《真相》系列(七十)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蘆笛

明鏡出版社

Mao Zedong Yongbing Zhen Rushen?

by

Lu, Di

Published in 2011 by Mirror Book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978-1-935981-25-1

Publisher:Pin Ho

Cover byYi Hua

P.O.Box366,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S.A.TEL:(516)338-6976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謹以此書獻給花費了大量時間與精力細心披閱本書、提供材料、並在各方面都作了中肯的批評和建議的摯友謝子石先生，以及關心本書寫作的遍佈五洲四洋的知音們。沒有他們的關心、鼓勵與幫助，本書就絕不會問世。



目錄

引 論

一、毛澤東神話的產生背景

在官修黨史中，毛澤東歷來被吹為驚天動地的軍事奇才，即使不算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也絕對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這神話至今長盛不衰，俘獲了各種各樣的人。即使是反共人士，也不是出之謾罵，便是把中共的勝利完全歸結於蘇聯的援助。這種感性發洩缺乏說服力，無助於破除我黨編造的毛澤東神話、實事求是地還原真實的軍事家毛澤東。

其實，毛澤東神話的流傳不足為奇，它有著深厚的傳統人文因素。套一句恩格斯的話，這是一個需要神話並製造了神話的國家和時代。

第一個因素，就是國人對戰爭藝術以及軍事家的傳統理解。《史記》、《三國演義》等文學著作，熔鑄了傳統的漫畫式的歷史觀與軍事觀。國人普遍是“唯謀略論”的堅定信徒，堅信戰爭不過是謀略大賽，何方謀略高出一籌，何方便能勝出。軍事家們獲得這謀略，並不需要專業訓練與實習，只需學會一本兵法秘笈，便能如張良、韓信、諸葛亮一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兩軍交戰的過程，就是一方全知全能，掌握了有關敵軍分佈與動向的所有信息，預見到敵人一切對策，因

而能按部就班地展開錦囊妙計，而另一方則一定只會嚴格按照敵軍統帥的設計行事，一步步乖乖掉入陷阱。這過程中絕不會有鬼子說的“戰爭迷霧”（fog of war，指戰爭中因情報不明，無法確定敵軍兵力分佈及動向，甚至不明本軍某部何在的混沌狀況。在全球定位系統［GPS］發明前，這種混沌情況乃是戰爭常規），也絕不會有打破原定計劃的意外事件發生。

這種對戰爭的幼稚理解，連玩多了電子戰爭遊戲的少兒恐怕都要嗤之以鼻。不幸的是，就是這種直線思維，構成了毛澤東神話的文化背景。在許多國人心目中，毛澤東就是新時代的諸葛亮。

其實，戰爭是參戰雙方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全面較量。所謂硬實力，指的是疆域、人力物力資源、武器裝備等客觀物質基礎；所謂軟實力，指的是主觀努力，除了軍隊的士氣與將士的作戰技能（包括統帥的謀略）外，主要是動員與利用資源的能力。隨著社會的發展，硬實力的內涵變得越來越多，在武器裝備中增加了工業生產力、科技水準、基礎設施、運輸與通訊能力、信息獲取能力等等古代沒有的內容，對戰局的決定作用日益增加。相比之下，作為軟實力的一部份，統帥的作用日益下降。在海灣戰爭中，聯軍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使用了類似漢尼拔在坎尼之戰的謀略，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然而謀略起到的作用只是加速了勝利、減少了己方傷亡而已，並不是決定勝敗的因素。以聯軍相對於薩達姆的全面的硬實力優勢，無論是換誰去作統帥，結局也絕不會兩樣，區別只在於傷亡的數量與戰爭的長短而已。

在生產力極度低下、毫無科學技術的古代，統帥的謀略對決定戰爭結局確能起到相當大的作用，而這就是“唯謀略論”在國人中至今長盛不衰的原因——它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原始以及

國人思維方式的嚴重滯後。其實，現代戰爭是西式戰爭，是一種 total war（總體戰），它比賽的是交戰雙方的綜合實力，將士們的主觀努力只能在客觀條件的制約下起作用。縱令子房、臥龍出任鴉片戰爭中的中方統帥，也絕對只會打敗仗。

即以主觀努力而言，現代戰爭也是一種系統工程。用劉伯承的話來說，它需要專業人員組織，並不是《三國演義》、《水滸傳》描繪的原始活動，也不是《孫子兵法》的籠統原則可以具體指導的。

西方自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便將勞動分工的原則推廣到一切領域之中，使得專業化成了整個社會的組建原則。不管在哪行哪業都如此，軍事部門也是這樣。西方國家早就作了不同軍兵種的分工。隨著時代推移和科技的發展，分工也越來越細化。無論是哪個軍兵種哪個級別的指揮，都要經過專業訓練才能勝任，靠看舊小說或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並不能獲得這種專業技能。

不幸的是，直到晚清，中國都還一直凍結在中古時代，社會組織不管是在哪個領域中都極為原始。就連教育都沒有分科，從無由專科教師分門別類傳授知識的學校。軍事領域就更原始。因為崇文抑武，傳統中國實際上沒有軍事教育，不說軍事院校，就連“武私塾”都沒有。將領們只能靠自學成才，不是“從戰爭學習戰爭”的行伍出身，便是自己看了點《孫子兵法》、《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老古董、連馬都不會騎的文人。軍兵種更沒有精細分工，除了古已有之的“馬軍”、“步軍”、“水軍”之外，就連工兵都沒有。用這種中古原始軍隊，去和把軍事當成博大精深的學科群、一代代加以鑽研發展的鬼子去打仗，當然只能大敗虧輸。

雖然兩次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仿效西方，建立了西式艦隊，但全軍的指揮機構卻始終停留在原始狀態。直到甲午戰爭時，中國仍未如日本那樣，效法西方建立陸軍部、總參謀部等專業機構，統帥李鴻章靠的還是遠古的幕僚制度。直到新政開始，朝廷才總算開始搭建此類機構，並在各地開辦西式軍校，組建新軍。歷史的嘲弄在於，這為抵禦外患而建立起來的軍事教育系統，培養出來的初級軍事人才根本沒在外戰中發揮作用，卻在民初軍閥混戰中紛紛成了弄潮兒。

當時中國軍隊的組織、將領的指揮能力與士兵的作戰技能都非常之差，到了現代人難以想像的地步。軍閥混戰那陣子，擁有一師兵力即可橫行天下，若非如吳佩孚那樣一度主宰中央政府，也能如趙恒惕那樣為一鎮諸侯。打仗就是蜂擁而前，對天亂放一陣槍，若是對方嚇跑了就跟著追；若是子彈打光了，敵人還不退，己方便掉頭就逃。這就是蔣介石何以辦個短訓班式的黃埔軍校，便能輕易打敗北洋軍閥。《劍橋中華民國史》指出：

> “鮑爾及其他德國軍官給予蔣介石軍隊的軍事訓練和軍事知識（雖然按照西方標準通常只是初步的），連同軍隊對蔣介石效忠的結合力，使這支軍隊無疑比他的任何政敵的軍隊在軍事上更有戰鬥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賴。”[1]

但用今日眼光來看，黃埔軍校也是兒戲。1927 年 5 月間，武漢國民政府下轄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叛變，率部進攻武昌。武漢政府急調葉挺率新組建的二十四師兩個團兵力迎敵，並將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後身）學生組成第一獨立師，以一團參戰，一團守城。參戰的學生團雖然已經受過多時軍事訓練，上陣後還是亂成一團。據隨團作戰的共產黨員教官高語罕報告，因平時作戰事訓練身上不帶子彈，現在身上驟然加了 30 多

斤，走路且感困難，何况打仗？因平時沒有打過或很少打靶，上陣後槍聲一響就亂放一氣，把自己的長官打傷不少，團長也因此受傷。因未經實戰訓練，戰鬥打響後只顧自己，不知協同。軍官們剛畢業，膽子小，不是躲著找不到人，就是藏到士兵後面，部隊一會兒就敗下陣來。葉挺情急之下，親自上前阻止，差點兒也被退下來的學生開槍打傷，不得已連斃數人，才把學生趕回陣地，但已全無戰鬥力了。葉挺的二十四師也是臨時湊合起來的部隊，自己打傷自己的也不少。幸虧夏斗寅部戰鬥力極弱，懾於葉挺和黃埔軍的威名，再加上民衆對之極爲反感，才自行敗退而去。[2]

不僅當時中國軍隊作戰能力極差，國家的工業和科技水準也非常低，廣大農村的道路、橋樑等基礎設施還處在中古狀態。“青年國際”代表達林曾記錄過北伐戰爭時的南國情景：

> “在中國南方，連能通過大車的寬路都沒有。軍隊走的是灌滿水的稻田間狹窄的田埂，過河是走獨木橋。士兵們就在那羊腸小道上一個跟著一個地魚貫前進。大部隊就這樣帶著機關槍、彈藥、行裝和給養行軍。這些東西全靠人揹——不是士兵，而是民伕。平均每個戰士至少有一到兩名民伕。機關槍全拆成零件裝在口袋或者籮筐里，民伕用扁擔挑著。”[3]

陳雲同志也如是說。他參加了長征，但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前後離開部隊，去莫斯科彙報。他告訴共產國際執委會，紅軍走過的大多是難以通行的羊腸小路。因為道路太窄，馬匹、騾子和毛驢反而給他們帶來麻煩。基礎設施的極度原始，保證了紅軍的安全：“我們從來不怕後面的追兵，因為道路太少，敵人不可能投入大量兵力，也很難將兵力在全線展開。”有時行軍極度緩

慢（“有一次，我們頂著傾盆大雨，跋涉在泥濘之中，花了 12 個小時，才走了 4 公里。” “由於軍用地圖上的位置常常標錯，我們常常走進死路而被迫走回頭路。有一個地方， 我們打了 3 天， 才走了 4 公里。”）[4]，但並未因此被國軍截斷、包圍和全殲，靠的就是極度原始落後的道路。

這種極端落後的狀況，為毛這位從未受過軍事科班訓練的文人提供了自學成才的空間。換到先進國家，或是換到現代，則毛這種“民間軍事家”絕無崛起可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人把毛當成《三國演義》上的諸葛亮倒也不錯：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靠自學成才的軍事統帥。

有助於毛澤東神話產生並長盛不衰的第二個人文傳統因素，是國人歷來崇拜“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大將風度”，是謝安在淝水之戰捷報傳來後的“矯情鎮物”：“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已破賊。’”這種“指揮若定”的氣魄，流於末端便成了視人命如草芥的鐵血心腸。

在這方面，偉大統帥確實滿足了大眾對大英雄宏大氣魄的期待。對國軍，他下的最頻繁的命令是“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對自家將士，他也動輒“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將來”；“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進佔長、哈及中東路”；“必須準備數萬人傷亡，要有決心付出此項代價，才能打得出新局面”；“準備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個旅”。當國後，他還殷殷教導各國共產黨黨魁們：“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

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5] 中外歷史上還從未有過氣魄如此之大的大英雄。

有利於毛澤東神話流傳的第三個人文傳統因素，是國人對“奇計”與“秘計”的執著愛好。所謂“奇計”，指的是《三國演義》上鄧艾以三萬精兵偷渡陰平直搗成都，以及魏延兵出子午谷偷襲關中一類出奇制勝。毛澤東本人就是這種奇計的愛好者，大約就是他反復發作的“外線病”的由來。但在我看來，這不過是一種瘋狂的賭博，用我黨的行話來說便是“軍事冒險主義”。而所謂“秘計”，就是《三十六計》裡典藏的那些好傢伙，也就是現代“軍事學家”們鼓吹的“超限戰”，其特點是毫無道德底線，爲了成功，什麼下作事體都能臉不變色心不跳地幹出來。在這方面，偉大統帥當之無愧是高手，其巔峰之作便是他在抗戰期間使出來的一系列秘計。

在偉大統帥的言傳身教之下，虎將們也深通各種秘計。1948 年 6 月 5 日，林彪、羅榮桓、譚政聯名下達《圍困長春的辦法》，命令部隊：“為反對長春守軍的人口疏散政策，對長市內出來之市民必須予以相攔，凡能堵回去者，務必堵其回去，使守軍對城市人口不能大量與迅速的疏散，而達成減少其糧食之困難。”[6] 不許百姓出城逃難，逼著他們去與守軍爭食，以此餓死敵軍。這種秘計，只怕連張獻忠都想不出來。長春圍城究竟死了多少無辜百姓，從來是黨國機密。國內《百度百科》根據民間調查稱，光國共雙方在城內城外掩埋的餓殍就有 12 萬人[7]。其他調查所得數據則比這高得多。解放軍中校作家張正隆在《雪白血紅》裡分別引用時任長春市長尚傳道之回憶錄稱“根據人民政府

進城後確實統計”“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和國民黨《中央日報》戰後報道稱城外“屍骨不下十五萬具”；日本媒體估計為二十至三十萬人。1975 年被釋放之“戰犯”段克文在《戰犯回憶》一書中說，長春圍城餓死了六十五萬。準確的數據，大概永遠被中共埋在黑幕裡了。

相比之下，共諜冀朝鼎糟害人民的神功簡直算不了什麼。他利用其與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特殊關係，主持擁有一億美元的“平準基金會”，擔任了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參與制定國府貨幣政策，成了國府最重要、最受信任的經濟學家。他不但利用其特殊地位向中共傳送大量經濟情報，而且據稱還為國府專出“與民爭利”的毒招。據說因為他的獻策，國府在抗戰勝利後推出 200 元偽幣兌換 1 元法幣的坑民政策，後來又發行“金圓券”，引出惡性通脹[8]，這一系列毒招損招，使得國府金融信用掃地，經濟崩潰，激起了國統區人民的憤怒，使得國民黨喪盡民心，為“反饑餓、反迫害”運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道義不論，就算毛的宏大氣魄與秘計果然有奇效，那光憑它們也決計無法奪取天下。中共奪取戰爭之所以取得勝利，是一系列主客觀因素決定的。

二、決定中共勝利的主客觀條件

中共奪權戰爭的勝利，是一系列特殊的歷史條件湊在一起造成的偶然事件，其成功經驗基本上無複製可能。

前面說過，戰爭是綜合實力的較量。中共擁有的只是軟實力優勢，這將在下文詳論。但僅有它尚不足以決定戰爭的勝負。如果反革命一方擁有壓倒性的硬實力優勢，則革命就絕無可能勝

利，甚至根本無法發動起來。只是一系列特殊的歷史條件碰巧湊在一起，才使中共獲得了千載難逢的崛起良機。

如所周知，辛亥革命引發了中國的自爆，使得中國淪為各路軍閥的戰場。中共起事時，軍閥大戰方酣。蔣介石馬不停蹄，一直卷在與各路軍閥的混戰中。先是寧漢分裂，後來又是北伐。表面上完成統一後沒幾天，軍閥大戰又以空前規模開場：蔣桂戰爭、中原大戰、福建事變、兩廣事變……。內亂之外尚有外患：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抗戰、長城抗戰、綏遠抗戰……。

這無窮無盡的亂局，不但給了我黨起事的可能，而且保證了它從來不是統治者的主要作戰對象，使得它獲得了武裝割據的時間與空間。當時真想鎮壓中共的，只有蔣介石與個別軍閥如何鍵。其他軍閥都把蔣視為比紅軍更現實的威脅，常常與中共結盟共同對付國府。因此，在抗戰爆發以前，蔣介石從未能騰出手來，心無旁騖地持續全力打擊中共。圍剿不但是斷續的，而且動用的不過是部份兵力。爲了控制西南軍閥，蔣介石甚至採用楊永泰之計，故意放走中央紅軍，借追剿為名，將國府統治延伸至西南。即使如此，當蔣介石得以比較認真地對付紅軍時，中共革命便立即走上了末路。幾個較大的根據地都被攻破，殘部被迫逃往陝北，瀕於滅亡。這一事實，充分證明了軟實力優勢並不能抵消硬實力。與信奉唯意志論的我黨的“唯物主義”宣傳相反，“人的因素”並不是萬能的。

恰在此時，日本人開始侵略，於是中共便死裡逃生，在鷸蚌相持中坐取漁人之利。此時中共既非日本亦非國府的打擊對象，便能在權力的真空中瘋長起來。待到日本投降後，其硬實力（地盤與兵力）已經壯大到難以消滅了。蔣介石雖然借抗戰消除了軍閥割據，完成了軍令政令的統一，有了持續打擊中共的可能，但

他對國家、軍隊、社會與人民的控制力卻遠非中共之敵。於是在蘇聯為共軍提供了強大武備之後，國府便再不是其對手了。

這就是中共崛起的大背景，是保障毛澤東勝出的最主要的客觀因素。抽去這個客觀因素，則哪怕比毛澤東英明一萬倍的天才去領導，中共也斷無勝利可能。

另一個客觀因素則是斯大林的戰略指導。如本書將要介紹的，如果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偉大舵手，則斯大林是偉大船長。偉大舵手幾次差點把船開翻了，全靠真正的戰略家偉大船長斯大林同志撥正船頭，指引航向，這才使得中共避開礁石，沖出險灘，從勝利走向勝利。

最後一個客觀因素便是毛的好運氣。讀者將在本書中看到，毛的許多戰略決策明明是昏招，然而卻因發生了一系列的意外事件，反而歪打正著。例如毛堅持北上逃蘇聯，本來只會喪命大漠，但到了甘肅後卻發現陝北有個根據地，因而倖免於難。但這不過是延緩了紅軍的死刑。此後他又讓其他紅軍也跳進那死牢，張學良卻又發動了西安事變，使紅軍不但逃脫了全軍覆沒的結局，而且在抗戰爆發後能利用地利迅速擴散到華北去。而西安事變能夠發生，完全是一連串偶然因素使然，用大白話來說便是撞上了大運。毫不誇張地說，毛是古今中外第一“福將”。

就主觀因素而言，我黨相對於國民黨最主要的軟實力優勢，就是林副統帥說的“精神原子彈”。在本質上，國際共運是一種現代宗教運動。它對醜惡社會現象的抨擊，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揭示”，以及對光明未來的允諾，使革命隊伍裡的識字分子堅信自己代表了“歷史發展潮流”，正在從事一種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正義的必勝事業，因而成了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宗教志士；對工農大眾，它邪惡的“階級鬥爭”理論將世間一切不

幸都歸咎於萬惡的“階級敵人”，能有效煽起他們的深仇大恨，並化之為強大的戰鬥力，再加上“打倒地主分田地”、“耕者有其田”的承諾，使得農民出身的戰士深信他們是在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戰。以這種邪教理論武裝起來的宗教軍隊，其鬥志之堅決、士氣之高昂、軍紀之嚴明，絕非世俗軍隊可以望其項背。

列寧的建黨理論則為中共提供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革命工藝學”，或曰“人民控制論”，是動員與利用人力物力資源的最強大手段。它靠建立一個兼有教會、軍隊與黑社會三重特點的革命黨，實行黨魁對黨員的絕對控制，再通過黨組織、特務機構（所謂“政治保衛部”）及其外圍組織（共青團、赤衛隊、兒童團、婦聯等等）去控制軍隊和人民，把轄區內所有的物質資源都捏在手裡，通過“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把所有的人都編織入由黨操控的無比嚴密的網絡，從而把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動員起來用於戰爭。黨實行鐵的紀律，對槍桿子的控制更是絕對的，因此共軍能化整為零，在“分兵以發動群衆”時，軍隊不但不會瓦解，還能去民間招兵買馬，使兵力雪崩式地倍增。其最輝煌的表演，便是抗戰期間共軍從三四萬人發展成百萬大軍。

此外，它特別重視宣傳，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把它變成了奪權和掌權的強大武器。黨建立並牢牢控制了高效率的現代宣傳機器，發展出了一整套揣摩民心、塑造民意、煽動仇恨的高明策略，既用它來對己方的軍民洗腦，又用它來嫻熟地搶佔道義制高點，進行威力無窮的宣傳戰，隱瞞己方的一切罪行與錯誤，卻不錯過任何一個機會抓住敵方的一切錯誤作足文章，剝奪對方的道義資源。林副統帥對此作了精闢的總結：“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要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桿子。”

相比之下，國民黨根本就不是這種動員型的極權政黨，沒有基層黨組織去控制、組織百姓並有效動員民間的人力物力。國民黨就連自家的政黨都無法控制，從來是四分五裂的大雜燴。軍隊就更不用說了。除了中央軍外，國軍基本是各懷異志的軍閥聯軍，動輒嘩變倒戈投降。以高度統一、意志如鋼、紀律如鐵的共黨去對付國民黨那種一盤散沙，孰優孰劣自不待言。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更是保守混亂的，對淺薄正義感特別充足的熱血青年毫無感召力。它更不懂如何開發利用百姓樸素的“道義”感，將其巧妙地化為戰爭資源，因而缺乏操控輿論、塑造民意的宣傳能力，在與中共的“道義戰”中只能一敗塗地。

正因為此，國府才會在“解放戰爭”中陷入兩條戰線的夾擊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9] 確乎如此，中共不但以“民主”號召騙取美國人與國內“第三勢力”的好感，更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等深得民心的口號在國統區煽起學運，使之成了密切配合中共奪權戰爭的第二戰場。

在我看來，這“革命工藝學”就是中共最終勝出的主觀必要條件。但這是中共從老大哥那兒學來的，是列寧同志的發明，不是毛的私人貢獻，不能算到毛頭上去。如果沒有毛，換其他人作黨魁，這主觀優勢照樣存在。

我黨的另外一個主觀優勢，是從蘇聯那兒學來的諜報工作。中共間諜人才輩出，對國民黨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滲透，滲透到超飽和的地步。其中既有擔任機要工作者，如著名的“前三傑”（錢壯飛、李克農與胡底）與“後三傑”（熊向暉、申健與

陳忠經），又有國軍高官，諸如先後任軍令部次長、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劉斐與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甚至在國府逃台後還有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國府的一切戰略情報均與中共慷慨分享，完全是透明的。就連戰術情報，中共都洞察無遺。遼瀋戰役中，參加義縣保衛戰的國軍軍官趙振華戰敗被俘後，被共軍長官提審。那長官走到牆上掛著的敵情要圖前，用手指著圖問他情況，他走上去一看，但見：

> “牆上掛的是第二十師在義縣防禦配備要圖，再仔細一看，上面的工事位置，兵力部署，小到連排，都與我們自己繪的絲毫不差。我當時大吃一驚，我們的軍事秘密，何以會被對方瞭解得這樣清楚，今天當俘虜是一百個應當的了。”[10]

中共從蘇聯學來的密碼偵破術也非常先進，共軍戰場指揮員因此對國軍動向與部署一清二楚。不但龔楚在回憶錄中介紹過[11]，李德也在回憶錄中提及，紅軍情報科日夜值班，竊聽和破譯國軍無線電報。第四次圍剿發動前，中共就得到“非常準確的情報”。類似地，在廣昌戰役發動前，紅軍事前就通過無線電偵察得知國軍發動進攻的準確時間地點[12]。李先念也承認：“曾希聖同志是我們黨的情報工作創始人。在紅軍時代，他擔任中央軍委二局局長……為毛澤東同志制定正確的軍事部署、指揮紅軍作戰，提供了許多準確無誤的國民黨軍事情報。”據他介紹，毛澤東曾說：“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像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周恩來也稱曾希聖是我黨情報工作“創業的人”[13]。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多次提到，他們不但根據偵聽到的國軍電訊制定作戰計劃，還經常將此類情報提供給一方面軍[14]。四方面軍負責偵聽敵臺情報的宋侃夫證實了這一情況。他還披露，中央紅軍在湘川黔地區行軍時很難偵聽到敵臺情報，四方面

軍電告的敵情起了重要作用。曾三也對他說：“你們提供的情報對我們是起了作用的，使中央紅軍避免了一些可能發生的遭遇戰。”文革中他挨批鬥，毛還因此發話說，宋侃夫過去是立了功的，不要老搞他[15]。反過來，共軍的密碼是蘇聯人編制的，連日本人都沒本事破譯。岡村寧次就曾承認：“戰爭中，我高級司令部照例收聽敵方無線電報。對延安發出的中共電報固然也曾截收並努力破譯，但因與蘇聯的密碼相似，始終未能破譯。”[16]

對國軍的戰略與戰術情報瞭如指掌，使得共軍不但在制定戰略計劃時能先機制勝，而且在進行戰鬥時可以實行“斬首戰術”，專門摧毀國軍指揮機構，令國軍不戰自亂。蔣介石為此傷透了腦筋。他告訴國軍將領們，共軍“能專找我們高級司令部和高級指揮官的所在地。凡是我們主力的調動，團長以上官長的行動，幾乎都被他們發覺。結果我們前方的高級司令部，往往遭受襲擊，高級指揮官往往被他們俘獲。這是他們八年以來，處心積慮，聚精會神所研究出來的對付我們的特種戰術。”“事實上一年以來我們最吃虧，最損失的地方也確實在於這一點。”[17]

那該怎麼辦呢？蔣介石想出來的辦法令人瞠目結舌：不是釜底抽薪，而是鍋中注水：他讓團以上各級司令部盡可能多設假司令部，司令官白天住一處，夜晚住一處，或住在營、連裡指揮；行軍時切不可騎馬或坐轎，“一切生活行動、服飾態度，要和士兵一樣”，這樣共軍“就不知道誰是指揮官了”[18]。如果被包圍，“切不可發出無線電報或電話向上級報告自己部隊死傷多少，糧食只剩多少”，因為共軍已掌握了我方的密電碼，“他在三五個小時內都可以翻譯出來”！[19]

既然明知如此，那就該採取主動措施，加強自家的反特除奸，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算沒本事設計“恩尼格瑪密碼機”，

起碼要頻繁改換密電碼吧？若不能這麼做，甚至連自家的密碼都不能信任，那就乾脆別作計劃，由各部將領相機行事算了。可老蔣制訂的計劃偏偏還非常僵死，不許將領自由發揮，於是便永遠讓我黨知己知彼，棋先一著。蔣緯國說：“國防部的高級軍官身邊有中共潛伏，所以變成了國防部的命令正本給中共，副本給國軍的情形，國軍的戰力遂大不如前，快速縱隊不是被殲滅就是自己崩潰。”[20] 拿著正本的共軍若還打不贏拿著副本的國軍，那當真是白癡了。而老蔣反復吃虧還悟不出身邊有間諜，也確實是白癡。但這並不是毛而是董必武、周恩來、劉少奇、曾希聖等人的功勞。如所周知，毛在蘇區主要是指揮打戰和從事政府工作，並不曾參與在白區建立並直接領導地下特工網，破譯密電碼的工作就更不是他領導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乃是，中共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集體努力的結果。創建紅軍的並不光是毛一人，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乃是其他人創建的。這些蘇區的紅軍使用的戰略戰術與毛用過的大同小異，乃是當地的紅軍將領獨立發明的。例如徐向前發明的“防禦運動戰”就頗有獨到之處，它不是如毛那樣誘敵深入，而是節節抵抗、遲滯、疲憊、消耗敵軍，時機成熟時再聚殲敵軍主力。無論是在鄂豫皖蘇區還是在通南巴蘇區，這戰術都行之有效，多次粉碎了優勢敵軍的會剿或圍剿。

即使是在毛徹底控制了全黨全軍之後，所謂“解放戰爭”的勝利也是集體努力的結果。不僅戰役指揮主要由地方將領策劃進行，就連正確的戰略決策的決定，也離不開劉少奇、粟裕、周恩來、朱德等人的貢獻，決不能把全部功勞都歸於毛一人。近年國內學者已經開始注意到這問題[21]，本書也將略作介紹。

三、真實的軍事家毛澤東

在摒除了上述因素後，再來客觀地評價軍事家毛澤東，則我認為他既不是什麼軍事學家，也算不上出色的軍隊統帥，更不具備實戰指揮能力。

毛澤東的智力缺陷，是他從未受過系統現代教育，徹底缺乏理論思辨能力。因此，在軍事學上，他並未提出過什麼合格的軍事理論。所謂“毛澤東軍事思想”並非理論，不過是共軍因為缺乏硬實力，出於求生本能，集體摸索出來的一套經驗規則。它既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作品，也沒有太多智力含量，其根本原則應該是三條：第一，戰略上防禦，戰術上進攻；第二，戰略上以少勝多，戰術上以多勝少；第三，戰略上的持久戰，戰術上的速決戰。

這三條原則，都是人數不多、裝備窳劣的軍隊克敵制勝的一系列必要條件鏈引出來的邏輯結論：敵強我弱——當然只會是敵人主動發起戰略進攻，己方處於戰略防禦；己方武器窳劣，就只能避免陣地防禦，靠人海戰術，以野外伏擊或突襲的方式主動進攻——要讓兵力居劣勢的軍隊有行使人海戰術的可能，就只能集中兵力打擊敵人的一路——要能打擊敵人一路，就必須在有利於己的地域上作戰，使得敵人無從發現自己的行蹤，而己方又對各路敵軍動態洞若觀火——要滿足這個條件，就必須發揚己方“人民操控術”優勢，將戰場選在內線，進行戰術上的速決戰與殲滅戰，否則有引起他路敵軍增援，使自己喪失局部數量優勢的危險。

但這一套經驗原則有其適用前提，並不是萬能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在處於戰略防禦勢態下，以戰術上的進攻消滅敵軍，藉

此一點點積累自家的地盤與兵力、削弱對方硬實力。但這過程能否進行下去，取決於雙方最初的硬實力基數。己方擁有的硬實力基數，決定了每次傷害對方、壯大自己的增量（Δ）的大小。如果己方太弱，對方太強，就算己方百戰百勝，但每次削弱對方、壯大自己的增量都太小，那麼己方硬實力再積累也無可能追上對方，就像《西遊記》上的鳳仙郡若想下雨，必須靠一隻雞去一口口啄完一座米山那樣。只要對方大獲全勝一次，己方便會輸光當盡，這個過程就會中斷，而這就是抗戰前快要發生的事——跳蚤是無法頂起被子來的。

問題在於，毛澤東並不是像我在此演示的那樣，以邏輯思維導出那幾條簡單原則，而是靠“實踐出真知”，從自身經驗中一點點摸索出了結論。因此，他錯過了上述最重要的第一條原則：只要敵強我弱大局不變，己方就只能處於戰略防禦。正因為此，他才會屢次為其智力結構中深厚的反理性因素左右，在敵強我弱的情勢下，迫不及待地想轉入戰略進攻，制定出令人目瞪口呆的自殺計劃。這將在本書中介紹。

不僅如此，因為缺乏理論思維能力，毛澤東只可能是任弼時說的“狹隘經驗主義者”。他看不出那幾條經驗規則的適用前提，卻把它們當成了萬應靈丹，因而刻舟求劍，在形勢已經改變之後還死抱著不放。例如他只是從直接經驗中體會到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性，卻不是靠邏輯思維推導出來的。因此，他既看不到只是在敵強我弱時才有此必要，也看不到其可行前提是敵軍打擊必須是斷續的而非持續的，這才能有“分兵發動群眾”的餘裕。因為不知道這兩條，他才會在共軍已經強大到可以與國軍決戰時，還令劉鄧大軍那支主力野戰軍放下殲滅戰不打，改行去當遊擊隊，去敵後徒勞無益地創造根據地。

又如自從井岡山的老土匪教會他“打圈子”的戰術後，它就成了所謂“毛澤東軍事思想”重要的一條。但毛澤東不知道，打圈子的目的是迷惑敵人，隱瞞自己的行蹤與動向，而這一般只適用於在群眾被黨組織控制的內線。若以大兵團去敵後搞這套，則無論怎麼打圈子也不可能隱瞞大軍的行蹤。而且，因為要比追兵走更多的路，軍隊只能持續急行軍，必定要因過度疲勞而造成大量非戰鬥減員，反而只能消耗自己。從這些例子來看，毛不過是個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狹隘經驗論者。縱是中國人缺乏理性思維能力，將這種人捧為“思想家”也未免太過分了些。

作為軍隊統帥，則我認為毛確有一定的戰略眼光，其最輝煌的表演，便是看出抗戰是我黨發跡的天賜良機，這當在本書中介紹。但這似乎是他唯一的真正的“平生得意之筆”，此前此後都不再顯示過類似的戰略目光。他的主要特點，是性格狂放，不拘小節，思維大而無當，流於模糊粗放，因此並不具備組織戰役的能力。惟其如此，他在決定了大略以後便放手讓下級去執行，自己不再干涉，更不會去操心那些戰術問題。這特點早讓張國燾看得清清楚楚了。在《我的回憶》中，張國燾寫下了他對軍事家毛澤東的觀察：

> “毛澤東……這個軍委主席過去是獨斷一切的，總司令等於虛設，現在他仍不稍變動。他逕行核閱所有軍事單位的文件，無論是情報、作戰計劃、軍隊行政，以至人事調動等，同時又逕行批定辦法，然後才交我們執行。這不特使總司令總政委變成了幕僚人員，簡直就是由他一個人唱獨腳戲。
>
> 毛澤東這種作風最為參謀長劉伯承所反對。劉伯承認為近代戰爭是有組織的戰爭，不能憑一個人的才智去處決。他

素來主張，作戰計劃應先由參謀長根據情報局長所提出認為正確的情報，交作戰局擬具方案，再由參謀長召集有關人員並徵詢政工人員的政治意見，擬定初步計劃，送總司令總政委批准，提交軍委會討論，或徑由軍委會主席審定，然後由總司令部下達命令實施。我支持劉伯承這一見解，認為我們如能這樣做，不僅可使軍事指揮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許多黨內糾紛。

毛這種獨斷獨行的作風，似已成為積習。在這點上，他和蔣介石一樣，不唯緊緊握著裁決權，而且有發號施令的欲望。換句話說，他不特執行最後的決定權，而且往往不讓任何同志有建議機會，就徑行予以指示。毛自負有過人的軍事天才，常以德國近代軍事家毛奇自比，他在江西蘇區時就曾因此和周恩來劉伯承以及德籍軍事顧問李特鬧得不可開交。遵義會議以後，周恩來做他的副手，也是受盡委屈。

另一方面，毛澤東也並不是一個精明的獨裁者。他富想像力，反應也很靈敏；他的思維有時也會走到很離奇的境界，甚至流露神話式的言論。他缺乏組織才幹，遇事不願作精確的計算。他所表示的意見，有時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豐富的語氣，為他的‘天才主張’作辯護。

他也是特殊的軍事第一主義者。他推崇中國古代的軍事理論，缺乏近代的軍事知識。他鄙薄當時軍事典籍所載的一切，認為都是陳腔濫調，他要不受拘束的發揮他的遊擊天才。他所擬具的軍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訓令’，常用激動的語句，描述某一任務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執行，而指示各個軍事單位分別負擔某些具體任務時，則常是很籠統的，似是讓各單位自行相機處理。

> 一般說來，我們當時都是一些遊擊專家，多少與毛澤東有相同的氣質，不過他在這方面發揮得最明顯，連我們都覺得他太離譜了。我曾經多次和他談論這方面的問題，覺得要與他溝通軍事上的見解極不容易，特別是想形成有組織的統一指揮，更是困難。”[22]

老張這番話，是他回憶自己擔任了紅軍總政委之後對毛的觀感，出了細節錯誤：那時毛並非軍委主席，連副主席都不是。他對毛專橫跋扈的評論不可能是那時的感受，只可能在他到延安以後。但這錯誤並不妨礙他觀察的準確。看出毛的專橫倒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其他評論則針針見血，於我心有戚戚焉。毛的智力構型特點確如他說：富有想像力，思維常常大膽而離奇，甚至荒誕不經，志大言誇，好大喜功，喜歡大手筆，卻又缺乏組織能力，痛恨受到約束，討厭刻板拘泥地行事，喜歡“打破框框”，天性與細針密線、一絲不苟的計劃工作格格不入，因而沒有耐心也沒有能力去“作精確的計算”，作出戰役的具體的組織與規劃，只能向將領提出提出籠統的要求，以訓令的方式下達軍事命令，指望將領們去八仙過海，發揮主觀能動性，完成他佈置的籠統任務。

國燾沒說的是毛為何會如此，其實那是他的智力構型與知識結構決定的。毛是個活在現代的古人，全部知識積累基本是劣質舊小說、《資治通鑒》等古史，以及各種爛報紙上的每一個字。因為他從古書中學到的陰謀詭計保證了他在權力鬥爭中的成功，他便對西方文明不屑一顧，不但徹底缺乏西方知識，也鄙視此類知識，認為中國既有的學問便已經囊括了全人類智慧在內，能為一切現實問題提供答案。他之所以知道毛奇，還虧一次大戰那陣子他正在讀師範，天天在圖書館看爛報紙。其實無論是老毛奇還

是小毛奇，都根本算不上什麼偉大的軍事家，毛知道的也不過就是他們的名字罷了。對現代戰爭特別是核戰爭是怎麼回事，他連起碼的概念都沒有，其實是在現實生活中有意無意地扮演《史記》乃至舊小說上那些“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傳統神人角色。

這就是為何周恩來要說，“解放”戰爭時期共軍總參謀部是世界上最小的參謀部。毛不需要參謀部，也不需要參謀人員，蓋他不知道怎麼使用那些人。他打的是一種舊式戰爭，當的是曹操、曾國藩、李鴻章式的舊式統帥，以手工業方式指揮戰爭，不需要專業人員分工合作，甚至連古代的幕府都不需要，一個人即可包打天下，這才是鬼子說的“一個人的戰爭”（one man's war）。

吊詭的是，這恰恰歪打正著。蓋抗戰爆發以後，中共的根據地由各種“山頭”組成，分散於華北、華中以及後來的東北各地，根本不可能像現代國家那樣，由總參謀部進行職業化指揮，只能由各地將領根據自己的情況各自為戰。中央軍委的職能不是組織指揮戰役，而是如國燾說的那樣，“用激動的語句，描述某一任務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執行，而指示各個軍事單位分別負擔某些具體任務時，則常是很籠統的，似是讓各單位自行相機處理”。這種“模糊統帥”恰好符合那種戰線犬牙交錯、各重兵集團彼此遠隔的特殊需要，使得將領能最大限度地因時因地制宜，發揮自己的才能。如果毛澤東也是蔣介石那種拘泥刻板的職業軍人，實行從白山黑水之間直到蘇北那情形千差萬別的“有組織的統一指揮”，只怕要輸得一塌糊塗。一言以蔽之，中共革命戰爭的特點，使得毛的天生缺陷反而成了一種主觀優勢。

這就是偉大統帥毛主席和西方統帥的區別：以斯大林格勒戰役和庫爾斯克戰役為例，這倆戰役都是蘇軍最高統帥部通過總參謀部仔細規劃組織的，並不是由斯大林或朱可夫或華西列夫斯基給方面軍司令部一個大致的想法，然後再由該方面軍司令部去組織戰役。作為軍事統帥，毛澤東更像個看棋支招的人而不像下棋的人。就連支招也不是告訴棋手該怎麼下，而是告訴他：左下角還沒落子，上那兒碰碰運氣去！

因為毛缺乏具體組織與指揮戰役的能力，甚至連軍事地圖都不會看，卻常常靠簡陋地圖來規劃大戰略，理想又常常脫離現實，所以他的戰略指揮時常給革命事業帶來損失。這就是負責實際指揮戰役的共軍將領何以會痛感需要一個真正的統帥，不但四渡赤水後林彪提出讓彭德懷負責前線指揮，請周毛朱隨軍主持大計，而且在“解放戰爭”的決戰階段行將開始時，粟裕也痛感需要一個真正的統帥來統一指揮中野、華野與陳謝兵團，使之“採取忽集忽分的作戰方式，以求能較徹底的殲滅敵人一路”，以兩三次殲滅戰促成戰局變化，並提議“請劉鄧統一指揮”[23]。但總的來看，中共奪權戰爭的特點，使得毛這個缺陷反而成了某種優勢，與蔣介石相比就顯得更突出。

老蔣最大的缺點是，他沒有戰略指揮才能，卻受過軍校教育，這種學校培養的不是將領而是低級軍官，所以他特別注意細節，下命令甚至連部隊在何處宿營的事都要操心，跟明朝那個楊嗣昌似的。當然這也是他的個性使然。老蔣生活極有規律，做事非常認真，跟老毛性格完全相反。這性格決定他毫無敢於賭博的大手筆，謹小慎微，絕對不可能是軍事奇才，但治國則最需要這種人，絕對不會引出大禍來。

另外一個缺點是他師心自用，經常越級指揮。據李宗仁說，蔣“喜歡坐在統帥部裡，直接以電話指揮前方作戰。抗戰時，他常常直接指揮最前線的師長，抗戰後對共軍作戰，他竟然連團長也指揮起來。他指揮的方法是直接掛電話，或直接打電報，故戰區司令長官甚至集團軍總司令和軍長都不知其事。有時一軍一師忽然離開防地，而前線最高指揮官還不知其事。但是蔣先生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往往軍隊調到一半，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益發使前線紊亂。蔣先生之所以要這樣做，實在是因為他未作過中、下級軍官，無戰場上的實際經驗，只是坐在高級指揮部裡，全憑一時心血來潮，揣測行事，指揮系統就亂了。”李還說：“長沙三次會戰時，薛岳本打得很好，不圖在作戰正緊張時，蔣先生一個電話把軍隊調亂，薛岳一時無法補救，被打得踉踉大敗，失了長沙。薛伯陵一氣，不聽統帥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隊撤到江西去了。後來薛岳幾乎為此受處罰呢！有人問薛岳，為何要到江西去。薛說：‘跑遠一點，他（指委員長）電話便打不通了！’這是抗戰期間，高級將領盡人皆知的趣事。”[24]

李宗仁極度憎恨蔣介石，其回憶錄感情傾向很強，且多文過飾非之處，未可盡信，但這兒的指控卻得到了蔣緯國的證實。據緯國說，徐州會戰期間，蔣介石竟給軍長胡長清空投命令，限時打下包家集。緯國於是跟總司令劉峙說，如果繞道而過去打雙堆集，包家集自然不戰而下。若保不住雙堆集，則拿下包家集也毫無用處。但劉峙知道蔣介石的固執個性，堅持服從蔣的命令，花了好幾天去打包家集，以致耽誤了雙堆集突圍。[25]

郭汝瑰也說：“一般人都唯恐負責，事事向蔣介石身上推，蔣也事無大小，一手包辦，坐在南京，憑這時的情報，在圖上指

揮，干涉小到一個師的細部行動。至於下級呢？明知錯了，也遵令執行，以免負責。”[26]可見這確實是蔣的一大毛病。

在我看來，毛澤東最大的才能，還是在權力鬥爭中使用匪夷所思的陰謀詭計，巧妙地架空上級，打倒競爭對手，排開衆人爬上去，再通過一系列高超的權術手段，把所有部下特別是將領們牢牢控制在手裡，此即韓信所謂“將將之才”。這才是他真正的專業，終生樂此不疲，直至生命最後一刻，他還在鑽研古書中的陰謀詭計。

例如延安整風那種高招，也只有他才能想出來。當然，這說起來也是從斯大林那兒得到的靈感。斯大林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主要區別，是斯大林把“階級鬥爭”擴大到黨內來，把黨內策略分歧統統說成是階級鬥爭，把權力鬥爭對手打成間諜特務，把布黨一切成就都說成是斯大林路線擊敗反動路線的結果，並按這調子重寫歷史，由他本人領導寫作班子編寫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書毛看了好多遍，大受啟發，從此學會了兩招：一曰偽造歷史，二曰引進“路線鬥爭”說，通過這兩招把所有的功勞都攬在自己身上，把政敵統統打成反革命。

雖然這是斯大林的發明，不過毛自己推出的鈍刀子倒確實是一大改進，確保了在戰爭時代能把人整怕整服而又不必殺頭，照樣能利用那些人為他效命。在這點上，應該說他強過了斯大林。

毛原來的上司、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對此深有體會，曾說“主席整人很厲害，主席對人也使用些‘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27]他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後吃夠了毛的苦頭，悟出了學習古書的重要，兩人竟然不約而同地讀起《資治通鑒》來。[28]

綜上所述，竊以為，毛澤東確有一定戰略眼光，但我黨吹的牛皮實在太大了。他絕對不是我黨描繪的那個偉大的軍事家。把

所有的功勞都歸到他頭上去非常可笑，歷史並非如此簡單。他不可替代的貢獻，還是在抗戰爆發後決定“放手發動群衆，壯大人民力量”，遊而不擊，專門發國難財，壯大共黨實力這條上。

具體來說，我認為黨神話在幾方面搗了鬼：第一，忽略了毛的學習成長過程。第二，隱瞞了毛指揮下共軍遭受的慘敗，甚至“反敗為勝”，將它們吹成是什麼“得意之筆”。第三，抹殺了集體的貢獻特別是職業軍人的貢獻，“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把所有的勝利都算在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頭上。因為它特別符合《史記》、《三國演義》塑造的傳統思維定式，於是國人也就毫無疑問地接受了這種天生就能神機妙算的神人。

為破除神話，茲不揣淺陋，根據中共自己發表的黨史資料，介紹毛在不同時期的一系列戰略失誤。因為閱讀有限，錯誤在所難免，還請識者教正。

第一章 井岡山:毛澤東的搖籃

一、秋收兒戲暴動

根據官修黨史，領導秋收暴動是毛澤東的第一樁功勞，在文革中甚至一度取代“八一南昌起義”，成了共軍的建軍節。實際上，官方捏造了兩個神話：首先，秋收暴動的計劃根本不是毛而是中共中央提出來的。其次，同時發動的農民暴動也不少，比較著名者有 1927 年 9 月 7 日廣州東江地區農民暴動。在此之前的 1922 年 5 月，“廣東農王”彭湃就開始在他家鄉海豐地區開展農民運動。至 1923 年 1 月 1 日海豐縣總農會成立的時候，會員已經有 10 萬人之多。1925 年，彭湃首次發動海陸豐農民起義，在當地建立起農民自衛軍，而海陸豐地區則是中共首次舉行工農兵代表大會、首次成立縣級蘇維埃政府的第一個蘇區。秋收暴動不過是當時中共在湘、鄂、粵、贛四省舉行的一系列暴動中的一個罷了。

早在 1927 年 7 月中旬，中共中央即已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組織民眾武裝起義的新政策，著手制定湘、鄂、粵、贛四省秋收起義的計劃。中共中央派毛澤東前往四川，但毛澤東請求仍回湖南工作。可他卻滯留在武漢不走，在那兒“指導湖南省委工

作”，以致中共湖南省委致信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稱書記毛澤東走後，由易禮容代，省委各部工作無不吃緊，盼望毛澤東回湘。中央也催不動他，只好改任易禮容爲書記。8 月 1 日，中共中央決定將南昌暴動“與中央決定之秋收暴動計劃匯合為一貫的鬥爭。在此原則之下，中央曾訓令湘粵贛鄂四省立即進行，響應南昌暴動”，為此決定組織湘南特委，以毛澤東為書記。 8 月 3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意欲“奪取一切政權於農民協會，殲滅土豪劣紳及一切反革命派，並沒收其財産”，計劃成立湘南政府，建設革命政權。為此，中央再次決定組織湘南特委，以毛澤東爲書記。然而儘管中央兩次作出決定，毛仍然遲遲其行，拖到 8 月 12 日才去長沙。[1]

毛滯留武漢期間，參加了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由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又譯“羅明那茲”、“羅米納茲”）一手操縱，把陳獨秀等人拋出來作替罪羊，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把毛從候補中央委員提拔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詳見下文對“路線鬥爭史”的介紹）。會議還決定在湖南發動秋收暴動。毛在會上批判了中央領導人，提了四點意見，其中一點是：

> “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以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2]

這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第一次表述，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其實最先是譚延闓提出的。毛澤東的個人貢獻，是在十一年後把它發展為“槍桿子萬能論”：

> “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衆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3]

“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甚至能造出文化來，成了萬物發生源泉，但不知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槍桿子除了“出政權”以及無量死屍外，還出過什麼像樣的東西？雖然這話無比荒唐，但“槍桿子萬能論”畢竟是毛澤東從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中總結出來的最主要的教訓。這教訓便成了秋收暴動的指導思想。

對中央舉行秋收暴動的計劃，毛提出了不同想法，那就是在湘南汝城組建一個師，以它為中心，佔據周邊四五個縣，“組織一政府模樣的革命指揮機關，實行土地革命，與長沙之唐政府對抗”，形成革命力量中心，達到推翻唐生智政府（也就是當時的武漢國民政府）的目的。[4]

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一度同意此案，但後來又改了主意，想組建一個師調往廣東。目的大概與後來的廣州暴動一樣：取得出海口，獲得蘇聯人源源不斷的武器支持，再來一次北伐。毛澤東不同意此方針，堅持“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佔據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最後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彭公達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並全權負責改組湖南省委，指定彭公達爲新的省委書記。[5]

毛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從武漢回到長沙後，成了新的湖南省委委員。在蘇聯駐長沙領事、共産國際代表馬也爾參與指導的省委會議上，毛再次提出“軍事為主”的暴動方針，指出“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上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這個暴動就可起來，否則終歸於失敗。……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此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6] 其他人提出要奪取長沙，毛同意了，放棄了原來的湘南暴動計劃，改為“以長沙暴動爲起點，湘南湘西等亦同時暴動，堅决地奪取整個的湖南，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7]。

但中央並不贊成，覆信指示：以長沙爲暴動起點的計劃在原則上是對的，但有兩個錯誤：一、靠外面軍事力量奪取長沙，這樣偏重於軍力，其結果只是一種軍事冒險；二、專注意長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收暴動工作（如放弃湘南計劃，並沒有積極地有組織地去準備長沙、湘潭、瀏陽、醴陵、湘鄉、寧鄉等處暴動）。中央認爲：湖南暴動，可以湘南爲一發動點，長沙爲一發動點，在寶慶（今邵陽市）一帶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動點；“湘中發動，集中軍力，撲城取長沙”；湘南、湘中的暴動盡可能地同時發動，免陷一地於孤立。[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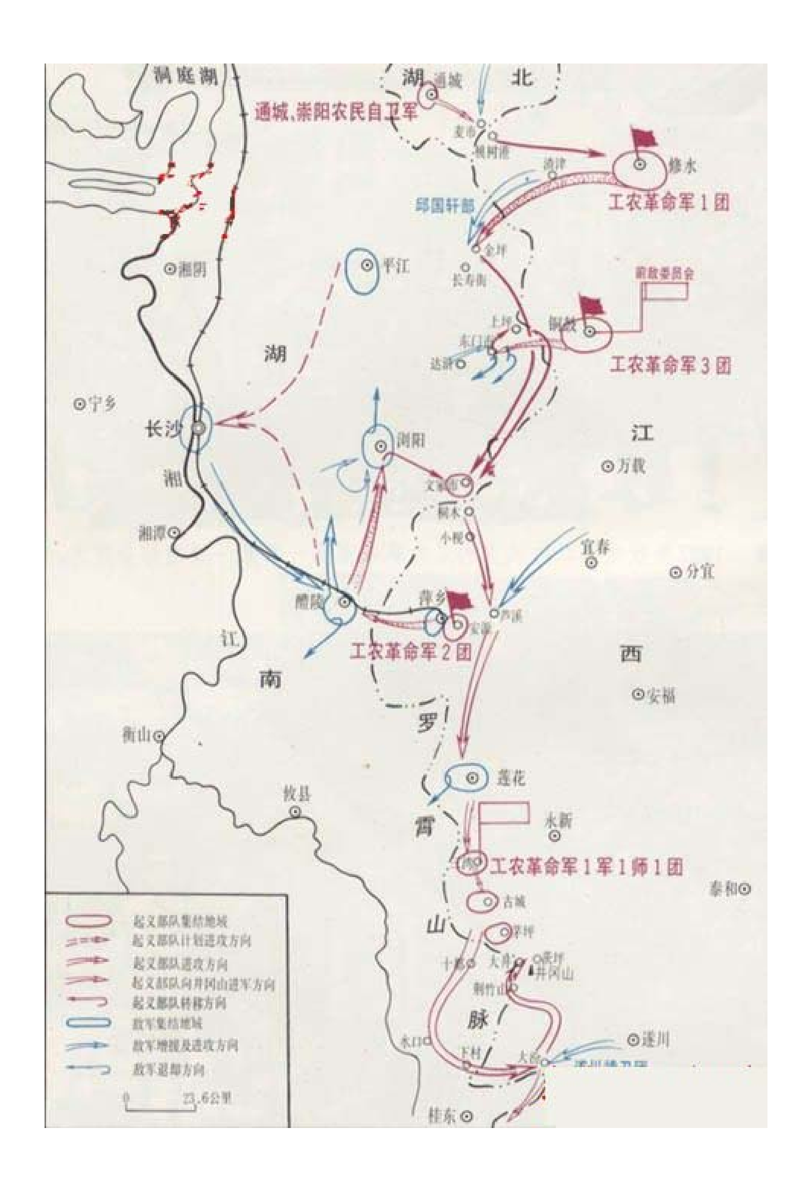
簡言之，中央主張各地同時一哄而起，主要靠群眾暴動去奪取全省，而毛則認為“沒有兵力的擁衛去奪取”政權不過是自欺。兩者的分歧，是正宗列寧主義者與絲毫不懂馬列的“人造黃油馬列主義者”的區別。列寧主義強調的是依靠群眾暴動，反對單純的軍事冒險，而這就是十月革命的光輝道路。而毛澤東卻從軍閥起家的事實中總結出“槍桿子萬能論”，知道靠暴民不可能

打倒軍閥，必須用軍隊去對付軍隊。幸虧毛不懂馬列，這才最後拉起了紅軍。蓋十月革命之所以靠群眾暴動成功，完全是時代的偶然造成的——那時俄國的軍隊全都在前線與德軍對峙，所以布黨靠武裝起來的工人和水兵組成的赤衛隊即能輕易奪取政權。但那特例根本就無法在中國複製。所以，毛“偏重於軍力”其實是對的。

但毛放棄了原來的湘南暴動計劃，指望靠三團兵力長途奔襲，去把長沙打下來，那就是搞笑了。按列寧主義的正統話語，此乃標準的“單純軍事冒險”，或曰“左傾盲動主義”，頗有點像孫中山的“十次革命”那種兒戲暴動。當然這也可以理解，毛不過是個小學教員出身，受過的正規教育只是個文科知青水準，此前從未接觸過軍事工作，組織能力又差，要組織指揮這種大規模行動，當然力不從心。於是秋收暴動當然只能是兒戲暴動，其與南昌暴動的區別，是它似乎就沒有貨真價實地“暴動”過，南昌暴動好歹還打下了南昌城，而秋收暴動的全過程，似乎就是把共黨原有的三個團的兵力“拉練”了一番，沿途損耗兵力，殘部潰退到井岡山上去落草（見下頁圖）。

暴動計劃是湖南省委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制定的。他依靠的兵力是三個團，稱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駐修水，以盧德銘警衛團爲骨幹、由平江工農義勇軍和崇陽、通城農民自衛軍組成；第二團駐安源，由安源工人糾察隊、安源礦警隊和安福等縣部分農民自衛軍組成；第三團駐銅鼓，以瀏陽工農義勇隊和警衛團一個營組成。這三個團裡，只有盧德銘的警衛團是正規軍。盧德銘是共產黨員，在八一暴動之後兩天由武昌率隊去九江，擬加入暴動部隊，見到張發奎業已分共，而葉挺賀龍等

人已經撤離南昌，於是準備沿贛邊去廣東與葉賀部會合，因路途梗阻而滯留湘東贛北一帶，此時便由毛拉來做起義軍總指揮。[9]



毛的暴動方案是：第二團進攻萍鄉與醴陵，向長沙取包圍態勢；第一團從修水向平江進攻，並發動平江農民在全縣暴動，奪取平江後再向長沙推進；第三團由銅鼓向瀏陽進攻，並發動瀏陽農民在四鄉暴動，逼進長沙。毛本人隨第三團行動。

連外行都看得出來此乃兒戲從事。即使三個團的兵力合在一起去打長沙都是開玩笑，何況是兵分三路去攻城掠地？暴動失敗後，中央批評湖南省委在秋收暴動指導上“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動應以農民群衆爲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變成了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認為毛澤東應負嚴重的責任，決定撤銷其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職務[10]。中央所謂以農民群眾為主力是扯淡——烏合之眾豈能是正規軍之敵？但毛澤東靠三個團分三路去長途奔襲長沙，那就絕對是“單純軍事投機”了。其實他應該把隊伍不聲不響地拉到湘南地區，在那兒發動湘南農民暴動，如朱德後來幹的那樣。不過即使是那樣，最後還是得上山。

如此“軍事投機”，結果當然是三路都碰得頭破血流：第一團在進攻金坪時，由師長余灑度收編的一個團突然倒戈，使第一團腹背受敵，遭受較大損失。盧德銘於是率部向第二、第三團靠攏。第二團在攻克瀏陽縣城後陷入重圍，倉促突圍，潰不成軍，突圍出來的殘部退向瀏陽文家市。第三團在東門市附近與敵激戰受挫，撤退到瀏陽孫家塅與第一團會合。當第一、第三團及第二團殘部會師文家市時，五千多人的隊伍只剩下了一千五百多人[11]。師長余灑度等人主張休整後再進攻長沙。毛澤東不同意，認為打長沙必敗，主張退到山區去。他的理由是：哪個朝代消滅過山大王？何況我們當“山大王”已和過去根本不同，有共產黨的

領導，有黨的政策，將來必會取得勝利。他說服了大家，隊伍沿著羅霄山脈南撤。[12]

由此可見，毛之所以把殘部拉上井岡山，乃是為了當“紅色山大王”。這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原教旨，稍知馬列基本教義或思想略微新潮的文人都不會這麼做。但他不懂馬列主義，卻把《三國演義》與《水滸》當成了畢生鑽研的經典，走投無路時上山落草再自然不過。實際上，上山落草一直是他的理想。據他的學弟說，他微時對舊友說自己的志向是：“造反！斬白蛇，起義師，成王、敗寇。”“梁山泊英雄好漢從土匪幹起。”為此勤習曾、左、彭、胡的治兵要略，還兩次步行繞洞庭湖，試圖結識湘西土匪幫會。據那人說，如果毛沒有碰上李大釗，最可能到湘西做土匪[13]。八七會議後，瞿秋白曾徵求毛澤東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意見。毛澤東表示，不願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願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14]。所以，井岡山道路也只可能由毛這種知識結構陳腐殘缺的人來開創，而《水滸傳》之類遊民文化經典也就是毛的第一部軍事教科書，是它們指引著毛上了井岡山。

二、井岡山道路——從傳統山大王到紅色山大王

在黨神話中，毛一上井岡山，就開闢了所謂“井岡山道路”，發明了建立、保衛與擴大革命根據地的全套政治軍事戰略戰術，整個中共革命就是這套戰略戰術在全國範圍內的放大推廣。這完全是捏造。事實上，所謂“井岡山道路”是死路一條，建立紅色根據地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戰略戰術是集體摸索出來的，而毛澤東在這個過程中，不但開始學會怎麼打仗，而且完成了從

經典山大王到紅色山大王的本質轉變。陳毅同志當年寫給黨中央的報告，為這真實過程作了大致勾勒。

紅色山大王與傳統山大王的本質區別，在於前者有個堅強的黨組織領導，能將轄境內的民眾充分發動組織起來，靠宣傳去煽動“階級仇”，分裂民眾，製造所謂“階級分化”。黨再以鄉村二流子為“革命先鋒”， 開展土地革命，將貧苦農民煽惑起來，去清算、搶奪與屠殺富戶，以梁山泊“投名狀”的方式將他們捆在黨的戰車上，從此再無退路，只能和黨幹到底。黨依靠其中的中堅力量，無情剷除“階級異己”，開展“紅色清鄉”與“肅反”，將民眾牢牢控制住，並建立地方政權、地方武裝、赤衛隊、兒童團等一系列組織，把保衛根據地的任務分散落實到每個可靠的百姓頭上。這樣，即使紅軍暫時撤離根據地，民眾仍然能保持對紅軍的忠誠。

這用陳毅的話來說，就是“群眾割據”，不是“紅軍割據”。所謂紅軍割據，是只用軍事力量佔領地盤，群眾懾於紅軍聲威而臣服，但並不真心擁護，紅軍一旦處於弱勢，群眾就會反水；而群眾割據則是出於群眾自身的要求，自己武裝起來驅逐敵人，自行管理區域內的大小事件。據陳毅說，整個井岡山時代的邊界割據，都只是紅軍割據而非群眾割據，“紅軍大半用的是染紅的政策，而不是用說服宣傳的態度，使得他們自己紅起來的，因此在邊界赤白鬥爭中農民反水常常見到的。”[15]

這一套“革命工藝學”本是蘇聯人的發明，並未寫在毛澤東的聖經《三國演義》與《水滸傳》上，因此他當然不懂。他上井岡山時，手下大約六七百人，與早就落草的土匪袁文才、王佐的兵力大致相當。井岡山歷來是土匪盤踞之地，易守難攻，但資源貧乏，人口稀少，沒有發展潛力，只適合宋江一類沒有搶天下野

心、只求安身立命的土匪存身。毛初期的作為也與綠林好漢差不多，其戰略是“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亦即以井岡山為安身立命之處，若山下風頭緩了，便分兵下山搶給養（美其名曰“打土豪”）並擴展地盤；山下風頭緊了，官軍來剿，便將兵力收縮回來據險抵抗。如此一漲一縮，便稱為“波浪式”。這基本是山大王的套路，談不上什麼現代的戰略戰術，毛更連個像樣點的根據地都沒能建立起來，割據的只是寧岡一部，發動和組織群眾就更談不上了。

正因為毛的“工農革命軍”的作派與傳統土匪太相似，因此並未引動地方政府的注意。朱毛會師前，官軍只有過一次動用營級兵力的“進剿”，戰鬥規模很小。1928 年初，朱德在湘南暴動，大肆燒殺搶掠，激起成千上萬的農民暴動[16]，又被官軍追剿，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在軍民聯手痛擊之下，朱德立足不住，便於 1928 年 4 月間逃往井岡山落腳，真正的邊界割據這才開始。

朱德帶來了上萬人馬，與毛的隊伍編為 3 個師 9 個團，稱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這是抄襲北伐“鐵軍”張發奎所部第四軍番號。這 9 個團中，朱德帶來 7 個團，毛的秋收暴動殘部有一個團，王佐、袁文才的綠林武裝編為一個團。井岡山只適合小股土匪安身，本來就已人滿為患，現在一下子又來了這麼多人，根本就不可能養活。據龔楚回憶，當他們初次見面時，毛講到經濟糧食困難，“立即便愁眉苦臉”，在第一次軍政會議上的講話中，毛就指出“今後經濟問題最為嚴重，應請省委及中央設法接濟”[17]，可見那地區完全是死地，沒有發展前途。

據陳毅同志向中央報告，無論是毛澤東還是袁文才、王佐，都不歡迎朱德帶來的龐大隊伍：

> “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四軍各部會合於江西寧岡，成立了四軍，並有軍委，但黨內不統一，軍隊各自為政。袁王為保存自己的老巢，很不願朱部及湘南農軍這樣多人在寧岡，使他目標大惹下大禍，主張四軍到贛南去。毛部頗有自了之心，看見朱部及農軍那樣混亂，不願意（合）夥，主張他們自己到平瀏（回北遊擊），朱部及農軍（向南遊擊）到贛南，軍委則隨朱部出發。朱部及農軍尚一致主張到贛南，因為寧岡沒有飯吃，實在不滿意袁王及毛部的態度。……當時的分南分北的政策大部建築在各部的私利上，尤以袁王的自私，毛部的自了不管，引起朱部及農軍的不滿。這個政策決定後並未實行，因為一二日後朱部二十八團即擊潰江西敵人四團，佔領了永新，經濟問題得到了解決大家又合夥起來。”[18]

朱德到來前，毛已經折騰了半年，但什麼局面都沒開創出來。朱德來後，邊界割據才開始形成，短期內便進入了陳毅所謂“邊界鬥爭的全盛時期”：紅軍迭獲勝利，在寧岡、永新及蓮花一部大大地發展了邊界黨和群眾組織，按人口均分了田地，成立了各級蘇維埃政府，各縣都建立了赤衛隊的群眾武裝，還開辦了紅軍醫院，成立了紅軍學校[19]。不難想像，如果毛澤東堅持排斥朱德部，則絕不會有此新氣象。

儘管如此，當地實在太貧瘠，無法養活多兵，部隊便不能不一再縮編，先是從 9 個團減為 6 個團，後又在 5 月初遣散了湘南暴動農民組成的第 30 團與第 33 團約四千人。據陳毅說，遣散湘南農軍是紅四軍軍委的決定，軍委常委嫌人數太多無法整理，造成了嚴重的給養與紀律問題，因此在他們要求走時便樂得讓他們走，農軍回去後大部受了損失，紅軍日後無人補充，引起黨內極

嚴重的批評[20]。紅四軍只剩下 4 個團約 6 千餘人，其中 28 團是朱德的老班底，也是紅四軍的主力部隊（林彪就是該團的），第 29 團由湘南農民軍組成，第 31 團是毛澤東的秋收暴動殘部，第 32 團則是袁文才的綠林武裝。這些部隊中，只有朱德的 28 團算得上是職業作戰隊伍，29 團次之。毛的 31 團和袁的 32 團兵力和戰鬥力都不強，在後來反會剿中都只承擔守山任務。主要作戰任務由朱德的兩個團承擔。因此，如果井岡山真是革命搖籃，保衛那搖籃的主要還是朱德，他才是正宗的紅軍之父。

從一開始，朱毛關係就很不融洽，其中既有戰略戰術上的爭論，更有權力鬥爭與性格衝突。毛澤東天性自負專橫，酷愛把持權力，任人唯親，排斥異己，又極為多疑，心胸狹窄。朱德雖然天性忠厚溫和，卻也無法長期忍耐，發生衝突是必然的。正因為毛澤東的性格太惡劣，最後才引起眾叛親離。1929 年 6 月 22 日，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召開，大會批判了毛澤東“形成家長制度的傾向”。儘管中央指定毛任前委書記，大會仍然違反了中央指示，選陳毅為前委書記。毛被迫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並指導地方工作[21]。爲解決此事，9 月下旬，周在中央軍事會議期間和陳毅多次談話，强調要鞏固紅四軍的團結，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並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澤東繼續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會後，周審定了陳毅根據會議和談話精神代中央起草的給紅四軍的指示信。信中批評了朱德、毛澤東各自在工作中的缺點，要他們及前委注意糾正，並要前委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信中說：

> “朱毛兩同志工作方法的錯誤。第一，兩同志常採取對立的形式去相互爭論；第二，兩同志常離開政治立場互相懷疑猜測，這是最不好的現象。兩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

主觀的或不公開的毛病，望兩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糾正這些影響到工作上的嚴重錯誤！”[22]

作為上級，周恩來當然只會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以示不偏不倚。但朱德的人緣好與毛澤東的人緣差一樣，都是有口皆碑的。因此，周在這兒數落的毛病：好與人對立、以惡意揣測猜疑對方以及在背後搞陰謀詭計（所謂“不公開”），其實都是毛澤東的性格缺陷。毛澤東的老部下何篤才曾對黃克誠說，毛澤東這個人很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論政治主張，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他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還舉例說，像李韶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會順從，騙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結果，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這樣的組織路線，何以能服人？[23]因為反對毛，何篤才後來被當成 AB 團殺掉了，可見毛之狠辣。

朱毛不和，使得湘贛邊界在進入三個月的全盛期後，便迅速走向所謂“八月失敗”。上引陳毅語錄已經說明，“朱部及農軍尚一致主張到贛南，因為寧岡沒有飯吃，實在不滿意袁王及毛部的態度”，只是爲了反擊官軍追剿，打下了永新城，覺得有飯吃了，才又與毛合夥。偉大領袖大概看到朱德的部隊確實能打仗，打開永新城後又讓他得以找到壓寨夫人賀子珍，於是改變了當初的排斥態度。在以後幾次會剿中，主要承擔作戰任務的，都是朱帶來的兩個團特別是 28 團。但朱德畢竟是職業軍人，他看出井岡山沒有發展前途，並不贊同毛的“波浪式推進政策”，更無法忍受毛的專橫跋扈。據龔楚回憶，會師後不久，朱德即對毛澤東極為不滿。他跟龔楚說，毛凡事獨裁，事前都不商量，全由他個

人決定，等到要立即行動時才通知他。他不反對毛獨裁，但事情總需時間準備才行[24]，因此總想離開毛澤東向外發展。

撇開權力鬥爭因素，光從軍事的角度來看，朱德當然是對的。井岡山的致命缺陷是地瘠民貧，無法養活多兵，毛的“波浪漲縮術”再折騰也成不了大氣候。而且，該地雖有天險，但缺乏迴旋餘地，容易被敵軍封鎖。若敵軍長圍久困，紅軍無法下山去白區“打草穀”，朱德的扁擔用不上，遲早要餓死。

不光朱德看出這點，中央、湖南省委和邊界特委也看出了這點，很不以毛的偏安思想為然，屢次要求毛離開井岡山向湘南發展，創建湘鄂贛邊區。朱德同意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的意見，認為井岡山周邊地區已民窮財盡，就是白軍不來也無法堅持下去，不但軍費無法籌措，就連軍服都無法解決，必須佔領較大地域，才能解決目前的困難[25]。於是朱德便帶著 28 團和 29 團，離開井岡山去湘南奇襲郴州。打下郴州來後，由湘南農民組成的 29 團思鄉心切，便逃散了，招致所謂“八月失敗”，朱德只好率部返回井岡山。此事被毛當成藉口，在給中央的報告（後選入毛選第一卷，題為《井岡山的鬥爭》）中大肆攻擊杜修經等人“冒進”。其實他才是只圖苟安一隅的山大王。如果井岡山道路就這麼走下去，那很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中央蘇區了。

朱德帶兵離開期間，井岡山遭到圍剿，激化了朱毛的矛盾。朱認為毛權力慾極強，秉性固執而又凡事獨裁，處處想控制朱德為毛守住井岡山。而井岡山糧食缺乏，沒有發展前途，必須向外發展，不同意毛的波浪式擴張。而且，毛常反對湖南省委和中央指示，朱認為那是出於個人主義不惜反對上級，朱不願跟著毛抗命。此外，紅四軍本應由前委領導，但毛自行組織紅軍黨與地方黨的聯席會議，以此代替前委，繞過朱德等人擅作決定。毛認識

到中共革命全靠軍事鬥爭，因此處心積慮要控制紅四軍，在突圍後試圖直接控制紅四軍主力 28 團（也就是朱德兼任團長的基本隊伍）。為此不但將嫡系 31 團的黨代表調去當 28 團的黨代表，而且執意提拔營長林彪當團長，要朱德放棄兼職。朱德不同意，毛竟將消息洩露給林彪，致使林彪對朱懷恨在心，成了毛的死黨。最後朱德為了顧全大局，只好讓林彪當了團長，毛從此牢牢掌握了紅四軍。[26]

朱毛的糾紛甚至為共產國際知曉。蘇聯在抗戰時期派駐延安的情報員弗拉基米洛夫有如下記載：

> “1930 年 1 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接到金一松（譯音）的報告，題為《論朱德和毛澤東的紅軍問題》：朱德（由於在湖南南部打了敗仗）受到嚴厲批評。毛澤東知道，這次敗仗大大地損害了朱德的威信，便力圖利用這件事對朱德的權威給予決定性的打擊。毛澤東想把一切權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但是，他一心只想抓權，當然對付不了局勢。而從朱德來說，他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不想去干預毛的事情。朱德宣稱，毛澤東要負一切責任。很難說誰是誰非，但是應當指出，無論如何，群眾對毛澤東是不滿意的。”[27]

李德在其回憶錄中也相當準確地記錄了朱毛的衝突：

> “在毛澤東和湖南省委之間發生衝突時，朱德和毛之間也發生了嚴重分歧。朱德批判毛當時的深居井岡山、以井岡山為中心‘陀螺似地向外擴展’的軍事策略；毛責怪朱‘理論上無知’、‘機會主義傾向’，因為朱執行了省委的指示，出征湘南，而這次出征以部分失敗結束了。1929 年再次會合以後，毛一步一步削弱朱德作為軍隊領導人的威信，把朱的政委陳毅和當時還只是營長的林彪拉到自己一邊，彭德

懷和劉伯承不久也被毛爭取過去了。朱德屈服了，形式上他還是總司令，但從此以後就不再起什麼獨立的、決定性的作用了。”[28]

李德是 1933 年才到蘇區的，只可能從第二手來源得知朱毛在井岡山的衝突。然而他瞭解到的信息竟然如此準確，說明此事在中央蘇區早已不是秘密。不過，他大概不知道，朱德在第二次離開井岡山後，曾再次試圖擺脫毛澤東。

1928 年底，國軍發動三省會剿，井岡山道路便走到了末路。朱德眼見無法守住井岡山，便主張扔下那荒山轉移，而毛主張憑險死守。爭論了一個月後，最後決定以 1/3 的兵力扼守井岡山，以 2/3 的兵力跳出外線，佔領江西敵人後方，使得江西軍隊回援，以此打破會剿[29]。歷來的規矩是朱德帶兵出外打仗，毛澤東和袁文才留守。但這次官軍勢大，毛看出了兇險，便提出要隨大隊轉移，大家也只好答應了[30]，於是守山的任務就交給了恰在此時來到井岡山的彭德懷率領的第五軍，以及袁文才的 32 團。

紅四軍主力在 1929 年 1 月初下山後，在大庾（今大余）被贛軍三團擊敗，只好沿著閩粵贛邊界“轉進”，把彭德懷扔在井岡山不管了。國軍輪班窮追，紅軍先後在平頂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等地四戰四北，只好急速逃命，每天必須強行軍 90 華里以上，疲憊不堪，而且所到之地群眾組織薄弱，給養非常困難。朱德力主分兵，以團為單位自謀生路，這樣行動快，容易逃脫，而且人少了，也就容易解決給養，恢復軍隊紀律，並減小目標，而毛則主張集中兵力作戰，說分散了就會被敵軍各個擊破。2 月間，朱毛終於分兵，“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著來依依不捨，所（以）終沒有分開。”[31] 其實是毛澤東賴上了朱德。

逃到瑞金與寧都交界的大柏地時，紅四軍“以屢敗之餘作最後一擲”，擊潰了國軍劉士毅師。待逃到興國、吉安、永豐交界處的東固時，紅四軍得到了由李文林等人領導的東固紅軍二團與四團的掩護，才獲得一周多的休整。此時朱毛得知井岡山業已失敗，於是決定到閩粵交界處遊擊。3 月間，蔣桂戰爭爆發，國軍忙著火拼，再顧不上剿紅軍了。紅四軍絕處逢生，進入閩西，擊潰了國軍郭鳳鳴旅，打下了汀州，開創了閩贛根據地，為日後建立中央蘇區奠定了基礎。[32]

由上介紹可知，第一塊紅色根據地，其實是朱德到來之後才開創的。從 1927 年 10 月至 1928 年 4 月，在朱德到來之前，毛澤東基本按照梁山泊模式行事，佔山為王，基本沒有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武裝與群眾組織。朱毛會師後，紅軍才將控制的地域從井岡山一地擴大到周邊三個縣，更開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基層政權與群眾組織，這才算是建立了湘贛邊界根據地。即使如此，按陳毅的評價，它也只是“紅軍割據”亦即單純的軍事佔領，群眾沒有真正發動起來。

紅四軍逃下井岡山後，吃夠了沒有群眾組織與地方武裝支持的苦頭，蕭克回憶道：

> “部隊在冰凍寒天中行走，很多人衣著單薄，大部分人穿草鞋。群眾沒有受紅軍的影響，有的逃跑，即不跑，對我們也是懷疑的。地主武裝還來騷擾。我們既要對付後面窮追不捨的敵人，又要克服自然界的重重困難。這一段行軍很危險，也很艱苦。”
>
> “有一天走了 20 多里，天快黑了，我們就在一個村子住下。離住地四五里的村莊，有個黨支部。快半夜時，幾個黨員來報告，說敵人天黑後到了他們村裡，情況十分緊急，我

們立即起床，悄悄出發了。若不是地方黨的同志來報告，第二天拂曉我們就有可能受敵襲擊。毛澤東後來曾以此例來說明軍隊做群眾工作、建立地方黨組織的重要性。”[33]

就是通過總結這些正反兩面的教訓，毛和其他紅軍領導人才逐漸發展和完善了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全套措施。它們並不是毛一上井岡山便無師自通地推出來的。

此外還有黨中央的指導，例如周恩來曾在中央的指示信中指出：

“（紅四軍）前委在過去忽略了所到地區之群眾的日常鬥爭。……紅軍四軍經過許多群眾未曾發動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號，應該細心去瞭解群眾日常生活的需要，從群眾日常生活鬥爭引導到政治鬥爭以至武裝鬥爭，這種鬥爭才是群眾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單純軍事力量的發動，才不是少數個人英勇的硬幹，才會團結廣大群眾在黨的周圍，這對於地方黨部工作之幫助，特別要指示這一點。”[34]

因此，客觀說來，毛澤東佔據井岡山，除了為朱德的隊伍提供了個暫時的落腳點外，無論是從政治上還是從軍事上來看都毫無意義，根本就不是什麼紅色根據地的樣板。如果不是朱德去與毛澤東會合，如果不是毛澤東被迫跟著朱德走下井岡山，那麼他也就不可能完成從古典山大王到紅色山大王的實質性轉變。井岡山只對毛個人的成長有意義，對中共革命並無意義。它之所以變成“革命的搖籃”，完全是毛製造的神話。

爲此，毛不惜向公眾隱瞞了他與朱德終生的不和，只對親信洩露他對朱的惡感。在文革中，他曾對王力說，“朱德每次重大路線鬥爭中不是站在對立的方面，就是不大清楚”，儘管如此，他仍然要保朱德和陳毅，那是因為“從井岡山就是總司令朱德、

政治委員毛澤東、政治部主任陳毅”，所以毛一定要保他們[35]。由此可見，毛保這兩個人，完全是出於維護“井岡山神龕”完美無缺的政治需要。此所以他讓朱德做了一輩子空頭司令，這實在是對待他根本不信任的“同志”、同時又能維持神話完整的絕佳辦法。這種詭計，天下也只有毛澤東才想得出來。

三、毛澤東的四個師父

毛的第一個師父是施耐庵。秋收暴動時，他毫無軍事經驗，當然只能按照舊小說裡學來的套路行事。他上井岡山，就是看中了它的險峻，想像梁山好漢那樣，以井岡山為據點，向周邊作“波浪式擴張”。 在前委給中央的報告裡，他提到了這一戰略：

> “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衆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遊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衆，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衆。’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衆，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36]

這兒所謂“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就是宋江戰略，亦即以井岡山為進退的出發點，“革命高潮”到來時，便下山擴展地盤，“革命低潮”到來時，便上山據險抵抗。毛篤

信“天險萬能論”，生怕下山被消滅，多次向中央强調：“此間係羅霄山脉中段，地勢極好，易守難攻”[37]，“寧岡能成爲軍事大本營者，即在山勢既大且險，路通兩省，勝固可以守，敗亦可以跑，且敵人絕對無法把我圍著，若加上各縣黨與群衆的基礎，實在可以與敵人作長期的鬥爭，若此刻輕易脫離寧岡，‘虎落平陽被犬欺’，四軍非常危險”[38]，“在四圍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割據，利用山險是必要的。”[39]

這不過是土匪千百年的老套路，根本不可能推廣到全國去——沒有天險的地方又該怎麼開創革命根據地？從發展來看，它是一種作繭自縛的自限性戰略，把自己拴死在窮山惡水中，自己規定了人員和地域的擴張上限；從防禦來看，它自動放棄了遊擊戰與運動戰必需的迴旋空間，很容易被敵軍封鎖剿滅。有無看到這一點的眼光，構成了朱德與毛的衝突。然而毛固執己見，直到三省會剿開始，才被迫放棄了死守天險的戰略，與朱德一道撤下井岡山，從此再沒回去過。此後紅四軍在長嶺寨一戰取勝，打死國軍旅長郭鳳鳴，佔領了汀州，紅軍人槍都大為增加，最後在閩贛邊界創建了大塊根據地。如果按毛澤東的原設想，以井岡山為中心向四周作波浪式擴張，則這新局面根本就不會開創出來。

據蕭克說，紅四軍在逃到東固後，前委開會研究，“乃決定拋棄固定區域之公開割據政策”。他認為：“這個決定有重要意義，原先我們都有一種在固定地區作長期鬥爭的思想，認為只有‘固定區域的公開割據’才是正確的，現在這個決定，實際突破了紅軍初創時期在認識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為以後在閩贛兩省大範圍的遊擊行動，以至最後創立中央蘇區，打開了一條道路。”[40] 這說明，毛終於從失敗中悟出了原來死守天險的苟安戰略是錯誤的。

對此關鍵性的戰略轉變，彭德懷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在死守井岡山三天後，天險被打破，只好率部突圍，轉戰各地，最後創建了湘鄂贛邊區根據地。他在逃下山後總結了教訓，認為在當時條件下，不可能建立“鞏固的後方”，只可能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前者是指敵軍打不進來的後方，後者則是指敵軍能打進來，但我軍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進來，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斷反復，人民群衆始終擁護我們：對紅軍掩護、偵察敵情，對白軍襲擾、封鎖消息，對當地反革命分子，群衆自動看押，甚至鎮壓，這樣的根據地就算是鞏固的”，“如井岡山那樣的，只算軍事後方，我們守了三天，被敵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進來，三十天也是會打進來的”[41]。正因為沒有鞏固的後方，即使是鞏固的根據地敵軍也能攻入，因此不宜像在井岡山那樣，建立醫院集中醫治傷兵，只能把傷患寄在群衆家醫治。

這才是創建根據地的正確指導思想。毛的宋江戰略的假定，是井岡山如梁山泊一般，始終不會被攻陷，但這只能發生在章回小說中。如果紅軍始終以井岡山為“波浪漲縮”的中心，把它當成攻不破的後方，那就勢必給拴死於其上，既不利於尋找權力真空，大刀闊斧開拓蘇區，勢必錯過蔣桂戰爭、中原大戰等天賜良機，也無從實施誘敵深入的積極防禦。無論是攻還是守，都是消極被動的戰略。待到天下粗安，紅區仍然只會是疥癬小疾。老蔣不必動用中央軍，只調地方武裝即可一鼓蕩平。事實上，無論是紅四軍還是紅五軍，都是離開井岡山後才創出點基業來，最後合成了所謂中央蘇區。因此，似乎可以說，彭德懷這一重大反思結果，奠定了現代農民戰爭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我黨領導的農民暴動隊伍發展出了與嘯聚山林的傳統草寇劃然而別的全套戰

略戰術，而就是這套戰略戰術，構成了所謂“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大內容。

據彭德懷說，他是對中央巡視員潘心源說這番話的，但這是重大戰略主張，他在 1929 年 4 月 1 日跟毛再度會合後，肯定也會說起。12 天後，毛以中共紅四軍前委的名義給湘贛邊界特委寫信，承認了過去的錯誤：“守勢的根據地的觀念，以後應該拋弃，大小五井、九隴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敵來了就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對付他。”[42] 這很可能就是彭德懷的意思，起碼是毛聽取了他的建議。不管怎樣，此後毛確實放棄了從舊小說上抄下來的呆板戰略，把“建立鞏固後方”改為“建立鞏固根據地”，由此才發展出“誘敵深入”的運動戰原則，不再搞宋江式死守天險了。

陳毅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紅軍需要根據地，但並不一定得是井岡山那樣的天險，主要的是有黨和群眾的組織，肅反工作有了成效，具有相當的地勢就可以了。紅軍不必死守根據地，應靠地方群眾去保衛[43]。周恩來也曾代表中央指示：

> “要知在統治階級政權未崩潰以及革命高潮未到來的時期，紅軍應該是採取經常遊擊的政策，若停留在一個地區，或企圖固守一個地帶，求其繼續存在，這不但可能而且必然陷於失敗。過去羅霄山脈政權的經驗告訴了我們。”[44]

所以，“羅霄山脈政權的經驗”，只證明了宋江戰略行不通，井岡山道路是死路一條。

毛澤東的第二個師父，是井岡山的一個老土匪。1927 年 12 月，毛澤東對部隊官兵講了戰術問題，他說:“走路，連兩三歲小孩也會，可是說到打仗，走路是一門好大的學問哩！他舉了個

例子，從前井岡山上有個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幾十年交道，總結了一條經驗:‘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毛委員說打圈是個好經驗，當然土匪打圈是消極的。我們要改它一句：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了避實就虛，殲滅敵人，使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強敵來了，先領他兜個圈子，等他的弱點暴露出來，就要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乾脆俐落，要有繳獲。最後他笑著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賺錢就來，蝕本不幹’，這就是我們的戰術。”[45] 官修《毛澤東年譜》也證實了這說法，並說那老土匪名叫朱聾子。[46]

這就是毛澤東學會的第一個遊擊戰術，後來他將此寫在給中央的報告裡，上引“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就是從那個“井岡山的老土匪”那兒學來的。

朱德則是毛的第三個師父。他多次在不同場合下聲稱，他是將遊擊戰術引入紅軍的第一人。在斯諾著《西行漫記》中，他說，1913 年-1915 年期間，他任滇軍營長，駐防於中越邊界，跟“蠻子”部落和土匪作戰，他把作戰經驗與學校學到的知識結合起來，發展出了機動遊擊戰術。此後他便用這戰術來“對付反動派軍隊”。至 1922 年，“我的特殊戰術已經出名，使人害怕”，以致劉湘想委他為師長[47]。後來他又對史沫特萊說，他上井岡山後，立即和毛召開了會議，他在會上為紅軍制定了基本戰術，歸納為著名的十六字訣，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48]。1944 年，朱德更在編寫紅一軍團史座談會上說：“退出湘南，就上井岡山同毛主席會合。從這時以後，我們這支隊伍才開始有組織的遊擊戰爭。關於遊擊戰爭，我還有點舊的經驗。過去從 1911 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打了十年，總是以少勝多。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採

取了遊擊戰爭的戰法。記得在莫斯科學習軍事時，教官測驗我，問我回國後怎樣打仗，我回答：戰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當時還受了批評。其實，這就是遊擊戰爭的思想。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起了一點帶頭作用。”[49]

這兒說得明明明白：紅軍“開始有組織的遊擊戰爭”，始於朱德上井岡山，他“起了一點帶頭作用”。膾炙人口的“十六字訣”、“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等“毛澤東軍事思想”，其實都是朱德首先提出來的，並非毛的發明。

龔楚的證詞與此一致，他也說，在朱毛會師後開的第一次前敵委員會會議上，朱德就提出了十六字訣[50]。據官修黨史，毛澤東在代表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下了這十六字訣，但毛寫那信是在朱毛會師一年後。因此，看來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掠人之美。

其他紅軍也獨立制定了類似的戰術原則。1929 年春，段德昌率洪湖游擊隊進入江陵、石首、監利開展游擊戰爭，建立了三縣紅色政權。8 月，鄂西游擊總隊成立，段任參謀長，後代總隊長。在游擊戰中，段德昌與周逸群一道，首創“敵來我飛、敵去我歸、敵多則跑、敵少則搞”的游擊戰術。

類似地，1929 年 9 月間，開創鄂豫皖蘇區的徐向前、戴克敏和曹學楷共同研究，總結了以下幾條戰術原則：

（1）集中作戰，分散游擊；

（2）紅軍作戰儘量號召群衆參加；

（3）敵情不明，不與作戰；

（4）敵進我退，敵退我進；

（5）對敵采取跑圈的形式；

（6）對遠距離的敵人，先動員群衆擾亂敵人，再采取突擊的方式；

（7）敵人如有堅固防禦工事，不與作戰。

戴克敏還提出了游擊隊員的“八會”：跑、打、集、散、進、退、知、疑。

徐向前還說：“這些東西，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們頭腦裡固有的。它是部隊和群衆實際鬥爭經驗的提煉、概括、總結。”[51]

確實如此，這不過是簡單的經驗總結，是常識範圍內的東西，發現這些經驗規則並不需要什麼過人才能。遊擊戰古已有之，從來是土匪對付官軍的戰術。若從楚漢相爭的彭越算起，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土匪總是以寡擊衆，面對聲勢浩大的官軍，出於生存本能，當然只能實行“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自發摸索出一套飄忽無定、避實擊虛的遊擊戰術來。因此，遊擊戰不但不是毛澤東的發明，也不是朱德的發明。如上所述，朱德自己就承認，他的遊擊戰術最先是在滇南剿匪時從土匪和“蠻子”那兒學來的，後來又在井岡山與毛澤東師從同一老土匪。據他對史沫特萊說，他將井岡山的老土匪朱老聾子的教導奉為座右銘：“你用不著知道怎樣打仗，只要知道怎樣包圍敵人就行了。”還自稱“我學了朱老聾子的很多戰術”，用於對付國軍採用的日本軍事戰術，即以小股快速部隊攻擊其後衛和側翼，將其切成幾片。如上所述，這朱老聾子也是毛的師父，乃是井岡山的臥龍先生，朱毛的共同師父，道道地地的國師爺。

然而這一套戰術有其適用範圍，決不能當成萬應靈丹，不分場合機械套用。周恩來看到了這一點，曾指示紅四軍：“關於一般戰術問題，如前委來信所提出之波浪式推進，兜圈子以及十六

字訣等辦法，應就實際情況去運去（用），不能定為一個原則。”[52]

確實如此，毛澤東的一大智力缺陷，就是“狹隘經驗論”，把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規律當成永恆真理。他不知道，“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一般只適用於內線作戰，蓋百姓會為紅軍提供給養，通報敵軍動態，對敵軍隱瞞紅軍行蹤。紅四軍在逃下井岡山後就因缺乏這些條件而吃足苦頭，連戰皆北，幾乎潰散。可惜毛卻沒看出這點來，後來在四渡赤水時又把這套使出來，創造了“不打仗又死那麼多人”的人間奇跡，以致幾乎引起政變（詳見下）。

毛的第四個師父，便是彭德懷。如前所述，他和朱德一道，打破了毛從《水滸》中學來的宋江戰略。不僅如此，彭德懷還在其自述中委婉地暗示，指揮中央蘇區頭三次反圍剿並不是毛一個人的功勞。例如第二次反圍剿確定阻擊和伏擊的地點其實是彭作的決定，毛還問他是否有危險，云云。在歌頌毛的英明偉大的同時，他還是忍不住披露：“毛主席對戰役部署，固然是異常細心地反復思考，力求無缺；對戰術問題也是異常細心地反復推究，特別是不恥下問，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53] 披露了這些戰事其實是毛向革命軍閥學藝的過程。

陸定一在毛死後曾說，我黨最初是靠軍閥教會打仗的，是他們教會紅軍怎麼組織參謀部，怎麼看地圖，怎麼利用地形地物，怎麼部署兵力，配置火力，安排預備隊，等等。他只是沒有點出具體的“軍閥”的名字來。其實這也不難想見，無非是朱德、劉伯承、彭德懷、黃公略等人罷了。儘管他們受的粗淺專業教育用西方眼光來看不值一提，但在內戰中也就夠用了——李宗仁不過就是廣西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的麼？那還算是高學歷了。他還很看

不起黃埔將領，說黃埔軍校學制也就只有半年，什麼都學不到。先總統蔣公只上了個士官預備學校，連士官生都不是，居然也就成了全軍最高統帥。學歷比老蔣高得多的朱德等人做毛澤東的教師爺，當然綽綽有餘。在很大程度上，國共雙方的將領都是自學成才。既然雙方都是邊學邊唱的票友，當然學習的危險就不是那麼大了。

竊以為，毛就是這麼“從游泳中學會游泳的”。他不是職業軍人，在起事之初當然不可能具備指揮戰鬥的能力，初起事時不過是拿民團練刀，等到朱毛會合後，自然也就有人代他去具體策劃戰事了。而且，以他粗放浪漫的氣質，也沒有那耐心去詳細規劃兵力部署，組織後勤，因此很可能終生都不具備實際指揮戰役的能力。不過此人造反作亂的天賦畢竟很高，看來看去，也就看出門道來了。因此，儘管他在後期可能仍不具備戰役指揮能力，只能給出大戰役的大致設想和基本要點，但能做到這點，也就算是一個稱職的戰略家了。

因此，有如說井岡山是革命的搖籃，不如說它是哺育毛成長為軍事家的搖籃。作為第一個紅色根據地，井岡山只有象徵意義，毫無實質意義。如果不是國軍圍剿逼迫毛走出了那搖籃，如果沒有朱德和彭德懷等革命軍閥作他的師父，那麼井岡山充其量也就是個遲早要被官軍踏平的梁山，而偉大統帥也就只會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被剿滅的草寇之一。

當然，毛也有自己的貢獻。即使是在當經典山大王期間，他的部隊與傳統土匪仍有本質區別——黨的領導，也就是具有上文說的列寧發明的“人的控制論”裝置。以政治委員監軍，實行“黨指揮槍”，乃是蘇俄紅軍總司令托洛茨基的發明，中共作了模仿。但此前的黨軍如葉挺獨立團和南昌暴動的隊伍，都是支部

建在團上，黨組織沒有紮根基層，難以切實控制士兵、掌握部隊。這一缺點在秋收暴動失敗後便暴露出來。在撤退到江西三灣村時，原來 5000 多人的隊伍只剩下約 1000 人，大部分減員都是逃兵。很明顯，若不加強對部隊的控制，則殘部很快就會潰散。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毛規定班、排建立黨小組，連隊建立黨支部，團建立黨委；連以上各級設黨代表，由同級黨組織的書記擔任；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如此即將他這前委書記對部隊的控制深入到了班排一級，將各級指戰員牢牢置於自己掌中。這一改革，賦予了共軍不會自動潰散的優點，使得“分兵以發動群衆”有了可能，保證了古已有之的遊擊戰爭發展為人民戰爭。因此，這軍制改進雖與戰略戰術沒有直接關係，但仍應視為毛的一個貢獻。

當然，這制度的完善也離不開其他同志。例如陳毅在報告中就曾指出，連上成立支部，但營不設黨委，只設直屬小組，在營單獨活動時頗感不便，於是在營部增設了黨委[54]。而且，這一套也不是永遠有效，例如在後來的所謂“八月失敗”中，28 團與 29 團由朱德率領南下打郴州，由湘南農民組成的 29 團回到老家後就自動潰散了。但與沒有這套制度的舊軍隊相比，紅軍仍然是一種不會被輕易打散、更不會隨便倒戈的新型軍隊。

毛的第二個貢獻便是戰術上的“鄉村包圍城市”。據龔楚說，毛雖是文人，對軍事問題的理解卻很敏銳，發明了“鄉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爭戰略，亦即以軍隊配合赤衛隊，控制住縣城週邊的所有鄉村，不准一切物資以及人民入城，並以紅軍一部控制交通要道，襲擊國軍運輸與通訊部隊，斷絕城內一切接濟和通訊。國軍只好派兵出城採購糧食，一出城便遭到紅軍與赤衛隊襲擊。給養斷絕後，國軍只有撤出城市，在撤出時又會遭到紅軍伏

擊或追擊。在整個國共戰爭中，這是我黨全面使用的戰略，稱為“控制面，截斷線，包圍點”，亦即控制鄉村，截斷交通線，包圍城市。如此即能充分發揮我黨組織控制群衆的優勢，避免我軍缺乏重武器、不善於攻堅的劣勢，確實是一種天才發明[55]，其最輝煌的表演，便是長春圍城。

第二章 “紅區正確路線代表”

一、真實的“路線鬥爭”史

官修黨史告訴大家，在中共革命鬥爭中，自始至終貫串著兩條路線的鬥爭，在遵義會議前有過四次：第一次是大革命中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第二次是瞿秋白的左傾盲動路線，第三次是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第四次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而偉大領袖毛主席則一直堅決抵制和反對歷次錯誤路線。遵義會議奠定了毛主席的領袖地位，全黨全軍這才化險為夷，從勝利走向勝利。偉大領袖本人一直是這神話的最熱情最執著的宣傳者，越老越甚，晚年跟祥林嫂一般，一開口便是“十次路線鬥爭史”。

我黨所謂“路線鬥爭”，說穿了不過是政策爭論，並不是什麼政治立場歧異。無論是列寧式革命黨，還是西方的議會政黨，黨內有政策爭論乃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但斯大林主義區別於列寧主義的特點，就是不容許黨內有不同意見，把黨內的策略分歧當成敵我鬥爭，甚至把赤裸裸的權力鬥爭冠以“路線鬥爭”的名號，藉此將權力競爭對手打為階級敵人。例如結束新經濟政策、實行農業集體化本來是托洛茨基的主張，然而斯大林、季諾維也

夫與加米涅夫爲了與托洛茨基爭權，結成三駕馬車反對之。季一加失勢後，又轉過去與托洛茨基結盟，採用托氏的主張反對斯大林，形成“左派反對派”。斯大林聯合布哈林將三人打下去後，轉身又撿起托氏的主張，把它當成自己政策的推行，引起布哈林反對。斯大林又把布哈林、托姆斯基等“右派反對派”打下去[1]。由此可見，這些所謂路線鬥爭的唯一“原則”，就是爭奪黨的最高領導權。斯大林在肉體消滅了黨內反對派、變成了說一不二的大獨裁者之後，便著手篡改歷史，在他主持寫作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將蘇俄的革命史歪曲捏造為一部“路線鬥爭”史，所有“錯誤路線頭子”都是“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的間諜”，而他這位唯一的“正確路線代表”則與各種各樣的“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鬥爭，這才使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這部偽史傳到延安後，立即引起了偉大領袖的注意。他反復看了十遍，學會了父皇這手厚黑學高招，於是照貓畫虎，召集胡喬木一干人，刻意挑選和篡改黨的六大以來的文件，編出中央文件彙編《六大以來》，在此基礎上編造出中共版的“路線鬥爭史”——《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通過延安整風，把這套偽史強行灌注給全黨。這過程已經在高華先生的傑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詳細介紹過了。

其實歷史的真情非但不是那麼黑白分明，簡單明快，而且常與毛捏造的神話相反。

我黨第一次“路線鬥爭”是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展開的。十月革命後，蘇俄陷入文明世界的敵視與封鎖。爲了打破這孤立被動局面，列寧發明了所謂“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的理論，企圖向第三世界輸出革命，在西方強國的後院放火，剝奪

其廉價原料來源與傾銷市場，從而剝奪西方工人的高工資和福利待遇，迫使他們起來幹革命，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統治，使得全球都變成赤旗的世界。土耳其和中國為此先後被莫斯科選為“世界革命”的“試驗田”。這就是毛澤東為何要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坦承：“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他說得很清楚：那“馬克思主義”是俄國人送來的，不是中國人如玄奘一般上門去求來的。

上門送貨的密使最先是維經斯基（又譯為魏金斯基、威金斯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他建立了中共最初的小組織。此後馬林又奉命來華，策劃了中共第一次黨代會。但馬林比較現實，看出中共實在沒什麼搞頭，向共產國際報告：“知識份子……公開表示同情蘇維埃俄國和共產主義，就像南方的孫中山一樣。但知識份子不能深刻領會他的國家資本主義思想和意向，所以同政治運動沒有任何聯繫。他們在自己那個小圈子裡研究社會主義的書本。”[2] 因此，中共唯一的出路，是與國民黨合作。

據此，中共在二大正式決定加入共產國際，成了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由共產國際派遣代表直接領導。1922 年 4 月，“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到廣州會見孫中山，提出國共兩黨建立民族革命聯合戰線，並建議“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加入國民黨”。據陳獨秀說，孫中山嚴詞拒絕了這建議，只允許中共及青年團分子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而不承認黨外聯合[3]。於是馬林便建議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獲得了斯大林的同意。

從此，國民革命便處於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下。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 122 次，做出了 738 個決定。指導中國大革命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幾乎全部來自莫斯科，並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親自執行。只有一

小部分是在這些代表嚴密監督下，由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執行。維經斯基把俄共中央政治局給他的指示歸納為四條，第一條是“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國革命[4]。這就是說，中國革命必須服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在兩者發生矛盾時，莫斯科就毫不猶豫地“舍魚而取熊掌”。

但國民黨是個大雜燴。賣國父孫文俯首聽任莫斯科指揮，難免引起黨內右派不滿與抵制。作為權謀高手，斯大林認為中共可以實行孫猴子鑽進鐵扇公主肚皮裡的戰術，從內部篡奪國民黨的領導權，對國民黨右派“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後才將他們像榨乾的檸檬一樣扔掉”[5]。

蘇俄派到廣州作孫中山顧問的鮑羅廷忠實執行了這一戰略。他以俄共的模式改組了國民黨，並在這過程中實行提拔左派、壓倒並驅逐右派的方針，以此促進國民黨分裂，達到最終將國民黨改造為一個激進的革命黨的目的。為此，他把國民黨的“左派”諸如汪精衛、蔣介石等人以及中共黨人諸如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等人提拔起來，佔據了重要領導崗位。

托洛茨基從一開頭就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在 1926 年 3 月“中山艦事變”發生後，他更是力主共產黨立即退出國民黨。1927 年 3 月，當北伐軍向上海挺進時，他更預言蔣介石的軍隊佔領上海後，資產階級將會急劇右轉，而共產黨將在這種轉變中遭受失敗，中共必須立即退出國民黨，組織蘇維埃以取代國民黨。但斯大林拒絕了這一建議，命令中共繼續與武漢國民政府合作。托氏激烈反對，聲稱這是重複過去的錯誤，再度預言這政策必將招致失敗。但斯大林堅持 “共產黨人必須參加武漢國民

黨及其革命政府”。直到托氏的預言再度成真，汪精衛“分共”之後，斯大林才改變了政策，命令中共開始蘇維埃革命。[6]

因此，真正的“路線鬥爭”是在莫斯科進行的，中國政策成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路線鬥爭”的重大內容之一。這政策當然也在中共內部引起了爭議，例如陳獨秀和張國燾都聲稱，他們曾主張中共保持獨立自主，但鮑羅廷拒絕了這一要求，聲稱“現在是共產黨應爲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7]。中共黨人本是莫斯科的雇員，當然只能服從開工資的大老闆。因此，所謂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乃是斯大林的革命路線，陳獨秀不過是共產國際拋出來的替罪羊而已。

其實第一次國共合作對雙方都有利。中共就不必說了，1923年中共開三大時，只有 420 名黨員。過了短短三年多的時間，黨員人數就劇增至近 6 萬人[8]，不但極大地擴大了影響，而且盤踞了要津，甚至滲入軍隊，掌握了部份軍隊，這才有本錢在國共破裂後發動武裝暴動，實行武裝割據。如果沒有國共合作，那麼中共也就是在書齋裡高談闊論的寥寥幾個憤青而已。

為一般人忽略的是，國民黨也從第一次國共合作中獲取了巨大利益。蘇俄給的幾百萬金盧布不必說，如果不是鮑羅廷對國民黨作了脫胎換骨的再生手術，那它至今仍然只會是一個沒有綱領、沒有黨章、沒有黨組織、沒有黨員名冊、不會組織群眾也不會組織基層政權、連份黨報或黨刊都沒有、不知道宣傳自己的政策方針（也沒有什麼政策方針）、更沒有黨軍的烏龍幻影，連烏合之眾都談不上，絕對沒有統一廣東的能力，遑論統一全國；而若非鮑羅廷把蔣介石一手提拔為黨軍統帥，北伐也不會那麼順利。

因此，辛亥之後中國的兩次統一，都是蘇聯人輸出革命的結果，區別只在於國民黨“斷奶放單飛”要比中共早得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鮑羅廷才是真正的雙重“國父”——中華民國（準確來說是“中華黨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父。賣國父孫文本人就承認這點。1924 年 11 月，孫中山北上與馮玉祥等人談判，動身前，他給國民黨要人留下手諭：“鮑羅廷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聽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樣。”[9] 這才是真正的《總理遺囑》，後來由汪精衛捉刀的那個傳世版本只供大眾消費。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意義還不止此。斯大林右傾革命機會主義的破產，導致合作破裂，使得中共猝不及防，遭受了損失。這一教訓為中共黨人留下了深重的心理創傷，塑造了他們被迫害妄想的反應定式，使得他們動輒杯弓蛇影，疑神疑鬼，百倍提高了過度反應的“階級鬥爭警惕性”，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的第二次國共合作與抗戰後的“和平建國”的結局。後文將要介紹，在所謂“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毛澤東猜疑國府逼共抗日的舉措，是爲了將共軍驅逐於黃河之北，與日軍南北夾擊之。這一陰暗猜想得到了皖南事變的“證實”，使得他進入完全徹底的歇斯底里態，然而全黨竟無一人覺得其荒誕。這原因就是大革命的教訓使得我黨“極大地成熟了”，心理略微正常者必然要被譴責為“陳獨秀式右傾機會主義者”，而那就是“叛變”的同義語，王明同志就是這樣跳下去的。

瞿秋白的“左傾盲動路線”則是共產國際代表、乳臭未乾的憤青羅米那茲與瞿秋白聯手炮製出來的。黨史上著名的八七會議，乃是一次完全違背黨章、特別是列寧手訂的“民主集中制”的非法會議，出席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

缺席，然而它卻能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將候補中央委員毛澤東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把“犯了錯誤”的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降為候補委員，充分體現了莫斯科對中共支部的粗暴干涉。會議由羅米那茲操控，目的是為莫斯科尋找替罪羊，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通過了他起草的《告全黨黨員書》，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作為黨在當時的最主要任務。

此後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在羅米那茲、羅易門等人的操控下，在革命處於低潮時期不保存實力，並在基層恢復並秘密發展黨組織，耐心積蓄力量，卻在城市搞“飛行集會”與“兒戲暴動”（張國燾語），廣州暴動就是個典型範例；在農村則大肆執行燒殺政策。直到 1928 年 6 月間，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這路線才算結束。這還是因為張國燾在大會上慷慨陳詞，歷數過去的錯誤，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深為所動，承認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犯了許多嚴重錯誤，嚴厲批評了盲動主義，宣佈當時中國沒有革命高潮，並闡明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10]。在他的報告的基礎上，大會通過決議，規定“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之中的動力，現在只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由此構成了我黨後來所謂“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反帝反封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決議雖然肯定了八七會議，但仍然指出中央“沒有嚴厲地防止當時黨內已經發現的盲動主義的傾向（這種極左派的傾向正是很有害的）”[11]。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官修黨史所採用的立場，令人不能不感歎國人是何等缺乏理論能力，以致連我黨幹革命的總路線都得由布哈林那對中國毫無瞭解的人來制定。

所謂“立三路線”也是貨真價實的斯大林革命路線。本來，布哈林為我黨制定的六大路線還比較現實，但斯大林認為太右傾。中共六大剛剛閉幕，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就召開了。其時斯大林正在收拾布哈林的“右派反對派”，該次大會上便成了布哈林在公共場合最後一次露面，此後共產國際便徹底為斯大林的親信把持。蘇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反映到共產國際中，“反右傾”便成了共產國際指導各國共黨幹革命的方針。

1929 年下半年，“中東路事件”發生，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大舉入侵中國東北。為配合蘇聯武裝入侵，共產國際執委會下令中共及其軍隊堅定地站在蘇聯一邊，同南京國民政府作戰，尤其要在東三省發動遊擊戰爭和哈爾濱發動工運，以實際行動“武裝保衛蘇聯”[12]。中共中央緊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號召全國的勞苦群眾，在“國際反赤色日”8 月 1 日舉行示威，抗議帝國主義及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對蘇聯的進攻，宣稱：“蘇聯的勝利，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蘇聯的失敗，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的失敗，也就是蘇聯的失敗。”[13]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連續發表文章，反誣國民黨為“帝國主義”，鼓吹赤色帝國主義侵略有理：“蘇聯在中國權利，僅只是在中東路沒有完全放棄，唯一的原因是因為中東路是進攻蘇聯之一個有力的根據地。”[14]“中東路係俄國國家出資，在中國境內建築，所以規定為中國與蘇聯共管，中東路並不是完全屬於中國主權。”[15]

爲了煽動中共起來“武裝保衛蘇聯”，共產國際執委會硬要說“中國進入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期已經成熟，命令中共發動群衆支持蘇聯、保衛蘇聯，領導群衆鬥爭走向革命高潮。此後國際給中共

的指示越來越左，致使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的頭腦越來越熱。1930 年 5 月，中央下令在城市發動反帝示威、演講、飛行集會等等。6 月間，政治局議決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爭取一省到數省首先勝利。據此，李立三制定了行動計劃，準備以武漢為中心，在全國中心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並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重點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8 月初，中央成立全國總行動委員會，並把黨、團、工會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各級行動委員會，作為全國暴動的各級指揮機構。

這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臺，都得到了莫斯科的贊許與支持。直到周恩來於 9 月間從蘇聯回到上海，傳達共產國際決議時還說：“中央的錯誤，是否路線上和國際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線上沒有什麼不同的。……只是因為對目前的革命發展形勢在程度與速度上有了過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中央過去計劃武漢暴動，南京暴動，上海總同盟罷工，受著國際反對，國際不是原則上反對，而是指示我們如何去準備，反對在今天或明天就做。”“兩條路線的鬥爭，主要是反右傾”[16]。但到了 10 月間，斯大林看到了中共政治局八月以來各次會議記錄，龍顏震怒，立即下令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整肅，立三路線至此結束，歷時約三個多月。

那麼，李立三犯了什麼錯誤？他認為，在 1929 年中東路事件中，中共全力支持了蘇俄，現在則是蘇俄支持中共革命的時候了。他要求共產國際立即命令外蒙紅軍向平津一帶進攻，蘇聯紅軍向東三省進攻，以策應中共的武裝暴動。據張國燾說，“當中共政治局會議記錄寄到莫斯科時，共產國際的首腦們對於李立三的這套議論，為之大驚失色；尤其是要蘇俄捲入戰禍一點，表示

憤慨，有的說：李立三是不是發瘋了？他是不是日本偵探？外蒙古出兵平津，蘇俄出兵滿洲，正是蘇俄所不能做的，而是日本軍閥夢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張無異是予日本軍閥以佔領滿蒙，進攻蘇聯的最好藉口。有的說：李立三的主張比托洛斯基的還要壞得多，不過他還沒有採取行動反對共產國際，至少也算得是半個托洛斯基主義者。”[17] 因此，李立三開罪莫斯科，不是因為什麼政策分歧，而是因為他碰到了斯大林的心病。正因為此，李立三被斯大林召去蘇聯作檢討、蹲監獄，羈旅 15 年，並被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開除出黨。只是在共產國際解散後，李立三才得以回國，並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說明中共也知道他不過是替罪羊。

至於所謂“王明路線”則完全是毛澤東杜撰出來的。王明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領導人米夫的親信。1931 年 1 月 7 日，在米夫主持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他從區委幹部一步登天，被提為政治局委員。次月，王明成為政治局常委，由此進入中共領導核心。四中全會是以清算立三路線的名義召開的，但其實質不過是米夫試圖徹底控制中共的組織清洗。1931 年 9 月，王明返回莫斯科，因此，他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時間也不過八九個月。王明臨走前，與周恩來商定由博古、張聞天等人組成“臨時中央”，維持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工作，將來到了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再把權力交出來。但博古等人後來進入蘇區後卻隱瞞了這一情形，變成了“臨時中央”的總書記，此後又在五中全會當選為正式總書記。[18]

王明到莫斯科後，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兼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經常給中共下指示，但總書記博古

並不買他的賬，因此，臨時中央乃至後來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的中央犯下的所謂“左傾錯誤”，並不能賴到王明頭上。

不僅如此，王明其實是反對博古推行的左傾路線的。據國內學者高華教授研究，自 1932 年起，王明即開始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和國內的中共中央產生了分歧，曾以共產國際的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提議調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對富農的政策和工商業、勞動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絕。1932 年 3 月，王明發表文章，公開批評蘇區“時常不斷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經由基本農民群衆分配過的土地”是一種“表面好象‘左’的，實際上非常有害的傾向”，指出“對中農的關係不正確”，是中央“最重要的”“弱點和錯誤”[19]。1933 年 1 月，王明進一步批評國內蘇區對富農採取的全面沒收的政策，指出採取這種‘左’的立場是混淆了革命的階段，“認為在蘇區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了”。他還尖銳批評中央蘇區禁止自由貿易，嚴重損害了蘇區的經濟，明確要求糾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觀點，制定靈活的、能夠反映各地區差別的經濟政策[20]。1934 年 8 月 3 日，王明、康生在給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對第五次反圍剿政治意義的評估、擴大百萬紅軍、以及有關對“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解釋等三個重要問題上，都有“問題”，“很容易引起不正確的結論”。[21]

王明甚至還對毛澤東施以援手。1934 年 4 月 20 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評針對毛澤東的“反羅明路線”鬥爭中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嚴重弱點”，指責“（中央政治局）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點都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有個別同志在文章中，客觀上將各種的錯誤，都說成羅明路線的錯誤，甚至於把那種在政治上和個人關係上與羅明路線都不必要聯在一起的錯

誤，都解釋成羅明路線者”[22]，使“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停了下來。王明還首次在國際舞臺上吹噓毛澤東，為他在莫斯科出文集，使得毛澤東成為除了王明之外能在 30 年代在蘇聯出版文集的唯一中共領袖[23]。1935 年 8 月 7 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產國際七大上作關於中國革命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列舉了十三個中共領導人的名字，稱之為“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材”。在這份名單中，毛澤東位居第一，而博古僅排在第十二位。[24]

更重要的是，王明緊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戰略及時作了根本性調整，是第一個提出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共領袖。1934 年 11 月間，王明批評了中共中央處理福建事變的方針，指出由於沒能援助十九路軍，最終導致閩變的失敗，加劇了紅軍衝破蔣介石圍剿的嚴重困難。1933 年 1 月 I7 日，王明以毛澤東、朱德的名義，起草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宣佈中共願與國民黨外的一切擁護民族革命戰爭的政治黨派進行合作，共同抗日。1933 年 1 月 26 日，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給中共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第一次提出在東北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3 年 10 月 27 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應關注“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並附上他們起草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具體綱領》。這份呼籲“立即停止一切內戰”的文件，經宋慶齡等 l779 人簽名，於 1934 年 4 月 20 日發表後，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34 年 4 月 20 日、9 月 16 日、11 月 24 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關門主義、改變打擊中間階層的過左政策的主張。1934 年 11 月，王明在《新條件與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1935 年 8

月，王明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報紙《救國時報》發表，宣稱中共願與任何實行對日抗戰的部隊合作。該年底，王明在《救國時報》撰文，宣傳“聯蔣抗日”。1935 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國時報》不斷刊文，呼籲國共合作抗日。1936 年 1 月 4 日至 9 日《救國時報》連載王明的文章《第二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正式提出“逼蔣抗日”的主張。[25]

然而無論是博古領導的中央，還是由張聞天作虛君、由毛澤東主事的陝北中央，對這根本戰略調整卻反應遲鈍。在恢復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後，毛澤東知道了共產國際的戰略調整，立即接過了統一戰線的口號。但他搞的是聯絡軍閥、借抗日為名大打討蔣內戰的把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便是“討日令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26]。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後，莫斯科才禁止了這種短視的陰謀詭計。

由此可見，官修黨史中所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完全是毛澤東捏造出來的神話。後文將要介紹，在抗戰爆發之前，如果真有一條“王明路線”，那也是保證了中共奪權勝利的斯大林革命路線，而毛澤東處處反對這一正確路線。只是莫斯科排除了他的干擾，中共才被迫接受國府“招安”，得以在抗戰中崛起。

二、毛澤東的“路線覺悟”

在上述歷次“路線鬥爭”中，毛澤東的表現如何？是否真如他自吹的那樣，是“紅區正確路線代表”，與一系列機會主義路線頭子作了堅決鬥爭？這不過是他編造的鬼話。

（一）“汪精衛的跟班”

如上所述，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一手促成的。此公是莫斯科派到中國煽動共運、並親手製造了中共的特使之一。他身為“中共教父”，骨子裡卻鄙視他下出來的怪胎，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中共現有黨員 420 名，其中工人 160 名，但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多數黨員沒有職業，所以黨同在職的工人、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繫”；“黨是個早產兒”，“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27]；“與印度和荷屬印度相比較，中國極為落後。從經濟狀況看，要在當前建立一個共產黨，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只有在國民運動進一步發展時才能產生共產黨。中國同志首先需要的是一個農業綱領。即使是國民運動，如果它不面向農民，它也就幾乎不可能成為一支主宰力量。”[28] 因此，他在中共三大上力主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領導下幹革命。

毛澤東完全同意馬林對基本國情的分析，甚至走得比馬林更遠。馬林留下來的中共三大會議記錄表明，毛澤東等人認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認識較膚淺”；“毛對我解釋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毛同志告訴我，湖南有 3000 萬人和 3 萬－4 萬現代工人。他對工會組織已拿不出任何辦法，所以十分悲觀，甚至認為欲拯救中國唯有靠俄國的干涉”[29]。

基於這種悲觀認識，毛支持馬林提出的加入國民黨的方針，並在大會發言中作了雄辯論證：

> “不推翻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國民革命不可能出現。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後進行。……希望在中國實現國際合作，出現一個和平時期，那時資本主義發展將非常迅速，中國無產階級人數也會大量增加。……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他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的原因。”[30]

如此“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和無所作為的觀點”，連馬林都無法同意，在會上作了駁斥：“我不像毛那樣悲觀，認為中國國民運動唯有在發生世界革命之後才能成功。無論如何我們不該推測哪一個首先發生，但不管怎樣我們應像現在這樣去實幹。”[31] 更有甚者，在致季諾維也夫等人的信中，馬林還披露，毛對他說：“革命得由俄國軍隊從北邊帶進來。”[32]

馬林和毛澤東等人的主張，激起了張國燾、蔡和森等人的反駁，他們指控馬林是要斷送共產黨。張國燾因而被馬林撤了中央委員，“曾經有很短一段時間，張完全處於失寵狀態，當時甚至沒有給他安排任何工作。他們無緣無故地把小夥子攆走，他落得個沒有工作，沒有經費。後來可能改變了主意，派他去北京，他呆在那裡，面對不幸的《工人週刊》，苟延殘喘”[33]。而毛澤東則因支持馬林而平步青雲，首次當選為中央委員，進入中央局並任秘書，成為陳獨秀的副手[34]。

此後毛更進一步，在中共黨刊《嚮導》上發表文章，強調商人反帝的堅定性，聲稱商人是革命的領導階級：“外力軍閥和商人是勢不兩立的”；“須知外力軍閥是全體商人以至全國國民的共同敵人，而革命成功後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爲推翻共同的敵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團結而奮鬥，是最必要的”；“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壯，領袖全國國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

也就越快！”為此歡呼：商人開始注意政治，並出來干預政治，這是一個何等可喜的消息！[35]

毛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後，為國民黨辛勤工作，先後在長沙、寧鄉、安源等地建立了國民黨分部和湖南總支部，使得湖南成爲國民黨組織最發達的省份之一[36]。他不但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權，而且簡直就是用發展國民黨來排擠共產黨。蔡和森因此對共産國際抱怨道：“在湖南，我們的組織失去了幾乎所有的政治意義。所有的政治問題都由國民黨的省黨部來決定，而不是由共產黨的省委員會决定。”鄧中夏也說：“毛那時反對獨立（於國民黨）的工會運動。”[37]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同一時期，張國燾寫信給維經斯基，旗幟鮮明地提出：

> “在現階段，只有在共產黨有強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地區，我們才能自行組織國民黨支部；而在共產黨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國民黨也沒有什麼影響的工人集中區，我們就不必為國民黨在那裡組織支部，也不讓其影響滲入。只有在廣州和漢口，我們的職工運動工作才不得不在國民黨內進行。”[38]

因此，要冒充“正確路線代表”，張國燾似乎更有點資格。

毛澤東的表現引起了“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的強烈不滿。1924 年三月底，在上海召開的團中央全會上，達林見到了中共中央代表毛澤東。毛身穿淺灰色綢長衫，很惹人注目，因為其他人穿的都是普通的藍布長衫。待到達林作完報告後，毛澤東發言，違反了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關於東方問題的決議、青年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以及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

示，儘管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都同意這些決議，使達林大吃一驚：

“毛澤東在發言中援引新‘三民主義’，斷言國民黨是革命的工人政黨，應該加入共產國際。然而國民黨在 1924 年 1 月的代表大會上甚至隻字未提要被吸收加入共產國際。根據共產國際的章程，每一個國家只能存在一個共產黨。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則意味著承認國民黨是共產主義政黨和取消毛澤東為其中央委員的那個黨。

毛澤東堅決反對以階級觀點對待中國農民，反對提出以一部份農民（無地佃農）對抗另一部份富裕農民的口號。他把全體農民——既有佃農，也有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都解釋為一個階級，都是反對資本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的。

還有，毛澤東的發言根本沒談全會的中心議題——在青年工人中的工作問題。”

會後達林給維經斯基寫了封信，說：

“你在這裡將可以聽到中央委員會書記毛澤東（一定是馬林的人）那些叫你瞠目結舌的事情。例如，國民黨現在和過去都是無產階級政黨，所以共產國際應該承認其為一個支部。在農民問題上，應該放棄階級路線。在貧苦農民中不會有什麼作為，應該和地主官僚（紳士）們搞在一起，等等。這位老兄是青年團中的黨代表，而且在團中央全會上堅持推行這種觀點，幸而這只不過是徒勞。我已經寫信給黨中央，請求指派新的代表。”[39]

於是毛被撤了職，連中共四大都沒能參加。在這次會議上，維經斯基、陳獨秀等人的主張佔了上風，大會因而通過決議，強調“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産階級有力的參加，

並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够得到勝利”。在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關係上，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擴大左派，反對右派，爭取中派[40]。張國燾捲土重來，又進了中央，而毛卻沒能當上中央委員。

毛澤東在共產黨內宦途失意，卻在國民黨內青雲直上。1925年 9 月，毛到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大籌備工作，深得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賞識。次月 5 日，汪精衛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傳部長職務為由，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41]。毛不負汪的垂青，上任伊始就召開了部務會議，制定了各種宣傳、編纂計劃，並規定以後凡有關黨義的出版物和宣傳品，均要先交宣傳部審查，糾正了此前宣傳工作無計劃、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他更規定，中宣部要向各省市宣傳部佈置宣傳要點，而下面也必須定期向中宣部報告工作。到毛離開國民黨中宣部時，向中宣部報告工作的省市已達 12 個。在他的主持下，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很快出現生氣勃勃的局面。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黨務報告讚揚道：“本黨在以前對於指導民眾運動的宣傳工作不很統一，現在說可以比較的統一了”，在深入民眾宣傳反帝反軍閥方面，“本黨也都可以指導而有成效”。毛還主編國民黨黨刊《政治週報》，就連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也發表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編印的《革命》第 4 期上。[42]

毛為國民黨辛勤工作，成績斐然，卻基本沒有管過共產黨的工作。查《毛澤東年譜》，1925 年全年，毛澤東只有四次短暫或一次性活動與共產黨有關：6 月中旬在韶山成立中共支部並在此後召開了黨團會議；8 月底在長沙向中共湘區委員會報告韶山農民運動情況；12 月間寫信給中共韶山支部指示工作；曾到中共廣東區委同陳延年等商量工作。1926 年全年也只有四次活動與中共有關：5 月份在國民黨第六屆農講所中建立中共和共青團

組織；11 月底在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任書記後，在漢口建立中共中央農委辦事處；12 月中旬出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特別會議；12 月底經與中共湖南區委商定，爲參加湖南農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開辦一短期訓練班。只是在他出任中央農委書記後，與中共有關的活動才逐漸多了起來。這樣的跨黨分子，有如說像共產黨員，莫如說更像國民黨員，殊難怪他的共黨同志要在背後譏之為“汪精衛的跟班”。

就連搞農運，毛澤東也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下進行的。開展農運最先是布哈林的指示，作為布黨的理論家，他首先闡明了國民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而“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乃是農民問題。無論出於何種考慮而迴避這一基本點，都意味著不理解這個社會經濟基礎的重大意義，而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順利地進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徹底消滅中國封建制度的鬥爭”。據此，他為中共規定了發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聯盟的任務[43]。

在蘇俄顧問的敦促下，孫中山也注意到這問題，他對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農民部的蘇聯顧問弗蘭克說：“中國強大的國民運動和爭取擺脫外國帝國主義統治的鬥爭應該由廣大民眾來進行，而首先由農民來進行。迄今為止我和國民黨還沒有與農民的接觸。在國民運動中出現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擁護者們的社會成份造成的。”彌補這一疏忽的辦法，就是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國民黨訓練農運幹部。但孫中山同時也指出了他與蘇聯顧問的分歧：

> “我們應該在整個廣東建立農民協會，從而建立反對地主的強大工具。只有我們建立這些協會並把農民武裝起來，才能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但我認為，在當前組織農民協

會的形勢下，進行任何反對地主的宣傳都是策略性的錯誤，因為那樣做會使地主在農民之前先組織起來。”[44]

毛澤東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涉足農運的，他擔任了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主辦的第六屆農講所是國民黨農民部訓練農運幹部的學校。不僅如此，從他原來的溫和主張來看，他基本是按照孫中山定下的農運路線行事的。就連那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也是他以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委員的身份，由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派人偕往，會同考察湖南省黨部要調查的六項內容[45]。在此之前，他還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講演中强調：“我們現在還不是打倒地主的時候，我們要讓他一步”，“在國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減少租額，減少利息，增加雇農工資的時候。”[46]

但此後鮑羅廷在大會上公開主張：“對於剝削農民的用刺刀去刺死他，刺死反革命的基礎，如像刺吳佩孚的軍隊一樣。這樣國民黨才不至於落後。”[47] 並提出要在農村發動更激烈的革命行動，就要不惜用痞子流氓來做先鋒[48]。於是毛考察回來後，態度就發生了根本改變。他不但寫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千古名篇，而且在武漢作了口頭報告，公開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式口號，“一時流傳甚廣，到處寫成標語，影響極大”[49]，使得本已過激的農運更加如火如荼。

但那基調其實與當時武漢某些國民黨領導人一致。報告發表前後，鄧演達、孫科等人或贊揚當今農民“在鄉村中從事打倒反革命的土豪劣紳，爲國民政府除去心腹之患，並且爲將來民主社會的建設奠定了一個堅固的基礎”；或宣傳必須要解决土地問題，才能真正解放農民，最終成就國民革命，宣稱如果因爲要實現最近政綱中的要求不得不圍縣署，殺土豪，根本說不上是什麼

“暴動”或“反常”。他們甚至在公開演講中說，農民兄弟“多打一個土豪劣紳，就是多做了一件革命工作。”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農民部發表的宣傳大綱批駁農會是土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的說法，主張實行“耕者有其田”，宣稱“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和種種反革命勢力不能够用和平的方法打倒，我們要用我們的鋤頭鐮刀爽爽快快的把他們壓服下來。”唐生智等國民黨領導人甚至贊同鮑羅廷“痞子流氓做先鋒”的主張，不僅說農民殺土豪劣紳十個有九個是准的，而且說現在許多人懷疑農運，指爲惰農運動，實際上“農民受壓迫過久，穩健分子不易起來，是要痞子流氓做先鋒，真正農民才得起來。專靠做農運的幾個人，是不成功的。”[50]

不僅如此，等到痞子運動完全失控，造成一系列嚴重的政治經濟軍事惡果後，毛澤東又及時翻轉原來的立場，承認湖南所以會發生這種現象，根本在於不少地方的農民協會是在哥老會的把握下，完全不聽指揮，不僅侵犯軍人家屬，截扣士兵寄回家的錢，而且連自耕農的土地也要平分[51]。馬日事變發生後，汪精衛在討論解決辦法的會上引用毛提供的情報，作為和平解決該事變的理由，指出：“毛澤東同志說得很詳細，農民協會確有擾害軍人家屬的舉動。”“我們過去不曉得農民協會爲什麼不聽政策，據毛澤東同志報告，才曉得農民協會有哥老會在內把持。他們既不知道國民黨是什麼，也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只曉得作殺人放火的勾當。”與汪一樣，毛也不贊成明令討伐許克祥，“毛澤東也承認不用武力的辦法是對的”[52]。

由此可見，在大革命中，毛澤東自始至終與國民黨穿連襠褲，更像國民黨左派而非共產黨人。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後，毛雖對鮑羅廷以中共中央為替罪羊的政客手段向張國燾私下表示過不

滿，但置身事外，不願捲入中共與鮑羅廷的鬥爭漩渦中[53]。即使是在四一二事變發生、寧漢分裂後，毛澤東也不曾反對過繼續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主張共產黨拉出去單幹，武裝農民，在農村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些神話都是後來編造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毛澤東曾像張國燾一樣，反對或抵制過斯大林的右傾革命機會主義路線。他與汪精衛等人的關係，要比與中共領袖的親密得多。在國共破裂後他為何倒向共產黨，完全是個難解的謎。

然而這樣一個連業餘共產黨員都算不上的專業國民黨員，卻能在八七會議上反過來批判中共中央不夠左。他提的四條意見是：第一，“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是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後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第二，站在地主方面不許農民革命。他原來也服從上級精神，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態度，向中央提交了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產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因他們說是不通於是也就沒有成立。於是黨的意見跟著許克祥走了”。第三，黨沒有重視軍事問題。第四，上級機關沒有盡心聽下級報告。[54]

這些都是謊言：第一條，他不但忙著去住國民黨的空房子，而且還幫國民黨在湖南蓋了全國最大的房子，壓垮了中共湖南省委的小房子；第二條，“跟著許克祥走”他也有份。馬日事變發生後，湖南各界民眾團體不斷情願，要求明令討伐甚至槍斃許克祥，他卻告訴汪精衛農民協會被哥老會把持，只知道做殺人放火的勾當，主張和平解決事變；第三條也未必成立，他本人倒是沒有重視軍事，至少沒見他有過這方面的主張，但陳獨秀在 1926

年 10 月就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這裡軍事因素起著頭等重要的作用”，沒有軍事力量，無論在哪裡都不可能奪取政權[55]。陳獨秀在中共五大的政治報告中更專門講了改組軍隊問題，提出要讓大多數工農加入軍隊，實現軍隊革命化，“如果我們不這樣做，而是高喊‘世界革命萬歲’和‘列寧主義萬歲’等口號，只限於做政治工作，我們就不會取得任何成果。我們想要使軍隊革命化，但又不去改變它的社會成份，那就是自己欺騙自己。”[56]張國燾也稱他曾向鮑羅廷提出要求，請蘇俄政府向中共供應軍火，用來武裝工農，以保障土地革命的進行，卻被鮑羅廷拒絕了[57]。所以，關鍵還在於斯大林當時不想向中共提供軍火。這前提不滿足，黨再重視軍事也沒用；第四條也不是事實，《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出後，不但全文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週報上連續刊出，而且前兩章發表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漢口《民國日報》的《中央副刊》上，並由《湖南民報》連載，還出了單行本。瞿秋白在序言中推薦：“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共產國際》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後轉載了《嚮導》刊印的《報告》，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還在執委會擴大會議上給予好評[58]。所以，毛沒有理由指責中央不重視甚至否定他的報告。

事實上，他那報告只是強調革命黨人應該端正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唯一的建議只是“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鬥爭，期於徹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始經濟鬥爭，期於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卻沒有武裝農民、建立基層政權的主張。文中雖有“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一節，卻是作為農運已經取得的成就列舉的，反倒給人一種“農民

已經武裝起來”的錯覺，其實那所謂“農民武裝”主要是梭鏢隊。

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如劉少奇後來承認的，當時中共根本沒有控制工農的能力[59]。在既沒有掌握軍隊和政權，也未在基層普遍建立黨組織的情況下，像毛那樣去大聲喝彩煽動，就只可能造出不可控的暴民運動來。它必然變得越來越過火，最後完全不可收拾。這就一方面使得湖南農村痞子運動超出了武漢國民政府尤其是北伐軍軍官們的容忍限度，“成了摧毀國共合作、瓦解武漢政權的一個主要因素”[60]，最終導致汪精衛分共；另一方面又使得被煽起來的農民沒有保護自己的政權與武裝，在國共破裂後遭到鎮壓時，就只能煙消火滅、風流雲散於旦夕之間。因此，為偉大領袖毛主席大聲喝彩的轟轟烈烈的痞子運動，乃是毫無實力的“泡沫運動”，其唯一的效果，便是觸怒和嚇跑我黨唯一的同盟者，把汪精衛推進了蔣介石的懷抱。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毛事先明明知道這後果。早在 1924 年他就向鮑羅廷介紹了過去的教訓：

> “我們憑經驗知道，當我們還不能組織無地的農民去反對大土地所有者時，我們必然要遭到失敗。例如在湖南省長沙、浙江省杭州、湖南省衡山，廣東省惠州就發生過這種情況。在這些地方我們起先組織不識字的農民，然後領導他們同較富裕、較大的土地所有者進行鬥爭。結果怎麼樣呢？我們的組織立刻遭到破壞，被查封，而所有這些農民不僅未認識到我們是在為他們的利益而鬥爭，甚至還仇視我們，他們說：如果不把我們組織起來，就不會發生任何災難，任何不幸。

所以，只要我們還不確信我們在農村擁有強有力的基層組織，只要我們在很長時期內沒有進行宣傳，我們就不能下決心採取激進的步驟反對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一般地說中國社會分化還沒有達到能夠進行這種鬥爭的程度。”[61]

對毛這種翻雲覆雨、反復無常的態度只能有兩種解釋：要麼毛澤東沒有主見，容易被潮流席捲而去，衝昏頭腦，輕易拋棄原來的經驗教訓；要麼他明知後患無窮，還要揣摩上意，嘩眾邀寵。不管是哪種情形，他的輕狂都為中共乃至他本人的事業帶來了沉重的損失。

（二）“左傾盲動主義”的受益者

在 1927 年 8 月 7 日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緊跟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奮起批判他從未抵制過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因而得到羅米那茲賞識，從候補中央委員晉升為候補政治局委員，並受命到湖南一帶組織秋收暴動。上面已經說過了，他領導的秋收暴動完全是左傾盲動，是“單純軍事冒險”。這裡只看看他在舉行秋收暴動前對全國局勢的估計：

“某同志（蘆注：蘇聯駐長沙領事馬也爾）來湘道及國際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聞之距躍三百；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從前總以為這是在一九零五年，這是以前極大的錯誤。工農兵蘇維埃完全與客觀環境適合，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此政權既建設，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國之勝利。望中央無疑的接受訓令，並且在湖南上實行。”[62]

所以，他過去以為 20 年代的中國相當於 1905 年的俄國，革命只會失敗，接到國際新訓令之後，才知道“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 1917 年”。只要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就必然迅速取得全國勝利。這種“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不知超過羅米那茲與瞿秋白多少倍！

上了井岡山後，毛澤東忙著做山大王，偈處一隅，消息閉塞，沒有可能關心全局。如上文指出，他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時期犯的錯誤，不是左傾盲動，而是受宋江戰略束縛，只想憑險割據，不圖進取，在一個沒有發展前途的死地中苟安。全虧朱德和彭德懷的幫助以及國軍的圍剿，他才走下井岡山，開創了閩贛邊區根據地。然而他非但不是為他篡改的黨史中的那個“紅區正確路線代表”，反倒是不折不扣的蘇區左王。

（三）“立三路線”的先驅與狂熱執行者

據國內學者近年研究，在李立三推行其“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時，除了何孟雄和陳獨秀外，黨內根本就沒有誰反對過[63]。毛澤東所謂“農村包圍城市”的觀念是在後來形成的，以 1936 年 12 月發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為標誌[64]。而且，它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並非毛一人的貢獻，周恩來、鄧小平等不少人都曾對此“理論”作出過探索和實踐。[65]

但這些學者沒有指出，毛澤東才是“左傾冒險主義”的始作俑者，早在李立三還在當右派時，他就宣稱“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提出了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的盲動路線。在立三路線出籠後，他更是該路線的狂熱推行者。

1929 年 1 月底，李立三起草過一個中央通告，認為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美國因為與美日兩國有矛盾，正在極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與穩定，因此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正趨於暫時穩定，軍閥戰爭不會馬上到來[66]。或許就是在這種情緒支配下，1929 年 2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革命形勢作了悲觀估計。16 日，中央致信廣東省委，說目前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很難形成一個大的割據局面，要派人找到朱毛紅軍，設法使朱、毛立即離開部隊和“危險地”[67]。

然而信送到毛手上時，卻正是他無比意氣風發之時。此前紅四軍離開了井岡山，建立了閩贛邊界根據地，毛這才悟出過去死守天險太膽小了，於是跳到另一個極端，在給中央的回信中豪情滿懷地提出了立三路線的雛形：

1）“國民黨統治從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就會到來”：

“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三次進攻井岡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後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漸低落，革命高潮逐漸生長。”

“自劉郭兩旅被擊潰之後，閩西贛南可以說沒有敵人了。蔣桂部隊在九江一帶彼此逼近，大戰爆發即在目前，國民黨統治從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就會到來。”

2）中共革命應以城市鬥爭為主，農村鬥爭為輔：

“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之建立，大區域產業支部之創造，正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最大任務，但同時農村鬥爭的發展，小區域蘇維埃之建立，紅軍之創造與擴大，亦是幫助城市鬥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條件。所以拋棄城市鬥爭沉溺於農村遊擊主義是最大的錯

誤，但畏懼農民勢力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領導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

3）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

> “我們要和蔣桂二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此一年中，要在上海、無錫、寧波、杭州、福州、廈門等處建設無產階級鬥爭的基礎，使能領導贛浙閩三省的農民鬥爭。”[68]

毛的“革命樂觀主義”遭到了同僚的批判。1929 年 6 月下旬，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召開，不但撤了毛前委書記的職，還作出決議，批判他的左傾：“前委決定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這個政策是未曾對主觀情形有很好的估量，是不對的。”同年 9 月 28 日，中央在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中同意這一評價：“預定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政權的決定，也是錯誤的”。[69]

然而毛並不服氣。1930 年 1 月初，距離毛在頭年 4 月提出的“一年內爭取江西”的期限只剩 3 個月了，毛還在給林彪的信中堅持原來的看法，說該計劃唯一的缺點只是不該規定為一年：

> “關於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不對的是規定一年為期。至於爭取江西，除開江西本身條件之外，還包含有全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條件。因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便決不能得到一年爭取江西的結論。那個建議的缺點就是不該規定為一年，因此，影響到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所謂‘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70]

據此，毛在 1930 年 1 月代表紅四軍前委向中央報告：“我們認為在目前局勢中，全國有一省或兩省首先勝利奪取政權的可

能，在南方各省中，我們以為首先勝利的省份便是江西，江西的主客觀條件都有這種可能。”[71] 而此時立三路線尚未形成。

1930 年 2 月 6 -9 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和紅軍第五軍、第六軍軍委聯席會議（史稱“二七會議”）。會議認為，江西反動派內部矛盾加劇，贛西南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江西有“首先勝利奪取全省政權之可能”，決定猛烈擴大蘇區和革命武裝力量，深入土地革命，為奪取江西全省政權而鬥爭。並決定集中紅軍第四、五、六軍，奪取江西全省政權，第一步先打吉安，只是因為受敵軍阻攔才放棄該計劃。但毛隨即又決定去攻打贛州，攻城不下，只好撤回[72]。

由此可見，早在中央政治局決議宣稱“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之前約四個月，毛便主動開展了攻打中心城市，奪取全省政權的冒險活動。

立三路線於是年 6 月間提出後，毛更積極主動地執行了它。在中央特派員涂振農下令紅一軍團打南昌後，朱毛率軍從福建長汀遠征南昌。只是因為南昌防守嚴密，紅一軍團才在前鋒抵達南昌對岸牛行車站後撤離[73]。然而這不過是改去攻打長沙、回師南潯、進取武漢而已。8 月 3 日，一軍團總部發佈訓令：“本軍團以絕對急進攻擊敵人之精神，決先取瀏陽，進略長沙，以威脅武漢。”8 月 19 日，毛澤東在給贛西南特委轉閩西特委並轉中央的信中說：“我軍為達到消滅敵人援助五軍，開展湘鄂贛之交大局計，乃決定去瀏陽擊敵，直取長沙，由株萍路回師襲擊贛敵（我們此時預計敵兵已集中向我），奪取吉安，再回南潯，進取武漢。”[74]

這就是紅軍第二次打長沙的來由，它是毛主動作出的決定，根本不是奉命行事。8 月 7 日，毛得悉紅三軍團已於 7 月 27 日佔

領長沙，隨後撤出，仍令全軍西進，向紅三軍團靠攏。8 月 23 日，紅一軍團與撤出長沙的紅三軍團會合，成立了紅一方面軍，毛澤東任總政委與總前委書記，兼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為當仁不讓的黨政軍第一把手。他主持的總前委會議決定第二次打長沙。《毛澤東年譜》對此的解釋是“由於總前委多數人主張立即再打長沙，毛澤東和朱德同意先試一試。”[75] 然而《彭德懷自述》提示，毛澤東對第二次打長沙的態度其實很積極：

> “會議還討論了進攻長沙的問題，我未發言。從三軍團本身來說，迫切需要短期整訓。從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〇年八月，部隊擴大了六倍，從五月開始一直沒有得到休整。有些連隊不但沒有黨的支部，連黨員也沒有，只有士兵委員會而沒有核心。這次打長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那次是迅速各個擊破敵軍，迅雷不及掩耳地給敵以襲擊。這次追擊之敵四個旅，一軍團在文家市全殲了戴鬥垣旅，其他三個旅安全退回長沙，原在長沙還有一個旅未出動。我軍迫近長沙時，敵取得五六天時間準備，野戰工事做好了，這就使我失去進攻的突然性，變成正規的陣地進攻戰。攻城能否速勝，難以肯定。結果，圍攻月餘未克。”[76]

彭德懷在此說得很清楚，他本人不同意再攻長沙，但沒有發言。毛澤東是總前委書記，就算他不是天性獨斷專橫，按我黨的制度，他也有最後決定權。如果他反對，則一方面軍根本不可能再去打長沙。而且，如果毛反對過，彭德懷絕對不敢在交代材料中不拍馬屁，大肆吹噓一番主席的英明正確。因此，彭的證詞與毛當時下發的命令以及他給中央的信中留下的證據一致，都說明第二次進攻長沙是毛澤東的主張。

正因為此，彭德懷才長期耿耿於懷，在會理會議前向劉少奇發牢騷時還數落：“蔣桂戰爭時[77]，湖南吳尚第八軍一部投桂軍，一部潰散。紅軍兩次進攻長沙何鍵部，損失也不少。”這實際上是指責李立三和毛澤東放過了避實擊虛的良機去兩次打何鍵。很明顯，這是專案組審問他在會理會議前如何勾結劉少奇反毛澤東時，他不得不作出的交代。

毛不僅想打長沙，還想征服全湖南並奪取武漢。會議次日，他致信中共贛西南特委、閩西特委並轉中央，報告紅一軍團此前在瀏陽文家市作戰的勝利，以及在永和市同第三軍團的會合。指出瀏陽之敵“被我軍消滅了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在進攻中，這是何鍵部隊的主力，把這些東西消滅了湖南政權就到了手了”。要求贛西南預備軍須在信到半月內選一萬人到長沙，信到一月內再送二萬人。望中央指示奪取武漢意見[78]。可見他樂觀到何種地步——不但認定湖南已經到手四分之一，還給贛西南預備軍下達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標，要人家在短期內便補充三萬兵力，而據彭德懷說，整個紅一方面軍也不過三萬餘人。

不僅如此，8 月 30 日，在獲悉敌军企图袭击红军側翼後，他仍令紅一方面軍“先誘殲該出擊之敵，然後乘勝進攻長沙”。次日他又改了主意，令紅一方面軍“誘殲敵軍於其工事之外，然後乘勝攻入長沙”。誘敵不成，他仍然下令强攻長沙。紅軍於 9 月 10 日晚向敵軍連續多次發起攻擊，前仆後繼，激戰至 11 日拂曉，仍未能突破敵軍陣地，紅一、三軍團都遭受重大損失。直到獲悉馳援長沙的國軍李宗仁、張發奎部已到湘潭，紅一方面軍總部才開會决定撤圍[79]。在此後給中央的報告中，他還吹噓：“把敵軍三十團以上的威風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紅軍，同時給全國以頗大影響，則是這一次戰爭的勝利。這次戰役是自有紅

軍以來第一次大戰，因此我軍死傷亦不小。單以一軍團說，高級幹部有柯武東劉作述兩同志陣亡，死傷中級幹部數十，下級幹部一百以上，士兵一千六百左右。三軍團損失亦不小。我軍雖有這些損失，但士氣一般仍是很壯，繼續到江西去作戰，是沒有什麼問題的。”[80]當然，他畢竟也學了點教訓，認為“沒有群衆條件是很難佔領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難消滅敵人的”[81]。

據參與該役的張宗遜說，第二次攻打長沙相當搞笑，不過殺害戰俘比較下流：

> “九月初，紅軍包圍長沙之後，接連三個晚上進行總攻，都未奏效。後來有人提議，用戰國時代的‘火牛陣’來沖鐵絲網，有的部隊竟然采納了這個提議，買來一些耕牛，把浸有煤油的棉花團綁在牛尾巴上，到晚間用火點燃，衝擊敵人防綫。結果這些牛根本不聽指揮，它們受了驚嚇不但不向前沖，反而到處亂跑，最後成了一場笑話而告終。就在這時，紅十二軍部隊在猴子石附近捉到長沙縣敵政府派往湘潭專送軍事通報的差役，得知長沙敵人計劃由湘江西岸繞道到易家灣附近偷渡湘江，迂迴我軍後方。城裡敵人從猴子石出擊，妄圖南北夾擊紅軍。軍長和政委指示，由我負責把俘虜和信件上送方面軍司令部。毛澤東和朱德聽了我的彙報以後，指示要嚴密看守俘虜，决不能讓他跑掉。接著朱雲卿参謀長指示，爲了防止萬一，你們把俘虜殺了罷，我按他的命令辦了。”[82]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毛在二次攻打長沙失敗，白白貼上了幾千將士以及大奶楊開慧的性命之後，還不吸取教訓，還準備去打南昌。9 月 12 日，總前委决定全軍撤長沙之圍，轉到株洲，同時發佈命令：“最火速最勇敢地奪取南昌、南潯路以至湖口，消

滅魯滌平及江西反動統治，截斷長江，向右進攻南京，向左保證奪取武漢。”[83]“決定了奪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軍團攻取吉安，第三軍團略取峽江、新淦”。[84]

1930年9月17日，毛澤東寫信向中央保證：“紅一方面軍繼續到江西作戰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要調二十軍、二十二軍等向北前進，配合廣大群衆猛力進攻南昌、九江，佔領南潯路”。[85]

1930年9月23日，紅一方面軍總部發佈命令：“本方面軍為要達到原任務，奪取南昌、九江消滅魯滌平……決先下吉安城，使贛西南工農群衆勢力向下游發展與我配合並補充大數量新兵到紅軍來以擴大紅軍。”[86]

1930年10月3日，紅一方面軍總部發佈《總攻吉安命令》：“本軍團有攻取吉安消滅鄧英部隊，匯合贛西南群衆力量直下南昌、九江建立江西政權……之任務，決於4號拂曉總攻吉安。”[87]

在攻佔吉安後，毛澤東在1930年10月14給中央的報告中吹噓：“吉安暴動的勝利，無疑是贛西南豪紳等國民黨統治的最後消滅，贛西南地方暴動的完成，江西全省首先勝利的開始，猛烈擴大紅軍的好時機。”此信還報告：紅一軍團於十月十八日可抵清江與紅五、紅八軍匯合，“即行佔領南潯路進攻南昌，在那一帶將有大規模的决戰”。[88]

1930年10月24日，紅一方面軍總部發出命令：“方面軍有繼續吉安勝利爭取進一步的勝利，發動群衆，消滅敵軍，擴大紅軍，有計劃有配合有步驟的奪取南昌九江，爭取江西全省勝利之任務。”[89]

1930 年 10 月 26 日，由毛澤東主持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與江西省行委在江西羅坊召開的聯席會議作出《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決議，指出："吉安勝利就是江西一省勝利的開始，它不僅是更有基礎的幫助紅軍向前發展，不僅要號召全江西革命群衆最近期間完成江西總暴動，這對於全國革命形勢的推進，對於爭取全國革命勝利，同時是有偉大意義。"目前"無疑的應繼續吉安勝利的發展，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最近吉安的奪取，是匯合一切革命勢力，成為奪取南昌嚴重的威迫形勢"。[90]

以上證據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紅一方面軍再次攻打長沙失敗後，毛澤東的頭腦仍然處於熱昏狀態，繼續沉醉在"奪取南昌九江，爭取江西全省首先勝利"的迷夢中。

幸虧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比毛澤東清醒。10 月 25 日，中央發出致紅一、紅三軍團前委的指示信，指出：敵人正在加緊部署對紅軍的"圍剿"，"圍剿"的最主要目標是紅一、紅三軍團。"照今天的形勢來說，攻長沙或是攻南昌，並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黨之最中心的策略如何組織革命戰爭擊破敵人的'圍剿'與進攻"[91]，毛才放棄了攻打南昌和九江的計劃。

四中全會後，蘇區成立了中央局，由周恩來任書記，到職前由項英代理。毛只是中央局委員以及由中央局領導的中革軍委副主席。他任書記的總前委以及中國革命委員會均被撤銷。1931 年 4 月 17 日，蘇區中央局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會議決議指出，從 1930 年 6 月中下旬召開的汀州會議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綫，放弃了鞏固蘇區的工作，采取了冒險路綫，去向大城市冒進"。决議還認爲：只是在攻打長沙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

才“由開始懷疑立三路綫，進而反對立三路綫，轉變到正確的路綫上去”。[92]

這個結論過於寬大了。如上所述，早在 1929 年 4 月間，當李立三還在“右傾”之時，毛澤東便已豪情萬丈地提出“一年內爭取江西”的主張。在 1930 年 2 月召開的“二七會議”上，毛又率先提出江西有“首先勝利奪取全省政權之可能”，並決定集中紅軍三個軍奪取江西全省政權。在奉命攻打南昌不成後，他又主動決定去打長沙。在第二次攻打長沙失敗後，他仍未死心，還想奪取南昌、九江，“爭取江西首先勝利”，而放棄這一路線還是因為中央下令讓他們準備反圍剿，並非毛主動覺醒。無怪乎知道這段歷史的李德要在其回憶錄中反復指責毛夥同李立三犯了路線錯誤。[93]

要說有誰最先認識到“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反對攻打大城市，周恩來比毛澤東更有資格。早在 1929 年 3 月 17 日，周在以中央名義致賀龍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就指出：“現在，在全國範圍內，還沒有一種直接革命的形勢，故工、農、兵士、貧民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在目前還是一個宣傳的口號。”强調在農村中發動群衆，開展游擊戰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農村蘇維埃的重要性，指出：“目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什麼佔領大的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衆，深入土地革命。故你們此時主要的任務，還在游擊區域之擴大，群衆發動之廣大，决不應超越了主觀的力量（主要的還是群衆的力量，不應只看見武裝的力量），而企圖立刻佔領中心工商業的城市。”關於游擊戰爭的發展區域問題，原則上“應該是向農村階級矛盾與鬥爭到了更激烈的地方，黨與群衆的組織有相當基礎的地方，以及給養豐富、地勢險峻的地方爲最宜”。[94]

同年 9 月 28 日，周代中央起草給紅四軍的指示信，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95]

同年 11 月 22 日，他在以政治局名義致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信中說：國內已面臨著群衆革命鬥爭復興的形勢，目前黨的主要任務是擁護蘇聯與反軍閥戰爭，並專門通報了各地紅軍迅速發展的情況。信中在談到黨內開展反對"機會主義反對派"的鬥爭時說：黨內右傾危險依然存在，"但這並不是說左傾便不危險了，現在城市工作中尚遇有脫離群衆的盲動情緒，農村工作中尚有不合條件的暴動計劃，甚至還有超乎條件的全省暴動計劃"，"這都是值得全黨注意，須予以堅决之糾正與肅清的"。[96]

因此，真實的歷史是，周恩來才是首先提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是中國革命特徵"、反對攻打大城市的第一人。在周幾次提出這一戰略後，毛還要積極執行李立三的自殺路線，堅持攻打大城市，甚至在長沙城下損兵折將後還不死心，還想去打南昌九江，幸虧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制止了這一盲動。而這卻被御用黨史學家篡改為毛抵制了中央讓他去打南昌的命令，改為去打吉安！

毛澤東之所以犯下這一系列的"路線錯誤"，關鍵在於他認識形勢的思維方式有嚴重問題，他終生擅長"見木不見林"、"坐井觀天"的高聚焦隧道眼（所謂"隧道眼"[tunnel vision]是管狀視野缺損，患者眼中的世界只是一圈，如同從隧道中望出去一般）的分析方式，把局部所見當成天下大勢。周恩來曾對此作過極為中肯的批評。在 1929 年 9 月 28 日代表中央寫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前委過去嘗根據紅軍近鄰

軍閥的行動來判斷整個統治局面的穩定與動搖，這樣的分析是不對的。”[97] 我們還將在後文看到，在抗戰期間，毛澤東甚至根據國府的態度預言世界大勢。古往今來，唯此一位戰略家展現過如此“由小見大”的雄才大略。

四中全會後到遵義會議這一段時間，乃是官修黨史所謂“王明路線統治時期”。準確來說，它指的其實是自 1931 年起中央大員陸續進入中央蘇區，特別是 1931 年 12 月周恩來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後，毛遭到外來的強龍排擠的事，其本質是權力鬥爭，並無多少“路線分歧”可言。

官修黨史所能列舉的“路線錯誤”，就是過左的土地革命政策；“肅反擴大化”；削去毛澤東的兵權，反對毛的“誘敵深入”的“積極防禦”，實行軍事冒險主義；在福建事變中採取關門主義，沒有和 19 路軍組成統一戰線；以及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初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口號，並採用“短促突擊”的消極防禦，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據說，由於“王明路線”的破壞，紅區工作損失百分之九十，白區工作損失了百分之百。

這幾條指控確有一定根據，但事實是，在這些問題上，毛澤東這位“正確路線代表”未必更高明，在有的問題上甚至更糟糕。

（四）極左的土地革命政策

早在 1927 年 8 月 19 日，還在策劃秋收暴動時，毛澤東就擬出“土地綱領”草案數條，其主要內容是：“沒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農在內，歸之公有，由農協按照‘工作能力’與‘消費量’（即依每家人口長幼多寡定每家實際消費量之多寡）

兩個標準公平分配於願得地之一切鄉村人民。”甚至還計劃移民以使得分配均勻：“土地分配以區爲單位不以鄉爲單位，人口多於土地之鄉，可以移於人口少於土地之鄉”；“土地沒收之後，對於地主（無論大地主）家屬之安置必須有一辦法，方能安定人心”[98]。由此可見，“沒收一切土地”的“王明路線”，其實最先發源於毛澤東。

1928 年 7 月間，中共六大在布哈林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條比較現實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規定：“無代價的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底土地財產，沒收的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使用”[99]，並不要求沒收富農的土地，更不要求沒收所有的土地，再把它均分給農民。

然而毛澤東卻與這條正確路線對著幹，他在 1928 年制定的《湘贛邊界土地法》中規定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並於是年 11 月 25 日給中共中央寫報告，說：

> “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邊界對於土地是採取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紅色區域，豪紳階級和中間階級，同被打擊。政策是如此，實際執行時卻大受中間階級的阻礙。當革命初期，中間階級表面上投降貧農階級，實際則利用他們從前的社會地位及家族主義，恐嚇貧農，延宕分田的時間。到無可延宕時，即隱瞞土地實數，或自據肥田，把瘠田讓人。此時期內，貧農因長期地被摧殘及感覺革命勝利無保障，往往接受中間階級的意見，不敢積極行動。必待進至革命高漲，如得了全縣甚至幾縣政權，反動軍隊幾次戰敗，紅軍的威力幾次表現之後，農村中才有對於中間階級的積極行動。如永新南鄉，是

中間階級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隱瞞土地也最厲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紅軍大勝之後，區政府又處理了幾個延宕分田的人，才實際地分下去。”

由此可見，這土改政策遭到了“中間階級”的抵抗，致使土改無法順利進行，然而毛澤東的解決辦法卻是，等“紅軍的威力幾次表現之後”，對中間階級採取“積極行動”。然而在同一份報告中，他也不能不承認，打擊中間階級只能導致民衆在官軍到來時大規模反水：

“中間階級在革命高漲時受到打擊，白色恐怖一來，馬上反水。引導反動軍隊大燒永新、寧岡革命農民的房子的，就是兩縣的小地主和富農。他們依照反動派的指示，燒屋、捉人，十分勇敢。紅軍再度到寧岡新城、古城、礱市一帶時，有數千農民聽信反動派的共產黨將要殺死他們的宣傳，跟了反動派跑到永新。”

“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過重打擊是主因。然若全國在革命高漲中，貧農階級有所恃而增加勇氣，中間階級亦有所懼而不敢亂為。”

“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於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100]

這份報告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題為《井岡山的鬥爭》。如所周知，《毛選》的文章都在出版前作了大量旨在美化毛澤東的修改，並非原始材料。連經過美容加工的文章都這麼說，可見實際情況之嚴重。

然而奇怪的是，毛澤東明知他制定的土地法嚴重打擊了中間階級，使得“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卻還要堅持這左傾路線，甚至打擊與錯誤路線作鬥爭的好同志。

李文林是東固根據地的創始人，贛西南特委常委。他和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只沒收豪紳地主土地，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並與特委書記、毛澤東的連襟劉士奇不和。毛澤東因此於 1930 年 2 月 6 日至 9 日，在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主持召開了軍政聯合會議，對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等痛加整肅，批評他們只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指控他們“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劉士奇），將他們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開除了江漢波的黨籍，將李文林調出主力部隊。[101]

1929 年，斯大林壓倒了布哈林的反對，以國家暴力“消滅富農”。受此大氣候影響，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方針，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甚至把富裕中農指為“第三種富農”，“堅決贊助群衆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甚至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土地問題決議案的同志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份”，要求將他們從黨的隊伍中“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102]

中央大員進入蘇區後，採取了比毛澤東更左的土地分配政策。1931 年 8 月 21 日，蘇區中央局通過了《關於土地問題的決

議案》，規定“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宣佈今後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給地主，富農只能分壞田[103]。同年 8 月 30 日，周恩來為臨時中央起草給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信，批評中央蘇區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104]。此後，在瑞金召開的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根據周的來信精神，批評毛於 1930 年制定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分田原則，“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這就是毛所謂“被錯誤路線迫害”的事實依據。

但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曾抵制和反對這一極左政策。相反，1933 年 6 月 1 日，毛澤東和項英聯名發佈了臨時中央政府《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其中就有“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內容。[105]

1933 年初，毛受中央局之命，領導中央蘇區的“查田運動”。楊尚昆同志說：

>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沒有‘左’呢？比如說查田運動，你們現在看看有個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時總的當然他不當權，但是他做具體工作，他這個查田運動就是‘左’的。（劉英插話：我在于都第二次擴紅，他直接領導我。他給我的批語是誰反對擴紅的就殺。後來又來電話，要三天找出反革命。於是縣保衛局就抓來一批人，硬說人家是‘改組派’。我是覺得‘左’的。後來是洛甫來了一封信，說反對擴紅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們才把這些人放了。）查田運動的結果是整了一批中農，至於富農那時早就沒有了。那麼在這種高壓下就擴紅，創造紅軍一百萬。誰敢不當紅軍呀？當然擴紅成績是主要的，但是那樣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實上等於抽丁，像興國那裡抽得就根本沒有什麼壯丁了。”[106]

因此，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楊尚昆同志和劉英同志（毛澤東的老部下，張聞天夫人）舉報，毛甚至比張聞天還左，命令“誰反對擴紅的就殺”，而且把中農當成富農整，以此製造高壓，“創造紅軍一百萬”，使得興國全縣無丁可抽。邱會作也證實，擴紅“名義上是動員，實際是強迫。農村裡只要是能當兵的人，是非去不可的，有沒有勞動力種田都不顧了。地方蘇維埃政府把可以送到紅軍的人幾乎全送去了。誰也不敢不辦，否則就以反對蘇維埃論處”。興國縣在蘇維埃革命前人口二十三萬，在一九三一年底有八萬餘人參加了紅軍，“實際上已經是竭澤而漁了”。[107]

據國內學者黃道炫、高華等人的研究，查田運動廣泛開展後，將許多中農乃至貧農劃為地富，擴大了打擊面：“把稍為放點債，收點租，而大部分靠出賣勞動力為一家生活來源的工人當地主打”[108]；“建寧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區，共計中農、貧農被誤打成土豪的有五十餘家。”[109] 就連毛澤東自己，都不得不在運動後期承認：“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幾年請過長工的，也把他當作富農。”[110]

毛澤東主持的查田運動，嚴重迫害了蘇區人民，直接導致蘇區人民大量逃往國府統治區。早在運動初期，一些地區就已開始出現群衆逃亡[111]。隨著運動進一步展開，大批群衆逃離蘇區的現象越演越烈[112]。直到運動進行了將近一年，毛澤東才開始“糾偏”，但迅即為張聞天制止。他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為名，下令嚴禁翻案，使得被改正的農民又被戴上地富帽子[113]。此後運動搞得更加過火，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遭到極為嚴厲的處置，以致人民“成群結隊整村整鄉”地逃往國府區域[114]。這些農

民逃出蘇區後生活困難，便在國軍保護下返回家園搶割莊稼[115]，使得本來就緊張的紅區糧食供應更加雪上加霜。

張聞天這才發現查田運動的嚴重惡果，在 1934 年 7 月發表文章反對“極左”，指出：“在查田運動的名義之下，任意沒收了地主富農兼商人的店鋪與商品，或是把工人當了地主打，但沒一個人敢起來糾正，甚至負責的機關也聽其自然不去干涉，因為大家怕這種干涉會遭到右傾機會主義頭銜與同地主資本家妥協的罪名。”[116] 很明顯，毛澤東作為主持運動的負責人，也採取了“聽其自然不去干涉”的態度。至少沒有證據表明，他曾對張聞天禁止翻案的命令作過抗爭。

總的來看，在四中全會以前，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政策比中央的還左，在四中全會以後，只是在“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這一點上，中央比毛還左。而這也就是毛唯一可以用來指責“王明路線”的鋼鞭材料。但即使是在這方面，毛當時也不曾抵制過“錯誤路線”，更以他主持的查田運動使得蘇區人民再也活不下去，不得不大規模逃往“解放區”，並在國軍保護下回鄉搶割莊稼，使得蘇區民生更加凋敝。

（五）血雨腥風的“肅反”

官修黨史對“王明路線”的第二個指責，便是“肅反擴大化”，然而正如高華教授指出的那樣：

> “長時期以來，關於蘇區肅反‘擴大化’的問題，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是一個被嚴重搞亂的問題。根據傳統的解釋，造成蘇區‘肅反’災禍的所有罪責，皆在王明與王明路線的身上，毛澤東與此毫無關聯。不僅如此，毛還被描繪成

是與王明‘左傾’肅反路線鬥爭的英雄。然而歷史的真實卻與此相反，毛是蘇區極端的肅反政策與實踐的始作俑者。”[117]

如上所述，早在四中全會召開（也就是王明上臺）前 11 個月，亦即 1930 年 2 月 6 日到 9 日，為鐵腕整肅不服從毛的領導、與毛的連襟劉士奇有矛盾的贛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和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等人，毛在贛西南特委所在地召開了軍政聯席會議，史稱“二七會議”，毛在會上將江、李等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開除了江漢波的黨籍，將李文林調出主力部隊。2 月 16 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佈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118]。由此開始了血腥的“反 AB 團鬥爭”。

在二七會議精神指引下，蘇區迅速出現肅反高潮。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 AB 團宣傳大綱》，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鬥爭矛頭迅速指向黨內，進而從黨的基層組織發展到上層領導。10 月 14 日，毛在給中央報告中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 AB 團份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 AB 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119]

毛首先在其親率的子弟兵一方面軍下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從 4 萬多將士中清理出 4,400 多名“AB 團”，其中有數十名“AB 團總團長”，悉數被處決。緊接著，毛又派出親信李韶九作為欽差大臣，將江西行委以及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悉數逮捕，並以毒刑逼供，短短五天內就處決了 40 多人，逃出虎口的紅二十軍團長劉敵於 1930 年 12 月 12 日發動兵變，逮捕了該軍軍長，率軍攻佔富田縣城，釋放了所有冤枉被捕人員，並逮捕了李韶九以下當地政府人員（後經陳毅調解後全部釋放），並把隊伍拉過贛江，宣佈脫離一方面軍，並派人向上海中央告狀，要求逮捕毛澤東。

富田事件爆發後，代理中央局書記項英將之定性為“無原則的派別鬥爭”，只開除了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等人黨籍，餘人免予追究。但不久後，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到達蘇區，認為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暴動，免了項英的職，以毛澤東代之。

毛掌權後便於 4 月 17 日主持通過蘇區中央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在蘇區全面展開肅“AB 團”運動，公然下令對“AB 團”分子要“軟硬兼施，窮追細問”，使得毒刑逼供氾濫成災。就連我黨內部文件都承認：“所有 AB 團的破獲完全是根據犯人的口供去破獲的，……審犯人的技術，全靠刑審”。“所謂硬的方法，通常著雙手吊起，人向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有所謂炸刑（萬泰），打地雷公，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勝利縣）……等。就勝利（縣）說，刑法計有一百廿種之多……”；

“凡打 AB 團不毒辣的，都認為與 AB 團有關係，有被扣留的可能”，“甚至於公開的說，寧肯殺錯一百，不肯放過一個之謬論”，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因之提拔幹部，調動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願意去……，在打 AB 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被疑為 AB 團”。[120]

毛還以談判為名誘捕了 20 軍兵變領導人，將其全體處決，又將 20 軍調入紅一、三軍團的埋伏圈，將其包圍繳械，該軍自軍長、政委以下 700 多名副排長以上幹部悉數被殺。該軍被取消番號，殘部歸入紅七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的血腥“肅反”，反倒是被“王明路線”制止的。1931 年底，周恩來進入蘇區途中，目睹了閩西肅“社民黨”的慘禍，當即下決心“糾偏”。他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局會議，就作出了《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問題工作決議案》，嚴厲批評“總前委領導時期”在“肅 AB 團”問題上濫用刑法、“以殺人為兒戲”的嚴重錯誤，強調糾正“肅反工作中的路線錯誤”[121]。這其實是對毛不點名的批評。至此，“打 AB 團”的大瘋狂才逐漸冷卻下來。

此後周恩來仿效蘇聯模式，在蘇區建立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制度，將毛式“肅反人民戰爭”改為特務操作。但毛澤東開創的革命傳統已難徹底糾正，各地打 AB 團、社民黨等虛構組織的流風餘韻未歇。更惡劣的是，毛“肅反”似已上癮，無從擺脫，直到中央蘇區後期，他都在號召“肅反”，看一眼官方編的《毛澤東年譜》便能洞見這一事實：

1933 年 3 月 15 日，毛與項英等發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鎮壓內部反革命問題的訓令，指出：敵人除開軍事“圍剿”之外，還有計劃地在蘇區內部組織反革命活動。但是各

地蘇維埃政府缺乏警覺性，對於反革命活動情形居然忽視。中央政府現在嚴重喚起各地政府及其肅反機關，要立即糾正這種錯誤。

1933 年 6 月 25 日，毛在瑞金召開的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開幕式，代表臨時中央政府致開會詞，說明蘇區內還有地主殘餘和富農，他們假冒貧農、中農，竊取土地革命的利益，混到蘇維埃和群衆團體裡面進行反革命活動；解釋中央政府召集這樣大會的意義，就是要開展查田運動，徹底解決土地問題。

1933 年 10 月 18 日，毛同項英等發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為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緊急動員令》，要求必須特別加緊肅反工作與赤色戒嚴。

1934 年 1 月 29 日，毛澤東向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作《關於緊急動員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強調團結一致爭取徹底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並提出七項緊急任務，其中兩項是“加緊赤色戒嚴”與“鎮壓反革命活動”。[122]

在毛的一再敦促下，許多地方又再度陷入亂捉亂殺的赤色恐怖中。1934 年 5 月，西江縣在“下半月短短的半個月中，即捕獲了幾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處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區在紅五月中共殺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獲了 AB 團、暗殺團、鏟共團、社民黨、保安會的組織，共捉了四個暗殺團長、兩個 AB 團長、數十名連長、排長、宣傳隊長等）”[123]；閩贛省裁判部“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輕重的亂殺一頓”，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沿途格殺群衆”[124]。以致張聞天不得不再度出來糾偏，譴責：“一些地方，赤色恐怖變成了亂捉亂殺……在一些同志中間正在形成‘殺錯一兩個不要緊’或者‘殺得愈多愈好’的理論”。[125]

但總的來說，自周恩來入主中央蘇區後，再沒有開展過像“肅 AB 團”和“肅社民黨那樣大規模的殺人運動[126]。而且，“王明路線”統治下的中央蘇區的“肅反”，與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央蘇區以及湘鄂西、鄂豫皖等蘇區的“肅反”有個明顯區別，那就是只是冤殺百姓，並不屠殺黨內政敵。就連博古中央“反羅明路線”，整“鄧毛古謝”集團，也只是理論批判加組織處理，從未使用過毛無情屠殺部下的血腥手段。所謂“王明路線搞肅反擴大化”，完全是毛澤東倒打一耙。

有趣的是，毛澤東編造出來的神話已經牢不可破，以致許多人以為，在“王明路線統治下”的中央蘇區，毛澤東會有什麼生命危險。國內某學者曾在談寧都會議的論文中說：

> “正是因為毛澤東行事謹慎，才使他得以躲過這一時期頻繁的肅反運動。對此，毛澤東本人也曾覺得幸運。1965 年 8 月 5 日，他在接見一個外國代表團時又談起那段被打入冷宮的歷史，他詼諧地笑道：‘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當然，這不僅僅是一種幽默，相反，也反映了一種客觀的事實。”[127]

反映了什麼“客觀的事實”？笑話！只見毛澤東砍戰友和部下腦袋的，從未見過誰要去砍他的腦殼。

第五次反圍剿之初，毛的親信蕭勁光不戰而棄戰略重鎮黎川，致使大局崩壞，難以逆轉（詳見後）。中共對蕭進行了審判，判處他五年監禁，開除黨籍、軍籍。蕭勁光被關押後，毛派賀子珍前往探視。賀轉達了毛的話，大意是：黎川失守是整個指揮部署的問題，你應該撤退，做得對。“經過毛澤東、王稼祥等人同‘左’傾冒險主義者的堅決鬥爭，蕭勁光關了一個月後被安置到紅軍大學當戰術教員”[128]。

李德也說：博古曾警告他，不要在軍委談及蕭勁光放棄黎川的事，因為毛澤東對這問題反應很敏感。後來紅軍長征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時，在廣西北部的全縣戰鬥失利。蕭勁光在該戰役中“又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當敵人的部隊出其不意地接近他的指揮部時，他帶著警衛人員逃跑了，丟下他手下的部隊，聽天由命。後來這些部隊有的被截斷，有的被打散。他在總參謀部報告時，卻好像沒有發生什麼事。我們自然談到了這件膽怯失職的事件，我我當時說，應該把蕭交給軍事法庭處置。毛澤東像以前一樣又出來庇護他，蕭被調到後勤縱隊，事情也就此了結。”[129]

由此可見，不但“左傾冒險主義者”們沒有毛那種為了個人權位便胡亂殺人的鐵石心腸，而且毛在所謂“被排擠”期間的勢力還如此強大，以致能一筆勾銷法庭判決，包庇貪生瀆職的親信逃過軍法制裁，這就是那個腦袋朝不保夕、搖搖欲落的可憐巴巴的“受迫害者”？！

三、寧都會議錯了麼？

官修黨史說，“王明路線”將毛的正確的軍事戰略譴責為“右傾機會主義”、“等待主義”、“狹隘經驗論”、“遊擊主義”等等，解除了毛對紅軍的領導權，代之以左傾冒險主義，招致一系列重大失敗，最終喪失了中央蘇區，云云。

這些說法當然有些許事實含量，可惜濃度甚低，乃是對複雜的歷史事實的漫畫式誇張，比較符合少兒的接受能力與欣賞習慣。

首先，所謂剝奪毛的軍權，無非就是蘇區中央局在寧都會議上“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事後由中央任命周恩來取代毛出任一方面軍總政委。但毛仍然是政治局委員與中革軍委委員。當時中央還比較“民主”，重大軍事戰略的制定都經過軍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討論，並上報共產國際代表團批准。只是在長征前夕，因為要脫離根據地流動作戰，才決定成立由博古、周恩來和李德組成三人團負責軍事指揮[130]。因此，對重大軍事決策，毛澤東都有建議權與表決權，李德就在回憶錄中披露了毛在軍委會議上發表的反對意見。從下文對福建事變的介紹可以看出，當時中共“民主”過了頭，對於是否該援助 19 路軍，瑞金和上海爭論不休，竟然遲遲不能作出決策，以致延誤了軍機。而且，毛在事後剽竊彭德懷的建議自炫，其實也就是承認了他在軍委或政治局會議上仍有發言權。

其次，寧都會議由來有自，既有策略分歧（亦即所謂“路線鬥爭”），又有權力鬥爭內容，更是毛澤東的個人作風造成的積怨使然。

毋庸諱言，四中全會後成立的臨時中央，在中共革命戰略上仍然很左。這也是必然的，蓋中共革命本來就是蘇俄革命的忠實拷貝，唯斯大林馬首是瞻。斯大林本來就是國際共運頭號左王，其口號歷來是“進攻路線”，中共豈能兩樣？當時共產革命只有蘇俄模式，亦即佔領中心城市，再赤化全國。中共別無其他參考系，當然只能按那模式照貓畫虎。而且，從馬列原教旨來說，中共革命既然據說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當然只能在產業工人密度最高的城市爆發，蓋“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財產佔有觀念，而是與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方式相聯繫的。只有毛澤東那不懂馬克思主義乃至任何一種西洋學說的舊文人，才會把“無產階

級”當成“無產者”的同義語，以為“山溝溝裡能出馬列主義”。因此，既然要幹共產革命，對馬列原教旨略知皮毛的中共領袖們，當然只可能堅持“城市中心論”。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臨時中央才會在 1932 年 1 月 9 日作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聲稱“佔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到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日程上面了”，要求中央蘇區佔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將目前分散的各蘇維埃根據地聯成一片，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131]。如前所述，毛澤東過去曾是立三路線的積極執行者。即使是在攻打長沙失敗，攻打南昌的計劃流產後，毛仍未認識到攻打大城市是不可行的。在臨時中央推行“王明路線”期間，他仍然擁護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總方針。哪怕是他在寧都會議被罷官的前夕，1932 年 9 月 28 日，他還在命令部隊：“造成更有利於與北面敵人決戰和消滅敵人主力的條件，來奪取中心城市，來實現江西革命的首先勝利。”[132]

不僅如此，如毛和臨時中央就東征福建一事爆發的爭吵證明的，他比中央更左更熱昏，甚至認為國府已經喪失了進攻蘇區的能力，紅軍應該結束內線防禦，轉入外線進攻，奪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勝利（詳後）。事實上，在整個中央蘇區時代，他並無反對攻打所有大城市的一般性想法，只是就事論事，在具體戰役策劃中出於現實考慮反對攻打某一具體城市罷了。例如他反對攻打贛州，並不是從理論上指出不該攻打大城市，應把經營重點放在農村，而是說贛州乃敵軍必守的堅城，三面環水，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於我不利[133]，給出的完全是具體的戰術上的理由，根本不是一般性地論證中國革命不能照搬蘇聯模式，

必須走自己的路的戰略理論。更何況他早在 1930 年 3 月間就去打過贛州，碰壁而退[134]，從自身經驗中就知道那個城不好打。總之，他與其他人的分歧只是與一時一事有關的戰術上的分歧，並不是對中國革命途徑的戰略主張的分歧。相反，對中國革命該怎麼搞，毛澤東那陣子根本就沒有形成總體看法，還不是共產國際怎麼說，他就怎麼信。

1932 年 3 月間，就紅軍下一步的發展方向問題，毛澤東和蘇區中央局的大多數成員發生爭論。中央局多數人主張紅軍主力向北發展，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較大城市。而毛主張紅軍向東發展，進入閩東南，打開局面。過後他向官兵解釋，那是因為沿贛江向北發展沒有多少發展餘地，因為國府剿共大本營就在南昌，向西發展有贛江阻隔，不便大軍行動，向南發展則會與廣東軍閥頂牛，云云。[135]

這當然符合避實擊虛的兵法，可惜與馬克思主義沒什麼相干，也談不上什麼反對城市中心論。在上海中央看來，毛這種考慮當然是為強敵嚇倒，害怕中央軍。這種想法再自然不過——就連有的現代學者，都還認為張國燾在草地時反對北上是因為害怕胡宗南的中央軍，何況當時的中共中央？

雙方都沒有意識到，這種爭論，其實反映了馬列理論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原理，不能用於中國革命實踐，必須作根本篡改。只是到了延安後，黨魁們開始反思失敗教訓，才朦朧感到了這個問題，於是毛率先提出“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口號，並獲得國際派的贊同[136]。這口號本身只表明了兩個事實：第一，馬克思主義不是什麼科學理論。真正的科學理論沒有什麼“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的差距，在“理論”與“實際”之間沒有鴻溝，不存在什麼“理論脫離實際”的問題——能脫離實際存在的

理論絕不是科學。科學理論更是普適的，不需要“本土化”——誰聽說過“牛頓力學中國化”、“相對論中國化”、“進化論中國化”？第二，無論是國際派還是毛澤東，統統都是科盲，徹底缺乏現代常識。

吊詭的是，正因為毛澤東不懂馬克思主義原教旨，沒有馬列思維定式對思想的束縛，所以，只有他那個“穴居人馬克思主義者”（“Caveman Marxist”，這是斯大林對毛澤東的準確評價），也才有可能將馬克思主義歪曲得面目全非（所謂“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最終將 20 世紀的“城市中心論”篡改為中古的“農村中心論”。

但當時無論是中央還是毛澤東，對馬克思理論與中國實際情況之間那深如河漢的鴻溝都懵然無覺，於是雙方便作了許多無謂的口舌之爭。其實誰也不比誰高明到哪兒去，根本不是官修黨史說的那種黑白分明的“路線鬥爭”。過去沒有這種無聊吵鬧，乃是因為毛澤東在根據地中是說一不二的土皇帝，但自 1931 年起中央大員紛紛進入蘇區後，毛澤東和他們的權力衝突就必然要與政策爭論攪在一起，雙方都要用“正確路線”包裝自己的政策主張，指責對方犯了路線錯誤。

4 月 14 日，上海中央致信蘇區，批評蘇區中央局“不瞭解紅軍的積極行動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義”，命令對右傾“做最堅決無情的爭鬥”[137]。4 月 25 日，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刊》上，發表《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不點名批評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略“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138]

毛澤東反唇相譏，5 月 3 日，他覆電蘇區中央局，指責：“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三次戰爭和日本出兵之後的中國統治勢力，特別是蔣系，已經受到很大的打擊，對於我們只能取守勢防禦的攻擊，至於粵軍亦是防禦攻擊性質。決不應誇大敵人力量，以為敵人還有像去年三次進攻給中央蘇區以大摧殘的可能，而且在戰略上把自己錯誤起來，走入錯誤道路。”“在三次戰爭以後，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採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我們的任務是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勝利，似要以消滅敵人做前提。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139]

這番吵鬧，實質是毛和臨時中央比賽誰更左。毛告訴中央：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是我，而是你們。三次反圍剿以及日本出兵，使得統治者們特別是蔣系遭到了重大打擊，現在他們對我們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發動大規模圍剿了。所以，我們現在決不能再在內線防禦，而要採取外線進攻戰略，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勝利。

可見當時毛澤東的腦袋熱昏到何等地步，甚至超過了臨時中央，根本就不是官修黨史上那個英明睿智的天才。雙方之所以要互扣“右傾”帽子，乃是因為“反右傾”是斯大林制定的國際共運總路線，所以那帽子乃是打擊黨內政敵的絕佳武器。後人不能信以為真，因為中央罵過毛“右傾”，便以為他真的反過“左傾”。

中央當然不願作“右傾機會主義者”，於是再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信，點名批評毛澤東的“遊擊主義”和“純粹防禦路線”。宣稱“澤東及其它純粹防禦路線的指揮者”的“消極態

度”，是當前“極大的危險”，要求蘇區中央局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毛澤東贊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衆中宣傳積極路線，爭取黨和紅軍的幹部說服他的純粹防禦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140]。忠於上級的蘇區中央局領導周恩來等人，當然也只會認為毛澤東的主張是“百分之百的右傾機會主義”，“完全背離了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141]

寧都會議前後蘇區中央局和毛澤東的爭吵，與此前的無謂吵鬧的區別，只在於兩點：第一，權力鬥爭的成分更濃厚。第二，從大局來看，毛澤東明顯錯了。

1932 年 6 月間，國府發動了對湘鄂西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作為對中央蘇區第四次圍剿的序幕。到了 8 月間，兩個蘇區的情勢都極為緊急。為了逆轉這被動局面，上海臨時中央更加希望紅一方面軍採取“進攻路線”，迫使蔣介石分兵，以減輕那兩個蘇區承受的壓力。這想法的產生很自然，與中央在 1935 年 1 月間命令張國燾放棄川陝蘇區傾巢而出，策應紅一方面軍，以及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頂不住國軍在西北的進攻，要求劉鄧放棄根據地，千里躍進大別山如出一轍。在此背景下，蘇區中央局於 6 月 17 日通過決議，提出“採取更積極的進攻策略”，“奪取贛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撫州、吉安、贛州、萍鄉等中心城市”。[142]

然而毛澤東雖然在周恩來等人的批評下，“深刻承認了自己以前的錯誤”[143]，同意了紅軍主力北上，舉行樂安、宜黃戰役，並在是年 8 月間攻克樂安、宜黃等城，但他內心深處並不可能消除與中央軍交戰的恐懼。因此，當蘇區中央局於 9 月 7 日批評一方面軍“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黃以西打擊陳誠、吳奇偉部”，命令“首先襲取永豐，將敵向西調動，給以各個擊破”，毛便反對

這一方針，建議讓部隊休整，分兵發動群衆。周恩來同意了他的主張，與毛澤東、王稼祥、朱德聯名覆電，反對襲取永豐，聲稱部隊需要休整，並已分兵發展遊擊運動與新蘇區。此後周在毛的鼓動下，無視中央局頻頻來電催促，一直按兵不動，無所作為。

1932 年 9 月中旬，張國燾等致電中共臨時中央，報告紅四方面軍的轉戰情況，並要求中央緊急動員各臨近蘇區軍民策應。臨時中央將該電轉給當時在中央蘇區前方指揮作戰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然而周毛等人在得知四方面軍作戰失利之後，除了給鄂豫皖中央分局兩次去電，用三次反圍剿經驗教導他們怎麼打仗，甚至指責他們不會打仗（“一月餘激戰三次，僅擊敗敵人，未能消滅敵人一路”）之外，仍不採取策應行動，堅持要在當地分散兵力，赤化南豐、樂安地區。

9 月 25 日，蘇區中央局覆電周、毛等人，指出他們的行動方針“在實際上將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而不能呼應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紅軍和河西紅十六軍、紅八軍的行動，“可以演成嚴重錯誤”。

同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堅持原定行動計劃，聲稱：“現在如能馬上求得戰爭，的確對於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並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面，我們對此已考慮再四。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9 月 26 日，中央局致電周毛等人，要他們攻城打援，並向西追擊永豐與西來增援之敵，再度反對他們“在輕敵之下分散佈置赤化工作”的方針，指出那不但會失去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敵人的戰機，而且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

同日，周毛等覆電中央局，流露了對中央軍的懼怕心理，聲稱樂安敵軍吳奇偉師非高樹勳一旅可比，如攻樂安三日不下，西來援敵必至，內外夾擊轉增不利。同時強調說：“攻樂安無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滅吳奇偉，以現時紅軍實力，將不能接著打強大增援敵隊。此請中央局特別注意。”

9 月 29 日與 30 日，蘇區中央局連續致電周毛等人，批評他們分兵擴大蘇區的方針“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我們現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豐河兩岸，做一個時期擴大蘇區工作等意見，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不去深刻領會攻取宜黃受分散所造成之嚴重的錯誤教訓”。強調對一切離開原則完成目前任務的分散赤化的觀點，“應給以無情的打擊”。

在收到中央局如此嚴重的警告後，周、毛等人仍然抗命不從，於 9 月 30 日致電蘇區中央局急轉鄂豫皖中央分局並轉臨時中央，聲稱四方面軍若不消滅敵人，則其他蘇區策應亦將無濟於事，中央蘇區自顧不暇，不能策應鄂豫皖，並再度為四方面軍慷慨提供免費戰略指導：

> 我們認為與敵決戰，必須具備擊破敵之一方的把握，以轉變目前不利局勢，並準備繼續作戰的力量。“若僅擊敗敵人，而不能消滅敵人，不能繳獲槍彈、俘虜，不能繼續作戰，這將不易變更現有局勢，他蘇區援助亦難消滅敵人，不易調動進攻鄂豫皖敵軍。”中央蘇區現正處於敵堅守據點，積極佈置大舉進攻，攻則集三師以上兵力來援，頗難取得在運動戰中消滅他的環境。“因此，鄂豫皖在現時必須選擇敵人之弱點，首先消滅敵之一部，如無此把握而蘇區尚能活

動，應勿急求戰，多疲勞敵軍，俟造成更有把握的決戰。”[144]

至此，中央局忍無可忍，終於決定暫停軍事行動，立即在前方開蘇區中央局全會。這就是在 1932 年 10 月間召開的著名的“寧都會議”。“會議中批評了澤東同志過去向贛東發展路線與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批評到前方同志對革命勝利估計不足，特別指示[出]澤東同志等待觀念的錯誤，批評到總政治部對有政治問題的人採取了組織上自由主義與組織觀念的錯誤，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在大多數同志認為毛同志承認與瞭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最後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145] 在我看來，中央局給毛這點微不足道的處分完全是應該的。

首先，毛澤東煽動周恩來抗命的理由，根本就不能自圓其說，直接違反了他的“分兵以發動群衆，集中以對付敵人”的原則：如果敵軍真的非常強大，威脅到中央蘇區的存亡，那麼他就不該堅持在大敵當前時分兵作群衆工作，赤化新佔領地區，因此也就不能說中央局指責他“輕敵”毫無根據。反過來，如果敵軍並不是那麼強大，或至少未對中央蘇區構成威脅，那麼他煽惑周恩來違抗中央局的集體決定，拒絕集中兵力主動出擊，以策應四方面軍，就完全是錯誤的。

其次，若從全局來看，一方面軍絕對有必要迅速採取大的行動以吸引國軍注意。此時湘鄂西與鄂豫皖蘇區都陷入危局，紅四方面軍（時稱四軍團）與二軍團（當時改名紅三軍）瀕臨滅頂。為了營救友軍，一方面軍冒一定風險、甚至作出一定犧牲是應該的。後來四方面軍為了策應一方面軍，不惜扔下川陝根據地南

下，為何一方面軍就不能作這種犧牲？紅一方面軍若能像後來第四次反圍剿那樣，以佯攻城市調動敵人，打一個大兵團伏擊戰，消滅中央軍的一兩個師，必然能引起蔣介石注意，分散國軍對其他蘇區的壓力。

毛澤東這種自相矛盾的舉措，似乎只能有一個合理解釋：雖然中央軍尚未對中央蘇區構成威脅，起碼沒有嚴重到紅軍必須迅速集結兵力準備應戰的程度，但他懼怕中央軍，不敢與之交戰，更極度自私，不願為營救友軍損耗實力，因此力持“四方面軍必須自己消滅敵人論”、“其他蘇區策應無效論”、“中央蘇區無力策應論”、“中央軍吳奇偉部不比高樹勳部論”。這就是他為何在寧都會議上遭到大多數人批評後仍固執己見，不同意改變既定方針，出擊敵人。這不能不說是只顧自己利益，不顧革命全局的本位主義。

更何況大多數與會者對毛澤東的批評都相當有道理，例如說指責毛的“誘敵深入”是“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說毛犯了“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等等，不能把這些批評一概斥之為“左傾”。

須知兵無常法，該在內線還是在外線作戰，必須因時因地制宜，根據具體情況靈活處理。所謂“誘敵深入”，無非是將敵軍誘入內線，尋機殲滅之。它不過是一種戰術，有其使用範圍，豈能絕對化、固定化為永恆不變、放之一切情況而皆准的神聖原則，萬應靈丹，普適公式？

毛澤東這主張是根據三次反圍剿的經驗提出來的。無非是因為敵強我弱，進行內線作戰能充分利用己方的天時地利人和，在自己選定的時間和地點與敵軍決戰。此乃普通常識，並不是只有天才才能想出來。偉大領袖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

> “這裡單說戰略退卻，江西叫做‘誘敵深入’，四川叫做‘收緊陣地’。從前的軍事理論家和實際家也無不承認這是弱軍對強軍作戰時在戰爭開始階段必須採取的方針。外國的軍事家就曾這樣說：‘戰略守勢的作戰，大都先避不利的決戰，使至有利的情況始求決戰。’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對此也沒有任何的增加。”[146]

在頭兩次反圍剿中，擔負圍剿任務的國軍乃是雜牌。軍閥部隊為防止蔣介石吞併，從來只想保存實力，對紅軍作戰並不積極，因此行動遲緩，各懷異志，由此導致敵軍行動不同步，彼此之間呼應不靈，甚至互不策應救援。第三次圍剿雖有中央軍參加，但仍是大雜燴，國軍又採用長驅大進的戰略，造成各部行動不同步。在這種情況下，紅軍當然可以抓住戰機，殲滅冒進深入的一部敵人，則餘敵自然膽怯而退。

但這戰術也有弊端：首先，若一定要等到敵軍深入才作戰，則很有可能誤了戰機。圍剿軍總是先在外線的出發陣地完成集結，然後再向蘇區內線推進。這集結過程一般不會同步。若要死抱著“誘敵深入”的框框，不敢先發制人，打出外線去，突襲並殲滅先到達出發陣地的某部敵軍，借此打亂敵軍的整個圍剿部署，而要坐待所有的敵軍完成集結後深入己方領土後，才去尋找殲敵機會，那就有可能貽誤了戰機，被迫與具有局部優勢的敵軍作戰。

其次，在內線作戰，對境內的經濟和民生破壞極大。尤其是紅軍實行“堅壁清野”、“赤色清鄉”的殘民方針，嚴重影響了農村生產。若曠日持久，則本來就貧瘠的蘇區絕無可能持續支撐沉重的戰爭負擔。而這就是第五次圍剿中發生的事。事實上，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也發現了這一點，因而跳到另一個極端，

竟然要野戰軍扔下根據地，打到敵人的遠後方去，因而給革命帶來了損失（詳見後）。

最後，“誘敵深入”之所以能奏效，其前提是敵軍有長驅直入的意願。若敵軍並無此種意願，而是採用第五次圍剿那種步步為營的戰術，任你引誘也不上鉤，則紅軍主動後撤，就只能自行幫助敵軍減輕推進的阻力。這就是第五次圍剿中面臨的不可解決的難題。

其實，毛澤東把“誘敵深入”當成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生命線與幸福線，只反映了他思維能力的窳陋。他沒有理論能力，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總結出一般性規律來，這才會把“誘敵深入”的戰術當成一般性戰略原則加以鼓吹，卻看不到真正的一般性指導原則，是爭取戰爭的主動權，而所謂“奪得主動權”，乃是“迫使敵人以我期望的兵力，在我選定的時間和地點與我作戰”。毛過去採用的“誘敵深入”之所以奏效，恰是因為它滿足了這一點。但“誘敵深入”既不是“奪得主動權”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它的充分條件。換言之，誘敵深入未必就能奪得主動權，不誘敵深入也未必不能奪得主動權，迫使敵人在我選定的戰場上與我作戰。

從這個角度來看，蘇區中央局大多數委員批評毛澤東是“等待主義”、“守株待兔”，並非毫無道理，而他們提出的佯攻樂安，圍城打援，調動敵軍，在運動中殲敵的設想，也不是毫不可行的。事實上，第四次反圍剿就是採用了此策，取得了紅軍自創立以來的空前大捷。

至於“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更是實事求是的批評。如所周知，毛澤東對“洋房子先生們”極度輕蔑鄙視，傲岸自雄，桀驁不馴，專橫跋扈，而且好弄權術，任人唯親，專

一培育扶植私人勢力，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提拔道德品質極差的阿諛逢迎者（如李韶九、劉士奇等人），鐵腕整肅膽敢反對他的鯁直之士。前已提及，早在蘇區創立初期，毛就因專橫跋扈，營私結黨，任人唯親，引起紅四軍多數幹部不滿，毛被迫一度離開軍隊，到地方工作。後來陳毅就此事專赴上海請示中央，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陳毅返回福建後才請毛復出[147]。但毛並沒有接受中央的批評，反而變本加厲，以鐵腕收拾李文林、江漢波等土鼈，引起了強烈反彈，打“AB 團”與富田事件的血腥屠殺，使得蘇區黨內軍內怨聲載道，積怨累累。中央大員進入蘇區組成中央局以後，當然遲早要對毛澤東這套霸王作派產生強烈反感。

正因為此，毛澤東煽惑周恩來按兵不動，在友軍陷入危難時專注於分兵赤化新蘇區，不過是促使中央局委員們早就積下的一肚子氣爆發的導火索罷了。在寧都會議召開前的 9 月 30 日，蘇區中央局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就說：

> “毛澤東同志對擴大中央蘇區、佔領中心城市以及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鬥爭表現動搖。……到東部山區的機會主義仍在繼續，他常常試圖加以實施，忽視黨的領導，而提拔幹部是從私人關係出發，而不是出於社會實踐的需要。雖然莫斯克文同志（即周恩來）在那裡，但他實際上很難貫徹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活動。因此，為了軍事領導人觀點的一致，我們堅決而公開地批評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並想把他召回到後方中央蘇維埃政府中工作。”[148]

這就是為何遠在上海、不和毛澤東直接打交道的臨時中央的態度反倒比蘇區中央局的溫和得多。在寧都會議期間，中央還致電蘇區中央局，指示：

> “至於與毛澤東同志的分歧，我們再重複一遍：請嘗試用同志式的態度來爭取他贊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不進行反對毛澤東的公開討論。現在我們反對將他從軍隊中召回，如果他服從黨的紀律的話。”[149]

儘管中央作了這指示，蘇區中央局還是公然抗命，撤了毛澤東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可見毛澤東在蘇區真是搞得天怒人怨，衆叛親離。黃克誠指出，是毛任人唯親、整肅異己的做法使得他喪失了人心：

> “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以錯誤的政治、軍事路線，代替了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其所以會如此，蘇區的同志相信黨中央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份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50]

其實這點處分真是微不足道，與他整肅政敵的毒辣手段形成了鮮明對照。然而他卻刻骨銘心地銜恨一輩子，似乎受了什麼慘無人道的迫害。這人從來有高度誇張的文學才能，什麼“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就是代表作。寧都會議自然也不例外，他後來說什麼：

> “寧都會議後，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我說，有一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裡去，搞得很臭。後來，在長征中間，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叫遵義會議，我這個臭的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151]

“我就受過壓，得過三次大的處分，被開除過黨籍，撤銷過軍職，不讓我指揮軍隊，不讓我參加黨的領導工作。我就在一個房子裡，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我也不找任何人，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什麼鄧、毛、謝、古。其實我連鄧小平同志的面也沒有見過。後來說在武漢見過，但是，我一點印象也沒有，可能見過沒有談話吧!”[152]

這些話完全是危言聳聽。可笑的是媒體至今還把這些極度誇張的話語當成信史傳播。

更大的諷刺還在於，毛澤東被解除總政委之職後，天並未垮下來，地球也並未因此停止轉動，紅軍非但沒有遇到災難，反而接二連三地打勝仗。10 月 18 日，紅一方面軍連克黎川、建寧；19 日、22 日又連克泰寧、邵武；11 月 17 日、19 日再克資溪、金溪，打開了贛東、閩北的局面，為紅軍贏得第四次反圍剿戰役奠定了基礎。[153]

四、沒有毛政委，一樣打勝仗

前文已經說過，兵無常法，該是外線還是內線作戰，當根據具體情況決定，不能把“誘敵深入”當成不可違反的神聖原則。真正的一般性指導原則，乃是奪得主動權，迫使敵人以我預期的兵力，在我選定的時間和地點與我作戰。第四次反圍剿就是靈活應用這一原則的光輝範例。

1932 年年底，國軍在完成了對湘鄂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後，開始準備對中央蘇區的圍剿。據李德介紹，早在該年夏季，中共就獲得了關於國軍行動的“非常準確的情報”。根據李德建議，並經共產國際代表團批准，紅軍準備趁敵人尚未完成圍

剿部署，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為此將主力調到北線，目的是擴大江西東北部蘇區，向紅 10 軍（即方志敏所創闖浙贛蘇區的紅軍）靠近，奪取有利出擊陣地，從側翼和背後向敵人進攻。戰役取得初步勝利，奪取了中央蘇區東北面的重鎮黎川。先頭部隊與紅 10 軍建立了聯繫。1933 年 1 月，李德等人又得知，蔣介石的精銳部隊在其最好的將領陳誠指揮下，在盱江和贛江之間的地區，向樂安－寧都方向發其攻勢。於是他和上海局一道建議停止在贛西北的戰役，一三軍團改向樂安方向進軍，在南豐附近未被敵軍發覺，越過盱江，出其不意向敵人進攻，殲敵近 3 師，打破了第四次圍剿。[154]

李德其時尚未進入蘇區，是在上海遙控指揮的，因此未能詳細介紹第四次反圍剿的過程，還把被殲滅的國軍 59 師說成 14 師。但他的證詞提供了一個官修黨史未提的重要細節：紅軍實行“進攻路線”，在國軍尚未完成圍剿部署時便主動出擊，奪取了紅區邊陲重鎮黎川，為後來誘敵提供了條件。

官方版本的反圍剿戰事是從 2 月才開始的。按照中共中央軍委的指令，紅一方面軍自 2 月 9 日起開始主動出擊，對南豐發起進攻，然遭到南豐守軍陶峙岳第 8 師的堅決抵抗，周恩來和朱德乃決定改為佯攻，圍城打援。國府迅速調集中路軍主力南下南豐，準備與紅軍決戰。周朱鑒於敵強我弱，便改變了打援計劃，主動撤圍，以紅 11 軍偽裝主力撤往黎川，卻將主力秘密轉移到東韶、洛口地區，待機殲敵。陳誠以為紅軍主力撤往黎川，遂令國軍第 1 縱隊集結於宜黃以南，第 2 縱隊自南豐出擊建寧，第 3 縱隊正面進攻黎川，擬將紅軍包圍於黎川加以殲滅。

紅軍在發現國軍動向後，抓住第 1 縱隊第 52、59 兩個師彼此相距較遠之機，由一方面軍主力在登仙橋和黃陂分別伏擊之，

一舉全殲了這兩個師。此後陳誠改用中央突破，將中路軍分為前後兩軍，向廣昌地區進攻。紅軍再次以紅 11 軍偽裝主力，擺出保衛廣昌的態勢，主力則潛入蘇區北部。陳誠再次中計，令前軍加速前進包圍紅軍，致使前後兩軍脫節 50 公里。隱蔽待機的主力紅軍抓住這一機會，在草台崗突襲後軍第 11 師，殲滅了該師大部。此後又在東陂殲敵第 9 師一部。餘敵紛紛撤出蘇區，圍剿至此打破。

官方媒體承認："在這次反'圍剿'中，周恩來、朱德首創大規模的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經驗，為紅軍戰史書寫了極其光彩的一章。這次反'圍剿'勝利後，中央紅軍發展到 10 萬人，其武器裝備同時得到很大改善。中央蘇區同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進入鼎盛期。"[155] 的確，這次反圍剿不但是歷次反圍剿戰役中取得戰果最大的一次，消滅敵人三個師，繳槍萬餘支，炮 40 門，新式機槍 300 餘挺，使蘇區範圍擴大到 30 餘縣，紅軍的武裝割據達到了巔峰，而且殲滅的是中央軍的精銳，而前三次反圍剿消滅的則是戰鬥力極差的雜牌部隊。這就是據說蔣介石為何自承："惟此次挫失，淒慘異常，實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

那麼，這次勝利是怎麼取得的？莫非真如官修黨史所說，是因為當時"王明路線"還來不及全面控制我黨我軍，所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能餘熱發電？姑不論毛主席已被解除了總政委的職務，戰役是周恩來和朱德指揮的，即以戰略戰術而論，它也違反了毛主席革命路線。

在光焰萬丈的名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偉大領袖毛主席為紅軍規定了反圍剿的嚴格操作程序，轉述於下：

1）準備階段：這是指敵人發動圍剿前的蘇區內部的準備工作。"準備階段中的主要的問題，是紅軍的準備退卻，政治動

員，徵集新兵，財政和糧食的準備，政治異己分子的處置等。”“準備階段中的主要步驟，就是軍事上的準備退卻，和為著準備退卻的政治上的動員”。

2）戰略退卻階段：“一旦敵人大舉向我進攻，紅軍就實行所謂‘求心退卻’。退卻的終點，往往選在根據地中部；但有時也在前部，有時則在後部，依照情況來決定。這種求心退卻，能夠使全部紅軍主力完全集中起來。”這兒所謂“求心退卻”，也就是“向心退卻”。亦即選定一個退卻終點，該點既是全體主力部隊的集結點，又是戰略反攻的初戰戰場。在實行戰略退卻過程中，原來分散的主力部隊全體向該點撤退，在該點完成集結。當敵軍推進到該點時，若情況對我有利，則紅軍發起攻擊，若情況不利，“退到該地區還無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幾步，待敵發生可乘之‘隙’”。

3）戰略反攻階段：當敵人推進到我軍退卻終點，又有隙可乘時，我軍即發動反攻。但必須慎重初戰，原則是：

> “第一，必須打勝。必須敵情、地形、人民等條件，都利於我，不利於敵，確有把握而後動手。否則寧可退讓，持重待機。機會總是有的，不可率爾應戰。”
>
> 第二，初戰的計劃必須是全戰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初戰必須對全戰役有利。
>
> 第三，初戰的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準備好反攻勝利或失敗後的應變方案。[156]

不難看出，第四次反圍剿的實戰過程在多處違反了上述刻板的操作程序。

首先，戰爭並不是從“求心退卻”開始，而是以外線進攻開始的。第一次伏擊的敵軍根本沒有深入紅區，主要戰場登仙橋、

黃陂都在蘇區週邊，不是什麼“誘敵深入”，其實是在外線圍城打援不成之後的隨機應變，乃是毛反對的“禦敵於國門之外”。第二次伏擊戰確實是誘敵深入，敵軍也確實深入到了廣昌前沿，但伏擊的並不是深入的敵軍，而是仍然處在蘇區邊緣地帶的敵軍。更重要的是，第一次誘敵之所以成功，乃是因為紅軍在此前攻克了重鎮黎川。該城為戰略重地，國軍不能不爭，陳誠才會令第一縱隊東進，授紅軍以可乘之機。

其次，若按官修黨史，則紅軍圍攻南豐該算是“初戰”。照毛的說法，“第一個戰鬥的勝敗給予極大的影響於全局，乃至一直影響到最後的一個戰鬥。” 然而它雖未打勝，卻沒有給全戰役帶來不利影響。若按李德的說法，則紅軍攻下黎川該算“初戰”，它也確實為後來的戰鬥創造了有利條件，然而它並不是內線戰略反攻的開始，卻是主動進攻的成果。

第三，按毛的教導，“戰略退卻終點”既是紅軍的集結點，又是發起戰略反攻的初戰戰場。然而周朱根本就沒有按照這刻板公式指揮，而是將主力集結於東韶、洛口地區待機。該地區處於中心位置，無論在哪個方向發現敵軍有隙可乘，紅軍都能及時出動。周朱在捕捉到戰機後，將主力部隊迅速轉移到蘇區北部邊緣的登仙橋與黃陂設伏。若將該地區算為“初戰戰場”，則它遠離了東韶－洛口的“戰略退卻終點”。第二次伏擊戰場草台崗也如此。

第四，周朱沒有按照毛的指示，把“揀弱的打”當成“弱軍對於強軍作戰的一個必要條件”，而是以敵軍各部因行軍路徑或速度不一，左右或首尾不能相顧之時作為戰機。兩次伏擊都以此為下決心的標準。

第五，周朱違反了毛的指示，實行“兩個拳頭打人”，同時在登仙橋與黃陂兩地伏擊了兩路敵軍。

於此不難看出，毛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裡闡發的反圍剿戰略原則，完全是根據三次反圍剿的簡單情況總結出來的，確實是僵硬死板的“狹隘經驗論”。第四次反圍剿的實際戰例表明，到底是主動出擊到外線作戰，還是誘敵深入，只能根據敵我態勢來靈活決定。只要戰場於我有利，能造成我軍的局部優勢，那就不管它是在內線還是外線，不管來的是嫡系還是雜牌，都應該當機立斷，果決發起戰鬥。而這些做法都違反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教導。毛主張“持重待機”，反對“率爾應戰”，確有“等待主義”之嫌。

據此可以斷言，若是毛澤東來指揮第四次反圍剿，則他只會按其狹隘經驗，以戰略退卻作為反圍剿的第一階段，那也就很可能不會贏得第四次反圍剿，起碼不會取得如此輝煌的戰果。這道理毫不難明白：若是不在國軍完成部署前，就在外線殲敵誘敵，而是實行所謂“求心退卻”，等到達退卻終點，再在該點開始“戰略反攻”，“慎重初戰”，則國軍也就不會在蘇區週邊丟了兩個師。待到敵人將所有的部隊都部署在環繞著蘇區邊界的出發陣地，同時分進合擊，則紅軍不但會錯過殲滅敵人的有利時機，而且也就沒有多少迴旋餘地了。

例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

> “退卻的軍隊能夠選擇自己所欲的有利陣地，使進攻的軍隊不得不就我範圍，這是內線作戰的一個優良條件。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這個條件的。但是單有這個條件還不夠，還要求別的條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條件。再則還要求好打的敵人，例如敵人疲勞了，或者發生了

過失，或者該路前進的敵人比較地缺乏戰鬥力。這些條件不具備時，雖有優良陣地，也只得置之不顧，繼續退卻，以就自己所欲的條件。”[157]

實際上，十多年後，蕭勁光等人就以東北“三保臨江”戰鬥的實踐經驗，批駁了毛這一“經典論述”：

在敵人重兵進攻的嚴峻形勢下，要有決心打硬仗，打較冒險的仗（仍是運動戰），“如無此決心，則必然這樣也不便打，那樣也不便打，其結果，必然部隊拖垮，山頭失守，危害全局。經驗證明，愈怕損失則損失更大；不怕損失則損失反小”。[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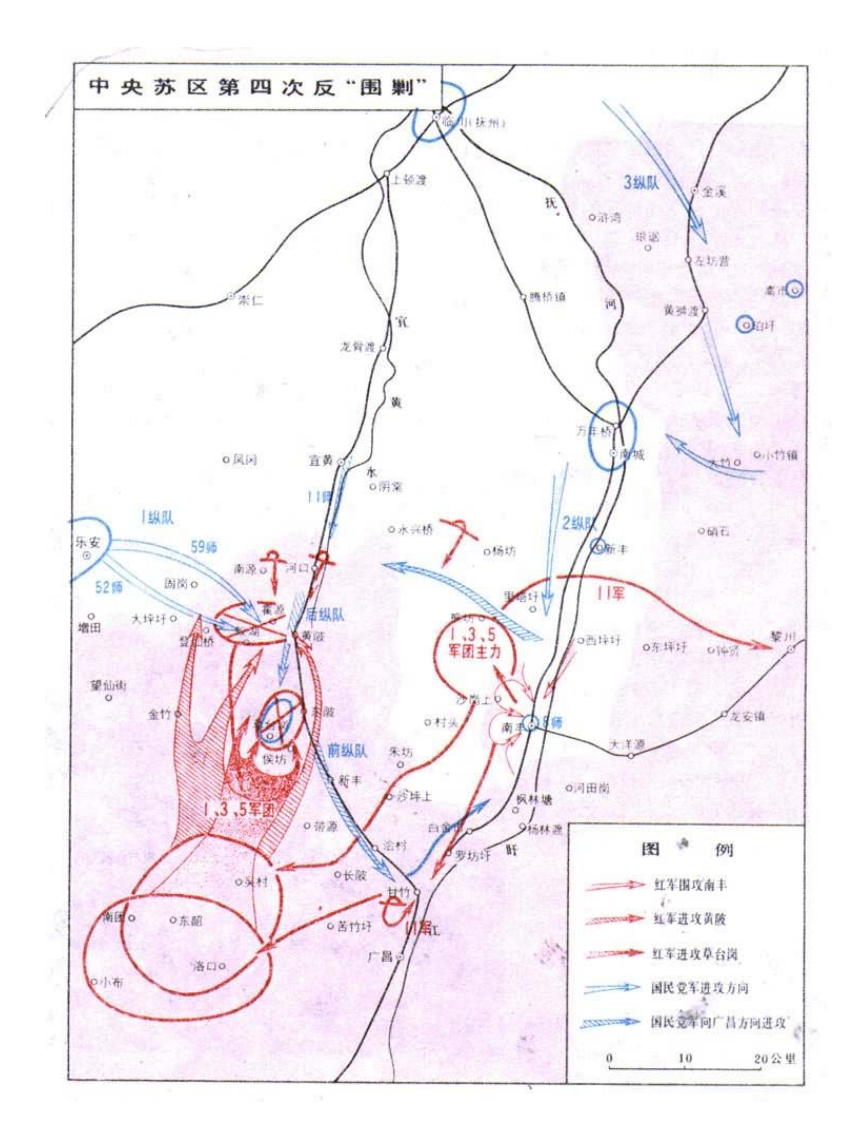
的確，若偉大領袖用他的光輝思想來指導第四次反圍剿，則他很可能會忍痛放棄登仙橋和黃陂的優良陣地，因為那兒處在紅區週邊，人民條件並不好，而且在該路前進的敵人都不是雜牌，並不缺乏戰鬥力。

由此可見，沒有毛主席，紅軍照樣打勝仗。而且，沒有毛主席的狹隘經驗論束縛，紅軍反而能打更大的勝仗。

五、第五次反圍剿

（一）毛若指揮，敗得更慘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其名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花了大量篇幅抨擊當時軍委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指揮。那文章有如說是軍事學論文或教材，莫如說是政論，其目的不在於傳授軍事理論和技術，而是證明他在軍事上比當時的中央領導高明萬倍，那戰爭如果是他指揮就肯定打贏。



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示意圖

他的努力果然大見成效，定下了此後數十年官修黨史的基調。至今官修黨史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基本評價，仍然是他這段話：

> “第五次反‘圍剿’時，幹部的意見開頭是繼續軍事冒險主義反對誘敵深入的觀點，後來是變成了軍事保守主義。”[159]

可惜這不過是彌天大謊，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確實打得非常被動，始終未能搶得先手，確實經歷了“冒險主義”——“保守主義”——“逃跑主義”三階段，但那並不是誰反對誘敵深入所致。當時的中央領導確實在反圍剿開始前與反圍剿過程中作了幾個錯誤決策，但都不是毛指責的“反對誘敵深入”的錯誤。紅軍的戰略指揮究竟錯在何處，毛始終沒能看出來。若是換他去指揮，結果只會更糟糕。

上文已經說過，戰爭就是搶個主動權，迫使敵人以預期的兵力，在我選定的時間地點與我方交戰，使得我方能形成局部優勢，以己之長，擊敵之短。毛反復鼓吹的誘敵深入，其實不過是達到這目的的手段之一罷了。它並不是奪得主動權的必要條件，更不是充分條件，並不一定都能奏效，第五次反圍剿就最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毛澤東“誘敵深入是弱軍戰勝強軍的萬應靈丹”的潛在假定，是敵人是白癡，永遠不會總結教訓，一定會乖乖按他的引誘入彀。可惜真實世界並不是這樣的。蔣介石總結了過去的失敗教訓，在德國顧問的指點下採用了“堡壘主義”的新戰略，以直勝曲，以拙勝巧，堅決不上“誘敵深入”的當，而是以守為攻，步步為營，處處築碉，以緩慢但堅定的絞殺，剝奪紅軍的選擇餘地與迴旋空間，逼迫紅軍在國軍選定的戰場上和國軍交戰，逼迫紅

軍無法進行運動戰而不得不投入陣地戰，國軍再以強大火力壓倒對方的人海戰術，以己之長擊敵之短，這就使得主客之勢倒轉，始終牢牢掌握了主動權，最終使得紅軍無計可施，只能突圍長竄。

關於國軍採用的新戰略，國內學者黃道炫先生有相當精彩的介紹[160]。這兒根據他披露的史料，作點述評。

第五次圍剿從 1933 年 10 月開始，至 1934 年 10 月結束，歷時整整一年。光是從戰爭的期限都能看出，蔣介石根本不想速戰速決，而是穩紮穩打，用持久戰、消耗戰熬垮對方。圍剿一開始，他就明確制定了整個戰役方針：“匪區縱橫不過五百方里。如我軍每日能進展二里，則不到一年，可以完全佔領匪區。”[161]在整個戰事過程中，他都非常能沉得住氣，決不急於求成，貪功冒進，而是一再叮囑部下穩紮穩打：“我中路軍主力不必求急進，只要固守現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湯兩路之發展，則匪經此戰必崩潰更速，不必心急也”[162]；“進展不必過急”[163]；“總須穩紮穩打為要”[164]。直到整個戰役行將結束時，他還在叮囑部下：“不宜單獨……進展，應令會同各縱隊前進，免為匪乘”[165]；“仍宜注意集結，勿過份分散”[166]。

總而言之，國軍第五次圍剿，其實就是改步兵為“戰鬥工兵”。部隊每天前進四五華里後，即使不遇到抵抗，也立即掘壕自衛，並在所有通道和一切村鎮上都構築堡壘。碉堡之間彼此可以互相瞭望，機槍火力可以彼此接應。紅軍靠輕武器根本無法攻佔這些工事。國軍若從工事裡出來，一遇到紅軍，立即便撤回工事，以陣地戰伺候對方[167]。隨著國軍穩步前推，身後便留下層層“碉林”。碉堡群之間相距在兩華里以內（這是老蔣下的死命令：“封鎖碉堡群之間隔，不得過二里以上”[168]），由新修的公

路連接在一起，以便各部互相迅速增援。紅軍即使突破第一線碉堡，也無望突破層層碉堡森林，只能困在逼仄的碉堡群中，遭受國軍交叉火力大量殺傷。

這就給紅軍出了個無法解決的難題：紅軍克敵制勝的慣技，乃是運動戰，也就是在敵軍運動中發起突襲殲滅之。現在敵軍並不迅速運動，而是頂著堡壘緩慢推進，這運動戰、遊擊戰等等，還怎麼個打法？但你若要坐視不管，甚或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教導，實行“戰略退卻”，那豈不是自動為敵軍去除前進阻力，使得他們毫不費事地對蘇區實行永久性佔領？前幾次圍剿，國軍並沒有頂著碉堡進來，對蘇區的佔領是暫時的而非永久的。紅軍只要殲敵一部，餘敵怕被殲滅，自然會撤出蘇區，因此紅軍暫時作“戰略退卻”也無妨。但這次國軍在佔領區修起了碉堡群，即使其前鋒在離開碉堡向前推進時被消滅了，身後留下的碉堡還照樣存在，有第二第三梯隊在裡面防守。要想收復失土，紅軍就不得不打攻堅戰，而這不是紅軍的火力能夠勝任的。因此，蘇區“國土”的喪失將是永久性的，絕無可能收回來。

這就是當時中革軍委其他成員反復請教毛的問題，他在三年後回答：

> “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人們，反對戰略退卻，理由是退卻喪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謂“打爛罎罎罐罐”），對外也產生不良影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則謂我退一步，敵之堡壘推進一步，根據地日蹙而無法恢復。如果說誘敵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壘主義的第五次‘圍剿’是無用的。對付第五次‘圍剿’，只能用分兵抵禦和短促突擊的方法。

> 回答這些意見是容易的，我們的歷史已經回答了。關於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買者如果不喪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賣者如果不喪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喪失是破壞，而其取得是進步的建設。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卻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麼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我們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的蝕本正因為這一點。不願意喪失一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亞的打硬仗，也得到喪失全國的結果，雖然阿國失敗的原因不僅僅這一點。”

此乃典型的毛式回答，處處充滿辯證法精神，反對任何一種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答了跟沒答一般。凡是智力正常的人都能看出來，“左傾機會主義者”們問的問題再實在不過：現在的情勢是“我退一步，敵之堡壘推進一步，根據地日蹙而無法恢復”，領土丟了，卻換不來戰勝敵人、恢復土地的戰機。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採取何種戰略，才能使紅軍發揮自己的優勢，在內線創造克敵制勝的機會？不拿出具體辦法來，光是空談一通“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抽象原則有什麼鳥用？

可笑的是毛還要說風涼話，指責“左傾機會主義者們”魯莽滅裂：

> “江西第五次反‘圍剿’，我軍全然不講退卻，原因在於對局部形勢和整個形勢都不注意，實在是一種魯莽滅裂的幹法。”

問題不是博古、恩來、李德、項英等人不想退卻，而是不能退卻，因為退卻並不能如過去一樣，換來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戰機，只能白白地永久性喪失土地。而沒有了土地，也就沒有了人力物力的戰爭資源，沒有了軍隊周旋的空間，只能最終被國軍擠死。如此簡單的道理，毛澤東為何就是不懂？

然而毛澤東就是有那臉皮無恥撒謊：

> "'堡壘主義的五次"圍剿"時期我們不能集中作戰，只能分兵防禦從事短促突擊'，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敵人三里五里一進、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壘主義作戰法，完全是紅軍自己的節節抗禦促成的。"

> "喪失根據地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喪失了江西中央根據地。這裡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產生的。領導者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後方打去的進攻，也不敢大膽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結果喪失了整個根據地，使紅軍做了一萬二千多公里的長征。"

他這完全是倒果為因。步步為營，層層築碉，乃是蔣介石早在戰前就決定並始終堅持不變的戰役總方針。即使是在國軍取得廣昌大捷之後，蔣介石還一再叮囑部下"進展不必過急"、"總須穩紮穩打為要"。紅軍根本無法"大膽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節節抵禦乃是敵人的堡壘主義逼出來的不得已之計，毛卻就是有那本事倒過來說，反誣國軍步步為營乃是紅軍節節抵禦造成的！

事實上，李德當初已經回答過他了：

> "毛澤東……在革命軍事委員會裡激烈反對這種戰術，即：一旦敵人離開碉堡群，就鉗制敵人與主要作戰區內，給

敵人以直接的反擊。他認為，由於這種戰術我們失去了主動性，自己放棄了在有利條件下，即在敵人的外部交通線上或在蘇區內部給敵人以殲滅性打擊的可能性。對於這種他稱之為進攻性防禦的原則，本來是無可爭議的，我們大家也都是贊成的。但是面對敵人的‘堡壘政策’，該如何實現運動戰，對這個問題毛澤東並沒有回答。在贛東北敵人的外線尋找決戰時機，這點從戰略上來講是毫無結果的。至於在我們區域內進行殲滅戰的有利條件，只要不能誘敵深入，也就是敵人不放棄堡壘戰，那就沒有希望得到。如果敵人不這樣做（最近三個月的經驗證明，敵人連做夢也沒想過要這樣做），我們埋伏在這裡，而敵人就可以毫不猶豫地繼續推行它計劃中的堡壘政策。這豈不意味著，我們自己放棄了蘇區的重要地區，而不去利用時機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這些考慮同我對形勢的判斷是符合的，在革命軍事委員會中也得到了大家的承認。”[169]

李德在這兒說的是實話。天下並不是只有毛澤東才知道打運動戰，才知道誘敵深入。事實上，當時從共產國際到中共中央，都強調以運動戰和遊擊戰進行積極防禦。

1933 年 3 月，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既要保衛蘇區，尤其是中央蘇區，又要保持紅軍的能動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領土的喪失。……應避免與敵人的大隊人馬做無益的衝突，採取誘敵深入，分散敵軍，瓦解敵軍，拖垮敵軍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遊擊戰的方法。”[170] 4 月，米夫指示：“假使要犧牲很多的戰士時，紅軍絕不固守一個地方。紅軍避免與集中的大部敵人接觸，引誘一部分敵人到蘇區內來創造進行決戰的勝利環境……在分散敵人的集中後，從側面及後面攻擊孤立的隊

伍，各個擊破，消滅敵人。”[171] 10 月和次年 2 月，共產國際再度指示中共中央：“我們的行動不應該採取陣地戰的方式，而應該在敵人的兩翼採取運動戰。”[172]“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的隊伍在運動戰中已經獲得了許多偉大的勝利，但不能在強攻敵人的堡壘地帶的作戰中，獲得勝利。”[173] 就連王明同志也反對“左傾冒險主義”：“反對那種‘左’的、冒險的傾向，其具體表現，就是完全否認有暫時地部分地軍事策略上的退卻底可能和必要……就是對於保存紅軍實力有第一等重要意義這一點估計得不足或根本不瞭解，機械地瞭解鞏固根據地任務，甚至以為可以犧牲大量紅軍力量去達到這一目的”[174]，主張“把中央蘇區的紅軍和遊擊隊從內防守的軍事行動，與紅軍及遊擊隊在蔣軍後方和兩翼方面實行廣大的遊擊戰和運動戰配合起來”[175]。

中共中央也是同一立場。1933 年 10 月，中共中央指示閩浙贛省委：“消極的堵防的政策，不論軍事上與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軍事上，在部隊數量暫時我們還比敵人小得多的時候，分兵把口，實際上就是使我們在敵人的殘酷的集中兵力的進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裝。”指出：“最好的鞏固蘇區的辦法，就是積極的開展深入白區的遊擊戰爭，發展與擴大蘇區”[176]。11 月，軍委代主席項英指示：“應在敵人後方要道，發展井岡山時代遊擊襲擊的精神、第四次戰役的挺進成績，來配合作戰以及轉變戰局”[177]；“運動戰是內戰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學習。”[178] 張聞天指出：“死守堡壘，對於我們是致命的打擊”[179]。

所以，在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中，根本就沒誰反對誘敵深入打運動戰，毛澤東完全是在造謠。難題還是李德說的那個：敵軍既然不肯放棄堡壘深入，也就無法在內線獲得殲滅敵人的有利

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戰略退卻”，無異於資敵。敬愛的林副統帥已經承認這一點了：

“誘敵深入的方法，在對付歷經慘敗而有無數血的教訓的敵人，已經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180]

林副沒看到（或是看到了沒說出來，待考）的是，一旦敵軍的碉堡包圍圈形成，圍剿再也無法打破了。紅軍若想逃過堡壘主義的慢性絞殺，唯一的希望就是制敵機先，在封鎖線合攏前跳出外線，從背後或側翼攻擊敵人，千方百計使敵軍無法完成包圍。而這就是反圍剿初期紅軍實行的“冒險主義”。這思路本是正確的，只是錯過了時機。

反圍剿初期的態勢是，蘇區北面是中央軍，西面是湘軍，南面是粵軍，東面是 19 路軍（福建事變後由中央軍代替）。據李德介紹，碉堡體系最堅固，推進最深的是北部，從贛江延伸到永豐以北，樂安和南豐以南直至黎川，其主要部分是從福州到南豐兩岸都構築了堅固堡壘的盱江一段。西部主要堡壘線沿贛江到贛州，從贛州繼續向北到信豐以北和會昌以南，直到福建邊界。東部堡壘一直沒有構築完畢，東北部暫時還敞開著一個缺口，敵軍準備拿下黎川後繼續構築堡壘，再來封住這個缺口[181]。因此，主要威脅來自於北線。國軍的意圖很明顯，那就是待北部封鎖線完成後，以它作為出發陣地，由北向南逐步推進，以層層碉堡擠死紅軍。

前節已經介紹過，在第四次反圍剿中，紅軍攻克了北部重鎮黎川，將中央蘇區和方志敏的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只要這個連接兩個蘇區的走廊還存在，國軍就不可能要完成上述戰略意圖。因此可以料知，國軍下一步必然是奪取贛東北，切斷兩個蘇區的聯繫，以完成北部封鎖線，堵死東北部的缺口。

在這種情況下，紅軍決不能坐待敵軍按計劃完成北部的碉堡封鎖線，更不能聽任國軍切斷與閩浙贛蘇區的連接，只能主動出擊，“禦敵於國門之外”，實行“進攻路線”與“左傾冒險主義”，在無堡壘地域以運動戰殲敵，再設法切斷已經築成的封鎖線的後方的交通，迫使碉堡內的守敵不戰而降，打破敵軍的封鎖。即使達不到這個目的，只要中央蘇區始終連接著閩浙贛蘇區，敵人無法築完封鎖線，其側翼始終暴露在紅軍的威脅下，就不可能向南推進。因此，敵軍必然要來爭奪這個結合部，而這就給了紅軍以大兵團伏擊敵軍的充分機會。

真實的戰事表明，國軍就是按這意圖行動的。然而軍委領導見不及此，卻派兵到福建去攻城掠地（詳見下），致使蘇區東北兵力空虛，使得國軍得以在北線從容築碉，延伸封鎖線。待到準備就緒後，國軍於 1933 年 9 月 25 日突然進攻黎川，拉開了第五次圍剿的序幕。

中革軍委這才看到確保中央蘇區東北部的重要，乃從福建調三軍團迅速北上，擬在撫河一帶消滅進攻黎川的國軍。但毛澤東的親信蕭勁光卻在 9 月 28 日不戰而棄該城，不但使得蘇區門戶洞開，而且使得中共丟掉了第四次反圍剿後獲得的地區，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的連接被隔斷。國軍自此奪得先手，可以實現原定戰略意圖了。

在這種情況下，讓毛去指揮只會更糟糕。其理由再簡單不過：他不知“敵變我變”，敵人既然採用了專剋“誘敵深入”的新戰略，那自己就再不能用這一套去迎合敵人，必須迅速想出新招來。因此，他只會在戰爭初期實行“求心退卻”，把主力集結到“戰略退卻終點”，實行“等待主義”，靜候敵人向蘇區腹地

推進，再尋機殲敵。這就等於幫助敵人完成上述戰略意圖，用鐵壁合圍活活困死紅軍。

這可不是厚誣之詞。蕭勁光奉命率一個獨立團守衛黎川，卻不戰而逃，輕棄該城，受到軍法審判。在他被關押期間，毛澤東特地派賀子珍去探監，“賀子珍轉達了毛澤東的話，大意是：黎川失守是整個指揮部署的問題，你應該撤退，做得對”[182]。這說明毛澤東根本沒看出保住與閩浙贛蘇區的連接、使紅軍能在封鎖線側後威脅敵軍的重要性。

李德倒是看出了黎川失守的嚴重惡果，乃命紅三軍團打出外線，目的是從敵軍側後進攻敵人，以收復黎川。可惜為時過晚，國軍已經在黎川北部修築了大量的碉堡，那封鎖線不是“線”，而是具有相當縱深的“帶”。三軍團奉命從東北部缺口沖出，在黎川東北面洵口的無堡壘地域與國軍遭遇，殲敵近一個師。但挺進到黎川西北的硝石一帶即陷入碉堡群中，失去了迴旋餘地，敵軍碉堡又很堅固，無法摧毀。三軍團幾乎被殲滅，只好撤回[183]。此後紅軍又先後在資溪橋和滸灣等地試圖以運動戰殲敵，每次都因遇到類似問題而無功而返。

在這幾次戰鬥中，紅軍都是在外線以一部進攻某地，主力則隱蔽集結於一側，待敵人被調出後便發起突襲，與第四次反圍剿的打法如出一轍，但都反遭重創。關鍵就在於今非昔比：打出外線後，若離開根據地較遠，雖能進入無堡壘地域，但有後路被切斷、無法返回根據地的危險，但若離開根據地較近，則仍然陷身在縱深碉堡群中，毫無迴旋餘地，只能被敵軍的交叉火力大量殺傷。所以，不是紅軍放棄了運動戰的拿手好戲，而是國軍把那戲臺拆了。

紅軍幾次在外線伏擊敵軍不成，反遭重大傷亡，只好撤回內線。11 月下旬，福建事變爆發（詳見下），蔣介石把圍剿蘇區的中央軍 11 個師調往福建，去鎮壓叛軍。此時乃天賜良機。紅軍應當趁機大舉從東北部沖出，與方志敏的紅 10 軍會合，一則從後方威脅入閩中央軍，策應福建叛軍，再則可以大縱深迂迴到黎川以北的無堡壘地域去，切斷北部封鎖線與後方的交通。此時有了閩浙贛蘇區作依托，紅軍即可避免上述兩難，既不至於因脫離根據地太遠而斷了退路，又不至於因離封鎖線太近而陷在碉堡集群中。如此即有了恢復兩個蘇區連接、挫敗國軍戰略意圖的可能。當然，此策成功的機會仍相當渺茫，最大的困難是硝石、資溪橋等戰役後，國軍在那一帶修築了大量碉堡，紅軍若再度從東北角沖出，有重蹈覆轍、陷於碉堡陣中不能自拔的危險。但從總的情況來看，在黎川失守後，紅軍若還想打破第五次圍剿，這就是剩下來的唯一希望。

然而中央軍委卻聽取了共產國際總軍事顧問的建議，令紅軍從西北一線突破封鎖線，向南昌挺進。先頭部隊紅一軍團到了蘇區西北角的永豐，才發現前方修了大量的碉堡，根本無望突破，於是便白白浪費了這一寶貴時機（詳見下）。待到福建事變於 1934 年 1 月下旬平定，蔣介石把入閩中央軍改為東路軍，取代原來出工不出力的 19 路軍，配合北線中央軍，自東向西步步築碉推進，紅軍便失去了外線殲敵的一切可能，只能在內線防禦了。至此，紅軍便從初期在外線出擊的“冒險主義”改為“短促突擊”的“保守主義”，到最後實在頂不下去，便只好實行“逃跑主義”了。

除了上述失誤外，當時的軍委領導人並沒有別的錯誤。戰爭初期打出外線是必要的。錯只錯在於沒有選對時間和方向：先是

在第四次反圍剿結束後錯過了在東北部擴大根據地的時機，後來又在閩變中選錯了突破方向。而毛自始至終都沒有認識到，一旦敵軍完成包圍，紅軍失敗的命運即已註定，因此，必須千方百計趕在敵人前頭主動出擊，使得敵軍無法築完封鎖線。所以，若是他去指揮，後果只會更慘重。

然而偉大領袖毛主席這位三年後的諸葛亮卻有那本事指責：“領導者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後方打去的進攻”，聲稱：

> “如果我軍在內線放棄節節抗禦的戰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時轉向敵人的內線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種。”

難道硝石戰役和資溪橋戰役，不是“在必要和可能時轉向敵人的內線打去”，而是“在內線節節抗禦”？

可毛馬上又轉過來指責：

> “第五次‘圍剿’，敵以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前進，首先佔領了黎川。我卻企圖恢復黎川，禦敵於根據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敵之鞏固陣地兼是白區之硝石。一戰不勝，又打其東南之資溪橋，也是敵之鞏固陣地和白區，又不勝。爾後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終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概。最後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

難道“在必要和可能時轉向敵人的內線打去”不是“禦敵於根據地之外”？難道“敵人的內線”不是白區而能是紅區？敵人的陣地當然鞏固，但那是唯一留了個缺口的地方。毛澤東自稱他在閩變期間曾建議自東北角突圍，打到蘇杭一帶去（詳見下文），那出路仍然是李德用過的那一條，區別只在於他主張放棄

的黎川失守後，那一帶的碉堡修得更鞏固了。而且，他的手筆實在太宏大，真要照他說的幹，紅軍只會全軍覆沒。

到 1934 年 4 月間，中央蘇區已被完全封鎖。封鎖線沿著整個東北線，北線和西北線，從南平一直延伸到吉安，在西部沿著贛江直到贛州。由於敵人堡壘構築堅固，而且層層向縱深推進，所以要想在這裡突圍到敵人外側和背後作戰已無可能。李德認為，過去半年的經驗表明，突圍肯定會使紅軍陷入敵人的堡壘地帶而不能自拔，南面的堡壘地帶比較容易通過，閩西南暫時還是最薄弱環節。據此，他提出了兩種方案供領導們選擇（他只有建議權，並無決策權，但博古和周恩來“為了打鬼，借助鍾馗”，以他那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來增加自己的權威，以懾服只會作空泛指責，卻提不出什麼可行建議的毛澤東）。

李德提出的第一個方案，是在敵軍碉堡最薄弱的西南部或東南部突圍，跳出外線，在敵人後方攻擊並消滅敵人。此案遭到所有人的反對，以毛的反對最激烈。

毛提出的替代方案是誘敵深入，在蘇區內部取得決定性勝利。此案也遭到大多數人的否決，他們認為這是不戰而棄領土，而且不能保證阻止敵人。

於是李德提出第三種方案：繼續實行“短促突擊”戰術，亦即在敵軍離開堡壘向前推進時發起突擊，消滅敵軍。該方案被接受[184]。

平心而論，這三種方案中，唯有最後一種是當時能想得出來的可行之策。跳出外線的一個隱患，就是後路被截斷，無法打回根據地，因而成了無根據地依托的流寇。當初紅四方面軍突圍而出，也不是想永久離開鄂豫皖根據地，是突圍後被敵軍追擊，形格勢禁，再也無法回去，只好逃到哪里算哪里。但比起紅一方面

軍後來的遭遇，四方面軍算是幸運的了。紅一方面軍突圍而出後，一直被強敵跟追，因而陷入無休止地流動作戰。這惡果不問可知：既無給養，又無法收治傷兵，只能扔下；軍隊得不到休整機會，體力長期透支，戰鬥力和士氣必然低落；為擺脫追兵，避免被圍殲，只能逃往雪山草地之類不毛之地。那些地方雖然“我能往，敵不願往”，不必作戰，但資源貧乏，杳無人煙，根本無法招募新兵，人員有減無增，最後只能自斃。如果不是陝北救中央，則陝甘支隊早就葬身在內蒙的瀚海大漠裡了。

即使能如李德計劃，紅軍從西南部或東南部跳出外線，從後方打擊國軍，摧毀了那一帶封鎖線，那也不能解除燃眉之急。蓋致命的威脅是北線與東線的中央軍。若中央軍趁虛而入，從北面和東面壓下來，奪取了後方根據地，則紅軍必然進退失據，仍然只有長征的路。所以，該方案確實不是上策。只能在萬不得已時採用。

第二種方案前面已經說過了，乃是閉眼不看現實——敵人死也不深入，請問怎麼個誘法？那不是不戰而棄“國土”，讓敵人當和平時代的工程隊，順順當當地把碉堡一直修到瑞金來麼？難怪大多數人要否決之，那連狹隘經驗論都談不上，完全是喪失了常智。

相比之下，“短促突擊”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唯一能想出來的辦法。它並不是什麼“保守主義”，也不是打攻堅戰或陣地防禦戰，而是“運動防禦戰”。其操作要點是，當敵軍離開碉堡向前推進時，紅軍以一部在工事中作正面抗擊，吸住敵軍，主力則從側翼以優勢兵力迅速發起突襲，速戰速決，在敵軍增援到來前消滅被吸引住的敵軍。李德還強調，如果突襲不利，敵軍已經展開正面防禦，那就應該立即撤出戰鬥，不和敵人硬拼。從理論上來

說，它避免了攻堅，屬於在運動中殲敵，符合紅軍的特長，其實是當時紅軍將領的共識。早在李德提出這戰術前，林彪、聶榮臻等人便有此建議，李德不過是總結了紅軍既往作戰的特點，在此基礎上作了充分闡發而已。[185]

然而這戰術並未奏效，蓋國軍推進很謹慎，稍一接觸即退回堡壘，以強大火力消滅紅軍。如果離敵人的碉堡過近，運動戰又變成了陣地戰。而且有陳誠親率的戰略預備隊隨時支援吃緊地區，使得紅軍突擊無效，反遭大量殺傷。[186]

此策既不行，紅軍又試圖搞誘敵深入。4 月間，紅軍從無線電裡偵察到，國軍即將進攻廣昌。因為國軍在此前稍微加快了推進速度，於是軍委決定讓敵軍深入到廣昌前沿，以紅 14 師等部堅守廣昌工事，以紅九軍團與紅 13 師在盱江東岸鉗制敵人，以主力紅一、三軍團和紅 22 師在廣昌以西一線伏擊敵軍[187]。據李德說，毛澤東也參加了軍委會議，同意了這個方案[188]。我覺得此說可信，因為它符合前文介紹過的毛的狹隘經驗論：廣昌不就是他說的“戰略退卻終點”麼？

但紅軍卻在此役中大敗虧輸。據李德回憶，原計劃由三軍團突襲行進中的敵軍，一軍團迂迴插入敵軍後方斷其歸路，但兩個軍團沒有配合好，或是三軍團行動過早，或是一軍團行動過晚，致使三軍團孤軍與源源而至的敵人援軍作戰，遭到敵人飛機大炮的攻擊，造成重大傷亡，而一軍團袖手旁觀，見死不救[189]。博古和朱德在戰後給周恩來的報告中卻說，原計劃讓一、九軍團打敵之頭，而三軍團打敵之尾，但三軍團過早投入戰鬥，攻擊了敵人的頭部，敵人便停止前進，構築工事，準備反擊。一軍團因為三軍團佔了他們的位置，只好轉移到右翼去，所以只能在最後階段才投入戰鬥，最後打成相持不下，只好脫離戰鬥[190]。彭德懷則在

回憶錄裡說，三軍團遭到敵機轟炸，突擊幾次均未成功[191]。而博古和朱德卻否認是役有炮兵與空中轟炸。

這些具體細節後人已無法確鑿查明，但據黃道炫先生考證，當時陰雨連綿，原始的國軍空軍無法起飛，而且戰鬥打響後雙方膠著在一起，無論是大炮還是飛機都無法使用[192]。因此，看來是彭德懷和李德在多年後回憶記錯了。不管細節如何，此役應該是符合毛的“誘敵深入”的僵死規則的，然而它並未奏效，反倒造成了高達四千多的傷亡，紅軍不得不放棄廣昌。

廣昌戰役是從“保守主義”到“逃跑主義”的轉捩點。五月初，政治局和中央軍委開會檢討戰略。李德再次建議突圍。他認為，由於敵人實行堡壘主義，在內線已無望取得決定性勝利，因此必須跳出外線，獲得更廣闊的作戰地域。與此同時，應令六軍團在湖南、七軍團在福建開闢新戰線，通過威脅敵人與後方的聯絡來牽制和引開敵人。毛澤東仍然持反對意見，他認為這決定太早，中央蘇區內仍有消滅敵人的條件，但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和軍委委員都同意突圍。5 月底、6 月初，中央討論並同意了李德的突圍計劃，這次毛沒有反對。該計劃也獲得了共產國際批准。李德原來的計劃是以中央紅軍三個軍團突破封鎖線，而蘇區內繼續部署戰略防禦，保證以後主力重返蘇區。但周恩來主張撤退整個蘇區，包括所有的中央機關、後勤部門和物資等等，並把獨立部隊與地方部隊都納入正規軍，結果作戰部隊被非作戰部隊過分拖累，嚴重妨礙了部隊行動[193]。

李德所說的共產國際批准紅軍突圍一事確為事實，有共產國際 6 月 25 日覆電為證：“在討論國際十三次全會和五中全會的議案時，關於鬥爭的前途及目前國際的情形以及紅軍靈活的策略，首先是趨於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條件下來鞏固和擴大自

己，以待機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194]而且中央還專門為此作了決議。據《毛澤東年譜》：“同月（蘆注：5 月）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鑒於廣昌失守後，國民黨軍日漸逼近中央革命根據地腹地，紅軍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隨即將這一決定報請共產國際批准，不久共產國際覆電同意。夏季，為準備戰略轉移，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秦邦憲、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籌畫。”[195]因此，官方媒體所謂：“1933 年（蘆按，應為 1934 年）10 月初，國民黨軍重兵集團繼續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這時，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未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即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到湘西與紅 2、紅 6 軍團會合”[196]，完全是造謠。

據黃道炫先生分析，因為已經決定撤退，中央在廣昌戰役之後便採取了陣地防禦方針，以遲滯國軍推進，為大規模轉移贏得準備時間。此外，這一戰略方針的轉變也說明紅軍對運動防禦戰失去了信心[197]。我覺得此說甚有道理。的確，舉“國”大搬家當然需要相當長的準備時間，何況還需要賄買運動南線的廣東軍閥陳濟棠，求他讓路。而且，既然無法誘敵深入，短促突擊也不靈，那剩下來的當然只有分兵把守，以堡壘對堡壘了。然而偉大領袖為了證明第五次反圍剿是因為沒讓他指揮才打敗的，竟然掐去前因後果，歪曲事實，指責道：

> “軍事平均主義，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圍剿”時，發展到了極點。‘六路分兵’，‘全線抵禦’，以為可以制敵，結果為敵所制，原因在於懼怕喪失土地。”

作為政治局委員與軍委委員，毛明明知道中央作此戰略方針改變之時，已經決定放棄中央蘇區了，那還有什麼“懼怕喪失土

地”一說？他反對紅軍跳出外線，才是怕喪失土地。若是中央大員們聽了他的，只怕全黨全軍都要在那鐵壁合圍中瘐斃。

綜上所述，在與閩浙贛蘇區的連接被切斷後，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其根本原因是，蔣介石剝奪了紅軍發揮其唯一長處的可能，迫使紅軍以己之短擊敵之長。紅軍的短處是不能打陣地戰（包括防禦戰和攻堅戰），只能打運動戰，毛所謂“積極防禦”，其實不是嚴格的軍事學意義上的防禦戰，而是進攻戰。所以，紅軍的作戰功能其實相當單一，只能攻，不能守。即使是進攻，也只能打野戰而不能攻堅。當國軍的堡壘主義剝奪了紅軍打野戰的可能後，紅軍當然要陷入既不能攻，也不能守的困境，剩下來的也就只有逃了。論其本質，突圍長竄也符合朱德為紅軍制定、為毛竊為己有的教義：“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只不過這次走得比較遠罷了。毛還有什麼好埋怨的？

有趣的是，毛澤東私下認定的失敗原因，並不是他指責博古中央時說的那些。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他在兩河口會議上告訴張國燾，中央紅軍之所以戰敗，主要是蔣介石的飛機和大炮厲害。因此只能跑到寧夏去，到外蒙古去弄點飛機大炮，來回敬蔣介石。如果沒有飛機大炮，那就再不要說“打倒蔣介石”這句話了[198]。在毛兒蓋會議上，他再次強調“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作準備”[199]，承認沒有“技術條件”（指飛機大炮一類重武器）就無法打破堡壘主義。紅軍在草地分開後，毛澤東等人動員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北上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康□天蘆雅名邛大直至懋撫一帶，敵壘已成，我軍絕無攻取可能”[200]。紅四方面軍在南下進攻天全時，遭到國軍空襲和碉堡陣地殺傷，張國燾因此覺得毛說的確有道理，飛機與碉堡確非他們的力量所能摧毀[201]。後來毛澤東等人為發動寧夏戰役，曾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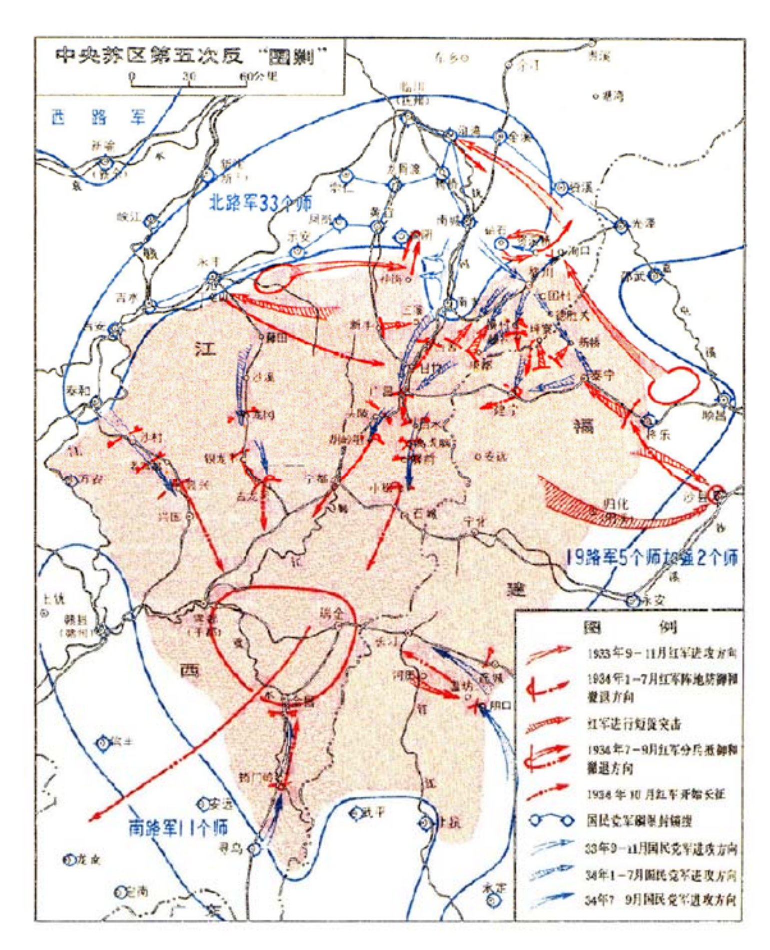
告莫斯科，以紅軍目前的“技術條件”，無法攻克甘肅寧夏一帶回民聚居的“土圍子”，要蘇聯“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202]

這些證據表明，毛其實在內心認定，沒有重武器，紅軍根本不可能光靠高明的戰略戰術，就能打敗敵人的堡壘主義。他之所以硬要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說成是錯誤的戰略指導造成的，完全是為了奪取最高領導權。可憐他至死也沒有悟出，打破堡壘主義的一線希望，恰在於不能實行他的等待主義，而必須採取“進攻路線”，千方百計防止敵人完成包圍。國軍的鐵壁合圍一旦形成之後，那就只有靠蘇聯空投重武器來救命了。

（二）毛澤東的責任

因為中央沒讓偉大領袖作最高統帥，他滿懷怨氣，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軍委討論戰事時，橫挑鼻子豎挑眼，這也批評，那也指責，更在紅軍將領中煽動對中革軍委領導的不滿，拆中央的台，蓄意破壞博古、周恩來和李德的威信，人為製造指揮困難。據李德說，博古告訴他，毛澤東曾讓紅一方面軍老部下對中央的決定陽奉陰違[203]。此說相當可信，上舉毛澤東特地派賀子珍去探望被關押的蕭勁光並給他打氣就是一例。這完全是為了個人權位，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在大敵當前、黨國危急存亡之秋，不顧大局糜爛搞內鬥。

此後他不僅在遵義會議上以軍事失敗為由，向中央發難，罷了博古的官，趁機擠進了書記處（中常委），還在延安整風期間，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當成打倒國際派的藉口，卻文過飾非，絕口不提他當初出的餿主意招致的嚴重後果。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示意圖

如上所述，紅軍反第五次圍剿犯了兩大戰略錯誤，一是沒有注意保衛蘇區東北部，導致黎川失守，致使中央蘇區和閩浙贛蘇區的連接被切斷，國軍得以實現既定戰略意圖；二是沒有利用福建事變，設法重建與閩浙贛蘇區的連接，從側後威脅國軍的北部

和東部封鎖線。而中央作出這兩大致命的錯誤決策，毛澤東都有份。

A．在反圍剿前同意東征福建

如前所述，1933 年春，中央蘇區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佔領了蘇區東北角的黎川，與方志敏的閩浙贛蘇區接通。如何趁勝擴大戰果，便成了影響此後根本戰局的關鍵一步。

當時中央蘇區的北面是中央軍，西面是何鍵的湘軍，南面是陳濟棠的粵軍，東面是蔡廷鍇的 19 路軍。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長尤爾特與軍事顧問李德都認為，北面的中央軍構成了主要危險，因此應該繼續在北線用兵，而蔡廷鍇則應該作為拉攏對象。但新任的共產國際總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勞恩（簡稱弗雷德）卻提出應該出去打福建，其理由一是蘇聯可能會提供武器援助，二是蔡廷鍇不可靠，為爭取他成為盟友，必須向他顯示實力，“先打後談”。此外，進攻福建可以確保蘇區後方和側翼，以便更好地面對中央軍在北面的進攻。

弗雷德的意見得到了中共中央駐上海辦事處的贊同，政治局與中革軍委經過討論後，也同意了弗雷德的計劃。博古原先遲疑不決，但被多數意見壓倒，後來他跟李德說，毛同意這個作戰方案，起到了重要作用。[204]

於是軍委便在 1933 年夏季將紅軍主力調去進攻閩西。紅軍東征節節順利，佔領了大片地區，繳獲了大量物資，直抵南平才停下來。19 路軍遂於八月間派人去見彭德懷[205]，與中共秘密達成停火協定。但蔣介石趁蘇區北部空虛，將碉堡沿盱江一直修到南豐，並於 9 月下旬出其不意地向黎川進攻，揭開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序幕。

中革軍委猝不及防，趕快從福建調三軍團北上增援，擬在撫河一帶與中央軍決戰。但大軍尚僕僕在途，守城的蕭勁光已經不戰而棄黎川，使得紅軍失去了先機。此後三軍團跳出外線，企圖拊敵後背，從北面收復黎川，卻在硝石一帶陷入碉堡陣中遭受重創，不得不撤回。以後紅軍又作了幾次類似嘗試，都以失敗告終，於是第四次反圍剿奪取的大部分地區都喪失了，原來的碉堡封鎖線空隙被堵死，中央紅軍與閩浙贛蘇區的紅 10 軍聯繫永久中斷，紅軍從此陷入被動。

不難看出，這個錯誤相當致命，而這就是軍委領導為何要以軍法審判蕭勁光。中央紅軍若能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乘勝向東北全力擴張，使得中央蘇區和閩浙贛蘇區融為不可分割的一片，則國軍在北線修築的碉堡線就失去了封鎖的作用，其側後將始終處在紅軍的威脅中，也就不可能像後來那樣，可以心無旁騖，只需從北向南將碉堡封鎖線平推下來，便輕而易舉地擠死了紅軍。

若紅軍將兩個蘇區牢牢地焊接在一起，那國軍就只有兩個選擇：或是向兩個蘇區的結合部發起進攻，將其隔斷後再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或是擴大封鎖區域，用封鎖線把閩浙贛邊區也包圍進去。

無論是國府采哪策，都將有利於紅軍。如果國軍採用第一策，企圖把蘇區一分而二，那就意味著放棄堡壘主義，因為在兩側翼暴露時不可能築壘前進，所以只能改為長驅直入，這就必將給紅軍提供運動殲敵的機會。而如果國軍採用第二策，作個更大的箱子把兩個蘇區都裝進去，那必然曠日持久，紅軍可以在封鎖線完成前，隨時跳出外線作戰，從後方摧毀封鎖線。而且，封鎖線越長，紅軍找到薄弱點加以突破也就更容易。根據地越大，紅

軍的迴旋餘地也就越充分，蓋紅軍可以沿著蘇區的對角線來回秘密移動，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聲東擊西，使得蔣介石猜不出紅軍真實意圖，防不勝防，陷入被動。

例如在國軍修到南豐的封鎖線向東北延伸前，軍委可令紅軍主力秘密集結在黎川以東一帶，卻令派偏師冒充主力，打出浙江西南邊界，虛張聲勢，威脅中國的膏腴之地江浙一帶。此舉勢必逼得蔣介石分兵圍堵，此時紅軍主力再從封鎖線北端大舉沖出，迅速迂迴插入封鎖線後方，切斷碉堡群與後方的交通聯繫，使守敵喪膽，不戰而降（馬奇諾防線就是如此打破的）。如此即能反使國軍建築的堅固工事為己所用，變成守衛自家“國境”的長城。此乃大衆熟知的圍魏救趙之計。

即使不能不戰而下敵軍的碉堡群，那也是攻敵之所必救，必然能調動後方敵人來援，相當於圍城打援，為紅軍提供了伏擊殲敵的機會。當然，此策也有相當大的風險，若碉堡中的敵軍頑固堅守，而後方援敵兵力雄厚，推進迅速，則紅軍就可能腹背受敵，陷入危境。但要打破敵人的堡壘主義，在缺乏重武器的前提下，這是唯一有點希望的打法了。

然而紅軍不此之圖，卻把主力調去福建攻城掠地，聽任國軍在北線延伸碉堡封鎖線，更因兵力空虛，在國軍突然發動進攻後，拱手讓出連接閩浙贛蘇區的樞紐黎川，使得國軍輕易切斷了連接兩個蘇區的走廊。蔣介石從此再無後顧之憂，可以按部就班地實現其戰略意圖，以鐵壁合圍先困死中央紅軍，接著又掃蕩了方志敏的紅 10 軍。所以，弗雷德這昏招，確實是第五次反圍剿前最關鍵的戰略失誤。

據李德說，毛澤東同意弗雷德的東征福建計劃，而他的同意對政治局通過決議起到了重要作用。此話相當可信。

須知偉大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最關鍵的一條，就是“避實擊虛”，專揀軟柿子捏。他這思想一以貫之，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裡，他開出來的反圍剿的操作要訣之一便是“揀弱的打”，而 1947 年底提出的《十大軍事原則》中的第一條就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在他眼中，北面的中央軍只可能是“集中和強大之敵”，而東面的 19 路軍則當然是“分散和孤立之敵”。早在 1932 年 3 月間中央局在瑞金開會討論進軍方向時，他就認為，蘇區北面的南昌是蔣介石的剿共大本營，因此向北沒有發展餘地，向西有贛江阻攔，向南有廣東軍閥，紅軍只能向東發展[206]。東征福建的計劃符合他一貫的思路，他在政治局會議上同意該方案是必然的。他在紅軍中的潛勢力相當大，因此，他投的贊成票，對政治局決定接受該方案當然會起到重要作用。

由此可見，偉大戰略家毛澤東連文盲朱元璋的軍事才能都沒有。當年朱元璋夾在陳友諒與張士誠的兩大根據地之間，他就決定先打左邊的強敵陳友諒，後打右邊的弱敵張士誠。後來他向群臣解釋，陳友諒野心勃勃，若他先去東面打張士誠，則西面的陳友諒定會傾國來攻，必然要使他陷入腹背受敵的危境。但若他先打陳友諒，張士誠不圖進取，偏安一隅，只會按兵不動，因此他沒有兩面作戰的危險。事態的發展果然不出他所料，朱元璋由此各個擊破了兩大競爭對手。

當時蘇區面臨的情勢也與朱元璋的差不多。圍剿蘇區的敵人中，北面的中央軍實力最強大，鬥志也最堅決。西面的何鍵還有一定的反共積極性，而廣東與福建的軍閥都只想保存實力，參與圍剿完全是虛應故事，出工不出力。在這種情況下，若紅軍“揀弱的打”，則中央軍就會乘機從北面壓下來，使得紅軍陷入腹背

受敵的危境。如果紅軍全力對付中央軍，則軍閥部隊只會作壁上觀。因此，若要在圍剿中倖存下來，則紅軍別無選擇，只能“先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毛之所以會贊成弗雷德的餿招，是因為他沒有自我完善的智慧，終生為三次反圍剿的狹隘經驗束縛。國軍三次圍剿都是由雜牌軍隊充當主力，那些軍隊各懷異志，只想保存實力。紅軍消滅了其中最弱的一部，便不難使餘敵膽寒而自行撤退。在蔣介石忙著和其他軍閥大戰，紅軍得以趁機擴張之時，當然也該“揀弱的打”，向抵抗力最弱的地帶擴張，以期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壯大自己。但若在群敵環伺之下，甚至在圍剿已經開始後，還要死抱著狹隘經驗不放，那就沒有什麼好事了。兵無常形，運用之妙，在乎一心。避實擊虛雖是用兵的重要原則，但也不能膠柱鼓瑟，刻舟求劍，把它變成不可打破的僵死教條。

事實上，這僵死教條連共軍自己都不遵守。例如在“解放戰爭”中，晉冀魯豫野戰軍在金山戰役時圍城打援時，就決定打三路援軍中最強的整編 88 師；在孝義戰役中，陳謝兵團面對三路進攻時，也決定先打進攻最積極的第八集團軍；在紅石鎮戰役中，遼東軍區面對三路進攻時，同樣也決定打最強大的第 89 師；至於廣為人知的華東野戰軍在孟良崮戰役中專挑國軍王牌部隊整編第 74 師打就更不用說了[207]。這些決策的考慮依據，都跟朱元璋如出一轍：最強大的往往也是士氣最旺、威脅最大的，若是避開去“揀弱的打”，則該敵就會兇猛地撲上來，致使己方腹背受敵，而弱敵只會在強敵被打時坐壁上觀，便於各個擊破。此外，強敵因為士氣旺盛，常是驕兵，容易輕狂冒進，露出破綻，而弱敵士氣低落，畏縮不前，比較謹慎，不容易暴露破綻。因此，上述戰例都取得了很好的戰果，並不是偶然的。

B．在閩變中堅持關門主義，坐視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倒臺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

> “第五次反‘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後，當福建事變出現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臺。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時候，雖已不利於出浙江，但還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208]

這又是毛慣用的事後“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209]的謊言。

所謂“福建事變”又稱“閩變”，乃是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其私人武裝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發動的反蔣事變。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等人在福建發佈《人民權利宣言》，事變爆發。22日，李濟深等人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2月下旬，蔣介石抽調進攻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十餘萬人，由贛東和浙江分路進攻延平、古田等地。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後被國軍佔領，“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總部分別遷往漳州和泉州。21

日，泉州、漳州相繼失守，福建事變終告失敗。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逃往香港，第十九路軍的番號被取消，軍隊被蔣介石改編。

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指責共產黨出賣了蔡廷鍇：

> “十二月中旬，中央軍約十餘萬人由蔣鼎文統率，兼程自浙、贛兩省分路南下入閩。閩方因何江西共黨有諒解，以為共黨可與之夾擊中央軍。孰知共軍竟自贛東讓開，中央大軍數萬乃一舉而侵入閩北。”[210]

所以，照李宗仁的說法，“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乃是中共背信棄義，與蔣介石聯手搞垮的。但從李德介紹的情況來看，他所謂“中共為國軍讓路”並非我黨有意為之，而是為了執行弗雷德計劃（詳見下），將紅軍主力調到蘇區西北的永豐一帶造成的贛東兵力空虛。但中共確實沒有策應蔡廷鍇所率 19 路軍，甚至沒有趁機與 19 路軍一道夾擊國軍的意願。此舉非常之蠢，蓋當時國軍正在進行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19 路軍乃是共同對蔣作戰的事實友軍，豈能見死不救，坐視蔣介石各個擊破？

那麼，這背時主意是誰想出來的？據李德說，閩變尚未發生，中共就刺探到了消息。項英通知李德，上海來的電報說蔡廷鍇將起事，估計能得到宋子文和其他國民黨反對派政治家支持，粵桂兩省至少中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軍事代表弗雷德建議，一旦蔡廷鍇開戰，中央紅軍就在西北一線突破敵人陣地，越過贛江，從敵人背後向南昌挺進。[211]

據他說，對於該如何對待蔡廷鍇和十九路軍，中共當時有三種不同主張。

第一種主張是博古一個人提出來的，他認為應該抓住這個難得的時機，組成全國範圍的抗日統一戰線。因此，中共應該全面

支持蔡廷鍇，即使蔡自己有顧慮，在軍事上也要給予直接的支持。

第二種主張為上海局與駐在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團所持。他們認為不可信任蔡廷鍇，蔡反蔣不過是軍閥之間的一般鬥爭，中共應該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鬥爭來加強自己在內戰中的地位。

第三種則是毛澤東的主張，“毛澤東把蔡廷鍇的起義稱為‘反動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企圖通過新的謀略來欺騙民衆，以便逃避它們越來越迫切的滅亡’。因此，他的結論是：我們不應該馬上支持十九路軍和‘人民革命政府’。當事變正在發展時，他不斷地批評福建政府，說它‘不一致’、‘不履行對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義務’（他指的是福建政府曾答應的物質上和經濟上的援助），說它‘不主動不堅決’等等。他警告說，要‘謹慎’、‘要三思而行’。他認為，十九路軍必須首先在閩北打擊蔣介石的部隊，然後我們才可以積極干預，給予支持。”[212]

據李德說，事變發生後，瑞金和上海爭論不休，耽誤了數周時間。最後，紅軍按弗雷德計劃（亦即自西北一線突破敵軍陣地，越過贛江，向南昌挺進的計劃）行事，一軍團開至永豐，三、五軍團在廣昌待命。但偵察結果表明，國軍在贛江以東縱深層層修築堡壘，紅軍無法突破。待到福建政府行將垮臺時，李德才決定改變計劃，不待共產國際批准，立即將執行弗雷德計劃的先頭部隊七個師調到福建，在南平地區向蔣介石的部隊右翼發動進攻，以策應十九路軍。但已為時過晚，十九路軍一個師長投降了國府，其部佔據了南平，紅軍無法渡過閩江，只好轉向東南，在閩中攻城掠地。福州便在此期間陷落了。[213]

所以，主張無所作為，坐視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倒臺的，恰是毛澤東本人，而一開頭就主張援助福建的是博古，最後終於決定採取策應行動的則是李德，恰與官修黨史相反。

這當然是李德的一面之詞，可惜毛澤東為他作了旁證。1934 年 1 月 24 至 25 日，毛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報告中說：

> “至於福建所謂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說他有一點革命的性質，不完全是反動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過是部分統治階級以及在共產主義和反動政治之間用‘第三條道路’的虛偽口號來欺騙人民的鬼把戲而已。”[214]

因此，看來李德的證詞是真實的，難怪他會對毛澤東事後文過飾非的行為特別生氣：

> “一年以後，毛澤東利用福建事變以及在事變中出現的缺點和錯誤，並以此為把柄篡奪了黨和軍隊的領導權。他仍然說十九路軍是‘反革命內部的一個派別，這個派別企圖用更多的欺騙……來維持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他還無恥地歪曲事實說，黨雖然正確地認識到，我們必須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以突破敵人的封鎖，但‘博古和其他人卻讓紅軍主力西調，勞而無功地攻擊永豐地區的堡壘，而不是與十九路軍直接配合，消滅蔣介石的主力部隊’。但是，對於福建事變的真實過程，對於延續了數周的意見分歧和衝突，以及對於他自己、中央委員會上海局、遺憾的是還有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其中起的惡劣作用，他卻很明智，閉口不談。”[215]

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總軍事顧問是駐在上海的弗雷德），其回憶錄裡處處流露了對共產國際和國際派那些“真正的馬列主義者”的感情傾向，然而他在上面這段話裡竟然指責共產國際代表團起了惡劣作用，因此，這段證詞讀來相當可信。

此外，從毛的一貫作風來看，他對於策應友軍從來無興趣。前文介紹過，蘇區中央局之所以要召開寧都會議罷了毛的官，一個原因就是當時國軍正在圍剿鄂豫皖、湘鄂西等蘇區，中央要一方面軍北上威脅南昌，以減輕這兩個蘇區所受的壓力。但毛澤東卻與周恩來等人致電鄂豫皖中央分局，要他們自己消滅敵人，否則即使其他蘇區策應，也並不能幫助鄂豫皖蘇區消滅敵人，並聲稱中央蘇區自顧不暇，無法策應，堅持按兵不動，無所作為。後來他與張國燾決裂後，率紅一、三軍北上，竟然改名“陝甘支隊”。陝甘支隊以毛為政委，司令是彭德懷，副司令是林彪，但公開佈告只用彭德懷和楊尚昆署名。毛特地交代楊尚昆，以他們兩人出面，讓國民黨有個錯覺，以為只是三軍團出來了[216]，完全是蓄意把蔣介石的注意力引向兄弟部隊。寧夏戰役失敗後，河東紅軍危在旦夕，準備從陝甘根據地突圍而出，舉行第二次長征，他竟然以西路軍為誘餌，令其在河西走廊的危地之中不進不退，騙得蔣介石以為該部想東進渡過黃河，把國軍都調去堵截（詳見後）。此後他更對西路軍的反復呼救置若罔聞，坐視西路軍毀滅。他對同一血脈的紅軍都如此冷漠無情，對於標榜“走第三條道路”的蔡廷鍇的軍隊，又豈會主張全力策應，甚至以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

事實上，這是彭德懷而不是毛的主張。彭在其回憶錄中說：

“福建事變是國民黨內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變後抗日派和親日派鬥爭的繼續和發展，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反對買辦地主階級的代表蔣介石的鬥爭。我們應利用這一新形勢，打破蔣介石正在準備的第五次‘圍剿’。根據這個簡單的認識，寫了一個電報給總政委轉中央博古，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博古批評這個建議，說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此事是路經建寧總政委處轉告我的。”[217]

類似地，毛所謂“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也是彭德懷的建議：

“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突出敵重圍，十一月到達宜章、郴州間。我建議以三軍團迅速向湘潭、寧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同時我中央率領其他兵團，進佔漵浦、辰溪、沅陵一帶，迅速發動群衆創造戰場，創造根據地，粉碎敵軍進攻。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後果是不利的。”[218]

這是彭在被關押審查期間寫的交代材料，他絕對不敢剽竊偉大領袖的創議。而且，如果當時得到毛的贊同，他也一定會提起，以表明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歷史上從來和他站在一起，沒有什麼“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一說。

因此，看來真實的情況是，毛再一次掠人之美，"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毛是政治局委員兼中革軍委委員，參與討論所有重大軍事決策。因此，將領們向中央提交的重大戰略建議，他一定會及時得知。當時雖然不同意，但在事後很久卻把它竊為己有，用來證明自己一向偉大光榮正確。大概彭德懷不興學習毛著，從未看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因此不知道他的兩個建議都被毛剽竊了，於是在交代材料中便實話實說，未能與偉大領袖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話說回來，即使毛真的提過那兩個建議，那也是昏招。我在前節說過，中央紅軍趁閩變發生，設法打通與閩浙贛蘇區的連接，乃是黎川失守後打敗第五次圍剿的唯一希望。但我那方案跟毛的完全不一樣，並不是長期脫離根據地作戰。須知跳出外線作戰的隱憂，便是後路被切斷，無法返回根據地，就此成了流寇，因此不宜離開根據地太遠。毛所謂"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的大手筆實在太宏大，等於徹底放棄根據地。提前進行長征，而且還把路線搬到江南水鄉去，那一帶水道縱橫，根本不利於紅軍打運動戰，又是國府統治區域的精華所在，是國府必爭之地。該區公路與鐵路交通比落後的內地發達多了，便於國府運兵，真要突進到那地方去，只怕要全軍覆沒。因此，即使毛澤東提出過那主張，也絕對是昏招，這才是如假包換的左傾冒險主義與盲動主義。

至於老彭說的突圍而出後應在湘中開創根據地，那也是空想主義（不知道空想主義該是左傾還是右傾），毫無可行性。被強敵攆著屁股追的流寇，根本不可能立下足來開創根據地，這一簡單道理，已被後來紅軍一再想在貴州雲南等地建立根據地而終不

可得的事實證明了。在雲貴那些交通極為不便之地尚且如此，而況有粵漢線通過的湖南乎？

第三章 長征路上

說到“長征”，許多讀者都只會想到毛主席率領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等等。其實那說的只是紅一方面軍。先後離開根據地長征的有紅四方面軍、紅一方面軍、紅二、六軍團（後改稱紅二方面軍）以及紅 25 軍。大眾之所以會把紅一方面軍當成長征的主體，完全是毛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選擇性宣傳的結果。事實上，它不過是其中一路，而且是最失敗的一路。

紅一方面軍由一、三、五、九四個軍團組成，出發時 8 萬餘人。紅一、三軍團到達陝北吳起鎮時，只有七八千人，其中只有五六千人是正規部隊[1]。加上被扔在草地的五、九軍團（共五六千人），則全軍在長征後也就只剩下 1.2-1.3 萬人。遵義會議召開時，中央紅軍尚有 3.7 萬餘人[2]。因此，毛澤東的指揮斷送了 2.4-2.5 萬紅軍，減員 2/3 以上。

別的紅軍哪路的損失都沒有如此慘重。紅四方面軍 1932 年底離開鄂豫皖蘇區後，轉戰三千里，先後共殲敵近萬人，仍有一萬四千多人，為撤出鄂豫皖時總兵力的四分之三，以後還在川北開闢了新根據地，建立了二十二個縣市的革命政權，兵力增至八萬[3]。此後該軍爲了策應中央紅軍，拋棄了川北根據地南下，在川南與一方面軍會師時，總兵力據徐向前說是八萬人，據李德與張國燾說是五萬人[4]，到達甘南與一方面軍再度會師時約四萬

人。若從撤出鄂豫皖算起，則兵力還有增加。若從撤出川北蘇區算起，則即使按徐向前的數字也只損失了一半人馬。

紅二方面軍原為紅二、六軍團，1935 年 10 月撤出湘鄂川黔蘇區，兵力約為 1.8 萬人，經貴州、雲南、四川，到達甘南時還有 1.3 萬餘人[5]，損失不到三分之一。該軍大概是長征中走得最輕鬆愉快的。據蕭克說，他們進入雲南後，在昆明北面百餘里的普渡河受到阻擊，隨即向南挺進，虛晃一槍，派小部隊佯攻昆明，主力繞向昆明西面，把滇軍主力甩在後面，直入空虛的滇西北，連克多個縣城與無數碉堡，“吃的穿的，無所不有。真是‘因糧於敵’，士氣旺盛。從盤縣向西北前進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畔的麗江縣和石鼓圩等地，並很快地北渡金沙江。”[6] 哪有一方面軍那麼淒慘！

紅 25 軍於 1934 年 11 月離開鄂豫皖時共 2900 餘人，轉戰安徽、湖北、河南、陝西、甘肅 5 個省，行程近 5000 公里，歷時 10 個月，抗擊了 30 多個團敵人的圍追堵截，不僅沒有減員，到陝北時，部隊還增加了 800 多人。[7]

黨神話告訴我們，遵義會議後，偉大領袖毛主席掌握了軍權，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在他的指揮下，紅軍從此從勝利走向勝利。就算毛澤東真是大救星，那也只能救紅一方面軍，總不好把其他紅軍的倖存也算成是他挽救的吧？而且，沒那榮幸被他救的紅軍，怎麼活下來的人反倒更多呢？難怪朱德看到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時要羡慕不已，對張國燾歎道：“現在一方面軍是不能打仗了，他過去是個巨人，現在身上的肉都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頭了。”[8] 看來，“珍惜生命，遠離天才”在當時應該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實際上，連楊尚昆都不得不承認："遵義會議後，毛主席剛出來擔負重任不久，中央領導層和主要戰將中，就有人嘲諷，有人想離開紅軍，有人發展到正式上書要求改換軍事領導人，這的確是嚴重的事情"[9]。

這"嚴重的事情"完全是毛的瞎指揮造成的。毛此前的軍事經驗主要來自於三次反圍剿，但那是在自家地盤裡打仗，佔盡了地利與人和，敵情動向一目了然，可以事前與將領們仔細切磋戰役計劃。但長征就反了過來：身為客軍，在陌生地域裡行軍作戰，隨時都在流動中，軍情瞬息萬變，沒有可能事前從容規劃，並與實際指揮戰鬥的將領們商量，其實只能由前線指揮官臨機處置，由中央遙控反而壞事。事實證明，遵義會議後打的勝仗都是前線指揮官臨機處置贏得的，而敗仗都是毛事前策劃造成的。

一、四渡赤水走麥城

紅軍從中央蘇區突圍後，原擬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創建湘西根據地，卻遭到何鍵的迎頭痛擊，在強渡湘江時減員過半，八萬多人變成三萬餘。進入貴州後，1934 年 12 月 18 日，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毛澤東提出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師的打算，改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經過激烈辯論後，政治局採納了毛的主張，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決定"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方"，但不宜深入黔西、黔西南及雲南地區。[10]

於是紅軍便繼續西進，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會議重申黎平會議決定，指出：首先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11]

1月7日，紅軍攻佔遵義，但強敵隨即跟蹤而來，無法立足。因此，政治局在遵義會議上再度改了主意，放棄黎平會議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決定北渡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12]。於是紅軍放棄遵義，分三路向川黔邊境開進，試圖在宜賓與瀘州之間渡過長江。

劉湘怕紅軍入川引來中央軍，派兩個旅先於紅軍到達赤水城，阻止紅軍北進；尾追的川軍進至土城以東地區。毛以為川軍好打，遂命令紅三、五軍團在土城附近進攻川軍郭勳祺部固守的青杠坡等陣地。不料川軍訓練有素，火力強大，又佔了地利，不但擊退紅軍進攻，而且發起反攻，一直打到白馬山軍委指揮部前沿，幾乎突入指揮部，軍委只好把幹部團投了進去。但川軍三個旅突然增援上來，把幹部團壓了下去。軍委又將一軍團二師投入。等到一軍團上去時，川軍已佔據有利地形，一軍團二師“陷在一個葫蘆形的隘口中，部隊無法展開，來回衝殺，傷亡較大。五團政委趙雲龍犧牲，部隊處境十分危險”[13]。軍委召開了緊急會議，取消了北上渡江計劃，“這是大家知道的紅軍在戰鬥中召開的唯一的一次緊急會議。可見這絕非是一次普通的戰鬥。現在清楚了，戰鬥中紅軍的命運可能危在旦夕”。紅軍趁夜撤出戰鬥，並連夜趕架浮橋，逃過了赤水河。[14]

土城戰鬥乃遵義會議後毛首次指揮的戰役，卻以慘敗告終。中共對傷亡數字秘而不宣，只是楊尚昆曾承認“造成很大傷亡”（見下）。聶榮臻也說：“未能消滅敵人，自己卻受損失不小。”[15]而索爾茲伯里則推算出，此戰基本抵消了紅軍在遵義一

帶招募的四千新兵[16]，那就是傷亡在四千左右，約為當時紅軍總人數 1/9。即使是在“錯誤路線”指導下的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也未蒙受過傷亡比例如此之高的重大損失。這且不論，中央軍委還幾乎讓敵軍一鍋端了，這在我黨我軍歷史上還真是絕無僅有。

這就是毛東山再起第一功，難怪博古要譏笑：看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擔任主攻的三軍團四師政委黃克誠則向劉少奇抱怨：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沒有達到目的，又造成很大傷亡，後來還直接給中央寫信反映。會理會議後，楊尚昆奉命讓黃寫檢查，黃就是不寫。[17]

毛在此役中犯了一系列錯誤：敵情不明便輕率地下了決心，低估了川軍兵力與戰力；不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卻去進攻堅守陣地並佔了地利的強敵。最主要的還是，打這仗到底是為什麼？青杠坡川軍郭勳祺部是尾追之敵，而此前中革軍委發佈《關於渡江的作戰計劃》規定：“對尾追之敵應使用少數得力部隊（約一團兵力左右）進行運動防禦，並向敵前出遊擊，以阻止敵人前進，而主力則應迅速脫離敵人。”那紅軍為何不這麼做，要掉過頭去打追兵？同一作戰計劃又說：“當我必要與尾追或側擊之敵進行戰鬥時，應集中主力進行消滅敵人的進攻戰鬥，不應以防禦戰鬥等待敵人來攻。”[18]很明顯，毛就是根據這一條決定打追兵，那必要性是什麼？大概他以為消滅了追兵，前面的川軍就會嚇得乖乖讓路吧？這根本就不可能。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前有守軍，後有追兵，就只能從旁跳出陷阱，因為不管是去打前面的守軍，還是打後面的追兵，都有遭到兩軍夾擊的危險。萬一戰鬥出現膠著，不能速決，危險就更大。而這就是實際發生的事，土城惡戰正酣時，川軍後續部隊兩個旅迅速增援上來，位於旺隆場的

川軍兩個旅也從側後攻擊紅軍[19]。如果不是紅軍逃得快，就要被圍殲了。毛澤東連這點常識都沒有，還配充什麼軍事天才？

戰敗後紅軍撤往赤水河西，是為所謂“一渡赤水”。軍委原想在宜賓附近過江，但彭德懷發現各路追兵逼近江南，而且川軍有 40 多個團扼守長江北岸，於是建議撤往雲南威信縣扎西鎮，整編遭受重創的部隊，“創建川黔邊根據地”[20]。但到了扎西後，毛大概覺得還是黔軍好打，提出回師東進。中央於是決定放棄原來的北渡長江、“創造川西根據地”的戰略計劃，改為“以川、滇、黔邊境爲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21]

於是紅軍東渡赤水，是為第二渡。三軍團從間道開至桐梓，從俘虜那兒得知婁山關防守空虛，於是進取該地，在婁山關與黔軍遭遇並擊敗之。一軍團在黑神廟偷聽敵人電話，得知遵義守軍只有一個營，於是一、三軍團順勢再佔遵義城。中央軍吳奇偉部旋即反攻，紅軍以三軍團在城外西南面高地抗擊，一軍團從東南攻敵側後，兩軍鉗形夾擊，殲敵一個師，餘敵逃脫。[22]

此乃紅軍長征以來第一個較大的勝仗，但這並不是偉大統帥運籌帷幄的結果。彭德懷在會理會議召開前夕，對時任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劉少奇抱怨說，婁山關遭遇戰不但贏得僥倖，而且斬獲不多：

> “現在部隊比較疲勞，特別是打婁山關那一天，很疲勞。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時從遵義出發的，想先佔婁山關（該關離桐梓和遵義各四十五里）。我們十一時許才接到軍委告訴的上述情況和要我們相機襲佔遵義的命令，即刻跑步前進。武裝長途跑步，消耗體力很大，幾天都沒有恢復起來。我先頭部隊到婁山關分水線（制高點）時，王家烈部隊

只隔兩三百米，如果它先佔領，我處仰攻態勢，就會增加傷亡和困難。那天因為我軍居高臨下，王家烈部戰鬥力也不強，我們傷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敵人五個團打敗了，但因正面突擊，沒有截斷敵軍退路，故繳獲也不多。”[23]

再佔遵義打敗中央軍也不是毛指揮的。據彭德懷說是兩軍團“自動配合”：“如第二次佔領遵義的第二天，打吳奇偉軍的反攻，一、三軍團就完全是自動配合把敵打敗的。”[24] 這與聶榮臻所說一致[25]。但楊尚昆卻又披露，在婁山關戰役前朱德曾命令：“全軍統歸彭、楊指揮。”[26] 總之，該役若非彭德懷指揮，就是兩軍團自動配合，沒毛的什麼事。

就連這仗彭德懷都很不滿意，向軍委建議：“目前，我應避免與相等兵力敵軍決戰，保持自己的優勢兵力，不應攻堅亂碰。遵義戰鬥的勝利沒有擴張，由於機械和失掉時機。”[27] 其唯一意義是為毛抬轎：“這是退出中央蘇區第一次連打了兩次勝仗。打亂了敵人的追擊部署，爭取了某些主動。改換新的領導後，打這樣一個勝仗意義更大。”[28]

可笑的是，這麼一個偶然的戰役勝利，而且根本不是毛指揮的，卻衝昏了他的頭腦，真以為自己創造了奇跡，就此認定遵義戰役的勝利“給了我們在貴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開始赤化群衆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可能”；“這一勝利是在黨反對了軍事的單純防禦路綫之後，證明了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正確，粉碎了一切動搖悲觀、過分估計敵人力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等機會主義觀點，發揚了紅色指戰員的高度積極性。遵義戰役的勝利就是黨的路綫的勝利！”“用一切努力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來建立蘇區根據地，是目前每個共産黨員最中心最神聖的任務”，“我們當前的中心口號是：打大勝仗來赤化全貴州！”“中央主力紅

軍的勝利，將不僅赤化全貴州，且將配合紅四方面軍與二、六軍團的勝利，赤化整個雲貴川三省以及湖南地域的廣大地區！”[29] 他指責博古等人是“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跑”[30]，卻悟不出強敵圍追堵截之下的孤軍只可能是流寇，絕無可能站穩腳跟，竟然以為打了個勝仗就可以把整個貴州甚至西南數省變成根據地！

或許就是在這種“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支配下，戰後當上了前敵司令部政委的毛澤東發佈命令，準備消滅駐魯班場的中央軍周渾元部，決心以“消滅周渾元來徹底粉碎敵人的追剿”，“打大勝仗來赤化全貴州”。林彪、聶榮臻不同意這主張，主張打駐打鼓新場的黔軍，獲得朱德支持[31]。軍委開會表決通過林案，毛竟以辭職相要挾。不料弄假成真，大家都同意他辭職。他只好壓下自尊心，連夜去遊說周恩來。周被他說服，撤銷了前議，召回了已向打鼓新場運動的紅一軍團。次日經毛澤東提議、張聞天贊成，組成了以周為首的“新三人團”，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負責全權指揮軍事。[32]

三人團遂按毛的主張，下令打魯班場。彭德懷反對此舉，認為周部早已進駐該地，野戰工事已經構築完畢，“敵人陣地工事堅固，地形對我不利，無攻破周渾元可能。似應迅速脫離當前之敵，控制仁懷、茅臺，西渡以吸引滇、川兩敵，尋求機動。”[33] 但毛固執己見，魯班場戰鬥因此打響。

這是毛指揮的第二個戰役，也是第二次敗仗。紅軍在“陣前遺屍七百餘具”[34]， 光紅一軍團就傷亡 489 人[35]，最後不得不撤出戰鬥。

這錯誤簡直是犯得莫名其妙。在西南三省中，黔軍的戰鬥力是最差的，而且只在打鼓新場駐了一個師，是以林彪按兵法避實擊虛的原則提出去打該敵，毛卻置林彪、彭德懷的反對不顧，執

意去打魯班場的三個師中央軍，而且還是攻堅戰。這完全違反了他後來在 1947 年年底提出來的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放過分散和孤立之敵，專打集中和強大之敵。黎平會議明明決定“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鬥”，他為什麼還要去打強敵中央軍？難怪彭德懷戰後要向中央軍委抱怨：“遵義戰鬥的勝利沒有擴張，由於機械和失掉時機，魯班場的戰役原則上不應打。”[36]

此役宣告了中央“在貴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開始赤化群衆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打算破產，於是毛又想渡過長江進入四川，遂令紅軍西渡赤水，向古藺、敘永開進，是為三渡赤水。但敵軍迅即三面合圍。紅軍不得不在剛剛渡過赤水後又返回赤水以東，是為第四渡。紅軍完全成了個小姑娘，把赤水河當成了猴皮筋，在上面跳來跳去，而這種無頭蒼蠅亂撞的盲動，竟然也就被無恥文人美化為什麼神機妙算！

四渡赤水後，毛仍未放棄與敵軍決戰後立定腳跟的幻想，“考慮向西南行動，擴大機動，以轉移戰局”，下令向黔西南進軍，再度去硬碰硬，突破周渾元、王家烈、孫渡等縱隊，攻佔黔西、大定一帶。但彭德懷覺得難以完成任務，建議轉向東南烏江流域。[37]

這次毛總算聽了他的話。紅軍於是南下，向貴陽虛晃一槍，隨即南渡烏江。渡江後彭德懷又向軍委建議攻佔滇黔邊區的盤縣、平彝，“往西甚至入滇，只要給滇敵一個較大的打擊，使我機動區域更大，則更能多得時間，爭取群眾，鞏固和擴大紅軍，開展在黔邊的新局面。”[38] 毛接受了建議，命令部隊西進，但中央軍已先機搶佔了盤縣、平彝一線。紅軍向北無路可走，向東有孫渡的追兵，只好被迫向西進入雲南。

進入雲南後，毛澤東仍然沒有放棄打個大勝仗建立根據地的固執念頭，以軍委的名義下令“與滇軍決戰”，準備在雲南東北地區“消滅敵人取得新的發展局面”。林彪於同日回電反對，指出：

> “川、滇、湘敵及中央軍正分路向昆明東北前進，阻我折回黔西，企圖消滅我軍於昆明東北之窄狹地域內。在目前形勢下，我軍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無法在滇東北開展局面……因此，我野戰軍應立即變更原定戰略，而應迅速脫離此不利形勢，先敵佔領東川，應經東川渡過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進，準備與四方面軍會合。”[39]

但毛澤東仍想在曲靖、沾益一帶與滇軍決戰。可惜滇軍不出擊，盤縣、平彝一線又已被跟追的中央軍佔領了，紅軍有陷入重圍的危險。於是中央軍委開會接納了林彪的建議，分道西行北上，大隊在祿勸縣皎平渡口渡過了金沙江，進入四川。

由上可知，所謂“四渡赤水”，乃是毛澤東的敗筆而非什麼“平生得意之筆”。他始終認識不到，為中央軍跟追並為地方軍閥堵截的客軍，根本就沒有可能立定腳跟，卻始終幻想與敵決戰，開創新根據地。先在黔北試，碰壁後改了主意，試圖過長江入川，與四方面軍會合創建川西根據地。土城戰敗後被迫逃過赤水，逃到扎西後覺得渡江無望，只好二渡赤水，重佔遵義，再度試圖“赤化貴州”。等到魯班場再吃敗仗，又毫無必要地三渡赤水，企圖再過長江，剛渡過去又發現不妙，馬上再渡回來。兩個多月的時間就浪費在這往返盲動裡。回到赤水以東後，毛仍然幻想在黔西南創建根據地，不行只好進入雲南，又想在滇東北建立根據地，再度發現不行，最後只好聽取林彪建議北上渡過金沙江。

因此，這整個過程乃是個不斷的試錯過程，一試再試，一錯再錯。不但原來的設想統統落空，還將部隊“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造成大量減員。楊尚昆說：“四渡赤水，是紅軍在長征中走得最頻繁的時候，不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連下雨，部隊非常疲勞。”[40] 李德也說：“病號和累垮的人多於死傷者，損失與日俱增。雖然，自年初以來，我軍在貴州招募了幾千名志願兵，但許多師團還是明顯地縮減了。”[41] 紅軍一佔遵義時有 3.7 萬人，與四方面軍會合時只剩下 1.5-1.8 萬人[42]，減員約 2 萬。而紅軍在再佔遵義後，除了土城、魯班場與會理三個敗仗外基本沒打過仗，因此，大部份減員都是行軍造成的，以四渡赤水期間損失最鉅。儘管數字沒有湘江戰役高，但損失的幾乎都是戰鬥骨幹，而湘江戰役損失的絕大部分是出發前剛擴充的新兵。因此，四渡赤水應是紅一方面軍長征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擊，而它完全是毛瞎指揮造成的。

御用文人把這種舉棋不定、猶豫彷徨的盲目試錯，吹成是為了進入雲南的深謀遠慮，完全是偽造歷史。上面已經講了，黎平會議決議“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雲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遵義會議以及扎西會議的決議都沒有進入雲南的計劃。南渡烏江前，毛從未想過去雲南，不是想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就是想北渡長江，建立川西根據地，在四渡赤水後仍想在黔西－大定一帶立足。進入雲南是彭德懷在渡過烏江後提出的不得已時採用的預案，其實是被追兵逼進去的。

如果毛早就想進雲南，那又有何難哉？一渡赤水後紅軍到了扎西，那就在雲南境內，再往西走上幾百里就能輕鬆愉快渡過金沙江。就是官修黨史，也只說“滇軍孫渡縱隊和川軍潘文華部從南北兩面逼近扎西”[43]，往西走又有什麼問題？那一帶是人煙稀

少、交通不便的滇東北，根本沒有敵軍，乃是“弓弦路”（請參看附圖），又何必大費周章，兜個天大的圈子去走林副說的“弓背路”？四渡赤水後進入雲南也非難事。紅軍南渡烏江時走得太急，破壞了浮橋，後衛部隊紅九軍團無法過河，滯留在北岸，後來被軍委當成誘敵的偏師[44]。該部走的就是“弓弦路”，最後在東川樹橘渡口輕易渡過金沙江，其命運與毛指揮下的主力部隊形成鮮明對比。就算毛天生酷愛走弓背路，那也完全可以率偏師南渡烏江，讓主力去走弓弦路。如此也就不會給主力帶來那麼多非戰鬥減員。

如此瞎指揮，連林副那毛澤東親手提拔並視為腹心的愛將都受不了，要串連彭德懷奪取前敵指揮權。據聶榮臻報告中央，四渡赤水時，林彪一直抱怨毛的指揮，說他們走的盡是弓背路，應該走弓弦，這樣會把部隊拖垮，像毛這樣指揮還行？！在會理休整時，林給彭德懷打電話說，現在的領導不成了，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我們服從你的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還特地給中央上書，請朱毛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出任前敵指揮。[45]

據李德說：不光是林彪，張聞天、彭德懷、楊尚昆也都公開指責毛：

> “部隊越向西行進，瞭解實際情況的領導幹部的情緒就變得越來越壞。對毛澤東軍事指揮的不滿情緒，已經發展到了幾乎要發生一次新的改組和一場新的派別鬥爭的地步。洛甫和林彪在這以前和遵義會議期間，曾經是毛最熱心的代言人和最可靠的支持者，現在卻以最激烈的批評者的身份出現了。他們公開指責毛及其整個領導小組‘在敵人面前逃跑’，‘軍事破產’。還有彭德懷，尤其是他的政治委員楊

尚昆（我與楊在一次偶然相遇中交談過），也或多或少贊同他們的意見。”

洛甫甚至還找李德串連，暗示準備以林彪、彭德懷和劉伯承取代“三人團”。只是李德不贊成在危急時刻作此人事變動，博古也擔心在此危急時刻派別鬥爭會招致紅軍覆亡，下定決心避免這種悲劇發生，黨和軍隊領導才倖免分裂。[46]

這一證詞得到了多人證實。張聞天夫人劉英當時是中央縱隊秘書長，她說：

“但是，在當時，毛主席既沒有後來那樣的絕對權威，大家對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也還沒有完全領會，所以上上下下雖然服從命令聽指揮，但對四渡赤水這一段也有不同意見，主要是圍繞著走路還是打仗。

在三人小組裡，稼祥對毛主席的辦法就有意見。他向聞天反映，說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稼祥要求開會討論這個問題。軍隊裡意見也不少，說只走路不打仗，部隊沒有打垮倒要拖垮了。聞天到三軍團去，德懷同志把部隊的情緒向聞天說了。聞天作風是很民主的，他說，有意見拿到會上討論。一軍團林彪還給三人小組寫信，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

……

（會理）會議由聞天主持。他先請王稼祥講，王稼祥說還是你先講吧。這樣，聞天就簡略地把他聽到的各處反映，對軍事指揮上的不同意見提出來，請大家討論。彭德懷把意見倒了出來，林彪也講了。在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會上這些意見，毛主席聽了大發脾氣，批判彭德懷右傾，說林

的信是彭鼓動起來的。我印象中會上爭得面紅耳赤，搞得很僵。

會議從五月十二日開起，一共開了兩三天。我記得第一天會議下來，聞天叫我邀林、彭到瓦房子裡來同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那裡已經用門板擱好了鋪。我想，聞天的意思是可以緩和氣氛，便於談心溝通思想。

我走進草棚子裡，他們正談得熱鬧。聽到林彪說：‘老彭，還是你行，前方還是你來指揮。’彭德懷說：‘我不幹。’

……最後聞天做結論，肯定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是正確的，批評了林彪和彭德懷，決定部隊繼續北進，到川西北創建新蘇區。”[47]

這與張聞天本人所說一致，他在整風運動中交代，新“三人團”成立後，王稼祥對毛的指揮不以為然，曾向他表示，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48]

楊尚昆也說：

“……從遵義出來這一段部隊就是走路，那個時候怨言很多。一天走來走去，打圈子，也沒有說清楚究竟要搞什麼，就是下命令。所以部隊疲勞得不得了。走的中間你擠我，我擠你，誰的力量大誰就跑得快。一軍團同三軍團碰到路上誰都不讓誰。特別是幹部團陳賡對一軍團楊成武那個團意見大得很，就公開罵，跺起腳來罵。因此可以說那個時候思想是很亂的。

在這種打圈圈情況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說，這樣不打仗又死那麼多人，是不行的。對這種打法洛甫也不瞭解。彭德懷也不瞭解，因此也跟他講，其實毛對彭不瞭解是最不

高興的。這裡還有王稼祥軍事方面對毛有意見，他又不跟毛直接講，就跟洛甫講，洛甫就跟毛講，毛就發脾氣。會理會議本來正式題目是批評林彪寫給中央的信，信是要毛下臺，要彭德懷出來指揮。但是會上有人卻出來說是張聞天到了三軍團司令部，同彭談了多少多少。我就起來作證，我說我是政治委員，整天同彭德懷兩個在一起，根本沒有這個事。張聞天沒有到過三兵團。所以這就懷疑到張聞天同彭德懷聯合起來反對毛主席。這根本是個冤枉，毛主席卻一直深信不疑。我以為毛同張的疙瘩那個時候就結下了。不然為什麼明明是要批評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結果卻又要把張聞天同彭德懷拉出來？那個會上非常緊張啊。”[49]

楊尚昆和劉英都試圖抵賴自己或老公的反毛“罪責”，因而互相矛盾。劉說張聞天支持毛，而楊則揭發，“對這種打法洛甫也不瞭解”；而且，在渡過北盤江之前，張聞天還想離開紅軍到上海去，而這是“使毛主席內心很不平靜”的三件事之一；楊還說，毛認定張是後臺，在會理會議上不但罵林彪是個娃娃，懂得個啥，還斥責張聞天是書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戰爭[50]。但楊否認張聞天曾到三軍團串連彭德懷推翻毛澤東，而劉卻說會議就是因為張到三軍團與彭談話後，才決定召開的。除此之外，他倆都證實了李德所說，當時高層確有多人公開表示對毛的不滿。

實際上，楊尚昆和劉少奇也是給中央提意見的“很多人”中的兩個。少奇同志已經在廬山會議上承認了，他和楊尚昆曾給張聞天發電報批評軍委（其實就是毛）。只是他把那事賴在彭德懷頭上，說電報裡的話都是彭說的，但電報寫好後彭卻不肯簽字，於是便以楊尚昆和劉少奇的名義發出去了：

"我們長征中認識，認為你（蘆注：指彭）爽直，對同志、友鄰部隊都照顧，感覺政治開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覺不好：會理會議前，批評軍委，很不守紀律，我聽不下去了。建議打電報，不要這樣講。我要打電報，話都是彭的。寫好電報交彭和尚昆，彭不簽字。會理楊、劉電報，是彭的意見。不簽字不對，並不勇敢。從那以後，覺得此人不簡單。"[51]

楊尚昆則說，土城戰敗後，三軍團打得最苦，下面講怪話的人最多，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據地，希望打仗。中央知道下面指戰員有意見，就派劉少奇到三軍團瞭解情況。劉少奇綜合了下面的意見，加上自己的意見，擬了份電稿，交彭楊簽字。彭認為下面有些意見，主要是對上面的戰略意圖不理解，加強思想教育就可以解決了，拒絕簽字。[52]

劉少奇的電報說了些什麼？黃克誠說：

"在這次（會理）會議上毛澤東對劉少奇、林彪、彭德懷進行了嚴厲地批評。……劉少奇則是因為在貴州時，曾向中央提過建議，他認為革命正處於低潮時期，應該改變方針，不能在貴州一帶打圈子。我曾經同劉少奇在一起交換過看法，彼此意見頗相吻合。毛澤東批評這種觀點是對革命喪失信心，是右傾機會主義。"[53]

由此可見，毛的指揮害得三軍團在土城吃了大虧，以後"不打仗又死那麼多人"，老彭因此天天在三軍團部實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滿足操娘要求，操夠"，不斷地問候毛文氏七妹，引起了劉的強烈共鳴。於是他便把彭、楊和他本人的意見匯總寫成電報，準備發給張聞天。不料彭不肯簽字，他只好和楊尚昆簽發，對彭則一肚子氣，直到廬山會議才發作出來。但他把電

報內容完全賴在彭身上則是胡說——黃克誠已經披露，他在私下交談中也反對打圈子，並不光在電報裡這麼說。

在文革期間被審查中，彭德懷交代了他對劉少奇說過些什麼對毛不滿的話：

> “軍委派劉少奇來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我和他談過以下的話：現在部隊的普遍情緒，是不怕打仗陣亡，就怕負傷；不怕急行軍、夜行軍，就怕害病掉隊，這是沒有根據地作戰的反映。……現在部隊比較疲勞，特別是打婁山關那一天，很疲勞。……因正面突擊，沒有截斷敵軍退路，故繳獲也不多。我還同他談：湖南敵軍戰鬥力也比以前弱。蔣桂戰爭時，湖南吳尚第八軍一部投桂軍，一部潰散。紅軍兩次進攻長沙何鍵部，損失也不少。紅軍到達郴州、宜章間時，我曾向中央建議：第三軍團向湘潭、寧鄉挺進，威脅長沙；中央率主力迅速進佔溆為中心的地區，發動群衆準備戰場；三軍團盡可能在寧鄉、湘潭、湘鄉、益陽地區同敵周旋一個時期。博古他們未採納，其實這個意見是可以考慮的。蔣介石部隊也很疲勞，目前滇軍和川軍還是生力軍。我軍應擺脫堵、側、追四面環敵的形勢，選擇有利的戰機打一兩個勝仗，轉入主動，實現遵義會議決議，靠近二方面軍，創建新根據地，就好辦了。這是我和劉少奇談話的內容。
>
> 過了兩天，劉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見和別人的意見，寫了一個電報給中央軍委，拿給我和楊尚昆簽字。我覺得與我的看法不同，沒有簽字，以劉、楊名義發了。”[54]

這些話確實是埋怨中央不聽他的高明建議，除了算舊賬，指責毛在他從長沙撤出後還要執意第二次去打，“紅軍兩次進攻長沙何鍵部，損失也不少”之外，重點就是抱怨沒有根據地持續流

動作戰、長期急行軍、夜行軍招致士氣低迷，認為“我軍應擺脫堵、側、追四面環敵的形勢，選擇有利的戰機打一兩個勝仗，轉入主動，實現遵義會議決議，靠近二方面軍，創建新根據地”，反對毛只打圈圈“不打仗又死那麼多人”的戰術。這完全是大眾當時的積怨所在，其實也就是電報內容之一。可彭卻要抵賴，說不是他的意思。但劉少奇已經在廬山會議上跟他對過質。如果真不是他的意思，他為何不當場與劉少奇分辯，而要默認？他把別人鼓動起來給老毛提意見，自己卻不出頭，別人當然要“覺得此人不簡單”。因此，林彪發難後，毛懷疑是彭和張在後頭搗鬼，雖是毛多疑成性，但也不完全是無中生有。

綜合以上證詞可知，張聞天、王稼祥、林彪、彭德懷、楊尚昆、劉少奇、黃克誠等幾乎所有的中共或紅軍的領導人，都對毛“在貴州一帶打圈子”極不滿意，黨總書記張聞天甚至悲觀失望到想離開紅軍的地步。就是因為群情洶洶，林彪才會“正式上書要求改換軍事領導人”。

老毛當然只會以己度人，絕不能理解那純粹是同僚和部下們對他瞎指揮的自發不滿，卻只會認定張聞天和他過去試圖搞倒“洋房子先生”們一樣，在下面拼命串連將領，蓄意在幕後煽動大家對他的不滿，以便奪他的權。其實，當時中央若有個毛式野心家陰謀家發難，要把毛拱下來只會獲得全黨全軍的真誠擁護。只是博古和李德顧全大局，張聞天大約也被他們說服了，改了主意出來挺毛，毛才倖免倒臺。連楊尚昆事後都能悟出：“這次會議（會理會議）克服了黨內和部隊內的渙散情緒，是有積極意義的。那個時候，如果上下動搖是很危險的。”[55] 的確，紅軍上下業已軍心渙散，中央若再爆發領導權危機，很可能就此潰散。

但在與四方面軍會合、危機暫時過去後，一方面軍的幹部仍然去向張國燾吐苦水。希望張主席為他們做主。老張反對洋房子和潤之，只怕有一大半是他們煽起來的。若是老張聯合一方面軍將領，開一個類似遵義會議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只怕毛立刻就得下臺。這就是毛為何要說他與老張的會見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時刻，說明毛對他當時所處的困境心頭雪亮。正因為此，毛才會捏造“兵變”的謊言，騙得多數中央委員和他一起率紅一、三軍團倉皇出逃。

毛澤東等人逃走後，被他們扔下的一方面軍高幹的怨恨便公開爆發了。時任紅軍總司令部三局主任的宋侃夫同志披露：

> “（另立中央的高幹）會議由張國燾主持，會上首先是李卓然、何長工、邵式平、羅炳輝等同志講話。他們的講話給我們的影響極大，因為他們是一方面軍的幹部，長期跟黨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麼也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呢？特別是何長工勁頭很大，大喊口號：‘打倒毛澤東！’李卓然也細聲細語講了不少。會議由何柳華（即廖承志同志）做的記錄，事後刊登在張國燾主辦的《幹部必讀》上。會後他們都升了官，李成為第二中央的政治（局）委員，何當上了第二中央的組織部長。朱總、徐帥在這個會上沒有講話，但張國燾在第二中央委員的名單中，仍然寫上了朱總、陳紹敏等人的名字。這個會開了整整一天，在會上宣佈臨時中央的成立，直屬共產國際。會上反中央到了頂點，氣氛非常緊張，時間是 1935 年 10 月。
>
> 與此同時，成立了‘波巴依德瓦’（藏語）中央政府，邵式平同志任主席，熊國炯同志任副主席。邵在會上也是慷

慨激昂地講了一通，邵還找了一個藏族人做老婆，後來帶到延安。”[56]

何長工早在秋收暴動時就是毛澤東的部下，跟隨毛上了井岡山後出任王佐、袁文才團的黨代表，朱毛會合後又被派到主力部隊 28 團去當黨代表[57]。然而他卻在會上帶頭高喊打倒毛澤東，一方面軍的其他高幹也同仇敵愾聲討之，可見積怨之深。

自我英勇的工農紅軍建立以來，還從未出過這種事，無論是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還是王明、博古等洋房子先生，從未如此激起全黨全軍同心同德的不滿。就連李德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也不曾激起將領們如此強烈的腹誹與公開抗議。它充分顯示了毛澤東從遵義會議後直到兩軍會師時，一直面臨著無比深重的權位危機。與黨神話完全相反，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遵義會議後不是什麼“萬眾歡呼毛主席喲，工農踴躍當紅軍”（《長征組歌》），而是眾叛親離，四面楚歌，一直在狼狽萬狀地走麥城。

毛落魄到此地步，除了他過去在蘇區廣結善緣之外，最主要還是他這段時間的指揮實無理智可言。無怪乎張戎要以為毛是故意找藉口避免過長江與張國燾會合，不過此論並無證據支持。我認為這一系列的盲動是“黨指揮槍”、外行領導內行造成的。無論是周，是毛，還是王稼祥，都是玩票的統帥，並不具備戰役指揮能力。在萬里長竄的緊急情況下，只能由前敵將領臨機處置，不宜由中軍統帥遙制，林彪的建議其實非常正確。羅炳輝率領的紅九軍團因為脫離了文人指揮，不但走得輕鬆愉快，而且還在打鼓新場附近伏擊了黔軍，俘敵 1800 人，繳槍 1000 餘支，而紅軍主力自再佔遵義後從未取得過這種勝利。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毛在掌權後急於施大手筆，扭轉乾坤，開創新局面，挽救革命挽救黨，為此不惜拋掉在中央蘇區學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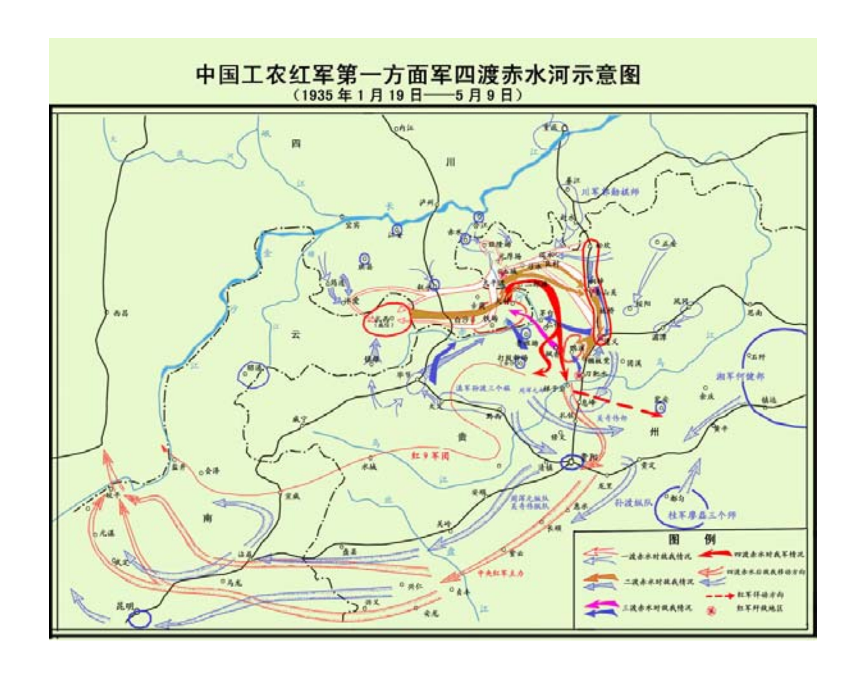
一點手藝，如彭德懷指出的那樣“與相等兵力敵軍決戰”，“攻堅亂碰”，指揮的兩次戰役都大敗虧輸，損失慘重。魯班場戰敗後，他從此喪膽，不敢再輕易開戰（“慎重初戰”？），卻又老是不死心，老想打個大的殲滅戰，立定足跟，開闢新根據地，因此老是在尋覓戰機，卻又老是覺得不合適，不敢打，於是只好使出他從井岡山老土匪朱老聾子那兒學來的入門手藝，“強敵跟追，用打圈子的辦法”，不斷地在原地畫圈圈，造出“不打仗又死那麼多人”的人間奇跡來，弄得群疑滿腹，衆難塞胸。

其實這困境明擺著：要創立根據地，先得集中兵力消滅敵軍，打下地方來後，再分兵發動群衆，建立基層政權。但長征路上根本沒有這麼做的餘裕。蔣介石欲借追剿紅軍而削藩，派兵窮追。地方軍閥又生怕紅軍在自家地盤內安營紮寨，予蔣以吞併藉口，是以積極參加會剿。紅軍只要一停下來，各派武裝就要圍上來。紅軍只能集中兵力對付敵人，一旦分散，立遭圍殲。即使兵力始終保持集中，一旦停下來，追兵必然團團圍住。就算打贏了一仗，敵軍也只會源源而至，越打越多，最後只會被圍殲。可笑的是，如此簡單的道理，毛卻死也不明白。全靠林副統帥當頭棒喝，他才在逃入雲南後死了心，北上渡江去與四方面軍會合。

話說回來，毛也有難處。當初他在遵義會議上奪了軍權，一個藉口就是博古等人實行“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跑”的逃跑主義。既然不逃跑，那當然只有停下來創建根據地，而上面已經解釋過了，這是不可能的。於是他除了在原地打圈之外，還能有什麼別的高招？幸虧他最後還是明白了這點，改打圈為長竄，實行逃跑主義，這才避免了毀滅。

毛本人其實也知道四渡赤水以及入雲南走弓背路乃是他的平生敗筆。在他的絕對權威確立後，他也曾在不經意間說出了實

話。在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時，他致電劉鄧，指出：“二萬五千里長征時期休息太少，疲勞太甚，減員太多，而那種性急有許多是不必要的”，要劉鄧“減少不必要的性急，力爭少走路、多休息”[58]，說明他還是記住了四渡赤水時毫無必要地令部隊白天黑夜急行軍，造成大量減員的教訓。



但此人虛榮心超強，胸襟褊狹，睚眥必報，因此對會理會議一直耿耿於懷，在 1959 年以前提過四次[59]。文革以前，“四渡赤水”從未見於黨史軍史，就連蕭華同志通篇歌頌偉大領袖的《長征組歌》，原來唱的也是“戰士雙腳走天下，聲東擊西出奇兵”。待到林副倒楣，會理會議上的舊賬被翻出來作罪證，那歌詞才改為“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我平生得意之筆”之說也忽

焉鵲起。這神話之所以產生，無非是偉大領袖“反敗為勝”的一貫絕招罷了。

二、危險的豪賭：孤軍北上

毛澤東的“平生得意之筆”向他證明了一個無情的事實：無論是在貴州還是雲南，紅軍都不可能立定腳跟，開創新的根據地。不難想見，在別的地方同樣會遇到這個問題。那該怎麼辦？據李德說，毛在雲南時跟他說，想經西康和青海去新疆，得到蘇聯的援助。在即將與四方面軍會合時，毛又向黨魁們提出，在川康交界地區建立一個少數民族國家，紅軍主力以此為根據地，經過青海或甘肅向新疆推進，與蘇聯建立直接聯繫，使蘇聯對中國紅軍的全面援助成為現實。“毫無疑問他估計到，向新疆的推進如果成功，一定會導致蘇聯和國民黨中國之間一場嚴重的外交上的，也許甚至是軍事上的衝突，而這正是他的本意。……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叫作‘一本萬利’。”只是其他人覺得高原長征太危險，才否決了他的意見。[60]

既然西進太危險，那就北上，只要能打通蘇聯就行。一方面軍進入四川藏邊地區後，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會議。據張國燾說，毛在會上解釋，中央紅軍之所以戰敗，主要是蔣介石的飛機和大炮厲害。因此只能跑到寧夏去，到外蒙古去弄點飛機大炮，來回敬蔣介石。如果沒有飛機大炮，那就再不要說“打倒蔣介石”這句話了。毛還強調指出，紅軍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在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幹部，也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

以再起。他還說這是他的冷靜想法，也許被人視為右派，但他請求我們慎重考慮他所提出來的計劃。”[61]

此後在毛兒蓋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再度提出這一戰略主張：

> “（西北地方）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作準備……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因此要用全力達到戰略方針，首先是甘肅這區域，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62]

不能否認，毛的這一主張確有一定依據。當時三個方面軍都給打出了老巢，成了流寇。沒有根據地，部隊就得不到休整，給養沒有固定來源，只能靠沿途搶劫，因此無法保證軍需的恒定供應，更被迫陷入無止境的流動作戰中，兵力遲早要消耗殆盡。因此，當務之急是開闢新的根據地。但毛澤東已經在貴州和雲南屢次試過了，都碰了壁。連在那些交通不便的落後地區都不行，到交通相對發達的內地就更無希望。就算是根據地開闢出來了，國軍來圍剿，使出堡壘主義來，紅軍又該如何抵擋？五次圍剿的痛苦經驗已經表明，“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烏龜殼，是成千上萬困死紅軍的烏龜殼。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沒有蘇聯提供飛機大炮等技術條件是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我們打不破反革命，反革命卻要打破我們”。因此，不能不說，毛的主張的確非常實際。

但張國燾對北上興趣缺缺。當時他們並不知道陝北有個根據地。因此，當時中央討論下一步行動計劃的前提，是無根據地依托的流動作戰。在此基礎上，張國燾覺得還不如呆在紅四方面軍

業已佔領的川西北地區。那地方雖是藏族牧民區，資源貧乏，藏民也不會參加紅軍，沒有發展前途，但地域廣大，敵人無法封鎖，地勢險惡，敵軍行軍進攻均不易。他認為，“爭取一省到數省首先勝利”的口號已經過時，現在是革命低潮時期，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的不是蘇維埃革命而是抗戰。但紅軍沒有力量既抗戰又反對國民黨，因此應該在一個閉塞的根據地裡堅持鬥爭，直到獲得蘇聯援助，中共也強大到可以依靠廣泛的抗日群衆運動，迫使國民黨改變政策。[63]

雖然有這些意見分歧，但張國燾開頭還是採取了合作態度，曾令徐向前按中央的指示辦，發動松潘戰役，打開北上通道，以奪取甘南作為根據地。徐向前和陳昌浩奉命攻打松潘，但中央軍憑碉固守，無法攻下。軍委只好改行夏洮戰役計劃，紅軍分為左右兩路，擬從卓克基北進取阿壩，控墨窪，繼而向北出夏河；右路軍大部從毛兒蓋北出班佑、巴西地區。毛澤東的打算是，紅軍北出後，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建立根據地。據他分析，這一地區背靠草地，川敵不易過來。臨近青海的回民區，黨的民族政策得當，回民不至於反對紅軍。如東進受阻，則以黃河以西作戰略退路。[64]

毛這計劃一望即知是置紅軍於死地：向南有草地，向東有強敵，向北有黃河，只有西方是“戰略退路”，然而那兒不僅有黃河，還有回民區，後來西路軍就是讓二馬全殲的，難道他們沒有執行“黨的民族政策”？

張國燾率左路軍按計劃攻克阿壩後，發現該地“人糧甚豐”，於是更傾向於南下，遂與毛澤東等人再度爭論進軍方向。毛澤東等人反對南下，給出的理由是：

（甲）地形利於敵封鎖，而不利於我攻擊，丹巴南千餘里，懋功南七百餘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天蘆雅名邛大直至懋撫一帶，敵壘已成，我軍絕無攻取可能。

（乙）經濟條件，絕不能供養大軍，大渡河流域千餘里間，術（？）[65]如毛兒蓋者，僅一磨西面而已，綏崇人口八千餘，糧本極少，懋撫糧已盡，大軍處此有絕食之虞。

（丙）阿壩南至冕寧，均少數民族，我軍處此區域，有消耗無補充，此事目前已極嚴重，決難繼續下去。

（丁）北面被敵封鎖，無戰略退路。

而張國燾反對北上，理由是，紅軍大量減員，彈藥和被服都缺乏，能否一舉破敵，或與敵作持久戰而擊破之；敵是否有續增可能等問題，都必須事前加以考慮。北進必將長途連續行軍，減員將在半數以上。據此，他請毛澤東等人考慮可能遇到的下列情況：

1、向東突出蒙西（？）封鎖線，是否將成無止境的運動戰，冬天不停留行軍，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穩腳跟？

3．若向東非停夏、洮不可，再無南返之機。背靠黃河，能不受阻礙否？[66]

幾十年後來客觀地看兩造的爭論，不能不說張國燾的考慮更周密。毛澤東等人反對南下的理由，可以成立的只有兩條：一是沒有發展前途，二是沒有戰略退路（也就是無法向北逃入外蒙或向西逃入當時為蘇聯控制的新疆）。確實如此，藏邊地區人口與資源都稀缺，藏胞不會參軍，部隊只有損耗沒有補充，離蘇聯更是非常遙遠，無法在事急時逃到蘇聯去。這些客觀事實都無從否認。

但張國燾的考慮更有道理：紅軍極度疲憊，大量減員，北上將遇到指揮統一、裝備精良的中央軍，而且敵人運兵方便（隴海線已於 1934 年 12 月修到西安，西安至蘭州有公路連接）。紅軍只要一停留下來，敵人就會源源而至，越打越多，很難立足，勢必重蹈長征時在貴州與雲南的覆轍。他的質問非常有力："是否將成無止境的運動戰，冬天不停留行軍，前途如何？""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穩腳跟？""若向東非停夏、洮不可，再無南返之機。背靠黃河，能不受阻礙否？"的確，毛澤東選定的洮河流域確實是死地，很容易陷入背水作戰的困境。而南下則不過是打四分五裂、勾心鬥角、裝備窳劣的川軍，又是深山密林，利於四方面軍那些慣走山路的川娃子，不利於敵人快速運兵。雖不利於擴展，卻也不至於滅亡。

因此，在北方沒有根據地的前提下考慮問題，則北上有著被殲滅的實實在在危險，唯一好處是有跑蘇聯的希望，但忽略敵軍封鎖不計，光從地理上看都是夢想。西安與中蒙邊境最南端相差大約十個緯度，直線距離大約是 1100 公里，其間有幾百公里的沙漠，能活著穿越的人大概不到十分之一。若要向西逃往蘇聯人控制下的新疆，倖存的希望也十分渺茫。所以，北上很可能是快速自殺。而南下雖無發展前途，只能緩慢自斃，但畢竟沒有立即全軍覆沒的危險。

張國燾的論證說服了陳昌浩與徐向前，卻無法說服毛澤東。其時張國燾已被任命為紅軍總政委與軍委總負責，掌握了軍權。迫於他的壓力，毛澤東等人還被迫同意增補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鐘為候補中央委員[67]。這些人都是張的老部下。照這趨勢發展下去，則張國燾遲早要變成當仁不讓的全黨領袖。毛澤東絕對不能

坐視這情況發生，於是他便捏造了所謂“電報事件”，詭稱張國燾給陳昌浩、徐向前發了密電，“要堅決南下，否則就要徹底解決”[68]，騙得中央瞞著前敵指揮部，扔下了右路軍大部，只帶著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當時已經改為軍的建制），星夜出逃。[69]

逃到甘南迭部縣的俄界時，政治局召開了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宣稱：

“目前應經過遊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遊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更新裝備，再以“更大規模更大力量打過來”，只要能夠“保持（存）數百幹部，若干千的戰士……就是很大的勝利”，“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70]

這就是說，毛澤東準備靠只有五六千人的紅一、三軍，保護著中央委員們以及機關的老弱婦孺，逃往外蒙。其實他早就有了這個應急腹案。據張國燾說，毛在兩河口會議上就曾說：

“他說到寧夏去必須由四方面軍擔負掩護的責任，這樣，在最惡劣的情況下，也可以掩護中共中央和多數幹部安全到達寧夏地區。如果在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幹部，也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71]

很明顯，毛澤東認為此時已是“最惡劣的情況”，必須實施他早就擬好的緊急方案了。但這完全是自殺。從甘肅迭部縣到中

蒙邊境。實際路程約為 2500 公里，還必須在深秋穿過中國第二大、世界第四大的阿拉善大沙漠。當然，毛澤東也想到了這問題，那應急方案中說的是“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幹部……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那當然只可能是請蘇聯人派汽車來接。但那陣子中共和莫斯科斷了電訊聯繫，怎麼可能通知大老闆派車前來？因此，他這方案唯一的意義，便是再次暴露此人思慮之粗疏，常常忽略了至關重要的細節問題。而這疏忽可以是致命的。

然而毛澤東的運氣不是一般的好。紅一、三軍（改編為陝甘支隊）北上到達宕昌縣哈達鋪後，毛澤東從國民黨報紙上瞭解到，陝北有相當大的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於是政治局常委便在通渭縣榜羅鎮開會，決定改變俄界會議決議，不再逃往外蒙，改去投奔陝北蘇區[72]。1935 年 10 月 19 日，陝甘支隊與紅 15 軍團在陝北吳起鎮會師，毛澤東獲救了。

但毛澤東雖逃過了死在大漠上的厄運，卻跳進了監牢。事實證明，張國燾是對的。北上冒險還不如南下苟安。

如上所述，毛澤東等人反駁張國燾南下主張的理由是兩條，一曰沒有發展前途，二曰沒有戰略退路。然而與西康相比，陝北更沒有發展前途，更沒有戰略退路。

先看第一個問題。陝北蘇區有兩大特點，一是資源貧乏，人口稀少，無法養活多兵；二是四面受圍，無法向外發展。

據李德介紹，當時的陝北根據地約三、四萬平方公里，除瓦窯堡（今子長縣）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較大村鎮都被敵人佔據。就連紅軍佔據的唯一縣城瓦窯堡未幾也丟了（詳見後）。據他說，陝北蘇區是全國最貧瘠最落後的地區，人煙稀少，村莊相隔很遠，一般村子只有四五戶人家，較大的村子也不超過 12 戶，不僅缺吃少穿，有的地方還嚴重缺水。[73]

中共中央在向共產國際以及向四方面軍通報陝北蘇區的情況時也承認：

“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住之地，且北不出寧夏，東不出山西，亦無紅軍活動之餘地。目前陝北蘇區即已大爲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74]

“各縣論地情則山多，溝深林稀，水缺土質松，人戶少，交通運輸不便，不宜大部隊運動。人口總數只四十餘萬，蘇區內當紅軍的已超過三萬，物產一般貧乏，農產除小米外，小麥及雜糧均缺，不能供給大軍久駐。”[75]

楊尚昆回憶道：

“1935 年 12 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討論中，大家覺得陝甘根據地的面積太小，人口也很少。一軍團與十五軍團會師後已有一萬多人，糧食已快吃完，冬天到了需要棉衣，當地沒有棉花、不出棉布；同時，聽說四方面軍也快要出來了，陝甘根據地養不起這許多軍隊，必須發展根據地。向哪兒發展呢？北面是榆林沙漠、綏德有閻錫山的兩個師，西面和南面是中央軍和張學良的部隊，我們頂多只能到洛川和甘泉，也不容易發展，剩下一條路，只有向東面發展，就是過黃河到山西、河北去發展。當時有很大一部份同志，包括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和軍隊領導同志不贊成，普遍的情緒是不願離開根據地。……大家都希望休息一下，要求先鞏固再發展。但是，毛主席認為如果限制在陝北這種特定的環境下，生存都很困難，所以，不能以鞏固求發展，而只能以發展求鞏固。”[76]

所以，連偉大領袖都承認，他把紅軍領進了一個缺衣少糧、連基本生存都無法維持的“特定的環境”，說白了就是死地。

彭德懷也認為，因為經濟落後，交通不便，陝北是小紅軍的好根據地，但只是大紅軍的一個落腳點。那就是說，陝北只能容大軍暫時駐足，無法長期養活多兵。而且，陝北蘇區北面是沙漠，西面荒涼，人煙稀少，南面是東北軍和西北軍；且陳誠於洛陽及其以西控制三個軍，放在機動位置，專門對付紅軍；若向南發展，不但得撕毀與軍閥達成的秘密協議，跟盟軍打仗，還會把中央軍引進西北，加強對西北的控制[77]。

因此，紅軍要想擴張，只能向東或向西，但正如事實證明的那樣，無論是東征還是西征都是死路一條。因此，那“落腳點”其實是個陷阱，紅軍若上那兒去落腳，就再也出不來了。

而且，老彭所謂“大紅軍”，只是五六千人的陝甘支隊，其實是“小紅軍”。它之所以能在那兒落腳長達一年，全靠蔣介石認為“大紅軍”留在川邊，乃是圍剿重點。北逃的紅軍只是“一小部分”，只需留意不讓他們“回竄出來”即可，因此他只是讓張學良的東北軍與楊虎城的西北軍在南面駐防，自己則親赴成都指揮對四方面軍的圍剿[78]。但張、楊的軍隊戰鬥力既差，又都想保存實力，對紅軍消極防禦，後來更與共黨達成秘密互不侵犯協定[79]，因此陝甘支隊才能暫時落下腳來。

但等到“大紅軍”真的來落腳，二、四兩個方面軍也擠了進來。紅軍總人數劇增至七八萬，立即就出現了嚴重的生存危機。張國燾到達陝北後馬上就發現了這一點，他說：

> “河連灣一帶在陝北蘇區看來，是較富庶的地方，實際上仍人煙稀少，糧產有限，不易長期供應我們這支大軍。這裡的河水雖已不苦，但仍是黃土高原的組成部分，稀疏的村

落，糧食生產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綿羊為主，運輸多賴驢子。同志們大多認為這裡的糧產，還不及西康地區，甚至有人設想到，如果一年前我軍果真全部自毛兒蓋去到陝北，恐怕早就餓死人了。”[80]

確乎如此。二、四方面軍到達陝北後，馬上就陷於饑寒交迫之中，逼得中共不但向張學良大量借錢，而且絕望地向莫斯科呼救，讓王明趕快寄錢來買米下鍋，買衣禦寒[81]。如果紅軍當初不分裂，全軍在 1935 年 10 月就到了陝北，能熬過一年去麼？

“大紅軍”面臨的生存危機還不光是資源緊缺造成的，更是“小紅軍”原來得以苟安的局面立即就被打破了。全體紅軍集中到了陝北，再也沒有四方面軍那“大紅軍”在西康吸引蔣介石的注意力，陝北隨之成了國軍圍剿的重點，紅軍便再也無法靠張學良、楊虎城通敵賣放而苟安一時了。待到蔣介石督率各路軍隊開始認真圍剿陝北蘇區，紅軍便走到了窮途末路。此時陝北蘇區的第二個固有缺陷便凸顯出來：沒有戰略退路。

毛澤東當初力主北上，唯一的理由就是必須打通蘇聯，取得飛機大炮等“技術條件”。這個戰略計劃，其實是建立在一個普遍的錯覺上，那就是所謂的“西北”是邊疆。這其實是古代中國留下來的錯覺。但滿清入關後極大地擴大了中國的幅員，遼闊的蒙古首次進入中國版圖，使得西北再也不是邊疆而是內地了。從西安到中蒙邊境的緯度差，約等於西安與桂林之間的緯度差。陝北離蘇聯仍然很遠，紅軍要打到中蒙邊境去，根本就沒有可能。後來的事實證明，合三個方面軍的全力也沒能打通蘇聯。

因此，毛澤東所謂“戰略退路”，只存在於他的幻想之中，其實是他當年在長沙中師上學時，地理沒學好造成的幻覺。紅軍在走投無路時，根本無法如他所想的那樣往蘇聯逃。1936 年 11

月中旬，中共發動的寧夏戰役失敗，蘇區陷入危局，政治局為此在 11 月 13 日召開會議，決定放棄陝北再度突圍長征，後來甚至決定分散突圍（詳見下）。毛澤東原來鼓吹的戰略退路在哪里？

不難想見，如果張國燾在草地時聽了毛澤東的話，全體紅軍北上，早在 1935 年 10 月就到了陝北，那蔣介石就只會督率中央軍全力圍剿陝北蘇區。中共也就沒有時間勾結上東北軍。八萬多人困在那死地中，不是凍餓而死，便是被國軍圍殲。要想逃脫滅亡的命運，紅軍便只能如政治局在寧夏戰役失敗後計劃的那樣，再度進行長征，向山西或河南湖北等地流竄。在交通相對發達的內地長期流動作戰而不被圍殲，其可能性實在微乎其微。即使國軍不圍追堵截，兩次長征緊接在一起，走到後來紅軍也必然自行融化無遺。

所以，毛澤東的北上方針其實是自殺方針。之所以自殺未遂，完全是因為張學良割斷了絞索。西安事變一爆發，紅軍立刻就受益。張學良把東北軍集結在西安周圍，將延安、甘泉、富縣、洛川等縣送給紅軍，楊虎城則把靖邊至榆林一帶送給紅軍。紅軍未放一槍一彈，根據地就擴大了幾萬平方公里，居民幾乎增加到百萬人口。西安事變解決後，蔣介石把東北軍東調，將西北軍北調，留下的軍事真空則由共軍佔領，陝甘寧特區因此擴大到 23 個縣[82]。因此，陝北根據地的擴大，完全是張、楊和蔣介石聯手恩賜的。此後中共從第二次國共合作中發的橫財就更不必說了。

這就是毛澤東為何要坦承：“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了出來。”[83] 他沒說的是，是他把自己關進了監牢，還讓二、四方面軍也跟著跳了進去。

吊詭的是，張學良之所以能夠挺身出來挽救革命挽救黨，使毛澤東死裡逃生，竟然是紅軍分裂造成的。如上所述，因為紅軍分裂了，蔣介石把南下的“大紅軍”當成剿共重點，對北上的“小紅軍”則掉以輕心，沒有派出中央軍追剿，只要求駐防陝南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防止他們回竄。這就給了紅一方面軍一年的喘息時間，使得中共有可能勾結上張學良。如果當初紅軍全師北上，則蔣介石必將督率中央軍圍剿，張楊也就沒有與中共秘密談判的時間與空間，西安事變也就不會發生了。反過來，如果紅四方面軍始終停留在南方，則蔣介石就會一直把它當成重點，不會去西安督戰。由此可見，無論是四方面軍早北上或晚北上，西安事變都不會發生。此中遇合之巧，令後人反思時，不得不懷疑冥冥之中是否真有天意在焉。

這一系列事前毫無可能預知的偶然因素，打破了毛澤東的錯誤決策必然的致命惡果，使得毛澤東可以用偶然因素導致的成功，來證明自己當年神機妙算的偉大光榮正確。後人以最終結果來判斷當初決策的正確與否，因而跟著相信毛捏造的神話，卻沒有意識到，那結果只證明毛確有賭徒的膽量以及不可思議的好運氣，卻不能證明他當初的北上主張是正確的。

例如楊尚昆同志這段話就最典型：

> “如果紅軍當時按照張國燾的主張全部南下而不是北上，抗戰爆發時，紅軍還在四川和西康的邊界地區，即使沒有被國民黨軍隊消滅或者餓死，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抗日前線，迅速壯大實力，開闢廣大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產生巨大影響，在抗戰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的遠見卓識。以他為代表的黨中央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84]

讀者因為知道後事，都只會覺得這話說得非常之對：抗戰爆發後中共確實佔了地利——從陝北擴散到華北去，當然要比從西康出發容易。若共軍一直停留在西康，這種好事當然也就沒有了。

可就在同一部回憶錄中，尚昆同志曾介紹：

> “（1934 年）12 月 8 日，部隊行進到黔東的黎平，周恩來同志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接受毛主席的意見，通過《關於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目前在湘西創建根據地已經‘不可能’也‘不適宜’，新的根據地應（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這是紅軍戰略轉變的開始。從這時開始，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開始被排除。這次會議成為遵義會議的前奏。”[85]

先是打算創建“川黔邊根據地”，繼而是“川西根據地”，然後又是“川滇黔邊根據地”，這一系列破了產的戰略意圖，似乎都是毛澤東同志的主張，那是不是也是“毛澤東同志的遠見卓識”，是不是也證明了“以他為代表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若是他的計劃成功了，紅軍創建了西南根據地，後來能否從那兒“直接走上抗日前線，迅速壯大實力”？他的遠見卓識為何不在離開中央蘇區時就顯示出來，而要等到那些計劃失敗了才想到北上呢？

尚昆同志是過來人，自己就該知道，毛同志之所以要在草地提出北上，完全是因為在西南一再碰壁，對在那兒創建根據地喪失了信心，所以想逃到靠近蘇聯的地域，取得蘇製軍火，背靠蘇聯打過來而已。與四方面軍決裂後，這意願就變成了逃往外蒙，上文所引他在俄界會議上的發言就是鐵證。這用我黨的行話來說，乃是“對自力更生的革命喪失信心，實行逃跑主義”，能說

那是他預見到後來能從陝甘“直接走上抗日前線，迅速壯大實力”麼？

而且，尚昆自己就說：“在哈達鋪，我們才知道陝北有劉志丹的部隊，有一塊根據地。”[86] 在草地吵架那陣，毛連陝北有個根據地都不知道，哪來什麼預見到兩年後抗戰會爆發、因而決定把陝甘作為未來擴散的根據地的鬼話？就連日本人自己也沒這未卜先知的本事吧？就算毛能掐指算出此事，他又怎麼知道蔣介石會招安紅軍？而沒有假招安，共軍又怎麼可能擴散到華北去？用這來證明毛的高瞻遠矚，還不如說毛是故意以北上去觸發西安事變少搞笑些。

按楊尚昆同志和其他愛黨同志的邏輯，咱們同樣可以說，國燾同志率大紅軍滯留南方，吸引蔣介石的注意，讓北上的小紅軍有時間勾結上張楊，此後又北上陝甘，逼得蔣介石爲了追剿大紅軍不得不飛到西安去，致使西安事變發生所需的兩個必要條件都得到了滿足，確保了紅軍日後能“直接走上抗日前線，迅速壯大實力”，“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張國燾同志的遠見卓識。以他為代表的臨時中央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所以，用後來計劃外發生的事，去證明原計劃的正確，就什麼可笑的結論都能作出來，還能說得頭頭是道。毛主張北上的原計劃目的是“打通蘇聯”，但這目的非但沒有達到，反使全體紅軍陷入危局。因此，事實證明，他的計劃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只是一系列計劃外的偶然事件發生了，才讓中共逢凶化吉，但這並不能用來為其錯誤開脫。

第四章 陝北蠢動

一、顧頭不顧腚的東征

東征山西，是毛以兵變謊言煽惑中央北上，借此爬上實際上的掌門人地位之後，指揮的第一個重大軍事行動，它暴露了毛戰略構想的輕率與戰術指揮的無能。

毛澤東到達陝北後，立即發現他跳進了死地之中。既然陷入死地，毛澤東的考慮就只能是：第一，如何跳出去。第二，如何去蘇聯主子那兒搬兵。

湊巧的是，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林育英）恰在此時到達陝北。據李德估計，“他是在蘇區北部從飛機上跳傘下來的”[1]，當真是自天而降的天使，而且帶來了福音：上帝指示，主力紅軍可向西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2]

張聞天立即連續兩次致電在前線的毛澤東，主張根據斯大林建議，迅速準備經寧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術援助並建立更加鞏固的戰略根據地[3]。毛澤東回信說，他完全同意這方針，不同意的只是時間與途徑，“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以空前的努力去達此目的。第二，最好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開展用陝北蘇區不使我們

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為完成上述兩種任務，我想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我們應在明年夏天與秋天向外蒙靠近。”[4]

毛這考慮也有道理，如彭德懷在其自述中指出的那樣，陝北蘇區北面是沙漠，西面荒涼，人煙稀少，南面是東北軍和西北軍；若向南發展，不但得跟盟軍打仗，還會把中央軍引進西北，加強對西北的控制[5]。剩下來的選擇，也就只有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再北上攻入綏遠（如今的內蒙自治區在民國時從東到西劃為四個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綏遠省在今日內蒙自治區之中西部），然後打通蘇聯。

但毛澤東開出的時間表又暴露了他喜歡想入非非的性格缺陷：第一步，在陝北花四個月的時間擴大紅軍一萬人，第二步，花兩個月的時間攻入山西、綏遠，接通外蒙，完成兩個任務，一共只需要六個月左右的時間。

您說這是什麼夢話？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後，改名為紅一軍團，與原在當地的紅十五軍團合編為新的紅一方面軍。總兵力據李德當時給中央的報告是一萬三千，但其中有一半是新兵和三千俘虜兵[6]，這資料與彭德懷在自述中說的相同。就算在總人口不過 40 萬的蘇區竭澤而漁，抽空當地壯丁，再增加一萬名新兵，那老兵也才有約四分之一左右，這種隊伍能有什麼戰鬥力？就算中央軍不介入，能在兩個月內打敗總數十幾萬的閻錫山的晉軍與傅作義的綏遠軍，挺進到外蒙去麼？

然而毛澤東卻認定這是可行的。1935 年 12 月下旬，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毛在會上作了軍事報告，他強調指出，下一階段的全部工作內容，就是打通蘇聯和鞏固擴大蘇區，“打通蘇聯是中心口號，與鞏固和擴大蘇區聯繫起來。”這一目標分

三步走：第一步，在陝西擴大紅軍，鞏固蘇區，準備東征；第二步，進攻山西西部，擊破晉軍主力，進一步擴大紅軍，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第三步，轉進綏遠，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線。[7]

最邪門的還是，毛竟然主張將蘇區留給赤衛隊和少先隊保衛，主力傾巢而出去遠征。他認為，為了便於擴大紅軍，為了“靠近蘇聯”，即使損失了保衛蘇區的赤少隊，那也是“部分損失不要緊的”，“應該忍受”[8]，可見“靠近蘇聯”的誘惑對他的誘惑之大。據楊尚昆說，毛的打算其實是“脫離陝北，佔領太行山，然後向綏遠發展，背靠內蒙”。[9]

雖然李德在會上堅決反對，但中央卻批准了這一冒險計劃。不過，前線部隊指揮員比後方領導更清醒。他們吃夠了丟了根據地，萬里長竄，不能休整，無法補充損耗的苦頭，因此從一開頭就明確反對這計劃。彭德懷等人紛紛致電中央，指出這一戰略方針“是錯誤的”，不僅“帶有冒險成分”，而且可能“走到離開蘇區的危險”，請求“重新考慮”[10]。楊尚昆也說：“東征彭德懷不願意，林彪不願意，都是從這個地方來的。因為他們都瞭解毛主席的意圖，就是要脫離根據地，那時大家都怕脫離根據地。因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個安身之所，又要走，怎麼得了呢。”[11] 據李德從博古那兒聽到的消息，彭德懷諷刺這是以不足兵力繼續進行長征，王稼祥則擔心若軍事上過於激進，政治上很容易使自己脫離抗日群衆運動而陷於孤立[12]。據徐向前說，就連遠在甘孜的紅軍總司令部和四方面軍總部都向陝北中央建議，“陝北為紅軍活動的重要地區，東征紅軍不宜孤軍突出，脫離根據地，宜早日回到陝北為好”[13]。

因為將領們群起反對，張聞天、周恩來等人原來力主以打通蘇聯為中心任務，現在也意識到了保住根據地的重要性，轉而認

為保衛、鞏固和擴大蘇區才是第一位的戰略任務。李德更給中央寫了意見書，反對從綏遠接近外蒙，強調中共“應當避免能夠引起蘇－日衝突的行動”[14]，實際上是提醒中共斯大林的忌諱。於是中央此後在延長召開的軍事會議便修改原來的計劃，確定該年的軍事方針僅為擴大蘇區和紅軍，反對冒進和脫離現有根據地的危險。毛的戰略計劃中挺進綏遠的第三步被否決了。會議仍然決定東征山西，但那不再是為了靠近外蒙，而是為了籌餉擴軍。

事態發展果然證明了反對者們的正確。紅軍東渡黃河，攻入山西後，一開頭進展也倒頗順利，佔領了一系列重要城鎮。但不久中央軍隨即陸續進入山西，閻錫山也集中了 4 個縱隊反攻，奪回了大部分陷共的土地，此後湯恩伯所部中央軍和晉軍數路人馬更節節推進，把紅軍全部壓到黃河東岸永和一帶狹小地區。紅軍面臨著喪失根據地，孤軍被包圍在黃河東岸的可能。此時就連毛都看出了危險，只好灰溜溜地渡過黃河撤了回去。雖然紅軍在山西大肆擄掠，解決了一時的糧餉問題並擴充了兵力，但換來的是戰鬥力極強的中央軍從此進入山西，如果那約 30 團的中央軍尾追過黃河，勢必給蘇區帶來致命威脅。為蠅頭小利而陷入戰略上的被動，此乃兵家大忌，而據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卻偏偏幹出來了。

當然，東征沒有導致全軍覆沒，但這並非毛的功勞，而是幾個因素造成的：

首先，我黨的運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好：正當毛籌措東征之際，彭德懷恰好勾結上了東北軍軍頭王以哲，張學良由此開始通共，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蘇區後方的安全。紅軍主力出動後，周恩來留下看家，手下只有兩三千人。全靠與張學良的秘密協定和楊虎城的無所作為，只有民團襲擊蘇區，才保住了蘇區平安無

事。但誰都能看出，這一因素根本就難以控制，把生存希望押在其上，大概只有瘋狂的賭徒才會幹。

其次，中央集體抵制了毛“挺進綏遠”的第三步計劃，把東征任務限於籌餉、擴軍、擴土的有限戰術目標。據楊尚昆說，“實際上毛主席提出的這個主張大家都不贊成。所以後來毛主席就改了。東征是走一步看一步”[15]。如果不是這樣，則紅軍在入晉之初進展順利之時，毛必然要忙著走那第三步，千里躍進大綏遠。等到中央軍入晉後，便能輕而易舉地截斷其後路，使紅軍失去根據地的依托。此時就算張學良通敵賣放，那也救不了困在大漠之中的流寇了。由此看來，延長會議還真是救了紅軍的命。

最後一個因素則是戰事未能如毛澤東指望的那樣如意進展。據楊尚昆說，雖然中央集體抵制了脫離陝北，挺進綏遠的計劃，但毛並沒有放棄他的主張，後來是因為沒有能按計劃打勝仗，又因國民黨想與中共合作，中央這才決定回頭。[16]

就算這一切不發生，紅軍如意挺進到了綏遠，並擊敗了名將傅作義的軍隊，靠近外蒙擴大蘇區，挾俄械俄餉赤化北中國，那也必然要引起日本人的強烈反彈，說不定真要如李德警告的一樣，引出日蘇衝突來，苟如此，則中國倒是可以免了八年抗戰的戰禍，而我黨當然也就沒有今天了。

然而毛澤東總結的失敗教訓卻大異其趣，他居然說什麼：“此次失著是太謹慎，未能立即出河北，我們未過黃河前對閻錫山估計太高”，在汾河西岸過於猶豫，沒有下決心東進到晉東南去。紅旗一旦插到京漢鐵路，情況必定大大不同。[17]這就是說，東征失敗，不是因為根本戰略方針就是冒險的賭博，而是因為那賭博還不夠膽大！

您說這是什麼瘋話？紅旗真要插到京漢鐵路去，則我黨立即成了過街老鼠。其時日本業已佔領了東北全境，正在向華北著著進逼，引起全國人民對於亡國滅種的極大恐慌，抗日救國的呼聲高入雲天。紅軍卻悍然把內戰打到華北戰略要地去，與日寇裡應外合，夾擊國軍。中國人民特別是弱智知識份子們就算再愚蠢，諒來也不至於蠢到能坐視這種赤裸裸的漢奸禍國行為吧？

這是從政治上說，從軍事上看，這愚昧似乎也不下於後來的“大躍進”。紅軍主力真要突進到華北，勢必成了徹底脫離根據地的孤軍。別說是精銳的中央軍，就是閻老西也能輕而易舉地截斷它和陝北蘇區的聯繫。此時紅軍陷入一馬平川的“四戰之地”，絕無可能立足下來建立新根據地，只會被圍殲。所以，毛所謂“失著”，其實是無意中的救命之著。

戰略大師毛澤東為何會想出這餿主意來？李德認為，毛的意圖是引起日本侵犯，威脅到南京政府存亡，將蘇聯拉入衝突，他好趁機漁利。李的根據是：毛在 1923 年中共三大上表示，中國革命只有通過蘇俄支援的軍事鬥爭才能取得勝利；1930 年毛支持李立三，企圖把蘇聯拉入與帝國主義、特別是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衝突中去；毛從 1935 年以來一再重複的具體計劃是，通過中國紅軍向新疆或蒙古的進軍，首先把蘇聯拉入與國民黨的衝突中，然後再使蘇聯與日本發生衝突，如此等等。[18]

這推測當然有一定道理，毛打通蘇聯的目的，就是想獲得蘇聯援助。挺進到外蒙去，不但能接受大量蘇聯援助，而且確有可能引發蘇聯與國府的衝突。若蘇聯像“教訓”張學良那樣出兵進攻中國，毛就能實現他早在黨的三大上就提出的“請蘇俄出兵從外蒙打進來”的夢想。

但他是否想觸發日蘇戰爭？我看未必。他不會忘記李立三就是栽在這上頭的，知道斯大林的忌諱，不至於再去重蹈覆轍。後來在與中共的秘密談判中，國府請紅軍開赴察哈爾、綏遠與外蒙的邊境地帶，毛澤東還因此舉會“導火日蘇戰爭”而予以拒絕[19]。所以，如果說毛想挑起兩虎相鬥，坐收卞莊刺虎之利，那也是對著國府的——或是挑起蘇聯與國府的衝突，或是挑起日本人大肆入侵中國，無論是哪種情況發生，他都是唯一的受益者。對此他已經在初到陝北後就說得明明白白了：

> “開闢我們的蘇區到晉陝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完成與外蒙及蘇聯打成一片的任務。在那時，我們便可以爭取更大的力量，給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革命（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遠的）與進攻蘇聯，國民黨各派軍閥進攻北方紅軍與進攻全國紅軍，以空前的大打擊，爭取蘇維埃在北方七八個省內、南方若干個省內的偉大勝利。”[20]

這段話同時也暴露了毛好大喜功、喜歡冒險的痼疾（用我黨的行話來說便是“左傾冒險主義”），完全是癡人說夢：明明給困在陝北死地動彈不得，朝不保夕，卻幻想在短期內打開局面，“爭取蘇維埃在北方七八個省內、南方若干個省內的偉大勝利”！我們將在後文看到，毛對放棄根據地，跳出外線，大刀闊斧開闢轟轟烈烈大局面的大手筆似乎情有獨鍾，可以說是成了一種情結。東征山西不過是這情結的第一次發作而已。

不過也必須承認，從軍事的觀點來看，東征山西雖是敗筆，但在政治上，毛還是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目的。李德認為，東征煽起了內戰戰火，迫使國府調軍西征，把地盤讓給了日本人，為日本人擴大侵略提供藉口，加強了國府內部親日分子的勢力，中國不僅要失掉察哈爾和河北，還要失掉綏遠與山西[21]。此說確有

道理，東征的直接後果是日軍在華北的勢力急劇擴大，為“華北自治運動”推波助瀾，使得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最終導致日本全面侵犯中國，使得毛澤東“坐山觀虎鬥”、借力打力的美夢終於成真。

東征山西也暴露了毛作為前敵指揮員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思慮粗放，沒有耐心去精密計劃，也缺乏把籠統打算化為實際行動的組織能力，因而“顧頭不顧腚”。這缺陷給時任一方面軍（當時改稱“抗日先鋒軍”）司令員的彭德懷留下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以致他在幾十年後寫坦白交代時，還忍不住要指出這一點：

> “一九三六年，大約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電報，決定東渡黃河，奪取呂梁山脈，開闢新根據地。我接到軍委這個指示後，是擁護毛主席這一決定的，但是內心有兩點顧慮：一是怕渡不過去。當時紅軍在大疲勞之後，體質還很弱；且人數也少，包括劉志丹、徐海東兩部分才一萬三千餘人。如受挫而強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東渡黃河後，在蔣軍大增援下，要保證能夠撤回陝北根據地。在這一點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覆電同意外，還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東渡黃河是必要的，但須絕對保證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繫。我這種想法，反映了當時紅軍體質弱的實際情況以及長征中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教訓。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興，他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
>
> 我隨毛主席到無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後，即率電臺去無定河口上下游各數十里，詳細偵察渡河點。我用了七個晚上偵察了一軍團和十五軍團的兩處渡河點，也偵察了敵情。不僅瞭解了敵人表面的工事構築、兵力火力配備，而且真實掌握了敵人的縱深配備以求既保證東渡取得勝利，又準備形勢萬

一變化，能安全撤回陝北。我到預定渡河點時，才造好十五隻船，每船乘三十人，來往一次需要一小時二十分鐘。全軍一萬四千人，還有行李、伙食擔子、馬匹等，這樣少的船隻，是無法保證東渡勝利，和萬一情況變化下回師的安全的。即決心組織地方黨、政、民全力以赴，根據掌握的每渡一次來回的時間，星夜趕造百隻船。每船配備三至四個船工，對船工加強政治動員和組織訓練。這才有了東渡的勝利保證，和必要時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絕對保證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繫，就成了空話。一軍團和十五軍團渡點正面守敵各不到一個營，其縱深也只有留譽鎮、石樓各一個營，都離河岸三十至四十里。待敵縱深部隊到達河岸時，我之戰鬥部隊即可全部渡完。

我在黃河邊做了一個多月這樣的準備工作。做了詳細的偵察工作，把對岸每一個碉堡敵人的兵力、火力配備，預備隊位置都弄清楚了；選擇了適當的渡河點，大體保證了渡河的準確性。這樣細緻的組織、偵察工作，對那次東渡的保證是沒有白費的。在我軍火力弱，尤其無炮火掩護下，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在執行軍委指示時，親自詳細偵察，進行各種渡河準備，是非常重要的。我回到大相村，向主席彙報了各項準備工作的情況，渡河地點、時間得到了批准。強渡很順利，兩處渡點均已登岸，幾乎沒有什麼傷亡。”[22]

在歌頌了一番東征的偉大勝利後，他沒敢再提“奪取呂梁山脈，開闢新根據地”那茬，便以“當敵軍迫近河岸，我軍早已準備大量船隻勝利地、安全地撤回陝北”結束。但誰都能聽出他的弦外之音：若不是他下了大功夫“絕對保證同陝北根據地的聯

繫”，則紅軍不是在東渡黃河時遭受重大傷亡，就是過去就回不來了。毛之“顧頭不顧腚”戰役設想方式，於茲可見一斑。

這和國燾的作風可是兩回事。四方面軍放棄川北根據地，西進策應中央紅軍時，必須強渡嘉陵江。嘉陵江面寬闊，水深流急，兩岸多為懸崖峭壁，川軍鄧錫侯與田頌堯兩部據險設防，紅軍裝備落後，要強渡很困難。張國燾親自組織指揮這次行動，親自審定各個可能的渡口，最後選定在蒼溪縣城附近渡江。張的軍事顧問們都不以為然，蓋此地江面甚寬，對岸又有重兵駐守。但他認為，正因為此，敵軍才不會想到紅軍在此渡江，可以攻其不備。他們組織了一個特別工兵營，趕制了百多隻小船，船頭以沙包作掩護工事，每船可載 12 名戰士。用這些船在離蒼溪 50 里的地方訓練官兵，同時修建從該地到蒼溪的道路，再用人力將這些船運過高山，搬到蒼溪附近的一條小河溝中去隱蔽起來。臨渡江時，敵軍得到了情報，高級將領一直在密切監視對岸，但沒發現任何行動，也未見任何船隻。敵軍於是以為情報不可靠，放鬆了警惕。哪知到了深夜三點鐘，隱蔽在小河溝中的百多隻小船一齊出動，直駛對岸。先頭部隊很順利地就奪下了灘頭陣地，大隊跟進，接連攻下對岸的所有制高點，並將奪得的敵軍扣留的大量船隻建成浮橋，使得大軍順利通過。[23]

這可不是老張賣瓜，自賣自誇。徐向前對此役的介紹與張的大致相同，他也強調選擇渡江地點的主要考慮正是那兒江面寬闊，敵人不會想到紅軍會在那兒渡江。不僅如此，他還承認“三月二十八日夜，我們下達了渡江命令。我和張國燾都在塔子山附近，直接指揮”[24]。反倒是老張說渡江戰役發動時，徐正在率部從儀隴前線後撤，他和陳昌浩是後來在劍閣與張國燾會合的[25]。由此看來，老張不大可能冒老徐之功，老徐倒有分功之嫌。

由此看來，張國燾雖然玩陰謀詭計絕非偉大領袖對手，政客心理素質更是沒法跟毛相比，但作為軍事家，老張可能要比老毛稱職些。

二、幾乎葬送全體紅軍的西征

紅軍剛從山西渡河撤回陝北根據地，偉大領袖又立即發動了西征。如東征一樣，這個軍事決策最能暴露偉大領袖的性格毛病：急功近利，過於操切，以致不顧主客觀條件限制，想入非非，再加上賭徒氣質太重，便常常為了宏大目標不惜孤注一擲，所謂“敢想敢說敢幹”。西征就是這不顧實力急於求成的“左性”表現。

據官修黨史，西征的命令是 1936 年 5 月 18 日下的，目的是“爲著極力擴大西北抗日根據地並使之鞏固，爲著擴大抗日紅軍，爲著更加接近外蒙和蘇聯，爲著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團聚”[26]。除了擴大根據地外，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更加接近外蒙和蘇聯”，那才是偉大領袖自從跳入陝北死地後一直念念不忘的中心任務。陝北蘇區北部是無法穿越的沙漠，要打通蘇聯，只能要麼向東取道山西進入綏遠，要麼向西取道寧夏、綏遠或取道青海、甘肅、新疆。東邊既然走不通，那就到西邊試試去。偉大領袖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得很明白：“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有二：一是寧夏及綏遠西這一條路，……二是甘、涼、肅三州。”[27] 無論是走哪條路，都得先佔領甘北。這就是西征的由來，它後來發展為著名的寧夏戰役。

於是一方面軍兩個軍團由彭德懷率領，分為左右兩路，進攻甘肅北部。主力出動後，蘇區便由紅 29 軍與 30 軍負責保衛。這

兩支部隊可不是紅四方面那兩支番號相同的主力部隊，剛由地方獨立團擴編而成，談不上什麼戰鬥力。

如所周知，我軍的編制從來是主力部隊、地方部隊、遊擊隊／赤衛隊（民兵）三級結構。主力部隊承擔重大作戰任務，地方部隊則用於守衛根據地。當時中共已與東北軍秘密達成停火協定，在此特殊情況下主力部隊遠出，全靠地方部隊守衛蘇區，按說也無關係。問題是偉大領袖剛剛東征歸來，而東征的偉大成果就是把中央軍引進了閻老西原來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山西，此刻正跟著撤退的紅軍前來，而偉大領袖居然也就忘了那茬。

這結果便是備受李德嘲笑的瓦窯堡（今子長縣）的陷落。他在回憶錄中說：

> “（一九三六年）五月底，駐紮在榆林的國民黨第八十六師乘一方面軍遠在西部和蘇區相對無防禦之機，進行了突然襲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出現在瓦窯堡城前，所有的中央機關都在這裡，但幾乎沒有軍隊防守。在毛的指示下，城市不戰而棄，人員倉卒撤退，例如我就是在撤退前一個小時才得到出發的命令的。所有的機關都轉移到保安，我們是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才到達那裡的。這件事實在太丟醜了，以致瓦窯堡再也不作為臨時紅都而被人所提起了。”[28]

這事楊奎松教授在其獨立研究中詳細介紹過。瓦窯堡是當時陝北根據地內唯一的縣城[29]，因此自然也就成了所謂“紅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京城。中共自恃東北軍不會來犯，再加上紅軍主力傾巢西去，也實在沒有什麼兵力，於是該城一帶極度空虛，而駐紮在該處的中共機關人員也非常麻痹。不料通共的東北軍 67 軍軍長王以哲適逢有事離開軍部，西北剿總內的親國民黨軍官趁機給 67 軍兩個師長下了命令，令他們北上進攻瓦窯

堡。東北軍 107 師當即攻佔瓦窯堡南部的蟠龍鎮。中共設在該地的醫院、黨校等若干機關都落入該師手中。東北軍 117 師也攻佔了瓦窯堡東南的永坪鎮。

蟠龍鎮距瓦窯堡只有 20 公里左右，而永坪距瓦窯堡還不到此數，中共自然極度震動。周恩來急忙致電王以哲，請他下令制止部下前進，王以哲倒是同意了，奈何 107 師師長劉翰東堅持要向瓦窯堡挺進，請紅軍“給予方便”。前去交涉的李克農火燒眉毛不顧一切，為了說服劉翰東，竟向他出示了周恩來與王以哲的往來密電，令王以哲過後得知極為不滿。不料劉翰東見了密電後仍不買賬，他告訴李克農，中央軍湯恩伯部正從山西大舉前來，瓦窯堡反正是守不住的，紅軍不如假作抵抗，將瓦窯堡暗送給他們算了。全靠王以哲直接下了軍令，東北軍才退出了永坪和蟠龍。

此時瓦窯堡已經三面受敵：南有東北軍，北有高雙成的 86 師（原馮玉祥西北軍系），東北方向的綏德有中央軍湯恩伯部，而紅軍主力遠在甘北，鞭長不及馬腹，該城註定要陷落。於是毛澤東便下令駐紮在該城的中央機關悉數撤往西部的保安（今志丹縣，當時只是個小鎮），並決定將瓦窯堡當成人情送給東北軍。王以哲便按中共建議，向西北剿總謊報 67 軍攻佔了偽都瓦窯堡。

不料瓦窯堡尚未移交給東北軍之時，周恩來發現從山西攻入的中央軍湯恩伯部只有兩個團，於是將防守瓦窯堡的全部紅軍調往綏德方向，準備抗擊湯軍，瓦窯堡徹底成了空城。駐守在該城西北約 20 公里處的石灣鎮的高雙成部兩個營便乘虛而入，於 1936 年 6 月 19 日輕鬆愉快地佔領了該城。周恩來只好趕快把準

備抗擊湯恩伯部的紅軍調回去，圍攻瓦窯堡，卻又因缺乏攻城重火器，只能望城興歎。

楊尚昆在其回憶錄中生動描寫了國軍衝入瓦窯堡時，中共領導狼狽出逃的情景：

> “我和林彪、羅瑞卿幾個人在城牆上看著敵人衝來，非常著急。這時，毛主席正在睡覺，周恩來同志身邊也沒有兵。幸好還埋伏著一個連，就靠他們抵擋了一下。我們就把毛主席叫起來，匆忙地撤出瓦窯堡。我沒有弄到馬騎，周恩來看到後，大聲嚷道你們哪個給楊副主任一匹馬呀！可是，那時亂糟糟地誰也顧不上，我就一口氣走了 15 里路，非常狼狽。就這樣從瓦窯堡撤到保安。東北軍前線部隊對這件事也很不滿意，說你們講好把瓦窯堡讓給我們的，讓我們緩一兩天，結果你們丟掉了，給國民黨地方部隊鑽了空子。”[30]

可憐王以哲白白通共一場，到手的人情又飛了，還害得他向西北剿總虛報戰功，聲稱攻佔了瓦窯堡，最後卻被高雙成部佔領了，其煩惱可知。那位攻佔了蟠龍鎮又不得不撤出的 107 師師長劉翰東更是暴跳如雷：當初在蟠龍時，他就勸李克農把那人情送給他，可惜中共不幹，最後卻落到了高雙成手中。為了安撫他，李克農建議他趕快去增援守城的高雙成部，紅軍再撤圍，以讓他掙個“解圍”之功。但這豈能抵得上攻佔偽都之功？劉翰東乃回信大罵：“弟在蟠龍與兄見面時，曾再三聲明：‘要送人情，必須乾脆！’而貴方一再延遲，竟將良好機會，坐送他人！……此事乃貴我雙方最大之損失也！！！”[31]

這些吃醋吵鬧也不去說它了。瓦窯堡之失，根本原因還是毛澤東顧頭不顧腚的“空城計”戰略。當初他率紅軍全師東征，只給周恩來留下兩三千人防守根據地，幸虧東北軍和西北軍都沒來

打，只有民團竄擾，堪稱僥天之倖。但天才軍事家總不能把走運當成制定戰略計劃的前提吧？這次紅軍主力又傾巢西向，瓦窯堡本該是戰略後方，卻成了三面受敵的前線凸出部。若湯恩伯不是只派出兩個團，而是將進入山西的 30 團兵力全部集結起來，渡過黃河，掃蕩紅軍空虛的戰略後方，則西征軍前有黃河，後有敵軍，進退失據，必將陷入絕境。毛主席用兵真如賭，於茲可見一斑。

然而毛澤東為了打通蘇聯，什麼都能豁出去。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後，改稱紅一軍團，與原在陝北的紅十五軍團合編為新的一方面軍，總兵力只有一萬三千人左右。兵力如此單薄，難免顧此失彼，按理說本該耐心等到二、四方面軍北上後，再合力去打通蘇聯。但偉大領袖等不及，竟然將此任務交給一方面軍，在給彭的電報中明確規定：“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全軍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而這一任務是必須一及十五軍團擔負。”甚至要彭德懷考慮在七月下半月即開始搶奪船隻，準備西渡黃河。[32]

區區一萬三千人，要在半年內完成這任務，搶渡黃河，或經寧夏、綏遠西北上進到外蒙，或沿“甘、涼、肅三州”（今張掖、武威、酒泉）河西走廊，進到新疆去，就算能辦到，那根據地誰來守衛？莫非中央再來一次狼狽出逃？

這計劃之荒唐，使得彭德懷不能不再次犯顏直諫。他回電指出，紅軍現有兵力無法兼顧打通蘇聯與保衛蘇區的雙重任務，因此他建議，先花一個月鞏固西征新佔領的甘北地區，過後再考慮打通蘇聯、接取軍火的問題[33]。

這本是常識範圍內的事：若按毛澤東的計劃，紅軍不待鞏固新佔領的甘北地區，便貿然渡過黃河，就算東北軍西北軍不來打，甚至馬家軍也不來打，已經進入山西的中央軍跟進陝北，抄

了紅軍的戰略後方又該怎麼辦？那時紅軍困在黃河西岸，就算能立下足來，新佔領的地區總不如老根據地有地利人和，更容易保衛吧？更何況據徐向前說，黃河西岸十分荒涼，人戶稀少，糧缺水鹹，地形開闊，堡寨稀疏，不便紅軍集結隱蔽，却利於敵騎兵的運動和突擊。紅軍三面臨敵，背靠黃河，如試圖停下來開闢根據地，則固勢必處於被動挨打、有耗無補、進退無路的地位[34]；若北上去外蒙，就得横穿阿拉善大沙漠，根本就不可能；若是沿河西走廊挺進新疆，那就是提前走上西路軍那條路。區別只在於西路軍算是偏師，主力還留在陝甘北，而毛的計劃可是全師遠征，就算不被馬家軍全殲，一旦渡河進入河西走廊後，便再也來不及回救陝北了，只能把後方的黨中央留給老天爺照看。國軍就是只派一個師，也能輕鬆愉快地掃蕩了那“小國空巢”。偉大領袖的名言是“從最壞處著眼，向最好處努力”，他為何終生無法實踐這自己總結出來的人生哲學呢？

這妄想到底太荒唐，以致連偉大領袖自己後來都意識到了，不能不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承認：

> “目前，關於接運物資的困難尚須解決，新疆、外蒙出兵並解決運輸路線，即擬向遠方提出交涉。非達到這一層，我們即使到達了寧夏或甘、涼、肅，也是沒用的，因為我們不能向新、蒙去搬東西。”[35]

毛澤東是說：必須由駐紮在新疆（當時蘇聯在哈密有駐軍）或是外蒙的蘇軍發兵，長途押運蘇聯提供的軍火，將其交給中共，否則即使中國紅軍打到了寧夏或是張掖－武威－酒泉一線，也是沒用的，因為紅軍並沒本事從那兒出發去新疆或外蒙，把大批軍火搬運回來。

這段話最能彰顯偉大統帥顧頭不顧腚、“革命者頂天立地勇往直前”的特點，非常非常搞笑：既然明知紅軍沒本事前去新疆或外蒙把軍火搬運回來，必須由蘇聯派兵武裝押運，那起碼得先落實了這事，再考慮自家發兵攻佔寧夏或張掖、武威、酒泉一帶吧？否則冒著丟失根據地的危險，萬里征戰打到了那些地方，蘇軍不把軍火運來，那又有什麼意思？這應該是凡智力正常的庸人都能想到的事吧？

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不但偉大領袖沒想到落實這成功前提，就連整個中央也沒想到。1934 年中央蘇區陷落後，莫斯科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繫即中斷。毛澤東先後發動東征與西征，是在與莫斯科的電訊恢復之前，唯一的依據就是被蘇聯空投入陝北的林育英帶來的口信：“主力紅軍可向西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直到 1936 年 7 月，莫斯科與陝北中央的電訊聯繫才恢復。1936 年 8 月 21 日，洛甫才正式向莫斯科彙報了紅軍向寧夏和甘肅西部擴張，以接運蘇聯軍火的作戰計劃，9 月 11 日獲得國際回電批准。但雙方竟然未在電訊中敲定軍火交接的具體問題，莫斯科的電報只是說：“在中國紅軍佔領寧夏後，……將軍火於 1936 年 12 月前集中於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界。在作出將之運往寧夏的安排後，通過某家在烏魯木齊（？）的外國商行售出。”[36] 這電文相當含混，並未說明由何方負責作出運輸安排，在哪兒交貨，但仍然透露了斯大林不想直接介入的意圖，而毛澤東居然也就不澄清有關細節，更不請求新疆或外蒙發兵押運，便匆忙發動了旨在攻佔綏遠定遠營（今內蒙阿拉善左旗）的寧夏戰役。

遲至 10 月 2 日，中共中央才向共產國際提出請求，要蘇蒙軍隊押運軍火，盡可能深入中國境內。但在此問題得到落實之

前，毛澤東便迫不及待，於 10 月 13 日致電彭德懷，要各方面軍作好渡河和攻擊寧夏的準備，還要彭德懷“充分注意個別同志之可能的動搖性。準備在無別部參加時，野戰軍單獨執行冰期計劃”[37]。那意思是，即使“個別同志”張國燾不願讓四方面軍參加行動，一方面軍也要按原計劃渡過黃河，佔領寧夏，接引蘇援。

然而共產國際卻於 18 日電告中共，外蒙不能派兵押運，“否則將等於對某國戰爭的開始”。為此莫斯科特地找了一家外國公司，負責賣貨並運送到外蒙邊境，但不能超過外蒙邊境一百公里。因此中共必須派出足夠的軍隊去外蒙邊境接收貨物，並承擔沿途保護的責任。[38]

這就是說，要獲得蘇援，紅軍佔領了定遠營還不夠，還必須挺進到外蒙邊界去。要去定遠營，必須通過騰格里大沙漠，據徐向前說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隊缺糧、缺水、缺駱駝，很難完成任務[39]。定遠營北面還有烏蘭布和沙漠。大軍連續穿越兩個沙漠，進到外蒙邊界，再掉頭穿過兩個沙漠，把上千噸軍火搬運回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因此，整個寧夏戰役計劃不過是空中樓閣。但毛澤東依然將三個方面軍都投入了該戰役。10 月 24 日，紅四方面軍開始在靖遠渡口渡過黃河。同日，中共中央緊急致電共產國際，請求蘇方把汽車隊開到定遠營來，並提供金錢資助，以解決軍隊的冬衣問題以及在國內購買軍火。[40]

然而這一請求卻被莫斯科無情拒絕了。11 月間，日本人指使偽蒙軍侵犯綏遠東部，中日關係更加惡化，綏遠抗戰即將爆發，這讓本來就害怕“某國”的斯大林更怕引火焚身，於是他令共產國際於 11 月 3 日給中共下令，“堅決認為從外蒙幫助的方

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1）在嚴冬和沙漠的環境下，你們派數千紅軍到外蒙邊境護送運輸是不可能的；（2）日本飛機對汽車及紅軍有轟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衝突可能。因此，現在已經決定目前不採用從外蒙幫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方法。如我們將約一千噸貨物運到哈密，你們有無可能佔領甘肅來接收？並請通知接受辦法以及你們將採用何種具體方式運輸。”[41]

這些技術問題，應該早在事前就敲定，哪有戰役發動之後才來討論的？然而偉大領袖那偉大而空洞的腦袋中不乏浪漫幻想，卻從來裝不進技術細節去。在他看來，需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接近蘇聯”即可，至於怎麼挺進到國境線上去，飛機大炮到手後又怎麼把它們搬運回來，誰去操作那些高科技產品，這些瑣碎細節從來在偉人視線之外。

正因為沒有考慮這些問題，整個西征包括寧夏戰役在內，都成了毫無意義的蠢動。幸虧中央於 11 月 4 日收到莫斯科的電報時，寧夏戰役已經失敗，否則若紅軍按計劃挺進到了定遠營再挨這當頭一棒，那滋味可是夠受的。好在這“學費”也沒白交，中央總算發現了那些技術問題，於是電告莫斯科：“除非你們用汽車送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里無人煙的沙漠。”[42]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如果早在發動西征之前，毛澤東便想到後來遇上的一系列技術問題，告訴莫斯科自己沒本事去國境線上取貨，要求蘇軍將軍火押運到中國內地，最好直接送到陝北來，那莫斯科就會及時告訴中共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必須避免任何可能招致與“某國”衝突的事件，這樣不是就可以省去後來種種瞎折騰了麼？

寧夏戰役之愚蠢，還不限於它的整個戰略目標只不過是毛澤東一廂情願的假定，更在於毛的部署不但使得紅二、四方面軍蒙受了巨大損失，而且使得整個紅軍陷入無從解救的危局，幾乎斷送了中共革命。在我黨歷史上還從未有過這種因統帥的錯誤指揮而幾乎斷送整個紅軍的先例。毛澤東的豐功偉業，超過了他咒罵的歷次“機會主義路線頭子”盲動成果的總和。

寧夏戰役發動前，1936 年 8 月間，紅二、四方面軍來到甘南，連克漳縣、洮州舊城、洮州、渭源等縣。紅四方面軍原擬趁虛向東南發展，中央卻告訴他們，中央已與張學良商定了“西北大聯合”的秘密計劃，要他們盡可能奪取岷州，以甘南為臨時根據地，休整補充，準備下一步由三個方面軍合力奪取寧夏，打通蘇聯，根據這一指示，陳昌浩便指揮紅軍攻打岷州，卻久攻未下。

此後因東北軍久無動作，中央又改了計劃，要二方面軍在甘南、甘中策應，以四方面軍獨力進取青海及甘西，聯繫新疆邊境，詢問他們有無把握。徐向前覺得獨力取甘西無問題，正欲動手，兩廣事變卻已和平解決，胡宗南部回開蘭州。於是中央又令他們停在當地，把甘南陝南發展為戰略根據地，和陝甘北根據地相呼應，並將西歸的胡宗南部擋在甘肅以東，準備冬季打通蘇聯。[43]

9 月 14 日，毛澤東等人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謂：“國際來電同意佔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佔領寧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後佔領寧夏”，其部署是：紅一方面軍主力於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攻取靈武、金積地區（今寧夏靈武市、吳忠市一帶），十二月渡河佔領寧夏北部；紅四方面軍以主力立即佔領隆德、靜寧、會寧、通

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西安－蘭州公路），阻止胡宗南西進，十月或十一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綫，十二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紅二方面軍在陝甘邊積極活動，吸引胡宗南於咸陽、平涼之綫以南地區，與紅四方面軍互相策應；四方面軍的主要任務是控制西蘭大道，阻止胡宗南西進，再由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二方面軍則在西蘭大道以南鉗制敵軍。待到佔領了寧夏，取得國際幫助後，再分兵略取甘肅西部。[44]

這個計劃的實質是：四、二方面軍在南面負責阻擊中央軍，掩護一方面軍北上接貨。一方面軍要攻佔的靈武，距離定遠營只有 300 多里，當然能搶在四方面軍前頭接到蘇聯軍火。何況毛已經規定，接貨不是四方面軍的任務："紅四方面軍佔領寧夏南部後，應頓住幾個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45]。至於部隊能否在冰天雪地中跨越大漠，那自然不在偉大領袖的計算之中。

此時胡宗南部正源源西進，陳昌浩大概覺得光是四方面軍頂不住，於是提出集中四方面軍主力，伺機北出通渭、靜寧、會寧，與一方面軍南北夾擊西進的胡宗南部。朱德和張國燾都同意了該計劃，但徐向前不贊成。他認為紅軍將在西（安）蘭（州）公路附近與敵決戰，敵人運輸方便，調兵迅速，紅軍南北夾擊不成，反會遭到敵人左右夾擊。而且，三個方面軍都向陝甘北集中，那裡人口稀少，無法養活大軍。他建議主力西進，渡過黃河，進據古浪、永登、紅城子一帶，與駐蘭州的東北軍配合，控制這一戰略樞紐地區，休整補充，以策應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寧夏，打通蘇聯。[46]

然而毛卻批准了陳的計劃，理由是胡宗南"企圖壓迫與削弱紅軍，隔斷中蘇，隔斷東北軍與紅軍，然後強迫我們就範，成立妥協"，因此，他擬的對策是：第一步，集合三個方面軍於靜

寧、會寧、定西一線及其南北，給胡宗南以相當打擊，使其不能達到隔斷紅軍、各個擊破的企圖；第二步，以兩個方面軍佔領寧夏，以一個方面軍控制胡宗南；第三步，佔領寧夏，取得蘇聯軍火後，分兵略取甘西、綏遠。[47]

但他又迅即變卦，說一方面軍兵力有限，必須固守現有根據地，因此決定只派出紅一師向靜寧、會寧一帶出動，策應四方面軍主力北進，在通渭、莊浪、靜寧、會寧地區迎敵。這樣，原定由一、四方面軍主力南北夾擊敵人，現在卻成了四方面軍北進到西安－蘭州的通道地區，獨立迎擊胡宗南部。當時西蘭公路業已修通。紅軍南北向運動，遠不如國軍東西運兵迅捷，毛本人早在 9 月 17 日就曾通報彭德懷："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陸續西運，甚速。"[48] 紅軍在有公路的地域作戰，無從發揮運動戰特長，很容易遭到國軍東西夾擊。徐向前明知這一仗很難打，但也只好準備硬著頭皮幹。[49]

張國燾也看出了這問題，於是主張四方面軍西渡黃河，進據古浪、紅城子一帶，伺機策應一方面軍渡河，奪取寧夏，實現冬季打通蘇聯的計劃。這其實就是徐向前提過但被否決了的那個計劃，但這次四方面軍大多數領導人都贊同，徐向前認為："這個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區同敵人决戰；二是吸引胡敵南向，減輕了對一方面軍的壓力；三是並不違背中央關於兩軍先取寧夏、後取甘西的戰略企圖；四是便於解决四方面軍的就糧問題。"於是他們決定以一個軍從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搶佔永登、紅城子地區作立腳點；以一個軍暫在黃河渡口附近活動，吸引和牽制青海的馬步芳敵；以兩個軍繼續布於漳縣、岷州地帶，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後這三個軍再渡河北進。主力出靖

遠、中衛方向，配合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寧夏。於是張國燾一面起草電報向中央報告，一面令部隊開始行動。[50]

這計劃遠比毛的高明。四方面軍有造船部隊，李先念就是木匠出身，用不著等到黃河結冰。那時胡宗南部尚未西歸，循化、永靖一帶空虛，全軍渡河不是問題。蔣介石從來把四方面軍當成主力，注意力都集中在該軍上。紅四面軍過河後，蔣怕他們北上或西進打通蘇聯，必然要投入大部份兵力追擊攔阻，就無法合圍河東的紅軍，一方面軍也就有可能在中衛渡河。即使不能，四方面軍也把國軍引入了沒有公路的地域，利於發揮自家的運動戰特長，有可能擊敗強敵，在甘西、寧夏一帶建立根據地，與陝北根據地互為犄角之勢。那就不至於如後來那樣，三個方面軍被鐵壁合圍在一個狹小地帶，延頸待斃。

然而毛澤東卻否決了這合理計劃。此前彭德懷就曾以密電向他進過讒言，說張國燾的目的是四方面軍在黃河、洮河間活動，以迴避胡宗南，使該敵全力對付我一方面軍，破壞打通國際計劃，還反說完全同意國際指示。他所說由永靖渡黃河搶佔永登，一部出中衛援助一方面軍奪取寧夏，這完全是鬼話，事實上很少可能，云云[51]。毛也懷疑張國燾想讓一方面軍去作炮灰。於是在張國燾再次提出這計劃後，毛即致電彭德懷，說張國燾“所謂一部出中衛策應，恐是空中樓閣”，次日即致電朱德、張國燾等：“中央明令已下，請速令通渭部隊仍回佔通渭，其餘跟即北上。”[52] 堅持要他們在靜寧、會寧一線迎擊胡宗南部。

彭德懷與毛澤東作此陰暗猜疑也很自然，蓋他們自己就專幹這種坑害兄弟部隊的事。前已述及，陝甘支隊的政委是毛澤東，司令是彭德懷，副司令是林彪，但公開佈告只用彭德懷和楊尚昆署名。毛還特地交代楊尚昆，這是爲了讓國民黨以為只是三軍團

出來了[53]，明擺著是要讓國軍把注意力放在四方面軍頭上。只是他們這猜疑實在可笑：蔣從來都把四方面軍當成紅軍主力，張國燾又怎麼可能“迴避胡宗南，使該敵全力對付我一方面軍”？後來紅四方面軍的一半渡河後，蔣介石以為紅軍大部都已西進，忙著去追，連毛澤東都承認了這一點：“蔣介石以我軍大部西渡，東岸所餘不多，令胡宗南猛追。胡令周祥初、孔令恂兩師向打拉池急進。關麟征師向靖遠追擊，毛炳文、王均部尾其後，似不會全部北進。”[54] 可見張國燾說的並非“鬼話”，此策確有兵法所謂“分敵”之功。

毛既以中央名義明令禁止四方面軍西進，張國燾只好服從。9 月 29 日，紅四方面軍總部重新下達北進命令，準備北上執行靜會計劃，在西蘭通道地區抗擊胡宗南部。但 10 月 3 日，四方面軍竟然丟失了該戰役計劃。張國燾臨機應變，決定改變部署，以四方面軍主力先機搶佔黃河東岸，在靖遠渡河。此前毛爲了說動四方面軍為他阻擊胡宗南部，曾允諾四方面軍北上後可以“從靖遠渡河，一方面軍跟即渡河”[55]，此時不便反悔，只好批准了。於是四方面軍搶在國軍之前通過西蘭大道，於 24 日開始渡河。10 月 31 日，中央軍關麟征師搶佔了靖遠渡口，河東紅軍已無可能渡河，被迫東撤，紅四方面軍從此被分割為兩部。寧夏戰役至此失敗。

此役之所以慘敗，完全是毛澤東堅持要四方面軍北上，在西安－蘭州通道地區阻擊胡宗南部造成的。他只想讓四方面軍為他堵住西進的中央軍，確保一方面軍攻取寧夏北部，接引蘇援，卻無視徐向前看出的兩大嚴重問題：首先是選定的戰場正處在西蘭通道地區，利於國軍東西對進，不利於紅軍南北夾擊，光靠四方

面軍完成這任務就更困難了；其次是全體紅軍擠進極度貧窮的陝甘北，給養必成嚴重問題。

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徐向前的預見一點都不錯。主席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原定戰役目標一個也沒達到：打仗迭遭重創，國軍籍交通便利，迅速推進，勢不可擋，接連給紅軍以沉重打擊。二方面軍受損嚴重，幾乎徹底喪失戰鬥力，四方面軍的紅 5 軍遭到敵機狂轟濫炸，傷亡高達三分之一，紅 4 軍與 31 軍也節節敗退；渡河也只渡了個半拉子——30 軍、9 軍、5 軍兩萬多人渡過河西，就此被隔斷。留在河東的餘部與一、二方面軍一道陷入國軍鐵壁合圍，被壓縮在定邊、鹽池以南，豫旺堡以東，曲子鎮以北的狹小地段。

自紅軍起事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面臨全軍覆沒。政治局為此在 11 月 13 日召開會議，決定放棄陝北再度突圍長征，於當日電告共產國際，因寧夏戰役失敗，“在河東之主力軍不得不改變行動方向，現擬第一步從慶陽、鎮原、合水南下，佔領平涼、涇川、長武、分州、正寧、寧縣等戰略機動地區，之後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視情況再定”。[56]

然而事態很快就惡化到連這一設想都無法實施了。7 天後，張聞天向國際報警：“紅軍主力在現地區不利作戰時將被迫恐怕得準備分路遠出，去支持相當長時期的遊擊戰爭。”[57] 可見情勢已經惡化到了紅軍只能化整為零，分散突圍，去打小股遊擊戰爭的嚴重地步。

幸虧次日紅軍即發動山城堡（今甘肅環縣境內）戰役，在該地伏擊了胡部一個旅，殲滅其大半。但這並不能緩解紅軍嚴重的生存危機。如徐向前、張國燾早就預見到的那樣，三個方面軍的人馬全都擠進陝甘北貧瘠的死地中，衣食立即成了難題。幾萬紅

軍戰士衣食無著，饑寒交迫，洛甫不得不急如星火地連連向莫斯科催款："你們多延遲一天，則紅軍餓死凍斃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你們答應十一月底在滬交款，究竟實行了沒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給了孫夫人？我們派人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飛機到滬取款，決不可使落空，八九萬人靠此吃飯！"[58]

軍事上的危局也並未因此小勝而被扭轉。連彭德懷都承認："胡宗南並不死心，率四個旅為左路向鹽池、定邊前進；王均、毛炳文兩軍為中路，向吳起、志丹（保安）前進；東北軍為右路向華池方向前進。"[59] 此時整個紅軍的主力都集中在蘇區西部，離中央所在地保安直線距離一百多公里。就算西部的紅軍主力能頂住胡宗南的進攻，王均、毛炳文部也輕易即可重演 86 師兩個營便攻佔瓦窯堡故事，彈指而下空城保安，掃蕩紅軍空虛的"戰略後方"，再與胡宗南部東西夾擊紅軍，則紅軍縱是大羅金仙，也難逃全軍覆沒的命運。偉大領袖的高聚焦隧道眼，把紅軍領入了絕境。

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張學良毅然挺身出來挽救革命挽救黨。徐向前披露：

> "我黨與友軍聯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計劃，因蔣介石親臨西安大力'剿共'，已瀕臨'流產'危局。加之，當時陝甘寧邊的數萬紅軍，在敵人重兵封鎖下，缺衣少糧，難以過冬，不得不準備進行新的戰略轉移。部隊開動前，我黨向張學良作了通報。張學良力主紅軍留在現地，'熬過一、二個月'，等待西北局勢的變化。因此，中央才推遲了'新計劃'的執行，令李富春、李維漢等緊急籌集一個月的軍糧，

並著西路軍停止西進，在永涼地區創立根據地，作爲一支戰略機動力量，待機策應河東。”[60]

還沒熬上一個月，20 多天後，西安事變就爆發了，“西北局勢”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黨死裡逃生，毛澤東一手造出來的危局被少帥輕鬆化解了，而他的昏悖指揮幾乎毀滅了全黨全軍的醜事，也就此沒能暴露出來。看來吉人自有天相，天才軍事家就是可以把走運當作制定戰略計劃的前提，顧頭不顧腚毫無關係，自有上天照看他的寶臀。

當然，出於權勢崇拜或成功崇拜心理，國人未必能接受這危局是偉大領袖的智力缺陷造成的，多半會用陰謀論來解釋這西征蠢動。例如毛聲稱一方面軍兵力有限，必須固守現有根據地，因此決定只派出紅一師配合行動，使得靜會戰役完全落在四方面軍一家身上[61]。這非常不符合偉大領袖顧頭不顧腚，動輒準備扔下根據地作驚天一博的一貫性格，令人不能不懷疑他是否也看到了徐帥看到的問題，亦即預定作戰地域處於西安－蘭州大道上，容易受到敵軍東西夾擊，因而故意讓四方面軍跳進那陷阱。

然而這看來還主要是個智力問題。毛之所以反悔，小算盤我看還是兩個，一個上面已經說了，他和彭德懷生怕四方面軍西進，讓胡宗南的打擊完全落在一方面軍頭上，因此反其道而行之，逼張部去為他的嫡系擋刀。另一個則是想奪得蘇聯軍火的支配權。最初的戰役計劃就是為此制定的。後來他雖一度同意由一、四方面軍南北夾擊胡宗南部，但又迅即變卦，只派一個師參加該戰役，實際上又回到了“四方面軍負責阻擊，一方面軍負責接貨”的原計劃。待到四方面軍覺得難以獨力阻擊中央軍，意欲西進時，他極度焦灼，不是說：“毛、胡將先據樂都，且將先據永登、涼州，遮斷其西進路，所謂一部出中衛策應，恐是空中樓

閣”，就是說：“西進將被限制於青海一角，爾後行動困難，且妨礙寧夏計劃”。這些話都非常可笑：毛炳文、胡宗南等部那時在固原、隆德一綫，怎麼可能搶在四方面軍前頭佔據永登與張掖？後來阻擊西路軍的是馬家軍，根本就不是中央軍；四方面軍被限制在青海一角也是扯淡：進入河西走廊後，若要進入青海，就得翻越祁連山。張國燾忙著去接軍火，怎會幹這種事？只會一鼓作氣打到哈密。

這可能才是毛真正的擔憂所在，捨此無法理解他那奇特的焦灼——若那真是出於對四方面軍前途的擔憂，那他後來對陷入絕境的西路軍極度冷漠又如何解釋？只是後來在形格勢禁之下，他被迫同意 30 軍和 9 軍渡河，於是河西紅軍便有可能搶先到達定遠營。然而即使是在此時，彭德懷仍想按原計劃行事，讓其他兩軍為他們阻敵，自己則搶在前頭去摘桃子，致電毛澤東：“部署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渡河後向蘭州北岸永登、景泰擴大佔領區，兩個軍抗擊會寧追擊之敵。二方面軍應逐漸向沛干池抗擊六營、七營之敵。一方面軍主力仍集中於王家團莊、高崖子、同心城。以金積、靈武之線為主渡點，中寧、中衛為次渡點。”[62] 倒是毛還知道一方面軍鞭長莫及——黃河都還沒渡過去，一方面軍又沒造船隊伍，怎麼可能去搶佔河西的定遠營？他因此電告彭：“九軍必須佔定遠營，這是接物攻寧的戰略樞紐，不應以一方面軍去佔，不便利，又失時機。”[63] 但這不過是對既成事實無可奈何的追認罷了。

當然，想壟斷與蘇聯的聯繫，確保自己的霸主地位不受挑戰也很自然，未足深責。更何況在陷入陝北那種毫無發展空間的死地之後，“打通蘇聯”便成了毛乃至整個中央能死死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在這種情況下，利令智昏幾乎是必然的。在發動整個

戰役前，中央竟無一人想到必須先落實接貨地點，就是這種絕望導致躁狂的明證。就是為此，毛才會在紅四方面軍北上之前，就幾次想讓一方面軍獨力打通蘇聯。在四、二方面軍北上後，他低估國軍戰力，誤以為靠兩支部隊即能堵住西進的中央軍，也就很自然了。追本溯源，這一系列昏招，都是為了彌補當初在草地上定下來的北上戰略方針的根本錯誤而使出來的。

問題是，即使假定蘇聯人同意把軍火押運到定遠營，紅軍也有能力穿越騰格里大沙漠，毛的部署也是錯誤的。他的錯誤是想把好事都佔全了：敵人讓雜牌去打，軍火讓嫡系去接，卻不想想雜牌若是給打垮了，下一個就輪到自己了。真正高明的自肥之道，還是讓紅四方面軍在甘南時就渡河西進，引走敵軍，再令一方面軍踏冰過河，去定遠營把軍火人揹肩扛弄回來。此時四方面軍必定陷入與馬家軍和追兵的鏖戰中，未必顧得上跟毛爭軍火。毛見不及此，卻認定“先打胡敵，後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堅持要四方面軍北上。要這麼辦，就該合全軍之力消滅胡宗南部。可他卻又捨不得損耗嫡系，把硬仗全派給二、四方面軍，令兩軍統統擠進地瘠人貧的死地，於是不但迭遭戰敗，為國軍提供了聚紅軍而殲之的便利，更讓兩軍與一方面軍爭食，為自己造成了嚴重的生存危機，真是愚不可及。

毛堅持要三個方面軍合在一起，也有可能是爲了吞併張國燾的部隊。四方面軍北上後，他迅即令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委，負責制定戰役計劃以及前線指揮[64]，架空了紅軍總司令朱德與總政委張國燾。這權術果然也奏效了，張國燾就曾在其回憶錄裡抱怨他因此失去了軍權[65]。然而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若不是張學良救黨於滅頂，紅軍只能分散突圍，終將被徹底消滅，那時

毛巧取豪奪來的軍權又在哪裡？因此，這厚黑學的偉大勝利，說到底還是張少帥為他掙來的。

三、斷送西路軍

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同志指出：“西路軍的兩萬多人，遭到幾乎全軍覆滅的命運，在我軍歷史上，絕無僅有。”他認為原因有三：第一，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它雖與風雲變幻的全局形勢有關，但戰略指導上的失誤造成了西路軍孤軍深入河西走廊，長期遭敵重兵圍困的被動局面。疲兵屢戰，有耗無補，進退失據，一籌莫展。第二，中央的錯誤決策，使得西路軍渡河後不久便喪失戰場主動權，轉為被動挨打，直至最後被消滅。第三，中央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而陳昌浩因“犯了路線錯誤”而顧慮重重，自始至終緊跟中央，使西路軍失去戰機，作繭自縛，步步被動，直至不堪收拾[66]。說白了，共軍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慘敗，是毛澤東同志一手造成的。

有人覺得，毛澤東用兵如神，不至於犯下這一系列錯誤，因此認定毛是故意置西路軍於死地，借國軍之手剝奪張國燾的實力。這似乎也有依據，例如毛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

> “爲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却主義的‘張國燾路綫’。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綫的最後破産。”[67]

該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標明的寫作時間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題注還說：

“據著者說，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戰略進攻、政治工作及其他問題，因為西安事變發生，沒有工夫再寫，就擱筆了。這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線反對另一個路線的意見。”[68]

這就是說，該文是在 1936 年 12 月 12 日以前寫出來的。但毛死後，黨內有人試圖為西路軍平反，於是《毛澤東軍事文集》在收入該文時，注解中便多了一段話：

“一九三六年七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後，由於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並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於同年十月到達甘肅會寧。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69]

這其實是告訴讀者：第一，四方面軍渡河是奉中央軍委指示，西路軍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下令組建的，不是什麼“張國燾退卻路線”；第二，毛寫作該文時，西路軍並未失敗（事實上，西安事變發生後，西路軍還在以永昌城裡慶祝[70]），那句話是毛爲了證明他一貫正確，偽造歷史，在西路軍覆滅後加進去的。

但這只是毛偽造歷史文過飾非的證據，並不能證明毛借刀殺人，蓄意坑害西路軍。在我看來，西路軍之所以覆滅，原因是：第一，寧夏戰役的總方針就錯了，執行這一方針的西路軍當然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第二，毛“崽賣爺田不心痛”，在計劃第二次

長征時，以西路軍作誘餌吸引國軍主力，犧牲雜牌，丟卒保車；在西路軍兩次求援時無情拒絕，直至該軍陷入絕境後才象徵性地派出援軍，還生怕把援軍也搭進去，要他們到黃河邊就止步。第三，毛的“外線病”發作，不知道外線作戰與內線作戰的區別，也不知道“叫化子打狗”只能“邊打邊跑”，不可能立下腳跟來，卻要西路軍在狹窄的河西走廊裡與強敵日日鏖戰的同時建立根據地。第四，毛對西路軍將領猜忌提防。陳昌浩身為中央軍委主席團成員[71]，卻對中央意圖一無所知，無從主動配合全局戰略。毛還萬里遙制，拒絕聽取西路軍領導的意見，使得他們毫無臨機處置權，明知是死路也只有蹚進去。第五，西安事變前後形勢變幻多端，毛顧慮重重，又無長遠考慮，因而舉棋不定，朝令夕改，令西路軍忽西忽東，忽行忽止，多次錯失戰機，始終被動挨打，直至最後毀滅。

以上除了第一條是我的理解外，其餘都寫在徐向前的《歷史的回顧》第十四章《血戰河西走廊》（501-564 頁）中，幸虧他死在毛之後，才有可能使蒙了幾十年的冤屈大白於天下。下文所引史料除注明者外，都出自該章，不再一一注明。

前文已經介紹過，四方面軍西渡黃河是寧夏戰役的一部份，而該戰役的整個計劃都是空中樓閣。

如前所述，毛發起這戰役的依據，是“國際來電同意佔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佔領寧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72]。既然莫斯科有此指示，那張國燾想從永靖、循化一帶渡河西進，哪怕真是去佔領甘肅西部，也就不能稱為“退卻主義”——無論是西進還是北上，都是去領軍火，只有難易之分，並無原則之別。

姑不論北上後來被斯大林否決，光從地理條件來看，西進也比北上相對容易。如上所述，北上進到外蒙邊境，要穿過中國第二大沙漠阿拉善大沙漠。據徐向前說，光是穿過定遠營以南的騰格里大沙漠就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隊缺糧、缺水、缺駱駝，很難完成任務。而西進路途較遠，必須穿過馬家軍防守的河西走廊，在酒泉與哈密之間還有一段戈壁灘（哈順戈壁[古稱“莫賀延磧”]東面的一段），但那不像內蒙的阿拉善大沙漠，自古以來就是交通要道（絲綢之路的一段）。當年左宗棠出征新疆，部將劉錦棠率大軍從肅州（酒泉）出發，很順利地就走到了哈密。自盛世才被蘇軍用刺刀端上新疆王的寶座後，新疆已淪為蘇聯殖民地，哈密有蘇聯駐軍。以紅四方面軍五個軍的實力，有可能像徐向前建議的那樣，趁馬家軍尚未反應過來，迅速進到嘉峪關以西，接通新疆取得軍火後，再“背靠新疆，打開戰局，控制河西地帶，那就不單是一時策應河東局勢的問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進程，亦必將發生積極的影響。八路軍就不止編制三個師。盛世才後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萬一哈順戈壁真是難以通過，請駐哈密的蘇軍開車將軍火送過來就是了。只要紅軍如徐向前建議的那樣，扼守住嘉峪關、玉門、安西（今瓜州縣）、敦煌等要地，那片地域就與新疆連在一起，蘇軍可以為所欲為。因為不會刺激日本，斯大林一定會同意，後來蘇聯也確實同意將軍火送到安西[73]。只是西路軍毀滅了，蘇聯才把那批軍火給了盛世才[74]。

即使按毛的計劃，先佔領寧夏，再北上接取蘇聯軍火，那也非得渡河不可。此前因兩廣事變，胡宗南部東調，西北空虛，正是渡河良機。若紅四方面軍搶在胡部西歸前輕鬆渡河，吸引分散

了國軍，河東紅軍也不會像後來那樣陷入重圍、瀕於滅頂，無計可施，只能準備再度突圍長竄了。

然而毛澤東卻極怕紅四方面軍西進，於 9 月 27 日以中央名義明令四方面軍北上，使得渡河推遲了將近一個月。直到 10 月 24 日，四方面軍的 30 軍才開始渡河。毛原來同意 9 軍接著渡河，但 9 軍開到河邊後毛又改了主意，令其去阻擊胡宗南，致使 9 軍在河邊白白耽誤了一天。26 日，毛又批准 9 軍渡河。28 日拂曉，30 軍、9 軍以及四方面軍指揮部全部過河。29 日，毛同意 31 軍過河，等到 31 軍於次日開到河邊後，毛卻又接受彭德懷建議，令其折向麻春堡開進。因中央軍關麟征師進逼靖遠，負責看守渡口的 5 軍只好匆忙渡河。31 日，渡口被國軍佔領，紅軍就此被分割在黃河兩岸。

指揮如此顛三倒四姑不論，問題更在於渡過去的三個軍根本就沒事幹，毛只能讓他們“休息待機”。這是因為去定遠營領取軍火的戰略目標不過是毛一廂情願，莫斯科從未同意過把軍火送到那兒去。相反，早在 9 月 18 日，共產國際就已令中共自己去外蒙邊境接貨，而定遠營和蒙古邊境之間還隔著烏蘭布和沙漠。11 月 3 日，莫斯科更通知中共不從外蒙送貨，要中共到哈密去接貨[75]。至此，寧夏戰役的戰略目標徹底落空。上文已經說過，如果毛先向莫斯科核實接貨地點，則寧夏戰役根本就不必發動。

按毛的命令開進陝甘的二、四方面軍超出了當地供養能力，陷入重圍的河東紅軍飢寒交迫，危在旦夕。11 月 8 日，中央軍委提出了《作戰新計劃》，準備東進山西。若在山西無法立足，就開始第二次長征，歷經冀豫晋、直魯豫、皖魯、鄂豫皖、鄂豫陝等地，再轉回西北，如此全國武裝旅遊一圈，“以一年至兩年全成之。目的在於擴大政治影響，擴大紅軍，爭取統一戰綫在全

國勝利，爭取與南京訂立協定，爭取抗日”，“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爲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

11 月 13 日，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放棄陝北，再度突圍長征，並於當日將計劃電告共產國際[76]。毛在政治局會議上作結論時明確指出：紅軍行動方向主要是向東，預計明春過黃河。四方面軍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調回來是個問題。現在我們的行動，都是脚踏兩邊船，最好是，向西的還是向西，向東的還是向東。如果向西不能達到目的，當然可以轉向東。[77]

徐向前說：“顯然，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戰略變動。不僅放弃了寧夏戰役計劃，而且改變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個方針、部署。據此，河東主力紅軍開始進行脫離陝甘寧根據地的準備。對於如此重大的變動，我們事前事後均一無所知，直到近幾年才弄清楚。”所謂“近幾年”，也就是 80 年代。儘管中共當時通報了黨外人士張學良，卻瞞了西路軍領導 40 多年，陳昌浩到死都給蒙在鼓裡。

河西紅軍在渡河後，佔據了一條山一帶（在甘肅景泰縣），“休息待機”，很快就失去了先手，遭到馬家軍進攻。11 月 15 日，毛周致電徐陳，同意他們向涼州（武威）進發，並告知：新疆接濟正準備中[78]。西路軍於 11 月 9 日開始西進，於 18-21 日到涼州、永昌一帶。但中央迅即電示：“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鞏固根據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門方向活動，在有利條件下消滅由古浪來敵，大部向涼州、永昌前進之敵，同時以一部奪取甘州、肅州至安西一帶地區，並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動，迷惑敵人，使敵疑我西路軍主力由民勤經定遠營配合陝甘企圖。”

徐向前說：山丹、永昌、涼州一帶，不論從地形、給養、民情、敵情條件來說，都不容紅軍持久立足，與敵周旋。他們蹲在那里不進不退，正給敵人以進擊之機，“從二十二日起，馬敵不斷向我發起大規模的進攻，我軍在東起涼州四十里鋪、西至山丹約三百餘里的地段上，艱苦鏖戰”。幾十年後他才明白，“當時令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建立根據地的主要企圖，是爲了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像，調動蔣介石的兵力扼控黃河，以便河東主力紅軍東出或南出，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據說蔣介石確實中了計，判斷陝甘紅軍“企圖在黃河將近結冰時，突竄甘、新、蒙地區與徐部會合”，趕忙調兵向黃河沿岸集結，準備殲滅“西竄”紅軍。

徐向前於是向中央報告了一系列困難：那一帶地形開闊，區域狹小，無樹木房屋，有許多堡壘，不便進行運動戰，敵軍是騎兵，進退迅速，紅軍勝難繳獲，敗則喪命，人員彈藥有損耗無補充，最後說：“我們現無能集優勢兵力，彈藥太少，難在甘東地區滅敵。如何速示。”但中央仍要他們就地堅持，他們只好硬著頭皮堅持下去。從 11 月 22 日至西安事變爆發，西路軍無日不戰，蒙受重大損失，由過河時的兩萬一千八百人減至一萬五千人。

西安事變爆發後，毛死裡逃生，不必再丟卒保車了，於是又令他們西進，“打通遠方”，限次年一月奪取甘州（張掖）與肅州（酒泉）。西路軍剛要行動，毛又應張學良要求，要他們東進，保衛東北軍後方。他們抗辯無效，剛開始秘密調動兵力，西安事變已和平解決，西路軍的任務又變為搶地盤。徐向前說：

> “從戰略上著眼，當時紅軍亟需得一人口稠密、物資豐富、靠近蘇聯、利於回旋的戰略基地，以便養精蓄銳，擴大

力量，擔負起偉大的抗日鬥爭任務。中央一致認爲，這個基地，以黃河以西的蘭州、涼州、甘州、肅州及寧夏地區，最爲理想。西路軍控制河西走廊，進據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黨名正言順地向蔣介石‘討價還價’，索取河西地帶的‘資本’。”

於是軍委於 12 月 27 日命令：“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佔領甘、肅二州，一部佔領安西。”月底，西路軍再次西進，先後攻佔高台與臨澤。此時國共談判出現僵局，毛害怕中央軍進攻陝甘，想以西路軍為援軍，於是又電令：“西路軍即在高台、臨澤地區集結，暫時勿再西進；……全靠你們自己團結奮鬥，爭取勝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79] 西路軍此時四面受敵，處境艱危，只好請中央派出原四方面軍的 4 軍與 31 軍來援。中央拒絕了，要他們“團結一致，緊縮編制，人自爲戰，堅决殲敵，獨立完成任務”。數萬馬家軍迅即追踪而至。西路軍陷入重圍，高台、臨澤相繼被攻破，5 軍被全殲，董振堂授首，全軍一萬餘人退守倪家營子。

此時中央又連續來電，命令西路軍東進。這是一則因為毛提防內戰再起，再則因為中共當時要求紅軍駐蘭州、涼州（武威）、肅州（酒泉）、寧夏地域，而蔣介石則要求陝甘紅軍駐渭水以北，西路軍處涼州以西。因此，“西路軍主力如能消滅馬敵一部，東進涼州，乃是我黨與蔣談判紅軍駐地問題的口實。”因蔣不同意紅軍駐陝南，毛就想調西路軍主力東返渡河，奪取甘南地區，作爲策應渭水以北部隊的戰略要地，迫蔣認可。“因此西路軍的東進目標，第一步爲涼州，第二步將視我黨與蔣談判的進展情況而定”。

馬家軍發現紅軍意欲東進，以七萬餘人日夜圍攻倪家營子。西路軍傷亡慘重。戰至二月中旬，毛怕惹惱蔣介石導致談判破裂，電令西路軍放弃東進計劃，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堅持，粉碎馬家軍的進攻，適時完成西進任務。西路軍領導提出，二馬與我拼戰不止。如上級不派四軍、三十一軍來援，打擊二馬實力，則西路軍難以完成西進任務。在現地堅持一段時間後，只好東出青海大通、西寧一帶活動，解決部隊的補充問題，伺機再圖發展。中央回電斥道：“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呢？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爲今後的勝利是與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徐向前因嘆道：“南下期間，我們的確犯了錯誤，欠了賬。把西路軍的行動方向與過去的‘政治錯誤’聯到一起，誰還能動彈？！”

眼見形勢危殆萬分，徐向前乃在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上提出自救東返，大家一致贊成。2 月 21 日，西路軍從倪家營子突圍而出，急速東進。馬步芳的騎兵旅和憲兵團尾追不舍，被 30 軍殺“回馬槍”，擊潰騎兵旅，全殲憲兵團，共繳槍一千二百餘支及大批軍用物資。但陳昌浩覺得東進違反了中央指示，怕以後挨整，又提出返回倪家營子。中央恰於此時來電：“甲、固守五十天。乙、我們正用各種有效方法援助你們。”

於是西路軍只好在業已突圍而出後，又自投羅網，重返倪家營子，再次陷入敵人重兵圍攻中。此時倪家營子已被敵軍洗劫一空，只剩斷垣殘壁。經七晝夜血戰，待援無望，軍政委員會乃一致决定再次突圍，沿祁連山向東轉移，並不斷向中央告急，請求速派援兵。

但當時國共和談協議行將達成，毛生怕簽不了字，為維持和局不惜坐視雜牌部隊毀滅。他的營救措施，就是讓周恩來求蔣介石命令馬家軍停止進攻，並於 2 月 27 日決定組建援西軍。徐向前披露："援西軍的組成，帶有向蔣介石施加壓力的性質，它的行動，以不影響和談大局爲限。"換言之，那不過是個向蔣施壓的姿態而已。毛特地規定了兩個原則：第一，如南京令二馬停戰，援西軍即中道停止。第二，不要把援西軍又貼進去。因此，即使蔣介石同意援西軍西進，也"只能控制黃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軍，共返東岸。"第二條特別搞笑：西路軍當時距黃河西岸三四千里，控制那兒又怎能"接出西路軍"？直到 3 月 9 日，西路軍危在旦夕時，他還電告周恩來，囑其"全力用政治方法解決，並須速解免去軍事增援爲上策"！[80]

西路軍從倪家營子再次突圍而出後，不久又被大批追敵包圍，再度血戰突圍後，只剩三千多人。此時中央軍委電示："你們現已處於特殊情況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所能解決問題"，爲保存現有力量，建議或率現存三團人員向蒙古邊境衝去，或率現存三團人員打游擊戰爭[81]。這兩條路都是死路：衝向蒙古邊境要進入巴丹吉林沙漠，而在河西走廊裡打遊擊戰立即就要被消滅。西路軍殘部於是退入祁連山中，但又被追兵趕上。軍政委員會於此決定，由陳昌浩與徐向前離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彙報情況，剩下的人編為三個支隊，就地遊擊。後來兩個支隊都被消滅，只有李先念那個支隊沿祁連山西進，經四十多天風雪轉戰，歷盡千苦萬苦，終於抵達新疆，最後剩下來的只有七、八百人。其中西路軍參謀長李特與 5 軍政委黃超九死一生逃到新疆後，還被王明下令槍決了。

西路軍的覆滅，到底有多少由客觀形勢決定，有多少是毛出於對非嫡系部隊的猜忌、冷漠，因而見死不救，甚至為了“丟卒保車”，令其困守乃至自蹈死地造成的，又有多少是毛缺乏軍事才能使然？

徐向前雖然沒有點毛的名，但明確指出那是毛缺乏長遠戰略眼光的結果。他同意，西路軍的“一切行動，均應服從和服務於策應河東紅軍與友軍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應才更符合實際情況，更有利於全局發展，指導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結局會大不一樣。“可惜的是，當時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致使西進的戰機完全喪失。西路軍的行動，步步以河東形勢的暫時需要爲轉移，缺乏戰略性的久遠安排。這樣雖對河東的紅軍和友軍，起到了一時的策應作用，却畢竟招致了西路軍覆滅的不幸結局。”

這其實是說：該不該丟卒，取決於對全局的長遠考慮。他認為，若按他當時的主張，將“卒”拱到底，挺進到新疆，那就變成了“車”（我這是借用西洋象棋作比喻）：“西路軍過了黃河，如果不在一條山蹲那麼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據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關，把玉門、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勢會大不一樣的。一是有飯吃，不挨餓；二是有衣穿，不挨凍；三是有槍炮、彈藥補充，有廣闊回旋餘地。說實在話，西路軍只要有個炮兵團，馬家軍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們打的。西路軍先打到西邊，取得補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於失敗的，至少也不會敗得那樣慘。”

前已指出，“在一條山蹲那麼久”，是因為毛事前沒有與大老闆商定接貨地點，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派西路軍去定遠營。這的確蠢不可言，無法原諒。但“在永昌、山丹搞根據地”則是爲了

誘騙蔣介石把重兵放到黃河岸邊去，以便河東紅軍東向突圍。據徐向前說，此策確實奏效了，因此也還說得過去。當然，這對西路軍比較殘忍，但本書討論的是毛的軍事才能，其心術不在考慮範圍內。個人覺得，毛最大的失誤，還是在西路軍西進到高台、臨澤地區後令其停止，就地創建根據地，致使西路軍陷入重圍，敗守倪家營子。此後又令其東進，繼而又令其停止，就地堅持，“適時完成西進任務”。在西路軍好不容易突圍而出之後，又下令“固守五十天”，逼得西路軍逃出來後又回去送死。

這一系列致命失誤根本就找不到原諒的理由。若從解救西路軍的角度來看，則自它鑽進河西走廊後，就只有向西或向東兩條路。從高台縣出發，西進到哈密，與東歸的路程差不多。區別在於，到了哈密就得救了（據徐向前說是過了嘉峪關即可），而到了黃河西岸仍未必能與河東紅軍匯合，等於又回到當初的危局中。更何況徐向前和大多數西路軍領導都認爲，馬家軍主力集中在東面，能否突破其重兵防堵還是問題，而乘虛西進把握大，損失小，最有利。因此，即使從逃生的消極角度來看，西進也是唯一的希望。當然，等到退守倪家營子後，這希望就喪失了。

哪怕毛只想利用西路軍，西進也是最好的選擇。據徐向前解釋，毛之所以忽而令其西進，忽而令其就地堅持，忽而又令其東進，忽而又令其固守，或是爲了獲取蘇聯對西北獨立的武力支持，或是爲了援助東北軍，或是爲了搶地盤，或是因為怕得罪蔣介石破壞和局，每個決策都是依據河東形勢的一時需要而作出的。但西路軍所處位置以及實力，決定了它根本就無法滿足毛那些臨時需要：策應河東紅軍鞭長莫及；搶地盤非但力不從心，而且與毛不惜代價與蔣媾和的戰略目標相衝突；西路軍突圍自救也未必會破壞和局。最荒唐的是，當西路軍進到高台、臨澤一線

時，毛因為怕中央軍進攻陝甘，竟讓西路軍停下來，想以之為援軍，這簡直荒誕不經：西路軍遠在千里之外，還隔著黃河，若陝甘根據地遭受中央軍進攻，西路軍飛奔來援，就算沒有馬家軍攔截，趕得上麼？反過來，若西路軍到新疆領到重武器，補充了人馬，立即便如虎添翼，無論是東進搶地盤，還是增加和談資本，都才能真正起作用。

毛為何看不到這一步？早在 11 月 3 日，莫斯科就來電告知不同意從外蒙交貨，要他們去哈密領取。但中央卻電告莫斯科："除非你們用汽車送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里無人煙的沙漠。"[82] 11 月 18 日，毛澤東、張聞天與周恩來電告徐向前和陳昌浩：肅州（今酒泉）到安西（今瓜州）有八天壞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83]。那麼，毛會不會是怕西路軍陷入絕境，這才不同意他們西進？

依愚見，那些話可能是周恩來的意思，毛心思粗放，根本不會想到那些細節上去。相反，他的特點是賭性十足，當年陝甘支隊只有五六千人，又是深秋，他還力主逃到外蒙去，全不顧前面有個中國第二大的阿拉善大沙漠。就算這曾是毛的顧慮，那在莫斯科同意把貨送到安西後[84]，也就不該存在了。然而毛還在此後令西路軍忽西忽東，忽而就地堅持。可見這不能解釋毛的乖張舉措。

我想，真正的原因，還是他不願意看到西路軍在領到蘇製武器後，變成最強大的紅軍武裝，如同後來的四野一般。毛篤信"槍桿子萬能論"，認定"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衆運動。……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他本來就深恨張國燾"人多槍多"。若是張的部下再搶在

他的嫡系前“打通遠方”，取得無量軍火，拿去造黨，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衆運動，造一切東西，毛就再不可能與張競爭了。這就是為何從一開始，毛就反對紅四方面軍在永靖、循化一帶渡河西進，堅持要他們折向東北去阻擊西進的中央軍。此後只是因為靜會戰役計劃丟失，毛才被迫同意四方面軍在靖遠渡河。因此，對毛來說，讓西路軍突圍西進拿到軍火，比起全軍覆沒來，仍是弊大於利。

這當然不免誅心之嫌，然而捨此就只能或用“毛蓄意坑害西路軍”或用“毛根本不會打仗”來解釋上述一系列咄咄怪事。與那倆解釋相較，此說似更接近真相，為毛的幾封電報支持。11 月 4 日，共產國際來電，要中共去哈密接貨。11 月 15 日，毛周電告陳徐，同意他們向涼州進發，說新疆接濟正準備中[85]。但 11 月 23 日，毛卻與張聞天致電陳徐，謂：“遠方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兩天後他又電告：“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奮鬥，打開局面。”[86] 到了 12 月 5 日，他卻又電告陳徐：“遠方可於兩個半月後將貨物送達安西”，要他們西進奪取張掖與酒泉[87]。自相矛盾一至於此，蔚為奇觀。很明顯，所謂蘇聯“堅決反對退入新疆”完全是謊言——去新疆接貨，本是莫斯科主動提出來的，毛卻改為不許進新疆。此後這永久性禁令卻又變成曖昧的“三個月內不要依靠”，最後又成了在安西接貨。這翻來覆去本身就說明毛內心猶豫不決，矛盾重重：既想保住這支隊伍，又怕他們拿到軍火。

這大概就是毛的盤算：西路軍既不要拿到軍火，從此有尾大不掉之虞，也不要被消滅，最好能在原地創建一個根據地，讓他多一個與蔣討價還價的籌碼。可他卻看不到，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徐向前同志已經解釋了：

> “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且不說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僅從西路軍面對優勢敵人的不斷圍攻來看，就缺乏建立根據地的起碼條件。部隊剛剛進入河西地帶，四面受敵，防不勝防，整天同馬家軍血戰，哪里還有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根據地的創建工作呢？創建革命根據地，離不開兩個基本點；一是消滅敵人，站穩脚跟，二是發動群衆，建黨建政。前提是消滅敵人，否則，便談不上發動群衆。毛主席說過：‘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衆爲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爲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衆工作，做群衆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毛澤東軍事文選》第八十五頁）對西路軍的要求有悖於此，仗還沒打勝，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行得通嗎?事實說明，壓根兒就行不通。規定任務，必須權衡主客觀條件，從實際出發，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飯，量體裁衣’的道理，就在這裡。只看到主觀需要的一面，忽視了客觀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隊去承擔其無力承擔的任務，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毛澤東違背自己的教條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前已指出，在長征時，他始終不明白在強敵圍追堵截之下，只能是“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跑”，不可能停下來創立根據地。這種常識性錯誤，源於他固有的想入非非的“革命浪漫主義”天性。

招致西路軍覆亡的又一原因，是毛的“外線病”。徐向前同志也指出了：

> “在敵强我弱的條件下，我軍的外綫進攻，歷來强調依托根據地，實行戰役戰鬥的速决原則。實踐證明，這是我們爭取和保持作戰主動性的有效手段。西路軍則恰恰相反，不

僅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與敵鏖戰。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應沒有援應。這樣，還有什麼戰局中的主動地位可言呢?違背了外綫進攻作戰的基本原則，喪失主動地位，一點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毛一面主張“誘敵深入”的內線作戰，一面又酷愛扔下根據地孤軍遠征的大手筆，前述紅軍東征、西征都是例子，更結棍的是下文將要介紹的他保衛西安的偉大設想，其荒誕絕對超出了正常人的範圍。和那比起來，西路軍孤軍遠征還真算不了什麼。

徐向前還指出了若干別的決策失誤，合起來說就兩條：

第一，毛指派的任務不符合地形條件。河西走廊內人煙稀少，北面是合黎山與沙漠，南面是祁連山，東西長約 1000 公里，寬僅數十公里，最狹處僅幾公里，跟個比較寬的峽谷也差不多。既沒有打運動戰的迴旋餘地，又不可能建立根據地。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鑽進去十分危險，只宜迅速通過，不可久居。若在那兒“分兵固壘，就地堅持”，就只能如徐向前說的那樣，擺上三百里長的一字長蛇陣，等於邀請敵軍來從容擊破。

毛竟然會想出那種餿招來，只可能有兩種解釋：要麼蓄意斷送西路軍，要麼不會看軍事地圖，不知道什麼是死地。在我看來，後者的可能性更大。跟斯大林一樣，毛畢竟沒有受過軍事教育。蘇軍將領曾發現，斯大林看地圖就跟老百姓一般，只看得見方向與距離，沒有地形觀念，因而常武斷規定行軍路線與速度，卻忽略了山脈、河流、森林、沼澤等地形條件的影響。連斯大林都如此，天資不及他百分之一的老毛就更不用說了。何況就連職業軍人都可能犯這種錯誤。例如杜聿明決定率遠征軍翻越野人山回國，從地圖上看毫無問題，但那兒是無法通行的叢林，害得三

萬五千人只剩下三千多人。毛也完全有可能犯類似錯誤，否則他此前也就不會力主陝甘支隊穿越大漠逃往外蒙了。

事實上，毛澤東已經承認了這一點。1937 年 12 月，他在接見西路軍將領李卓然、李先念、曾傳六、程世才等人時說："那一帶是少數民族地區，人煙稀少，群眾中革命工作基礎又很差，地勢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幾十里寬的一條狹窄地區，運動不便，敵人多是騎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騎兵作戰的經驗，這些情況使西路軍在失敗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88] 說明他在下令"建立根據地"時根本沒考慮過這些問題，只是在西路軍將領生還後，才明白那兒的地形到底是什麼樣。

第二，兩條腿跑不過四條腿。面對馬家軍的騎兵，紅軍的運動戰優勢以及近戰、夜戰、奔襲、伏擊、迂回、猛打猛追等戰術特長都無所用武，而這一點為毛始料未及。這也毫不足奇——除了陝甘支隊出草地時遭到過小股騎兵襲擊，以及彭德懷指揮擊潰了東北軍陷在深溝裡的三個騎兵團[89]之外，毛從無與騎兵大部隊在開闊地域交戰的經驗。他是"實踐出真知"，"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沒有接觸過的東西就不知道，這才會在遙制西路軍時屢出餿招，教他們怎麼打騎兵（詳見《毛澤東年譜》上卷中毛的有關電報）。要等到西路軍全軍覆沒，他才知道騎兵的厲害，在十多年後訪問莫斯科還特地為此請教斯大林。

綜上所述，竊以為，西路軍覆滅本有可能避免，卻最終未能避免，完全是毛瞎指揮造成的。他之所以如此，倒未必是蓄意為之，主要還是氣度褊狹、私心太重、目光短淺、思慮不周以及知識缺損使然。

四、“西北大聯合”與西安事變殺蔣

所謂“西北大聯合”，我已在有關西安事變的文章中介紹過[90]，乃是我黨於 1936 年 5 月至 8 月間與張學良等人策劃進行的西北獨立運動，亦即成立“西北國防政府”，由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第 17 路軍以及紅軍組成“抗日聯軍”，由張學良擔任該“政府”的主席與聯軍總司令，奪取寧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並爭取華北宋哲元、山西閻錫山等加入，與蘇聯結成盟國，與東北的“滿洲國”遙相對峙，共同瓜分北中國，與南京政府分庭抗禮。

毛澤東這一肢解中國宏偉設想的靈感，來源於他對聖意的揣摩。1924 年 5 月 31 日，中蘇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該條約明確宣告：“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並作出了蘇聯撤軍的規定。但蘇軍一直違約賴在外蒙不走。不僅如此，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人霸佔了全東北，日蘇關係趨於緊張。1936 年 3 月間，蘇聯踐踏了上述條約，把外蒙當成主權國家，和它簽訂了“共同防衛條約”。

蘇聯這一行動，給了毛澤東極大的鼓舞，在 1936 年 5 月 8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偉大領袖激動地告訴同志們：“三月間訂立的蘇蒙條約，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91]，他就此提出“西北大聯合”的壯麗設想，並為此發動西征，試圖打通蘇聯，為未來獨立的“西北國”接通最強大的外援渠道。

偉大領袖這個戰略設想，完全建立在對上級領導意圖的理解上，那就是把斯大林與外蒙簽訂攻守同盟條約，當成了對中共下

一步行動的指示。但這不過是個猜測，偉大領袖是自作多情了，斯大林此舉不是對他，而是對著日本人的，其實是告訴後者：外蒙是我的，你們休想來此打主意。哪像偉大領袖所想的那樣，是暗示中國革命者可以效法外蒙共產黨人那樣搞獨立，放手將西北從中國版圖中割裂出去！後來日蘇在外蒙邊境爆發的一系列武裝衝突證明了斯大林的高瞻遠矚，蘇軍正是靠該條約賦予的特權，在張鼓峰、哈勒欣河等地痛擊日軍。

在此，偉大領袖再一次顯示了他在當國後暴露得淋漓盡致的性格缺陷，那就是把願望當現實，據此制定宏大的戰略計劃。當然也不能說他完全猜錯了，事實上，他這一偉大設想與共產國際在 1936 年 4 月間為中共制定的遠期工作計劃暗合，該計劃規定中共近期以爭取東北軍、晉軍與紅軍停戰為主，以後則要爭取"組織抗日聯軍，以西北為中心"，建立"反蔣統一戰線"[92]。

共產國際之所以作出這計劃，究竟是反映了斯大林舉棋不定，還是反映了蘇聯國家行政部門與輸出革命特設機構之間的溝通障礙，尚待史家進一步考證。我個人覺得後一可能較大，蓋早在 1935 年年底，蘇聯外交部即向南京政府表示願意討論兩國軍事互助問題[93]。共產國際於 1936 年 8 月 15 日突然給中共來電，否決了"西北大聯合"計劃，要我黨"聯蔣抗日"，也提示外交政策的改變終於在此時傳到了間諜機構。

1936 年 6 月間，"兩廣事變"爆發，兩廣軍閥公開舉兵反抗中央。受此大好形勢鼓舞，黨中央遂決定："東北軍在西北的發動決不容緩，我們計劃至遲到八月應該發動。八月上旬二、四方面軍可到甘南，那時實是最好時機。"[94]

紅二、四方面軍確於八月上旬到了包座地區，前鋒抵達甘南，而此時共產國際否決“西北大聯合”計劃的電令尚未下來。若“西北大聯合”真於此時發動，那會有什麼樣的結局？

從 19 世紀末葉起，中國就成了日俄兩家競相掠奪的獵物。日俄曾三次簽訂密約，劃定了瓜分中國的分界線：北滿和內蒙西部歸俄國，南滿和內蒙東部歸日本。蘇聯十月革命後，日蘇關係惡化，原來的“協商瓜分”變成了“競爭瓜分”。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獨霸全滿，打破了原來的協議，引起蘇聯反彈，日蘇關係更加緊張。當時日本正在假手德王入侵內蒙，如果西北效法外蒙獨立出去，變成蘇聯的保護國，陝、甘、寧、青、新成了蘇聯勢力範圍，必然要對內蒙構成戰略包圍，日本少壯軍人絕對不會坐視，大本營內的北進派必然得勢，日軍很可能會進犯外蒙甚至西伯利亞，而這正是斯大林刻意要避免的事。

另一方面，此舉必然極大地刺激南京政府，並將全國的注意力從東北轉移到西北去。西北是中國的傳統領土，中華民族據說就是在那兒發祥的，中國最早的帝都就在那兒，在國人心目中的感情價值絕非關外的新領土東北可比。從西安事變發生後全國一邊倒的強烈輿論抨擊不難推知，“西北大聯合”計劃若真在八月份發動，則大衆本來就深惡痛絕的逃將張學良勢必變成國人皆曰可殺的國賊。本來就有衆多親日派在內的南京政府很可能改取聯日制俄政策，而這勢必刺激莫斯科。其時納粹德國正在歐洲崛起，令斯大林日夜不安，他最要避免的便是兩線作戰，因此絕不會輕易捲進遠東的戰事，只會靠外交盡可能把中國政府拉過去。

因此，如果張學良真在八月上旬宣佈成立“西北國防政府”，斯大林絕不會支持，更不會如毛澤東預想的那樣“我們可以同你聯盟”。老斯乃是貨真價實的克里姆林宮新沙皇。在他眼

裡，馬列教條和“階級情誼”比起帝國利益來輕如鴻毛。他既能為了討好希特勒，把逃到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捆送到蘇德邊境去交給蓋世太保，又胡不可拋棄損害了蘇聯國家利益的中共？所以，他最可能的反應，還是如同西安事變發生後那樣，宣佈那是日本人的陰謀，強烈反對譴責之，表示與南京政府站在一起，甚至公開撇清他和中共的關係，譴責那夥人是土匪。

如此一來，無非就是西安事變提前發動，但與西安事變不同的是，叛軍手中沒有蔣介石作人質，因此蔣介石就只會調動大軍進剿，將“三位一體”一鍋熬了，畢平叛與剿匪之功於一役。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戰鬥力本來就差，無論是戰鬥力還是兵員總數根本就不是中央軍的對手。更何況兩軍的糧餉武器彈藥全靠南京供應，交戰後餉械斷絕，若曠日持久，士兵缺餉必然嘩變。張楊都毫無我黨控制軍隊的能力，支持他們的只是少數少壯軍官，內部矛盾重重。若老蔣把戰無不勝的銀彈使出來，收買運動張楊手下的將領，甚至不必交戰，大軍就能土崩瓦解於旦夕之間，正如後來少帥晉京後東北軍不戰自潰一般。張楊倒是可以下野出國，餘部由國府收編，紅軍可就走投無路了。那時老蔣挾戰勝之餘威，加緊對陝北蘇區的圍剿，則中共革命也就走到了盡頭。

因此，偉大領袖這偉大戰略規劃實在是自殺術。此人本來就缺乏世界知識，毫無國際戰略的基本觀念，對國外的事兩眼一抹黑，光看他對斯諾發的那番宏論便知道他究竟懂多少天下事了：“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作走江湖的騙子，但認爲墨索里尼能幹得多，一個真正的權術家，有歷史知識，而希特勒，却不過是資本家的沒有意志的傀儡。”[95] 這種評論，大概也只有偉大領袖能作出來。

當然這也不能怪他，蓋他僅有的一點國際知識全是從當時的爛報紙上看來的，那些東西能教會他什麼西方文明歷史背景知識，能給他什麼對國際事務的洞察力？何況困居在陝北那消息閉塞的文明死角，他怎麼可能知道希特勒在歐洲的崛起成了斯大林的最大心事？又怎麼可能知道斯大林最想避免的便是兩線作戰，心心念念的就是搞“遠東慕尼黑”，使得遠東成為蘇聯的戰略後方？而且，困在陝北的紅軍也確實是走投無路了，看一眼當時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就足以得知我黨是處在何種困境中，幾乎所有的人想的都是如何從那死地中逃出去。絕望之中，人難免把願望當現實。毛澤東把蘇蒙結盟當成是斯大林授意中共搞獨立，據此制定戰略計劃，說起來也是人之常情，適足悲憫。

西安事變發生後，毛隱瞞斯大林的來電，千方百計拖延時間，巴不得張學良殺了蔣介石，告訴張只要蔣仍在人世，各方猶豫觀望就不可避免，張應“幹到底膽大些”[96]，甚至讓周恩來敦促張“在內戰階段不可避免圍攻西安前，（對蔣）行最後手段”[97]。其時何應欽指揮的討逆軍已經攻破潼關，向西安迅速推進，湯恩伯部則早就進入陝北了，駐紮在甘肅的胡宗南部隨時可以從西面進攻叛軍，叛軍處於腹背受敵極為不利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若是殺了蔣介石，則中央軍各部都只會義無反顧地合擊叛軍。而叛軍內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此前第 17 路軍第七軍軍長馮欽哉已公開拒絕楊虎城“進駐潼關，防堵中央軍”的命令，向國民政府作出“一不作共產黨，二不擁護小張（學良），三不與中央軍作戰”的承諾，並與劉峙通電全國，反對張、楊。除他之外，張楊手下都有將領與南京暗通款曲，宣誓效忠，見勢不妙必然會在陣前倒戈，令叛軍一敗塗地。

因此，殺蔣的結局類似於上述虛擬的西北獨立的結局：東北軍和 17 路軍迅速崩潰，被中央軍收編，最後只剩紅軍獨力與幾十萬中央軍周旋，其結局不待智者而後知之。其唯一的區別，大概就是失去了唯一能統一全國進行抗戰的領袖，政府落到了汪精衛、孫科等人手上。

苟若此，則中國的外交政策必然發生重大改變。如所周知，同盟會與日本人淵源極深，特別是因為孫中山多年叫賣與日本合併，成立"中日聯邦"（日本人後來的"中日提攜，共存共榮"、"大東亞共榮圈"等等，全是孫文當年竭力向日人推銷的賣國主張），國民黨內部確有大量的親日派。哪怕是在戰後，何應欽等人仍對投降的日本軍人愛憐呵護備至，不僅不將日軍官兵稱為"戰俘"，改稱"徒手官兵"，而且在南京受降時還廢除投降方向受降方呈交軍刀的國際儀式，改為不帶刀入場，甚至準備搞成圓桌儀式，只是因美方抗議才改為長方桌對立儀式。按國際禮儀，投降方向受降方敬禮，但後者不還禮。可當日軍總參謀長向何應欽呈交降書敬禮時，何竟然不由得站起來還禮，以致在場的岡村寧次感歎道："看到我這位老朋友的溫厚品格，不禁想到：畢竟是東方道德！"[98]

因此，似乎可以說，如同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一人與日本交戰一樣，抗戰乃是蔣介石一人與日本交戰。如果沒有蔣介石一意孤行，苦撐到底，則國府要麼不會發動抗戰，要麼在受到日軍初次打擊後便與日本媾和了。那麼日本人也就未必會去南洋冒險，美日未必會交戰，而日蘇交戰的可能性倒是相當大，整個世界歷史可能都要按另一條路演變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偉大領袖的殺蔣計謀，倒確實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偉大戰略，不過這即使發生，也沒他老人家什麼事，蓋

紅軍那陣子早被討逆軍消滅了。就算奇跡發生，他能和其他中央委員一道逃到外蒙去，也只會被斯大林當成日本間諜，交給NKVD百般毒打後槍斃。

這些事沒發生，全靠斯大林先通過共產國際來電否定了“西北大聯合”計劃，後又直接給中共發電報，警告中共若不運用其影響力促成蔣介石的釋放，則莫斯科將把他們譴責為土匪，向全世界公開批判[99]，這才迫使我黨放棄了殺蔣的誘人念頭，周恩來謁見被囚禁的“校長”，給他敬了個瀟灑的軍禮，接受了國府早在五個月之前便提出的和平方案，換來了蔣介石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的口頭承諾，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因此，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中國革命的偉大船長斯大林同志為中共撥正了船頭，指明了航向，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儘管他不過是無比精明地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謀求帝國利益而已。

五、萬里奔襲狂想曲

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天晚上，國民黨中常會與政治會議緊急召集聯席會議，議決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查辦，並令軍委常委兼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調動指揮軍隊事宜[100]。12 月 16 日，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指揮大軍由潼關向西安迅速推進，國軍飛機輪番轟炸渭南與赤水車站。大戰即將爆發。張楊叛軍所處戰略態勢極為不利：討逆軍正自東向西推進，駐守甘肅的胡宗南隨時可從西向東推進，叛軍腹背受敵。此外，中央軍湯恩伯部早就進入陝北，隨時可能掃蕩空虛的陝北蘇區。

在此嚴重情勢下，張楊集結兵力，準備抵擋討逆軍的進攻，把延安等地讓出，請紅軍接防。毛澤東先給紅軍前敵指揮部發電

報，集結於甘肅西峰鎮（今西峰市），為張楊“壯其膽而振其氣”[101]。但他又覺得這個戰略不過癮，旋即改了主意，令紅軍改到延安、甘泉集中，準備扔下根據地，迂迴到敵主力之後的鄭州一帶，並發展到直逼南京。此令一出，將領譁然。前敵總指揮彭德懷與政委任弼時致電中央，指出若野戰軍出河南取進攻態勢，則很可能丟掉固原、蘭州與陝甘公路，來不及回援西安。若胡宗南部南北夾擊，則很可能隔斷紅軍與西路軍及蘇聯的聯繫，無法取得蘇援，因此應爭取寧夏、鞏固蘭州，一部出綏遠與傅作義聯合抗日。劉伯承則建議趁機發國難財，儘量控制全甘肅，並完成寧夏戰役計劃，乘黃河結冰渡過黃河，攻取寧夏，接通外蒙。[102]

此時斯大林命令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密電尚未為其他人知曉，所以彭德懷劉伯承輩尚在做打通蘇聯取得蘇援的夢。但即使忽略斯大林來電不計，早在 11 月 3 日，共產國際也已來電通知中共“堅決認為從外蒙幫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我黨去哈密領取。然而直到此時，劉伯承尚在指望打通外蒙，我黨內部資訊流通之不暢，以致連高級將領都蒙在鼓裡，還在根據過時情報構思戰略，可謂荒唐之極。這說起來也是毛一手壟斷與莫斯科的電訊造成的。

雖然彭、劉等人不知道莫斯科已經變卦，但他們都看出了毛的戰略計劃的危險。然而毛澤東還要堅持之，回電教訓彭、任：

> “無論軍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須擊破敵之要害。敵之要害不是寧夏或甘肅，而是河南與南京。敵已奉行大規模內戰，我們對戰爭是後發，不是先發。然在敵主力向西安進時，我軍應奉行大的戰略，迂迴並擊破敵頭腦之南京政府。此方針應無疑義。”[103]

這可是比李立三當初制定的攻打各中心大城市，“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戰略計劃瘋狂一萬倍，絕對是瘋子戰略。

略去隔在黃河西岸的西路軍不計，當時紅軍全師也就六萬人左右。就憑這支隊伍，要扔下根據地，毫無糧秣彈藥補充，毫無休整餘裕，持輕武器萬里奔襲，不停息地流動作戰，先打到鄭州那“四戰之地”去，進而南下“擊破敵頭腦之南京政府”！紅軍連寧夏回民聚居的“土圍子”都無法攻破，曾為此特地向蘇聯請求提供飛機大炮，憑什麼去攻取鄭州城和南京城？就算這些大城市用輕武器就能打下來，那從陝北打到南京，就算沿途絲毫不受阻攔，步行起碼也得一兩個月吧？要是還沒走到那兒，我方的“頭腦”就被敵軍擊破咋辦？讓紅軍趕快往回趕？跑得過火車麼？

更何況西安事變已經引起了全民極大憤怒，紅軍一旦打到河南去，立即就要變成過街老鼠。鄭州一帶一馬平川，連古人都知道那兒不是用兵之地，到了現代就更是如此。隴海線與京漢線在彼交叉，國軍無論從哪個方向調兵都極為方便，很容易就將遠道而來、已成強弩之末的紅軍包圍起來，而偉大領袖卻想入非非，想以那兒為出發地，去“擊破敵頭腦之南京政府”！

所幸張學良還有點人類常識，他知道紅軍主力一旦遠出，則陝北只剩下東北軍三個師，根本無法抵擋胡宗南與湯恩伯的兩個軍，因此要求紅軍佈置在環縣、豫旺地區，一部放在甘泉－延安一線，以掩護東北軍後方。毛澤東還要試圖說服他，說胡部與湯部不過是支隊，只需各以一部鉗制即可，“敵之要害在南京與京漢、隴海線。若以二、三萬人的戰略迂迴部隊突擊京漢、隴海，取得決定性勝利，則大局立起變化”！[104]

此時劉峙率四個師圍住了華縣，進逼渭南，距西安只有約40 公里了。周恩來將此嚴重敵情電告毛澤東。毛才決定先救燃眉之急，於 19 日回電周恩來：“紅軍決向西安集中，配合張楊首先消滅東來之敵。”[105]此後他又根據張學良的命令，讓紅軍主力集結於慶陽、環縣一帶，配合王以哲部打擊欲從海原南下天水、再東進西安的胡宗南部，守住叛軍西線。20 日，華縣被討逆軍攻破，西安危如累卵。張學良又準備把紅軍調往東線。同日，宋子文飛抵西安，代表宋美齡調處。23 日，周恩來謁見蔣介石，作出重大讓步，接受國府 7 月間提出的和平方案，換來了蔣介石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的口頭承諾。25 日，張學良護送蔣介石離開西安飛往洛陽，戰雲被和平之風吹散，毛澤東那個萬里奔襲的偉大奇計也就始終沒用上。

吊詭的是，毛澤東這奇計，因為過於荒誕離奇，徹底脫離了現實，因而絕無實現可能，反倒不會造成任何損害。即使宋子文和宋美齡不來西安，事變得不到和平解決，毛的計劃也不可能化為現實。蓋當時紅軍主力全在甘北，即使立即南下東進，也得幾天後才能趕到西安一帶，而此前西安早就成了危城，紅軍即使趕到西安附近，也肯定只會被張學良投入東線作戰，抵擋討逆軍進攻，哪還有餘裕從容迂迴到河南去，南下漢口，奪取南京，實行偉大領袖“擊破敵頭腦之南京政府”的偉大計劃？因此，毛這一偉大計劃的唯一意義，就是向後人顯示此人的腦袋確實有點不正常，喜歡陶醉於宏大然而絕對脫離現實的妄想之中。

六、西安事變爆發後的其他蠢舉

（一）規定放蔣三條件

我在另文中說過，宋慶齡確實轉發過斯大林給中共的最後通牒，非此無以解釋中共何以會在抓到蔣介石、佔了上風之後，不但突然改變殺蔣政策，反倒作出重大讓步，接受了國府早在1936年7月4日就提出的和平方案，而正是這讓步換來了蔣介石口頭同意停止剿共。[106]

和平解決事變的重大契機還不光是中共作出讓步，更是宋子文和宋美齡的斡旋。兩人相繼飛到西安，代表蔣介石和張楊等人談判，基本接受了對方的要求。在這過程中，蔣介石從未直接出面，兩宋也未留下任何文字憑據，只是口頭擔保蔣被釋放後一定會恪守承諾。

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都能看出，此乃蔣介石的讓步底線：他身為國家領袖，豈能屈從於叛亂將領的威嚇，留下文字把柄，讓對方捏在手裡不斷訛詐？若是幹了這種事，他以後還怎麼領導全國？因此，若堅持要他留下書面保證，他寧死也不會同意，那麼僵局就絕無希望打破。而蘇聯業已抽腿，沒有老大哥的援助，“西北大聯合”只會被討逆軍蕩平。而且，若他真是不守信用，區區一紙保證對他又能有什麼約束力？因此，提這要求除了使得問題無法解決外，什麼意思都沒有。

張學良看出了這點，因此很痛快地就接受了這君子協定。然而毛澤東可不是君子，他最怕的就是蔣介石背信棄義，一旦獲得自由後便大舉報復。張國燾證詞披露了他對蔣報復的擔心。據張國燾說，蔣介石回京後，毛的焦慮便達到了頂點：

> “當時毛澤東最感頭痛的是蔣介石返回南京後，可能對陝北發動報復行動。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由張學良護送返回南京，周恩來的急電，當晚到達保安，毛澤東顯得特

別焦急。他似斷定蔣介石的報復必然會來，而且會很迅速和慘酷。他曾斷斷續續的表示，糟了！張學良也跟著到南京去，目的無非是想減輕自己對蔣的罪過，難道他不會把罪過都推向中共頭上？我們不是曾經推動張學良反蔣抗日，說什麼可得蘇聯援助，擁護張學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麼？這些難道張學良不會自動或者被逼的和盤托出？再者，西安沒有張學良，東北軍將解體。張、楊、共三角聯盟也已不復存在。蔣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張、楊在西安的勢力。蔣介石的拳頭，難道不會打到中共頭上、再來一次從四方八面圍剿我們麼？”[107]

這段證詞不但忠實反映了毛澤東典型的陰暗思維方式，而且直接為他的言行證實。

12 月 24 日深夜，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要求他堅持放蔣三條件：第一是中央軍全部撤出潼關。第二是南京及蔣通過公開的政治文件宣佈國內和平，與民更始，不咎既往，並召集救國會議。第三是開始部分釋放政治犯。電報強調，沒有這些條件保證就放蔣，對西安的地位，張楊以及其軍隊的安全都是非常危險的。毛澤東還認為，挾蔣在手還有文章可做，有利於爭取到這些保證。即使打起仗來，只要打幾個勝仗就能奠定和平基礎。[108]

這些條件，特別是頭兩條，再充分不過地暴露了毛的心病：害怕蔣回去後大舉報復，因此想讓蔣和南京政府書面保證不咎既往。而給彭德懷的電報則暴露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已經成了他想事的方式——他總是指望打幾個勝仗便能開創大局面，長征時在貴州境內如此，到達陝北後東征、西征也如此，可惜一直沒出現這種奇跡。難道如今便能出現？敵我實力對比如此懸殊，事變又備受國內外輿論譴責，張楊內外交困，“挾蔣在手”到底能

詭詐出什麼好結果來？既不敢殺，又不敢放，那就只能刀兵相見。既然有把握打幾個勝仗就能迫使南京屈服，那就乾脆把蔣殺掉算了，何以又不敢殺呢？厚黑學並非真正智慧，光從這點上便能看出來。

幸虧張學良那花花公子竟然比我黨還高明，他大概知道要蔣作出這些讓步，就是讓他公開承認自己向劫持者們屈服了，等於在全國人民面前公開自我羞辱，這是絕無可能的，還不如做個漂亮姿態，相信兩宋作出的君子協定，就坡騎驢，趁機跨下這如此難下的虎背算了。因此，他力主放蔣，好不容易才說服周恩來，但楊虎城仍不同意。張懶得再跟他們囉嗦，索性快刀斬亂麻，陪蔣介石飛回洛陽去了。[109]

因此，放蔣乃是張學良一人的主張，違反了中共與楊虎城的意願。若他忠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辦事，堅持那放蔣三條件，則僵局無望打破，必然要以動武收場。誠如宋子文所言，“戰火一開，就很難壓制”。蔣介石多半會死在東北軍少壯軍人手中。那結局就是前文虛擬過的那樣：東北軍和 17 路軍土崩瓦解，紅軍被全殲。在此關鍵時刻，少帥再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二）公佈兩宋的口頭承諾

張學良護送蔣介石返回南京後，引起了楊虎城和中共對蔣大舉報復的極大恐慌。他們的對策，簡直蠢到連我都不好意思轉述：既然沒能讓蔣作出書面擔保，那就把私下的協議兜出來，讓蔣無法反悔。12 月 27 日，西安《解放日報》刊登了據說是蔣作出的六條承諾。次日，毛澤東發表聲明，也列出了蔣“允諾的條

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該文“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此文的第一個意義，便是再次證實張國燾所言不虛，毛澤東確實對蔣食言而肥、大舉報復充滿了恐懼，直接就在該文中流露了：

> “蔣氏在西安曾說了將要認真抗日的話，當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擊革命勢力，因為不但信義問題關係蔣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實際的政治道路上，在蔣氏及其一派面前橫著一種已經膨脹起來而不利於他們的勢力，這就是在西安事變中欲置蔣氏於死地的所謂討伐派。”

偉大領袖盼望蔣信守承諾到了這地步，不但告訴蔣“信義問題關係蔣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不惜出之以挑撥手段，告訴蔣不是中共，而是主張討伐的何應欽的派系，才對他構成了真正威脅。更令人噁心的是，我黨不但把自己挑唆張楊發動“西北大聯合”於前、煽動張學良殺蔣於後的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還冒充“調停人”，把和平解決事變的功勞算在自己身上，向蔣介石評功擺好：

> “蔣氏應當記憶，他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和平解決，並為此而作了種種努力，全係由民族生存的觀點出發。設使內戰擴大，張楊長期禁錮蔣氏，則事變的進展徒然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堅決揭破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汪精衛、何應欽等的陰謀，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次事變，這和張楊二將軍及宋子文氏等國民黨人的主張可謂不謀

而合。這就是全國人民的主張，因為現在的內戰是人民所痛惡的。”

這話說得也倒不錯，可惜是斯大林的意思。而且，哪怕在斯大林下令後，偉大領袖考慮的還是如何與討逆軍大打內戰，甚至想把“人民所痛惡的”內戰打到鄭州、南京去。當然老蔣不可能知道這些黑幕，所以他只該感謝中共的不殺之恩。

聲明末尾，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再度提醒蔣介石信守諾言，直接表明了他對此事的看重，間接流露了他對蔣背信棄義大舉報復的恐懼：

“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今後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110]

此文的第二個意義，就是顯示了偉大領袖那難以思議的愚蠢：既然你如此盼望蔣介石信守承諾，生怕他大舉報復，那就不能去刺激羞辱他，讓他下不了臺吧？蔣最忌諱的就是怕人懷疑他在生死關頭沒能做到王陽明的教導，犧牲了“領袖偉大之人格”。你卻到處去說他對張楊作出了秘密承諾，把它們一條兩條開出來，提醒他信守刺刀下的諾言，讓他這臉往哪兒藏去？更何況他獲釋之後，第一件事便是表示“言必信，行必果”，這就該放心了吧？即使你沒有信任他人的能力，非來這套不可，也得先等他翻臉再說吧？如此“先發制人”，不是千方百計刺激他惱羞成怒，乾脆矢口否認那本來就是口說無憑的君子協定麼？有張學良在他手上，難道還不能逼出個欽定《西安事變真相》，把中共的幕後挑唆加油添醋地說出來，然後再大舉興兵討伐？

這愚蠢作法，不但使真正的調停人兩宋大發雷霆，威脅要退出調停工作，而且也使得蔣的態度轉硬，張學良被軍事法庭判

刑，不能說和這沒關係。中共和楊虎城擔心蔣的報復，竟然連投鼠忌器之心都沒有，當真是誰跟他們共事誰倒楣。

這種種蠢動，連共產國際都看不下去，來電勸告“不要老是叫喊蔣介石在西安做出了什麼保證”，而毛澤東最後也總算意識到此舉之蠢，在政治局會議上承認這麼做在政治上是幼稚的。[111]

不難想像，如果蔣介石受的是我黨教育而非王陽明那套“心學”，他一旦獲釋後會怎麼行動。然而即使是受了這種羞辱，他仍然始終信守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由此看來，真正打倒蔣介石的人，還是他自己。

（三）為實現西北半獨立而欲與國府開戰

如另文所述，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乃是實現西北獨立。此後因蘇聯臨陣抽腿，不予支持，只好改為半獨立，也就是西北由“三位一體”統治，有自己獨立的軍政系統，不容中央政府插手。它和原來的“西北大聯合”計劃的區別，只在於沒有與蘇聯結盟一條，但仍然是國中之國。

這就是蔣介石回到南京後中央和西安的分歧所在，所有扯皮都是圍繞這一核心展開的：楊虎城和中共要的是割據西北稱雄，而蔣介石要的是確保與抗戰成敗攸關的西北國防基地。

張學良陪蔣介石回京後，受到軍法審判，被判刑十年，旋即為蔣特赦，但“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也就是被蔣介石軟禁起來。作為發動對武裝叛亂的高級將領的懲罰，這應當是寬大無邊了。即使是在西方，犯了這種叛國罪大概也會被槍決。然而消息傳到西安後，中共、楊虎城、東北軍將領仍極感震動。毛力主

以強硬政策謀求西北半獨立，在給時駐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博古的電報中說：

> “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並把紅軍的聲威傳出去，使中央軍不敢猛進（猛進時消滅其一部），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局面。”[112]

本著這一精神，西安提出三條要求：釋放張學良；中央軍撤出潼關；政府改組，清除“親日派”。

這三條或許是宋子文擔保過的，但都沒有實現可能：張學良是經過法庭判決的，豈能由軍閥以武力干擾司法？中央軍是國軍，並非外國軍隊，上哪兒去只該由中央政府決定，豈容割據地方的軍閥置喙？以發動兵變要求中央政府改組，塞進自己看中的人，政府如果屈從，則國將不國。“親日”若只是政策主張，則並不構成叛國罪，不是清洗理由。

就連張學良自己都覺得不妥，他給蔣介石提了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建議堅持剿共（他直接稱為“剿匪”），將東北軍調到河南，由中央軍接防，楊虎城出國考察半年，但不開缺，等抗戰爆發後再召回國。第二個方案則是不再剿共，將楊虎城部調往甘肅，將東北軍調往河南湖北一帶，由中央軍進駐陝西。

蔣介石大概覺得這兩個方案都過於嚴厲，他當時考慮國策的全部出發點是為抗日作準備，為此決定聯共。為此，他把張學良的兩個方案修改得非常溫和寬大，拿掉了“剿匪”這條。第一個選案是將東北軍全部調往甘肅，第 17 路軍仍駐陝西原防，歸綏靖主任楊虎城指揮，但中央軍必須進駐自潼關至寶雞沿鐵路各縣。第二個選案則是將東北軍調往河南安徽，楊虎城出任甘肅省主席，第 17 路軍調往甘肅。[113]

這兩個選案都非常寬大，特別是第一選案並未把“三位一體”拆開，它要求的只是中央軍進駐隴海線沿線各縣。這完全是從抗日大計出發的，並不是針對“三位一體”的報復。蔣介石知道抗戰一開，敵強我弱，沿海地域一定會淪陷，中央政府只能轉移到內地去堅持抗戰。他原來考慮以西北作為抗戰基地，但隨著紅軍長征，中央軍進入四川，他又把抗戰基地改在西南。但當時唯一能援助中國抗日的只有蘇聯一國，因此必須確保西北處於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以便通過西北獲得國際援助。

但這兩個方案卻被西安斷然拒絕，他們將蔣介石提出的兩個選案視為報復，準備以內戰捍衛西北的半獨立。毛澤東乃是最堅決的主戰派，他熱衷的還是那個萬里奔襲的偉大戰略。過去張學良是聯軍總司令，他還得服從張的意願，如今張成了階下囚，紅軍便可自主作戰了。他特地要求周與楊虎城和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約法三章，聲明紅軍保持獨立的指揮系統，擔任單獨作戰的一方面[114]，而這“單獨作戰的一方面”按毛的構想則是：

> “紅軍主力應以第一步出商洛（蘆注：陝西商州、洛南），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漢路為上策。如此方能改變整個局勢，分化南京，迫蔣就範。留二方面軍在渭北策應友軍在內線作戰。爾後內線之紅軍與友軍同外線之紅軍主力互相策應為戰略上之配合作戰。”[115]

此人看來對京漢線有一種偏執性愛好。當初紅軍東征山西時，他在戰後總結中就說什麼“此次失著是太謹慎，未能立即出河北”，紅旗一旦插到京漢鐵路，情況必定大大不同。他怎麼連紅軍根本不可能在中州那種“四戰之地”立下足來的人類常識都沒有？紅旗一旦插到京漢鐵路，情況必定大大不同：紅軍再不能打山地遊擊戰，也無法與運兵快捷的國軍打運動戰，優勢徹底失

去，只有坐待圍殲。這並不需要什麼軍事才能，只需有點人類常識就能看出，他何以就是不知道？

對西安方面的好戰叫囂，蔣介石表現了極大的忍耐。他請楊虎城的代表給楊捎去親筆信，苦口婆心曉以大義，指出楊不但沒有執行中央政府的人事明令，省府也沒有按中央法令恢復原有關係，事變中成立的組織如臨時軍事委員會之類仍未撤銷，“形式上有不奉政令割據獨立之嫌”，當務之急是“廓清外間之疑慮，表示絕不割據獨立，亦不破壞統一”，因此應該迅速表示接受中央命令，取消事變後成立的組織，停止反對中央的宣傳，這才是大局所在。至於“軍事善後等具體細目，非無商量餘地”。他還在最後誠摯地呼籲：“須知陝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陝西以作國防之基礎。中央離陝西無以建國，陝西離中央無一遂其生存與發展。故必須立下決心，向和平統一之方向做去，迅復事變以前之常態，確立此後努力之始基。”[116]

據捎去這封手書的楊虎城的代表說，蔣介石在和他談話時非常激動，以致痛哭[117]。看來這位曾文正公的傳人是真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卻不知道這種心態只能被我黨哺育出來的後人視為愚蠢。

就連張學良自己都多次“含淚請求”西安方面不要動武。1 月 13 日，他請楊虎城的代表捎去親筆信和經過蔣介石修改的兩個選案，並竭力敦促西安接受第二方案，讓東北軍調出西北，否則“決難挽此劫運”——難逃覆滅下場。他更絕望地向袍澤呼籲：“盼諸兄計及國家利害，勿專為我個人謀也”[118]，其實就是哀求西安方面手下留情，不要讓他夾在衝突雙方中坐蠟。1 月 19 日，他再次寫信給楊虎城，要他立即接受國府提出的第一方案，

直截了當地告訴他，“關於弟個人出處問題，在陝甘解決前是不便談起，斷不可以為解決當前問題之焦點”。[119]

這說得再明白不過：若雙方動武，他就只能夾在中間化為齏粉。然而西安方面的真正目的乃是西北半獨立，又豈會存投鼠忌器之心？楊虎城與中共仍然堅持要蔣介石在防區問題上讓步，使得蔣介石的忍讓終於到了盡頭。20 日，他再度給楊虎城去信，一針見血地指出，西安方面的目的是“不許中央過問西北之一切，亦無異使陝甘不為國家軍令政令所及之陝甘，而直欲使西北淪亡為東北淪亡之續”，“企圖割據與罔恤國本，乃有加於昔”，他明確告訴楊虎城，中央要以陝西為國防根據，絕不會放棄西北，限楊虎城 25 日 12 時前答覆，否則戰爭將不可避免。[120]

即使到了此時，蔣介石仍未放棄和平努力，他特地讓張沖向中共代表潘漢年解釋中央軍為何非得進駐隴海線沿線不可，那是因為中央必須接通西北諸戰略要地直至新疆，也必須通過該線接通四川。這樣一旦抗戰發生，沿海受困，中國才能通過西北接取國際援助。因此，不但中央軍必須控制隴海路，而且行營必須設在西安。他願將延長、延川、延安、鄜縣、慶陽、淳化一帶撥給紅軍駐防，中央當視同一體，給紅軍與中央軍同等給養，中共可在駐防當地參加政權，只希望中共顧念國家艱難，為整個民族著想，力勸楊虎城接受和平方案。[121]

然而我黨不可能理解蔣介石的心事，更不會相信他說話算話，於是便決定把和戰決策推給楊虎城與東北軍將領，自己“處在建議與贊助地位，免致不利時招怨”，同時決定無論和戰，紅軍都按原計劃出陝南，立足於打[122]。22 日，中共代表彭德懷、任弼時等人趕到西安，與楊虎城和東北左派軍官分別會談，會議

堅持接受國府第一方案的前提是中央軍退出甘肅，並商談了萬一戰爭爆發時三方的協同作戰軍事計劃。[123]

幸虧偉大船長斯大林同志再一次揮巨手，指航向。共產國際於 1 月 20 日來電嚴厲批評中共，指出中共執行的方針是想分裂國民黨而不是與之合作，把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達成的妥協看成是南京的屈服，把東北軍和 17 路軍視為反對南京的聯盟，這實際上是為親日派發動內戰提供藉口，要求我黨立即把主要任務放到爭取停戰、爭取與南京政府共同抗日上來，與張楊軍隊的合作必須服從於這一主要任務。只有親日派發動進攻時才可自衛，但無論如何不能為這種進攻提供口實。[124]

大老闆發了話，中共只好趕快轉向，向楊虎城和東北軍將領說明自己主張和平。這激起了東北軍和 17 路軍的不滿，“紅軍出賣朋友”的空氣甚囂塵上。東北軍少壯軍官前去向周恩來抗議。受他們的影響，楊虎城也傾向於打。周恩來為此向中央建議，即使戰爭爆發也要與兩軍同進退，“我勝則蔣可讓步，我敗則友軍必不怪我，我可擴大，蔣仍可與我們談判。”[125]

此乃絕對昏招，戰端一開，“三位一體”必敗無疑，哪有什麼“我勝則蔣可讓步”一說？東北軍和 17 路軍的戰鬥力如何，連周恩來自己都心中有數。西安事變一發生，楊虎城手下的軍長馮欽哉就立即宣佈擁護中央，此後警備第一旅王俊部、警備第二旅沈璽亭和唐得楹兩個團、第 17 師 49 旅旅長王勁哉部先後投向南京。第 17 路軍所餘不到 4 萬人，士氣低迷。周恩來自己就多次向中共中央報告過：“十七路士氣不旺，戰鬥力弱”，東北軍“只能勝不能敗，只能進不能退”，“能守不能攻”[126]，軍閥的軍隊習慣於呆在城市享福，豈能如紅軍那樣主動放棄城市，轉入鄉村打運動戰？更何況如後來的事變昭示的那樣，東北軍內部矛

盾重重，起勁咋呼的不過是一小撮左派少壯軍官，而這些人根本就控制不了軍隊。一旦戰局不利，勢必紛紛倒戈，到那時當然是“我敗則友軍必不怪我”，然而那嚴重後果豈是“友軍不怪”可以彌補的？

然而毛也就被他說服了，於 30 日覆電周恩來等人，聲明“我們與張楊是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我們不能獨異，失去張楊”，要周“向張楊兩部表示，我們始終同他們一道，在他們不同意撤兵以前，我們不單獨行動，協助他們爭取更有利條件”。[127]

幸虧那個在事變爆發時捉住蔣介石、後來做了大漢奸的孫銘九，此時又接替少帥重任，挺身出來挽救革命挽救黨。2 月 2 日，他夥同苗劍秋（後被殺）、應德田（後來也做了漢奸）等人發動兵變，妄圖一舉清除東北軍內的“妥協派”，派兵槍殺了王以哲，還在城中到處搜索東北軍高級將領，引起東北軍內訌。將領們或紛紛向中央政府輸誠，派兵反攻，或帶兵遠走高飛，離開那是非之地。二十萬大軍旦夕之間便如雪獅子向火，融化得一乾二淨，被老蔣輕易東調改編。楊虎城失去了倚仗，只好黯然去國，去歐洲“考察”，內戰自然也就打不起來了。

這樣，西安事變的唯一贏家便是中共。我黨不但逃過了發動內戰必然招致的毀滅，而且直接從東北軍與 17 路軍土崩瓦解中獲利。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蔣介石非但沒有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在派中央軍接防陝西時順便把紅軍也一鍋熬了，反而讓中共填補東北軍和 17 路軍調走後留下的真空，使得我黨的根據地迅速擴大到 23 個縣[128]，到抗戰爆發後更是讓我黨任意擴張。

因此，我黨倖存下來的功績，似乎也不能完全歸結於斯大林為我黨撥正船頭，漢奸孫銘九等人的功勞更是微不足道。最主要

的恩公還是蔣中正。他可以囚禁張學良，迫使楊虎城出國，卻始終恪守在西安時作出的“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

這是為什麼？為的是為國家留一線血脈。上文已經說過，老蔣當時制定國策的全部出發點都是在為抗日作準備。當時英美法對日本侵略都取綏靖態度，只有蘇日矛盾較大。如果抗戰爆發，唯一能指望得到援助的只有蘇聯。打狗要看主人面，為了巴結上蘇聯，不能不對中共網開四面。因此，西安事變的唯一成果，就是堅定了他的容共決心。因此，他可以懲罰張楊，但絕不會報復中共，只會反給他們大量的好處，蓋張楊沒有蘇聯人作後臺。

這教訓就是，誰愛國誰倒楣。偉大領袖得以倖存下來，不是有什麼了不得的鬼谷子兵法，而是因為他的對手是個真誠的愛國者。當然，蔣介石的過錯不是愛國，而是無知：他不知道“聯俄”與“剿共”完全可以並行不悖，蓋斯大林是克里姆林宮新沙皇，隨時可以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利益犧牲中共。如果魚和熊掌不可得而兼之，則他只會毫不猶豫地捨中共而取國府。

第五章
抗戰:毛澤東真正的平生得意之筆

抗戰八年，偉大統帥毛主席到底對日寇使用了什麼神鬼莫測的戰略，使得我黨成了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副部長、毛澤東嫡孫毛新宇少將在 CCTV 訪談節目中口頭發表的研究結果是：“我爺爺領導八路軍新四軍殲滅日寇 150 萬”。可我翻開官修黨史從頭查到尾，似乎就只能查到“舉世震驚”的“三大戰役”：

平型關大捷：此役據日本人說殲滅了其運輸隊 200 餘人，據朱德向延安報告是 500 餘人，據官修黨史說是 1000 餘人。咱們往多裡算，就算是 1000 餘人吧。可它卻是朱德、任弼時、林彪等人違反毛的意思打的，林彪還為此在廬山會議上作了檢查（見下）。

夜襲陽明堡機場：據官修黨史稱一共炸毀敵機 24 架（當時作戰指揮員陳錫聯向總部的報告為 19 架），被我黨教科書吹到了天上，號稱是“創造了機槍、手榴彈打飛機的世界軍事奇跡”，不過似乎和毛沒什麼關係，在我能查到的一切中共黨史資

料中，都找不到他對此有任何指示，雖則它不曾像其他“兩大戰役”一樣遭到毛的反對。

百團大戰：據 1941 年第十八集團軍總部《百團大戰各階段作戰概述》（又稱《1940 年百團大戰戰鬥彙報》）稱此役“斃傷日軍 12645 人”，“俘虜日軍 281 人”，1980 年代前出版的《中國革命史講義》（胡華主編）以及北京五所院校 1957 年聯合編寫的《抗戰中的中國軍事》所採數字與此接近：“斃傷日軍 10645 人”、“俘虜日軍 281 人”。以後官修黨史又稱“斃傷日軍二萬餘人”。就算最後這個數字是真的吧，然而該役卻是彭德懷發動的，從此成了彭的反毛罪行之一。彭本人不但在廬山會議上認了錯，說“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在文革中它更成了彭被整死的罪狀之一，甚至被寫到中學教科書裡。但凡是文革時代的中學生，想來都還記得當時歷史教科書中“百團大戰暴露了我軍實力，把日軍從國民黨戰場上吸引過來”的譴責話語。這其實是最高指示，據聶榮臻同志披露：“毛澤東同志批評說，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1]

再退一步說，就算這感天地、泣鬼神的“三大戰役”都是偉大統帥親自指揮的吧，即使採用官方最高數據，加起來也就只斃傷了日軍二萬一千餘人、摧毀敌机 24 架，這就能“打敗日本狗強盜”了？要知道，光是被毛主席反復稱讚的天目反頑戰役就幹掉了國軍抗日部隊三萬餘人，更不用說抗戰八年中一百萬國軍抗日遊擊軍的悲慘下場。除此上述三大战役之外，毛主席所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還有什麼大規模的抗日救國舉動？好像就剩下“小兵張嘎”、“海娃”、“王二小”等抗日英雄，中國聯合國常任

理事國的國際地位，似乎就是他們掙來的。至於我黨宣傳材料裡報道的那些殲滅戰，很多都是無中生有或無限誇大，而擊斃的那些將軍大佐，很多在日方提供的日軍編制中都是“查無此人”，或者人雖然查到了，但人家活得好好的，二戰結束後榮歸故里，含飴弄孫頤養天年。

因此，要知道偉大統帥在此期內如何發揮其軍事才能，只能去別的方面找，而中共要人的年譜中連篇累牘盡是記載毛主席在此期間真正的專業活動的資料。不容置疑，我黨雖然沒有打日本人，但抗戰八年，是它成長壯大、最終奪取全國政權的關鍵時期，也是毛澤東脫穎而出，在黨內奠定了不可動搖的領袖地位的關鍵時期。這兩個歷史性事件互為因果。其中一個比較直接的原因，是毛借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之機，完成了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據張國燾說，紅軍中以四方面軍人數最多，陝北本地人次之，第一、第二方面軍人數較少。毛瞞著張國燾，將紅軍各部混編，使其互相牽制，並強調黨的領導，廣泛實行政委制度，將各級政治部和軍中特工組織的職權都提得很高，派嫡系充當此類監軍，藉此把槍桿子緊緊捏在自己手上[2]。另一個原因則是衆所周知的延安整風，毛通過它在全黨全軍樹立了絕對權威，對此高華教授已在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作了充分介紹。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如中共文獻顯示的那樣，偉大領袖毛主席以他英明的戰略眼光，力排衆議，確定了中共的“抗戰”實質上是“取內戰形式的民族革命戰爭”[3]，為我黨制定了將內戰巧妙地偽裝為外戰的新時期奪權戰略，使得我黨的力量瘋狂擴張，配合日本友軍，極大地削弱和打擊了真正的敵人國民黨，奠定了戰後與國民黨爭天下的基本格局。他為我黨立下的這一殊勳偉業，奠定了他在黨內不容置疑、不容挑戰的領袖地位。作為謀略

家，這才是毛真正的平生得意之筆。鄧小平在毛澤東逝世後復出時曾對外賓說，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黨至今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我看指的就是這一條。很難設想，如果不是偉大領袖在這關鍵時期掌舵，我黨會有上臺的一天。

一、毛的新型內戰戰略

對毛澤東在抗戰爆發後夥同張聞天為我黨制定的新戰略，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作了相當詳盡的介紹。

據張國燾說，抗戰一爆發，毛澤東和洛甫就看出，日本人為共產黨解了困。蘆溝橋事變之初，他們很擔心南京不能堅持抗戰，因此在在為南京政府堅持抗日打氣。當年八月初，中日戰爭正在華北大規模進行，於是毛澤東放心了。他公開表示：“蔣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向日本那邊去了。”張聞天也很得意的說：“抗戰終於爆發了，蔣介石已無力危害我們。”這些話不僅反應出國共間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對內仍重於對外的想法。

等到國軍受挫後，毛澤東、張聞天等開始誇大其詞地說，“蔣介石對外雖然抗戰，但對內依然是像以往那樣反動。”據此斷言國民黨抗戰不會有好結果，不是在戰爭中一敗塗地，便會中途妥協。他們開始揚言，中共所領導的軍隊，不會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平等待遇；如果聽任國民黨將領們的指揮，那麼紅軍可能被送到前線去充當日軍炮火的犧牲品。如果中共所領導的軍事力量被犧牲了，國民黨便會乘勢壓迫喪失了軍事本錢的中共。[4]

這些想法，就是毛澤東和張聞天制定新時期戰略策略的出發點，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由張

聞天與毛澤東在會上做了報告，為全黨提出了中共“抗日”政策的總方針。

據張國燾說，張聞天在報告中認為，國民黨的抗戰只是片面的和軍事性的。國民黨的本質仍屬反動，並未放棄消滅中共的野心。蔣介石隨時可以與日本妥協，調轉槍頭，對付中共。因此，他認為中共的任務是既要與日本侵略勢力作戰，又要反對反動的南京統治。“他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雕，使日本和蔣介石和一切反動勢力相繼失敗，最後勝利歸於勞苦工農大衆和中共。……他強調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敗主義策略，因此肯定必須使蔣介石失敗，使日本和蔣介石等都因戰爭而瓦解”。

毛澤東繼張聞天之後發言，表明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並詳細闡述了中共和八路軍應採取的實際策略。他認為日本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倖勝之理。過去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現在抗戰既已爆發，就應冷靜認識到抗戰是艱巨的任務，國民黨的反動本質是不會改變的，只有在持久抗戰中，中共能採取正確的策略，才能使中國人民有獲得勝利的希望。

他警告大家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遊擊根據地。

毛澤東強調，中共和八路軍應該維持絕對的獨立自主。他說，八路軍此後仍應完全按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應一概用各種藉口推脫。

紅軍雖改稱八路軍，但其內部體系，一仍舊貫，不得有任何變更；尤其要嚴防國民黨滲透到紅軍中來。中共所發展的抗日遊擊根據地的一切，都需根據延安的指示處理，自成體系，在國民黨區域的中共組織，除少數人員可以露面外，仍須保持地下組織的特性，展開對國民黨的政治批評。尤其要反對漢奸和妥協活動，以期達到爭取民衆的目的。[5]

當時抗戰初起，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民族情緒空前高漲，中共高幹和將領們自然也受到影響。與會者乍聞張聞天和毛澤東提出的失敗主義策略，難免震驚，紛紛發言表示不同意。張國燾比洛甫和潤之更懂馬列，當即發言反對，指出不能用抗戰類比一次世界大戰。抗戰是民族自衛戰爭，不是一戰式帝國主義爭霸戰。列寧並沒有和沙皇建立對外統一戰線，因此才主張要沙皇失敗，而中共已和國民黨建立統戰，不能提出使蔣介石失敗的主張。蔣若失敗，中共也難逃失敗的厄運，因此必須同舟共濟到底。他提出勝利主義的策略與毛與洛甫的失敗主義策略相抗，主張中共與國民黨競賽抗戰，爭取打敗日本，靠自己的抗戰業績去贏得全國人民的擁戴。

周恩來也表示了不同意見。他分析了蔣介石個人倔強性格以及當時國內外的形勢，認為毛澤東和洛甫的顧慮並不存在，蔣既已抗戰，就絕不會中途妥協。他強調，中共應通過積極抗戰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尤其要顧到過去說過的話。過去中共表示要與國

民黨精誠合作，八路軍將開赴最前線衝鋒陷陣，現在不便在事實上表現出表裡不一。中共的獨立自主只能是相對的，不好公開違抗南京命令，可以用其他方法實現相對的獨立自主，例如向南京公開說明應按八路軍的遊擊專長分配作戰任務，在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可以對國民政府的法令陽奉陰違。他不贊成專打避實就虛的遊擊戰，認為這會被人認為抗戰不力。他主張在有利情形下與日寇進行較大規模的運動戰，即使蒙受相當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它可以在全國人民面前證明中共努力抗戰。

據張國燾說，與會者或多或少都對張毛的主張表示異議，或曰統戰政策不能變化太快，或曰應委曲求全，力爭抗戰勝利，或曰絕對的獨立自主不易實行，或反對只打遊擊戰。

毛見形勢不對，便提議休會三天，在下面分別遊說將領。復會後，他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作了些表面上的讓步。他沒敢再公開說讓蔣介石失敗的話，但仍強調要防止南京妥協傾向，也沒強調中共要絕對獨立自主，只是強調八路軍應在獨立自主的原則下行事，於是使得決議得以通過。[6]

張國燾上述證詞得到了李德的證實，他說：

毛澤東與張國燾對統一戰線與中共任務發生激烈爭論，毛認為蔣只是半心半意進行單方面的局部戰爭，無疑會失敗，國民黨遲早要投降，若國民黨部分軍隊繼續作戰，就會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共就要在全國起領導作用，中共不能再迎合國民黨，必須保持政治上軍事上的完全獨立自主，一旦情況允許或必要，就起來反對它。毛認為，最後問題在於誰能立於不敗之地，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

張則認為國民黨右翼有分裂可能，但核心並未受到觸動，戰爭提高了國民黨的威信，而且很有可能擴大為全面戰爭。中共每

次任意行動都是對國民黨的挑戰，有引起統一戰線破裂的危險，這對中國人民將是一場災難。大敵當前，必須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準則。

朱德和周恩來以及其他人主張八路軍形式上加入國軍，但不要為人同化，在戰略問題上應服從南京軍事委員會，服從第二戰區總司令閻錫山，這麼做的好處是可以從南京政府那兒得到軍餉與裝備。毛的意見與此相反，堅持組織上和戰略上必須完全自主，認為國民黨正面臨政治上軍事上的破產。朱、彭主張根據南京軍委會指令與國軍進行真正合作，但拒絕進行任何陣地戰，只進行運動戰與遊擊戰相配合的戰爭。毛則認為八路在數量上和武器技術上都不如國軍，無望在前線取得較大的軍事勝利，認為不可能發動起廣泛的人民戰爭，要求八路軍行動不要限制在指定的第二戰區，而是要到日本佔領軍後方去，在那兒完全自主地進行純粹的遊擊戰，在山區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動員群衆，建立新部隊，不斷擴大八路軍。

會議達成的妥協，是先在山西與國軍在某種程度上並肩作戰，當守不住時，八路軍就分散到整個華北去，按毛的意思開展軍事行動。[7]

近年官方出版物也部分披露了毛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

> “毛澤東在會議發言中，著重談了紅軍的戰略方針問題。他說：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能低估它，看輕它。同日本侵略軍作戰，不能局限於過去同國民黨軍隊作戰的那一套老辦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們的子彈和武器供應都很困難，打了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紅軍的戰略方針應當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的兵團和在平原發展遊擊戰爭，但要著重於山地。遊擊戰爭

的作戰原則，就是分散以發動群衆，集中以消滅敵人，還是過去那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8]

除此之外，張國燾還披露了毛對抗戰大局走向的一般估計：

“毛澤東從來不談友軍抗戰的事，我從未聽見他讚揚和鼓勵過這些英勇抗戰的表現。當南京失守，國軍向後撤退，形勢相當混亂的時候，毛澤東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觀感。他認為蔣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將整個中國的領土斷送與日本，可是日軍只能佔領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線，中共所領導的遊擊戰爭，就可以在廣大敵後地區發展起來，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國才能翻身。因此，整個中國會被蔣介石斷送，將來中共又可以從日本手中奪回來。

我聽了毛澤東這種議論，真有點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國為甚麼要完全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為甚麼不積極支持蔣介石堅持抗戰，為甚麼不積極維持抗日的國民政府，為甚麼不同抗日友軍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國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國人容易翻身嗎？我為此曾經憤怒的感到，毛澤東的想法和由此出發點而來的所作所為，其實是幫助日本侵略，毛澤東將會遺害中共和八路軍以及整個中國，簡直是一個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漢奸。”[9]

綜上所述，毛澤東對局勢的基本估計是：國民黨的反動本質並未改變，仍然是中共的死敵。蔣介石只是消極抗戰，必然要在受到日軍重大打擊後對日投降，消滅中共。即使蔣介石堅持抗戰，共軍改編為國軍後，也必然被國府視為異己，被送到前線去做炮灰而損失殆盡。日本軍事實力非常強大，國軍不堪一擊。若將中共弱小的軍隊投入抗戰，必然被比國軍厲害得多的飛機大炮

輕易消滅。由於中日實力對比懸殊，若蔣介石堅持抗戰，則大片領土必將淪亡，甚至有全國被日軍佔領的危險。

據此，毛和張聞天在洛川會議前後制定的戰略可總結如下：

第一，國府是敵人而不是盟軍，決不能因統一戰線的建立而混淆階級陣線。國民黨是表面上的盟友，實際上的敵人。抗戰實質上是新時期具有特殊形式的內戰。決不能放鬆對國府這階級敵人的警惕性，要從推翻國府的統治、最終奪取全國政權的長遠目標著眼，立足於國共合作隨時破裂的可能性，積極投入這場新型內戰，千方百計削弱和打擊國府，否則就是右傾投降主義。

第二，紅軍只在表面上接受國府改編，但絕不服從中央政府的軍令政令，一定要保持“絕對的獨立”，也就是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經濟上全面的獨立自主。換言之，中共控制的軍隊是只服從中共指揮、為黨謀利的黨軍，而非保衛國家民族的國防軍，中共控制的地域是獨立的國中之國。在國府統治區域內，中共則應秘密活動，以抗日積極分子的合法身份出場，設法從國民黨內部奪取領導權。

第三，由於日軍只能佔領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線，因此，紅軍的基本任務，就是千方百計避免與日軍作戰，以“挺進敵後抗日”的名義，分散滲透到廣大的敵後真空地帶去，收編被日本人擊潰的國軍，招兵買馬，擴大私人武裝，建立中共政權，將廣大人民組織於我黨的鐵腕控制之下，使得絕大部分淪陷區域都化為中共領地。如果全國淪陷了，日軍便在事實上代替紅軍，為中共打下了天下。

毛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近年為毛左竭力否認，誣之為階級敵人造謠。戴晴女士只因轉述了張國燾的證詞，就被那些人罵得

狗血淋頭。不幸的是，以上三條原則，每條都得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們的親口證實：

第一條，國府是理該遭受削弱與打擊的階級敵人：

毛澤東：

“同蔣介石打了 10 年，講統一戰線時，一切都忘了。”

“打蔣介石 10 年，打紅了眼；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

“抗日時期不準備奪取政權，那我們怎麼辦呢？抗日時期不準備奪取政權，還準備把政權讓給蔣介石。這跟‘和平民主新階段’不是一件事。”[10]

中共中央：

“應該明確的指出：民族統一戰綫只是改變了階級鬥爭的形式（如武裝鬥爭，沒收土地鬥爭等），但並不取消階級鬥爭。而且爲了使統一戰綫有雄厚的群衆的力量，發動組織與領導工農小資產階級日常的經濟政治鬥爭，威逼剝削者統治者的讓步以滿足他們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藉口統一戰綫而取消階級鬥爭，那只是過去陳獨秀機會主義的復活。”

“國民黨現在還是一個腐敗的軍閥官僚地主資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團，但其中願意救國的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中派的力量現在已開始佔有優勢，左派的力量還很薄弱，照現在的樣子，他不能擔負起堅决抗日救國的任務。”[11]

楊尚昆：

“1937 年 10 月 8 日，華北軍分會發出一本小冊子《對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軍任務的指示》，這是任弼時起草的，其中也就反映了太原時一部份黨的領導同志與少奇同志對形

勢分析的不同意見。少奇同志認為，在強敵面前華北早晚要淪陷，我們不必費力去幫國民黨軍隊抵抗，還是抓住時機到處去發展遊擊隊，發動群眾建立政權為好；有的用閻錫山的名義，有的可以先斬後奏，不要因統一戰線而縮手縮腳。恩來同志認為應當照顧統一戰線，任弼時同志則說少奇同志是‘民族失敗主義’。他在寫這個小冊子時，就把這種分歧寫了進去，說：‘必須反對民族失敗主義情緒與認為華北局勢無法挽救的宿命論。’毛主席看到這些話很不高興，因為他的想法與少奇同志比較接近，認為這些話是針對他的。因此，一見軍分會的小冊子，他就火了。10 月 17 日，他同張聞天致電前方，說：‘軍分會 10 月 8 日指示文件有原則錯誤，望停止傳達。’”[12]

第二條，絕不服從國府的軍令政令，放手建立國中之國，在國統區則設法竊奪領導權：

中共中央書記處：

“不應向戰區多作報告，不應向他們經常請示，許多問題應相應不理。如遇武裝衝突，有利時則反擊之，不利時應轉移被攻擊部隊至有利地區，再講對付。同時大事宣傳，以爭取中立分子之同情，以孤立反共最積極的分子。”[13]

毛澤東：

“蔣對八路軍不知下過多少無理命令，均以‘不理’二字了之。但不理不是不回電，必要時須回他幾個電報，聲明確難執行，有時須提出新的問題要求他答覆，……而且再三再四不准不休，只有不斷向頑固派提出新問題，一步一步向之逼緊，才能爭取我之獨立地位。在目前階段內兩黨鬥爭問

題即反磨擦問題上的戰術，就是攻勢防禦，而決不可採取單純防禦。”[14]

“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抗日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衆，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綫的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15]

彭德懷：

“為了堅決保證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在 1938 年春恢復了政治委員和政治部制度。規定了擴編八路軍的四種不同名稱。即：教導旅、新編旅、暫編旅、補充旅；分給四個戰略區，即：五臺山區、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各從第一旅起，擴編多少算多少，報告延安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備案就是，根本就不要請示，更不報告國民黨政府。根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給養自籌。建設了根據地，有了政權區，可徵收救國公糧；沒有建設根據地政權以前，即捐、借、指派、沒收漢奸財物，不靠國民黨發餉、發給養。到 1940 年和 1941 年，根據地先後發本幣，禁止偽幣和法幣在根據地內流通，建設‘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

“至於‘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一條，原來思想上就沒有準備實行。在當時，我們想，在日軍佔領區，蔣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著我們，一切還是照毛主席的獨立自主方針辦。到 1938 年秋六中全會時，八路軍已發展到 25 萬人，成立了許多暫編、新編、教導旅。這些從未通過國民黨，如要通過它，一個也不會准。”[16]

中共中央：

“我們的目的是改組國民黨。這必須使左派的革命份子大批的加入進去，造成國民黨內部有力的左派。我們在國民黨內部的方針是團集（結）左派，推動與聯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親日派。……共產黨員不應拒絕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不願共產黨加入的條件之下，共產黨員可以秘密加入，完全以左傾國民黨員的面目出現。”

“應該立刻動員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傾群衆到正規軍隊，地方武裝及軍事學校中，並爭取其中的領導位置。應利用民團保甲壯丁隊後備隊等各種名義，實行武裝民衆。保障軍隊及各種武裝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應該是我黨目前第一等任務。”[17]

第三條，效法跟在獅子後面吃死屍的鬣狗，跟在日本人後面“撿洋撈”，收編被日軍擊潰的國軍，佔領日軍留在戰線後方的廣大地域：

林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

毛澤東：“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

彭德懷：“黃紹竑很早意識到了。”

林彪：“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

毛澤東：“三個師只 32000 人，號稱四萬八。當時打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散發動群衆。”

彭德懷：“百團大戰後，才搞武工隊。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但對以後整偽軍有好處。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守紀律比較注意。”[18]

毛澤東：

“發動全華北黨（包括山東在內）動員群衆，收編散兵散槍，普遍地但是有計劃地組成游擊隊。”“八路軍將成爲全山西游擊戰爭之主體。應該在統一戰綫之原則下，放手發動群衆，擴大自己，徵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我們在河北的根本方針要達到以八路軍爲主，使八路軍力量擴大，主任公署和縣政權無論如何不取消。”“綏東專員已逃，你們應乘機用大力建立當地抗日政權的工作。”“在今年一年內，山東分局與一一五師至少應發展軍隊（包括游擊隊）到十五萬人槍（一一五師應分配幹部與兵力到山東全境去），中原局至少發展到十萬人槍。”“沒有自衛軍的廣大發展，即無法廣大發展軍隊，無法建立鞏固根據地。因此有組織有訓練的抗日自衛軍，至少須十倍於正規軍與游擊隊。例如山東有十五萬軍隊，至少須有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有組織有訓練的自衛軍。華中有十萬軍隊，至少須有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自衛軍。現在你們的自衛軍還太少。”“要建立這樣大的武裝力量，沒有政權是不行的。因此必須以堅决與逐步的計劃，極力爭取山東、豫東、皖北、蘇北的大部政權歸入我們與進步人士的手中。”[19]

邱會作：

“毛主席（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說，‘別人要問：“你們共產黨是利用抗戰來壯大自己的力量。”發問的人若是自己人或是可靠的朋友，你可以向他點點頭，要是別有用心，你可以回答：“沒有人民力量的發展就沒有全民抗戰！”’“要建立抗日根據地。……現在我們要到日寇的後方去，那裡日本人管不了，蔣介石不敢去，那裡就是我們的了。”[20]

弗拉基米洛夫：

“到前線去跑一趟，使我確信中共領導並不想打日本人；他們把戰爭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據地的良好時機。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隊，而是靠日本和國民黨兩種力量的對峙來建立他們的根據地。要是日本人打敗了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政權被消滅了，八路軍部隊立刻就鑽進這個地區。必要時，他們會幹掉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戰友，而奪取政權。”[21]

對中共的新型內戰戰略，常見的主要誤識有三個：第一，以為中共的“抗戰”是官方所謂的“獨立自主的遊擊戰”，其實共軍只是對日軍游而不擊，對國軍則照樣大打運動戰與殲滅戰，其手筆比十年內戰大多了。第二，以為共軍承擔的是“敵後戰場”，而國軍承擔的是“正面戰場”。其實國軍照樣承擔敵後戰場，而共軍的所謂“敵後根據地”，大部是靠侵佔搶奪國軍的敵後根據地建立起來的。第三，中共的“抗戰”並未經歷什麼“防禦，相持，反攻”三個階段，但隨著戰爭進行，共軍也確實採用了不同的戰略。官修黨史資料顯示，共軍先後或同時採用了以下戰略：

第一，分兵以搶佔敵後地盤，建立根據地：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衆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衆工作，做群衆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衆工作，

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22]

第二，偽裝抗日：

“百團大戰對外不要宣佈結束，蔣介石正發動反共新高潮，我們尚須利用百團大戰的聲勢去反對他。”[23]

“關於衛立煌要求配合作戰，請擬一部署計劃電告，此計劃中在太南太嶽兩線者於戰事發生時雖不是猛打，但應準備施行之，在其他區域者只做樣子，不應實施。”[24]

“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決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凶，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復，國民黨坐收漁利，並將進攻邊區。恩來電是轉給你作參考的，他電中反映國民黨及外國人的壓力，我們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望按此總方針調節我們的行動，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區則打得小些，使國民黨覺得我們真在打就好了。”[25]

第三，集中以打擊國軍，武力攻佔國軍抗日根據地：

“這一資本集團與那一資本集團之間，也是你我要相互整垮，這一公司與那一公司之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無不如此。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同國民黨兩次聯合（第一次是同孫中山）是暫時的，互相利用，暫時同盟。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求生存，擴大，這是己之所欲，難道要資產階級也擴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擴大，自己消滅，當然不是，要擴大，而且施之於人，不願國民黨擴大，準備條件消滅之。”[26]

“準備不惜與中央軍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與發展。”“只要我們要發展就還會有磨擦，休戰也不過是暫時

> 的。”“在戰爭區域，特別是在敵人後方，我應放手發展武裝，建立政權，建立根據地，在有理有利有節條件下，堅决打擊阻礙我發展的反共頑固派。”“反磨擦鬥爭必須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擴大鞏固軍隊密切聯繫起來。”[27]
>
> “1940 年 1 月底開始反擊反共磨擦，只三天，全部殲滅朱懷冰軍兩個師、侯如墉旅、張蔭梧一個縱隊，共十餘個團，鞏固了太行山根據地，保證了太行山根據地和山東、蘇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聯繫。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28]

這就是毛澤東為全黨全軍制定的新型內戰戰略，它確保了我黨我軍在抗戰時期的迅速崛起。

二、中共“抗戰”的真實過程

儘管偉大領袖為全黨制定了上述戰略，但許多高幹仍受全國空前高漲的救國熱潮影響，對這套英明戰略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正如毛在 1940 年 12 月 4 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指出的：“洛川會議確定了獨立自主地山地游擊戰，但前方同志不服從，到 1937 年 12 月會議及黨的六中全會才得到正確解决。”[29]

平型關戰役前，林彪連續向中央請戰，毛澤東連發兩份電報都未能制止，只好同意他用一個旅打一下。儘管林部不過襲擊了日軍的輜重隊，連作戰隊伍都不是，而且只殲滅了二百多名日軍（日方統計數字。朱德所報數字為五百人），八路軍卻付出了傷亡四百多人的代價[30]，而且其中有許多是長征老戰士。林彪見識到皇軍的厲害，這才意識到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在平型關戰鬥總結中承認：

> “我軍在目前兵力和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後襲擊其後路為主。斷敵退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辦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宜的。”[31]

日本人不好打，國軍可是容易打，跟在日本人後面“撿洋捞”更是輕鬆愉快。於是全黨很快地領會到偉大領袖的高明，採取了他的英明戰略，迅即把外戰轉化為巧妙的內戰。

總的來看，抗戰並不如官修黨史所說，分為什麽“防禦、相持、反攻”三個階段。這或許適用於國軍抗戰，但從中共公佈的黨史資料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共的所謂“抗戰”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初期的“分兵以搶佔敵後地盤”，從七七事變到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為止；中期的“集中以打擊國軍”，攻佔國軍根據地，試圖建立南北朝，甚至準備發動全面內戰，此期從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到蘇德戰爭爆發（1941 年 6 月 22 日）為止；以及後期的“蟄伏待變”階段，自蘇德戰爭爆發到日本投降為止。

在這三個階段中，共軍採用了不同戰略。

（一）初期：分兵以搶佔地盤

此期中共的戰略是雙管齊下。在國府統治區域，中共黨人使出大革命時期的故伎，以“救亡志士”的面目出場，以國府的名義迅速拉起私人武裝，旦夕之間便如惡性腫瘤那樣擴散全國。過去關在北平等地的共產黨員給放了出來，立即就到城外拉起了武裝。就連北平城外的西山，在七七事變爆發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便成立了為我黨控制的“抗日國民軍”。如果抗戰不爆發，這種奇跡根本就無從夢見。

最典型的是薄一波的經歷。抗戰爆發前，該同志和安子文、劉瀾濤等人被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裡。1936 年秋，中央批准他們假投降，於是安子文化名“徐子文”，薄一波化名“張永璞”，在國民黨報紙上發表反共啟事，聲稱“子文等因年幼無知，交際不慎”， 誤上了共黨賊船，“余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後不參加共產組織及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人的身軀從狗洞子爬了出來，這就是文革時鬧得舉國皆知的“61 人叛徒案”。

一波同志爬出來後，被黨派回老家山西，在閻錫山領導下工作，負責建立“犧牲救國同盟會”。在接受委任前，他與閻錫山約法三章，保證不在山西省的政府裡和軍隊裡發展共產黨組織。以後他又說動閻錫山，負責去籌建稱為“抗日決死隊”的新軍。他說：“和犧盟會一樣，決死隊和其他新軍隊伍也是在‘戴閻的帽子’，‘講山西話’[32]的形式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部隊建立之初，我們思想上就明確要把領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使這支部隊從一開始就成為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武裝。”1937 年 11 月初，薄一波帶領決死隊去晉東南，合法佔領了太行和太嶽的大部份地區。他本人出任山西第三區專員公署專員，管轄 13 個縣。動用第三專署專員權力，將各縣縣長改由共產黨員擔任。到 1938 年初，山西全省的 105 個縣有 70 個縣的縣長由犧盟會和決死隊的幹部充任，其中絕大多數為共產黨員。1938 年 2 月，閻錫山禁止再用決死隊名義發展部隊，他們就採取其他形式發展武裝。到 1939 年夏，山西新軍已發展到 50 個團，其中正規團 46 個，遊擊支隊 4 個，主力部隊約 5 萬人，實際兵力和武器數量都

超過了山西舊軍；加上分佈於晉東南、晉西北和晉西南地區的地方武裝達到近 10 萬人。[33]

這就是薄一波兌現對閻錫山親口作出的保證的方式——只花了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就以和平演變的方式“爭取一省首先勝利”，創建了比當年的中央蘇區還要大的根據地。最妙的是，它是用閻老西的錢和槍組建起來的。世上哪有這種空手套白狼的好事？然而它偏偏就發生了！饒是閻老西素稱老狐狸，卻也八十老娘倒繃孩兒，被我黨騙了還幫著數錢。

革命的另一手，是跟在獅子後面吃死屍的“鬣狗戰術”。隨著日軍推進，地方政權紛紛逃散，各種各樣的自衛武裝乃至土匪都冒了出來。共軍將自己的面目藏得嚴嚴實實（例如 1939 年 5 月，陳毅命葉飛率新四軍第六團準備東進至江陰、無錫、常熟等地區發展隊伍，搞武器，籌款子，相機建立根據地時，為應付國民黨第三戰區，將第六團改名為“江南抗日義勇軍”，團長葉飛化名葉琛，副團長吳焜化名為吳克剛，參謀長喬信民化名汪明，政治部主任化名為劉飛[34]），化整為零，趁亂潛入戰線後方的真空地帶，打著國府的旗號，跟在日軍後面招降納叛，收編散兵散槍，吞併民衆自衛武裝乃至土匪武裝，組織民眾，建立政權，派捐收稅，建立國中之國。日軍打到哪裡，他們就跟著接管到哪裡。完全是讓日寇代他們打天下。

正因為此，紅區才以空前速度創建起來，迅猛發展。以晉察冀邊區為例，據《百度百科》，七七事變後僅三月，聶榮臻率八路軍一一五師部分就以五臺山為中心開闢晉察冀根據地。11 月成立晉察冀軍區，1938 年 1 月就成立了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後發展為包括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遼寧等省各一部

的廣大地區，有 108 縣，人口 2500 餘萬。據彭德懷說，到 1938 年秋，八路軍便已增長至 25 萬人。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誠如劉少奇同志對葉飛同志英明地指出的，國府還主動請共軍去搶佔地盤：

> “抗戰初期，……國民黨很蠢，他還不懂得我軍能在敵後建立根據地發展壯大。徐州會戰時，蔣介石還請八路軍一一五師進入山東，幫他扯日軍的後腿，他是想借日寇來消滅我們。結果，我們不但沒有被消滅，還建立了山東根據地。所以，我們在華北、在山東開闢的根據地都是合法的，國民黨是啞巴吃黃連，沒法叫苦，這樣的文章好做。”[35]

這兒所謂“借日寇來消滅我們”，乃是典型的小人之心，不但暴露了中共畏日如虎、斷不肯為國流血犧牲的自私怯懦心理，而且竟然成為共軍公開違抗軍令、甚至發動武裝叛亂的藉口。下文將作介紹。

這就是“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發國難財的真相。如果不是日本人入侵，如果中共不借空前國難壯大自己、削弱國府，則這奇跡根本就不可能發生。十年內戰期間，我黨趁軍閥混戰起事，折騰了足足十年，但哪怕在蘇區最鼎盛之際，其面積總和也從未達到晉察冀根據地的水準。據官修黨史，中央蘇區最大時也只有 31 個縣。鄂豫皖蘇區最大時僅 20 餘縣，湘鄂贛蘇區 17 縣，湘鄂西蘇區 10 餘縣，它們的鼎盛時期乃至存在時期並不同步，在同一時刻加起來的蘇區總面積頂多也就是 50 來個縣。而且，等到蔣介石騰出手來後，所有的蘇區便都被國軍次第攻破，最後只剩下陝北蘇區 9 個縣（這是徐向前的說法，李德的說法要小得多，據他說只有瓦窯堡一個縣城，後來還丟了）。

如果日軍也像國軍那樣圍剿中共根據地，而共軍真的如他們說的對日偽戰鬥十幾萬次，難道這奇跡還會發生？莫非皇軍打仗還不如國軍？據岡村寧次回憶錄，停戰時，中國派遣軍的兵力約為 105 萬（華北方面軍 30 萬，第六方面軍 35 萬，第 13 軍 30 萬，第 23 軍 10 萬）[36]。這是停戰時的資料，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只會更多，就算平均數是 100 萬吧。據官修黨史，偽軍總數在 1943 年為 80 萬。據說八路軍與新四軍一共抗擊了 58%的日軍和 90%以上的偽軍，那就是抗擊了 58 萬日軍以及 72 萬偽軍。

1933 年 10 月，國府動用 50 萬兵力，其中還有若干戰力低下的雜牌部隊，只花了一年時間，便收復了中央蘇區全境，江西省內土共絕跡，被建成了“模範省”。日軍相當於國軍的戰力，說是以一當十並不誇張。例如昆侖關戰役，日軍以 4.5 萬兵力對國軍 30 萬，雖然第 21 旅團遭受重創（中方稱全殲），仍能在其後的桂南會戰中大獲全勝，盡復國軍浴血死戰半月多奪去的地盤。

如今我黨卻告訴大家，58 萬皇軍加 72 萬皇協軍苦戰 8 年，卻辦不到 50 萬國軍在 1 年中辦到的事！

皇軍和國府幫助我黨順利建立起來的所有的“邊區”，除了名義屬於國府外，都牢牢控制在中共手裡，國府一切官員軍人都不得進入，乃是再典型不過的國中之國。毛澤東自己就說：“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而他那個國不是“蔣介石的國”。彭德懷在其自述中坦承：“到 1940 年和 1941 年，根據地先後發本幣，禁止偽幣和法幣在根據地內流通，建設‘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法幣乃是民國當時的貨幣，卻竟然被邊區政府禁止流通，這種“抗日根據地”，與獨立的“滿洲國”到底有何差別？

然而中共的“愛國主義”價值觀卻完全兩樣，他們並不覺得不打日本人是恥辱，卻為中共的迅速壯大心花怒放，倍感偉大領袖的英明正確。1940 年 2 月，彭德懷由衷地讚美：中共“有了富於政治遠見，預見事變，並且善於處理事變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領袖”；周恩來也心悅誠服地歸順了毛[37]。 在廬山會議上，周小舟曾提到抗戰初期運動戰與遊擊戰之爭，說彭德懷因此感歎道，很久之後才認識自己的錯誤和毛主席的正確，證明彭德懷從心底敬佩毛主席。[38]

（二）中期：集中以打擊國軍

由於我黨的欺騙宣傳，大陸人中一個普遍的誤會是以為敵後只有共軍。國軍承擔的是正面戰場，開展的是正規戰，而共軍承擔的是敵後戰場，開展的是遊擊戰。事實上，國軍不但承擔正面戰場，也承擔敵後戰場，不但打正規戰，也打遊擊戰。

早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已經考慮到在抗日戰爭中要採用遊擊戰術。如參謀本部 1936 年底擬訂、1937 年 3 月定稿的《民國二十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甲案）》中，曾明文規定：“作戰時間，應有專門機關指導民衆，組織義勇軍並別動隊，採遊擊戰術，以牽制敵軍，並擾亂其後方。”1937 年秋，國府已在山西、河北留置了遊擊部隊。1937 年冬，國府在漢口召開的軍事會議進一步強調了在敵後開展遊擊戰[39]。因此，說只有中共才在敵後開展遊擊戰，乃是我黨欺騙宣傳之一。

抗戰的特點是，它是一種“雜亂戰爭”，日軍自始至終沒有一個通盤戰略計劃，卻由各部隨機因應、胡亂攻擊。因此，它從未形成整齊劃一的陣線，戰線犬牙交錯，類似圍棋。因此，抗戰

期間長期或一度留置或滯留敵後的國軍曾經非常多，其中廣為人知的當數國軍在中條山以及大別山區留置的重兵集團。軍委會要求各級國軍普遍編組特種出擊部隊，經常襲擾敵軍，並定期上報出擊戰績。在大的戰役、會戰前後，國民黨軍各部更要派遣一定數量的搜索隊、土工掘路隊、便衣隊、突擊隊、快速隊等到敵後執行偵察、搜索、破壞交通、擾亂對方等各類遊擊任務[40]。隨著淪陷區擴大，從事敵後遊擊戰的地域也跟著擴大，幾乎每個戰區均包含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敵後遊擊戰，涉及範圍達十餘省，遊擊隊數量成百上千，作戰次數成千上萬。據何應欽軍事報告，從事遊擊戰的國軍，1938 年底達 80 餘萬，1940 年底有 60 餘萬，以後經過整編，逐年減少，至 1944 年 4 月仍有 27 萬。[41]

所以，所謂“敵後”不但有共軍，更有大量的國軍甚至國軍的重兵集團。共軍擴張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與國軍發生衝突，而他們就是共軍在此期的主要作戰對象。毛澤東說：“只要我們要發展就還會有磨擦，休戰也不過是暫時的。”[42]“如妨礙我發展，須堅決消滅之。”[43]“發展當然會引起磨擦，但只有發展力量，給磨擦者以反打擊，給武裝進攻者以反攻，才能鞏固自己。”[44]“反磨擦鬥爭必須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擴大鞏固軍隊密切聯繫起來。”[45] 坦承中共的“發展”就是“磨擦”發生的原因。中共要擴大鞏固根據地與軍隊，就只能去“反磨擦”，把土地、人、槍從國軍那兒奪過來。

為此，偉大領袖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為全黨全軍制定了抗戰中期的新戰略。1938 年 11 月 5 日，毛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結論，突出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並決定“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和華南”。毛指出：在現時，有些事應該先得國民黨同意，例如將三個師的番號擴編為三個軍的番號，這叫先奏

後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實再告訴它，這叫做先斬後奏。有些估計它現時不會同意，則斬而不奏。有些如果做了要妨礙大局，則暫時不斬不奏。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並把它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46]

六中全會與洛川會議同為劃時代的里程碑。此後，黨的任務就從初期的“合法擴張”升級為“非法擴張”，或曰“反磨擦”。按毛後來的解釋，“反磨擦戰爭”實質上是“取內戰形式的民族革命戰爭”[47]。六中全會後，中共的“抗戰”就逐漸轉變為這種“取內戰形式的民族革命戰爭”，亦即從初期的從內部攘奪國府地方政權軍權以及分兵搶佔無主地帶，轉變為直接攻佔國軍敵後根據地。

之所以發生這轉變，原因是三條。第一條上面已經說過了：中共膨脹到一定程度，要繼續發展就只能去搶國軍防地。第二條是中共的急劇擴張引起了國府的戒備，從內部攘奪國府政權與軍權的捷徑已不再可行。六中全會尚未結束，周恩來即奉毛之命趕回重慶去見蔣介石，要求恢復大革命時期的黨內合作，共產黨人公開身份後加入國民黨和三青團，並保證不在國民黨及其軍隊內發展組織。蔣介石一度動心，但與下屬商量後提出只能是共產黨人退黨後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取消名義後加入國民黨，但不能再搞跨黨的辦法。雙方於是談崩[48]。很明顯，毛是想將“山西經驗”推向全國，但不幸為國民黨識破。既然不能巧取，剩下來的就只有豪奪。第三個原因是共軍的急劇擴張與中共秘密組織在國府區域內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的戒備，因而試圖限制中共的滲透

與發展。這又使得中共根深蒂固的被迫害妄想狂發作，以為國府要消滅中共，加劇了兩黨的惡性互動。

共軍在此期採用的軍事戰略，與十年內戰時無異，仍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打擊國軍”，對日本人則游而不擊。除了百團大戰是因華北根據地被分割封鎖，造成了生存危機，不得不破襲日軍的交通線外，其他地區頂多只在遭到日軍進攻，而又實在逃不了時才予以反擊，但絕不主動出擊。對國軍則大打運動戰、殲滅戰。

要在抗日的名義下大打內戰，痛殲國軍，殺害衛國忠良，當然需要特殊技巧，而這可是熟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遊民文化經典的偉大領袖的專長。在 1939 年 5 月 5 日的延安後方留守兵團軍事會議上，毛說，“中國的事，歷來如此，有槍為大”，強調要鞏固邊區必須堅持一個方針，兩條原則：一個方針就是“一步不讓”。兩條原則的第一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第二條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否則人家磨擦來，你不磨擦去，他便得寸進尺。所以，不管誰來進犯我們，都當漢奸打，堅持我們的立場，決不動搖。[49]

對所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後來作了明確解釋，那就是：“如其對我不進攻，我則步步發展，待其攻時才大舉反擊。以保持有利原則。”[50] 具體操作是：事前謀劃好要攻佔哪些國軍防區，確定哪部國軍是消滅對象，哪部國軍可用又打又拉的革命兩手拉攏過來，或至少使之保持中立，然後再不斷蠶食或直接攻佔選定的地盤。一旦到手，便將它化為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獨立王國。無論是國府向該地區委任官員或是派入軍隊，都是“進犯我們，都當漢奸打”，都要堅持“一步不讓”的方針。

例如 1938 年 12 月，國府欲調國軍高桂滋部駐防陝北。毛澤東聞訊後立即表示“我們決不讓高桂滋部來此”，不但派人向高表示反對，而且命令部下通過多個途徑設法打消蔣介石調高意圖；並令重慶、西安兩地辦事處都向當局表明：如政府調高桂滋，中共就要加調一旅到兩旅來陝保衛邊區。[51]

自己的地盤“一步不讓”，別人的地盤則千方百計去搶，這就叫“發展”。誰要想制止或限制這種發國難財、消滅國軍、顛覆地方政權的叛國行為，誰就是“反共”，就是“反動”，就是“頑固”，就是“投降”，就是“磨擦來”，就要“磨擦去”，“須堅決消滅之”。

例如 1939 年 6 月 21 日，毛致電朱德、彭德懷、楊尚昆：“在敵人‘掃蕩’後，魯南局面混亂，山東省府秦啓榮部及東北軍損失很大。我應趁此機會將第一一五師師部及第六八六團蕭華一部開赴魯南，以鞏固魯南根據地。”[52] 這完全是趁人之危，卻恰是中共所謂“發展”。

又如 1939 年 12 月 4 日，朱德、楊尚昆致電彭德懷並中央書記處，謂冀魯豫境內的石友三部企圖截斷我與山東的聯繫，朱懷冰的第九十七軍北上冀西，企圖與我爭奪太行山脈。爲此，已命平漢路東兩個團到冀西確保山地，還準備將冀中一部份部隊移冀南，冀南一部份部隊必要時也南移，以加強魯西北，向南開展工作[53]。八路軍與石友三部、朱懷冰部都屬國府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都守土有責，中共豈能阻止友軍正常調動，甚至以此為由去搶佔地盤？當然，石友三後來被八路逼得投降了日寇，但那並不能用來為共軍在此前襲擊友軍開脫。

中共向國軍敵後根據地“發展”，就是“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則類似第一次國共破裂的局部重

演——地方實力派發現自己上了當，想亡羊補牢，限制中共發展，而中共在羽翼豐滿後便翻臉不認人，公開發動叛亂。

例如薄一波去為閻錫山工作之初，曾保證決不在政府與軍隊中發展共黨，閻便信以為真，讓他一手策劃建立犧盟會與新軍，後又委他為專員，自己信守承諾，用人不疑，從不干涉過問，聽任薄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一意孤行。殊不料薄一波利用閻的輕信，不但把犧盟會建成中共外圍組織，而且在新軍中大規模清洗“反動舊軍官”，換成共產黨員。一縱隊縱隊長魯應麟是所謂舊軍官，很能打仗，卻因為堅持與日軍戰鬥，就被薄撤職。到了 1938 年下半年，中共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部隊，軍事指揮權也基本上拿過來了。

1939 年 3-4 月間，閻錫山開始悟出開門揖盜之非，在高幹會議上傳達蔣委員長關於取消新軍政治委員制度，以及文官不能兼任軍職的命令。會議還討論了取消戰地動員委員會，限制犧盟會活動，縮小專員權限，取消“進步”法令等措施。薄一波等人認為這是閻錫山下定了奪取軍權、取消進步措施的決心，遂決定牢牢掌握住對新軍的領導權，於是明確宣佈政委制度不能取消，果斷撤掉舊軍官，以中共政工幹部代之，並下令部下把犧盟會在各地區的近 70 個縣政權進一步掌握好，主要是糧食、財政和地方武裝大權，準備應付突然事變。

1939 年 8、9 月間，中共北方局、中共中央和山西省委迭發指示，下令在山西開展“反逆流”鬥爭。11 月初，薄一波召開決死隊一縱隊擴大會議，強調加強組織上的準備，掌握部隊，進一步鞏固政權，準備在頑軍進攻時進行堅決的武裝鬥爭。[54]

這可真是井落到吊桶裡了：新軍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爲了抗戰，用國家的錢和槍組建的，理應絕對服從國民政府軍事

委員會以及閻本人的指揮，效命抗日疆場，何來什麼“閻錫山下定了奪取軍權、取消進步措施的決心”？到底是誰篡奪了國防軍的軍權，把它變成私家軍？取消政委制度，不許文官兼任軍職，正是軍隊國家化、軍政分開的進步措施，也為舉國一致抗戰所必需，怎麼又成“逆流”了？而且，那是最高統帥蔣介石的命令。在衛國戰爭中抗命不從就是叛國。國軍即使以武力鎮壓，也是完全應該的。

然而這卻構成了所謂“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序幕。據中共媒體介紹，它是這樣觸發的：

> “（1939 年）12 月 1 日，閻錫山命令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決死隊第二縱隊於 5 日進攻日軍，此舉將使該部置於日頑兩面夾擊境地。因此第二縱隊拒絕執行命令。閻便宣布第二縱隊爲‘叛軍’，下令‘討伐’，以 6 個軍的兵力，向隰縣、孝義一帶的新軍攻擊。”[55]

在法理上，決死隊從來不由共產黨領導，是被共產黨人欺騙長官竊為己有的。就算所述是實，共軍也是國民革命軍一部。對抗上級軍令，拒絕開往抗日前線，當然就構成了武力叛國大罪，政府以武力鎮壓完全是應該的。

然而這卻不是中共的“愛國主義”，於是薄一波操控新軍公開叛亂，與八路軍聯手痛擊舊軍，重創後者，還反誣王靖國、陳長捷、趙承綬、孫楚等部國軍以及拒絕附逆的決死隊三縱隊一部是“叛軍”。12 月 30 日，彭德懷向中共中央建議，為鞏固華北，應徹底消滅晉西反共投降勢力，晉東南應消滅孫楚指揮之獨八旅幹部團及決死三縱隊之叛軍。毛澤東於 1940 年 1 月 11 日覆電說，目前還不是全國“下雨”之時，閻錫山是大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部份。我們要以賀（龍）、關（向應）力量首先奪取晉西

北，要鞏固晉西南，打開一條通往洛陽的路，然後向呂梁山攻擊。如此時閻錫山願意講和，則讓他佔領呂梁山大部，我只佔一小部及一條交通線就此罷手，否則戰事難免擴大。[56]

奪取晉西北，鞏固晉西南，打開通往洛陽的路，攻擊呂梁山，還事先劃定攻佔地域。莫非那些地方不是國軍防地，而是淪陷區？這到底是誰的“高潮”啊？

然而我黨就是有本事在國家危在旦夕之際“高潮”迭起，快感連連：

1940 年 1 月 4 日，八路軍總部制訂了討伐石友三的戰役計劃。隨後，冀南八路軍向石友三部發起攻擊。石友三率部逃到衛河以東[57]。大眾都知道石友三後來做了漢奸，卻不知道他主要是被八路逼反的。

同日，彭德懷命令賀、關、聶等部爭取在晉西北解決陳長捷、王靖國、趙承綬三部主力，避免與中央軍直接衝突[58]。爲什麼要解決該三部的主力？莫非他們是日軍？

1940 年 1 月 5 日，毛致電彭德懷：晋西北有賀（龍）關（向應）率兩個團去即可保障逐漸消滅舊軍，化爲根據地。晉東南已失之七縣可選擇無中央軍之數縣消滅孫楚，恢復人民政權[59]。“逐漸消滅舊軍，化爲根據地”，讀之令人膽寒，實難想像世上竟有這種毫無國家民族觀念的“民族中流砥柱”：要創建根據地，何不去日本人手上奪取？

1 月 5 日，朱、彭致電聶榮臻等，指出侯如墉、喬明禮一貫反共反八路軍，應立即抽調兵力殲滅之[60]。扣個“反共反八路軍”的帽子便可殲滅之，那八路不打日軍，是不是因為他們不反共也不反八路軍？倘確實如此，那又是何原因哪？

1 月 8 日，彭德懷向毛澤東、王稼祥報告：龐炳勳將調河北，與朱懷冰、石友三、侯如墉等部合七師之眾，難對付，建議賀龍、關向應仍回晉西北全力打擊閻錫山，掌握同蒲路西及綏遠政權；決死一、二縱隊東移太嶽；陳士榘支隊調豫東與楊得志支隊發展冀魯豫邊區；呂梁山軍事行動可適可而止[61]。所以，“砥柱”全力打擊的不是日寇，而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再無餘力留給日本人。

1 月 19 日，蔣介石命令八路軍移邯（鄲）長（治）路北，朱、彭認為那是“欲逼八路軍退出太嶽”，因而頂風上，電令劉伯承、鄧小平，著陳賡率 771、773 兩個團移駐太嶽，與決死一縱隊會合，統一指揮太嶽之八路軍與決死隊；由黃克誠統一指揮太嶽各部。[62]

1 月 21 日，朱、彭致電徐向前等：對盤踞在山東對我軍搞磨擦的沈鴻烈頑固力量，需在有理有利的原則下在軍事上打擊之，在政治上孤立之，並推翻其危害抗日的反動政權。要力求掌握魯南之蒙陰、日照、諸城、安丘、萊蕪、新汶、泗水等十一縣以及膠東半島八縣地區[63]。偌大地盤，中共要去“力求掌握”，敢問是去誰的手裡奪啊？中共有何權利武力推翻國府地方政權？

最絕的是，一邊高潮迭起，到處攻城掠地，一邊賊喊捉賊。1 月 25 日，朱、彭及其他八路軍將領通電全國，反對國民黨槍口對內，進攻邊區。[64]

1 月 29 日，朱、彭致電黃克誠，指出：壺關、長治、潞城、黎城、平順是我基本地區，必須鞏固，並盡可能爭取鞏固陵川、高平、晉城（不含）大道以西山地。對高平、陽城、晉城等地的叛軍反動政權，應尋求機會打擊消滅之。對中央軍應避免衝突。在其進犯我軍時，則給以堅決打擊，消滅其一部[65]。凡是共

軍想奪取的地方，駐防其上的國軍不是“叛軍”，便是“頑軍”。欲打內戰，何患無辭，據說這就是“槍口對外”。

就連國軍調動，也能構成共軍“反磨擦”的藉口。1 月 30 日，朱、彭電告劉伯承、鄧小平：鹿鍾麟有東進濮陽與丁樹本會合可能，我對其磨擦採取自衛立場，可先消滅反共的齊子修部[66]。連國軍兩部會合在一起都不能容忍，必欲消滅之，簡直比日軍還霸道。“先消滅”也是“自衛立場”，絕了。

2 月 11 日，據稱國軍朱懷冰部向八路軍發動進攻，11 日至 16 日，朱、彭定下了消滅石友三、朱懷冰各部的部署。3 月 4 日，朱、彭指揮 17 個團在平漢路東發起衛東戰役，至 15 日殲滅石友三部六千餘人。3 月 5 日，朱、彭指揮 13 個團的兵力，在平漢路西發起磁（縣）、武（安）、涉（縣）、林（縣）戰役，至 8 日全殲朱懷冰兩個師、侯如墉一個旅、張蔭梧一個縱隊共一萬餘人，並控制了武安、涉縣公路以南，西平羅、臨淇鎮以北地區。這兩個戰役的勝利，鞏固了太行山根據地，保證了同山東、蘇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聯繫。[67]

1940 年 2 月 20 日，毛澤東滿意地總結道：

> “蔣在華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勢，經過我們幾個月的堅決反攻，可以說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勢打下去了。邊區二十三縣已逐漸統一，華北（新黃河以北整個華北）我們已佔領了優勢，中原我們也發展了。蔣現已整個處在防禦地位。”[68]

迫使蔣“整個處在防禦地位”，也能是抗戰的偉大勝利？就是“砥柱”對民族聖戰的偉大貢獻，可以為此心花怒放？沒有中共幫忙，蔣也本來就“整個處在防禦地位”了，怎麼還忍心去雪上加霜？

中共中央書記處總結的“反磨擦”赫赫戰果更全面：

> “晉西北頑固勢力已全部肅清，（河北）石、高已潰敗，殘部退山東之荷澤，朱懷冰一個師大部被消滅，鹿、朱退（河南）輝縣”，“在華北特別是汾離公路、白屯公路、長治、磁縣、大名之線以北，我們已佔絕對優勢，山東境內我頑雙方尚在對峙中，惟我有政權之縣份已達四十縣。”[69]

據此，中共中央計劃下一步“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南江南達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於共產黨進步勢力管理之下，同時極大發展鄂中與鄂東，以便與全國工作相配合”，且要力爭在最短的時間內裡能夠達到擴軍百萬的目標。[70]

這就是中共文電披露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真實過程。不難看出，我黨釀製“高潮”的步驟，就是毛反復強調的“有理有利有節”——“有理”，就是事先看好要侵佔的地盤，千方百計巧取豪奪之，激化雙方矛盾，直至對方忍無可忍，以武力反擊或試圖收復失地，共軍便全速開動宣傳機器，惡人先告狀，作出一副受害人狀，將忠勇抗戰的國軍誣為“反共分子”、“頑固派”；“有利”，是事先選定有利的戰場，誘敵深入，以重兵圍殲之，在國軍主力被殲後迅速擴大戰果，佔領周邊地區；“有節”，則是在地盤擴大到預設指標後，便開始“呼籲和平”，作出“相忍為國”的崇高狀來。國府爲避免大局崩壞，國家淪亡，也只好默認現狀。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釀製技巧更臻化境。中共全靠它從頭建立並鞏固了華中根據地。而促進中共向華中擴張的直接原因，則是共軍在日軍佔領的華北難以生存，必須避實擊虛，去攻佔為國軍管轄、中共尚未染指的華中。

早在 1939 年 4 月 12 日，毛便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六中全會决議發展華中的方針是正確的。現在敵人準備大舉進攻華北，將來趨勢我們必將更加困難，部隊也將縮小，地區也將縮小。現在全國共産黨與游擊戰爭的主要發展方向是華中[71]。同月 21 日，中央書記處發出指示：“華中是我黨發展武裝力量的主要地域，並在戰略上華中亦爲聯繫華北華南之樞紐，關係整個抗戰前途甚大。”“新四軍在江北指揮部應成爲華中我武裝力量之領導中心，除指揮我原有武裝外，更有建立和發展新的隊伍之任務。”[72]

1939 年 5 月 4 日，毛致電劉少奇：“據陳毅電稱，蘇北敵攻高郵與韓德勤激戰中，日軍岩木師團大部移江都、六合，有掃蕩蘇北模樣，在韓與兩李（指李明揚、李長江）不能支持下，爲我奪取蘇北良機。望令葉飛部開返蘇北，在蘇北地區放手發展，在今年內至少擴大二萬人槍。韓德勤部如妨礙我發展，須堅决消滅之。”[73]

韓德勤將軍是著名的抗日功臣。台兒莊戰役期間，他率所部第二十四集團軍負責南綫作戰，在高郵、寶應一帶奮勇殺敵，成功阻擊了由揚州北進之敵，就連日酋板垣征四郎都承認韓部的抵抗非常頑强。徐州失守後，韓德勤任蘇北兵團總指揮，留在蘇北敵後堅持抗戰，在武漢會戰期間，韓德勤指揮第 89 軍等部，在蘇北敵後大舉反攻，先後以血戰從日寇手中奪回阜寧、鹽城、東台、宿遷等大片地域，形成了真正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因為戰功赫赫，他被國府任命為蘇魯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江蘇省主席。他在與日寇苦戰之際，大概做夢也沒想到毛澤東業已決定趁人之危，利用日本友軍的幫助擴大私人地盤，而他本人已被毛的瞄準鏡套住，厄運即將來臨。

1940 年 1 月 19 日，中央闡明了此期的奮鬥目標：將長江以北“發展”為中共領地，與國府劃江而治，建立事實上的南北朝。若國共全面破裂，則“大舉向南”：

> “新四軍能否向南發展，向皖浙贛大活動，抑或應過江向北，要看今後的形勢來決定。假如全國剿共，則我們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國共劃界而治，則我們不宜大舉向南，而宜向北，以求與蔣隔江而治。”[74]

爲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中央除在同一指示中強調“華中是我們目前在全國最好發展的區域，在華中可以發展”；“江南陳毅同志處應努力向蘇北發展”外，更於 1 月 28 日指示：今年內中共中央中原局至少發展到 10 萬軍隊，100 萬至 150 萬自衛軍。因此，必須以堅決與逐步的計劃極力爭取山東、豫東、皖北、蘇北的大部份政權歸入我們與進步人士的手中[75]。同月，根據中央指示，陳毅派新四軍挺進縱隊第一、第四團渡江北上[76]，首次染指蘇北。

2 月 10 日，中央軍委再次催促陳毅部進佔蘇北：“陳毅猛然發展蘇北，堅決肅清反動，建立政權，擴大軍隊 2 萬至 3 萬，鞏固根據地；尤其江南，可一直發展至淞滬、滬杭、蘇嘉三路全線，並越過淞滬線，直達海邊。”[77]

3 月 23 日，因為晉察冀地區頭年多災，軍民糧食困難，朱德和彭德懷根據毛澤東、王稼祥的來電，命令平漢路東的部隊以相當數量移動，援助新四軍與發展淮河南北，同時將磨擦中心移至華中，以鞏固華北[78]。29 日，毛、王致電朱、彭、劉、項等，同意朱、彭將磨擦中心移至華中的決心。在華中武裝磨擦中的軍事策略如下：以淮河、淮南鐵路為界，在此線以西避免武裝鬥爭，在此線以東地區則應堅決控制在我手中；將來八路軍到達華

中後，則應堅決爭取全部蘇北在我手中，陳毅部隊立即應當向蘇北發展。[79]

請注意，毛澤東口口聲聲罵國民黨“吃磨擦飯”，還令八路軍總部出版發行《磨擦從何而來》的小冊子，但這些電報明確無誤地顯示，共產黨才是吃磨擦飯的專家，磨擦中心在哪兒完全由他們選定，甚至力求建立事實上的南北朝，“與蔣隔江而治”。

為執行中央指示，3 月 22 日，陳毅所部新四軍在半塔集殲滅國軍三千餘人，打開了皖東新局面，不久即建立天長等八個縣政權。陳毅後來對半塔集“保衛戰”給予高度評價，說“半塔守備是固守待援的範例。在華中先有半塔，後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黃橋”[80]，構成了在國家危如累卵之際大打內戰的三個輝煌里程碑。

半塔集戰役後，劉少奇及時總結了該役“固守待援，誘殲國軍”的典型經驗。向葉飛面授機宜，教他怎麼去製造藉口，消滅國軍，用“自衛反擊”的方式把蘇北從韓德勤手中搶過來，還要把國軍栽為“挑釁者”：

> “少奇同志說，現在華中的情況就不同了。國民黨接受了教訓，對蘇、浙、皖，他們也比華北更重視，不再跑光了，留在蘇北為首的就是韓德勤，約有十幾萬軍隊。……現在我們爲了爭取抗戰勝利，建立華中抗日根據地，只能把阻礙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趕走，要把韓德勤佔著的地盤奪過來。這個文章怎麼做就難了。……
>
> 這個文章怎麼做？少奇同志把地圖鋪開，一邊指點著一邊告訴我說：中央已抽調山東八路軍黃克誠縱隊南下，已經到了隴海路邊；江北指揮部在皖東，四、五支隊部署已經展開；江南部隊也準備到江北。我們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

隊已快靠攏了。要解决蘇北問題，就要從韓德勤手裡將蘇北奪過來。因此，頑固派在華中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時，必須有一支堅强有力的部隊吸引頑固派來圍攻我們，孤軍堅守一個星期，充分暴露了是頑固派猖狂進攻，釁自彼開，我們就可以增援，八路軍部隊南下，皖東部隊向東，江南部隊向北，到蘇北來消滅韓德勤。”[81]

劉少奇在此承認：“從韓德勤手裡將蘇北奪過來。”爭奪的對象不是日本人，而是國民黨。就這樣，日本人、韓德勤與中共構成了個傳送鏈：韓把國土從日本人手中搶回來，中共又從韓手中搶過去，就連新四軍總部所在地鹽城都這樣。

4 月 5 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朱德、彭德懷，指出：韓德勤進攻皖東雖因失敗退返淮河以北，李品仙受李先念縱隊 5 個團向大別山脈攻擊之威脅，而有停止進攻皖東之意，蔣介石亦有停止軍事衝突，與我談判，條件是欲把八路軍、新四軍統統納入黃河以北、劃定黃河以北為我兩軍防區之企圖。但是，第一，華北敵佔領區日益擴大，我之鬥爭日益艱苦，我黨我軍不控制華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國性突變時，我軍決不能限死黃河以北不入中原，故華中為我黨我軍最重要的生命線。[82]

所以，雖然蔣介石與國軍都想停止衝突，共軍仍堅持避實擊虛，以奪取華中國軍根據地為生存前提，並為全面內戰爆發（所謂“全國性突變”）作準備。

5 月 4 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給東南局的指示，指出：“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抗日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衆，建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綫的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

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83] 這裡的“敵人佔領區域”，指的就是國軍敵後根據地。然而該電報在蘇南縣團以上負責人會議上傳達時，卻“全場振奮，指出過去關於國黨的限制未能充分發展自己”，今後“決心放手打開局面，猛然發展”[84]。

1940 年 5 月 8 日，陳毅向中央報告：“解決蘇北問題，應先向省韓（江蘇省主席韓德勤）下手。”[85]

12 日，毛致電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目前華中鬥爭應以全力對付韓德勤及蘇北其他頑軍，切實發展蘇北。對李品仙應取守勢並力爭和緩，以防蔣桂聯合以對我。”[86] 全力對付的是在蘇北敵後堅持抗戰的國軍，對之取守勢的則是另一部國軍，仿佛日軍壓根兒不存在，毛澤東何以如此有恃無恐，知道日軍只會坐山觀虎鬥，絕不會介入？

然而共軍就是有恃無恐，“猛然發展”內戰。5 月間，陳毅和粟裕令東路部隊在一月之內將國軍胡肇漢、楊忠、趙北三部武裝肅清；令第二團在近日內將江南張知衡部肅清，力求在最近一月內控制京滬路全線，待忠義救國軍東進至江陰、無錫地區時予以全部殲滅。[87]

5 月 30 日，毛致電劉少奇等人，認為“我一鼓而乾脆消滅韓已不可能。”但次日他又致電劉少奇、陳毅，要他們充分利用日本友軍的援助，策應日軍打擊國軍：“應利用敵攻河南，湯恩伯、李品仙大部被牽制機會，加速整理部隊，消滅可能消滅的韓德勤、沈鴻烈反共軍。”[88]

6 月 15 日，陳毅致電中央，謂：“目前只有集中蘇北攻擊韓或者集中蘇南打冷欣兩個途徑，……在你們未指示前我決心佈置移往蘇北。”18 日，挺進軍五團擊潰冷欣所部第四十師朱團。[89]

5 月 17 日，新四軍挺進縱隊進佔郭村，李長江多次派人索還。六月下旬，李向挺縱下了最後通牒，限三天內退出郭村。葉飛將此情況分別電告中原局的劉少奇與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的陳毅。劉少奇回電，要葉飛按他在半塔集戰役後所授秘計，“在衝突前爭取政治上的優勢”，“固守或以遊擊戰支持一二星期，讓頑固派進攻你們，你們自衛，造成充分政治理由，然後再由八路軍與四、五支隊援助你們協力側擊頑固派。”葉飛依計而行，未聽陳毅命令，固守待援，誘殲國軍。6 月 29 日，李長江率兵包圍郭村，戰鬥打響。7 月 1 日，挺進縱隊突襲李明揚軍後方重鎮宜陵，消滅其一個營和團部，李軍大恐。2 日，挺進縱隊和蘇皖支隊殲李部 3 個團，迫使李部全線潰退。3 日，陳毅對葉飛說：我們要打開蘇北局面，非把韓德勤打敗不可；要打敗韓德勤就必須爭取二李中立，不使他們投奔韓德勤。4 日，陳毅指揮挺進縱隊和蘇皖支隊分路出擊，一舉奪取塘頭，俘虜李部官兵近 2000 人，直逼泰州城下。過後陳毅卻打電話向李明揚道歉，聲稱該役是“對部下約束不嚴”造成的“誤會”[90]，以拉攏他在即將到來的滅韓戰役中保持中立。

7 月 12 日，毛致電周、劉、項、陳等，重申 5 月 12 日的命令：“華中目前鬥爭策略，以全力對付韓德勤及蘇北其他頑軍，切實發展蘇北。”[91] 再次強調全力對付國軍，不留半分餘力給日本友人。

1940 年 7 月 20 日，劉少奇與鄧子恢聯名致電陳毅並報中央與共軍其他將領，分析比較大別山、伏牛山、蘇北這三個地區的利弊，指出蘇北最有利於我發展，必須取得蘇北，為整個華中建立一個總的鞏固的根據地。並提出下一步作戰計劃：陳毅所部暫不去黃橋，在原地"讓韓（德勤）李（明揚）集中部隊從東北方向"向我進攻時，我軍"以逸待勞，嚴陣以待，最好在他來攻三五天之內我不作大出擊，在原地則應準備獨立堅持兩星期至一個月。"以便在政治上向全國輿論和蘇北群眾證明"釁自彼開"；在軍事上則等待與配合強大的增援部隊的到來，共同進行決戰，"趕走韓德勤，最好李明揚也同時趕走。"中共中央軍委指示中原局和陳毅：對二李採取緩和方針，對桂系李品仙也採取和緩衝突的態度。並指出，韓德勤部進攻新四軍可能性很大，因此蘇北已成為頑我雙方必爭之地，故華中八路軍、新四軍部隊仍須增援陳毅，以求壓下韓之攻勢，發展蘇北。[92]

7 月 25 日，陳毅指示陳丕顯，謂與韓德勤部決戰的戰場選擇已初步擬定了幾種方案。總之要遠離那些中間勢力的防區才對我有利。[93]

7 月 28 日，陳粟率隊在老葉莊、徐家橋一線擊潰國軍陳泰運部兩個團殲其一個營。當晚，以第二縱隊佔領黃橋以北及東北一線，以第一縱隊佔領搬經，截斷國軍何克謙退路，以第三縱隊攻佔黃橋及其以南地區。經一夜激戰，次晨佔領黃橋，殲何克謙部主力近 2000 人[94]。

30 日，毛致電劉少奇等人："同意劉少奇關於蘇北戰略的意見。""蘇北全部爲我必爭之地，韓德勤部攻我時，我應大舉反攻，一舉驅逐或殲滅該部，發展蘇北。如其對我不進攻，我則步步發展，待其攻時才大舉反擊。以保持有利原則。"[95]

8 月上旬，陳粟分兵發動群眾，清剿散兵遊勇；成立泰縣、如皋、靖江、泰興、江都五個縣政府；委派縣長，成立軍政幹校，出版報刊，設卡收稅，招募新兵。[96]

8 月 31 日，陳毅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八路軍應迅速南進，主力要在省韓未攻我前先行佔領鹽城之線，五支隊則應先佔領平橋、寶應之線，才能密切配合我一舉解決蘇北問題，否則要失良機於萬一。”同時表示自己“積極準備單獨解決決戰任務”。[97]

9 月 3 日，劉少奇、鄧子恢致電陳粟並報中央：“韓德勤已開始向你們進攻，這已給了我們解決蘇北問題的極大可能。現決以 9 個團參加，由蘇北全部南下，配合你們解決韓之主力，完全佔領鹽城、東台、興化、阜寧四點。這對我八路軍、新四軍今後在華中之作戰地位具有決定意義。”次日，陳毅致電中央，謂“我處即照胡服 3 日申電原則辦理”，吸引韓德勤，固守待援。同日，陳毅派黃橋著名士紳和民眾代表到泰州轉海安、東台呼籲和平，展開政治攻勢，下令新四軍放棄黃橋及其以北陣地，並致電蔣介石，通報韓德勤糾集兵力進攻及新四軍退讓情況，要蔣制止韓進攻。次日晚上，陳、粟指揮部隊反擊，一舉殲滅國軍先頭部隊第一旅兩個團。6 日，陳致電蔣介石，再度惡人先告狀：“懇鈞座立電韓主席制止友軍行動，主張公道。”13 日，陳、粟再次令二、三縱隊對國軍防區姜堰發起攻擊，以一縱隊打援。殲張少華部 1000 餘人，於次日攻佔姜堰。陳毅聲稱：“我們打姜堰的目的很簡單，是為求得和平。”此後陳毅再次發動“和平”攻勢，並拉攏二李，試圖通過他們刺探到韓德勤的部署。[98]

9 月 22 日，毛電令葉挺、項英："蘇北主力須即動手解决韓德勤部。皖南部隊及軍部以在動手解决韓德勤之前移至蘇南爲有利。"[99]

10 月 3 日，毛致電周恩來，讓他在重慶惡人先告狀，"告（國府）以韓德勤部現又大舉壓迫陳毅蘇北部隊，據陳毅稱戰事不可避免，要求黃克誠增援。我們的部署方針是：韓不攻陳，黃不攻韓；韓若攻陳，黃必攻韓。望先告何應欽停止韓之行動，否則八路軍不能坐視。"[100]

嗣後，蘇魯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再三命令新四軍撤出姜堰，經黃橋開回江南，否則即動武。陳毅爲了誘敵深入，同意退出姜堰，並以此作足宣傳文章，在姜堰邀集各界人士舉行告別會，聲稱新四軍東進黃橋以來，真誠維護團結抗日大局，一直採取退讓態度，但韓德勤既不許我們抗日，也不准我們生存，他喪失了人性，簡直是一條狼！我們是遵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的！[101]

10 月 4 日上午，國軍進抵黃橋，黃橋戰役爆發。10 日，戰役結束。國軍第八十九軍及獨立六旅等部 16 個團共 1.1 萬餘人被殲，89 軍軍長李守維在撤退過程中落水淹死，獨立六旅旅長翁達自殺。這些忠勇衛國將士抗過了日軍屠殺，卻死在共軍手中。33 師長孫啟人、99 旅旅長苗瑞林以及 117 師參謀長以下 3800 餘人被俘。新四軍攻佔海安、東台，八路軍黃克誠部也南下攻佔東溝、宜林、阜寧、鹽城等地，與新四軍在東台會合，蘇北與蘇中的中共根據地連成一片[102]。國軍在蘇北敵後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就這樣被共軍奪走了。

10 月 9 日，毛致電劉、陳並告葉、項："無論國民黨何部向我進攻，必須堅决消滅之。只有消滅此等反共部隊，才有進攻

日寇之可能。國民黨任何無理責難都不要理他。陳（毅）部大勝，振我士氣，寒彼賊膽，惟韓德勤尚有實力，我軍須集結力量沉著作戰。黃克誠部南下增援完全是正當的。”[103] 中共不抗日，還要打擊抗戰國軍，以“寒彼賊膽”，摧垮他們的士氣。

10 月 12 日，毛與朱德、王稼祥致電周恩來，告以葉（挺）項（英）屢電主張大舉進攻韓德勤、李品仙，並要求將黃克誠、羅炳輝諸部改歸其統一指揮。韓德勤一個師進攻陳毅，我反攻勝利，俘獲千餘，請周要求蔣介石、何應欽制止韓之進攻，否則八路軍不能坐視。同日致電葉挺、項英、劉少奇、陳毅和黃克誠，指出：蔣介石在英美策動下，可能加入英美戰線，整個南方有變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蔣是站在反日立場上，中共不能在南方國民黨地區進行任何遊擊戰爭，因此新四軍軍部應乘此時迅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絕對不要再遲延。皖南戰鬥部隊，亦應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堅持遊擊戰爭。韓德勤大敗乞和，顯係緩兵待援。此時黃克誠應以增援陳毅為由，派部進至東台與陳會合，以主力佔領興化以東之廣大地區，迫韓放棄反我方針，承認我之抗日根據地。同日兩次電告陳毅，強調對所獲俘虜只釋放少數壞分子，其餘一概補充自己，加以訓練，增強部隊戰鬥力。最重要俘虜官酌留數人不放，以為他日韓德勤向我進攻之人證。注意收集韓反共證據，特別是蔣介石的反共命令文件。[104]

這幾通電報最能顯示毛之厚黑：1）“韓德勤大敗乞和”，毛還要周恩來去要求蔣介石“制止韓之進攻”，而“黃克誠應以增援陳毅為由，派部進至東台與陳會合，以主力佔領興化以東之廣大地區”；2）中國加入英美戰線，不是國家免於滅亡的福音，而是“整個南方有變為黑暗世界之可能”；3）將“最重要俘虜官酌留數人不放，以為他日韓德勤向我進攻之人證”——為

日後再度進攻韓德勤預先製造“自衛證據”；4）毛的內戰武功已臻化境，飛花彈葉亦能傷人。蔣介石試圖限制共軍在國軍後方搗亂破壞的命令文件的唯一作用，便是變成掩蓋共軍主動發起內戰的煙幕彈。

10 月 18 日，陳毅致電葉挺，再度通過他向蔣介石告狀，聲稱：“職部但求生存抗日，毫無他望，對於韓氏出此親痛仇快行為，實深遺憾。惟有懇請轉呈上峰，速令韓氏停止進攻，和平解決，以利抗日。”[105]

共軍在黃橋戰役中消滅了韓部一萬一千餘人，劉少奇意猶未盡，必欲徹底消滅韓軍而後快。11 月 4 日，他向中共中央提議“迅速消滅韓德勤，統一蘇北與皖東於我手中”。10 日，劉少奇致電中共中央，決心以八路軍第五縱隊一部鉗制霍守義部，“主力即進攻寶應、射陽鎮以北之曹甸、車橋、平橋一帶韓部據點，控制淮安、寶應段之運河，得手後相機南攻興化、沙河，徹底解決韓部。”次日，他第三次請戰，建議“首先消滅韓德勤，鞏固蘇北，確保津浦路以東地區，集中全力在皖東決戰後再相機向西大發展”。毛憚於輿論譴責，決定暫等風頭緩一緩，遂與朱、王覆電：“目前即刻動手打韓德勤、霍守義、何柱國，在政治上極端不利，尚須忍耐。”[106]

11 月 18 日，劉少奇、陳毅等致電中共中央暨其他將領，第四次請戰：“現各方均來電，要求先打韓，爭取戰略上的主動，以便將來能集中力量對付西面湯（恩伯）李（品仙）之進攻。”並提出相機解決韓德勤等的四個方案。[107]

中央終於同意了。21 日，劉少奇、陳毅等向所部發出“殲滅省韓主力”的部署，決定華中指揮部“於 23 日移鹽城指揮，各部務於 26 日之前進入各自攻擊準備位置，秘密集結完畢，待

命攻擊”。26 日，劉少奇、陳毅命令：“各兵團應於 27 日進至攻擊準備位置，均於 29 日拂曉開始攻擊。”29 日，劉、陳下令 30 日拂曉進行總攻擊。當晚，先頭部隊向韓德勤部第一線馬莊、北宋莊、丁苑崗等地發起進攻，曹甸戰役正式打響。12 月 13 日，陳、粟、黃等指揮新四軍第一二縱隊與八路軍第五縱隊第一支隊對韓德勤主力所在地曹甸發起總攻，經一晝夜未能攻克，不得不命令部隊撤出戰鬥。此役共殲韓部 8000 餘人，新四軍、八路軍傷亡 2000 人。[108]

11 月 30 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彭德懷：國民黨的政策是將我封鎖於敵後與敵拼消耗，防我南移，以隔斷我軍。我在華北的主要方針是堅持鬥爭。南線黃克誠及彭明治、朱滌新支隊移華中。華中是國共必爭之地。目前南移是最好時機[109]。重申中共拒絕對日作戰，要在國難深重、強敵深入國境之際去與國民黨爭“必爭之地”的堅定決心。

12 月 4 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作總結，認爲“目前國共磨擦有和緩的可能，小的衝突不可免，但大的戰爭不會有。去年反磨擦鬥爭取得了很大勝利，創立了華中各處的根據地，我軍擴大到五十萬人。日本的方針是承認汪精衛，打倒蔣政權”，“我們在日軍進攻時和靠近日軍的地區可以大發展，因此對蔣之辦法是先斬後奏，斬而不奏”[110]，坦承“華中各處的根據地”是靠“去年反磨擦鬥爭”創立的。而且，明知“日本的方針是承認汪精衛，打倒蔣政權”，卻蓄意雪上加霜，再次命令與日軍夾擊國軍。

6 日，毛致電周、葉並告葉、項、彭、左：“爲隔斷韓德勤、霍守義兩部，打通蘇皖，以便我黃克誠部增援皖東，粉碎桂軍莫德宏之進攻起見，我蘇北部隊必須從淮安、寶應間打一缺口。打通後即可向皖東增援。”[111]

19 日，毛、朱、王致電八路軍、新四軍各將領及劉少奇等，下令開闢內戰新戰場：“綜合各方面情況，蔣桂對華中進攻是有决心的。我决以打擊李仙洲爲目的，望彭黃左令楊得志率部南下，須於一個半月內到達彭雪楓地區；望陳羅令教導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遲，應於半月內到達張愛萍地區；望葉項率部迅即渡江應於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爲要。”[112]

23 日，毛、朱、王致電劉少奇等人，下令利用日本友軍的策應，趁國軍處於困難之際消滅韓部：“在蔣介石沒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舉進攻是不可能的，因爲他沒有便利的戰場。因此你們一方面要認真準備對付蔣介石的進攻，决不可鬆懈自己的準備。但另一方面，也要曉得蔣介石的困難，他的困難甚多，沒有便利戰場即是其一，敵佔渦陽、蒙城後，這個困難更增加了。所以你們很可以利用時機積極準備一切，包括擴大整訓軍隊，鞏固與發展根據地。”要他們“首先解决韓德勤”，第二步再向淮北、皖東出動。[113]

12 月 25 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得意地宣佈：“在此次反磨擦中我們的收穫主要是取得蘇北。”[114]

1941 年 1 月 6 日，毛、朱、王覆電彭雪楓並轉劉少奇、陳毅、賴傳珠，提醒他們注意使用卞莊刺虎之計，盡可能利用日本友軍去殺傷國軍，只在國軍背後捅刀子：“不可進得太急妨礙敵頑决戰。我只在敵頑作戰地區以外之間隙部分乘機發展，對地方頑固派可消滅之。”[115]

中共不顧國亡無日，趁國軍全力對付日寇之際，大規模消滅國軍，攻佔國軍防區，激化了國共兩黨的矛盾，為皖南事變作了充分鋪墊。這裡只簡略轉述楊奎松教授發掘的有關史實，評論則由我作出，文責自負，與楊教授無關。

早在一年前，國府就在華北地區對中共破壞抗戰的犯罪行為作了調查。據統計，從 1939 年 1 月至 1940 年 2 月，八路軍與各地國軍較大的衝突就有數十起，除晉西事變奪取山西新軍之外，還有 1939 年 2 月 20 日前後消滅史省三、周朝貴所屬的河北保安第二、三旅；4 月 26 日重創河北民軍王子耀之第 15 團；4 月 28 日圍殲張靜元之第 14 團；6 月 21 日重創河北民軍第二軍分區喬明禮部；8 月中旬圍殲河北民軍第 11 旅王志和部；同月圍殲第二戰區第三遊擊師張誠德等部；10 月消滅白志沂部；11 月消滅山東保安第二中隊；12 月初消滅河北遊擊第三支隊孫仲文部；1940 年 1 月 2 日殲滅河北民軍第七縱隊趙侗所部；1 月 10 日消滅胡安烈部；1 月 11 日消滅夏維禮縱隊之李本卿部和侯如墉部；11 月 12 日消滅喬明禮部；1 月 22 日消滅王學禮部和于珩部；2 月 9 日至 11 日重創石友三部，並消滅孫良誠部一團；1 月底至 2 月初全殲山西金憲章部，2 月下旬消滅第 97 軍朱懷冰部，等等。自 1938 年 12 月下旬至 1939 年 8 月 29 日，張蔭梧所部河北民軍已先後被殲，張被迫隻身離開河北。山東省自 1939 年 9 月至 1940 年 1 月亦先後有博興保安八旅、魯東第九梯隊、招遠保安第 27 旅，以及萊蕪、東平、嶧縣及鄆城等縣的保安隊被八路軍殲滅，等等。[116]

這一系列破壞抗戰、消滅國軍的漢奸行為，引起了各地軍人、官員和民眾的極大憤慨，自然要反應到國民黨中央那兒去。1939 年 1 月下旬，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根據會議代表的要求，經蔣介石同意，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秘書處針對中共在國府“權力所及之區”內的秘密活動，擬定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9 月間，國民黨中央召開黨政軍聯席會議，擬具了《共黨問題處理辦法最高原則》以及《對某黨應取態度之原則》等秘密

文件，主張“不宜全般破裂”，但“贊成各地方之局部鬥爭”，強調“在中央立場上對各地方之磨擦衝突均視為地方事件，採取個別處理之方式”，要求“各地區之國軍於暗中劃一地境線，不許十八集團部隊自由越境，若不服制止，即將其侵越之部隊剿滅”，“默許各機關戰區及淪陷區之國軍採取任何方法肅清其內部之不良分子”。[117]

這些都是一個主權政府對中共破壞抗戰的犯罪活動的最起碼的應對措施。國民黨本該先公佈上述調查結果，再以法令和軍令形式公開發佈那些規定。然而國府卻生怕在汪逆投敵之際在日寇面前暴露內部矛盾，故而只作內部秘密規定，反而授人以柄，被毛澤東收在《磨擦從何而來》的小冊子中，用為詆毀國府的“搞磨擦”的“反共罪證”，成功地倒果為因——本來那些規定是中共“反磨擦”引出來的被動防禦，卻成了“磨擦”的由來。

1940 年初，鑒於衝突不斷，國民黨高幹上書蔣介石，建議：“將冀察戰區給予中共，發表朱、彭為總副司令，而將黃河以南以及長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隊強制調赴北方，並示意只准向東四省發展，不准向南進出，在黃河以南尤其是長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絲毫客氣，雷厲風行，禁絕並剿滅中共一切活動分子，確保國民黨之統制態勢。”其目的是“免去中共部隊與國軍雜處之狀態，並堅固自己陣容”，“使中共轉向其鋒，與倭寇及偽組織直接衝突”[118]。據此，1940 年 7 月 21 日，國民黨談判代表將《中央提示案》送達中共代表周恩來，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部開入舊黃河河道以北之冀察兩省和晉東北及冀魯交界地區”[119]，試圖逼共抗日，卻被中共拒絕。

黃橋戰役成了壓斷駱駝背的最後一根稻草，國府至此忍無可忍。1940 年 10 月 19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及

副總長白崇禧致電朱彭葉（史稱“皓電”），指責八路軍與新四軍：（一）不守戰區範圍，自由出動；（二）不遵編制，各部自由擴充；（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四）不打日人，專事軍事吞併。故命令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各部隊，限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第三問題所規定之本地境內。[120]

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這軍令都是合理必要的，只是來得太晚了。從法理上說，國府軍委是領導衛國戰爭的最高統帥部，有權調動屬下任何一部，而下屬部隊只能絕對服從。從最大限度地動員全民抗戰的角度來說，共軍握有 50 萬重兵，逼共抗日為國家民族整體利益所必需。從確保抗戰不被內奸破壞來說，它也是絕對必要的：軍令所舉每條都是事實。共軍不但不遵軍令，不守編制，任意流竄，擅自擴軍擴地，還不打日本人，不是與日軍夾攻國軍，便是武力顛覆地方政府，攘奪國軍根據地，而且還越打越大，越攻越廣，從陝西打到山東，從河北打到安徽與江蘇。爲了確保抗戰不遭破壞，當然必須制止這叛國行徑。到了 1940 年底，中央提示案指定地域內的國軍已被共軍殲滅殆盡。若讓共軍悉數撤到那一帶去，他們就再也無法暗算國軍了。如果中共真是“民族中流砥柱”，那就正好獲得了殺敵報國的廣闊疆場，根本就沒有理由拒絕。要“發展”，敵後的東四省有的是地方。

然而中共在此期的戰略目標是與國府劃江而治，建立事實上的南北朝。如果國共破裂就“大舉向南”，又豈會同意開到黃河以北？於是中共一面以朱、彭、葉、項的名義覆電，公開拒絕服從軍令，只同意將皖南新四軍部隊移到江北[121]，以實行早就謀劃好了的與蘇北新四軍會合，一面策劃“大舉向南”。11 月 1

日，毛致電周恩來等，與之商量是否發動全面內戰，以重兵突襲國府後方：

> “目前有兩個方案：（甲）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防禦。即只在反共軍進到我根據地時反擊之，我軍不打入彼後方。待彼方投降實現，人民明白真相時，再用反漢奸旗幟打入彼後方。採此方案其利是政治上我佔上風，其害是軍事上不但不能用實力制止投降，而且必被彼方數十萬軍隊將我驅至隴海路以北構築縱深封鎖綫，我將來出不去，而受日蔣兩軍嚴重夾擊。軍事上危險是很大的。（乙）政治與軍事上同時進攻，即從五十萬人中至少調精兵二十萬分路打入彼後方。如採此案，則政治上不利（人民不瞭解），但軍事上能制機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實力制止投降之可能。”[122]

共軍公開抗命，給國府出了個難題：若不言出法隨，則中央威信掃地，從此再不能號令部隊，還怎麼抗日？因此，軍令部隨即擬定《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於 11 月 14 日上報蔣介石，要求批准執行。

但若真要以武力驅逐共軍過河，國府就有可能遭到日軍與共軍大規模內外夾擊，要想生存下來，就只有向日本乞和。因此，軍令部的計劃報上去後，蔣介石遲遲不批。直到 12 月 7 日才批示：“此部署與計劃可照辦”，但又指示“暫緩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實施時間”，以後又下令將期限後延，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分別在 12 月底和次年 1 月底移至黃河以北，而新四軍皖南部隊則在 12 月底以前先開到長江以北。[123]

國軍高級將領憤激於共軍明目張膽顛覆抗戰，強烈主張武力鎮壓。何應欽上書蔣介石，要求第三戰區應準備“立即將江南N4A（新四軍）予以解决”[124]；白崇禧、徐永昌、胡宗南等人也

提出了激烈主張。但蔣介石顧全抗日大局，堅持“一面則準備軍事，一面則仍主政治方法解決，不使全面破裂”的基本方針[125]，指望在施加軍事壓力的同時，通過談判讓共軍撤到指定防區。為此，他召見了中共代表周恩來，非常激動而且坦率地告以共軍吞併蘇北給他本人造成的困境：“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蘇北事情鬧大了，現在誰聽說了都反對你們。他們很憤慨，我的話他們都不聽了。”“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衝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126]

《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經蔣批准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遂於 12 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軍駐地集結包圍，構築碉堡，準備“徹底肅清”“匪巢”[127]。但因蔣介石延遲了下令時間，計劃已無可能按期完成。顧祝同本人也只想禮送共軍至江北。因此，他不僅同意展期北移，主張如數發給被扣發的該軍的 10 月、11 月經費（黃橋戰役後，國軍暫停發給新四軍薪餉，以為懲誡）與彈藥，建議增加該軍北移路綫，指定該軍臨時集結區，還力主該軍秘密潛渡，逐次躍進，乘日軍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損失，影響北移時間。[128]

當時新四軍主要分兩部，大部在江蘇，小部在皖南。毛早就想讓皖南新四軍或移至蘇南，或移至皖東，將兩部合在一起。要去與新四軍主力會合，只有兩條路：或在銅陵、繁昌間之間渡江到皖北後再東進；或是東進去蘇南渡江北上。國府原來同意新四軍東進去蘇南。但新四軍繼黃橋戰役後，又在 11 月底發起曹甸戰役，以重兵圍攻韓德勤部，極大地刺激了國府。12 月 3 日，何應欽向蔣提議，皖南新四軍不能再去蘇南，“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規定路綫，以免該部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之攻

擊。”[129] 蔣批准了何的提議，顧祝同因此轉令皖南新四軍就地於銅陵、繁昌間渡江，經皖北北上。12 月 8 日，顧祝同要求“有關部隊盡力予以協助，俾順利迅速轉移完畢”[130]。 12 日，蔣介石明令皖北國軍李品仙部配合新四軍於 12 月底前由皖南移江北之行動。李品仙隨即作出部署，為新四軍北渡讓路。[131]

然而國軍指定的北移路線卻引起了中共疑心病發作。12 月 30 日，毛、朱致電葉、項：“據恩來稱：‘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四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佈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等語。我們同意恩來意見，分批走蘇南為好。”[132] 項英等人於是向顧祝同要求走蘇南，但顧祝同只同意走一個團，主力仍須渡江北上。項英等人乃決定：既不北上，也不直接東進，而是“先對南面包圍我之頑軍佯示威脅，吸引頑方注意，然後突然東進轉向蘇南。”[133]

但此前國軍已決定以武力威逼皖南新四軍北上，顧祝同已飭各部在茂林以南構築封鎖線。項英和葉挺完全知道這情況。1941 年 1 月 1 日，他倆致電中央：“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進，並採取游擊作戰姿態運動，發生戰鬥可能性很大，我們如遇阻擊即用戰鬥消滅之，遇强敵則採取游擊繞圈，至萬不得已時分散游擊。”[134] 1 月 3 日，中共中央覆電項英等，批准了這一計劃：“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行動，是完全正確的。”[135] 次日，皖南新四軍軍部秘密出動，南下茂林。

以上文電說得明明白白：儘管國府為新四軍皖南部隊北移指定了路線，並明令皖北國軍讓道，中共卻決定既不走上級指定的北路，也不走原來提出過、但後來因中共發動曹甸戰役而被國府禁止走的東路，卻選了一條國軍根本想不到的路，秘密南下。明

知“發生戰鬥可能性很大”，卻準備好武力威脅國軍，“遇阻擊即用戰鬥消滅之”，完全是蓄意挑起武力衝突。

對新四軍的秘密計劃，蔣介石與顧祝同都一無所知。他們還在考慮是否同意新四軍部份部隊改走蘇南，以及要不要再度為新四軍適當展期[136]。第 32 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直到 5 日才得知新四軍主力業已開拔，遂派出部隊星夜搜索。6 日上午，國軍搜索部隊在麻嶺與新四軍遭遇，短暫開火後退回。顧祝同聞報後，當晚下令給上官雲相：“為整飭紀綱，貫徹軍令，對該軍擅自行動部隊決於進剿。”[137]

1 月 7 日，戰鬥在茂林地區打響。次日顧祝同才向蔣介石及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等報告，說明新四軍不遵指定路綫北渡，其意圖“非向鎮江一帶渡江，參加攻擊我韓德勤軍，即係絕不渡江準備竄擾後方”[138]。蔣介石與白崇禧商量後，決定批准“積極肅清”。1 月 14 日，戰鬥結束，新四軍被殲七千餘人。

在此期間，白崇禧等國軍將領極力主張擴大戰果，乘勢全面進剿陝北、華中、華北等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但蔣介石不同意，他雖批准了“積極清剿”，但目的還是以此强制執行北移命令，因此明確表示：“對皖南新四軍，余只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饒而能從命”，則盡可放其北移，並再度重申新四軍應以無爲地區爲集結地，爾後沿巢縣、定遠、懷遠以東睢州之綫北渡黃河，進入指定地區[139]。直到顧祝同來電報告已全殲新四軍軍部、俘虜軍長葉挺等之後，蔣才打消此念。

國府軍委會討論此案時，白崇禧提出取消新四軍番號，將葉挺交付軍法審判，大部份與會者都贊同，但蔣介石却持慎重態度[140]。直到 16 日晚，經過反復考慮，他才最終同意了白崇禧的意見。他在日記中說：“此雖違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則應撤消其

番號，將葉項交軍法會審，徹底解決，以立威信，而振紀綱”，“若無最後制裁決心，則以後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脅，而俄國之已允撥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爲容共之要求。以後我之國權全操之於人矣。故乘俄械將運到未到之時，以表示我對中共制裁之決心，決不因俄國有大炮二百門、飛機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濟之故而有所遷就。”[141]

總之，蔣的考慮是，既不想再讓中共藉蘇俄挾制國府，得寸進尺，又不願在此國脈如絲之際開罪蘇俄，喪失唯一的外援，更怕與中共全面破裂予日本以漁人之利，以致國亡無日。其投鼠忌器、左右為難、忍辱負重、老成謀國之心躍然紙上。

中共的反應卻與此形成了無比鮮明的對比。1941年1月13日，毛澤東與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等人，指出，我為答覆蔣介石對我皖南一萬人之聚殲計劃，蘇北準備包圍韓德勤，山東準備包圍沈鴻烈，限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攻擊。“如皖南部隊被蔣介石消滅，我應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韓德勤、沈鴻烈，徹底解決華中問題。”同日另電告劉、陳：我們已向當局提出最嚴重之抗議，申明如不撤圍，破裂之責在彼。中央決定政治上、軍事上立即準備大舉反攻。[142]

1月14日，毛澤東與朱德、王稼祥致電彭德懷、左權，八路軍各師，新四軍，各戰區並周恩來、葉劍英：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迅速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蘇北、山東我軍迅即準備一切，待命消滅韓德勤、沈鴻烈，同時發出最嚴重抗議通電，並向蔣介石直接談判外，我華北各部隊須遵令提前準備機動部隊，準備應付最嚴重事變。[143]

1月15日，劉少奇致電毛、朱、王，指出：“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國民黨分裂”，“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

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爲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這穩健態度遭到毛的痛斥，他致電周恩來、葉劍英並告彭德懷、左權、劉少奇、陳毅等，指出：“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144]

1月23日，彭德懷致電中共中央，認為應堅持華北為八路軍生息之所，將八路軍基幹兵團轉移晉西北以對付蔣之決裂。同日，毛澤東覆電：17日以後，時局好轉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現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問題，而是根本決裂問題，唯軍事方針還只能取守勢，目前還不能下調動大部隊的決心。要求彭答覆：目前我能集中多少兵力？三個月內能否從華北抽五萬兵力，籌五個月經費？[145]

同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稱：“我們與蔣合作已經沒有好處，對我們沒有好處，對蔣因日本停止進攻，也沒有好處，因此這種合作已無存在之可能。”“如果日軍與國民黨反共軍配合，那我黨有很大危險，將會受到損失。”同日，他致電劉少奇：“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面投降與全面破裂的開始，我們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計不適用了。”[146]

1月26日至30日，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八路軍三縱隊司令員呂正操，挺進軍司令員蕭克，一二零師師長賀龍，魯南八路軍將領徐向前、朱瑞，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等連電中央及朱彭，請纓南下馳援新四軍，討伐親日派，驅逐國賊何應欽，並要求召回重慶代表，撤回各地辦事處，拒絕考慮繼續撤退等任何條

件。30日，彭德懷致電各師並報毛澤東、朱德：因蔣介石消滅新四軍，應討伐親日派，以八路軍主力向西北突入四川。[147]

毛澤東同意攻入四川，認為“如立即取攻勢，即須調動華北兵力，而一經調動即須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奪取陝甘），即須有决心同蔣介石打到底。”但他又覺得，中共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術人員，無法實現奪取西南西北幾個重要省份的戰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奪取西北，控制中蘇西北交通樞紐，就無法取得蘇聯的援助。因此，他強烈要求蘇聯停止對國府的軍援，立即準備“公開援助我們”，特別是設法“援助我們奪取蘭州”，以便通過蘭州接通蘇聯，接取援助。他明確表示：“如沒有飛機及攻城部隊奪取蘭州及甘凉肅三州是不可能的，而這一問題遲早必須解决”。[148]

這真是莫名其妙的群體歇斯底里。皖南事變完全是項英等人故意違抗軍令，不惜挑起誤會引出來的衝突——顧祝同的擔憂確有道理：皖南部隊既不走北路，也不走東路，卻突然秘密南下，那當然有可能不是準備從鎮江一帶渡江，去參加攻擊韓德勤軍，就是根本不準備渡江，卻想打到國軍後方去，國防軍當然只能以武力制止。更何況項英事前就準備以戰鬥消滅國軍，那打起來又能怪誰？哪怕是國軍蓄意殲滅之，那共軍也不過損失了區區七千人，而光是在此前的黃橋戰役與曹甸戰役中，新四軍就消滅了國軍一共兩萬餘人。若是再把此前新四軍在蘇南、蘇北、皖東等地消滅的國軍以及八路軍在華北各地消滅的國軍算上，少說也有十幾萬。和這比起來，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領袖還有什麼氣不平的？卻“只認進，不認出”，竟然不惜孤注一擲，欲以重兵突襲抗戰大後方四川，甚至不惜為此去乞求蘇聯派兵援助自己，與日軍共

同推翻國府。這種喪心病狂的賣國勾當，豈能是中國人（遑論“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想得出來的?

可惜斯大林不聽毛的指揮。他只要中國拖住日本，以便他心無旁騖地與希特勒瓜分歐洲，於是毛澤東只好悻悻決定推遲發動全面內戰的時間：“問題是遠方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相左，三個月來幾經往復，尚未解決。故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只能取守勢，惟須作攻勢的積極準備，以便在四個月或六個月後，能夠有力地轉入攻勢。”[149]。

1月下旬，日軍突然對河南國軍發動大規模進攻。毛澤東欣喜若狂。2月2日，他為中央書記處起草的給各地下屬的電報指出：此次河南戰役是宜昌戰役之後最大的戰役，不論其軍事結果如何，在政治上已給蔣介石以很大的打擊。因他煽起皖南事變，造成國共間深刻裂痕，敵乃乘虛而入。各地應強調宣傳蔣介石此種全力對內的反革命作法，完全為敵人造機會，如不變計，必至鬧到亡國。蔣介石在我們表示強硬立場之後，又遇敵人大舉進攻，乃向我提出廉價的妥協辦法，允許華中我軍展期北移及新四軍收入八路軍增編一軍等條件，已為周恩來堅決拒絕。蔣在危急時求妥協之心，已可概見。“我們必須堅持尖銳鬥爭立場，不達到我們必要條件決不與之妥協。”[150]哪怕形勢危如累卵，蔣介石為保存民族血脈，忍氣吞聲謀求與中共妥協，他仍然要“堅持尖銳鬥爭立場”。

同日，毛和朱德、王稼祥電令新四軍與八路軍領導人：敵向豫北進攻有六個師團之眾，湯恩伯五個軍受大損失，盡撤向平漢路以西，湯恩伯、胡宗南、衛立煌主力有被擊潰可能，桂系八十四軍亦受損失，正在混亂中。敵有佔洛陽可能，你們應不失時機集中大力向河南發展。八路軍原地不動，仍不鬆懈準備，新四軍

力爭河南，不惜全力以赴[151]。要他們再度趁火打劫，與日本友軍夾攻國軍，並再度強調“全力以赴”，不留半分餘力給日本人。

劉少奇立即響應了毛的這一號召，2 月8 日，他電令下屬：“湯恩伯部已狼狽西撤，損失極大。敵佔太和、項城、南陽、鎮平等地，並有向洛陽進攻之勢。我彭雪楓部主力已西進至闞集及其以西板橋集、口孜集、江口集等地，設法控制新黃河以東地區，並相機以一部渡過新黃河，向平漢路東發展。彭部現正肅清皖北地方頑固勢力。我李先念部已北進向豫南發展。皖東四、五支隊及游擊縱隊應密切注意敵人對大別山的‘掃蕩’，而不失時機的向皖西發展。目前你們在戰略上的任務是建立桐城、廬江、舒城地區的游擊根據地，加强無爲陣地。”“同時你們要負責到江南蕪湖附近建立根據地。”[152]

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毛指出日本人爲什麼要進攻河南：

> “日本人不願意我們去華北。東條公開說：‘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共產軍去華北，破壞日本利益。’這一點我們過去却沒有估計到。”[153]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若共軍撤到黃河以北，失去了在國軍根據地內擴張的可能，當然要“破壞日本利益”，卻能增進中國利益；而中共留在黃河以南大規模殲滅國軍，破壞了中國的利益，卻增進了日本的利益。所以，當國府試圖逼共抗日時，日本人當然不能坐視，要對中共慷慨施以援手，使國府逼共抗日的政策不得不流產。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只能針對國軍在河南的重兵集團下手，而不能在國共雜處的華中地區發動進攻，以免不慎摧毀共軍，使得那事實上的第五縱隊再也無法從內部顛覆國府。日本人從來精通這一套，當年在日俄戰爭爆發時資助列

寧，縱容孫中山顛覆大清以及先總統袁公，等等，早就是輕車熟路了。毛澤東不學有術，對日本人毫無瞭解，這才會“這一點我們過去卻沒有估計到”，只知道慶倖日本人代他粉碎了國府逼共抗日的計劃，為此幸災樂禍：“（蔣介石）又沒有料到華中大舉剿共的軍隊會遭到敵人的掃蕩，破壞他原來的計劃。”[154]

但毛將抗戰時國內的三大勢力看成是“蔣、日、我，三國誌”，說得確實很準確。不過，那是中共和日本人形成事實上的蜀吳聯盟，彼此默契策應，共抗國府那“魏國”。在對下級的指示中，毛多次明確無誤地指出了敵我友關係的實質。

1940年11月30日，毛致電周恩來等，指出蔣介石“對敵對我沒有防線，這是其外部不穩固。”[155]，明確地把中共與日寇一道劃為國府的“外部”。

1941年4月5日，毛澤東等致電八路軍與新四軍領導，對山東、華中的戰略部署提出意見，指出：“在日蔣矛盾依然尖銳存在條件下，反共軍向我大舉進攻是不可能的，這一點給我黨在山東、華中鞏固擴大根據地以有利條件。”“但山東、華中敵、頑、我的三角鬥爭是長期性的，三方中無論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決問題。”“因此你們戰略部署須適應上述根本情況，作長期打算，勿為臨時消息所左右。”[156]

這就是說，“三國”的實力達成了一種均衡，誰也無法迅速吃掉誰，至少在山東與華中如此。既然如此，將“頑、我”的力量加在一起，不就能壓倒“敵”的實力，將日寇至少從這些地區中驅逐出去麼？“砥柱”為何不願這麼幹？很明顯，若是這麼幹，我黨便再也沒有機會發國難財了。同理，“我”若和“敵”聯手徹底滅了“頑”，則也就無法再養寇自重、籍寇自肥，只怕還要被“敵”徹底掃蕩。因此，最有利於“我”的辦法，還是利

用日蔣矛盾“鞏固擴大根據地”，將“敵”視為統戰對象，實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將“頑”視為打擊對象，實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1941年8月17日，毛澤東與王稼祥致電陳毅、劉少奇：“對待偽軍應採用德威兼施辦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範建立我軍的威權，但專打則勢必結成生死冤仇，不打與專打兩個極端政策對我們都是不利的。”“對偽軍中的兩面派分子，應控制使他們不完全倒在敵人方面來反對我們。”“我們應耐心地採取七擒孟獲政策。”[157]

由此可見，中共對“頑軍”與偽軍的態度完全不一樣，對“頑軍”是“全力打擊”、“全力以赴”、“全力對付”、“不怕破裂”、“猛烈反擊”、“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對偽軍則示之以威，結之以恩，只需讓其承認並尊重自己的實力即可，不能“結成生死冤仇”。這種“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令侵華日軍極大受益。國軍地方部隊受不了兩面夾擊，紛紛投降日本人。“頑軍”長官們這麼幹，倒不是出於其“階級本性”，而是共黨不給他們別的選擇：投靠日軍後反倒成了“孟獲”，能享受中共的“恩德”，從而保存實力，而若投靠共軍就只會被我黨將其部隊徹底消化後，把他們當作糞便排出去。

據岡村寧次說，他在就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後，瞭解到防區內的國軍沒有中央軍，都是地方軍，乃是各派系舊軍閥，雖接受中央政府軍餉，但對蔣介石未必忠誠，只求保存實力，因此他要求部下對這些地方軍進行誘降工作，結果非常有效。從1942年春開始，那些將領陸續投降，到43年秋幾乎全部歸順日軍。據他估計，到戰爭末期，投降日軍的地方軍兵力共約40萬人，其中華北部分約30萬。他說，這些將領對蔣介石不夠忠誠，“對國家民族

倒有相當誠意”，他們初次見到他時就說：“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道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158]

如所周知，除了個別例外如何鍵外，抗戰前還真沒有幾個地方軍閥與我黨有什麼深仇大恨，一般都對剿共毫無興趣，更對共黨本性毫無認識，因此多與我黨密謀倒蔣，是我黨的統戰對象，事實盟友。陳濟棠、蔡廷鍇、陳銘樞、李宗仁、劉湘、楊虎城、張學良、閻錫山等人，都曾與我黨有過勾結。抗戰爆發後，許多雜牌部隊開頭還打得非常勇敢頑強，然而滯留在敵後的軍閥們到後來卻與我黨成了仇人。這仇恨竟然大過了國仇，以致連在台兒莊戰役中拼死殺敵、死不後退、因此立下大功而被舉國愛戴的名將龐炳勳都投降了日本人，您說我黨“反摩擦”的威力大不大？

（三）後期：蟄伏待變

1941 年 6 月 22 日，蘇德戰爭爆發，毛澤東對蔣介石咄咄逼人的兇焰頓斂，不敢再像過去那樣“不怕破裂”、“全力打擊”國軍了，以二十萬精兵分路打入四川的宏偉計劃更是收了起來。中共的“抗戰”因此進入了“蟄伏待變期”，亦即在華北停止擴張，精兵簡政，蟄伏待變，在華中則堅持“反磨擦”，但以不致全面破裂為度。

毛澤東過去對國府態度強硬，是因為他有恃無恐，自覺有蘇聯做他的強大靠山。這就是蔣介石為何覺得中共“藉外力要脅”他。確實如此。毛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159] 那意思是，這兩點

就是老蔣的死穴，我們大可照準了死捏，只需放手打內戰就是，他們再吃天大的虧也只能敢怒不敢言、敢言不敢行。因此朱德才會在內戰大獲全勝後說：“他們不做聲，我們也不做聲。他們打敗了不做聲，我們勝利了，何必那樣來宣傳呢！”[160]

蘇德戰爭爆發使得毛驟失後盾，原來壯如西班牙鬥牛的一口底氣頓時洩了。他迅即調整了戰略，放棄了與國府劃江而治、必要時發動全面內戰的戰略目標，無論對日本人還是對國府都儘量保守既有地盤，絕不容許國軍進入他的獨立王國，但一般不再對國軍發動大規模進攻。他知道，沒有蘇聯援助就不可能推翻國府。現在蘇聯已自身難保，中共唯一明智的戰略就是苦撐待變，待蘇聯打贏了戰爭，再挾蘇援與蔣爭天下。

在內部文電中，他把這方針講得十分清楚。1941年7月12日，劉少奇、陳毅致電毛澤東，說：“如日本向蘇聯進攻，我們當號召全國向日寇進攻，即使國民黨不積極反攻，我八路、新四軍亦必須獨立反攻，以牽制日本，敵後某些據點可能放棄。”18日，毛澤東覆電，指出：“八路、新四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於我於蘇均不利。”“全局決定於蘇聯打勝仗。”“我們對蔣還是既不讓也不攻的方針，讓地盤給蔣在我既事實上不可能，他也決不會同日本拼。”[161]

因為這“戰略退卻”，他先後幾次對共軍的“反磨擦”略加約束。例如1941年8月17日致電彭德懷，同意其派一個團帶幹部去中條山十縣發展遊擊戰爭，“但以不使衛立煌感到威脅為度”[162]。同日，他致電劉少奇、陳毅，同意其將“領導機關在最困難時移至皖東”，“但不能大舉向西發展。目前中蘇英美、國共兩黨均亟需聯合對付法西斯，桂系李、白亦與何應欽有區別，故不

宜大舉西向。”[163] 1944年4月5日，他和朱彭致電羅榮桓等，指出“日蔣衝突今年必更劇。爭取國內平靜，拉蔣打日，是目前政策中心。你們大舉部署打頑，極不合宜。除非頑部進攻，我可以在自衛立場上打之。具體作戰，須取得中央同意。”[164]

但毛的“戰略退卻”非常有限，也就只是放棄建立南北朝，不再主張“不怕破裂”、“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而已。遍查中共要人年譜，他約束部下發起進攻也就只有過這麼幾次，其退讓的底線非常明確而且堅定。1941年7月30日，他致電黃克誠並告劉少奇，預想“如日冒險攻蘇，蔣迫我北上，我之方針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軍事上仍然是長期的遊擊戰爭。”“華中山東部隊決不北上，對蔣之進迫則取自衛政策，對國民黨的每一反共宣傳與反攻行動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針。”[165] 所以，哪怕在他假想的最黑暗的局面出現時，毛的戰略目標仍是積蓄力量準備最終推翻國府，其堅決拒絕北上抗日的決心堅持不變。

既然不敢像過去那樣大規模進攻國軍，而且華北的“土頑”也給“磨”光了，又不敢去對偽軍進行“反磨擦”，再加上百團大戰惹惱了日軍，開始掃蕩華北共軍，中共便只能韜光養晦，決定“目前敵後抗戰的總方針是熬時間儲力量”[166]。蘇德戰爭爆發前夕，毛便命令部下“曲綫救國”， 保存實力：

> “一般說，我黨我軍在此種三角地帶（引者注：冀南平原一類地區），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善於隱蔽自己，保存實力，……對於民眾中某些被迫應付敵人的行為，……應該因勢利導成為有計劃性的應付敵人的辦法，甚至成為策略。……應多採用兩面派政策，加強偽組織偽軍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蔭蔽自己）。”[167]

蘇德戰爭爆發後，他重申這一命令：

> “在這一新階段中，我之方針應當是熬時間的長期鬥爭，分散的遊擊戰爭，採取一切鬥爭方式（從最激烈的武裝鬥爭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兩面派的方式）與敵人周旋，節省與保存自己的實力（武裝實力與民衆實力），以待有利的時機。”[168]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毛開始把各地幹部召到延安去，以“利用時間，休養兵力，恢復元氣”，只在嘴上抗日：“但八路軍新四軍之戰績，應廣為宣傳，尤其對海外的宣傳，應當加強。”[169]此後中共中央更鑒於“在敵後發展的頂點，早經過去；由於根據地和軍隊的減縮，在數量上亦允許從現在的工作中抽調一部出來”，決定“華北及華中各戰略區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條件下，應抽調大批幹部送來延安保留培養。”“選送的幹部，軍隊中應該是營級及其以上的幹部；地方應該是縣（級）及其以上的幹部。”[170]

營級以上的幹部都送到延安去“保存培養”，還打什麼仗？從 1941 年年底到中共七大，除了豫湘桂戰役爆發後一段時間內，華北共軍實際上是處在停戰狀態，提前進入了“和平民主新階段”。毛澤東利用這段休戰期，發動延安整風，徹底整垮整服其競爭對手，建立了他在黨內的絕對權威。蘇聯駐延安的情報人員弗拉基米洛夫在其日記中對此作了大量記述，指出：“實際上，八路軍和新四軍自 1941 年起就停止了對日作戰。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對日戰鬥發生在 1940 年（即大家知道的百團大戰）。”[171]

毛澤東為何能與日寇休戰？周佛海 1943 年的幾則日記意味深長：

三月二日

筱月來，談共黨不滿渝方，欲與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漢年在滬與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無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欲與余相見等語，因身體不適，約改期再談。

三月七日

篠月來報告毛澤東密派代表馮龍來滬見余，表示共產黨願與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統一。事出意外，考慮再四，授以原則數點，囑其接洽後再與余會談。

【日記編者蔡德金註：

馮龍，馮少白。時任新四軍司令部參謀處科長。篠月，即邵式軍，馮龍的姑夫。時馮龍奉新四軍政委劉少奇、軍長陳毅之命，往上海偵察敵情和採購物資，通過邵式軍的關係，與周佛海進行了接觸。】

三月八日

筱月帶馮龍來見，告以對外和平、對內統一之大義，並分析國際形勢，謂英、美對蘇終不永久合作，日、蘇或有提携以對付英、美之一日。渠言來滬係奉毛之命令，僅其最上層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當返延安報告等語。談一小時辭去。其用（意）何在，殊難揣測，當一面與之周旋，一面監視其發展也。公博對此事亦注意，允與馮晤談。[172]

馮少白帶來的口信，與毛澤東在蘇德戰爭爆發前對國內外“階級陣線”的劃分（詳見下）驚人的一致：國際上指望日、蘇“提携以對付英、美”，而國內則仇“頑”親偽。可證他與周佛海秘密接觸確實是“奉毛之命令”，告訴周的確實是“僅其最上層三四人知之”的毛的意圖。

“奉毛之命令”與敵偽來往的更有中共特工頭子潘漢年。“高饒事件”發生後，潘漢年向陳毅談了 1943 年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見汪精衛的經過，並且將寫好的材料托陳毅轉交中央。陳毅將材料直接轉送毛，毛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潘漢年被判刑 15 年，繫獄至死，死後多年才獲得平反。

潘被抓起來時，羅青長擔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兼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受命調查此案。他們查閱了 1939 年 3 月到 1948 年 8 月潘漢年與中央來往電報和有關記錄文件，發現：“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而且當時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許的。中央對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據此，中共另一特務頭子李克農於 1955 年 4 月 29 日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其中與敵偽秘密來往有關的三條是：

> “（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利用日本駐港副領事刻戶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報告。（三）潘漢年提供了決策情報：（1）關於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他在 1941 年 6 月 13 日報告說蘇德戰爭一觸即發，延安於 6 月 20 日收到。（2）蘇德戰爭爆發後，日軍究竟是南進還是北進的情報。（3）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情報。這是當時延安，毛主席、黨中央都是極為關注的問題，是起了決策作用的戰略情報，得到了中央的好評。”[173]

潘漢年的身份，對日偽根本不是秘密。倘若中共是抗日組織，他怎麼可能“打入敵偽組織”，不被抓起來？然而他不但能深入虎穴，還能“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甚至

利用到袁殊、胡均鶴、李士群、汪精衛那些頂級漢奸以及日本駐港副領事刻戶根木和小泉等人頭上去，並被李士群、胡均鶴等人如此器重，以致倒屐相迎，要“挾持”他去見汪精衛，還向他提供極爲準確的重大戰略情報。這是怎麼回事？莫非日僞高官會向一個抗日組織的高幹慷慨單向贈送絕密情報？就算李士群乃至汪精衛都想投誠，總不至於連日本副領事也想加入中共吧？如此高價值的戰略情報，當然只可能用價值相當的情報去交換。請問那又是什麼？總不可能是美軍的吧？中共間諜能拿出來的專業產品，不就是國府的戰略絕密麼？

羅青長同志還披露：

> “過去毛主席是很讚賞潘漢年的，30 年代潘漢年同福建十九路軍和廣東陳濟棠以及同南京國民黨的談判，毛主席都是參與領導或直接領導的。延安時期潘漢年發回的電報，毛主席都看過。潘漢年做的幾項重要工作，如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等情報，策反敵僞工作，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等，中央都知道。毛主席多次稱讚上海的情報工作。“七大”時，毛主席曾經表揚過上海的地下工作，對劉曉、潘漢年都稱讚過。進北平後，中央在考慮開展外交工作時曾議論要潘漢年擔任駐英國大使。可見中央過去對潘漢年很信任。”[174]

既然如此，為何潘漢年對陳毅說出他去見汪精衛的事，毛便龍顏震怒，要把他抓起來呢？李士群、周佛海、陳公博、日本領事都見得，汪精衛卻見不得，這是什麼道理？級別越高，獲得高價值戰略情報的可能性不也就越高麼？爲什麼潘漢年從此不能信用？是不是因為此事只能由中共“最上層三四人”得知，而潘居然將此事洩露給並不知情的陳毅？

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黑的一頁，中共與日偽到底做了些什麼骯髒交易，大概世人永無可能得知詳情了。儘管如此，根據中共的實際表現，不難推知他們和日偽結成了攻守同盟，互換戰略情報。除此之外更有“互相提攜，共存共榮”。弗拉基米洛夫在1943年1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

> “解放區出現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中也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全都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到處都在做非法的鴉片生意。例如，在柴陵，遠在後方的第120師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貨物都是由淪陷區倉庫直接供應的。在第120師師部裡，討論的中心不是戰鬥任務、作戰和其他軍事問題，而是怎麼做買賣和賺錢。
>
> 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嚴令八路軍和新四軍各部隊不得對日本人採取任何有力的作戰活動。一句話，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擊就往後撤，有可能就休戰。中共正重新部署其精銳部隊。它們要撤離華北地區。新駐區是特區。”[175]

在其日記中，他大量記述了中共的鴉片生產與貿易，說具體負責出售鴉片的是中共特工頭子李克農，他利用與秘密會黨的聯繫傾銷鴉片。1944年4月，因為外國記者團要訪問延安，中共還緊急動員了359旅和第一旅，去把通往延安及其冬季營地道路兩旁幾百公頃的罌粟剷了[176]。

對中共歷史上這無比骯髒的一頁，已有獨立研究《紅太陽下的罌粟花》作了介紹。這裡只想指出，弗拉基米洛夫所說中共與日偽大做生意的事，得到了當時負責財經工作的邱會作的證實。

他在回憶錄中說，約在1939年11月間，山東分局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提出，從膠東進口日貨，可以取得大量稅收，建議中央派一批財經幹部到山東建立稅收工作，每月可為中共中央籌到5-10萬法幣。毛、周、李富春等人對此極感興趣，派邱會作率近百人的財經工作團去山東，後來去了豫皖蘇邊區，“湯恩伯大量進口日貨的通道被我們控制，我們立即組織淮上地區的稅收，開闢財政來源。在淮上一年多的時間里，我們的稅收工作，每月能搞到數萬元，甚至十餘萬元。”[177]

與日偽和平共處，友好通商，使得延安那窮山惡水在全國“先富了起來”。邱會作在離開延安4年後回到延安，驚喜地發現：

> “1944年4月間，我到了延安，進黨校學習。本來對延安並不陌生，但延安一切都變了，變化最大的是大家都豐衣足食，物質生活豐富，精神狀態很好。延安保存了很大一批幹部，大家都在精神煥發地攻讀馬列主義，整風學習。”“邊區的生產發展起來了，享受到了延安的豐衣足食。中央能集中數以千計的幹部到延安學習，也是在有飯吃的條件下，才能辦的事”“黨校的生活也是不錯的，同三七年抗大的生活相比成了明顯的對照。抗大時期幾乎天天吃不飽飯。現在，黨校不僅有飯吃，而且吃得比較好。”[178]

當然，和平共處、友好通商、平等互利的對象只限於日偽軍。對國軍，共軍的大規模進攻雖然在此期停了下來，但華中“打頑”從未停止。下面只舉《毛澤東軍事年譜》與《陳毅年譜》中的幾例內戰記錄：

1941年8月3日，毛、朱、王、葉致電陳毅、劉少奇、賴傳珠：頑軍霍守義師奉蔣介石令北竄魯南並趁機擴佔其活動地區，望相機消滅之於北上途中。[179]

1941年10月14日，爲阻止國軍韓德勤部接應湯恩伯東進，陳毅集中6團兵力發起程道口戰役，先後攻克國軍駐防的史家集、仰化集、丁莊、畢莊、張莊、大行莊等外圍據點，21日攻克程道口。此役共斃傷韓部保安第七旅旅長兼第三縱隊司令王光夏等部190餘人，俘獲1230人，繳獲大量武器彈藥。[180]

同年11月7日，新四軍九旅擊潰頑軍耿聾子部，繳獲甚多。陳毅聞訊於次日致電賴傳珠，謂擊潰耿聾子是打了東進反共軍的先鋒。[181]

同年12月1日，李品仙、韓德勤部擬於9日開始東西合進，約15日到達歸仁集後交接子彈。賴傳珠電告陳毅，決定先打李後打桂系[182]。連國軍在抗戰中交接彈藥都要以武力制止。

1942年3月22日，陳毅聞皖東北頑軍又有東進消息，指示四師設法打擊之。[183]

1943年3月17日，新四軍進攻山子頭一帶的韓德勤部，戰至18日上午，俘韓德勤以下官兵一千餘人，迫使已越過津浦路的王仲廉部以及韓部第89軍倉惶退至津浦路西。4月1日，在簽訂了與韓會談的備忘錄十條後，新四軍禮送韓德勤出境。至此，韓德勤身為江蘇省主席，在江蘇省內的唯一轄地就只剩下陳毅慷慨送給他的一個鄉。[184]

弗拉基米洛夫等人也向莫斯科報告：

> “毛澤東有些片面地和明顯不適當地評價了國共關係和他們所參加的這場對日戰爭。毛澤東電報的數字是從有傾向性地刻意為最近到延安來的外國記者團準備的材料中拿來

> 的。事實上，特區領導層相信，蔣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敵人。”特區領導人現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為應付即將到來的國共衝突做好一切準備。而這樣的作戰實際上一直都在進行，僅僅在 1943 年裡，“新四軍就對中央軍進行了 724 次戰鬥，結果，擊斃擊傷 8181 人，俘獲 9879 人，奪取了 34 個據點，以及 8622 支步槍，507 支散彈槍，以及 200 挺機關槍。”因此，日本在 4 月 17 日發動的針對河南地區的大規模進攻，明顯地受到了毛澤東等人的歡迎。“中共無意在這一地區幫助中央軍防禦日本人的進攻”[185]。

這兒說的是日寇在1944年4月間為打通大陸交通線發動的豫湘桂戰役。國軍一潰千里，再次為我黨創造了撿洋撈機會。4月22日，毛致電指示滕代遠、鄧小平等：在敵南犯空虛時，應乘機開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為將來可能時開展豫西工作的基礎[186]。10月間，中共中央令八路軍組成南下部隊，渡過黃河進入河南，建立河南根據地；派戴季英、王樹聲、劉子久、陳先瑞等從陝北率兩個老團與大批幹部進入河南活動，建立“河南人民解放軍”；令新四軍南下發展蘇浙，西進發展豫東、皖北；並在廣東發展遊擊戰爭[187]。這當然又意味著消滅滯留敵後的國府地方政權、地方部隊與人民自衛武裝。共軍將領彭雪楓就是在指揮消滅駐防河南-江蘇交界地區八縣的“頑軍”時陣亡的。

隨著蘇軍在戰場上節節勝利，毛的底氣又粗了起來。1945 年 4 月 1 日，他和周恩來、朱德特地向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打招呼，希望美國在中國發生內戰時，對國共雙方都採取不插手政策[188]。待到七大開過，他便再度準備打到國府的後方去。根據邱會作回憶錄，七大以後不久，約在 1945 年 6 月間，中央組織部召集會議，彭真傳達了毛的指示：

> “他說，毛主席決定要向南方發展，這是對抗日戰爭正確路線新的發展。過去我們只強調了深入日本佔領區的敵後，這是對的，但又不全面，現在要向另一個敵後，即國民黨佔領區的敵後，這就全面了。國民黨佔領區就全國來說，湘、鄂、贛是國民黨的薄弱環節。日本人的勢力也不雄厚。蔣經國在贛南能夠站住，我們也一定能站住！我們黨內，過去有些人（指王明等人）怕得罪蔣介石，不敢到他的‘家裡’去搞革命，吃了大虧。現在這些人都改變了認識，糾正了錯誤，我們的事就好辦了。我們只要堅定地不怕日本人，不怕國民黨，我們就一定勝利！中央已經決定，由陳毅同志率數百名團以上幹部，其中要有相當數量的高級幹部，向南方發展，恢復湘、鄂、贛、閩四省蘇區老根據地，南方會成為大的革命根據地。”

會後成立了南下幹部工作團。毛、朱、彭德懷、康生等接見了南下幹部代表，毛還鼓勵邱會作：“興國佬，打回老家去！”只是因為蘇聯出兵東北，幹部團才在派出後又改被派往東北。[189]

綜上所述，中共的“抗戰”，從頭到尾都是偽裝了的內戰，其真正的作戰對象一直是國軍，其要旨始終是“專門襲擊國民黨，不救中國助東洋”，對日偽軍像春天般溫暖，對“頑軍”如嚴冬一般殘酷無情，靠“反摩擦”來壯大自己。這其間毛雖因蘇德戰爭爆發一度稍事收斂，但那不過是“花落自有花開日，蓄芳待來年”罷了。

三、毛澤東在此期犯的戰略錯誤

（一） 遲遲不想“招安”

這個問題前面已斷續介紹過，這裡再著重講一下。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獨霸了全東北，激化了蘇日矛盾。1933 年，希特勒上臺，蘇聯面臨著兩面受敵的可能。斯大林開始考慮放棄顛覆國府的方針，轉而利用中國與日本對抗，並在全世界結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1935 年 7-8 月間，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季米特洛夫在會上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在王明主持下，經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閱，中共代表團於 8 月 1 日提出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稱：“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是年底，王明在《救國時報》撰文，宣傳“聯蔣抗日”。1935 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國時報》不斷刊文，呼籲國共合作抗日。1936 年 1 月 4 日至 9 日，《救國時報》連載王明的文章《第二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正式提出“逼蔣抗日”的主張。[190]

因為中共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繫中斷，中共未能及時得知《八一宣言》。但 1935 年 11 月，張浩從蘇聯潛入陝北，向中共中央及時傳達了莫斯科的最新立場。然而毛澤東卻對莫斯科的指示陽奉陰違，另搞一套，直到 1936 年 4 月，他還告訴張聞天：

> “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討日令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191]

所以，“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只不過是中共“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為此，毛還與張學良、楊虎城和其他軍閥密謀策劃“西北大聯合”。毋庸贅言，如果中共就這樣“討日”討下去，那也就不會有第二次國共合作，而中共也就不可能利用它大發國難財了。

幸虧毛澤東的貓膩被主子看穿了，1936 年 8 月 15 日，共產國際向中共下令：

> “把蔣介石與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該服從抗日。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本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也不能認為整個國民黨和整個蔣介石的軍隊都是日寇的同盟者。為了切實有效地進行武裝抗日，還需要有蔣介石的軍隊參加，或者其絕大部分軍隊參加。鑒於以上情況，必須採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為此，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定進行談判。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應該宣佈他們準備馬上派出代表團，或者在蘇區接待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團。”[192]

這才逼得中共中央於次日作出決定，將“抗日反蔣”的口號改為“聯蔣抗日”[193]，此後，王明在莫斯科召開的代表團會議上說，根據國際現在的指示，只能爭取成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沒有南京參加，則不行的”，“若只組織一部分國防政府，則變為內戰政府”[194]，指出“西北國防政府”的成立只能導致內戰。中共中央才正式發佈指示，宣稱“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195]。

如前所述，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靠的全是斯大林。但在“三位一體”瓦解後，儘管蔣介石恪守諾言，停止了對紅區的進攻，中共仍然不想履行周恩來對蔣作的擔保。毛澤東對“聯蔣抗日”極不熱心，總想聯合其他反蔣勢力把蔣介石搞掉。而且，他受其聖經《水滸傳》的影響太深，對“打土豪分田地”的“蘇維埃運動”情有獨鍾，總是捨不得扔掉，死也不同意張國燾“蘇維埃運動業已失敗”的基本分析，遲遲未能完成戰略轉變。

直到季米特洛夫於 1937 年 1 月 19 日致電中共中央，質問道：“你們是否認為現在仍不是把蘇維埃制度改為大眾革命管理制度的時候？”[196] 中央常委這才通過決議，由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電報。2 月 5 日，季米特洛夫將電稿請莫洛托夫審閱後批准[197]。5 天後，中共中央將此電發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作出四項保證：“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198]。但直到盧溝橋事變發生後 8 天，中共中央才將這些保證通告全國，只是多加了一條“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199]。

所以，毛澤東是在斯大林的鞭策下，才一步三回頭地走上第二次國共合作之路的，而正是這一根本性的戰略轉變，為中共將內戰偽裝為外戰提供了必要前提。不僅如此，當年中共在江西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綁票勒贖，聲名狼藉，連毛本人後來都承認，“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辦法所得不多，名譽又壞”[200]，對識字分子毫無蠱惑力。毛被斯大林逼著放棄了蘇維埃革命，改為

在農村中實行減租減息，“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中共由此面目一新，不僅吸引了大量熱血憤青奔向延安，在識字界也獲得了相當大的影響力。

這使得中共的“統戰”策略發生了質變。毛過去的“統戰”，和孫文的也差不多。孫文拉攏南方軍閥打北洋軍閥，毛也是拉攏地方軍閥倒蔣。他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嚐到甜頭後，才將“統戰對象”從軍閥擴大到了識字界、“開明士紳”等社會各階層，推出了《新民主主義論》。此後他又接過美國人的“聯合政府”的主張，推出了《論聯合政府》，並將美國人提出“民主”主張接過來，化為攻擊國府的強大宣傳武器。他的承諾是如此動聽，以致大多數人都能從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對美國人與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允諾“民主聯合政府”；對民族資產階級，他答應“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201]。

這根本策略的改變，不僅為中共在抗戰中騙取了“第三勢力”的同情，而且使得它在後來的內戰中順利搶佔了道義制高點，剝奪了國府的道義資源，在國統區開闢了第二戰場。它在中共奪權戰爭中起到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致官修黨史將“統一戰線”當成了與“黨的建設”、“武裝鬥爭”並列的“民主革命三大法寶”之一。只是我黨忘記告訴大家，這“第三大法寶”其實是斯大林不顧毛的反抗硬塞給他的。

（二）看毛澤東如何洞察天下大勢

先學習幾段最高指示：

1940年10月25日的預言：

“德意日不久必有大規模行動。德不攻英倫，必向非洲、印度，英國快到手忙腳亂之時。日本將取先佔南洋，後掃中國政策，香港、新加坡、仰光、荷屬四地一旦落於日本之手，中國英美派又將手忙腳亂。美國準備未周，不一定很快作戰，如德攻英倫，美海軍便要同時對付大西洋，不能集中對付太平洋，日本進攻南洋各地時，不一定便發生美日戰爭，那時重慶英美派將望著發乾急……如果是這一種情況，我們大有文章可做。……最黑暗的情況是日本對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軍控制新加坡，德攻英倫不下，中國英美派放棄獨立戰爭，加入英美同盟的危險就加大了，大多數中間派跟蔣介石跑的危險也更大了。還須假定這種情況，即美國海軍集中力量，打敗日本海軍，日本投降美國，日本陸軍退出中國，美國把中國英美派從財政上軍事上武裝起來，中國由日本殖民地變為美國殖民地，國共合作變為大規模內戰，最黑暗莫過如此。”[202]

同日作出的預言：

“德國仍在準備攻英倫，即使不攻英倫，但埃及、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必落入德軍之手，日本必攻香港、新加坡、仰光及荷印，總之英國倒霉時期快到了，不論美國是否迅速參戰，英國倒霉是定了的，美國迅速參戰也無救於英國倒霉，因此中國英美派也是要倒霉的。”“我們要準備蔣介石做戴高樂或做貝當，準備他宣佈我為反革命而發動全面反共，我們要準備對付最黑暗局面。”[203]

1940年11月1日的預言：

“如果帶決戰性質的日美戰爭不能迅速爆發（這個可能多），或雖爆發美無勝利把握（兩年內是無把握的），如果英國被德日意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十有八九），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漢等地，僅佔沿海與華北並聲明主權仍屬中國，由蔣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參加日德意同盟，反對英美能使中國資產階級發洋財，他是願意投降日本的，蔣介石走這條路可能性最大。”[204]

1940 年 11 月 3 日的預言：

“依客觀估計，蔣將來靠英美的可能小，靠德日的可能大，因德日的壓力和引力都是很大的，壓力是斷血管，打重慶，引力是交還失地，在大戰中發財與聯合剿共。而英美在兩年內是無能為力，蔣是等不到兩年的。兩年外英美亦無絕對勝利把握，有可能雙方成相持局面，打上兩三年沒有最後勝負，待革命出來結果他們。也有可能英帝國相當迅速的被打敗，舊大陸盡被德意日佔領，美感孤立，望洋興歎，要待舊大陸革命起來時，美以干涉革命的姿態向歐亞進攻。”[205]

1941 年 1 月 5 日的預言：

“不出三個月德必攻英。”[206]

粗知二戰史的讀者都能看出這些預言是怎樣的荒謬絕倫，而毛的思維方式又是何等反常。最絕的是，他假想的“最黑暗的局面”後來恰恰發生了：“美國海軍集中力量，打敗日本海軍，日本投降美國，日本陸軍退出中國”，缺的只是美國從無將中國變為殖民地的壯志雄心，因此沒有“把中國英美派從財政上軍事上武裝起來”，而這恰是他成功奪取全中國的原因。世界知識如此缺乏，頭腦如此錯亂，還能算什麼有起碼預見能力的戰略家？

然而不管怎樣怪誕，毛的思路還是可以梳理明白的。此人只看線裝書，知識陳舊殘缺，毫無世界知識與環球視野，唯一的“現代知識”就是粗淺的馬列主義 ABC。因此，他用以想事的方式只能是“粗淺的階級鬥爭理論＋祖傳陰謀詭計”。拿這一套去分析中國和世界，就只能是“荒謬的理論＋高超的權術”。他看不出中國社會根本不是西式階級社會，而是官僚社會，不知道國民黨和現在的中共一樣，乃是中國歷來就有的自我支持、自我代表的官僚集團，根本不代表任何階級，兩者的區別只在於權力的大小以及羞恥心和道德觀念的有無，卻去苦苦琢磨國民黨究竟是哪個階級的代表，又受哪家帝國主義指使。他的“理論探索”，就是在國內外搞“清理階級隊伍”，為國民黨、英、美、法、德、意、日劃定階級成份。上面這些荒誕預言，就是他使用“國際階級分析”作出來的。

列寧的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理論認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者都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只有打倒帝國主義，這些國家的人民才能獲得解放。如果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促進本國打敗，化外戰為內戰，起來推翻本國的統治者，用革命戰爭結束帝國主義戰爭。這就叫“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是列寧在一戰中的主張。前已述及，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和張聞天都用它去套抗戰，認為黨的任務是促進國民黨打敗。毛高出於張之處，只在於他看出日軍的佔領必然是空洞的，敵後有著鬣狗吃死屍的廣闊天地。

毛澤東的另一靈感來源是斯大林。他那時並沒有自己的政治軍事戰略，只能如國際派一樣，惟斯大林馬首是瞻，“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1933 年 3 月，納粹上臺，讓斯大林感到東西兩面都受到威脅。他最初的應對，是號召組成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因此，他命令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放蔣，與國府結成抗日統一戰線。但到了 1939 年春，因與英法結成“集體安全體系”的努力受挫，蘇聯開始譴責英法。是年 8 月，斯大林更來了個 U 轉，與納粹德國秘密結盟，共同對付英法。此後共產國際即奉命停止推銷“世界反法西斯戰線”，改為譴責英法堅持帝國主義戰爭，不肯與德國媾和。1939 年 9 月 1 日，德軍從西面入侵波蘭，9 月 17 日，蘇軍從東面入侵波蘭。9 月 24 日，兩軍在預先商定的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一線會師，完成了瓜分波蘭的軍事行動。

毛立即領略並發揮了斯大林此舉的涵義，斷言：“過去關於法西斯國家與民主國家之劃分已經失掉了意義”，“爭取同所謂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建立統一戰線的時期，已經過去。”今後各國共產黨的任務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革命戰爭”，“推翻世界反動營壘，用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戰爭，打倒戰爭禍首，推翻資產階級”[207]。在蘇聯吞併了波羅的海三國後，他更對斯大林的謀略佩服無地，頌揚蘇聯“貫徹了不作任何帝國主義工具與不捲入帝國主義戰爭漩渦的和平中立政策”，因而擴大了幅員，極大地提高了經濟與國防實力。[208]

就是從這裡，毛獲得了觀察分析世界大趨勢的“望遠鏡與顯微鏡”。他把斯大林的齷齪把戲原模原樣地搬到遠東來，將日本和中共分別看成德國與蘇聯的東方等價物，而國府則是英美的代表。如同英法在慕尼黑會議上出賣了捷克斯洛伐克一般，國府也可能在英美壓力下與日本媾和；另一種可能則是國府“把抗戰拖到美國出來干涉時結束，使其結果有利於大資產階級頑固派維持一黨專政的現狀”[209]。無論蔣介石投降日本（“做貝當”），還

是加入英美同盟（“做戴高樂”），都有可能縮短戰爭，使得中共再也無法從中漁利。而且，無論是以哪種方式結束戰爭，蔣介石都可以騰出手來剿共。因此，“蔣介石不論投降日德意或投降英美，均給我黨以大的打擊。”[210]

據此，中共應取的戰略是：“既反對中國成為日本的工具，也反對中國成為英美的工具”[211]，以盡可能延長代表英美的國府與日本的帝國主義戰爭，而中共則必須效法蘇聯，決不捲入這“帝國主義戰爭”的漩渦，而要趁機大打“取內戰形式的民族革命戰爭”，擴大地盤，壯大實力。

明乎此，就能理解毛為何會盼望德國與日本獲勝，把美國打敗日本看成最黑暗的局面，甚至比日本交還失地、蔣介石因此媾和還更糟糕，為何會害怕“蔣介石在英美策動下，可能加入英美戰線，整個南方有變為黑暗世界之可能”，為何會對“英國倒霉”、“中國英美派手忙腳亂”、“重慶英美派望著發乾急”幸災樂禍，中宣部又為何會反對“英美拖中國加入其戰爭集團”，因而提出“阻止與援救國民黨這一放棄獨立戰爭加入英美同盟的錯誤方針，是我黨當前的嚴重任務”，要對許多中間派及廣大人民進行耐心說服解釋工作，使他們從國民黨英美派的“英美援助中國抗日”、“聯合英美抗日”的欺騙宣傳下解放出來。[212]

必須承認，在厚黑學上，毛澤東確實不愧為斯大林的肖弟子，將斯大林那套模仿得維妙維肖：斯大林在歐洲避實擊虛，專捏軟柿子，千方百計討好納粹，卻恃強淩弱，欺負侵佔弱小國家波蘭、波羅的海沿岸三國、芬蘭和羅馬尼亞，擴大了蘇聯的幅員，毛澤東則千方百計避免惹惱皇軍與皇協軍，卻恃強淩弱，消滅吞併國軍地方部隊與自治武裝。待到他控制了華北與蘇北，自

覺羽翼豐滿之後，便不惜以 15-20 萬精兵打到國府後方去，卻從未敢想過以此重兵打到“滿洲國”去。

但毛與“洋房子先生”們有三個區別：第一，他雖不懂馬列，卻遠比那些人厚黑，精通古往今來一切陰謀詭計。第二，他遠比那些人精明自私，更關心的不是世界革命勝利，而是如何最有效地藉助外力奪得政權。第三，他缺乏世界知識，昧於國際局勢，與斯大林毫無私人接觸，對斯大林的思維方式與性格毫無瞭解，因此時常坐井觀天，以己度人，把他自己揣摩出來的斯大林的心思當成真的，用為中共戰略制定依據。

前已述及，1936 年 3 月，蘇聯和外蒙簽訂了“共同防衛條約”。斯大林此舉本來是告訴日本人，外蒙是蘇聯帝國的勢力範圍，不容日本染指，然而毛澤東卻把這當成“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213]，據此提出“西北大聯合”計劃，發動西征，謀劃建立獨立的“西北國”，卻不知道那根本不是斯大林的意圖。

類似地，在蘇聯與德國瓜分波蘭後，毛又一次誤讀了斯大林。他以為斯大林在東方也改了主意，會轉而與日本結盟對抗英美，按波蘭模式與日本瓜分中國，而他便能在蘇聯人的卵翼下當兒皇帝。1939 年 9 月底，斯諾在採訪他時問，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採取佔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他竟然答道：“按照列寧主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毫不掩飾地支持蘇日瓜分中國。當這談話被洩露到英美報刊後，季米特洛夫大為震驚，來電嚴厲批評毛澤東失言[214]。然而毛仍然以為斯大林會朝這個方向走。的確，將他的思路進行到底，結論必然是“按波蘭模式解決中國問題是符合列寧主義原則的”。馬列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當時的中國是蔣介石的，不是無產階

級的。若能有一半落在無產階級手裡，也是世界革命的偉大勝利，“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就是為此，中共才會慶祝蘇日以條約形式正式瓜分中國領土。1941 年 4 月 13 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蘇聯“誓言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而日本則“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兩大帝國主義惡鄰公開宣佈以武力保證外蒙與東北永久脫離中國，受到愛國的中國人同聲譴責，毛為中共起草的聲明卻歡呼：“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蘇日條約使蘇聯的國際地位極大的提高了，蘇聯無論在東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發言權，這對於一切反動派都是不利的，而對於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與被壓迫民族則都是有利的。”“至於蘇日聲明互不侵犯滿洲與外蒙，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現在蘇日聲明，却保證了外蒙不受侵犯，這不但對外蒙有利，即對全中國爭取解放也是有利的。”[215]

爲什麼永久性喪失外蒙和東北會對中國人民有利，而對“一切反動派”不利？毛在內部文電中作了解釋。蘇日條約簽訂當天，他致電周恩來，指出：“日蘇條約使蘇聯徹底解除被攻威脅，對國際對中國發言權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國同盟爲反蘇工具之幻想最後破産，對制止中國投降與反共危險有積極作用。”4 月 17 日，他再度致電周恩來，指出：“蔣介石歷來認爲蘇聯依賴他的抗日，他乃敢於放手反共，日蘇條約對蔣給了一個嚴重打擊。”“擺在蔣面前的是外交、財政、中間派三大困難問題，關於外交者是第一日本威脅加重，第二美、英重心在對德，第三蘇聯獲得自由。”“在日蘇條約訂立、蘇聯獲得自由之後，蔣投降與反共將更加困難。”[216]

原來，他心花怒放，是因為條約解除了日本對蘇聯的威脅，蘇聯獲得了行動自由，再不需要國府把日本拴住，再不會援助國府抗戰。英美關注重點在德國，也不會援助中國，這當然“對蔣給了一個嚴重打擊”。更重要的是，條約使得蘇聯不必再擔心國共合作破裂，“對中國發言權增高”，也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支持中共，再不會不許他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國軍了。以後國府若是還敢逼共抗日，或是試圖限制乃至反擊共軍的大規模進攻，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蘇聯出兵，幫他打通西北，推翻國府。而根據列寧主義原則，斯大林不會拒絕。

只有作如是理解，才能看懂那表面上完全不可理喻的瘋話：“在日蘇條約訂立、蘇聯獲得自由之後，蔣投降與反共將更加困難。”正常人都只會困惑：國府在喪失了外援後，抗戰勝利的希望更加渺茫，投降的危險只會增加，怎麼還會“更加困難”？“反共”也是這樣：以前老蔣怕失去蘇援，投鼠忌器，對中共的叛國罪行忍氣吞聲，委曲求全。現在蘇援斷絕，中共喪失了挾制國府的一大法寶，怎麼反倒會使蔣反共更加困難？有誰能理解這邏輯？但若我們與毛作換位思考，則立即可以看出，倘中國如他所願，被蘇日瓜分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南京的“中華民國”之後，那蔣介石確實連投降的可能都沒有了；若蘇聯應毛請求出兵幫他打天下，則蔣反共當然更加困難。

毛在欣慰的同時也感到失望。4月16日，毛在討論蘇日中立條約的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蘇日條約訂立之後，蘇、日雙方都得到自由，但對中國問題沒有解决。”[217] 這話既是欣慰，又有失望：蘇聯得到了援助中共打內戰的自由，而日本則得到了將防衛蘇聯的關東軍改用於攻擊中國與南洋的自由，如此即可避免中國淪入他害怕的“最黑暗局面”。美中不足的是，該條約沒能像

蘇德條約“解決”波蘭問題那樣，徹底瓜分中國，將毛“與蔣隔江而治”的夢想化為國際條約，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如“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一樣扶植起來。毛只能寄希望於未來，這或許就是他為何要在聲明中向斯大林發出信號：“中國人民的希望，只要說到外援，便是首先寄托在蘇聯身上的，而蘇聯在這次條約上並沒有使中國失望，也永遠不會使中國失望。”

然而這不過是毛一廂情願。斯大林的“國際主義”不過是加了時髦包裝的俄羅斯沙文主義而已，其要旨就一句話：“蘇聯的國家利益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當蘇聯的國家利益與馬列意識形態相衝突時，他總是毫不猶豫地拋棄後者：在 20 年代末把共產國際改造為蘇聯的第五縱隊；在蘇德戰爭前為討好希特勒將逃到蘇聯去的德國共產黨人捆送給蓋世太保；在蘇德戰爭爆發後應英美要求解散共產國際，保證不再輸出革命等等，都是斯大林“國際主義”的輝煌表現。當時蘇聯的國家利益要求中國盡可能長久地牽制日本。在崔可夫來華就任蘇聯軍事總顧問前，斯大林向他面授機宜時將此說得明明白白：

> “歐洲的局勢、希特勒的節節勝利預示著英國和美國可能會逐漸增加對蔣介石的援助。這就可望，由於有我國的援助和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我們駐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要緊緊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綫作戰”，“至於國共兩黨關係的惡化，暫不要去管他們”，“蘇聯的援助只能給予蔣介石國民黨而不能給予中國共產黨。”[218]

這些話不但暴露了斯大林“階級感情”的實質——絕不會爲了一個區區第五縱隊便損害蘇聯的國家利益，更顯示了他驚人的洞察力與精明——他深知中共根本不打日本人，拿到武器只會去打內戰，因而起不到拖住日本的作用。當然這也不足奇——蘇聯人的情報工作不是吹的，連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都知道，“中國紅軍司令部也熱衷於把槍口對準蔣介石，而不考慮它可能會使全體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革命成果遭受什麽樣的危險”，因此要崔可夫“協調中國紅軍和蔣介石軍隊的抗日行動，而不管他們之間的分歧”[219]。因此，毛澤東的“世界大戰略”，不但再一次顯示了把願望當現實的濃厚個人色彩，而且反映了“逢蒙”對“后羿”的嚴重低估。而這就是他幾乎闖下大禍的原因。

當然，也不能說毛澤東構想的“世界新秩序”完全是想入非非。我在《野蠻的俄羅斯》中介紹過，蘇聯確實想加入軸心國，為此特地派莫洛托夫到柏林去與斯大林談判，只是因為蘇聯要價太高才惹惱了希特勒。即使如此，斯大林仍在戰後為蘇德破裂倍感惋惜，反復感歎：“唉，若與德國人聯手，我們本可所向無敵。”[220] 在軸心國一方，不但德國的里賓特洛甫等人主張與蘇聯結盟共同對抗英美，而且日本統治集團中也頗有人主張與蘇聯結盟，外相松岡洋右就是最熱心者。若非希特勒視斯拉夫人為只配滅絕的“亞人類”，二戰陣營確有可能按日蘇德意為一方，英美中為另一方的方式組合，而那可真是“最黑暗莫過如此”了。

由此可見，雖然毛的才能不及斯大林百分之一，但同為厚黑學高手，同為對民主制度極度鄙視、對極權制度極為讚賞的大獨裁者，兩人的心思還是有相通之處的。只是他過於操切了，要發動對國府的全面進攻，至少得等到蘇聯加入了軸心國吧？在此之

前就急於動手，當然只會如“張楊兵諫”一般被斯大林否決。惟其如此，偉大船長才再一次撥正了偉大舵手的“左滿舵”。

（三）幾乎斷送中共大業的冒險計劃

明白了毛“階級分析＋陰謀詭計”的思維方式，則不難看出他是怎麼作出那個以 15 萬精兵閃擊國府大後方的宏偉計劃的。

毛澤東最大的困惑，是國民黨為何要在 1939-1940 年期間開始“防共限共”，甚至試圖逼共抗日，在 1940 年 10 月 19 日給中共下了最後通牒（“皓電”），限期撤到黃河故道以北。此前國府接二連三遭到日軍與共軍的聯合打擊，華北與蘇北的敵後根據地都給共軍搶走了，元氣大傷，而共軍兵力卻暴增至 50 萬，擴地千里。實力此消彼長，按理說國府不該再有此膽量，然而其態度卻非常強硬，那底氣究竟是哪兒來的?

其實國府的反應是個正常人都能理解：日寇入侵中國，猶如強盜闖入某個聚族而居的大宅院。如果那大家族的某個不肖子弟不去協同大眾禦侮，卻不是跟在強盜後面撿起強盜搶剩的珍寶據為己有，就是趁某家與強盜全力拼命時擠進門去，在主人背後捅刀子，把人家推出門去，鳩佔鵲巢，不許人家再進屋，當然要引起闔族公憤。大敵當前不便清理門戶，只好規定那不肖子弟不得再到處流竄趁火打劫，並試圖將他逼上對敵第一線，將其打擊力轉向強盜。這本是天理人情決定的必然反應，哪來什麼階級背景、遑論國際階級背景?

然而這卻不是毛澤東的陰暗思維方式，他只會以己度人。因為中共是蘇聯的代理人，他便認定國民黨那國內階級敵人也一定是國際階級敵人的代理人。過去國府 “限共防共”，那當然只

能是英美法在背後撐腰。但在法國投降後，英國“手忙腳亂”自顧不暇之時，國府逼共抗日的態度卻更堅決，這就不能不把他打入悶葫蘆了。爲了解決這個“理論難題”，他去苦苦琢磨了半天，終於在 1940 年 7 月作出了“國民黨頑固派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偉大理論發現[221]，完全無視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出現始於 40 年後的改革開放，而大資產階級問世也就只是最近十年的事——當然這也難怪，他從未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生活過，又不興看西方的書，怎麼可能知道什麼是資產階級？

然而即使給“國民黨頑固派”補戴了階級敵人的帽子，將其成功地開除出統一戰線，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這“大資產階級”究竟是哪國的走狗，打的是什麼主意？於是毛不斷疑神疑鬼，忽而懷疑英美搗鬼，忽而猜測國府準備投降日本，一會兒以為國府馬上就要大打出手，一會兒又覺得國府沒那個膽。在國府發出皓電之後，毛澤東更是處於極度焦慮與惶惶不安之中，說了無量昏話蠢話，充分演示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陰暗思維方式能何等有效地降低人的判斷力。

例如他在 1940 年 10 月 25 日認定，國民黨發動“反蘇反共新高潮”是爲加入英美同盟作準備[222]，11 月 1 日又立即來個 U 轉，覺得蔣介石加入德日意同盟、反對英美的可能性最大[223]，11 月 3 日更斷言：“目前反共高潮是有直接投降的準備，所謂聯合英美抗日只是蔣介石的煙幕彈。”[224] 11 月 1 日才說過：“蔣介石不論投降日德意或投降英美，均給我黨以大的打擊”[225]，5 天後又覺得：“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入英美集團了。”[226] 同月 3 日還認定國府投降、日蔣聯合剿共迫在眉睫：“判斷其計劃第一步將我軍驅逐於隴海路線以北，構築重層縱深封鎖線（邊區周圍的封

鎖線是五道），第二步配合日寇夾擊消滅我軍，中日妥協與日蔣聯合剿共的危險是嚴重的存在著，雖然還有其他的可能性，但投降是主要的。”[227] 18 天後卻又認為“只要蔣介石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嚇我讓步。”[228] 到後來他總算短暫恢復神智，看到了那本來是明擺著的事：“蔣及國民黨雖然其勢洶洶的舉行進攻，實則他們很怕內戰，很怕根本破裂國共合作，故其決心仍有動搖之可能。”

然而看出了真相卻讓他獲得了刁難訛詐國府的底氣。在同一份電報中，他把這無賴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我除在文章上《佳電》表示和緩及皖南一點小小讓步外（實際我早要北移，但現偏要再拖一兩個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讓，有進攻者必粉碎之。”[229] 而僅僅在 11 天前他還催促葉挺：“希夷渡江以速為好，不應徵蔣同意，如蔣反對，便不好過江了。”[230] 其前恭後倨之狀可掬。

正因為此，皖南事變對他來說才宛如晴天霹靂，使他進入完全徹底的歇斯底里態，腦袋再一次捲入狂亂猜疑的漩渦，生生把自己弄成笑柄：

> “皖南事變即是三國同盟以來國民黨內親日派英美派同謀的一連串反共事變的繼續發展。”[231] “國民黨幹出這件大事，定有帝國主義的指使，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義（意）。”[232] “蔣介石宣佈新四軍為叛逆，將葉挺付審判，似有與我黨破裂決心，其背景似以日德為多。”[233]

除此之外，他第一個反應就是遷怒於莫斯科。這是因為此前的 11 月 4 日，他曾親自給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寫了一封長信，請共產國際考慮他集中 15 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後方去的先發制人的軍事計劃[234]。但斯大林一直認為，中共還顯得太孱弱，在

國內的地位還不夠鞏固，蔣介石可以輕而易舉地聯合日本人來反對共產黨。因此，把槍口對準國民黨，必然將自己置於走投無路的境地。如果因此把蔣介石逼到日本一邊去，那不論對中國革命還是對蘇聯的安全，都是一種嚴重的危險。季米特洛夫也向中共強調指出，還看不出蔣有全面剿共和降日的決心。親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設法挑起國共戰爭，逼蔣介石降日，中共切不可中此詭計，故在政治上應把矛頭對準親日派，軍事上只應作防禦的自衛戰準備，黨的決策無論如何不該將破裂作為出發點。[235]

同樣是陰暗思維（例如季米特洛夫認為逼共抗日是親日派的詭計），斯大林的考慮與毛澤東的一比，高下立見。給季米特洛夫等人寫信前一天，毛曾向周恩來講過自己的考慮：

> “如果我們在反對內戰的口號下不怕內戰，待他的剿共軍前進時出十五萬精兵（以三十萬支持各根據地），抄到他後方，打幾個大勝仗，提出請求撤懲何應欽（清君側），撤退剿共軍，繼續抗戰國策，恢復國內和平，實行三民主義，改革政治機構，給人民以抗戰自由，釋放抗日政治犯，召集國民大會等條件（大體如張、楊之八條）。如果那時日本已經南進，美日關係緊張，日本自顧不暇，如果那時國內各中間派及國民黨中的中間勢力出來加以贊助（組織勸和團、隔斷火線等）。如果那時國內及蔣集團內某些人乘機造反，作不利於蔣之活動（這些人現在是勸蔣反共，其目的在造出亂子，置蔣於爐火之上，以圖乘機取蔣自代，如何、白皆是）。如果那時蘇聯又出來調整一番，這種好轉是有可能的，恐怕中國的真正好轉要在那時也說不定，這是生產經過陣痛的道理。但那時也有蔣介石做貝當並最後做汪精衛之可能，那就是最後大決裂，此種可能性也許還要大些也難說。

但彼既組織剿共軍，我當然不能坐以待斃，當然不能讓他筑好十道八道西起寧夏東至海濱的縱深重層封鎖線（新的萬里長城），讓他把我們放在日蔣夾擊消滅中而毫不動手動腳。故在剿共軍前進時，我們勢必打出去，以期轉變局勢，爭取好轉。如果蔣那時做了貝當，便證明我們正是打得對，我們便把清君側（或兵諫）的旗幟改換為打漢奸的旗幟，一直打到底，這就是取內戰形式的民族革命戰爭（過去與現在的反磨擦戰爭也是這種性質）。”[236]

這就是說，他準備大規模重演“張楊兵諫”，實現當年流產了的“西北大聯合”，只是這次胃口更大，要與國府劃江而治搞南北朝，如一切順利就徹底推翻國府。

這偉大戰略構想的動人之處，是它建立在一系列的“如果”上，其中沒一個靠譜：日本南進還得再等上一年多，大本營當時尚未決定到底是南下還是北上；“國內及蔣集團內某些人乘機造反”也沒有可能。當年抗戰還沒爆發，張楊也未發兵攻打南京，只是扣下了蔣介石，就激起了舉國抗議風暴，以致事前承諾起來響應的軍閥都噤若寒蟬。在抗戰中就更不會有哪個軍閥敢出來造反了——軍閥怕輿論抨擊，與中共完全是兩回事；最後一個“如果”則完全是搞笑：當年“西北大局面” 因蘇聯反對而流產。這次要搞更大的“局面”，蘇聯又豈會“出來調整一番”？在那之後，毛還要向主子提這宏偉規劃，完全是自討沒趣。

更動人的是，毛毫無吸取教訓的智能，在目睹了全國聲討張楊之後，居然還想再在那條死路上瀟灑走一回，在全國人民心目中變成徹頭徹尾的漢奸賣國賊。這且不論，毛居然看不出逼得國府投降日本的惡果，而那是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最擔心的。他也設想過這種可能，但結論卻是那“便證明我們正是打得對，我

們便把清君側（或兵諫）的旗幟改換為打漢奸的旗幟，一直打到底”！

能打到底麼？共軍只有 50 萬，派出攻打國府後方的也就 15-20 萬，而國軍可是有幾百萬，只是過去一直用於抗戰而已。但當此內外交攻、亡國滅種危在旦夕之時，國府也不必投降，只須與日本達成緊急停火、維持現狀的協議，調集重兵先除了內奸再說。共軍此舉不但向全國人民暴露了他們的漢奸真面目，而且證明了蔣介石過去“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是何等英明，剝奪了反蔣派鼓噪的道義立場，而斯大林爲了將蘇聯從尷尬的位置上解脫出來，最可能的反應還是使出其慣伎——宣佈毛澤東是日本間諜，蘇聯與此事毫不相干，並密令中共整肅之。

因此，要這計劃成功，最主要的“如果”，不是“蘇聯出來調整一番”，而是與日寇秘密結盟，雙方同時大舉進攻國府。有大日本皇軍摧枯拉朽地“給力”，要推翻國府易事耳。而斯大林也絕不會爲了挽救中國出兵。但問題是，驕橫的日本人願意這麼幹麼？他們可以在局部與中共默契配合，形成事實盟軍，但這可是聯手推翻國府，難逃天下人眼目。極度鄙視支那的日本人決不肯丟此面子，向全世界顯示他們居然需要中共作盟軍才能推翻國府。就連在河南發動攻勢制止國府逼共抗日，東條都還特地在其演說中欲蓋彌彰地表白，皇軍完全用不著共黨幫忙：“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戰，但日本決不依賴國共糾紛，而是依賴自己力量解決中國事件。”[237] 所以，倘中共大規模發動內戰，日本人最可能的反應還是坐山觀虎鬥，以避“靠中共幫忙才能滅了蔣政權”之嫌。而蔣介石需要的，也就只是日本人按兵不動。

所以，並不需要戰略家的眼光即可看出毛的計劃的災難性後果。然而毛非但看不出，在皖南事變發生後還要遷怒莫斯科，令

周恩來質問崔可夫："蔣介石無法無天至此，請問崔可夫如何辦？"蘇聯人認為，蔣是否蓄意破裂還有待觀察，"今天的工作中心，仍是求得抗戰繼續"[238]，毛卻根本聽不進去。1 月 23 日，他致電周恩來，毫不客氣地教訓蘇聯上司："朋友們的意見是錯誤的，請對朋友們說，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國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開始，要他們停止接濟，準備後事，不然要上當的。"[239] 周恩來隨後向他轉達了蘇聯大使等各方意見，强調蔣並非真要破裂，認爲延安的估計有些過激，毛澤東仍然不容分說："人家已宣布我們叛變，我們決不能再取游移態度，我們決不能再容忍，我們決不能怕破裂，否則我就要犯嚴重錯誤。……你們應向各方表示，蔣介石已將我們推到對立地位，除非蔣介石取消十七號命令及實行其他必要步驟，我們是只有和他對立一途，因爲我沒有別的路走。"[240] 此後他雖然不得不同意"蘇武官延長時間的意見是對的，事實上我出兵至快在半年後，目前只打防禦戰"，卻仍然纏著主子不放，要他們停止對國府的援助，更連連追問："何種時機他們可以公開援助我們？""五月後他們有何辦法援助我們奪取蘭州？"強調："如沒有飛機及攻城部隊奪取蘭州及甘涼肅三州是不可能的，而這一問題遲早必須解决。"[241]

只是因為日寇在河南對國軍發動了大規模攻勢，毛的歇斯底里才逐漸緩解了。即使在這時，他仍然忘不了再度顯示一把"知己知彼"神功，連希特勒能"迫令日本"的笑話都鬧出來了：

> "蔣介石原知一、二、三月內敵人要進攻的，他之所以發動皖南事變，發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軍進攻淮北、皖東、鄂中新四軍，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敵人進攻……拖

過幾個月，希特勒就會迫令日本南進，中國就太平了。豈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樣。”[242]

毛澤東不知道，日本人其實救了他——倘若他再沒完沒了地纏著主子，只怕斯大林疑心病要發作，把他打成日本間諜。實際上，斯大林已經快要發作了。2 月 5 日，季米特洛夫給毛下了相當嚴厲的命令：“我們認為分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應該走向分裂。相反，在主張維護抗日統一戰線的群眾的支持下，共產黨應該盡到一切責任避免分裂。我們要求你重新考慮你現在的立場，並告訴我們你的想法與建議。”[243] 唬得毛乖乖回電：“服從您的指令。”[244]

這通電報說明，斯大林把實際情況看得一清二楚：是毛而不是蔣在“走向分裂”。他的招子可比毛的亮多了，更有非人的冷靜，絕不會因為毛的危言聳聽就被拉下渾水。就連皖南事變的真相，他也能在萬里之外一眼就看穿事件的本質，令人驚歎不已。他對季米特洛夫說：

> “葉挺是個不守紀律的遊擊戰士。我們應該查明這次事件是不是他自作自受。我們的遊擊隊中也有些好人，但我們不得不槍斃他們，因為他們缺乏紀律性。”[245]

這猜測的唯一誤差，就是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葉挺是個傀儡，真正“不守紀律的遊擊戰士”是毛澤東。

蘇聯的利益不論，斯大林的冷靜態度也救了中共。如果他真被毛拖下了水，那必然要引起日本強烈反彈，大本營的北進派很可能因此佔上風，引發日蘇戰爭。那後來蘇聯就會垮在兩面作戰裡，中共當然也只能跟著完蛋。因此，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偉大船長斯大林同志又一次挽救了中共革命挽救了黨。

毛的決心下得實在不是時候。如果毛熬到蘇聯加入軸心國後，再去遊說斯大林以波蘭模式解決中國問題，那還可能有點希望。可皖南事變發生前後日蘇尚未接近，斯大林正在全神提防日本（實際上他一直都在提防，並沒有因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而“獲得自由”。即使在蘇德戰爭爆發後，他仍在遠東部署了重兵。只是在莫斯科危急時，王牌間諜佐爾格又報告日本 1942 年春季以前不會攻蘇後，他才把 25 萬重兵從遠東調去保衛莫斯科）。而且，毛完全不懂主子的心思，斯大林才不會在乎中共是否會被消滅，在乎的是蘇聯的安全。用中共瀕於滅亡的慘景或許能打動季米特洛夫，但絕無可能打動老斯。毛有如以此嚇唬斯大林，不如向他委婉指出，與日本瓜分中國本部將能極大地增進蘇聯的安全——起碼蘇聯在其南面獲得了個唯命是從的僕從國，能為蘇聯更可靠地牽制日本。不過，即使蘇聯加入了軸心國，說動老斯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毛看不出來，中國不是波蘭，從未在歷史上屬於俄國，蘇聯無法把華北直接納入版圖，只能把它變成又一個外蒙。但斯大林不信任任何人，為扶植他深懷疑忌的毛澤東[246]，去與他極度猜忌的日本作此交易，道義損失與風險太大而所得甚少，不符合他謹慎精明的本性。

可笑的是，明明是莫斯科把毛澤東從自我毀滅中救了出來，他卻非但不領情，反而還懷恨在心。楊奎松教授認為，毛與莫斯科在此期的“近乎公開的意見分歧乃至政策衝突”，使得“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迅速改變與共產國際之間上下級關係的嚴重必要性”[247]，可見此人實在缺乏認識錯誤的自我完善智能。他更不想想，連他自己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危急之時，都捨不得犧牲“局部利益”去挽救“整體利益”，斯大林又怎會犧牲自己的“整體利益”來扶植他這個“局部利益”？

（四）“不許革命”，是耶非耶？

從洛川會議起，毛澤東就確定了中共“抗戰”的終極目標——奪取政權，整個戰爭都是為與國府最後的決戰做準備。到日本敗象已顯時，毛澤東就躍躍欲試了。1944 年 6 月，中共召開六屆七中全會，命令全黨“準備配合世界大事變，在時機成熟時，奪取在有我强大軍隊與强大根據地附近的一切敵占城市與交通要道”[248]。毛特別強調，中共要爭取搶在國民黨和羅斯福前面奪取城市，誰奪取了中心城市，誰就取得了中國的統治地位。[249] 同年 12 月，他更是意氣風發地指示：“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250]

1945 年 8 月 9 日，蘇聯出兵東北，“把中國拿下來”的時刻終於到來了。毛澤東進入高度亢奮狀態，下令全黨“立即佈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進行廣泛的進攻，……準備於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佔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251] 蘇聯聯絡員弗拉基米洛夫當時觀察到：

> “中共中央委員會的軍事機構空前活躍，延安忙得連打盹的功夫都沒有。唯一的目的是要趕在國民黨前面，佔領新的地盤和日本人的軍火庫，並不惜一切代價阻止中央政府軍前進。延安發佈了秘密指示：消滅一切堅持向前推進的國民黨部隊。而且，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可能，就把他們從新佔的地區趕出去。軍人、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一批一批地離開延安。”[252]

近年公開的中共文電證實了他的觀察。接連幾天，中共中央、軍委、共軍延安總部等一日數電，全是命令各部大舉出動搶佔地盤，迫日繳械，消滅國軍，“佈置內戰戰場”：

> “以最大主力用極大速度迅向粵北發展，以便與湘粵邊兩周後可能到達之王震部隊取得聯繫，造成我華南制止內戰的主要根據地。”[253]
>
> “各地應將我軍大部迅速集中，脫離分散遊擊狀態，分甲乙丙三等組成團或旅或師，變成超地方性的正規兵團”，迫使敵偽投降。不投降即逐一消滅之。“解決敵偽後，主力應迅速集結整訓，準備用於制止內戰方面。”[254]
>
> 依據國共兩黨實力對比，確定我黨必須力爭佔領之交通線及沿線大小城市，“積極準備對付蔣介石的進攻”。[255]
>
> “江南力量就現地向四周擴展，奪取廣大鄉村和許多縣城，準備內戰戰場。……江南在內戰勝利（打幾個大勝仗）後就原地繼續擴展，長期堅持。……江北力量全部留江北，不再派兵去江南，任務為力爭佔領津浦路及長江以北、津浦以東、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滅偽軍，準備與李品仙、何柱國作戰，並以有力部隊配合八路軍佔領隴海路。”[256]
>
> 爲了“造成迎接內戰的堅強基礎”，“江南的任務是於佔領各城鎮後即放手發動群眾，擴大部隊，武裝群眾，囤積資財，佈置內戰戰場。顧祝同大軍各分路東進京杭滬，通過我區時，不作正面堵截，應讓其通過，即截擊其翼側後尾，仍按照自衛原則。”“蘇中負責解決孫良誠、李明揚、陳太運等偽頑各部。”[257]

最後一則指示最富毛的特色——連命令部下暗算別人時都還忘不了擺出岸然道貌，明明是預謀截擊國軍，卻有本事說那是“按照自衛原則”！倒是後來他當國後說了實話：

> “1945 年我們正在準備推翻蔣介石。奪取政權的時候，斯大林用他們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們，指示我們不要反對蔣介石，說如果打內戰，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258]

那電報是 8 月 20 日來的，而毛剛剛才接連電令華中局與華北各區局，要求各解放區不僅必須佔領同蒲路北段、平綏路東段、北寧路、平漢路北段、隴海路東段、正太路、津浦路、膠濟路等十餘條鐵路，還要求華中局“發動上海市民及近郊遊擊隊實行武裝起義，解除偽軍偽警武裝，佔領上海，建立各階級民主聯合的上海市政府”；晉察冀解放區應迅速佈置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莊城內人民的武裝起義，以不失時機地配合攻城部隊奪取這些城市。[259]

在高度亢奮中挨了這瓢冷水，毛暴跳如雷。但他畢竟知道“蘇聯是革命的本錢”的偉大真理，只好悻悻取消計劃，並下令共軍“改變方針，除個別地點仍可佔領外，一般應以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及要道，使敵偽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著重於奪取小城市及廣大鄉村，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發動群眾鬥爭，作持久打算。”[260]

更讓毛不快的是，此前蔣介石兩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都被毛斥爲“完全是欺騙”。不料斯大林的來電卻命令中共與國府合作，通過談判維護和平，走和平發展道路。8 月 23 日，蔣介石第三次電邀，毛澤東不得不覆電同意。但據弗拉基米洛夫說，哪怕是在赫爾利與張治中特地來接毛的專機到達延安

後，毛仍然提心吊膽，再度要求弗拉基米洛夫證實，蘇聯政府是否準備保障他在重慶的人身安全，並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脅，就到重慶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去避難。弗拉基米洛夫明確同意了他的要求，並代表莫斯科為他的安全作了堅決擔保[261]。這樣，毛才於 8 月 28 日飛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簽訂了“雙十協定”後於 10 月 11 日返回延安。

這事讓毛澤東切齒銜恨。斯大林死前他敢怒不敢言，蘇共 20 大批了斯大林後，他才多次在黨內會議以及與“兄弟黨”會談時發洩宿怨，把它當成是斯大林四次“整我們”的一次，把斯大林說成是不許阿 Q 革命的趙太爺，指責斯 “不相信中國革命的力量”。

其實毛若有自知之明，就該感謝斯大林再一次救了他。他那計劃遠遠超出了中共當時的實力：不但要搶在國軍前面佔領東四省，要華北與華中共軍攻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要江南共軍佔領盡可能多的地域，要廣東共軍遊擊隊向北急速擴展，與華中南下的共軍會合，建立華南內戰根據地，還要在滬寧杭三角地區發動幾百萬農民武裝暴動[262]，在北平、天津等其他大城市也普遍發動暴動，等等。比起當年李立三的瘋狂來，這計劃也未遑多讓，其必然失敗不必待智者而後知之：

首先，這攤子鋪得實在太大。共軍不過一百萬人，卻要去佔領華北、華中甚至江南等大片地域內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即使如意實現，那共軍也就給攤成了薄餅，必須處處守衛，再無可能“集中以對付敵人”。而國軍在抗戰中一直是集群作戰，北上接收也是大兵團出動。毛的計劃為其提供了各個擊破的絕佳機會。

其次，毛以為抗戰還要打一年多，因此當時共軍尚未完成向正規軍的轉變。在過往 8 年間，除了威武雄壯的“反摩擦”大戰

外，我英勇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根本就沒打過仗。八路軍將領萬毅承認，到 1946 年初開始和國民黨中央軍作戰時，他還弄不清楚這運動戰應當怎麼打，更不曾和裝備好、作戰力強的敵人打過仗[263]。8 年抗戰中，共軍大部分時間都處於高度分散狀態。上引軍委電令中就說："各地應將我軍大部迅速集中，脫離分散遊擊狀態，分甲乙丙三等組成團或旅或師，變成超地方性的正規兵團"，可見當時共軍大多以營以下的單位分散存在。這種基本沒打過仗尤其是正規仗、甚至沒有得到集訓的隊伍能有什麼戰鬥力可言？光是把大軍集中起來，完成組建，讓各級指揮員熟悉一下部隊，都得花上一定時間，更別說讓各部隊學會彼此協同配合了。此外，共軍裝備窳陋，缺乏重武器，雖然關外共軍接收了大量日軍武器，但軍火還未來得及從東北送到關內，所謂炮兵、坦克部隊等"特種兵"還未訓練出來，缺乏打正規戰的硬件。

相比之下，國軍和日寇血戰八年，而且專打攻防戰，乃是血與火鍛煉出來的百戰雄師，在美國參戰後又獲得援助，極大地改善了裝備。東北共軍當時向中央報告：

> "進入東北之敵軍為蔣系統精銳，大部美械裝備，經過美國訓練，參加印緬作戰，炮火和自動火器多！戰鬥力強，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軍齡，其中甚至有個別排長仍當戰鬥兵者，較頑強，不容易繳槍，甚至一個（原注：此處有誤，似應為"一連"）打到七八個人還不繳槍，帶著遠征軍，常勝軍的驕傲狀度，尤其是新一軍新六軍特別驕傲，戰鬥確實也頑強。"[264]

因此，共軍在抗戰硝煙未散之際就與國軍交戰，而且是打攻防戰，完全是以短擊長。這就是共軍為何在關外初戰一觸即潰。1945 年 11-12 月間，國軍攻克山海關，沿北寧路挺進，連克錦

西、錦州、黑山、義縣、阜新等地。劉少奇這才看到了無情的事實。12 月 7 日，他致電提醒東北局：“請你們注意這種事實，杜聿明兩個軍由山海關打到瀋陽幾乎未遇嚴重抵抗。我之東北新部隊還不能作戰。……目前與頑軍作戰，我們一切條件都不夠。”[265]

因此，當時共軍迫切需要的，不是立即與國府開戰，而是一個編組、裝備、訓練部隊的準備期，以便將龐大的散兵遊勇組建整訓為能打大仗的正規軍。

第三、抗戰是中國在近現代史上第一次獲得完勝的對外戰爭。作為領導全國軍民（除共軍外）取得勝利的最高統帥，蔣介石的聲望達到了頂峰。當時國民黨雖已腐敗，但淪陷區的人民還來不及得知。後來困擾國統區人民的惡政諸如“劫收”、惡性通脹等等還未發生。人民飽受了八年戰禍，極度厭戰。毛卻要在蔣介石聲望如日中天之際，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全面內戰，只會讓自己在全民心目中變成過街老鼠。起碼再也無法像後來那樣，把識字分子統統籠絡過去，在國統區開闢“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第二戰場。毛澤東對此其實也心中有數，兩年前曾跟彭德懷說：“蔣在抗戰中有功勞，同時人民心理厭惡內戰。”[266] 明知如此，還要蠻幹，完全是利令智昏。

第四、當時國府還未開始大規模裁軍，內戰若立即爆發，也就不會再裁軍了。那就不會再有裁軍弄出來的許多嚴重問題（詳見下章），國軍也不至苦於兵力不足，捉襟見肘。

第五、當時美蘇關係尚未惡化，美國在華官員對中共頗有好感。若中共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尤其是在京滬杭三角地帶發動數百萬農民暴亂，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城市發動武裝起義等等[267]，必

然招致美國的惡感。美國人就不會再像後來那樣，先以馬歇爾調停救了東北共軍，後又對華實施軍火禁運。

此舉也必然置蘇聯於尷尬之地。哪怕斯大林的“階級感情”壓倒了他對蘇聯國家利益的考慮，在共軍被打得落花流水時就只能自己上陣。那必然導致蘇美對抗，美國就會大規模援助國府，最終很可能以東西德、南北韓方式解決中國問題；若斯大林要避免與美國對抗，就只能撇清自己，於是中共也就沒有可能在蘇軍包庇下大舉潛入東北，並從蘇軍那兒獲得無量軍火援助，毛澤東也就不可能征服全國了。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抗戰後為時一年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對中共來說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幸虧斯大林及時制止了毛的自殺性冒險，美國人又來“調處”，才使得共軍獲得了這個至關重要的緩衝期，我黨才能大規模滲透到關外去，不但裝備訓練了關外共軍，更從關外運來無量軍火，裝備訓練了關內共軍。如果沒有這個準備階段，則共軍就算不被消滅，起碼征服全國也不會那麼容易。

其實，毛澤東在事後也悟出了這一點，在廬山會議上說：“‘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奪取政權的，哪怕一年兩年也好。結果我們爭得一年時間。如果再加一年，那就更好。”[268] 由此可見，在內心深處，他也知道斯大林其實並沒有錯。只是他絕對不會承認，斯大林制止他發動內戰，雖是爲了蘇聯利益，但也又一次讓中共避免了大災難。

四、人民戰爭勝利的基本原因

此處所謂“勝利”，不是對日本人而是對國民黨而言的。抗戰使得中共獲得了與國民黨爭天下的雄厚資本，成了“三國”中唯一的贏家。在短短八年中，共軍從原來的三四萬人劇增到百萬之衆，從陝北一隅死地蔓延到整個華北與華東，從原來統治 40 來萬貧瘠人口發展到統治了上億人口，最終實現了偉大領袖“把中國拿下來”的宏偉戰略目標。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未見過這種將內戰全面僞裝為外戰而大獲全勝的奇跡。最絕的還是，無論是在戰時還是戰後，這把戲都未被國人識破，連苦主蔣介石吃盡啞巴虧都無法抱怨，甚至在抗戰勝利後還不得不給紅軍將領授勳。作為戰略家，這就是毛真正唯一的平生得意之筆，確實算得上是羅貫中所謂“隨機應變信如神”了。不過，它有如說是軍事科學的輝煌成就，莫如說是厚黑學最高最活的頂峰。

但從軍事學的角度來看，近百萬大軍就潛藏在佔領軍的鼻子底下，遊而不擊，佔領軍居然一無所知，只知道傻盯著看得見的國軍重兵集團，也是一種獨一無二的成就。無怪乎官修黨史作者們要把偉大領袖吹成世界級軍事家。但比較客觀的態度，是分別確定導致這偉大戰略成功的一系列因素中，有哪些是主觀因素，而主觀因素中又有哪些是毛的個人貢獻。

第一個主觀因素，就是偉大領袖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如上所述，抗戰爆發伊始，他就看出了小而極強的日本征服大而極弱的中國必然具有以下特點：1）中國軍隊沒有戰勝日軍的可能。共軍若要去當抗日英雄，不旋踵即化為齏粉；2）日軍的軍事征服必然是空洞的，只能是“點”與“線”，廣闊的“面”上必然形成權力真空區域，大有填補空間；3）因此，最明智的辦法就是借力打力，實施“鬣狗戰術”，亦即絕不捲入與日軍的衝突，

卻把共軍化為“播種機”，掛在日軍那負責翻地的“拖拉機”後面，利用日軍去替中共打天下。

當時黨內除了毛澤東與張聞天，沒人看出了這一點。這就是洛川會議上黨內何以會發生“分兵”與“合兵”之爭。共軍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也是宣傳隊。打仗時集中起來，不打仗時即分散開來去發動組織群衆。因此，洛川會議上的爭論，實質上是“打仗”與“不打仗”之爭。大多數黨內愛國同志想集中兵力打仗，而偉大領袖則反對打仗，主張充分利用我軍的“工作隊”功能，分兵組織發動群衆，從無到有地建立根據地。事實證明，毛澤東對了，大眾因而心悅誠服，讓毛充分利用這心情，將自己吹成一貫正確的天才，建立了絕對權威。

但若沒有列寧同志發明的“人民控制論”，這戰略就不可能成功，甚至不可能構思出來。前文反復強調指出，列寧黨是集教會、軍隊、地下幫會於一身的顛覆政權的強大工具。它奉行鐵的紀律，黨員都是宗教狂熱分子，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並滿懷必勝信念，都受過如何組織、教育、發動、控制群衆的基本訓練，都能在極為困難的處境下獨立工作，迅速將周圍的群衆發動組織起來，變成黨的基本隊伍。這是列寧黨的獨門功夫——一顆種子撒下去，轉瞬便是一片森林。此即現代的“撒豆成兵”術。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懂這一手。當年鄂豫皖蘇區也就只是三百多人的原始投資，最後也發展到了八萬大軍。哪怕紅四方面軍因西征折損了大半兵力，剩下來的兵力仍在紅軍中佔大頭。毛高於同儕之處，不是他發明了這一套，而是他看到了我黨在抗戰中的基本任務，不是去打日本人，而是先撒豆成兵，搶佔地盤，百倍擴大武裝，待到實力增加到一定程度，便大舉殲滅國軍。

這是共黨特有的優勢，別人無法效法。毛在抗戰中使用的戰略原則，其中假招安、消極避戰、保存實力等等，並非什麼了不起的獨門功夫，所有軍閥無不知曉。但他們缺了我黨的宗教優勢與組織優勢，因此無法效仿。閻老西就很佩服我黨這手，曾慨歎八路的本事，是分散兵力後還能集中起來，而我們的人如果散開了就再也收不起來了；所以八路越抗越肥，我們越抗越瘦，云云。這並非他一個人的苦惱。英美入侵伊拉克時，為躲避聯軍空襲，薩達姆也曾分散兵力來著，可散開後也就再也無法收拾起來了，大軍反而因此潰散。

正因為共軍在兵力分散之後不但能再度收起來，而且還能在分散期間倍增，才保證了偉大領袖的戰略的成功。否則總兵力也就三四萬人，再撒到廣袤的華北去，立刻便融化得乾乾淨淨，還怎麼完成趁亂搶天下的戰略任務？因此，這光榮應該首先歸功於蘇聯老大哥，其次才是咱們的毛主席。

不過中共也有自己的發明：兵民合一的人民戰爭。這一條保證了百萬大軍就藏在鬼子鼻子底下，鬼子還一無所知。同樣滯留在戰線後方的國軍可沒這本事，因此無法隱蔽自己，成了日本人唯一看得見的打擊目標。這一套對兩眼一抹黑的外國佔領軍特別有效，其最輝煌的表演，是越南戰爭。美國人直到狼狽撤退，也沒想出該怎麼區分軍人與老百姓。

這一條可不是蘇聯老大哥想出來的，而是中共的集體發明（不能說是毛的個人發明）。毛在洛川會議上力主將我軍置於敵軍側後，此乃人類常識，因為八路毫無重武器，真要打仗當然只能如此。斯大林也作過類似指示。1937 年 11 月 11 日，他在接見王明、康生與王稼祥時說：“因為八路軍沒有炮兵，它的戰術不應當是正面進攻，而是騷擾敵人，將敵人誘入內地，然後從後方

打擊之。必須破壞日軍使用的通訊、道路與橋樑。”但斯大林與毛在此有兩個區別：第一，他雖然認為八路軍應該擴大到 30 個師，但說的還是打仗，而不是毛設想的遊而不擊，壯大自己。相反，他大概知道毛的德行，特地指出：“中國人怎麼去打外敵——這才是決定性的問題。當戰爭結束後，他們怎麼自己打自己的問題才會出現！”[269] 第二，他沒有想到兵民合一的人民戰爭。

因此，人民戰爭應該算是我黨的發明。不過，它真正的偉大勝利並不是在中國取得的——我黨的人民戰爭打擊的是國軍而不是日軍——而是在越南。越共可是真和美國人打。據美國方面的統計，一共有 58,226 美軍在該戰爭中喪生或失蹤[270]。而全體共軍一齊出動猛攻日軍只有一次，可惜是在“八一五”之後。其時日軍業已遵旨停火，奉盟軍司令部之命等待國軍前來受降。但共軍爲了搶佔地盤並繳獲日軍武器彈藥，在華北及蘇北對鬥志全無、只敢自衛、不敢出擊的日軍發動了無數次猛烈進攻，造成日軍一共七千多人傷亡[271]。在此之前，共軍在長達八年的時間裡對日軍的危害，恐怕還不如一場中等規模的流感。要推知這一點毫不困難——連全軍出動猛打死老虎，都只能斃傷日軍七千多人，那“百團大戰斃傷日軍二萬餘人”是怎麼想像出來的？

第二個主觀因素，是毛不但高瞻遠矚看到下一步棋，並始終極度專一、無比執著地追求那最終目標，“萬縷千絲終不改，任它隨聚隨分”。從洛川會議開始，他就認定了戰爭的最終目標是推翻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此後無論有著何等千頭萬緒的事，他都對此始終念念不忘，動輒強調“全力對付”、“全力以赴”、“全力打擊”國軍，一直在為最後的攤牌作準備。

這不是說毛澤東不曾對終極目標有過短暫的偏離。1943 年初，他對彭德懷說：

> “在德意日打倒後，國際國內均會發生根本變化，這一形勢是利於人民不利於獨裁的。但蔣在抗戰中有功勞，同時人民心理厭惡內戰，故我們應爭取在抗戰後與國民黨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九月蔣約我見面，派了林彪去，現尚未回；到適當時機，我準備出去見蔣，以期談判成功。”[272]

但這動搖畢竟是一時的，在豫湘桂戰役暴露了國軍的虛弱之後，毛澤東“把中國拿下來”的決心就再不可能改變了。相比之下，蔣介石從未把共產黨當成主要危險，極度低估其潛力，精力都花到外戰上去了，當然要處於劣勢。

第三個主觀因素，是我黨強大的宣傳機器與高明的統戰策略。要將內戰偽裝為外戰，“偽裝”是成功的關鍵，否則一旦暴露就要備受輿論譴責乃至軍法審判。然而我黨把從蘇聯學來的宣傳戰與統戰策略發揮得出神入化，確保了中共非但始終沒有受到譴責，反而成了“砥柱”。

皖南事變就最典型地表明了這一點。本來，國民黨逼共抗日的“皓電”就是中共大打內戰逼出來的，事變之所以發生也完全是中共的錯。然而我黨事前賊喊捉賊，事後呼天搶地，再加上周恩來在重慶的統戰工作，便使得是非徹底顛倒，不但各小黨派對國民黨表示反感，在華外交人員、傳媒人士、海外華人等一邊倒地譴責國府，就連美國政府也公開表示嚴重關切[273]，完全成了“挨了打的，忍辱負重馱著打了人的；打了人的，苦大仇深騎著挨了打的”。中共中央後來總結道：“皖南事變引起全國及全世界人士的注意，中國共產黨更加成了中國團結抗戰的重要因素，我黨的地位已提高了。……蔣介石在這次反共高潮中的失敗，使他在今後再要發動這樣的高潮更加困難，使他不能不重新考慮自

己的地位和態度。”[274] 說的完全是事實。如果國民黨也會這手，在朱懷冰、侯如墉、張蔭梧、石友三等部一萬六千餘人被殲滅，韓德勤部兩萬餘人在黃橋戰役、曹甸戰役中被消滅時，知道如何利用輿論工具，及時充分地揭露中共的叛國罪行，則毛澤東喬裝改扮了的內戰根本也就打不下去。

越到後來，我黨這手宣傳統戰功夫也就越是爐火純青，讓心機簡單的老美統統入了彀。史迪威、謝偉思等人都一致認定蔣介石不抗戰，真正抗日的是英勇的八路軍，中國的未來寄託在中共身上。共美關係好到毛澤東一度指望美國援助，為此請求秘密訪問美國的地步。能看穿中共把戲的，舉世唯有他們的厚黑老大哥蘇聯人，尤其是其派駐延安的情報員孫平等人。

但這一手仍然是蘇聯傳給中共的，並非毛的發明。毛最打動人的，還是他的痞子精神。皖南事變後，國府取消了新四軍番號，停發八路軍軍餉。毛乃致電周恩來：

> “請問國民黨，對八路軍是否還準備發餉，如發則已，否則我們將向全國全世界（包括蘇聯在內）募捐，發起普遍的募捐運動（我們真正準備這樣做），學叫化子討飯吃的辦法，因為國民黨迫得我們沒有路走，我們將要餓死了。”[275]

這世上的便宜都讓我黨佔了：國府挨了打還不說，兇手還要它開工資。若是不給，就成了“反共”，越發成了“國民黨破壞抗戰”的罪證。

第四個主觀因素便是偉大領袖的妄想型人格障礙（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用敬愛的前國家主席楊尚昆同志的話來說就是：“毛主席這個人非常多疑”[276]。此乃他和斯大林最觸目的主觀氣質。我想，這除了與他們微時出身卑賤有關外，更是長期的殘酷無情的革命鬥爭造成的：長期處在險惡的環境中，隨時都

可能喪命，必然會誘導出疑神疑鬼，決不信任任何一個人，而是將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潛在的敵人的心理傾向。在險惡的生存環境中，這種心理變態反過來又變成了一種生存優勢，因而成了一種正反饋式的不斷強化，最終變成了患者的行動本能。

偉大領袖毛主席構思那偉大戰略，本身就是這種心理變態的輝煌表現。前文已經總結過，他提出那幾條戰略原則的基礎，是對形勢的基本估計，其中最重要的是：“國民黨的反動本質並未改變，仍然是中共的死敵。蔣介石只是消極抗戰，必然要在受到日軍重大打擊後對日投降，消滅中共。”既然如此，那結論就是國共遲早要翻臉，那有如被國民黨打個冷不防，不如在一開頭便假招安真拆臺，假抗日真擴張，厚積實力，準備時局突變時對付蔣介石的進攻。

據張國燾說，周恩來並不同意這分析。他根據蔣介石特別倔強的個性，認定蔣會抗戰到底。因此主張與國民黨真誠合作。事實證明周恩來的分析是對的，毛完全錯了。然而毛基於錯誤估計提出的戰略卻歪打正著，下文還要專門分析這一問題。不難設想，如果毛澤東和張聞天沒有那心理疾障，如周一般深信蔣會抗戰到底，服從國府的軍令政令，與友軍並肩抗日，則三萬多人的隊伍早就被日軍一舉殲滅無遺了。就算逃過被殲的厄運，那也不可能擴張到後來的地步，在戰後肯定不是國軍對手，也就不可能爭到天下了。

毛的心理變態，似乎有助於解釋他為何會突然會一反常態，變得小心謹慎起來。如前所述，他的東征和西征戰略，乃至西安事變期間提出的以兩三萬兵力萬里奔襲，打到南京去，“擊破敵之首腦”，完全是想入非非，已經超出了正常人的範圍，每次都引起將領們反對。然而這次他卻一反常態，一再警告將領們不要

小看日軍，不要到前線去充抗日英雄，不該和日軍打仗，而是應該去分兵發動群衆，建立根據地。

這是怎麼回事？他對大手筆的偏執性愛好上哪兒去了？為何不提用三萬人萬里奔襲，打到淪陷了的北平或其他大城市去呢？過去他和將領們意見不一致，都是他冒進，將領們持重，而這次卻反了過來，是將領們冒進，他格外持重。他反對“大戰觀念”是如此執著，以致在二十多年後的廬山會議上還要提起，嚇得林彪同志趕快檢討：“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還要批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而老彭也給嚇得立即認錯：“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是什麼讓他的性格突然來了個 180 度的大轉彎？

我想，這裡面因素比較多，不光是他知道皇軍的飛機大炮厲害，也不光是出於“內戰勇猛，外戰無膽”的優秀民族傳統，更是因為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料定蔣介石遲早要投降，生怕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遭到日軍與國軍夾擊。這噩夢始終纏繞著他，在所謂“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發作得尤為猛烈。當時他認定，蔣介石令共軍過黃河抗日，是想與日軍夾擊共軍，為此竟然不惜計劃先發制人，用重兵突襲國府後方。既然有這種嚴重的心理疾患，他當然要始終牢記“蔣、日、我，三國誌”，認定蔣才是真正的敵人，因此決不願為打擊事實友軍而把大手筆使出來。

第五個主觀因素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什麼國家民族觀念。在這點上他與張國燾、周恩來那種經歷了五四運動洗禮的新青年不同，倒是深得馬克思“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的“國際主義”要旨，這就是他能輕易得出“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的結論的原因。

當然，說偉大領袖在這點上是個不折不扣的列寧主義者，也不完全準確。他或許確如王明那樣，也把蘇聯看成是自己的祖國（所謂“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但他愛那個國家的前提，是必須有利於自己奪取政權，決不能愛到為它犧牲自己的奪權機會。因此他敢於對共產國際的指示陽奉陰違，有利於自己的才執行，不利於自己的就不辦，甚至能趁人之危，敲詐上司一把。

蘇德戰爭爆發前夕，莫斯科就對中共的消極抗戰極不滿意，季米特洛夫曾命令中共：“無論你們面臨著什麼樣的困難，都必須堅決採取一切可能的各種行動反擊日本的攻勢。無論是中國人民民族戰爭，還是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未來道路都取決於此。”[277]

然而毛澤東除了捏造赫赫戰果哄騙大老闆外，便是向莫斯科哭窮。蘇德戰爭爆發之初，蘇軍兵敗如山，斯大林生怕日本趁機夾擊，要季米特洛夫命令中共發起大規模行動，換來的是毛澤東再度哭窮。季米特洛夫於是建議蘇共向中國黨提供 200 萬美元援款。聯共（布）中央次日即批准馬上援助中國同志 100 萬美元[278]。然而即使是金錢也無法軟化毛澤東堅定不移的避戰決心。

眼見共產國際使喚不動中共，蘇共中央便與共產國際聯合下令，要求中共中央討論並提出牽制日軍進攻蘇聯的具體行動部署。毛回電說，中共中央已經做出決定，將盡全力阻止日軍從華北轉移去進攻蘇聯，請求蘇聯援助彈藥，以便擴大行動。這要求嚇壞了蘇聯人：他們本來就擔心日本發動進攻，以武器援助八路豈不是為日軍入侵提供藉口？於是莫洛托夫告訴季米特洛夫，同意中共的行動路線，但現在不能允諾提供彈藥[279]。毛澤東便趁機回答主子，因為“敵我軍事技術裝備懸殊太遠，我人力、物力、地區、彈藥日益困難”，“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

假若不顧一切犧牲來動作，有使我們被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據地的可能，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280]

據當時參與與“遠方”秘密電訊聯繫的師哲披露，此後斯大林又幾次向中共求援。1942 年德國發動夏季攻勢期間，風傳日本將配合德國進攻蘇聯，斯大林為此三次致電毛澤東。第一次他答應為中共提供一兩個師的新式武器，要八路軍派一兩個師去中蒙邊境去接。毛回電拒絕，說部隊到不了中蒙邊境就會被日本飛機發現消滅。此後斯大林再次來電，問毛可否派出較小型的遊擊部隊，到滿蒙邊界輪番接受較小批量的武器，毛再度回絕。1943 年初，斯大林第三次來電，要中共調若干師團部署在長城內外一線，雖不是爲了進行大戰役，卻也能起到牽制日軍力量的作用。毛這次同意了，把羅瑞卿、楊成武、呂正操等部部署在長城內外一線。此舉既未暴露目標，打草驚蛇，又佔據了重要戰略位置，為抗戰勝利後迅速進入東北做好了準備。[281]

毛澤東在此顯示的太極拳招數令人歎為觀止，富有中國特色。在這點上，徒弟勝過了師父——不管大老闆怎麼發招，他都有本事推搪：先是推說沒有武器，待斯大林答應給了，又說若部隊集體出動就會被日本飛機消滅。斯大林於是請他派出小股部隊多次輪番接貨，又被他回絕了。直到最後他才同意將八路軍隱蔽部署在出關的戰略位置上，不是爲了牽制日本，而是爲了戰後迅速進入東北。當初他不顧一切去定遠營接取蘇援，此時卻又對蘇製武器突然喪失興趣，當真是絕大諷刺。

師哲說，他對毛澤東這些做法的真正理解，還是在“七大”期間。一天，他請教毛澤東王明的錯誤實質是什麼，毛答曰：“王明的問題，關鍵就在於他對自己的事（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了！而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282]

上文已經介紹過，劉少奇和陳毅都曾在蘇德戰爭爆發後主張向日軍發動反攻，卻為毛否決。若是王明或張聞天作黨魁，哪怕張國燾也罷，都絕不會坐視主子落難而無動於衷，必然老老實實聽從主子號令，向日軍發動進攻。那麼共軍的實力就會暴露出來，遭到皇軍無情掃蕩，後來也就沒有可能與國民黨爭天下了。毛的自私自利，避免了將我黨幾年發的國難財毀於一旦。

當然，這種小農式自私之所以奏效，還全靠日本人不打蘇聯打南洋。若是日本人決定北上，聯合希特勒結果了蘇聯，則共軍也就無可能在戰後挺進東北，接取大量武器特別是重武器。而沒有重武器，即使有百萬之衆也絕無可能是國軍對手，這點毛澤東早在長征時就反復向張國燾及其他中央委員們強調過了。

第六個主觀因素我已經在舊作《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中講過了[283]，那就是毛澤東敢於並善於以毀掉全局的自傷訛詐來迫使對方就範。毛看準了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亡國，把這當成了蔣的天然劣勢而加以充分利用，不惜將邊緣政策推行到極限程度。這用他的“哲學”話語來說，便是“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唯有不怕破裂，才能不須破裂而佔盡便宜。

導致偉大領袖偉大戰略成功的客觀因素，第一條應該是國共合作。沒有這條，則中共絕無可能上臺，因此我黨把“統一戰線”當成了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但前文已經介紹過了，這偉大法寶是偉大船長硬塞給偉大舵手的。若非斯大林識破並制止了毛陽奉陰違，另搞一套，第二次國共合作就不會實現。

確保偉大領袖新型內戰成功的第二個客觀因素，乃是蔣介石死硬的愛國主義。這死硬的愛國主義精神，使得抗戰成了他一個人力排衆議、一意孤行的戰爭。

我黨指控國民黨內部有龐大的親日派勢力，此話不假。國共兩黨都有深厚的外國背景。我黨的蘇俄背景就不必說了。國民黨雖然後來比較乾淨，早期也好不到哪兒去，要人都是日本海歸。同盟會本是日本右派組織黑龍會扶植起來的，其中甚至有日本會員。日本右派一直大力支持孫中山與清廷、袁世凱搗亂，以使中國處於永恆內亂中。而孫氏的夢想，便是中日合併，實行“大亞洲主義”。

孫文這一賣國思想對黨徒們影響至深至鉅。記得 90 年代初臺灣《中央日報國際版》登載過張群訪談錄。記者說，有人指責他是親日派，問他是不是真的。他說，那其實是受國父“中日聯邦”設想的影響，國民黨內有這種想法的人很多，云云。確實如此，許多國民黨人都受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影響，認為中日應當聯手對付西方白人的侵略，而這正是日本人在二戰中的口號，所謂“日中親善，互相提攜”、“大東亞共榮圈”、“亞洲民族解放戰爭”等等，其實都是孫文當年一直在向日本人拼命兜銷的陳貨。日本人建立滿洲國，就曾以孫文多次向日本叫賣滿蒙的事實為據，聲稱他們是實行中華民國國父的遺願。

賣國父孫文留下的遺教，使得其忠實信徒的反帝激情集中在白人頭上，後來與英美結盟完全是被日本人逼的。在中日戰爭爆發後，他們都覺得是兄弟相殘——同文同種的黃人不去打白人，卻自相殘殺。這種中日親善之情，在抗戰勝利後立即就流露出來，看一眼岡村寧次的回憶錄就夠了：

> “9 月某日，為做好接收準備，中國總司令部派某中將到津浦線南部各地視察。該中將對所在地日軍將士作了如下的談話，使我將士大為感動：

‘日軍並非戰敗，中國軍亦非勝利。儘管如此，我等應停止一切爭議，讓既往之事付諸東流，而致力於中日之合作。’”[284]

“新編第一軍是蔣介石嫡系美式優良裝備的精銳部隊，在加爾各答受過美式訓練，軍紀嚴明。其年青將校擅長外交，態度明朗，對與日本作戰，深以為憾。有的甚至高喊：‘我們黃色人種之團結，乃亞洲當務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鴉片戰爭！’當夜，兩國軍官在當地飯館舉行聯歡會。中國第一師司令部除師長外全體軍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參謀及守備隊長以下全體軍官出席。兩國軍官攜手進入飯館。這一情景使麕集的人山人海的群衆和士兵，投以驚奇的目光。……

以戰爭結束為轉機，中國方面特別是上層人物之間，掀起加強日、中合作之熱潮。……各地接收中也到處可見。中國甚至有將日本的高級技術、軍事技術及技術人員等，引進中國之意圖。但因美國對此不滿，此風遂被扼止。”[285]

南京大屠殺就發生在昨日，竟能忘記得那麼快，而無足輕重的香港，卻當成不能或忘的深重國仇；對美國的高科技沒興趣，卻對日本那二流國家的科技羡慕不止。這種奇特的感情錯位，在在提示了國民黨“打錯人了”的遺憾。前去受降的何應欽向岡村寧次充分表示了這遺憾：

“我任軍政部長以來，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國內情況未能如願以償，而日本軍部內，也有不諒解蔣委員長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啟戰端，誠不勝遺憾之至。我曾對磯谷、喜多兩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佔中國，外國勢將介入，事態將向困難發展。7 月 3 日蘆溝橋事變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國放

棄親蘇政策，並接受廣田五原則時，我也曾說過中日相戰兩敗俱傷，結果將使共黨勢力擴大。此事不幸為我言中。”[286]

這就是為何孫中山的傳人汪精衛為何會投降日本。其實若不是蔣介石當家，戰爭恐怕根本也就打不起來。就算是打起來，國軍遭受重創後也很快就會屈服，何至於苦撑八年之久？

抗戰爆發之初，國民黨內部的親日派深知中日實力的天壤之別，對抗戰前途悲觀失望，被人稱為“低調俱樂部”。當時我黨勢力正在惡性膨脹，“和平接管”了大量土地，更是引起了他們的警覺，覺得抗戰只能讓中國化為焦土，讓共黨坐大，什麼好處都沒有，汪精衛就是為此最後決定投降日本人的。

必須指出，唱“低調”者，並不都是出於孫中山哺育出來的“日中親善，互相提攜”的深厚階級感情，其中不乏與日本並無淵源的老成謀國之輩。胡適曾被指為“低調俱樂部”的成員。雖然他只是為那夥人取了個諢名而已，但不能不說他的思路與他們有共通之處。1937 年 8 月 5 日，亦即七七事變後不到一月，胡適和陶希聖即聯名向蔣介石上書，主張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此換得日本讓步，從根本上調整兩國關係。[287]

竊以為，不能用“賣國主義”、“投降主義”等國產標籤，去對這種思潮作簡單的道德批判。自鴉片戰爭以來，一部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就是“蠢動——挨打——再蠢動——再挨打——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的蠢動失敗史。開頭是朝廷的“清流”禍國，死不承認國家極度孱弱腐敗，根本不是鬼子的對手，越打吃虧就越大。直到八國聯軍佔領了北京，老佛爺才算醒了過來，學著鬼子搞新政。民初的統治者也算清醒。可五四運動之後，尤其是國共兩黨在 20 年代把列寧的“反帝民族解放鬥爭”理論引入

中國，為蘇聯人火中取栗，挑起了一系列涉外事件之後，全國知青便統統成了排外“清流”。

這結果便是，在國家陷入無窮內亂、國力日益下降的同時，民氣卻變得越來越躁狂囂張，“反帝”激情日益高漲。如楊杏佛所說：“但知是非，不顧利害，不計成敗”已經成為“‘五卅’後民族獨立運動的精神”[288]。任何正常人都看得出此中荒唐：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病夫去侮罵武功高手，還能有什麼好下場？

當時許多有識之士都為此憂心忡忡，蔣廷黻指出：

> “中國國力和民族意識覺醒的程度不能相稱……我們堅決要求國際地位平等，但是我們沒有支持此種要求的國力。”[289]

為國立下大功的資深外交家顏惠慶說得更直截了當：

> “當時中國負責任的、明白事理的人對此採取保留和沉默的態度，而那些主張武力外交的魯莽的政客們，卻以排外和幼稚的口號煽動民衆情緒，根本不知道這樣做簡直是在玩弄導火索，遲早會引爆炸藥桶。這種興師動衆的宣傳在國內搞得轟轟烈烈，看起來很成功，而給國際外交鬥爭帶來的卻是災難。在處理棘手的外交問題時，必須考慮我國軍事力量不足，其他方面準備不夠，以及所處的不利的國際環境。採取冒險蠻幹的做法，雖說動機是愛國的，但效果卻是令人不能容忍的。”[290]

顏老先生沒有指出的，乃是“那些主張武力外交的魯莽的政客們”之所以要這麼幹，完全是出於個人野心，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以抗日為倒蔣”，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則是“在討日令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

所以，政客們不是“魯莽”，更不是不是不知道玩弄導火索的危險——毛澤東不是在洛川會議上語重心長地警告過全黨，不要小看日本人的武力，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麼？看出中國絕非日本的對手，並不需要什麼過人的聰明才智。

這世上，大概也只會有中國憤青才會神智錯亂到以為光憑本國的力量即能打敗日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如狂風掃落葉一般，席捲整個南洋。區區 3.5 萬日軍在兩周內即攻陷新加坡，迫降了將近 14 萬英軍、印軍和澳大利亞軍組成的聯軍。13 萬日軍在菲律賓登陸，五個月後就全殲了 15 萬美菲聯軍（迫降 10 萬，餘者打死或打傷）。連西方強國都不是對手，讓中國那內部四分五裂、毫無國防能力的東亞病夫上去，當然只能是我黨笑罵的“一觸即潰，一潰千里”。

所以，在“愛國”政客們，“抗日秀”原是供內銷的，並不準備出口。愛國主義本是西方發明，但中國人在引入時作了實質上的改進，把它變成了一種所向披靡的內戰法寶，此即所謂“以夷制華”，乃是中國第五大發明。

然而蔣介石卻是個真正的愛國者。他何嘗不知以中國之積弱，與日本交戰完全是自殺？可惜他不是真正的獨裁者，不能罔顧民意，更何況麾下還有馮玉祥、李宗仁等“以抗日為倒蔣”的野心家們。他要真是為了顧全國脈民命而忍恥媾和，內戰立刻就要再度爆發。強敵窺伺在側，再與西南西北軍閥大打內戰，國亡無日。而且，日本人欺人太甚，東北淪陷後又在覬覦華北。如此蠶食下去，究竟伊于胡底？

在這種情況下，取勝的一線希望全在於友邦的支援。就是為此，蔣介石才在戰前就採取了容共政策，指望把蘇聯拉來作盟軍。可惜他連毛澤東都玩不過，又豈是斯大林那厚黑學祖師爺的

對手？1937年10月22日，蔣介石電令時在莫斯科訪問的楊傑向蘇方詢問，如中國武力抵抗到底，蘇俄“是否有參戰之決心與其時期”[291]。11 月，伏羅希洛夫、斯大林在會見楊傑和張沖時都答應，蘇聯在緊急關頭將參戰[292]。然而當南京危急，蔣介石要蘇聯兌現諾言時，斯大林卻聲稱：“假使蘇聯不因日方挑釁而即刻對日出兵，恐將被認為是侵略行動，日本在國際輿論的地位將馬上改善。”[293]

國際支援既不可得，蔣介石就只能實行和戰兩手，在竭力抵抗的同時，也希望戰爭能因日本人的讓步而迅速停息下來，為此曾在早期通過秘密使節與日本“民間人士”有過一點接觸，終因蔣介石死硬的愛國立場與日本陸軍的驕橫而以毫無結果告終。

據楊天石教授的研究，萱野長知、小川平吉、頭山滿、秋山定輔等日本“民間人士”，在抗戰中曾與國民黨高層的密使秘密接觸，企圖迅速解決“支那事變”。這些爛人都是孫中山當年的密友，鼎力協助孫氏將中國搞亂，其中萱野是興中會會員，同盟會會員，曾應黃興之召參與辛亥革命漢陽之役，1915 年又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軍顧問，協助居正在山東起兵反袁。小川則在辛亥期間與頭山滿，內田良平、犬養毅等人組成有鄰會，援助孫文。頭山滿就更不用說了，一直在孫氏生前積極贊助他“唱衰”中國[294]。因此，從革命輩分來講，他們可算蔣介石的父執輩。蔣介石自命孫文傳人，不能不對這些爛人十分恭敬。

老蔣設下的停戰前提，是日本必須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他在給萱野的密電中將這說得清清楚楚：

> “中日事變誠為兩國之不幸，萱野翁不辭辛勞，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礎，必須建立於平等與互讓之基礎上，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295]

楊天石教授的研究表明，蔣介石一直堅持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為雙方停戰談判的前提。無論是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上，是答覆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還是與日本“民間人士”的秘密接觸，國府代表都秉承蔣介石的指示，堅持了這一立場。用蔣氏的話來說便是：“倭必先尊重中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並即恢復七七事變前之原狀，然後方謀停戰。”[296]

抗戰初期我軍迭遭慘敗，並未影響蔣介石的決心。就連在1941 年，抗戰進入了最艱苦、勝利希望最渺茫的黯淡時刻，蔣介石“抗戰到底”的決心仍然毫不動搖。其時蘇聯踐踏了過去對中國作出的種種保證，與日本訂立所謂“中立條約”，相互承認並尊重偽滿與外蒙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中斷了給中國的軍火援助。英國對日妥協，竟在公開文件中將滿洲當成一個獨立國家，並表示尊重日本在該“國”中的經濟權[297]。就連美國似乎也靠不住了。蔣介石得到情報，謂美日達成妥協，美國已同意日本佔領中國的華北與滿洲[298]，他仍然向國內外莊嚴宣告：

> “我們非完全驅逐寇軍於我們的國境以外，徹底消滅他侵略的野心，我們的抗戰，是決不能停止的。我們若非使東北同胞獲得真正的自由，東北的失地完全恢復，在我們神聖的抗戰，亦決不會停止的。”[299]

就在珍珠港事變爆發前一天，他還讓拉鐵摩爾轉告羅斯福總統：“中國決不能放棄東北，否則新疆、西藏皆將不保，外蒙亦難收復。”[300]

如果說蔣介石在抗戰初期態度死硬還能理解，在我軍一再遭受毀滅性打擊，華北和沿海大城市相繼淪陷，國脈如絲，西方列強隔岸觀火，漠不關心，內外交困之際，還如山西騾子一般倔強，死挺下去，那就只能用個性來解釋了。

須知憤青的“腎上腺愛國”與理性愛國的區別，是前者其實是一種病態，與意淫一般，是在想像中獲取某種滿足欣快，因此不能持久，在現實露出猙獰面目來後就會迅速消散。因此，若蔣介石在百姓吃夠苦頭後與日本媾和，不大可能引起強烈的民意反彈。就連憤青們也不會像抗戰爆發前那樣，慷慨激昂地起來示威，恐怕要反過來歡呼蔣委員長英明也未可知。如果他充分利用國民黨內深厚的親日派資源，與日妥協，起碼不會在國內引起強烈的反對（別有用心的共黨不計，但他們的反對無濟於事）。

實際上，當時國民黨內外，除了汪精衛一派以外，主張與日妥協的大有人在。日軍進攻武漢時，孔祥熙的心腹賈存德向萱野等人表示，共產黨正積極發展勢力，漢口陷落將導致赤化蔓延，希望日軍暫勿進攻漢口，擬由孔祥熙、居正、何應欽、李宗仁出面會談，由日本提出議案[301]。然而蔣介石通過早期的試探，已經知道日本人絕不會答應撤出中國領土，嚴令禁止再進行此類接觸：“賈某事，應嚴令停止活動，否則即作漢奸通敵論罪。敵想復訂停戰協定，以亡我國，其計劃極毒，請兄負責制止，免誤大政方針。千萬注意是荷！”[302] 此後他又多次制止孔祥熙的秘密活動，甚至以“殺無赦”警告孔祥熙及其密使蕭振瀛[303]。

對於那些並非親戚的國民黨元老，他可就不客氣了，不但派軍統在越南謀刺意圖投敵的汪精衛而誤中曾仲鳴，還派軍統在上海幹掉了被日本特務土肥原說服、起草了《和平救國宣言》的唐紹儀。可見他破釜沉舟的決心有多決絕。

蔣介石的決心，來自於他通過早期秘密接觸後，認定日本人絕不會輕易放棄已經佔領的大片土地，中國不可能以和平手段收回失地，就連讓日本人同意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都無可能。中國別無選擇，只有不惜一切代價抗戰到底。

事實證明他對日本的認識是正確的。日本陸相板垣征四郎就曾驕橫地說："按照原來的估計，漢口陷落時，國民政府將無條件投降，日本方面沒有必要發表規定撤兵的聲明。"[304]

蔣介石當然知道共黨趁機崛起的禍害，但在兩個魔鬼之間，他選擇了與他認為危害較小的魔鬼結盟，去共同對付他認為危害較大的魔鬼。在這點上，他非常像邱吉爾，後者也認定蘇聯乃是危害性較小的魔鬼，因而與蘇結盟去對付危害性更大的納粹德國，到快勝利時才發現蘇聯勢力空前膨脹而後悔不迭。蔣介石與邱吉爾相似的另一點是，兩人都因個性強悍而在毫無勝利希望的情況下力排衆議堅持下去。如果沒有邱吉爾，很難想像英國會在敦刻爾克撤退後獨自堅持對德作戰。更難想像的是，中國若無蔣介石，怎麼還可能與日本血戰八年，苦撐不倒，寧死不屈。換國民黨任何一個人去坐他的位置，都勢必要走上汪精衛那條路。

因此，似乎可以說，抗戰乃是蔣介石一個人的戰爭。沒有老蔣，中國也就不會有抗戰。人民的好總理在洛川會議上的預言完全是正確的，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估計完全錯了。吊詭的是，毛的偉大勝利，恰來自於其基本估計的錯誤。若是他的估計正確，老蔣如汪精衛一般及時投降，就地停戰，掉過頭去痛剿共軍，則我黨也就絕無上台的希望。

這其間的是非功過，實在是難說得很。我曾跟英國人說，你們把邱吉爾當成大英雄，我看實在是哭錯了墳頭。如果他在敦刻爾克撤退後聽了哈利法克斯爵爺的話，與德國媾和，讓德國人心無旁騖地去結果蘇聯，世界今日恐怕要光明得多。你們和德國人死扛，最後是丟掉了自己的大帝國，從超級大國變成了個二三流國家，這種英雄到底給英國帶來什麼好處？然而即使是理性如英

國人，也難接受我這奇談怪論。由此看來，評論先總統蔣公的功過是非，確實超出了我的能力。

確保偉大領袖新型內戰戰略成功的第三個客觀因素，乃是虛驕蠢笨的日本人毫無明確的戰爭目的，從頭到尾就不知道該拿中國怎麼辦。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英明指出：“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這偉大真理既簡單又樸素：既然紅軍不是國軍的對手，那就請大日本皇軍代自己去收拾蔣介石。外國佔領軍可不比國府那地頭蛇，兩眼一抹黑，分不清哪些是良民，哪些是共黨，因此那佔領必然是空洞的，廣大基層留待共軍去填補。皇軍佔領的土地越多，我黨控制的土地也就越多。全國都給佔領了，全國也就是“外日而內共”（或形日而實共）的黨天下了。

然而這思路有個致命缺陷：如果日本人真想征服中國，那就不會採用“添油戰術”，一點點地增兵，而會像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說的那樣，一開頭便舉國以赴，動用大部分陸海軍兵力，效滿清故事，陸軍先在東北集結，入華北後兵分三路，右路沿隴海線向西經略西北，中路沿平漢路南下，左路沿津浦線南下，以海軍封鎖沿海港口，三個月內便能征服北中國。此後三路同時南下，中路分為兩路，一路與右路征服中南和西南，形成鉗形夾擊，另一路則配合左路自西向東作旋輪運動，將國軍重兵集團逼向海邊消滅之。與此同時還可以一部自廣州登陸，與左路和中路南北對進，包抄殲滅國軍，充其量一年內就能輕鬆征服全中國。

如果日本人採取這種旨在將中國從地圖上抹掉的征服戰略，毛澤東還有什麼戲唱？日寇打的是速決戰，迅速摧毀國軍有效抵抗，佔領所有的大城市，三個月平定華北，一年內平定全國，迫使死不投降的蔣介石逃到西藏或緬甸去，成立由日本人操控的偽

政府。中共擴散得再快，也來不及蔓延到華北去吧？等到中國變成了“滿洲國”第二，日本人再把收拾抗聯的那手使出來，大規模“集村並屯”，以地頭蛇作嚮導肅清境內土共，必要時效法老蔣大規模圍剿。我黨連中央軍都打不過，難道還能打得過日軍？

然而虛矯蠢笨的日本人發動的侵略戰爭，乃是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的沒有明確戰爭目的“大東亞怪戰”（“圣戰”多了個豎心旁）。連日本人自己都不知道為何要打這場戰爭，想通過它達到個什麼目的。它是人類戰爭史上見所未見的“自動生長的戰爭”，日本人只有隨機產生的戰術目的，卻始終沒有個明確的戰略目標，遑論由此決定的通盤戰略規劃。它其實是一場“因失控而遷延擴大的懲罰行動”——必須趕快澄清：所謂“懲罰”，是發動戰爭一方認為要以軍事行動“教訓教訓”對方，並不是說對方真該受膺懲。就本質而言，日寇侵華戰爭，與中國“教訓”越南的區別，只在於後者目的明確，嚴格受控，無論是否達到“教訓”的目的都及時撤兵，不曾遷延擴大而已。

日本人之所以弄出這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的怪戰來，我看原因有那麼兩條：

第一，日本人奇怪的民族傳統，使得他們建立了一個沒人能治理的奇怪國家，誰都當不了皇軍的家，就連皇軍的高級將領乃至大本營，也未必能當皇軍的家。參謀本是一種輔佐人員，然而卻常常成了自發統帥。而且，一場大的戰役，竟然可以不通過統帥部事前縝密組織規劃，而是由野戰部隊自發互相呼應與增援，甚至可由個別部隊自主發動，再將其他部隊捲入。一言以蔽之，那個國家竟然沒有一個神經中樞，不管是獨裁中樞還是集體中樞都闕如。不僅全國如此，而且連戰區都如此。支那派遣軍司令部

也未必能如臂使手一般，指揮在中國戰區的各野戰部隊，使之令行禁止。

用個淺白比喻來說吧，正常人是大腦發指令，手才會抬起來去打人。日本人則是手先抬起來去打人，然後強迫大腦認可。您說這是什麼奇怪民族？無怪乎如今日本記者想“檢證”戰爭責任，最後竟然找不到誰該為發動戰爭負責。蓋那是個千手觀音，一千個拳頭自發決定打人，彼此可以有商量配合，然而卻未必經過大腦許可。您說到底讓哪只手去承擔責任？

中日戰爭就是這麼觸發的，從頭到尾，日本人根本也就沒有想到過要徹底征服中國。日軍從東北擴張到華北，完全是少數少壯軍人效法石原莞爾那大英雄征服滿洲的自發壯舉。日軍進駐華北後，遲早要與國軍發生摩擦，導致盧溝橋事變擦槍走火。事變發生後，日軍沒有料到為他們極度輕視的支那人竟然會堅決抵抗，於是便加大了懲罰力度。此後發生的通州事變傳到日本國內，激怒了日本全民，於是政府便大舉增兵，對幹出這種爛事來的支那人痛加膺懲。不料中國非但不屈服，蔣委員長還宣佈要抵抗到底。於是怪戰就這麼打起來了。說起來真是難以置信。

以後的八年無非是這故事的無數次重演：懲罰——不服——再懲罰——仍不服——日人一籌莫展，不知該怎麼結束這場“計劃外戰爭”。

其實一切自發行動都有這特點，如所周知，89 學運的領袖們也同樣不知道該怎麼結束那場運動。這毫不足奇：既然未經某個神經中樞全盤規劃過，當然也就不可能有鬼話說的 exit strategy（收場戰略）。

第二，日人極度驕橫，自以為是天神後裔，優秀種族，不把“劣等種族支那人”放在眼裡，以為只要痛打怯懦的支那人一

番，支那政府便會屈膝投降。然而出乎他們的意料，蔣介石再挨痛打也寧死不降。在這反復痛打的過程中，皇軍佔領的地方越來越多，就此變成了驕橫的日人扔不掉的包袱，使得他們更不可能有收場戰略——難道能把皇軍百戰得之的土地乖乖送出去？皇軍忠勇將士的鮮血不是白流了麼？日本人之所以認定他們該在東北享有特殊權益，就是因為他們當初發動了日俄戰爭，從此認為東北是他們靠血戰從俄國人手裡奪下來的。

這就是《赫爾備忘錄》為何會讓日人跳到雲天外——當時美國對日實行全面禁運，美國國務卿赫爾提出，解禁的條件是從中國撤出。這其實不失為日人體面下臺的臺階，蓋當時東北是否屬於中國還在未定之天，英美都覺得滿洲有了大量日本移民，不便再讓東北回歸中國。因此，日人如果堅持滿洲不屬於中國，只答應從關內撤到關外，美國很可能會同意，而日人便可以就此下臺，保住滿洲那勝利果實。這正是岡村寧次在投降後的感喟：

> “美國《時代》及《生活》雜誌記者馬裘里•薩班斯小姐，27、8 歲的美人，頭腦極為聰敏。……其軍事素養之豐富，觀察之敏銳，遠遠淩駕於日本記者之上，令人敬佩。特別是她提出了諸如‘日本進入滿洲或在塘沽協定後，即行停止豈不更好’等與我所見相同的意見，使我對其卓越見解，不勝驚歎。”[305]

可惜驕橫的日人當時並不這麼想，卻把《赫爾備忘錄》當成不能接受的最後通牒，竟然因此鋌而走險，悍然發動太平洋戰爭。那戰爭的動機之一，辻政信在其回憶錄裡交代過，就是企圖通過打擊英美，嚇得國府屈服。這種白癡主意，全世界也只有日人想得出來。

因此，日人犯了兩個錯誤，成全了毛澤東的內戰戰略，一是把速決戰打成了持久戰，不是他們沒本事迅速滅亡中國，而是他們從未想到過這麼幹。二是蠢到把發動太平洋戰爭當成收場戰略（另一動機是眼見荷蘭投降，想到南洋去“撿無主資源”，奪取荷蘭殖民地印尼的石油和橡膠），使得獨力苦撐的中國有了強大的盟國，終於有了戰勝日本的希望。

這兩個錯誤，隨便省了哪一個，我黨都沒戲。第一條前面已經說過了，日人若真是滅了中國，則我黨當然只會被一鍋熬進去，哪有什麼好下場？第二條也至關重要。如果老美不捲進來，中國絕無獨勝希望。若日人拒絕《赫爾備忘錄》，但不發動戰爭，利用現有庫存汽油全力出動，在一年內結果了中國。其時美國孤立主義思潮壓倒一切，羅斯福根本不可能違反民意對日宣戰，只能坐看中國陷落。到時毛澤東究竟有何本事，靠土八路的老套筒、紅纓槍把日本人趕出去？

根據訪問了延安並考察過八路軍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卡爾遜給美國軍方情報處的報告，八路軍領導人告訴他，他們不認為遊擊戰會給中國帶來決定性的勝利，遊擊戰只是用來延長戰爭和拖垮日本。他們認為，通過對日軍佔領區交通線的破壞，能夠為蔣介石贏得足夠的時間去創建一支能夠在決戰中打敗日軍的力量[306]。雖然共軍從未“拖垮日本”，更在事實上協助日軍打擊國軍，不過好歹八路軍領導人還是對卡爾遜說了實話，靠遊擊戰是不可能把日本人趕出去的。

其實這話毛早就對國民黨說過。1938 年 1 月 13 日，毛建議國軍以陣地戰為主，陣地戰和遊擊戰為輔，理由是：“為什麼說遊擊戰為輔呢？因為遊擊戰不能最後消滅敵人。所以，現在要以運動戰為主，陣地戰、遊擊戰為輔。”[307]

而且，日本不去打美國，希特勒不因此向美國宣戰，則曾對選民發過誓不管歐洲閒事的羅斯福也就不敢違背民意向德國宣戰。斯大林和朱可夫都私下承認過，沒有老美援助的大量物資，蘇聯人不可能打贏[308]。蘇聯垮了，誰來扶持我黨奪取全國政權？我英勇的八路軍、新四軍只會被皇軍在征服全國後無情掃蕩。當年抗聯殘部還能逃到蘇聯去，蘇聯沒有了，共軍又能往哪兒逃？

毛澤東在構思他那偉大戰略時沒有想過這些可能，這倒無足深責——誰有本事預知後事？然而他不能原諒的智力錯誤是，他竟然看不到新型內戰的成功前提是兩條：第一，抗戰必須是持久戰，使得我黨有足夠時間擴張實力。第二，日本必須戰敗退出中國，使得我黨可以與被極大削弱的國軍爭天下。如果日本真的征服了中國，那覆巢之下，豈還能有他那獨蛋倖存的餘地？他見不及此，卻反過來把日本勝利當成了內戰取勝的前提。正是為此，在蘇德戰爭爆發前，他才生怕日本人被英美打敗。

所以，毛的戰略，說到底還是得請老大哥幫忙。在這點上，可以說他確實顯示了某種戰略眼光。他知道離開蘇聯援助便無法奪取全國政權，看准了“全局決定於蘇聯打勝仗”，因而最怕的是日本北上去打蘇聯，心目中的理想盟友組合是“日蘇提攜以對付英美”。原來指望蘇聯出兵幫他建立南北朝，到最後則是由蘇聯出兵幫他搶佔東北。但這究其實不過是石敬瑭戰略，實在沒有太多的高明可言。它的成功，靠的還是日本人的愚蠢錯誤：若是日人不去打美國，就算是蘇聯未遭到德國入侵，便借斯大林一個膽，他也不會為了扶持中共上臺去和日本人動干戈。

第六章 內戰

一、“辰兄”給了中共問鼎的硬實力

抗戰勝利後，中共已經壯大為握有百萬正規軍和兩百萬民兵、統治著上億人口、擁有龐大地盤的強大力量，獲得了與國民黨爭天下的雄厚本錢。依愚見，到此地步，即使蘇聯人不出兵，國府順利接收了東北，蔣介石也未必能消滅共產黨，大概只能限制起來，但徹底肅清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若蘇聯不出兵，則我黨也絕無可能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奪取天下。

前文反復指出，國共相爭，共黨最大的主觀優勢，是擁有列寧革命工藝學那個偉大法寶，包括邪教提供的“精神原子彈”以及組織、發動、操控人民群衆的強大手段。它使得我黨能最大限度地榨取根據地的全部人力物力資源，將之用於戰爭。而國民黨作為標榜實行了憲政的執政黨，根本就不可能也不敢這麼做。交戰一方實行的是現代的“總體戰”，亦即治下每個百姓都在直接間接地為戰爭服務，而另一方實行的則是由軍隊包辦的傳統平叛戰爭，雙方戰爭組織方式與動員能力的優劣判若雲泥。如果國共相爭發生在古代，用的是冷兵器，則共黨在擁有百萬大軍，上億

人口之後，即可輕易打敗國府，就跟秦國靠“舉國體制”最終掃滅了六國一樣。

但國共交戰發生在西式武器發明之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沒有蘇聯人提供的重武器，土八路絕無可能靠老套筒紅纓槍席捲全國。在飛機坦克大炮面前，百萬土八路不過是一堆體積比較壯觀的肉。這本是人類常識範圍內的事，早在 1900 年就由拳匪為咱們演示過了。

要言之，在蘇聯入侵滿洲前，中共擁有的只是邪教軟實力優勢，但硬實力即所控制的疆域、資源特別是武備遠不及國民黨，就綜合實力而言，斷無推翻國民黨的希望。蘇軍入侵滿洲後，為中共提供了大片根據地、大批輕重武器以及強大軍工生產能力，為我黨注入了打敗國府的硬實力，使得國共實力對比發生了不可逆轉的傾斜，國民黨的敗局便於此註定。一般人的誤區，是以為我黨光憑軟實力便能打敗國軍的硬實力，此乃偉大領袖毛主席那“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用來破壞全民大腦的致愚劑。而右憤又徹底否認我黨的邪教優勢與列寧革命工藝學的強大威力，把中共征服全國完全看成了單純的軍事勝利。

陳雲同志諄諄教導我們：

> “在抗日戰爭結束前，我們黨在東北的力量與全國其他各個根據地相比最弱。然而不到三年，卻在那裡打響並打勝了解放戰爭的第一個大戰役。所以能夠出現這麼大的變化，絕不只是和戰役的參加者，和戰役的組織、指揮以及具體戰鬥有關，而是有著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由於蘇聯紅軍出兵東北，打敗了日本關東軍。這為我們的大部隊能搶在國民黨前面迅速進入這個地區，為改善我們的裝備，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那時，蘇聯黨對我們的力量估計不足，並有雅

爾塔協定的約束，但他們還是盡力幫助我們的。東北背靠蘇聯，東鄰朝鮮，這對我們在和國民黨作戰中的後勤補給和傷病員的運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條件。”[1]

這個總結還比較實事求是，蘇聯對中共的援助是多方面的。

（一）幫助中共搶佔東北

蘇軍出兵前後，國府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按照該條約，蘇軍必須把東北移交給國府。當時東北境內無中國一兵一卒，無論是國民黨的“東北義勇軍”也好，是被共黨操控的“抗聯”也好，早就被皇軍搞得乾乾淨淨了，抗聯殘部早就逃往蘇聯。偽滿經營該“國”14 年，“支滿邊界”防守得鐵桶也似。如果蘇聯不出兵，日偽軍奉命維持原狀，嚴守“邊境”，不許八路入境，只許國軍前去接收；或是蘇聯嚴格按照條約行事，不許八路出關，則中共根本就不可能佔有東北根據地。

但蘇軍佔領當局卻以各種藉口刁難阻止國軍進入東北。國府想海運國軍入東北，蘇軍以大連是商港為藉口，不許國軍在大連港登陸，同時將營口、葫蘆島等港口交給中共的所謂“自治軍”，以火力拒止國軍登陸，使得國軍遲遲無法進入東北。與此同時，對大舉出關的中共軍隊，蘇軍則採取默認、縱容乃至鼓勵的態度。蘇聯遠東司令部甚至特地派飛機將彭真、陳雲、葉季壯、伍修權、段子俊與莫春和等六人從延安接到山海關，隨即用火車送到瀋陽。[2]

蘇聯人還教中共怎麼去掩耳盜鈴，與他們聯手破壞國際條約。9 月 7 日，蘇聯駐沈部隊近衛軍第六集團軍司令員克拉夫琴科上將等會見最先出關的共軍將領曾克林、唐凱。商談時，蘇軍

提出："從現實看，由於受中蘇條約的限制，國民黨接管東北似乎是合法的，共產黨接管東北似乎是非法的。因此，建議你們對外最好不叫八路軍，把八路軍改成東北人民自治軍。""我們可以在東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外交上也可以爭取主動。"蘇軍遠東司令部又下達命令，凡佩戴東北人民自治軍符號的部隊，可以在東北各地活動。蘇軍還一度把日本關東軍最大的蘇家屯倉庫交給曾克林部看守。[3]

據此，1945 年 9 月中旬，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和各戰略區通報：蘇軍私下允許中共軍隊在山海關以東沿海一帶登陸，控制鄉村和中小城市；蘇軍並答應尊重中共在熱河建立的行政及領導機關；瀋陽地區"擴兵極容易，每一號召就有數百人，並有大批偽組織武裝均待改編"；"各小城市及鄉村無人管理"；"曾克林部現已發展 2 萬餘人，全為新式裝備，從山海關到瀋陽各城均駐有曾部。曾率 4 個連到瀋陽一星期，即發展成 4000 人，並改編保安部隊萬餘人"；"原在東北作苦工之我八路軍被俘人員約一、二萬人，已組織八路遊擊隊若干股，並進入長春"；"在瀋陽各地堆積之各種輕重武器及資財甚多，無人看管，隨便可以拿到，曾克林（部）已看守瀋陽各重要工廠及倉庫，據說有槍數十萬支、大炮數千門及彈藥、布匹、糧食無數"。[4]

1945 年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按照蘇軍的教唆，下令進入東北的共軍改用"東北人民自治軍"番號。於是出關共軍迅即進入東北各地。冀熱遼十六分區部隊先後接管山海關、錦州並進入瀋陽，"進入瀋陽後，得到很大發展，並一度接管看守關東軍在蘇家屯的軍火倉庫，取出大批武器彈藥，裝備了部隊"，此後又"開赴南滿，接管鞍山、遼陽、營口、撫順、本溪等城市"，

“從八月到十一月，我冀熱遼出關部隊迅速發展為十二個旅（內有兩個炮兵旅）、兩個支隊、十個獨立團，約十萬餘人。其中進入遼寧、吉林、齊齊哈爾的部隊發展為十個旅、兩個支隊、十個獨立團，約九萬餘人；進入熱河的部隊，發展為兩個旅、一個團，一萬四千餘人。此外，在熱河、遼西發展地方武裝一萬餘人。”[5]

由於蘇軍一直佔據了瀋陽，國軍在 1945 年 11 月中旬攻克山海關並在 12 月下旬攻佔北寧線後，即遲遲不能北上（詳後）。於是在蘇軍撤走前，國府只能對瀋陽、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幾個大城市進行象徵性接收，其他城市都被中共佔領了。由於國府抗議，蘇聯決定秘密撤兵，以此報復國府。1946 年 3 月 9 日，蘇軍代表通知中共東北局：瀋陽紅軍將於 13 日撤退，希望中共佔領，瀋陽以南蘇軍不再向國民黨辦交接，一切蘇軍撤走的地區，中共都可以自由破壞[6]。蘇軍在將東北 57 個戰略據點交給中共[7]的同時，卻不通知國府他們即將撤離，以便讓盡可能多的地區落在中共手裡。

就這樣，在蘇軍的縱容與鼓勵之下，共軍得以順利佔據東北的大部份地區。國軍只能在蘇軍撤走後，以武力收復南滿和中滿的大城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規定的移交，完全成了一紙空文。

（二）大規模武裝中共

首先進入東北的共軍，是跟著蘇軍回來的抗聯殘部。當抗聯領導人周保中見到蘇軍元帥華西列夫斯基時，第一句話就是：“我要擴軍，你要支援我武器。”華西列夫斯基慷慨答應：“可著你的力量拿，你要多少，就拿多少，你拿走的剩下的歸我。這

是咱們的戰利品，我們分用。中蘇友好條約又沒規定將戰利品交國民黨。所以，我只能交給它武器庫房，交給他長春市。”他還答應：“我立即通知所有蘇軍把守的武器庫，讓他們只要見到你周保中批的條子，立即幫助你們運。”抗聯黨組織當即向東北十一個大中城市的衛戍副司令下達了十萬火急的命令：搶運武器，擴充軍隊。蘇軍的運輸隊也夜以繼日地幫助他們往外運。使抗聯僅用一個月的時間就組建了一支四萬八千五百人的自衛隊。到中共東北委員會向中共東北局移交關係時，“東北人民自衛軍”已達 7 萬人。[8]

最初奉命出關的共軍總兵力僅 11 萬人，武器裝備十分落後，有的部隊甚至是奉命空手出關的[9]。他們也得到了蘇軍的大力支援。許多老一輩無恥階級革命家在回憶錄中都談到這事。伍修權同志回憶，蘇軍曾將幾個很大的軍用品倉庫一度交給他們，“搞到些新槍和很多裝備。葉季壯同志親自去看了，裡頭有大衣、服裝、鞋子、帽子等物資，東西多得很，可以儘量去拉，部隊趁機裝備了一下”；“李運昌帶的部隊向熱河轉移，轉移中，從倉庫中帶走了很多物資”。[10]

曾克林也說，蘇軍曾將其看守的關東軍武器庫交給其所部，蘇軍看守的大型武器庫也允許他們進去拉武器。他們“向外拉了三天武器。一次一下就拉了 20 個車皮的武器，共 2 萬餘支步槍，100 多門大炮，20 多萬發子彈”；“一些蘇軍幹部戰士也慷慨地贈送了大批武器。”[11] 使該部由原來的 4000 人部隊增至 60000 人，並裝備有蘇聯人送的 30 架日本飛機[12]。東北局書記彭真當時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曾克林部原一千五百人，現共發展到三萬七千人，輕重機槍約四百挺及相當數量的子彈；現在

在我看守下比較可靠的軍械庫只有七五山炮十一門、追擊炮七十門及六五子彈五百萬發。”[13]

蕭華也說，他們“和蘇聯紅軍聯繫，利用各種方式搬運他們繳獲的倉庫裡的武器彈藥。通過這些方法，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收集了大批武器裝備、醫藥、被服、兵工機器。尤其使人興奮的是，還收集了一批山炮、野炮、輕重機槍。”“我們用這些武器成立了炮兵連、機槍連、炮兵團。那時，去北滿的部隊武器裝備也很匱乏。我們除了充實本部隊外，還拿出一批比較好的武器運往北滿，支援兄弟部隊，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同時我們招收了大批工人，建立了兵工廠、被服廠、醫院和倉庫。”[14]

何長工也在其回憶錄中承認，他按李富春的指示，與蘇聯代表談判用廢鋼鐵換取蘇聯存放在滿洲里的日本關東軍的大量武器。蘇方代表卡瓦洛夫開始不鬆口，何聽說他有兩個嗜好，“一是愛喝烈性酒，一是愛跳舞。於是，我搞了一些烈性酒給他喝，又利用我們的文工團組織了幾次舞會。當時很困難，能喝上酒，跳上舞實在不易。他喝的很舒服，跳得很痛快。當我們的談判進行到第三天夜裡，他端著酒杯就在協定上簽字了。當然，卡瓦洛夫在協定上簽字不是個人的行動，是秉承蘇聯政府的旨意，是蘇聯政府對我們友好的一種表示，……這批武器數量不小，具體數目記不清了，有各種槍炮，還有坦克，我們用幾列火車拉了幾天才拉完，解決我們不小的問題。”[15]

蘇軍在佔領東北期間，自始至終在向中共提供軍火。1945年 10 月 4 日，蘇方通知中共東北局，準備把繳獲的所有保存在瀋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的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如數交給中共接收，並說明這些武器彈藥可以裝備幾十萬人。同日，東北局報告中央，蘇方

表示“此間家務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現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許在一個月內替我保存。”[16] 中共此後得到的武器，已知者就有三批，其中步槍約 10 萬支，輕重機槍約 3400 挺，擲彈筒約 500 個，大炮 100 餘門，各種彈藥將近 2000 萬發。不久，蘇方又把南滿的大批兵工廠、武器彈藥倉庫，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飛機統統交給中共。[17]

10 月下旬，蘇軍又將撫順一處軍火庫中 300 萬發炮彈交給了東北局，要他們加緊組織訓練炮兵部隊，同時還將一個日本航空大隊及全部人員交給了他們。[18] 12 月 29 日，彭真通報各兵團：“我確曾控制大批物資（機器、被服、彈藥）”，“根據現存不完整材料，運赴錦州方面的各種子彈一項即達八百萬發，手榴彈約十五萬個，皮帽、鞋子各三萬，大衣兩萬，棉裹腿近十萬，另有北面運去一萬兩千支步槍，機槍六百挺，十月初尚搶運去很大一批物資。”[19]

蘇聯撤軍時，又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彈藥。4 月上旬開始向中共轉交北滿的日軍武器庫，其中僅輕重機槍就在萬挺以上，各種炮上千門。4 月 14 日，蘇軍撤出長春，中共軍隊迅速向城裡的國民黨軍隊發動攻勢。中共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內的重型武器[20]。蘇軍當局還應蕭勁光和韓光的要求，把繳獲的近 50 車廂的日本武器轉交給中共軍隊，並通過朝鮮的清津港經對馬海峽向東北的中共軍隊提供了 20 台貨運機車。[21]

1946 年 5 月間，國軍攻克四平、長春，共軍向北潰退，損失嚴重。應東北局和“民主聯軍”司令部代表蕭勁光的請求，駐旅順口蘇軍當局同意將蘇軍繳獲日本關東軍的武器轉交給“民主聯軍”，並精心組織了轉交工作，僅用一周的時間，就將存放在大孤山的 15 車廂的武器轉交給蕭勁光。1946 年 6 月底，蘇軍在

大孤山又轉交給民主聯軍一批新的武器彈藥[22]。蕭勁光還要求蘇軍將其在朝鮮得到的戰利品轉交給東北共軍，幾天之後就從朝鮮向中共運去了兩軍列武器。不久，劉亞樓又來到旅順口，要求蘇軍幫助解決蘇軍轉交的日本飛機所使用的活塞圈。蘇軍當局隨即安排海軍基地修理所生產了一批新活塞，交給他帶走[23]。蘇聯濱海軍區指揮部還命令旅順口蘇軍司令部，將存放在大連的火車頭調運給共軍 30 個。1947 年又運去了 20 個車頭。這些車頭都在大連裝船，先運到朝鮮清津港，再轉運到北滿。為將車頭運到大連碼頭，蘇軍當局還在大連修了專用鐵路。[24]

就是為此，共軍才獲得了能與國軍較量的裝備，到後期更具備了壓倒國軍的強大火力。據官修軍史，1946 年戰爭初期，東北共軍第一縱隊配備槍 13991 支（挺），其中衝鋒槍 92 支；各種火炮 46 門，其中 75 毫米山炮 12 門。到 1948 年 6 月，該縱擁有各種槍 16438 支（挺），其中長短槍 1065 支（疑為 10065 支——引者），輕機槍 772 挺，重機槍 175 挺，高射機槍 6 挺，各種炮 681 門，其中六零炮 243 門，迫擊炮 50 門，戰防炮 17 門，火箭炮 38 門，步兵炮 13 門，山炮 30 門，野炮 13 門，榴彈炮 9 門，以及平射炮等。[25]

哪怕在撤出東北許久後，蘇軍還在繼續援助東北共軍。國內學者李長林認為，1947 年 6 月至 1948 年 8 月，是中共獲得武器裝備最多的一個階段。除了上述何長工獲得的武器外，朱瑞還於 1947 年 6 月第二次赴朝，用農產品折價交換日軍的武器裝備和彈藥。在兩個月的時間裡，蘇軍經圖們向中共運送了數十列車的日軍武器、火炮和彈藥。據他計算，東北共軍從這次援助中獲得了至少 200 多門重型火炮，長短槍 20 萬支。[26]

這一結論與蘇方的信息一致。1948 年 5 月，蘇軍對外作戰部致電哈爾濱蘇軍東亞作戰部，明確指示："應立即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取得聯繫，並且以盡可能快的方式瞭解他們現在的具體需要。從 6 月 1 日到 9 月底，我們將沿伊爾庫茨克到滿洲的邊界線，集結大量的軍火、服裝和汽油以提供給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將提供輕型和重型坦克、各種口徑的機關炮以及飛機，使用這些武器和裝備的中國人員已派往我們這裡受訓練。"電報要求"不惜任何代價幫助消滅敵人。"[27]

在此之前，儘管共軍已由蘇聯人武裝起來，但因蔣介石把裝備最精良的國軍部隊都派到東北，關外共軍的裝備仍非國軍之敵。據范漢傑說，1948 年 8 月下旬，國防部和東北剿總對東北共軍戰力與動向作了估計，"認為炮兵部隊是增加了，有很多日本山、野重炮。在黑龍江佳木斯以北山區，找到日本前關東軍遺下的秘密火藥庫，裡面的各種炮彈很多。解放軍的炮火一定比過去強大得多"[28]。

然而國軍不知道，直到此時，蘇聯人還在用重武器大規模裝備共軍，因此仍然低估了共軍的火力。遼瀋戰役前，國軍之所以要固守城市，一個原因就是認為共軍的裝備尚不足以攻堅。可事實是，到了 48 年，共軍的火力已經壓倒了國軍。據官修軍史，東北共軍共有槍 46.8 餘支，其中輕重機槍 1.8 萬餘挺；炮 1.1 萬餘門，其中山炮、野炮、榴彈炮、加農炮等重炮 660 門，高射炮 116 門，戰防炮、步兵炮、迫擊炮 1600 門，還有了坦克部隊。[29]

共軍對錦州發起總攻時，"900 餘門大炮（其中山炮、野炮、榴彈炮、加農炮 320 餘門），一齊射向預定目標，經 45 分鐘破壞射擊，打開了突破口，壓制了守軍前沿火力點。10 時 45 分坦克亦進入發射陣地，支援步兵突擊和縱深戰鬥。10 時 50 分

左右，各突擊炮隊，在炮兵和坦克大力支援下，實施連續爆破，迅速突破城垣。”[30]炮火之猛烈，使得所有的國軍將領都大吃一驚。

范漢傑：

“炮戰之猛烈為過去所未有。後來我軍炮彈接濟不上，炮兵陣地已為解放軍的炮兵所控制，我軍發了幾顆炮彈後，解放軍的炮兵即集中火力向我軍炮兵陣地及步兵陣地猛烈射擊，士兵在壕溝裡動也不敢動。各部隊電話因炮擊而中斷，伙食有時也送不上去，傷兵有時也就互不下來，陣亡的也不能及時埋葬。士氣的低落和苦悶也是罕見的，城裡已成黑暗的死胡同了。”[31]

盧浚泉：

“解放軍有一個炮兵縱隊轄兩個師，配有日式加農炮、臼炮、野炮，各步兵師配有炮兵營，軍容甚整，這是平時想像不到的。”“錦州守軍各部隊一再要求補充彈藥，而錦州兵站既無機步彈，又無炮彈。”“守軍亟待解決的各種彈藥，尤其是炮彈，毫無辦法補給。”“整個陣地都被解放軍的炮火所控制。守軍的防禦工事受到解放軍強大炮火的猛烈攻擊，鋼筋混凝土反而成為暴露陣地的目標。”[32]

盛家興：

“解放軍炮兵火力的強大殊出乎守軍預料之外。……十月中旬後，錦州守軍的炮兵全被壓制，同時彈藥告罄。”“十月十四日上午，解放軍發動總攻。炮火連天，南北土城先後被打開了缺口，戰火逐漸漫入市區。槍炮聲、炸藥聲震如雷鳴，滿城煙霧瀰漫，交通斷絕，通信失靈。北面暫編第

二十二師陣地內錦義公路上還出現解放軍的戰車，戰鬥更形激烈。”[33]

我黨告訴大家，共軍的大炮是蔣介石那運輸大隊長供應的，然而盧浚泉已經說了，那是日式大炮，並非美國大炮。東北國軍多為美式裝備的精銳部隊。而關東軍是被蘇軍繳械的，請問東北共軍的日式大炮是從哪兒來的?

錦州如此，其他地方也不例外，在義縣防守的國軍團長趙振華留下了極為生動的描述：

“解放軍採取了逐點攻取的戰術，先集中炮火轟擊欲奪取的據點，轟得幾乎變成平地。”“解放軍集中了幾十門迫擊炮向東方前進據點轟擊，彈如雨下，硝煙泥土鹿砦四處飛揚，整個戰場好像下了一場彌天大霧。騎兵排長向團部報告說：‘機關槍、衝鋒槍被泥沙塞滿發生故障不能射擊，士兵在陣地裡視線被塵土遮住，交通壕也幾乎削為平地。’我隨即來到東城牆上觀察戰況，只見南方前進據點及騎兵排據點一帶被煙霧泥土籠罩了，炮彈像一陣猛烈的冰雹撒下來，硝煙泥塵直衝到天上去，像一根一根的煙柱，被風吹著飄過大凌河去。”“解放軍的炮火近兩天來越打越猛了，我們的山炮沒有炮彈早變成了啞巴。解放軍震耳欲聾的炮聲，我們斷定無疑是重炮，這使我們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威脅。”“炮彈聲震耳欲聾，連機步槍聲都聽不清楚。”[34]

從錦西出發去援救錦州的國軍也在塔山遇到了優勢炮火：

“由於解放軍集中優勢炮兵火力，實行奇襲阻擊，我方炮兵受到很大威脅與壓制，其炮火之猛烈，是我們部隊對共產黨部隊作戰以來所僅見。我們作戰，從來都是靠空軍壓制

敵人，以絕對優勢炮火開闢前進道路。而現在，初次遇到我方炮火處於劣勢狀態，部隊士氣受到極大震動。”[35]

這本質變化又豈止發生在關外？根據官修軍史，濟南戰役的攻城火力部署是：“以特種兵縱隊炮兵第 1 團（欠 1 個營）、第 3 團（欠 2 個連）及山東兵團炮兵團組成 2 個炮兵群，分別配屬於攻城東、西兵團，支援攻城作戰。”在進攻內城時，“攻城集團各炮群所屬山炮和野炮進至外城內，直接支援部隊作戰；榴彈炮配置在外城外，以猛烈炮火壓制內城守敵火力和殺傷其有生力量”[36]。而守城國軍只有三個炮兵營。[37]

淮海戰役就更不用說了，據黃百韜的戰情報告，共軍在進攻碾莊圩時，“戰鬥至為慘烈，現碾莊圩已成火海，統計落彈不下兩萬發，通信設備均被摧毀，兵團部已無法指揮”。[38]

想當初紅軍連寧夏地區回族聚居的“土圍子”都打不開，聞天同志為此特地向蘇聯請求給予飛機大炮的“技術條件”援助。1936 年 6 月 19 日，國軍高雙成部兩個營乘瓦窯堡防務空虛，攻佔了該城。周恩來隨即調集了兩個軍圍攻該城，想把它奪回來，終因缺乏攻城重火器而徒喚奈何。那陣子我英勇的工農紅軍又何以不使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來，去奪取國軍的幾千門大炮，而要發動寧夏戰役，千方百計、萬死不辭地去“打通蘇聯”，想把飛機大炮從中蒙邊境上搬回來涅？

那麼，關內的炮兵是從哪兒來的？當然只能從蘇聯人那兒來。曾克林稱，他曾用火車先後運送數批軍火給鞍山、營口、安東等地新到之內地部隊，並利用葫蘆島、營口、莊河等港口，用船向山東龍口送去一批武器彈藥，其中有 500 萬發子彈、炮彈，以支援山東部隊。中共中央與東北局來往電報中也幾度提到向內地調運武器彈藥的情況。1946 年 5 月至 6 月間即從東北秘密運送

三批軍火前往山東。以後每月均有相當數量的軍火由東北南運關內，7 月僅一次就運往山東 100 餘車皮的彈藥。[39]

蘇軍不光佔領東北，也強佔了熱河與察哈爾兩省（今內蒙東部），並把熱、察兩省交給了土八路。這地區乃是東北與華北連接地域，是我黨大舉出關搶佔東北的重要路線之一。當時日軍就曾破譯延安軍事電令，命令從張家口至承德一線，山海關附近一線，以及從煙臺附近的海路，形成三個縱隊，火速轉進滿洲[40]。它同時也是我黨將關外蘇援大舉運往關內的重要陸路樞紐。

蘇聯人到底給了我黨多少軍火？蘇方公佈了四種數字，第一種是步槍 70 萬支，輕機槍 11000 挺，重機槍 3000 挺，大炮 1800 門，迫擊炮 2500 門、坦克 700 輛，飛機 900 架，軍火庫 800 個[41]；第二種是 3700 門火炮、迫擊炮和擲彈筒，600 輛坦克，861 架飛機，680 座軍用倉庫及松花江區艦隊的全部艦艇[42]；第三種是步槍 70 萬枝，機槍 12000-14000 挺，各種炮 4000 餘門，坦克約 600 輛，汽車 2000 多輛，彈藥庫 679 座，飛機 800 餘架，炮艇若干[43]；第四種是 1976 年出版的《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條給出的：“蘇聯的援助是人民解放軍力量壯大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蘇軍指揮部把繳獲原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轉交給人民解放軍（火炮、迫擊炮和火箭筒 37000 餘門，坦克 600 輛，飛機 861 架，機槍約 12000 挺，汽車 2000 餘輛等等）。爾後，蘇聯又向人民解放軍提供了大量蘇制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44]

這四批數據中，輕武器、飛機、坦克、軍火庫的數量基本一致，火炮數量則出入極大，國內學者李長林因此推測《蘇聯軍事百科全書》中 37000 門的火炮數字應為 3700 門的筆誤。他自己的研究結論是：“總計中共軍隊通過蘇軍直接或間接獲得的日軍

裝備應有步騎槍 30 萬支左右、各種炮 1600 多門（含迫擊炮、擲彈筒）、坦克 20 輛左右。”[45] 準確數據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但《蘇聯軍事百科全書》所說：“蘇聯又向人民解放軍提供了大量蘇制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已為毛澤東本人證實。他在 1949 年 2 月初會見米高揚時說，為了宣傳的目的，東北野戰軍在入關前把蘇制武器一律留在關外。[46]

就連北韓也曾向中共贈送過軍火。據當年在朝鮮辦事處工作的丁雪松等回憶：“過去朝鮮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軍的軍火庫。兩年多來，朝鮮方面支援了我們 2000 多車皮日本侵略軍留下的戰略物資，有的是無代價支援我們的，有的是通過物資交換取得的。在請求朝鮮政府支援的作戰物資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同志提出的 12 個車皮物資；第二批是劉亞樓提出的 24 個車皮物資；第三批是朱瑞提出的 110 個車皮物資；第四批要多達 600 到 800 個車皮物資。這些物資都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鮮勞動黨中央的幾位領導同志答應無償贈與和無代價幫助我們裝運的。”[47]

（三）賦予中共全面持久的戰爭能力

除了向中共提供大量武器彈藥外，蘇聯人還把東北兵工廠轉讓給中共，使得我黨獲得了強大的軍工生產能力。官修軍史承認：

> “東北全區的軍工軍需生產也集中在北滿地區，僅哈爾濱、佳木斯、牡丹江、齊齊哈爾等地就建立了軍工廠 36 座，使得東北民主聯軍槍、炮的彈藥供給基本上得到了保證。”[48]

北滿兵工廠負責供應四野，而大連的“建新工業公司”則負責供應關內共軍。官修軍史披露，這家開在蘇軍用刺刀保護的“自由港”裡的大型兵工聯合企業，是東北、晉察冀與華東共同開辦的：

> “1947 年春，東北解放區僅大連一地就從蘇聯紅軍手中接收了機械廠、鑄造廠、煉鋼廠、製罐廠等 12 個工廠，機床 300 餘臺，其他機器 770 餘臺，各種原料價值 5 億元法幣。東北與華東、晉察冀等解放區在大連共同建成‘建新工業公司’，有職工 8000 餘人，最初每月生產 75 山炮彈 1 萬發，並生產 60 迫擊炮、機關槍、鋼材。4 月，晉察冀解放區的兵工廠共生產 82 迫擊炮彈 1780 發、50 擲彈筒 2760 發、步槍彈 5.44 萬發、手榴彈 2.8 萬餘枚。”[49]

時任東北軍工部長的何長工介紹：

> “東北軍事工業……對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東北局、東北野戰軍領導的讚揚；同時也有力的支援了全國的解放戰爭，特別是對華東戰場支援，受到戰場指揮員的好評。一九四九年初，賀龍同志來到東北參觀軍工生產。……他給東北軍工生產以很高的評價，高興地說：東北的軍工規模這麼大，設備這樣好，這樣全，關內可沒有呀！你們不僅能生產子彈、手榴彈，還能生產各種槍炮，榴彈炮彈都造出來了，真了不起呀！看了你們的軍工，我的腰杆也硬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第二次全國軍工會議期間，劉少奇同志聽了我們的彙報說，中央對東北軍工生產是很滿意的，希望繼續努力。一九四九年一月，華東野戰軍副司令粟裕同志親自從前線寫信給建新公司總經理朱毅同志：‘朱毅同志：非常感謝你！你們做的威力很大的炮彈，保證了我軍

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他還說，華東的解放，一是離不開山東的小推車，二是離不開大連的炮彈。”[50]

遲至 1947 年夏季，國府才認識到這情形，為此發動了旨在“截斷共軍的國際交通線”的膠東戰役[51]。華東野戰軍領導陳毅、粟裕於為此致電譚震林等並華東局：

“膠東為我全軍軍事供應之主要基地，冀魯豫亦部份供給。如果敵向膠東腹地進犯，對我戰爭供應影響甚大，因此我東兵團四個縱隊及膠東、濱北之地方所有地武應立即緊急動員，齊心協力，單獨負起保衛膠東基地光榮任務，以徹底粉碎敵人進攻。”[52]

綜合以上中共自己披露的信息，可以大致看出共軍的軍火供應路線圖：東北野戰軍的軍火由北滿軍工企業負責供應，華東野戰軍的軍火由開在蘇聯“租界”大連裡的軍工企業通過海運負責供應。晉冀魯豫野戰軍的軍火則部份由大連供應（上舉陳毅電報已說明了這一點。官修軍史也披露，劉鄧大軍在千里躍進大別山前，就曾請山東渤海區調給 1000 發山炮彈[53]），部份可能由東北共軍通過遼西走廊的陸路運輸供應。而這三個野戰軍正是共軍的內戰主力。由此可見，共軍戰力與東北的軍火供應成正相關。

因此，蘇軍進佔東北與熱察，為中共提供了軍火生產工業基地，給了中共可持續發展的軍備實力。依愚見，此舉對壯大中共的軍事實力起到的作用，並不亞於將關東軍與北韓的軍火庫轉贈給中共。如果蘇聯人像 20 年代援助國民黨那樣，只是“授人以魚”而非“教人以漁”，則中共推翻國府就絕不可能那麼容易。

蘇聯還派出大批專家和技術人員，幫助中共修復被中共自己在撤退過程中破壞的鐵路和橋樑。在蘇方中長鐵路局長茹拉夫廖夫及其率領的鐵路技術力量的指導下，中長路北線得到迅速修

復，1947 年春，從滿洲里到外貝加爾斯克，從綏芬河到格羅捷科沃一線實現了聯運。[54]使得中共東北根據地與蘇聯大後方通過鐵路運輸連接在一起。此外，從 1947 年 5 月起，蘇聯船隻從布拉戈維申斯克、哈巴羅夫斯克、共青團城向松花江中國各港口定期供貨。燃料、藥品、衣服、靴鞋等大批必需物資源源不斷地運來[55]。這些物資又從佳木斯轉運到解放區各急需的地區。

1948 年春，東野開始準備遼沈戰役的工作，但此前被共軍破壞的鐵路妨礙了大規模的部隊調動與集結。1948 年 5 月上旬，林彪致函斯大林，請求幫助恢復鐵路交通。斯大林於 1948 年 5 月 15 日批准。兩天後，蘇聯部長會議下達 5970 號令，任命交通部副部長科瓦廖夫為蘇聯派往中長鐵路的全權代表[56]。6 月中旬，科瓦廖夫率領由 21 人組成的專家組到達哈爾濱[57]。

蘇聯鐵路專家組首先幫助中共建立了鐵路恢復管理局和鐵道特種部隊，並對最重要的被破壞了的鐵路路段進行了技術勘察[58]，幫助中共設置了各級修復部門，成立了鐵道兵，並由蘇聯提供了部份裝備、器械和工具，建立了供應和採購機構與基地，在哈爾濱機車修理廠建立了專門的橋樑供應基地，並按照蘇聯專家的方案製造出 80 噸的吊臂起重機，還在哈爾濱建立了專門的軍械修理廠，為鐵道部隊修理和製造工具與裝備。[59]

在蘇聯專家幫助下，遼沈戰役前，共軍共接收和修復了鐵路 5700 多公里，通車線路里程達 9818 公里，占全東北通車線路的 98%，修復機車 885 台[60]。蘇聯專家組組織並直接領導了對 1350 公里最重要的鐵路線的修復，其中包括吉林－長春，哈爾濱－長春，四平街－通遼，義縣－錦州，梅河口－瀋陽－鞍山，錦州－山海關各路段[61]。在此期間還修復了大中型橋樑 62 座[62]。這些基礎設施的及時修復，保證了共軍能夠先從長春地區迅速轉移並集

中於錦州地區，後又利用剛剛修復的鐵路，迅速地轉移到新立屯一瀋陽和梅河口，逐次全殲國軍。

遼沈戰役結束後，爲了幫助中共迅速修復南滿鐵路，打通關內外交通，蘇聯部長會議下令：從大連儲備的列車中，調撥1500 個貨運車廂、130 個客運車廂和 50 個機車交給中共；由蘇方擁有的大連機車修理廠為中共製造 1000 個貨運車廂；中長鐵路各工廠負責對東北的鐵路機車和車廂進行大修和中修，製造所需信號、通訊器具和道岔；中長鐵路大連營運區派出修理車和專家工作組並攜帶修理大連境外區段鐵路所需材料，隨時進行鐵路修理工作。蘇聯部長會議還責成蘇聯交通部，把從遠東鐵路從東北搶去的 86 部機車和 1000 個車廂，交給東北鐵路北線各區段使用；派遣 170 名精通專業的蘇聯鐵路工作人員，歸中長鐵路管理局局長茹拉夫廖夫領導，協助組織中長鐵路南線的各區段的營運，保證指定的全部貨物沿東北鐵路各線順利轉運大連[63]。由於“辰兄”的大力協助，東北野戰軍才能迅速入關，包圍了平津國軍，迫使傅作義投降。

此外，蘇聯還派了工程技術人員和經濟管理專家，幫助恢復和發展東北經濟建設。大連造船廠在蘇聯工程技術人員幫助下進行修復和改建，1947 年底，生產規模就超過戰前水平。[64]

“辰兄”還以貿易方式向中共提供戰略物資。1946 年 12 月 21 日，東北貿易總公司與蘇聯遠東公司和全蘇糧食出口公司正式簽訂了以貨易貨協議，以糧食、肉類、禽蛋等換取布匹、棉花、棉紗、食鹽、工礦原材料、機器零配件、機油和醫藥用品等。進出口總額均為東北地方流通券 362 億元。[65]

1948 年 2 月 27 日，東北貿易總公司與蘇聯糧食出口公司簽訂了第二次貿易合同。以糧食、豆油、原煤、肉類、魚類和雞蛋

等換取棉布、棉紗、紡花、裝花、大卡車、摩托車以及各種機器設備、工業原材料和軍需品等。東北對蘇聯出口額為東北幣 656 億元，進口額為 620 億元[66]。另外，東北貿易總公司還與設在哈爾濱的蘇聯秋林公司達成協議，對蘇聯出口原糧和肉類，進口工業機械和燃料，進出口總額為46億元東北幣。[67]

1949 年 7 月，“東北人民民主政府商業代表團”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第三次蘇貿易合同，合同為期 1 年[68]。東北對蘇聯出口糧食、原煤、肉類、木材、毛皮、魚類、雞蛋等物資，蘇聯對東北出口棉布、紡花、汽車、汽油、拖拉機、車床等機器設備和原料，雙方貿易總值各為東北幣712億元。[69]

在遼沈戰役過程中，蘇聯不僅提供了技術援助，支援了大批鐵路器材，還應中共請求，緊急支援了棉花、布匹、醫藥、軍需品、日用品等大批戰略物資。[70]

官修史書承認，通過對蘇貿易，中共“換進了一大批棉製品等日用工業品和一些工業交通機械器材、醫藥器械等，緩解了軍需民用物資的匾乏狀況，對東北解放區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產生了良好的作用”[71]。不難想見，如果沒有蘇聯作中共的可靠後方，則國府光是卡住關內棉花和布匹對東北的輸出，就足以凍死冰天雪地裡的共軍。

1945年12月21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

> “請你們注意東北長期永久根據地之建立。即在通化、延吉、甯安、東寧、密山、穆棱、佳木斯、嫩江、黑河、洮南、開魯等地區，必須派必要的老部隊和幹部去開闢工作，建立後方，建立工業，組織與訓練軍隊，開辦學校，以便能夠源源供給前線，有如漢高祖之漢中。只有這一計劃的成

功，我在東北的鬥爭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並能遲早爭取勝利。”[72]

在“辰兄”千方百計的扶持下，這個偉大理想終於實現了，東北成了中共最強大的戰爭基地。

（四）為中共提供庇護所、交通線以及戰略後方

蘇聯人不但不遺餘力地從各方面扶持中共，還在中共軍隊遭到危難時直接出手，以刺刀在中國境內強行劃出國中之國，令中共敗軍逃入其內逃生。

1945 年 8 月 22 日，蘇軍空降部隊進駐旅大。10 月初，東北局派韓光與大連蘇軍當局聯繫，請求支持其在南滿工作。蘇方希望中共儘快派幹部到大連，建立地方政權。與此同時，蘇方以大連是商港為藉口，不許國軍在大連登陸。東北局派韓光等一大批幹部進入大連，成立大連地委。當時公安局長、副市長均由中共幹部擔任。同年 12 月 15 日，東北局根據東南滿的新形勢指出：“東南滿（旅大蔣頑不能進兵），為我與國民黨奪取東北之主要戰略與依托。”[73] 旅大就此變成中共在南滿的軍事基地。

1946 年春，國軍在南滿大敗共軍，攻克了本溪。5 月間，國軍 8 個師從瀋陽向旅大推進，意欲消滅南滿共軍。當國軍逼近旅大時，旅順衛戍司令沃洛申會見了國軍負責人。他當著這位負責人的面，在地圖所示的旅大蘇軍管轄區以北 8 至 10 公里處劃了一條“安全線”，不許國軍越過。他威脅說，如國軍越過這條界線，就處於蘇軍炮火範圍，可能產生危險後果。國軍負責人被迫接受了這條所謂的緩衝地帶，而中共軍隊則可自由出入。從此，

蘇軍用刺刀單方面強加給中國的這個國中之國，就變成了南滿共軍的避難所。

1947 年春，國府試圖派軍隊進駐上述緩衝地帶，以驅逐集中在該地的 3 萬餘名中共南滿部隊。4 月 6 日，國府派駐普蘭店的前方部隊團長周璞通知蘇方，國軍準備駐防窪子店地區。窪子店不在蘇聯海軍根據地範圍內，蘇方無法拒絕。但蘇軍負責人查列斯基卻聲稱，窪子店是旅大蘇軍的水源地。為確保水源安全，蘇軍派有少數部隊在那裡駐守。如國民黨方面保證水源不被破壞，則蘇方願意交出。但蘇方始終沒有交出窪子店，還不斷進行軍事演習，使南滿地區的國軍始終不敢進入緩衝區。這樣，蘇軍既擴大了中共在大連的根據地，又保護了中共南滿部隊。[74]

“辰兄”以及它扶植的北韓領導人還為中共開闢了境外交通線，使得為蘇軍佔領的北韓成了中共的戰略後方。

1945 年 5 月間，國軍大敗林彪，先後攻佔四平，長春等地，佔領了松花江以南各地區的鐵路線和交通要衝，將共軍分割在北滿、東滿、西滿、南滿等幾塊孤立地區。南北滿交通被切斷，共軍陷入危局。當此緊急關頭，蘇聯以及北韓政權應中共東北局的請求，在朝鮮和大連建立了四條水陸交通線。一條陸上交通線從安東（今丹東）經穿過北韓到圖們，另一條從通化穿過北韓到圖們，構成了連接南北滿的陸地走廊。兩條海上運輸線則分別從大連到南浦和大連到羅津。從大連裝船抵南浦或羅津港，再經過陸上交通走廊，可直達北滿[75]。這些水陸運輸線，把北滿、南滿和旅大根據地以及關內外聯繫到了一起。北韓實際上成了中共軍隊的戰略後方。中共可以取道北韓，在各根據地之間方便地進行人員和物資轉運。

1946 年 11 月，國軍進攻南滿。中共南滿部隊撤出安東、通化，先後有 18000 餘名傷病員、家屬和後勤人員以及 85%的戰略物資撤到了朝鮮境內。在共軍收復安東、通化後，絕大部分人員以及 2 萬餘噸戰略物資又被運回南滿。通過上述交通線，南北滿還進行了大量的戰略物資交換。所轉運的物資已經無法全面統計，僅有據可查的，1947 年頭 7 個月就轉運了 21 萬噸，1948 年全年為 30.09 萬噸。過境人員年下半年有 18 批計 3000 人，1947 年春由安東去輯安的有 2000 餘人，由大連去臨江者 3000 人，由大連去北滿的幹部 2000 余人。到 1947 年 6 月總計經朝鮮過境者不少於 10000 人。1948 年通過圖們一南陽口岸的過境人員達 8685 人。許多著名人士，如李濟深、沈鈞儒等人參加新政協會議時，都是從香港，經海上通道，轉赴哈爾濱的[76]。潘朔端率領的海城“起義”官兵，也是經金日成批准，由北韓當局協助，取道朝鮮去北滿整編的。[77]

這些交通線更使得共軍可以在被國軍隔斷的南北滿之間調動兵力。據官修軍史，在所謂“四保臨江”之後，“南滿部隊經過 3 個多月的連續作戰，消耗較大，又得不到及時補充，實力大為削弱，每個野戰師僅 4000 人左右。為此，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從北滿抽調 3600 多人補充南滿部隊，以保持南滿部隊的戰鬥力”。[78] 這就是陳雲同志為何要說：“東北背靠蘇聯，東鄰朝鮮，這對我們在和國民黨作戰中的後勤補給和傷病員的運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條件。”[79]

除了以上諸方面的援助扶持外，蘇聯還利用其國際影響，遏阻美國援助國府。在馬歇爾來華調處過程中，美國政府對蘇聯的態度非常重視。1946 年 5 月，國軍攻佔長春，並繼續向北向西推進。6 月，蘇聯通過其駐華外交官向美國在華外交官非正式地

提出第一次警告，聲稱迄今為止，蘇聯對中國問題採取不插手政策，但如美國再繼續奉行這種對蘇聯帶有“進攻性”的政策，蘇聯將不能坐視。美國方面立即意識到這是蘇聯第一次表示有可能進行“積極干涉”。後來蘇聯又發表文章全面批判美國對華政策，表示“蘇聯的政策不能對美國對華政策漠然處之”。美國對此也很重視，進行仔細研究。認為是蘇聯對美對華政策最強硬的批評，但還是克制的。國內若干學者認為，蘇聯施加的外交壓力，是馬歇爾壓國府在攻佔四平後停止進攻，促使國共雙方達成 6 月東北停火協議的因素之一[80]。有的學者還認為，蘇方壓力給美國對華政策帶來極大的掣肘。馬歇爾擔心，國共戰爭的升級可能會讓“蘇聯政府採取公開或隱蔽的干涉活動”。爲了避免美蘇在中國直接對抗，馬歇爾竭力壓蔣介石與中共和談，最終為此實行了對華軍火禁運。[81]

二十多年前，蘇俄向中國輸出革命，建立了中共，教會了它“革命工藝學”，給了它邪教軟實力。如今又向它慷慨注入了奪取全國政權必需的硬實力，使中共軍隊成為一支具有現代化裝備與持久戰爭能力的正規軍，國府的命運便已註定。在此之後，無論是誰去當黨魁，結局恐怕都不會有什麼兩樣了。例如確保“解放戰爭”勝利的最兩個根本的戰略決策，都不是毛而是劉少奇作出的決定。光這一事實，就證明了在抗戰勝利之後，毛澤東的戰略才能並非為中共勝利所必需。

二、奠定中共勝利的兩個關鍵決策

第一個關鍵決策，就是搶佔東北。早在抗戰勝利之前，毛澤東便看准了這步棋。他在七大上說：“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

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因此，要“準備廿、三十個旅，十五萬人到廿萬人脫離軍區，將來開到滿洲去”，“得到技術條件”。[82]

但看出這點並不需要什麼過人的聰明才智：從南昌暴動那天起，獲得蘇援就一直是中共歷屆領導人的遠大理想。前已提及，1933 年中央紅軍之所以要去打福建，一個理由就是奪取出海口後可望獲得蘇援。紅軍“北上抗日”以及後來的寧夏戰役就不用說了。東北三面為蘇聯外蒙包圍，又是全國工業基地。要在蘇聯人的卵翼下顛覆中國政府，再也沒哪個地區比那兒更合適了。所以，換任何人去當黨魁，也一定看出這步棋來。

因此，蘇聯對日宣戰後，毛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搶佔東北。8 月 11 日，朱德連發兩電，命令原東北軍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向察哈爾、熱河進發；原東北軍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向熱河、遼寧進發；原東北軍萬毅部由山東、河北向遼寧進發；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的李運昌部向遼寧、吉林進發；在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等統率所部隨同八路軍及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83]。8 月 20 日，毛澤東又根據蘇軍進展情況，決定從華北各根據地中抽調 9 個團，連同已在熱河邊境的幾個團，配備相當數量的地方工作幹部，限期開往東北，並明確宣佈部隊的任務是“乘紅軍佔領東北期間和國民黨爭奪東北”[84]

可惜斯大林禁止中共打內戰的電報當天就來了。次日，毛被迫改變原定戰略方針，下令各部隊“開至熱河邊境探明情況後再行決定”，因“軍隊是否能去遼吉黑三省現在尚不知道”[85]。8 月 28 日，毛飛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直到 10 月 11 日才返

回。在此期間，中央由劉少奇代拆代行。毛走後第二天，劉少奇即下令：

> “晉察冀和山東準備派到東三省的幹部和部隊，應迅速出發，部隊可用東北軍及義勇軍等名義，只要紅軍不堅決反對，我們即可非正式的進入東三省。不要聲張，不要在報上發表消息，進入東三省後開始亦不必乘火車進佔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廣大鄉村和紅軍未曾駐紮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大大的放手發展，在我軍不能進入的大城市，亦須盡可能派幹部去工作。……山東幹部與部隊如能由海道進入東三省活動，則越快越好。”
>
> “熱河、察哈爾兩省，不在中蘇條約範圍之內，我必須完全控制，必須迅速派幹部和部隊到一切重要地區去工作，建立政權與地方武裝，但亦不要希望紅軍給我以幫助，一切只要紅軍不堅決反對即應放手進行。”[86]

因此，這第一個關鍵決策雖然早就是毛的意願，但“偷偷的進去，打槍的不要”的具體決策還是劉少奇作出的。

第二個關鍵決策便是“向北推進，向南防禦”，而這也是劉少奇作出的。

從前文中，讀者不難看出毛澤東一貫的特徵，便是好大喜功，抱負常常遠遠超出能力。抗戰勝利時，中共的主要地盤在華北和華中，其他地區佔地雖廣，兵力卻非常單薄，其中鄂豫地區的新四軍第 5 師李先念部僅有兵力 4 萬；河南嵩山地區的王樹聲部僅有兵力 1.8 萬，皖中地區僅有兵力 2 萬，而整個華南的廣大地區只有兵力 2.7 萬[87]。可毛卻在蘇聯出兵後下令全國起事，全面出擊，遍地開花，命共軍去完成根本不可能的任務，甚至荒唐到令八路軍王震部南下打到廣東去。

還沒有等到斯大林發來制止毛打內戰的電報，各地將領便紛紛向中央叫苦。李先念部幾次致電中央："國內蔣軍必四上逼近，我主觀弱點太多，雖有兵 4 萬，但地區太大，不敷應用。""處於蔣大我小之環境，自己力量分散，……我們當前困難很大。"王樹聲部致電中央："河南工作是有很大困難與艱苦"；"農村城市的破壞，生產力大減，這影響廣大人民與我軍的生活"；部隊無法補充，"現我主力團都是 3 個連到 5 個連的小團編制"；奉命開往華南的王震部才走到湘粵贛邊就致電中央，謂其行動非常困難，到廣東五嶺建立根據地已不可能，"我們集中的意見，一致建議北上，靠攏李先念"；新四軍領導張雲逸、饒漱石也致電中央："我們經過整晚反復考慮，一致認為如果八路軍不能南下增援，江南部隊又決不退回江北，僅靠江北現有力量，完成佔領津浦路及長江以北一切城市……是頗感困難的"，要求"從江南調回兩個旅到江北"，等等。[88]

毛澤東雖在 8 月 21 日下令取消了前令，但共軍兵力如此分散，根本就不可能與國軍較量。何況華北和山東共軍還大量開往東北，其根據地的防衛就更脆弱。當此之際，有點頭腦的人都能看出來：中共只能顧大頭，北線擴張，南線收縮，以確保搶佔東北，鞏固華北與華中，而這就是劉少奇的決定。9 月 17 日，他代表中央請示在重慶的毛澤東：

> "爲了完全控制與鞏固熱河和冀東，對付平津唐山一帶將來頑軍對於熱河的威脅，我們必須在冀東、熱河控制重兵，除現在派去東北部隊外，並須屯集至少五萬軍隊在冀東，以備紅軍撤退時能搶先進入東北。因此，現在必須立即計劃調集十萬至十五萬軍隊到冀東（冀東富足可以屯兵並開

> 闢熱河工作）、熱河一帶。否則將會來不及，對東北與熱河的控制，均將沒有保障。”
>
> “爲了實現這一計劃，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否則我之主力分散，地區太大，處處限於被動。因此，我們意見，新四軍江南主力部隊立即轉移到江北，並調華東新四軍主力十萬人到冀東，或調新四軍主力到山東，再從山東冀魯豫抽調十萬人至十五萬人到冀東熱河一帶。而華東根據地則以剩餘力量加以擴大去堅持。”[89]

在同一電報中，他還建議成立冀熱遼中央局，派高崗、李富春、康生等去工作，並組織強有力的軍事指揮機關，以陳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擔任，“無此領導機關負責，鞏固熱河是不可能的”。兩天後，毛回電批准劉提出的戰略部署。事實證明，這一決策非常關鍵。若全面內戰爆發時，中共兵力還是如原來那樣分散，則中共難免岌岌乎危哉。

雖然這一決定與前一個決策一樣，不過是常識，連劉少奇那從未帶兵打過仗的人都能看出來，但通觀一部“解放戰爭”史，也就只有這倆戰略決策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除此之外，毛澤東並未作出什麼英明的戰略決策。具體戰役都是各地將領自己策劃好了，再向毛請示批准。毛還一再告訴部下，由他們根據具體情況下決心，“我們不遙制”。三大戰役中，只有遼瀋戰役中決定打錦州是毛的主張，但風險不論（詳見下），該決策也只加速了國軍的潰滅，並不決定整個戰爭的勝敗。毛非但沒像黨神話編造的那樣構思指揮了每一個戰役，反而為地方將領出了不少餿主意，每次都無一例外是“革命浪漫主義精神”發作。

三、毛澤東的錯誤戰略決策

（一）“禦敵於國門之外”

平心而論，從斯大林來電制止毛澤東打內戰起，直到 1946 年國共談判破裂止，毛還是想與國民黨合作的。這也很自然：他雖從抗戰爆發那天起，就確定了以推翻國府為戰爭終局，在 1944 年底更是揚言：“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但這豪情壯志完全建立在他對斯大林的誤解上。他以為斯大林一定會把他這“階級小弟”扶上臺，這才會斷言：“國際援助一定要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不料大老闆明確表態不同意打內戰，他當然也就失去了推翻國府的底氣，只好乖乖服從父皇的旨意，準備“到國民政府去做官”。

但即使同意與國府合作，毛仍然有不容退讓的底線，那就是絕不當交出武裝的希臘共黨領袖：“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決不能交出去。”共產黨的軍隊只能是黨軍，決不能國家化；根據地只能是由共黨控制的國中之國，絕不容許他人插足。大觀園裡賈寶玉的命根是系在頸上的一塊石頭，毛澤東的命根是他的軍隊。說到底，毛的“和平建國”，就是將過去的非法割據“法理化”，使得國家永遠處於分裂狀態。

不僅如此，毛的“和平民主新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搶在停戰前最大限度地搶佔地盤，擴大黨軍。為此，他在簽訂《雙十協定》六天後就下令：“蔣軍在東北登陸，及從任何方面進入東北之蔣軍，須堅決全部消滅之。”“如能消滅蔣軍前頭部隊，即可使蔣軍後續部隊有所畏懼，方可爭取時間。”“新部隊八萬人須速加整訓，準備作戰，一切頑方武裝均須解除。”[90]

此時他大概還只是想儘可能遲滯國軍出關，以便自己多佔地盤。但在蘇聯人的慫恿下[91]，他迅即改了主意，決定把國軍擋在關內，獨霸東北，以造出“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

“辰兄（原編者註：指蘇方）態度如此，甚為欣慰。蔣已展開八十萬軍隊向我華北、華中進攻及準備進攻東北。我黨決心動員全力，控制東北，保衛華北、華中，六個月內粉碎其進攻，然後同蔣開談判，迫他承認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過渡到和平局面，否則和平是不可能的。我黨現正組成五十五萬至六十萬野戰軍，尚有七十萬地方軍（如東北能組成三十萬地方軍，如李運昌所部在遼寧那樣，則至年底至[止]將有一百萬地方軍）配合作戰，只要友人能給以有力援助，有把握完成上述任務。東北方面的一切問題的關鍵是兩個月內拒止蔣軍登陸、著陸及接收政權，此點如無蘇軍援助則不能成功。”[92]

“辰兄”果然施以援手，“拒止”國軍在大連登陸，並將營口與葫蘆島交給中共軍隊，讓其以火力“拒止”國軍登陸。津浦路、平漢路又被共軍破壞，國軍無法及時北上受降接收。毛澤東心花怒放，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畫出了南北朝藍圖：

“目前形勢於我有利，我必須達到下列目的：華北、東北、蘇北、皖北及邊區全部歸人民自治（孫中山主張），僅平、津、青三地可暫時駐一小部中央軍，將來亦須退出。其他各地中央軍已到者須退出，未到者停止前進；閻錫山、傅作義須免職，民選各省省政府；華北、東北各設政治委員會統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違背自治原則派遣官吏，已派者須取消。東北問題現在就應提出。華北各地敵偽受降全部

歸我，……東北由東北人民自治軍保護治安，中央軍不得開入，否則引起內戰，由彼負責。”[93]

但國軍在秦皇島成功登陸，準備出關接收，於是毛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稍稍降價，允許國府在東北“插一隻腳”：

“山海關三日已打響，第十五師在美軍支持下由秦皇島進攻，事先要求我軍退出山海關及離開鐵路線，當地我軍沒有接受，彼即攻擊，被我擊潰。瀋陽得失，決於作戰結果。如我能在本月內殲滅其首先進攻的兩三個師，取得集結兵力整訓後備之時間（需要兩個月），並在爾後能根本殲滅其進攻力量，則東北可能歸於我有，那時讓國民黨插一隻腳，很好講話。”[94]

於是他擺開架勢，準備在錦州一舉殲滅國軍三個軍。出關國軍乃是國軍精銳，原為赴緬遠征軍，裝備精良，士氣旺盛，戰鬥力極強，而毛澤東卻能“知己知彼”，11 月 10 日，他致電東北局，告訴他們“國民黨美械師戰鬥力不強”，“你們面前只有敵三個軍約八萬人，孤軍深入，地理民情不熟，脫離群眾，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弱點甚多”，“山海關我軍堅持半個月，待我軍集中瀋陽、錦州線，即有辦法”[95]。14 日，他致電“東北人民自治軍”第二副司令李運昌等，命令他們堅守山海關、綏中、興城之線至少三星期，多則兩個月，以掩護主力黃克誠、梁興初部在錦州集中。同日，他電令冀熱遼分局並告東北局、晉察冀局以及黃克誠梁興初，指定“以錦州為中心之地區為我主力集中作戰之戰略樞紐”，要分局派大批幹部去錦州周邊地區發動民眾，鎮壓反動，組織民兵遊擊隊及地方軍，創造戰場，援助錦州、山海關主力作戰。[96]

哪怕在得知部隊遠道新到，官兵疲勞，地形不熟，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勢將處於被動，而且山海關的衝突並非真正的戰鬥之後，他為“求於將來決戰時一戰解決問題”，仍然下令“李運昌、楊國夫兩部堅持山海關、綏中之線，節節抗擊，消耗疲憊敵人”，令黃克誠、梁興初兩部隱蔽開至錦州、錦西、興城三角地區休整，待國軍進至綏中地區或興城地區時集中最大兵力，“舉行反攻，分作幾個戰鬥，每次殲滅其二三個師，最後全部殲滅三個軍，即能從戰略上解決問題”[97]，指望以匆忙集中的疲卒去殲滅國軍精銳，“一戰解決問題”。

若是毛澤東堅持此方針，則無異於聚共軍於一地，以請國軍全殲，後來也就沒有骨幹與時間去“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了。國軍即使無法完全消滅關外共軍，只要切實佔領南滿和熱、察兩省，遮斷關內外共軍交通，則關內共軍也就得不到軍火資助，於是在後來爆發的全面內戰中，國軍仍能在關內取勝，而共軍的最好前途，也就是割據東北大部，讓“滿洲國”變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1 月 16 日，國軍輕易攻破山海關。因為中共阻止國軍在滿洲接收，“國民黨已聲言拒絕接收，撤回熊式輝等行營人員，並說蘇聯供給我軍武器反對政府，使得中蘇關係處於危機之中”，蘇軍於是不敢再慫恿中共獨霸東北，此時毛澤東病倒了（據《毛澤東年譜》，1945 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毛因疲勞過度，患病住院），劉少奇代拆代行。他秉承毛的意志，令東北局“仍應在顧忌蘇聯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並請蘇軍推遲撤軍，“再有一個月我出動的部隊和幹部可全部到達滿洲”[98]。

無奈蘇聯畢竟不敢公開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只能同意讓國軍接收大城市。劉少奇於是悻悻地指示：“彼方（原編者

註：指蘇聯）既如此決定，我們只有服從，長春路沿線及大城市讓給蔣軍”，但他仍要部下請求蘇聯將錦州、葫蘆島及北寧路讓給中共，並請蘇軍“盡可能推延蔣軍進入滿洲及各大城市的時間”，“以上兩項要求，力求辰兄幫助，如不能亦只好服從”。“大城市讓出後，應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穩腳根（跟），準備和蔣軍鬥爭”[99]。

請注意，共產國際早在 1943 年就解散了，中共再也不是莫斯科的下級，然而中共中央仍然口口聲聲“服從”，活脫脫一副石敬瑭嘴臉。而且，劉仍想佔據葫蘆島-錦州一線，甚至請蘇軍出面將該地域劃給他，藉助外力公開瓜分中國。

林彪抵制了毛集中主力在錦州地區與國軍決戰的亂命。11 月 21 日，他致電軍委，提出了他的“根本意見”：

> “目前我軍應避免被敵各個擊破，應避免倉促應戰，應準備放棄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讓敵拉長分散後，再選弱點突擊。因此，在瀋陽、營口各地之我軍不必趕來增援，應就地進行裝備與訓練，養精蓄神，特別加強炮兵的建設，以等待以後之作戰。”[100]

事實證明林副是正確的。國軍繼攻破山海關後，又迅速攻佔錦州、錦西、義縣、阜新等地。共軍望風披靡，潰不成軍。這無情的事實讓劉少奇醒悟過來，他代表中央致電東北局，作出了根本戰略改變：

> “我們企圖獨佔東北特別是獨佔東北一切大城市，已經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我們目前不應以爭奪瀋陽、長春為目標來佈置一切工作，而應以控制長春路兩側地區，建立根據地，利用冬季整訓十五萬野戰軍，建立二十萬地方武裝，以準備明年春天的大決戰為目標來佈置一切工作。”

他還大聲疾呼，提醒東北局正視共軍缺乏作戰能力的現實：

> “請你們注意這種事實，杜聿明兩個軍由山海關打到瀋陽幾乎未遇嚴重抵抗。我之東北新部隊還不能作戰，黃、梁、楊國夫等部因疲勞，沒有地方群眾配合及各種困難，如不經休整準備，亦幾乎不能作戰。阻斷北寧路及大量消滅頑軍，暫時不可能。林彪冬電部署以旅為單位分散打土匪做群眾工作，是對的。……目前與頑軍作戰，我們一切條件都不夠，但我們必須利用東北一切對我有利的條件迅速準備，以便明春能夠勝利的決戰。”[101]

這就是有名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重大戰略調整。當然，劉少奇這通電報仍然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仍在盼望再過幾個月便能“勝利的決戰”。而且，他明知“如無友方的直接幫助，我欲佔領大城市是不可能的”，但還是不死心，指望蘇軍替他打天下：“如有這種幫助，則有這種可能，當盡一切力量以爭取之”；或起碼由主子出面替他向國府爭地盤：“但以瀋陽、長春給蔣，而以哈爾濱及其他長春線城市給我，並讓我取得大連民選政權，或由蘇聯與蔣談判，讓我在瀋、長、哈諸城市插一腳，使東北成為合作局面，那也還是有可能的。這點望你向辰兄探聽。”[102]

但他畢竟看到了共軍毫無後方依托的危險，為中央起草了《關於建立東北長期永久根據地給東北局的指示》。提醒東北局注意：“我在錦州第一線被擊破後，即因無鞏固後方而不得不陷於混亂”，要他們“必須同時加強長春路兩邊深遠後方的工作，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準備在平原情況嚴重時有鞏固的後方可以進退迴旋，否則是危險的”，但他仍然肯定東北局將“部隊和幹部

集中在南滿長春路附近工作是對的，因為頑軍未到，我尚可在這些地區抓一把”[103]。

三天後，劉少奇又修改了立場，以個人名義電告彭真，說他對東北局的部署“總有些不放心，覺得是有危險性的”。他們將主力部署在瀋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周圍及南滿，似仍取奪取三大城市的姿勢，而在東滿、北滿、西滿許多戰略要地，都沒派堅強部隊和有力的黨領導機關去建立可靠根據地。“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著很多土匪的鄉村，如果頑軍一旦控制大城市，你們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時，你們的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於被動”。因此，“你們今天在東北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然後依情況的允許去逐漸爭取在東北的優勢”，“你們應把屁股坐在東滿、北滿、西滿那些可靠地區，去建立根據地，背靠蘇聯、外蒙，而把雙手伸到三大城市附近去儘量抓一把。如此，我可隨時縮手，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動。現到東北的主力部隊和幹部，必須分散部署，應以大半分到東滿、北滿、西滿各戰略要地去建立根據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發展，並準備隨時能撤走。……你們應趁頑軍尚未到達時，將主力從容移至安全地帶，好好在冬季進行幾個月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的工作”。[104]

這才是奪取東北的正道。幸虧少奇同志借偉大領袖病倒之機，為他撥正船頭，指引航向，共軍才在來年的潰敗中有了農村根據地作為戰略退路，沒有徹底潰散。

然而這也不過是明擺著的事，並不需要什麼出眾的戰略眼光才能看到這一點。早在 11 月底，張聞天就與陳雲等致電中央：“我們必須承認，首先獨佔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幹綫以獨佔滿洲，這種可能性現在是沒有的。”當前東北工作的基本方針，

“應該不是把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於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裝力量，在錦州、瀋陽前線給國民黨部隊以可能的打擊，爭取時間，同時，將其他武裝力量及幹部，有計劃地、主動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滿、東滿、西滿，包括廣大鄉村、中小城市及鐵路支線的戰略地區，以掃蕩反動武裝與土匪、肅清漢奸力量，放手發動群眾，擴大部隊，改造政權，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圍及長春鐵路幹綫兩旁的廣大根據地。”[105]

老毛極度鄙視張聞天，說他不過是個從莫斯科揹回了幾麻袋教條的書生。然而就連他都有此眼光，毛那軍事奇才何以偏偏沒有呢？

（二）死守四平

死守四平，完全違背了共軍不爭一城一地得失，避免陣地戰，大踏步進退，以運動戰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的教條，以己之短擊敵之長，招致慘敗，因而成了毛澤東為大眾熟知的敗筆。然而毛犯下此錯也情有可原，那是他先仰承蘇聯人鼻息，後指望馬歇爾幫忙所致。

前文說過，毛“敢同魔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的底氣，完全來自於“北方吹來了十月的風”。他就跟個球膽似的，其脹縮完全取決於蘇聯人吹多少氣進去，這在東北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

東北歷來是俄國與日本的爭奪對象。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獨霸了滿洲。蘇聯出兵，就是爲了將滿洲從日本人手中奪回去，把東北變成不許第三國涉足的勢力範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滿足了俄國人的意願，這就是斯大林逼迫毛與蔣介石談判

的原因。但在蘇軍佔領東北期間，蘇美關係開始惡化。斯大林疑神疑鬼，以為美國想染指東北。中美接近更助長了他的疑心。中共從來是他收拾國府的工具，於是隨著美蘇關係與中蘇關係的變化，他對中共的支持也時強時弱：想收拾國府時，便鼓勵支持中共打內戰；在與美國或國府的關係緩和時，便對此態度冷淡或甚至反對。四平之戰就是俄國人向中共那“球膽”打氣的結果。

此前因為共軍被國軍在錦州輕易打敗，蘇聯也未便公開支持中共獨霸東北，毛澤東遂同意與國民黨談判停火。1946 年 1 月 10 日，國共兩黨正式簽署停戰協定。協定明文規定：“（一）一切戰鬥行動立即停止”；“（二）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三）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但有一條關鍵但書：“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或東北九省境內調動並不影響”[106]。停戰令於 13 日午夜生效。

這協定明顯有利於國府解決東北問題，蓋它並不禁止國府派兵進入東北接收，而這一直是蔣介石的立場：東北是政府接收的問題，不是國共協商分割地盤的問題。這態度雖不現實，卻非常合理：關內的共軍根據地大部份是在抗戰期間建立的，因此國府只能尊重既成事實。但關外的共軍根據地卻是共軍在日本投降後，違反盟國統帥部命令，偷偷大舉出關去搶來的。中共所謂“尊重中共在東北的地位”，完全是非法要求，就連駐沈蘇軍將領克拉夫琴科都不能不私下對中共承認這點。

此外，“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的規定，也使得共黨喪失了顛覆國府的一個強有力手段。在日本佔領期間，除了百團大戰時平漢路短暫遭到破壞外，平漢路與津浦路都一直暢通無阻。然而日本一投降，它們馬上就被中共破壞了。直

到國府垮臺，這兩條幹綫始終未被打通。很明顯，若是中共遵守協定，那國府就能將關內部隊迅速運到東北去。

毛澤東同意簽訂這協定，是因為蘇聯此時還在反對內戰。直到 1 月 17 日，周恩來還向延安轉告了蘇聯駐華使節傳達的蘇共中央意見，指示中共不應想蘇維埃化，應決心停止內戰，並取得蔣同意進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戰，美國空軍會壓下來，要對美國有充分估計。[107]

毛澤東因此決定與國府協商瓜分東北。在 1 月 26 日給東北局的指示中，他明確指出：

> “我黨目前對東北的方針，應該是力求和平解決，力求國民黨承認我黨在東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條件下與國民黨合作，實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設東北，在目前國際國內形勢下，只有這個方針才是正確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圖獨霸東北，拒絕與國民黨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確的，行不通的，必須在黨內加以肅清。……如我們對國民黨採取內戰方針，我們必歸失敗。”

理由他也說了，那是“因為蘇聯和美國都不容許國共兩黨在東北長期內戰，全國人民和東北人民反對內戰，不論國共兩黨都不能違背人民意志長期內戰”。這裡面他真正怕的，還是蘇聯不批准，所以才會把蘇聯反對放在第一條。據此，他命令：“在軍事上避免在長春路沿線及其他大城市如撫順、吉林、龍江、牡丹江等地與蔣軍衝突，切實退出長春路及這些大城市，以表示我方讓步。但必須鞏固的控制長春路兩側廣大地區，切實準備在蔣軍向我進攻時給以殲滅的打擊。”[108]

可是此後蘇聯因控制東北經濟的企圖受挫，便以鼓勵中共搗亂的方式向國府施壓。2 月下旬，蘇軍代表向東北局交底，坦承

他們“全力爭取在東北插一腳，除大連旅順口外，正在與頑方談經濟問題，迫其承認蘇方地位”，為此要求中共“政治上保持強硬態度，軍事上加強進攻，予以有力配合”。俄國人還許願：不論他們與國府的經濟談判成功與否，蘇方最終目的仍是支持中共確立在東北的主人地位。[109]

但毛的既定方針卻未能及時隨之改變。3 月 13 日，他仍然指示周恩來，最終可以將瀋陽至哈爾濱之長春路上各城市（路兩旁不在內）以及撫順、鞍山、本溪、營口、遼陽等數地讓給國民黨，但中東路大部、南滿路南段以及兩路以外之大部蘇軍駐紮區都不能讓，以此交換國方從熱河撤兵。就連這打算能否實現，他也認為“須要經過嚴重的外交鬥爭，以至軍事鬥爭，我們要以一切力量去爭取。”[110]

然而中蘇關係卻在此時迅速惡化了。蘇軍入侵東北後，幹出了比日寇有過之無不及的種種獸行：搶劫行兇，糟蹋了無數良家婦女，還將工礦企業的設備拆卸一空，運回蘇聯。1 月 16 日，按《中蘇同盟條約》規定，國府派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副處長張莘夫前去接收撫順煤礦，竟被蘇軍殺害。1946 年 2 月 11 日，英美蘇公佈了 1945 年 2 月三國簽訂的《雅爾塔協議》，其中規定大連港“國際化”，保障蘇聯在該港口的特殊利益；恢復旅順港為蘇聯的海軍基地；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由中蘇聯合運營，保障蘇聯在該聯合公司的特殊利益；維護外蒙現狀。這消息引起全國輿論大嘩。再加上張莘夫慘死的消息傳到民間，全國迅即爆發大規模反蘇示威遊行，喊出了“蘇軍必須立即退出東北”、“徹查張莘夫慘案”的口號。這是五四以來首次自發的全國愛國學生運動，但其規模與國際影響遠非五四運動可比。英美因此譴責蘇聯拆運東北工礦企業設備。瀋陽蘇軍司令竟謊稱那是根據蘇美英

三國協定行事。2 月 26 日，美國國務卿公開否認蘇方說辭，聲明："本政府不接受戰利品包括工業企業或如中國東北境內工業及配備之任何解釋。"3 月 9 日，英國政府正式向蘇聯提出抗議，表示斷難承認蘇聯將中國東北工業設備擅自運走。[111]

國內外輿論抨擊令蘇聯人惱羞成怒，他們遂決定將中共放出來猛咬國府，以出胸中惡氣。其報復措施一是違反《中蘇同盟條約》中將東北移交給國府的規定，突然秘密撤軍，將政權交給中共；二是屢屢煽動中共大打出手。3 月 9 日，蘇軍代表通知中共東北局：瀋陽紅軍將於 13 日撤退，希望中共佔領，瀋陽以南蘇軍不再向國民黨辦交接，一切蘇軍撤走的地區，中共都可以自由破壞[112]。此後蘇軍代表又向東北局表示對中共中央行動遲緩、態度猶豫的不滿，批評中共中央對美國人太客氣了，更不應該同意讓國民黨開 5 個軍到東北來[113]。蘇軍代表甚至表示，凡蘇軍撤退之地，包括瀋陽、四平街，中共都可以放手大打，並希望中共放手大打，而長春以北如哈爾濱等地，則應堅決控制，不讓國民黨進兵，撫順、營口等地也應力爭雙方都不駐軍。[114]

有了主子撐腰，毛澤東豪氣頓生。3 月 17 日，他電令東北局："速與辰兄接洽，將整個中東路（包括哈市）讓我駐兵，永遠佔住，不讓國民黨駐一兵一卒"，"請彭林速即佈置一切，造成優勢，以利談判。"[115] 次日，共軍攻克為國軍佔領的四平街，殲滅國軍三千人[116]。23 日毛致電東北局及林彪："你們應立即動手大破北寧路及瀋陽附近之長春路，愈迅速愈廣泛愈好，遲則無用。同時立刻動員全軍在運動中及其立足未穩之時，堅決徹底殲消國民黨進攻軍隊，愈多愈好，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將來。"[117] 24 日，他"判斷蔣介石必由瀋陽出兵向北和我爭奪長春、哈爾濱"，命令東北局：

“我黨方針是用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進佔長、哈及中東路，而以南滿西滿為輔助方向。”“為此目的，請速與辰兄交涉，允許由我方派兵佔領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黃李部動員全力堅決控制四平街地區，如頑軍北進時徹底殲滅之，決不讓其向長春前進。”“我南滿主力就現地堅決殲滅向遼陽、撫順等處進攻之敵。”[118]

毛澤東既然決定違反《停戰協定》以及《中蘇同盟條約》，以武力阻止國軍接收，不惜任何犧牲搶佔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即自滿洲里至綏芬河的鐵路。該線是沙俄修建的去海參崴的戰略鐵路，自西北至東南橫貫東北全境，所以毛志在必得），東北問題便再無希望和平解決。但他此時還不想發動全面內戰，其打算還是搶在國軍接收前霸佔四平以北、本溪以南地區，造成既成事實，迫國府接受。為此，他於 3 月 27 日命令：“爲了阻止蔣軍北進，力爭由我佔領長春、哈爾濱及中東鐵路全線（是否可能主要由友人決定，而我應力爭），必須使用主要力量，並須迅趕時機，遲則無用。”“友人”當然樂觀其成。4 月 18 日，共軍攻佔已為國府接收的長春，24 日攻佔齊齊哈爾。28 日攻佔哈爾濱[119]，為全國內戰隆重揭開序幕。

毛還於 4 月 6 日下令在四平與本溪兩地與國軍決戰，強調“必須準備數萬人傷亡，要有決心付出此項代價，才能打得出新局面”[120]；林彪反對分散兵力，認為東北迅速實現和平的可能性不大，鞏固四平與奪取長春均無甚把握，建議停止進攻長春，將大部用於攻擊長春之兵力調至四平，以集中兵力作戰。保衛四平街應以不造成軍隊之被動作戰為主。南滿的共軍主力也應在本溪戰役結束後抽調上來，與已在四平的部隊合編為一個大野戰軍。[121]

然而毛卻捨不得放棄即將到手的長春，把希望完全押在馬歇爾調停上。4 月 13 日，他致電林彪："馬到華後東北可能停戰，國方必於數日內盡力攻奪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條件下擊退其進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談判。"[122] 15 日他更催促："在停戰以前奪取優勢。大約一切重要作戰問題須爭取於十天內外解決。"[123] 18 日，新一軍開始進攻四平，毛下令："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於四平南北地區舉行數次大的戰役決戰，（長、哈、齊）三市是否能確保，決於是否能在四平地區大量殲滅敵人，故爭取戰爭勝利，是基本環節。"[124] 同時下令南滿共軍"死守本溪，以主力在外面行動，挫敵銳氣，爭取時間，以待停戰到來，停戰時機已不在遠。"[125]

長春曾是偽滿"首都"，中共計劃把"首都"從陝北搬到這兒來。爲此目的，毛急切到連最起碼的軍事常識都喪失了：四平本是長春門戶。若四平失守，長春必然不保。若四平保住了，國軍也未必能奪回長春。因此，明智的決策，應該是集中兵力保衛四平。然而毛澤東不但沒有聽取林彪關於停止進攻長春、將兵力用於四平戰役的建議，還在攻下長春後命令："長春防禦工事一概保留，準備於必要時把長春變為馬德里"，"長春應佈置守城，指定守城部隊準備糧彈死守，配合野戰軍殲滅敵人"。21 日，他再令"準備死守長春"。爲了保住長春，他接連電令林彪死守四平：22 日令林彪死守四平，挫敵銳氣，爭取戰局好轉。26 日電告林彪，馬歇爾已提出停戰方案，有停戰可能，望加強四平守備兵力，鼓勵堅守，挫敵銳氣，爭取時間，並望對四平守軍傳令嘉獎。27 日令林彪"化四平街為馬德里"。29 日電告林彪等："東北停戰協定可能於兩三日內簽字，望努力奮鬥，不要

鬆懈。”30 日，他再次告訴林彪時局正在起變化，可能簽訂停戰協定，望“死守四平，寸土必爭”。[126]

在此，偉大統帥再一次表現出了我們業已熟悉的一系列特點：

首先是把願望當現實，將假想中的好事當成制定戰略計劃的前提。當年他計劃用 20 萬精兵攻打國府後方，其勝利指望就是建立於一系列一廂情願的“如果”上。如今他又把希望放在馬歇爾的調停上，而且認定東北停戰協定很快就能簽字。

其次是他以己度人的看問題方式。因為自己是蘇聯走狗，他便以為蔣介石對馬歇爾就如他對蘇聯人一樣，“只有服從”，“只好服從”。可惜真情並不如此。共軍大敗前，馬歇爾確實會同中共和民盟向國府提出了停戰方案，卻被蔣介石拒絕了。當然毛也沒有完全弄錯：在共軍大敗之後，馬氏還是逼迫蔣介石停火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最後勝利恰是因為他的“國際階級分析”出了錯——在蘇聯大舉援助中共的同時，美國卻對國府實行軍事禁運，從而改變了雙方實力對比（詳見後）。

第三是“革命者頂天立地勇往直前”的大無畏氣概。4 月 21 日，他下令將新一軍“各個擊破，全部或大部殲滅之”，“爭取這一有決定性的戰役勝利”[127]。可別說是孫立人的新一軍，共軍就連廖耀湘的新六軍都打不過。此前共軍曾在沙嶺子與新六軍交過手，消滅對方 600 餘人，自己卻損失了 2100 餘人。4 月 9、10 兩日，林彪又親自指揮近 5 個旅的兵力與正面進攻之敵展開激戰，雖守住了泉頭車站和興隆嶺，卻一仗就傷亡了 1700 餘人[128]。然而毛澤東卻能無視這些戰例顯示出來的敵我強弱對比，向部下下達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第四是顧頭不顧腚。4 月 21 日，因四平吃緊，他下令抽調南滿共軍，令其兼程北進，以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大量敵人，保衛長春、哈爾濱[129]，致使南線空虛。杜聿明抓住這機會，於 28 日向本溪發起猛攻，重創共軍，6 天後即攻佔本溪[130]。杜隨即將部隊迅速北調，參與進攻四平。5 月 15 日，國軍再度向四平發起全面攻擊。18 日，國軍攻佔四平防線的制高點塔子山，由此迂迴四平側後。共軍後路有被切斷的危險，當晚只好撤出四平。[131]

四平既失，國軍又攆在屁股後面追，長春也只好在 5 天後放棄了。據官修軍史："在大踏步的進行戰略撤退的同時，國民黨新 1 軍、新 6 軍尾隨東北民主聯軍各部，連續佔領公主嶺、東豐、西豐、伊通等地，逼近長春。……5 月 23 日，國民黨軍進佔長春，又相繼佔領雙陽、梅河口、海龍、磐石、農安、德惠、吉林等 19 座重要城市，逐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廣大地區。"[132]

共軍向北狼狽潰逃，堪稱潰不成軍，一直逃過松花江才立下足來。連黃克誠都不得不承認："部隊從四平撤退尚有計劃，長春撤退則已有些混亂。西滿四個旅，一個旅到北滿，一個旅到東滿，兩個旅到西滿，其他各部情況不明。部隊非常疲勞。"[133]軍心渙散，士氣低落，軍紀廢弛："幹部中一般情緒不高，特別是營以下幹部一般有很大厭戰情緒，負傷到後方搶擾打人嫖賭（表現）很壞，傷癒後不願歸隊。比較好的則要求到地方工作。壞的很多逃跑……有些幹部則裝病到後方。這些現象是抗戰八年所未有。"[134]

共軍敗得之狼狽，《雪白血紅》裡作了些記述：官兵怨氣沖天，連林彪都罵上了："就是林彪來了也不讓！瞎指揮，打敗仗，就會撤，就能跑——撤退將軍，逃跑將軍！""甚至一些當

年非常熟悉、崇敬他的老部下，也心存疑慮：‘林總’是不是多少年沒打仗了，不會打仗？”[135]

這當然不是林總的錯。漫說事前他就不同意死守，何況他還在危難中救了共軍。18 日他致電東北局和中共中央告急：“四平以東陣地失守數處，此刻敵正猛攻，情況危急。”不待毛批准就決定撤退。次日毛才覆電說：“如果你覺得繼續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時，便應主動地放棄四平。”但即使如此，毛還是要他“以一部在正面遲滯敵人，主力撤至兩翼休整，準備由陣地戰轉變為運動戰”[136]。更荒唐的是，毛本人雖不知共軍兵敗如山倒，但也知道長春守不住，在 5 月 23 日電告周恩來：“長春我們應準備撤出”，卻於同日電令林彪堅守公主嶺，“如公主嶺不能守，應堅守長春，以待談判”[137]。而林彪卻知道潰兵根本不堪再戰，索性當天就放棄長春，一道煙逃過松花江去了。因此，林彪下令放棄四平與放棄長春，實際上都是先斬後奏。惟其如此，他也才為共軍留下了來日大舉重來的本錢。

當然，毛澤東最終還是意識到了局勢的嚴重。5 月 27 日，他致電東北局及林彪：“目前軍事方針，除以一部與敵保持接觸，給以擾亂及破路外，主力應不怕喪失地方，脫離並遠離敵人爭取時間休整補充，恢復元氣再行作戰。”[138] 這實際上是批准了共軍逃跑避戰。5 月 30 日他電告周恩來葉劍英等，寧可讓蔣介石武力佔領哈爾濱、齊齊哈爾、滿洲里，不能允許象徵佔領，亦不允許哈市獨立。在和平未實現前，對美領事或救濟人員去哈或去我方任何地點必須堅決拒絕[139]，說明他意識到哈爾濱等地有丟失的危險，但他仍不甘心不戰而棄。但林彪反對固守哈爾濱，請求主動放棄該城。毛不得不接受現實，於 6 月 3 日致電東北局、林彪等人：“同意你們作放棄哈爾濱之準備，採取運動戰與

遊擊戰方針，實行中央去年十二月對東北工作指示，作長期打算，為在中小城市及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而鬥爭。對於分散與孤立之敵據點，應在可能條件下攻取之。目前軍隊應爭取休整，恢復疲勞，提高士氣。”[140]說明他此刻終於意識到了“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的計劃是錯誤的，被迫回到劉少奇在半年前制定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決策上去。

然而此時馬歇爾卻出來攪屎了。馬氏雖未如毛指望的那樣，在三天內或十天內逼令蔣介石簽訂東北停戰協定，卻也在共軍丟掉長春後向蔣介石施壓，要他“立即下令停止政府軍隊之前進攻擊與追擊，並請准許調處執行部隊前進人員立赴長春。”蔣介石屈服了。6 月 4 日，他與馬歇爾舉行會談，同意以 15 天為限，就東北停戰問題、恢復交通以及整軍等問題與中共進行談判[141]。毛澤東迅即改變放棄哈爾濱的決定，於 5 日電令林彪等人：（一）望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區於我手中，尤其保持哈爾濱。（二）望保持鞍山、營口於我手中。（三）凡能攻取之地望於數日內攻取之；並專門電令蕭華“盡可能保持鞍山、海城、營口在我手中”；電令李富春、黃克誠盡可能殲滅或驅逐鄭家屯之敵，其他地點能佔領者速佔領之，因數日後可能停戰談判。當天，蔣介石、周恩來、馬歇爾達成東北停戰協議。次日，國共雙方下令，自 6 月 7 日起，東北停戰 15 天。當天，毛澤東致電東北局和林彪等，令共軍各部利用停戰 15 天時間“休息補充，提高士氣，準備再戰。在 15 天內，如國民黨遵守協定，停止進攻，則我亦應遵守協定，停止軍事衝突，但須嚴防敵軍進襲，不要鬆懈警惕性”[142]。這說明他知道了國軍的厲害，不敢再像過去那樣輕易違約冒險了。

停戰期滿後，雙方宣佈停戰時間再延長 8 天，進行和談。再度期滿後幾個月內，戰火都未復燃。林彪充分利用了這寶貴的喘息時間，在北滿整軍講武，從容休整、擴充、裝備、訓練部隊，半年後再大舉捲土重來。

死守四平，究竟給共軍造成了多大傷亡？官修軍史說的是："在此役中，民主聯軍有生力量消耗甚大，傷亡達 8000 人，而且大部份是骨幹力量。"[143] 楊奎松披露的兩份中共的電報說傷亡為 2-2.5 萬人[144]。黃克誠 5 月 13 日給中央的電報則披露，出關共軍的作戰部隊人員經過幾次大戰鬥就損耗了一半（詳見後）。但那電報是在四平失守前發出的，並不包括 13 日以後的損失。此後的四平保衛戰中的傷亡不論，光是放棄四平後向北潰退時的損失就很高，連官修軍史都承認，共軍"在北撤中，晝夜行軍，大量減員"[145]。但即使不完全，黃克誠披露的情況也夠驚人了。關內來的共軍約 11 萬餘人，減員一半就是 5.5 萬人，達到了毛"準備數萬人傷亡"的預算。但黃克誠 5 月 24 日的電報又說；"從 3 月下旬國民黨軍進攻起，到長春撤退，我軍除南滿外，總傷亡一萬五千人，僅西滿四個旅及一部地方部隊，傷亡達七千左右，七、十旅連排幹部大部換了三次，部份營級亦換三次，團級幹部傷亡尚小，有些部隊元氣受到損傷，不經整訓已難作戰。"[146] 這傷亡數字顯然與他在 5 月 13 日的電報中說的不一致。看來準確的傷亡數字還有待史家調查。不管怎樣，共軍在此役中付出的代價是十分慘重的。

付出如此慘重代價，換來了什麼戰略利益？共軍達到了毛定下的"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的戰略目標否？國府是否就此承認了"我黨在東北一定合法地位"，在毛預定的三天或十天內乖乖簽字畫押，同意"將整個中東路（包括哈市）讓我駐

兵，永遠佔住，不讓國民黨駐一兵一卒”？作出這慘痛犧牲，結果是既喪師，又失地，還動搖了全局。

與在華北蘇北不同，共軍初到東北時乃是毫無根基的客軍。劉少奇早在頭年攝政時就看出了這一點，特地發電報給彭真，要他離開大城市，分兵到廣大鄉村發動群眾，清剿土匪，實行土改，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才能有戰略後方。否則“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著很多土匪的鄉村，如果頑軍一旦控制大城市，你們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時，你們的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於被動。”可毛只盯著大城市，把軍隊集中到四平地區去打陣地戰，於是一旦戰敗時，便落入了劉少奇早就預警過的危局中。官修軍史官承認：

> “東北民主聯軍從四平、長春等地撤退後，處境極為困難。東北解放區的面積大大縮小。除保持北滿幾個完整省份外，大部份地區為國民黨軍佔領，而且南北滿處於被分割的局面。……國民黨軍控制了東北的主要大城市及重要的鐵路幹綫。東北民主聯軍部份指戰員，對自四平撤退的這一戰略措施一時缺乏認識，對長期堅持自衛戰爭的信心不足。四平戰役，東北民主聯軍雖然給國民黨軍以嚴重打擊，但卻傷亡8000 餘人。部隊骨幹減少，個別部隊失去了戰鬥力。少數新建的地方武裝嘩變，土匪乘機騷擾，部隊沒有鞏固的根據地作依托。尤其是經過山海關、四平、長春等地的連續作戰，部隊急需整頓補充。”[147]

這其實是說，四平之戰造成了兩個惡果：首先是陷入進退失據的危局。在給中央的電報中，黃克誠坦率指出，中共在西滿“尚無廣泛的、有組織的群眾基礎”；而“土匪問題尚未解決”，是“因為集中兵力於四平，亦無較多部隊進剿”[148]。換言

之，毛把兵力都集中到四平去，卻不去鄉村發動組織群眾打土匪，於是中共此刻便前有國軍，後有土匪，腹背受敵。

第二個惡果就是把共軍的根據地分割為南北滿兩塊，主力在北滿，偏師在南滿。不但彼此相隔很遠，而且由於東北的氣候與地理特點，北滿共軍只能在冬季過江發動攻勢[149]。因此，除了冬季三個月之外，它無法策應松花江以南的共軍。這就給了國軍各個擊破共軍的可能。南滿根據地至為重要——前已述及，關內共軍的軍火就是從那兒經海道運到山東去的。但該區的共軍兵力較少，在本溪失守後，若不是蘇軍出來劃定“安全區”救命，早就被國軍殲滅了。但即使有蘇軍保駕護航，南滿共軍仍然未脫危境，根基很不穩固。官修軍史承認：“在嚴重敵情威脅下，大部地區的地方武裝潰散甚至嘩變。遼南原有地方部隊約 1.7 萬人，至 1946 年底，只剩 4000 餘人。國民黨軍利用潛伏的反動勢力，迅速恢復村、屯各級偽政權，實行保甲制，組織‘自衛隊’，佈置情報網，成立地主武裝‘大團’，為其護路、放哨、送情報。強行徵兵、徵糧、徵馬、‘獻槍’，厲行苛捐雜稅，並實行併村，廣泛安設據點（每縣約 10 餘處）。”[150]

國軍也知道南滿的重要性，打算確實控制熱河，截斷華北與東北共軍聯繫的遼西走廊，並封鎖旅大與內陸交通，以截斷山東與東北共軍的海上聯繫[151]。為此，杜聿明充分利用了共軍在地理分佈上的弱點，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計劃、1946 年 10 月，國軍向南滿共軍大舉發動進攻。共軍節節敗退，到了 12 月份，南滿絕大部份城鎮盡入國軍之手，共軍只控制了 5 座小縣城和長白山區。該區地瘠民貧，村落稀疏，總人口僅 20 餘萬，無法長期養活 4 萬野戰軍與地方幹部。12 月 11 日，南滿共軍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大多數人都主張留下少數部隊堅持遊擊

戰，主力撤到松花江以北。只是因為陳雲和蕭勁光力排眾議，會議才決定留在南滿堅持鬥爭[152]。全靠國軍拖到冬季才開始進攻南滿的臨江。致使北滿共軍得以“三下江南”，實行“南打北拉”，成功地“四保臨江”[153]。南滿根據地才倖存下來。

林彪大敗北竄時正當初夏。若國軍不停火，在收復松花江以南地域之後，立即回師南下，乘共軍新敗膽寒混亂之際，在冬季到來之前消滅南滿共軍，則北滿共軍根本就無法策應救援之。國軍雖不能進入蘇軍劃定的“安全區”與北韓，仍可在遼東半島與中韓邊境建立永久性封鎖線，使得“大連建新工業公司”無法取得原料及輸出軍火。然後再揮師西進，與傅作義夾攻熱察綏的共軍，切斷西滿共軍與關內的交通。此後再次第進剿西滿與東滿共軍。只要遵循各個擊破的原則，國軍兵力並無不敷之虞。

苟如此，則東北就再不是中共全軍的軍火庫與兵工廠，共軍也就不能如後來那樣，以火海戰術加人海戰術大規模殲滅國軍，攻陷大城市了。那麼，雖然國府未必能徹底根除共禍，但中共推翻國府的希望必然變得十分渺茫。國軍之所以能有此扭轉戰局的寶貴機會，全拜偉大統帥之賜——他的瞎指揮使得共軍主力被迫逃過松花江，使得南滿共軍失去了有力臂助。只是因為馬歇爾出來幫中共的忙，蔣介石又低估了共軍潛力，貽誤了戰機，而“辰兄”又為共軍提供避難所，“東方馬德里”才未變成毛澤東的滑鐵盧。

然而毛澤東就是死不認錯。據黃克誠說：

> “1959 年廬山會議期間，一天，毛澤東約我和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到他住地，我們邊談話邊爭論問題。當談起四平保衛戰的情況時，毛澤東問我：‘難道四平保衛戰打錯了？’我說：‘開始敵人向四平推進，我們打他一下子，以

阻敵前進，這並不錯。但後來在敵人集結重兵尋我主力決戰的情況之下，我們就不應該固守四平了。’毛澤東說：‘固守四平當時是我決定的。’我說：‘是你決定的也是不對的。’毛澤東說：‘那就讓歷史和後人去評說吧。’”[154]

勿過，毛也就是嘴硬而已。雖然他在四平失守後致電林彪、彭真，為自己的錯誤決策辯護，聲稱此役“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頑強英勇精神，這一鬥爭是有歷史意義的”[155]，但在長春失守三天後，他還是通報各戰略區，雖免不得鼓吹該役“使敵遭受我軍重大打擊”，卻也生怕其他戰區效法，表示“四平防禦戰為一時特殊條件所致，不能成為我一般的作戰方針”，並將他的失敗教訓當成科學預見通知大眾：“目前，我力守大城市則許多中、小城市將被丟掉，許多運動戰各個擊破敵人的機會不能利用，敵如繼續增兵對我守軍進行包圍攻擊，則我必然仍要放棄大城市。”[156] 由此可見，雖然他死不認錯，但畢竟還是自家有病自家知。

黃克誠並不是放馬後炮。四平之戰前，他曾多次給林彪發電報，建議從四平撤退，但林彪很滑頭，既不覆電，也不撤兵——他知道死守四平是皇上旨意，非到萬不得已時不能違旨。黃乃於5 月 12 日致電中央：“由關內進入東北之部隊，經幾次大戰鬥，戰鬥部隊人員消耗已達一半，連、排、班幹部消耗則達一半以上。目前雖尚能補充一部新兵，但戰鬥力已減弱”，而敵人尚在增兵，“四平堅持有極大困難。四平不守，長春亦難確保”。因此，他建議：

“（三）如停戰短期可以實現，則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長春亦絕對必要。如長期打下去，則四平、長春固會喪失，主力亦將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繼續戰鬥。故如停戰不能在現狀下取得，讓出長春可以達到停戰時，我意即讓出長

> 春，……以求爭取時間，休整主力，肅清土匪，鞏固北滿根據地，來應付將來的決戰。
>
> （四）東北已不可能停戰，應在全國打起來，以牽制國民黨軍向東北調動。……
>
> （五）我對整個情況不瞭解。但目前關內不打，關外單獨堅持消耗的局勢感覺絕（對）不利。故提上面意見，請考慮。”[157]

據黃克誠說，這份電報也如石沉大海。但看來毛還是在大敗後採用了他獻上的毒計：“在全國打起來，以牽制國民黨軍向東北調動”。四平失守次日，毛致電蕭克、程子華並告聶榮臻等，熱河作戰之主要目的在於吸引敵 13 軍，93 軍並消耗他們，“此戰役應著重破路與部份殲滅及消耗其有生力量”。破路應十分徹底，務使長期不能修復，此戰役應延長至月底，“不要收束太早，以利援助東北。”6 月 2 日，他又電令劉伯承、鄧小平、薄一波：國民黨在東北佔我長春、吉林，正在向哈爾濱進攻，在關內各地，進攻不停，其中包括攻我豫東；五月三十日起北平蔣軍大舉攻我冀東。因此，我必須採取報復手段。除令山東攻取泰安、大汶口、張店、周村、德州、棗莊等地外，你處可攻取長恒、考城、永年、聊城四處。[158]

第二個命令最能顯示共產黨人的哲學，那就是劉少奇在批評“個人主義者”時說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哈爾濱、長春、吉林、四平等地早為國府接收，是共軍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停戰協定非法攻佔的，國軍不過是收復失地而已，卻成了“佔我長春、吉林，正在向哈爾濱進攻”！有點人生經驗的人都知道，與持此種邏輯的人絕無可能合作。可笑的是，

無論是馬歇爾還是蔣介石，都沒有這種常識，一廂情願地以為國民黨可與中共“和平建國”。

這兩個命令更公然踐踏了共產黨人簽字畫押的《停戰協定》，尤其是其中“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的規定。而這是任何一個主權政府都不能坐視的：鐵路交通一旦癱瘓，國府漫說再無可能向東北增兵完成接收，就連國民經濟都要崩潰。此令下後一個月，其強大威力就顯示出來了。6 月 19 日，徐永昌在謁見蔣介石時就指出：“共黨果有意稍事相安，似應知難而止。否則我人當毅然進剿。今日不辦，僅就斷交通厄我經濟一事，即倒政府而有餘。”[159] 因此，毛澤東違反停戰協定，下令對國府採取大規模顛覆活動，超出了任何一個主權政府的容忍限度，最終導致了內戰全面爆發。

（三）“外線病”的幾次發作

我在本書引論中指出，所謂“毛澤東軍事思想”，不過是共軍因為缺乏硬實力，出於求生本能，集體摸索出來的一套經驗規則，其根本原則應是三條：第一，戰略上防禦，戰術上進攻；第二，戰略上以少勝多，戰術上以多勝少；第三，戰略上的持久戰，戰術上的速決戰。

不幸的是，毛澤東雖從實踐經驗中摸索出了後兩條結論，卻因缺乏理論能力而看不到最重要的第一條：只要敵強我弱大局不變，己方就只能處於戰略防禦，以戰術上的進攻消滅敵軍，藉此一點點積累自家硬實力、削弱對方硬實力。抗戰給了中共足夠的人力物力資源基數，蘇聯人又提供了武備，因而極大地提高了共軍每次削減對方硬實力、增進自己硬實力的增量，使得它從原來

叮人的跳蚤，變成了咬人的惡犬，於是硬實力逆轉就有了可能。換言之，惡犬越咬人就越厲害，最後可能長成吃人的獅虎。但開初雙方的硬實力仍有較大差距。因此，共軍仍然只能處於戰略防禦狀態。中共要做的，就是充分利用己方人民操控術的軟實力優勢，藉此抵消對方的硬實力優勢，最大限度地增加每次削弱對方、壯大自己的增量。

雖然毛澤東也知道扳著指頭算應該每月消滅國軍多少旅，才能打敗蔣介石，但這位天才軍事家從未受過系統教育，缺乏思維能力，因而不懂在敵強我弱的全局尚未逆轉時，共軍只能在戰略上取守勢，在戰術上取攻勢。在消滅了進攻根據地的敵軍後，根據地自然會隨共軍反攻而擴展，資源擁有量隨之增加。只有到硬實力增長到軟實力優勢不再是決定性因素時，才能發動戰略進攻。若在此前就發動戰略進攻，貿然脫離根據地打入外線，那就不能消滅敵人壯大自己，反而會推遲勝利的到來。

毛非但不知道這最關鍵的原則，也不懂其推論：1）如果全軍都打出外線，那就是戰略進攻，只能在己方硬實力堪與對方匹敵時才能這麼做。2）在這個轉折點到來前，打出外線只能是戰術上而非戰略上的，是局部而非全局，是微觀而非宏觀。共軍作戰必須以根據地為依托，在原有基礎上發展，不能"下決心不要後方"，打到萬里之外去，那樣必然進退失據。3）每次戰鬥傷害對方、壯大自己的增量不是個常數，己方硬實力越大，則給對方造成的傷害越烈。由此決定了敵我實力對比的變化不是勻速的。一旦進入戰略進攻階段，則所謂"雪崩效應"遲早會出現，其時不但不需要內線作戰，也不再需要集中數倍於敵軍的兵力去打殲滅戰了，更不需要去建立新的根據地，只需如辮子兵一樣橫掃全國即可。而這就是中共征服南中國的實際過程。

可惜毛澤東雖然從形形色色的線裝書上學會了各式各樣匪夷所思的陰謀權術，卻從未接受過正規思維訓練，因而徹底缺乏理論能力，只能靠“實踐出真知”，以“親口吃梨子”的原始方式摸索出“狹隘經驗論”，卻沒有足夠智力靠理性思維導出所謂“毛澤東軍事思想”，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他的“軍事思想”不但有重大缺損，而且還在實踐中受到他智力結構中深厚的反理性因素干擾。他天性好賭，喜歡驚天動地的大手筆，巴不得一舉扭轉乾坤，創造奇跡，開創出轟轟烈烈的大局面來，於是就害上了頑固的“外線病”。每當他賭性發作、“革命浪漫主義”精神沛然莫之能御之時，便很容易忘記那些經驗規則，想抄襲他的聖經《三國演義》中的鄧艾以三萬精兵偷渡陰平直搗成都、或魏延兵出子午谷偷襲關中的奇計，動輒想出奇兵打到外線去。這個痼疾在過去多次發作過，在所謂“解放戰爭”中當然也不例外。每次發作都給革命事業帶來損失，實際上是推遲而不是加速了中共奪取全國政權。

1、“北線奪取三路四城，南線三軍奪取津浦線”

1946 年 6 月間，國共和談陷入僵局。毛悍然決定發動全面內戰，以主力大舉向外線出擊，向國統區發動全面進攻。6 月 19 日，毛致電關內各戰略區首長：“觀察近日形勢，蔣介石準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後，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如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因此，我軍必須戰勝蔣軍進攻，爭取和平前途。”[160]

這基本估計十分可笑：按他對共軍大勝的定義（見下），則共軍大勝後就奪取了大半個中國，他立即就要“宜將剩勇追窮

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痛打落水狗之餘，還要寫《評戰犯求和》百般嘲笑，豈還會“必可議和”？而老蔣的脾氣十分倔強，越敗就越不肯投降，抗戰就是如此；如大勝反倒有議和可能，蓋他沒有毛澤東的“徹底革命”精神，又一向低估我黨屢仆屢起的生存力，卻用對付軍閥的定式對待共產黨，勝後便覺得對方殊不足慮，反有可能招安中共，1936 年紅軍走投無路時他派密使與之和談就是先例。

此後幾天內，毛澤東給各戰略區開出了“大勝”目標。用中共當時的總結來說，便是“北線奪取三路四城，南線三軍奪取津浦線”。“北線”指的是晉察冀與晉綏戰場；而“南線”則是指山東、華中與晉察魯豫戰場。

毛派給晉察冀軍區的任務是：“基本任務是保衛地方與奪取三路四城。”“乘敵北進，集中楊、楊、郭、趙四個縱隊及冀中、冀晉全力舉行平漢戰役，佔領從長辛店至石門整個平漢路，相機佔領保定、石門兩城。”“希望你們用全力組織平漢戰役，於半月內準備完畢，待命攻擊。”“平漢勝利後，即以主力三個縱隊不少於二十團四萬人入晉，充當奪取山西之主力，首先配合山西各區，奪取正太、同蒲兩線，掃清太原、大同以外一切敵據點，使冀晉、晉綏、呂梁、太行、太岳五區打成一片，然後相機奪取太原、大同。”“奪取三路四城（保定、石門、太原、大同）須準備六個月或較多時間，但是必須完成此任務。”據此，所謂“三路”，指的是平漢鐵路從長辛店到石門（石家莊）這一段，同蒲鐵路（大同至蒲州，蒲州在今日山西之芮城縣），與正太鐵路（正定至太原，即今日之石太線）。而所謂“四城”則是指保定、石家莊、大同與太原。[161]

派給晉冀魯豫軍區的任務是：“以豫東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集中主要兵力盡可能攻取長垣、考城、民權、蘭封、封丘、寧陵、睢縣、杞縣、陳留、通許、太康、拓城、淮陽、商丘、鹿邑、西華各點，主要著重在野戰中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相機佔領開封。”“除山西對閻部隊外，其餘以一部監視豫北之敵，應以最大主力出動於豫東區域。”

派給南線的任務是：“以徐州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集中山東主要力量配合蘇皖北部各區，攻取黃口、碭山、虞城、渦陽、夾溝、符離、宿縣、任橋、固鎮（即徐蚌間）各點，主要著重調動徐州之敵於野戰中殲滅之，相機佔領徐州。”“山東以膠東對付青、濰，以渤海對付濟南，其餘魯中、魯南、濱海三區主力及新四主力全部南下。”“只要佔領開封、徐州間及徐州、蚌埠間主要鐵路線及上述各縣城之半數左右，即為有利。有些縣城可讓地方部隊逐次攻佔之，我主力不必每個城均去打。”“粟譚主力對付江北之敵，配合你們作戰。”“上述作戰勝利（不一定要取得開封、徐州）後，如形勢有利，可考慮以太行、山東兩區主力渡淮河向大別山、安慶、浦口之線前進。”

毛強調指出，這是外線作戰，具有很多優點，但並不是冒險主義：“這一計劃的精神著重向南，與蔣的精神著重向北相反，可將很大一部蔣軍拋在北面，處於被動地位。”“這一計劃依靠老根據地，逐步向南，穩紮穩打，並不冒險。”“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從國民黨區域徵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區不受破壞。”
162

兩天後，毛又補充了南線的作戰計劃，將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劉、鄧、薄部負責占領開封-徐州之間的隴海線及豫東、淮北各城；陳毅、舒同負責佔領徐州-蚌埠之間的鐵路線並

調動徐州敵軍出擊而殲滅之；以蘇中地方兵團負責吸引並牽制南通-揚州線上之敵，粟裕、譚震譚率主力佔領蚌埠-浦口之間的鐵路線，殲滅淮南地區的三、四分區之敵，策應北面作戰。第二階段則是渡過淮河向南推進。給的準備時間為半個月，必要時酌量延長。毛還特地關照他們不要阻止敵方向青島濟南等地增兵，“彼方向北增兵愈多愈好”。[163]

6 月 26 日，毛又給南線追加了新任務，令劉鄧主力出隴海豫東，陳舒主力出徐蚌間，調動敵人而殲滅之。華中軍區應以一部在蘇中吸引並牽制南通-揚州線上之敵，粟裕譚震林則率主力（不少於十五個團），與陳毅舒同部配合，一舉佔領蚌埠至浦口之間的鐵路，徹底破壞鐵路並殲滅該地之敵，並準備打大仗，殲滅由浦口北進之敵。[164]

這個偉大計劃的特點是“敵進我進”。毛讓主力部隊傾巢外出，聲稱優點是“將很大一部蔣軍拋在北面，處於被動地位”。北面不是共軍的根據地麼？讓蔣軍佔了，到底是誰處於被動地位啊？給養從哪兒來？像長征那樣走到哪裡搶到哪裡？長征不過幾萬人，如今可是幾十萬的大軍，能靠“打土豪”為生麼？在北線他還想到了守衛根據地的問題，把“保衛地方”當成了晉察冀軍區的基本任務，可他卻把這任務交給了熱河四個獨立旅，冀東、冀中各兩個旅、商都兩個團以及其他地方部隊（這也是必然的，因為主力要去打“三路四城”），而在南線他連地方部隊都派去攻城，好像決心徹底放棄根據地，而且還要讓國軍盡可能地向青島濟南等地進軍，似乎全然不知道共軍的軍火大部份都經海道運來，而國軍的戰略目標之一就是佔領沿海口岸，切斷中共的國際交通線。把根據地讓給國軍，據說優越性是自己可“從國民黨區域徵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區不受破壞”。就算國軍愛民如子，絕

不徵用老區的人力物力，個個練過辟穀術，或是全都懷揣大餅而來，使得老區絲毫不受破壞，但那已在敵軍佔領之下，對自己又有什麼好處？莫非在國統區徵用人力物力比在老區還方便？

由此可見，這計劃暴露的還不只是毛好大喜功，以致抱負遠超實力，更是此人的腦袋確實不是很正常。只有遠大理想完全脫離了現實的人，才會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發動全面進攻，在共軍還缺乏攻堅作戰的經驗與技能時，便妄圖攻取大量堅城，而且還要部下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在如此廣闊的地域中作戰的準備，在短到不可能的期限內完成指派的戰略任務；而只有腦袋不正常的人，才會想出以扔下老區的方式去保證其不受破壞的怪招。

毛澤東的亂命受到了粟裕的委婉抵制。6 月 27 日，粟裕致電山東野戰軍並中共中央軍委，首先歌頌“中央作戰方針完全正確”，然後指出毛的計劃超出了當地的負擔，提出替代方案，最後請示：“我們是否在蘇中先打一仗再西移？”兩天後，華中分局和華中軍區也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相同建議。毛於 30 日覆電，令部隊暫緩調動，待他與陳毅商酌後再決定。[165]

幸虧蔣介石此時毅然出來“給力”，幫毛打定了主意。7 月 1 日，國府給葉劍英下了最後通牒，限共軍於 30 日前退出山東東明縣以及至河南考城縣（今蘭考）的走廊，否則一切後果由共方負責，劉伯承鄧小平等人得到的情報也說，國軍正準備進攻焦作、冀南。據此，毛判斷“膠濟、徐州、豫北、豫東、蘇北之頑可能同時向我進攻”，於是決定：“我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166] 即使改了主意，那也不是因為他發現原計劃在軍事上太荒謬，必遭慘敗，而是因為他覺得讓國民黨先動手，對於中共的政治宣傳攻勢更有利。

此後粟裕在蘇中兩戰告捷，殲滅國軍約兩萬人[167]，毛嚐到了甜頭，遂覺得“不如令粟部再在蘇中作戰一時期，再打一二個勝仗，使蘇中蔣軍完全轉入守勢，保全蘇中解放區，對全局有極大利益。這樣配合淮北作戰，更為有利”[168]。粟裕趁機致電中央軍委，列舉了在蘇中作戰的好處，其中“威脅長江，亦直接拖住敵人無法它調”[169]一條，頗符毛以奇兵直擊對方要害的癖好，於是他便批准了，說：“如你們能在今後一個月內再打二三個勝仗，繼續殲敵二三個旅，則對整個局勢助益極大。”[170]粟裕充分利用此聖旨，堅持在蘇中內線作戰，以寡勝眾，以弱勝強，取得所謂“七戰七捷”的戰果。他率領的僅有 5 萬餘人的華中野戰軍迅速壯大，最終成長為關內最強大的野戰軍，與其在戰爭初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分不開。因此，共軍在華中戰場上的勝利，乃是粟裕抵制毛主席革命路線取得的。

在回憶錄中，粟裕同志其實也指出了這一點，說：

> “確定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這是戰爭初期中央軍委對原定戰略計劃的一次調整，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蘇中戰役，就是在中央調整戰略計劃指導下發起的。”[171]

相比之下，凡是忠實執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線之時之處，革命就要受挫折。8 月上旬，陳毅等人根據毛原定的出擊津浦路的計劃，指揮山東野戰軍發起了泗縣戰役，擬在攻克該城後，乘勝出津浦路。但共軍攻入城關後暴露在國軍炮火下，傷亡甚眾，攻打了三晝夜毫無進展，被迫在傷亡兩千多人後撤退。該役危及了華東、華中地區共軍的態勢。國軍乘勝向泗陽、淮陰、淮安進剿，迫使正在圍攻海安的華中野戰軍撤圍星夜北上，與山東野戰軍共同保衛淮陰。然而被動局面已難扭轉，國軍連下淮陰、淮安等

城，基本上控制了運河地區。淮陰是共軍蘇皖根據地的首府。連官修軍史都不得不承認，失去這一戰略要地，“為爾後在這一戰場上的交通運輸、兵力轉移等增加了許多困難，整個華中形勢日趨嚴重”。[172]

類似地，8 月 9 日，毛澤東要晉冀魯豫野戰軍打出外線，去“佔領汴徐線及豫東、淮北十餘城，並殲敵二至三個旅”[173]。劉鄧奉命南下，以傷亡五千餘人的代價，一度攻佔了虞城至開封之間的隴海路以及以南的部份地域包括虞城、通許、杞縣等五個縣城[174]。令毛澤東喜出望外，當即致電“慶祝你們佔領隴海路大勝利”，要他們在“隴海作戰完結後整頓隊勢，第二步應即奪取陳留、通許、杞縣、睢縣、寧陵、商丘、太康、柘城、鹿邑、亳縣等城，威脅新黃河”，“爭取半月以上時間佔領豫東全境（主要的）及渦河流域，推遲主力決戰時間。”[175]

可惜國軍利用鐵路迅速運兵，東西夾擊共軍。劉伯承部不但沒能在半月內佔領豫東全境及渦河流域，就連既有戰果都無法保有，被迫撤回隴海線以北。據國軍稱是“傷亡慘重，開始向北潰退”[176]。只是在撤回根據地後，劉採用誘敵深入的老套路，將國軍誘入預選戰場，才取得了定陶戰役的勝利。[177]

然而這些挫敗，比起忠實執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晉察冀軍區還真算不了什麼。晉察冀是共軍在華北建立的最早最大的根據地，與晉冀魯豫兵力差不多，不但宿將甚多，有聶榮臻、羅瑞卿、耿彪、楊得志、楊成武、程子華等人，都是老資格紅軍將領，而且區內“頑軍”早在抗戰期間就被共軍“反磨擦”差不多磨光了。內戰爆發後共軍大舉破路，國府無法運兵入晉，因此共軍擁有數量優勢，又從佔領熱察的蘇軍手上獲得大量日本武器，以致在保衛張家口時能用汽車運兵（見下）。與只有五萬兵力，

面對十幾萬國軍的粟裕率領的華中野戰軍完全是兩回事，要消滅不善用兵的閻老西的單薄兵力，指顧間事耳。

然而毛澤東軍事思想卻創造了奇跡。前文已經介紹了，毛給晉察冀與晉綏軍區的基本任務是保衛地方與奪取三路四城。其作戰步驟是，第一步，以晉綏軍區主力部隊和晉察冀軍區一部進行晉北戰役，奪取同蒲路北段諸城，割斷太原與大同的聯繫；晉察冀軍區主力部隊則留置冀東作戰。第二步，以晉察冀、晉綏軍區主力奪取大同，以一部兵力阻擊北平之敵前進。第三步，視情況發展進行平漢戰役，首先奪取平漢路北段，並相機攻佔石家莊、保定等城，然後再奪取正太路和太原。[178]

根據毛的指示，還在國共和談期間，賀龍部便破壞和平，於6 月 19 日突然進攻碩縣，發動了晉西戰役。23 日，毛又指示他們“必須於最近期間攻取懷仁、岱岳、山陰、寧武、應縣、繁峙、代縣、崞縣、原平、忻縣、五台、定襄，然後相機奪取大同”[179]。據此，晉西野戰軍在攻佔碩縣後，又繼續攻佔了寧武、繁峙和崞縣，接著去攻打忻縣，卻兩攻忻縣未克，只好改為以小部兵力圍困，主力撤回休整。

接下來便是晉察冀與晉綏軍區合力攻打大同的第二步。大同此時已成孤城，國軍只能靠空運補充兵力與糧彈。7 月 31 日，共軍發動對大同周圍據點的攻擊，大同戰役開始。8 月 10 日，鑒於大同危急，而國府又無法派兵入山西，蔣中正將大同劃歸第12 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管轄。9 月 3 日，傅作義用“圍魏救趙”之計，從陶林派兵突襲位於大同北面的集寧。他兵分三路，一路進攻大同西北方向的涼城，一路向集寧正西方向進攻，藉以迷惑敵人，主攻集寧的三個師卻經平綏鐵路（北平至歸綏，歸綏即今

日之呼和浩特，當時為綏遠省省會）以北的火石壩秘密東進。8日，攻城部隊於到達集寧西北地區隱蔽集結。

共軍大同前線指揮部果然中計，以為傅部主力可能沿鐵路進攻，或是沿著公路由涼城、新堂進攻豐鎮。毛更是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他告訴部下，大同戰役的可能結局就只有“大同敵有固守頑抗與突圍西竄兩種可能”，卻未料到國軍有增援解圍的可能，甚至還交代部下：“如大同敵全部突圍西竄，則不要攔阻，讓其竄至離城數十里時殲滅之。”[180] 好像因極度恐懼拼命奔逃，以致口鼻噴血倒地而死的，一定只會是國軍（見後）。

遲至 8 日晚，共軍才知道傅作義部東進，主力慌忙趕去援救集寧，並於次日電告毛澤東。毛於 10 日電令張宗遜、羅瑞卿：“速令楊得志部四個團開到集寧西南地區作為最後決勝之用。”“殲敵方法最好將我主力突入敵後，由西向東打”[181]，居然認定傅軍只會從西南方向來，要楊得志部開到集寧西南，去斷從集寧西北發起進攻的傅軍的後路。

9 月 10 日，傅軍三個師開始猛攻集寧，攻佔了城西和城北臥虎山等外圍陣地。這時共軍主力相繼趕到，與城內共軍夾擊傅軍。傅軍賈勇殺入集寧城。此時傅軍援軍第 101 師從西面趕來增援，攻佔了大腦包山陣地。大同前線指揮部乃調轉主力先去打援軍。集寧城下的傅軍趁機恢復了臥虎山、天門山等陣地，並進攻小腦包山，策應 101 師。此後傅軍兩個師又陸續趕到，向共軍陣地猛攻。共軍四面受敵，只好狼狽潰逃。傅軍攻克集寧。集寧既失，大同北面有了屏障，共軍只好撤圍。[182]

此乃中國戰史上少見的光輝戰例。它與共軍的人海戰術不同。共軍雖在戰略上以少擊眾，但在戰術上從來都是以眾暴寡，多仗地利人和，以數倍兵力打伏擊，與《三國演義》上的計謀差

不多。而此役在戰略上和戰術上都是以寡勝眾，以弱勝強。按兵法，傅作義本無勝算：兵力太少，又是長途奔襲，敵軍以逸待勞，還擁有優勢兵力，其所以一擊成功，靠的完全是兵法所謂“攻敵所必救”、“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從運用傳統韜略的角度來看，中國近現代戰史上，大概也就只有傅作義一個真正的名將。

戰後傅作義致電毛澤東，譴責中共背信棄義發動內戰，勸其停止內戰，參與和平建國，促進憲政，聲稱：“在這次戰役中，你們擺在戰場的屍體，至少在二萬人以上，我們流著眼淚，已經將他們掩埋了。你們在潰退途中，因恐怖國軍追擊，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者比比皆是。”[183] 官修軍史則連提都沒提共軍傷亡人數，估計是零傷亡。死的是否有傅作義說的那麼多，那麼慘，還待史家落實。但集寧大捷對共軍的士氣打擊確實很沉重。它扭轉了山西的危局，使得胡宗南部得以從山西脫身出來，去進攻陝甘寧。尤其是在傅作義奇襲張家口之後，老傅在共軍眼中簡直就成了隋朝小兒心目中的麻叔謀。直到 1949 年 2 月 23 日，毛澤東還致電聶榮臻、蕭克等人，要他們堅決克服幹部中怕傅作義的錯誤思想。[184]

因為集中兵力打大同，原駐承德的共軍 1 縱隊抽走，留下地方部隊“保衛地方”，冀東門戶洞開。國軍於是輕取承德，使得張家口暴露在集寧國軍與承德國軍兩面夾擊的威脅下。9 月 17 日，聶榮臻等人致電中共中央軍委，提出因有遭到兩面夾擊的危險，在敵人進攻張家口時只進行掩護戰鬥，不作堅守。毛於次日覆電，聲稱“打破此種進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批評他們“若預先即決定不打，則將喪失可打之機，對於軍心士氣亦很不

利。”好在毛還是吸取了死守四平的教訓，同意“張家口應秘密進行疏散，準備於必要時放棄之”[185]。

偉大統帥既然發了話，聶榮臻等人當然只能凜遵無違。不幸的是，他們在集寧吃了大虧還沒學乖，於是再次料敵錯誤，判斷國軍的主攻方向將是東線平綏鐵路東段之康莊、懷來地區，西線國軍可能經興和或沿平綏路進攻，與東線國軍會師於柴溝堡地區。最要命的是，他們估計在東線國軍攻下懷來之前，西線國軍不會輕易東進，因此把主力放在東面的懷來、延慶地區；在西線只將一個縱隊配置在張家口以西的柴溝堡、陽高一線，準備在那兒迎擊東進的傅軍。

殊不料老傅根本不從西面來，而是從共軍做夢也想不到的北面來。他乘共軍與西進國軍在懷來以東激戰時，派一個師冒充主力，虛張聲勢向大同、陽高前進，揚言要向平綏路東南張家口進攻。為造成大軍調動的錯覺，讓共軍細作幫他傳遞那假情報，他令那師士兵白天登上火車，大搖大擺地南下，晚上又悄悄開回原地下車，次日再大搖大擺地上車，如此循環運輸下去。與此同時，他卻令 4 個步兵師和 1 個騎兵師從集寧附近秘密出發，經尚義秘密奔襲張家口北面的張北。10 月 8 日，當傅軍進到尚義、大清溝一帶時，共軍還睡在鼓裡，以為只是小股敵軍竄擾，只派出一個騎兵旅去殲滅該敵。此時傅部騎兵直插張北，該城只有一個步兵連和騎兵連防守，傅軍騎兵迅速突入城內，隨即擊敗了乘汽車趕來的軍區警備團。傅軍後續部隊到達張北後，即向張家口前進，在狼窩溝擊潰阻擊的共軍教導旅。至此，張家口以北已無險可守。共軍只好於 11 日從該城狼狽撤退[186]。共軍逃得極度慌亂，大批輜重來不及運走，晉察冀的共軍因此連冬裝都沒有，糧草也落在傅軍手中，啼饑號寒，苦不堪言。

不難看出，傅作義用兵很像韓信，其韜略遠超共軍的所謂名將粟裕、林彪與劉伯承。後者之所以成名，靠的主要還是集體發展出來的新式戰略戰術，並非本人的軍事才能。連共諜郭汝瑰都不能不承認：

> “傅作義在國共和談破裂前夕，曾奉蔣介石令，一舉襲佔張家口，並主動進攻遵化，喜峰口一帶解放軍根據地。這在內戰戰火紛飛，蔣軍處處失利的情況下，傅作義竟能改變蔣軍在華北的處境顯然是國民黨將領中不可多得的將才，於是得任華北‘剿匪’總司令，而且深得蔣介石的信賴。關於華北作戰事宜，除訓令指示企圖、方針外，悉由傅作義全權主持，不干涉其作戰部署。”

郭汝瑰還說，蔣介石對傅作義信任到這種地步，就連他在平津戰役前夕作出的戰略部署，事前也不報告國防部[187]。只怕所謂“天子門生”們也無此殊遇。

老傅的幾次輝煌勝利，極大地打擊了共軍。據官修軍史，全面內戰爆發時，晉冀魯豫總兵力為 27 萬，晉察冀為 24 萬。一年後，晉冀魯豫總兵力升至 42 萬人，其中野戰軍為 28 萬人。而晉察冀總兵力卻降為 19.4 萬人，其中野戰軍 8.5 萬餘人[188]。因為一系列挫敗，晉察冀野戰軍始終未能像劉鄧野戰軍那樣，成長為一支主力大軍。可見忠實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能造出什麼奇跡來。

這挫敗之所以發生，在我看來，是傅作義遠比毛澤東、聶榮臻等人善於用兵。大同前線指揮官張宗遜犯下的錯誤，固然是導致共軍慘敗的直接原因，但他說的也很對，毛制定的根本戰略，決定了這類戰役必然失敗：

> “當時我軍正處於由抗日遊擊戰向運動戰過渡的階段，不少部隊剛由遊擊隊編成，戰鬥力不強，打運動戰尚不成熟，就打大規模的攻堅戰，是很勉強的。”[189]

大同戰役還算是內線戰役。在當時的條件下，讓此前游而不擊的共軍去攻堅，都還落得如此下場，到外線去打石家莊、保定與太原，還能有什麽好結果？有點常識的人都該知道，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去外線攻堅非常危險：頓兵堅城之下，等於主動扔掉自己神出鬼沒的運動戰優勢，暴露自己的位置，吸引敵人聚殲。想出這種餿招的人來，腦子實在不是那麽正常。

2、“三軍挺進中原”

如上所述，從發動內戰那天起，毛便決定採取戰略進攻方針，“敵進我進”，打到外線去。只是因為公開發動內戰不得人心，他才決定“先在內線打幾仗”，而就是這戰略方針的改變，使得共軍硬實力獲得了極大增長。但到了 1947 年 8、9 月間，因為連年戰禍毀了中國經濟，民怨沸騰，國民黨統治不穩，毛覺得可以扔掉“自衛”面具了，於是決定“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同時“以一部份主力和廣大地方部隊繼續在內線作戰，殲滅內線敵人，收復失地。”[190]

在具體實施中，它逐漸演變成了所謂“三軍挺進中原”，亦即陳賡、謝富治縱隊離開晉冀魯豫根據地挺進豫西，劉鄧大軍南渡黃河、淮河，千里躍進大別山，去那兒開闢根據地，而陳粟大

軍分為東西兩個兵團，東兵團在內線保衛膠東根據地，西兵團脫離根據地南下，開闢豫皖蘇根據地。據官修軍史說：“劉鄧、陳粟、陳謝三軍挺進中原，是刺入蔣介石胸膛的三把尖刀。三軍以‘品’字形陣勢配合作戰，機動殲敵，創建中原解放區，調動重點進攻陝北、山東的國民黨軍主力回援，以此策應內線解放軍作戰，改變整個戰局。”[191]

這段抒情散文讀上去倒很過癮，可惜並非史實。陳謝縱隊出動攻擊豫西策應陝北倒確有道理：首先，陝北當時頗危急，需要援軍。毛本來想調到陳謝縱隊陝北去直接參戰，但陝北地瘠人貧，無法養活多兵，於是決定讓該縱隊挺進豫西，如此則既能策應陝北共軍，又能讓大軍就食豫西[192]。當年紅軍三個方面軍會師前，張國燾、徐向前就提過類似建議，但毛拒絕聽取，硬逼兩個方面軍擠進陝北，險些餓死凍死了三軍。這次他總算記住了教訓，因而值得肯定。其次，陳謝縱隊不過是一支偏師，並非大野戰軍。根據粟裕同志的經驗，跳出外線的難度要小得多（詳見下）。即使全軍覆沒，對大局也不會造成災難性後果。第三，陳謝的作戰地域臨近陝北，確實能起到策應陝北共軍的作用。

但讓其他兩個大軍尤其是劉鄧大軍“下決心不要後方，以半個月行程，直出大別山，佔領大別山為中心的數十縣，肅清民團，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吸引敵人向我進攻打運動戰”[193]，就完全是昏招了。在決戰關頭，突然令一支強大的野戰軍退出戰場，扔下後方與重武器，打到千里之外去創建根據地。即使損失為零，此舉也蠢不可言：當時需要的是集中兵力消滅國軍主力，並不是分兵去從頭創建根據地，後者並不能消滅敵人。毛蠢到看不出來，只要消滅了國軍主力，自可以大軍席捲廣大地域，正如後來大軍過江後並不必“分兵以發動群眾”，從頭去一點點創建

根據地一般。將野戰軍抽去忙那些不急之務，說明毛不懂“抓主要矛盾”，蓄意減輕對敵威脅，等於犯了資敵罪。毛澤東這個戰略決策，非但沒有達到戰略目的，還使得兩支野戰軍都遭受挫敗，推遲了中共奪權戰爭勝利。

毛澤東為何會犯此錯誤？這是因為他缺乏抽象思維能力，終生是個狹隘經驗主義者，只知抱著既往成功經驗不放，卻不知道取得那些成功的前提。他看不到，中共之所以能在十年內戰與抗戰中創建根據地，根本原因是中共並非當時統治者的主要作戰對象。在紅軍時代，蔣介石的主要對手是軍閥而非中共。在抗戰中，日本人的主要乃至唯一的作戰對象是國軍。因此，無論是國府還是日本人，打擊共軍都是斷續的，在打擊時也只會動用一小部份兵力。這就為中共建立根據地提供了足夠的空間與時間。

但“解放戰爭”就不再如此了。中共成了國府唯一的作戰對象，其打擊是持續與全力以赴的。於是中共就再無可能沿用老套路，以“分兵發動群眾”的方式建立根據地。這道理連白癡都想得過來：國軍再不會因為什麼蔣桂戰爭、中原大戰、一二八抗戰、長城抗戰等等停止圍剿，給中共以分兵擴張的餘裕。當此之際，獲得新根據地的方式就只能是以主力消滅敵軍，奪取國府的地盤。因此，消滅敵人才是當務之急，才是擴大地盤的前提。

另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共軍已經有了龐大的地盤、雄厚的兵力與可觀的武備，已能以大兵團運動戰方式消滅敵軍。此時共軍應該以根據地為永久性戰爭基地，以其為依托，向國統區推進，而不是放棄己方的動員優勢，遠離根據地去外線作戰，尤其要避免讓大兵團淪為無後方流動作戰的客軍。這教訓粟裕同志已經從親身經歷中體會到了：

> “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中，敵強我弱，我軍被逼到被動地位，常常有個走得了走不了的問題，在走的過程中吃了大虧，也不罕見。走，一支小遊擊隊還好辦，一個大兵團卻不好辦。好幾個縱隊，敵人天天咬住尾巴，被迫打掩護戰、撤退戰、遭遇戰，部隊得不到休息，糧食得不到供應，彈藥得不到補充，傷病員得不到安置，士氣也受影響。我五個縱隊進入魯西南的處境就是這樣。”[194]

這本是常識問題，可奇怪的是毛澤東沒有常識。他那隧道眼就只能看見內線作戰會破壞自己的根據地。於是用直線思維得出結論：既然你能來破壞我，我又為何不能去破壞你？打到你的地域去，不就能把戰禍引到你那邊去了麼？而且，我下決心不要後方，上你那邊去搶，豈不是既減輕了根據地人民的負擔，又削弱了敵人？這就是他在電令華東野戰軍挺進魯西南時說的話：

> “全軍一切將士，都應迅速建立無後方作戰的思想，人員、糧食、彈藥、被服，一切從敵軍、敵區取給，準備在連續作戰之後縮編部隊，準備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個旅，而戰鬥意志越打越頑強（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虜兵即俘即補，重炮不要帶去，不要怕後方被敵切斷，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漢以東進軍。”[195]

這人思路之奇特，正常人實難理解：不要重武器，不惜大量減員，付出如此沉重代價，為的到底是什麼？就爲了去淮河以北、平漢以東建立根據地？可大軍走了，誰來保衛已有的根據地？是從頭建立根據地容易，還是在已有根據地基礎上擴張容易？而且，丟了重炮，大量減員，失去戰勝敵軍的把握，那根據地又該如何建？有如以這種笨辦法去擴大地盤，不如依托現有根據地，利用已有重炮與雄厚兵力，大量消滅敵軍。敵軍消滅後，

佔領那片地域又有何難？即使要在外線打，也得在家門口打，戰役間隙可以回家休息。若是跑得遠遠的，就連個坐下來休息的“屁股”都沒有了。毛怎麼連他上井岡山前就學會的那課都記不住？

如張國燾所說，毛的“思維有時也會走到很離奇的境界，甚至流露神話式的言論”，令人啼笑皆非。他教劉鄧怎麼在外線獲取軍糧就是生動例證：

> “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辦法所得不多，名譽又壞，在我方建立政權以前，仍應暫時利用國民黨下層機構及稅收機關（在我黨有力人員監督指揮之下），以大體上的累進方法徵糧，惟免除赤貧人口負擔，方能解決大軍給養。”[196]

像長征那樣靠沿途搶劫獲取軍糧，還不光是個名譽很壞的問題，對十幾萬大軍來說，它根本就不可行。但毛的替代方案更不實際：軍隊一旦進入外線，必然處於不停的流動作戰之中，怎麼還可能去派糧派捐？“國民黨下層機構及稅收機關”跑了怎麼辦？您這是讓大軍去打仗呢，還是讓他們去收稅？

這戰略方針實在太蠢，因此陳、粟、劉、鄧都反對。他們都“主張仍在內線作戰，爾後有依托地向國民黨統治區域推進”[197]。這才是更實際、更有效的擴大根據地的主張。在當時的情勢下更是如此。

其時國軍正重點進攻山東，目的是奪取沿海口岸，切斷共軍的“國際交通線”，堵死從旅大源源運到山東港口的軍火供應。保住這條供給線對共軍極為重要。而且，此前兩軍都獲得大勝：陳粟在孟良崮戰役中消滅了國軍 3.2 萬餘人，劉鄧在魯西南戰役中消滅了國軍 5.6 萬人[198]。兩軍彼此鄰近，可以密切配合作戰，又有根據地為依托，不難擴大戰果，粉碎國軍進攻，不但能保住

膠東根據地，還能在勝利後乘勢推進，赤化整個山東。是以劉鄧“打電報給軍委，說趁勢還能在晉冀魯豫地區繼續殲滅一些敵人，吸引和牽制更多的敵人，形勢很好啊”。[199]

然而毛卻給出他們不得不服從的理由：

> “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已面告陳賡），如陳謝及劉鄧不能在兩個月內以自己有效行動調動胡軍一部，協助陝北打開局面，致陝北不能支持，則兩個月後胡軍主力可能東調，你們困難亦將增加。”[200]

此話若非毛故意用情感訛詐方式逼迫劉鄧從命，便只能是他頭腦昏亂的表現。上面已經說了，陳謝兵出豫西，對陝北確有策應作用。但劉鄧躍進到大別山去，距離太遠，蔣介石只會就近使用兵力，根本不會有分敵之效。事實上，劉鄧南下並未調動胡宗南部，反倒調動了自己（見下）。

我想，驅使毛澤東作出這戰略決策的真正原因，還是他好大喜功，迷醉在“逐鹿中原”的宏大幻景中，喜好“兵出子午谷”一類奇計，又缺乏思維能力，囿於狹隘經驗，看不出上述擴大地盤的正道。再加上他只會用外行的眼光看地圖，據此規劃戰略，因此非但不知道劉鄧大軍此行將通過兵家忌諱的地域，而且大別山根本也就不是理想的戰場，只在外行眼中有軍事價值而已。只是因為共軍已經強大到國軍無法消滅的地步了，這一錯誤決策才沒有招致全局性災難。儘管如此，它仍然使得劉鄧大軍自廢武功，從強大的野戰軍淪為遊擊兵團；使得陳粟大軍一度失利，喪失了膠東根據地。

〇 劉鄧大軍自殘

1）自動解除武裝

從魯西南躍進到大別山，要通過隴海路、渦河、黃泛區、沙河、洪河、汝河與淮河等一系列天然障礙。黃泛區寬達約 20 公里，“區內淤泥遍地，積水淺者沒膝、深處齊腰，路無人罕。又逢盛夏多雨，黃泛區內平日可行人處現在已是泥濘一片，難於下足，車輛通行更難”[201]，這就意味著拋棄重武器與大量減員。大軍被迫將一部份榴彈炮和十輪卡車就地埋藏或炸毀，遠路運來的小米、醋、蔬菜等等都扔下。強渡汝河前，為加快行軍速度，又埋藏和炸毀了一些笨重武器和車輛[202]。鄧小平說：“過黃泛區，真困難啊，重裝備帶不走，只能丟了，所以打淮海戰役的時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203]而華東野戰軍在濟南戰役前即擁有大炮 1174 門[204]。

2）靠奇跡救命

這是小平同志自己說的：

> “過淮河，老天爺幫了一個大忙，能夠徒涉。過去沒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徒涉的，那一次剛漲起來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親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個時候能徒涉，這就非常順利了。”[205]

當時國軍正在後面追擊。前有大河，後有追兵，凶險之至。共軍又自動解除武裝，扔掉了重武器，長途跋涉極度疲勞，根本沒有足夠戰力背水作戰。即使不被全殲，也很可能被打散。正因為知道這巨大的危險，劉伯承才會以全軍統帥之身親自去踩踏。恰好剛剛漲起來的河水突然落下去了，全軍這才涉水而過。更絕的是，全軍剛剛過去，河水又暴漲了。此時國軍追到，無法徒涉，又無船可乘，只能望河興歎。整編 85 師師長吳紹周因嘆道：“共產黨有命，剛剛過去水就漲了。”[206] 概率如此小的事件居然發生了，似乎也只能用天命來解釋。然而若是這小概率事

件不發生，今日官修軍史又該怎麼說？還能是偉大領袖的英明決策麼？難道他如《三國演義》上的諸葛亮一樣，在千里之外便算定了河水的漲落？這完全是毫無必要地置大軍於死地。

3）天時、地利、人和統統不利於己

劉鄧大軍中下層指戰員都是北方人，對南方氣候與食物習慣等等很不適應。平原來的人不適應走山路或田埂小路。山區蚊子與毒蛇多，不少人被蛇咬傷或患上瘧疾，加上不服水土導致的腹瀉、疥瘡等疾病，造成大量非戰鬥減員。最嚴重的還是軍糧問題。大別山地廣人稀，連當地居民的糧食的都無法自給，遑論養活多兵。部隊始終處於飢餓狀態，“糧食都吃不上，油和鹽就更談不到了。缺油少鹽，不少戰士得了夜盲病，一路走一路跌跟頭，摔得鼻青臉腫。再加上初到南方，病號越來越多。”[207]

此外，共軍在該地區也缺乏群眾基礎。共軍此前曾從該地區先後四次撤走：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徐海東的紅 25 軍；高敬亭的新四軍 4 支隊；李先念、鄭位三的中原軍區主力。“這些部隊撤出後，根據地受到國民黨的嚴重破壞。人民群眾受過國民黨的殘酷壓迫，不敢輕易起來同反動派作鬥爭。當劉鄧大軍回到大別山時，雖然少數地方還有一些分散的武裝在堅持鬥爭，但大部份地區已經沒有共產黨組織和活動。要動員、組織人民需要時間。老解放區遠在千里之外，劉鄧大軍原來內線作戰具備的優勢已不存在，而外線作戰尤其是無後方作戰的諸多不便則紛至遝來。千里躍進雖取得出其不意之成功。但長途南征使部隊付出了重裝備大量丟失、傷病員增多、廣大官兵心力憔悴的代價，全軍急需休整、補充。”[208]

但補充兵力卻根本沒有可能。大別山地區曾是國軍敵後抗日根據地，桂系國軍在該地經營了多年，許多官兵在該地區娶妻生

子，根深葉茂。民團、保安隊等組織相當發達。百姓一見共軍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往山裡跑。劉鄧部隊在該地非但喪失了發動、組織、操控人民的軟實力優勢，而且還屢遭民團、保安隊的襲擊。那些人照樣精通“打了就跑”的遊擊戰術，給共軍造成極大困擾。[209]

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大別山地區山深林密，山路崎嶇，既無法養活多兵，更不利於大兵團實施寬大機動，進行大規模殲滅戰，只適於遊擊戰。毛澤東只看見它的地理位置貌似扼長江口岸，威脅武漢九江南京，卻不知道該地區頂多只能發展為遊擊基地，並不能變成主力野戰軍作大規模運動戰的根據地，於是便想當然地指示：“到國民黨區域作戰爭取勝利的關鍵：第一是在善於捕捉戰機，勇敢堅決，多打勝仗；第二是在堅決執行爭取群眾的政策，使廣大群眾獲得利益，站在我軍方面。只要這兩點做到了，我們就勝利了。”[210]

可憐劉鄧大軍勞師遠征，跑到毫無後方支持的大山裡去，令戰士“空著肚子行軍，真是百爪撓心，兩眼發藍”[211]，不但要對付國軍重兵圍剿，還時時遭到地方武裝襲擊，避戰猶恐不及，還怎麼“捕捉戰機，勇敢堅決，多打勝仗”？幾個月前動輒消滅上萬正規國軍的雄師，如今淪落到只能打“土頑”。劉鄧只能號召部隊“力爭打小殲滅戰（一個班也好）”[212]！以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的針挑土方式，何時才能推翻“三座大山”？

劉鄧大軍不但喪失了大量消滅國軍的能力，還連累了友軍。挺進大別山不但未能像毛設想的那樣，將胡宗南部調出陝北，反而調動了自己。劉鄧雖然吸引了國軍數十個旅的兵力，但因喪失了戰力而頻頻遇險，使得陳粟與陳謝兩部不得不放過殲敵機會去

策應救援。1947 年 12 月的所謂“三軍聯合作戰”，就是因為國軍圍剿大別山，劉鄧陷入危境，陳粟與陳謝兩部爲了解救之，不得不大舉出動破路。主力野戰軍放過大規模殲滅戰不打，改去幹本該由地方部隊與民兵幹的活，仿佛又回到了“百團大戰”的遊擊時代。

即令如此，破路仍未起到解救大別山危機的作用。12 月 19 日，粟裕致電劉伯承、鄧小平、中央軍委：“至此刻為止，平漢路已破壞。但敵對大別山之‘清剿’計劃，迄未改變。似擬集中全力，弄垮我大別山後，再轉移兵力，以對付其他地區。因此，我們及陳謝必須長期配合劉鄧行動，直至完全粉碎敵人對大別山之進攻為止。”[213] 說明大別山已經成為三個主力野戰軍的包袱。如毛不下決心，則這包袱還得讓三軍一道長久地揹下去。

因為是被動救援而非主動襲敵，選擇戰場、捕捉戰機的空間和時間都嚴重受限，平漢路戰役便只能以失敗告終。除了粟裕部消滅了整編第三師一個旅、陳謝部消滅該師另一個旅及師部和兵團總部外，該役並未達到預定戰略目的。最後兩部長途奔襲確山縣城失利，“傷亡較大”，粟裕不得不決定撤出戰鬥。陳謝部撤到襄樊一帶，粟裕部撤到沙河以北休整。戰役至此結束。[214]

到最後劉鄧實在撐不下去，只好試圖放下包袱，開動機器。1948 年 1 月 26 日，劉鄧致電中央軍委，謂若無粟、陳兩部的支持，在敵幾個強師壓迫下，劉鄧大軍無法集中兵力作戰。因此，他們建議了三種方案：粟、陳兩部或是按原計劃支援他們，或是至遲在一個月後支援，或三軍各自尋機殲敵。若採用最後一種方案，則“我們野戰軍採取寬大機動，或出淮北，或出漢江、桐柏，其利得多，但大別山要受到很大摧殘。”[215]

到此地步，毛澤東仍然捨不得扔掉那包袱，回電要劉鄧在 3 個月內“分遣堅持，多休息打小仗”。最後竟然想以更大的錯誤來彌補先前的錯誤。他覺得，如大別山根據地不能建立和鞏固，戰略進攻以來獲得的成就將半途而廢，因此令粟裕率七八萬人躍進江南，以“吸引敵二十至三十個回防江南”，減輕大別山方面的壓力。[216]

幸虧毛到最後不知怎的也發現了那雞肋食之無味，於 48 年 2 月 7 日致電劉鄧，要他們考慮轉移[217]。鄧小平兩天後覆電：“我野部隊在大別山內，一時很難打到好杖，輾轉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寬大機動，並利於粟的行動，實屬必要。”[218] 這才算陸續撤出了大別山，結束了那長達半年的自殘活動。

據官修軍史，劉鄧大軍出征時共 12.4 萬餘人。轉出大別山後，據 1948 年 3 月統計，只剩下 5.86 萬人（不包括留在大別山轉為軍區武裝的人員），只有輕重機槍 1518 挺、山炮 23 門，炮彈 1089 發，重迫擊炮 2 門，迫擊炮 74 門、炮彈 5698 發。山、野、榴等重炮均損失了。全體指戰員非常疲勞，亟需休整補充，恢復戰力[219]。而據另外的統計，劉鄧大軍先後進入大別山的兵力（不包括後來開闢江漢和桐柏根據地的兩個縱隊）在 14 萬以上，到 1947 年 11 月底降為 9.1 萬人，除去轉為軍區武裝的兩萬餘人，部隊已減員 3 萬，其中被俘 8000 人[220]。1948 年 2 月轉出大別山時只有 56654 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隊和工作人員 1 萬多人，全軍降為不足 7 萬人[221]。減員過半，堪稱第二支西路軍。毛的蠢動，犯了兵法“百里趨利”大忌，將一支裝備精良、能征慣戰的百戰雄師虐待致殘。

付出了如許代價，最後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大別山根據地根本就沒能建立起來。連小平同志都不能不承認：“原先我們佔領

了二十多個縣城，後來一個也沒有了，野戰軍主力也從大別山轉到淮北去了，這能不能說是勝利呢？我說，這也是勝利了。”[222]那當然是偉大勝利，不過是“精神勝利”，共產黨人從來就不承認失敗，歷來是“反敗為勝”的高手。只是小平同志不知怎的忘記了，他剛剛才告訴過中央，若野戰軍撤走了，“大別山要受到很大摧殘”，更忘記了“插進敵人胸膛的一把尖刀”、“威逼武漢、九江、南京”等等大話。若真是把尖刀，為何不把它扎得更深，而要把它血淋淋（自家的血）地拔出來呢？如偉大統帥當初策劃的那樣，以那兒為跳板再作躍進，直接攻打武漢、九江、南京，當是何等方便？

赫魯曉夫說，斯大林靠看地球儀指揮戰爭，本人對此說法存疑。但毛確實是靠看地圖指揮戰爭，而且是以外行眼光去看地圖，只能看見位置與距離，看不到地形地貌。這才會作出一系列荒謬決策，諸如在草地決定扔掉四方面軍，率五六千人北上穿過大漠逃往蘇聯；令紅一軍團獨力渡過黃河，穿越大漠，“打通蘇聯”，去把上千噸軍火揹回來；令四方面軍在西蘭大道上阻擊西進的中央軍；令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裡就地建立根據地；令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令四野入關後先攻佔塘沽，以阻斷國軍的海上逃路，等等。這些全都是他不會看地圖的鐵證，可就是這麼一個軍事外行，被我黨造成了戰無不勝、算無遺策的戰神！

當然，作戰必須看地圖。但指揮員用的都是局部的戰場地圖，一般是五萬分之一或十萬分之一（即 1 公分相當於 500 米或 1000 米）的比例尺。若是在全國地圖上挑選戰略決戰戰場，那比例尺必然很小，無法顯示局部的地形地貌。那陣子非但沒有 Google Earth 一類名堂，當時中國的地理測繪能力又極差，謬誤百出。隨便找本民國時代出的地圖冊，立即便可洞見這事實。就

連軍用戰場地圖都常有重大錯誤或遺漏。陳雲同志在莫斯科彙報時就說："由於軍用地圖上的位置常常標錯，我們常常走進死路而被迫走回頭路。有一個地方，我們打了 3 天，才走了 4 公里。"[223] 又如據官修軍史，陳謝部與粟裕部合攻確山縣時，用的是繳獲的國軍地圖，漏畫了全城制高點，於是兩部都未攻打。國軍即憑藉該高地頑強抵抗，守住了確山城[224]。在這種情況下，靠全國地圖去策劃全局戰略，也只有毛澤東那種大無畏的外行才能幹出來。

〇"反攻反攻，丟掉山東"

前文已經說過，山東是國軍 1947 年重點進攻的對象。作為共軍的軍事供給基地，它對維持共軍的可持續戰力至為重要。1947 年 5 月間，粟裕部取得了孟良崮戰役勝利。陳粟"準備以七八個月時間，即在一九四七年底以前，集中全部主力在內線各個殲敵"，"因為當時山東還有五十多個縣城在我手中，而且連成一片，膠東、渤海、濱海三個地區還可以回旋，在內線殲敵的條件還是存在的"。[225]

但毛卻於 6 月 29 日致電陳粟等人，為使華東野戰軍配合劉鄧大軍作戰，並徹底打破國民黨對山東的重點進攻，請陳毅等考慮分兵出擊問題，要他們"改取分路出擊其遠後方之方針。其外出兩路之兵力，或以兩個縱隊出魯南，以三個縱隊出魯西亦可"。[226]

此策十分愚蠢：敵強我弱，共軍只能集中兵力消滅敵軍，保衛根據地，才能有戰略後方和給養來源，維持戰爭。即使要分兵去外線作戰，也只能在根據地外圍，攻擊敵軍近後方或側翼的薄弱環節。如此則不但有根據地為依托提供給養，更能有效調動敵軍回援，製造可乘之隙。而且，一旦內線出現戰機，即可隨時轉

入內線作戰。毛卻要令陳粟分路遠出，去打擊敵人的遠後方。給養問題不論，在敵人兵力還能兼顧進攻與防衛時，此舉也不可能有效調動入境敵軍回援。而且，主力離開根據地過遠，就無法策應內線防守部隊，又在陌生地域作戰，減少了取勝機會，於是就有兩頭落空的危險：既無法在外線有效殲敵，根據地又有喪失之虞。而這就是實際發生的事。

陳粟等人決定立即執行毛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方針。一路由葉飛、陶勇率領兩個縱隊越過臨蒙公路向魯南挺進；一路由陳士榘、唐亮率領三個縱隊向魯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進；剩下的四個縱隊與特種兵縱隊則由陳粟率領，在魯中地區與國軍周旋。這就是華野“七月分兵”的開始。據粟裕說，它是在未經充分準備的情況下開始的。從接到軍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到全軍開始行動僅有一天多時間。[227]

如此臨時變計，倉促用兵，當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而且，用十個指頭去按跳蚤，就哪個也按不住。外線的 1 縱圍攻滕縣，10 縱攻擊汶上，3 縱與 8 縱攻擊濟寧，4 縱圍攻鄒縣，都未能攻克。於是這五個縱隊只好在濟寧附近會師，並轉移至魯西南地區。留在內線的四個縱隊也沒有什麼好結果。他們冒著大雨苦戰四天四夜，圍攻駐防南麻地區的國軍整編第 11 師，僅殲敵一個團，因援敵迫近不得不撤圍。接著又冒雨轉攻臨朐的整編第 8 師苦戰五晝夜，僅殲敵一個營，又因援敵迫近不得不撤出。兩仗下來共傷亡 2.1 萬人，據說殲滅國軍 1.4 萬人[228]，其實是敗仗。據粟裕同志說：“在山東內線，南麻、臨朐兩仗未能殲滅敵人，敵人佔領了膠濟線，膠東地區有被敵人佔領的危險。膠東是我華東地區的重要後方物資基地，且有數萬傷病員、家屬安置在那裡，

如一旦被敵佔領，對民心、士氣、物資補給都將帶來嚴重影響。”[229]

此後陳粟決定自己去指揮進入魯西南外線的五個縱隊，將內線的五個縱隊留給譚震林、許世友等人指揮。毛覆電稱讚此決定“極為正確”，要他們“克服部隊中轉回內線之情緒，學習劉、鄧向外線英勇奮鬥精神，克服一切困難，堅持在淮河以北、黃河以南廣大區域行動，絕對不可有渡黃河北返或運河東返老根據地長期休整之思想。”[230] 8 月 27 日，他更電令陳粟，謂敵大軍向劉鄧追擊，情況異常緊迫。要他們率兩個縱隊和炮縱星夜兼程前進，不惜疲勞，不要休息，不要補充，立即南渡，大舉越隴海路向淮河以北前進，殲滅與抓住幾部敵人，直接援助劉鄧。次日他又致電陳粟，要他們在九、十月內打開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漢路以東、運河以西之廣大局面，大量殲敵，並在渤海、冀南建立補給中心，則侵入膠東之敵必難持久。否則兩頭失踏，劉鄧亦難在南邊立腳，於大局不利。[231]

這種命令完全喪失了理智：要部隊不休息、不要補充，星夜兼程前進，在兩個月內征服如此廣大的地域，還要大量殲敵，同時還要在渤海、冀南建立補給中心。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天下哪有這種事？難道他不知道疲卒毫無戰鬥力？這倒頗有後來令全民連日連夜不睡覺，通宵奮戰大煉鋼鐵的味道。

此時華野外線兵團已疲勞已極。據粟裕同志說：“我軍七月初進入魯西南，一個多月以來，我們沒有打過一個像樣的仗，我第十縱隊又被迫退到黃河以北休整”，“進入魯西南的五個縱隊，離開根據地，經過一個月的連續行軍作戰，十分疲勞。部隊在齊腰或齊膝的大水中和泥濘的道路上行動。作戰、機動和補給都十分困難。非戰鬥減員也很嚴重。第一、第四縱隊傷亡各約五

千人，非戰鬥減員亦各約五千人。第三縱隊第七、第九師都縮編為兩個團，第一縱隊所屬三個師除第二師多轄一個地方團外，其餘只轄一個團，第十縱隊亦傷亡近兩千人。這五個縱隊的實力大減。”“部隊思想比較混亂，對已經開始的全國大反攻形勢產生懷疑。如有的說，‘反攻是被迫的，是被敵人逐出了山東’。有的說，‘反攻、反攻，丟掉山東’。部分指揮員對於無後方條件下作戰缺乏信心。”更難聽的話他沒有記下來。當時的幹部發牢騷說：“運動戰、運動戰，只運不戰。我走弧形，敵走直線，敵人走一，我們走二，晝夜不停，疲勞不堪。”“這樣下去，只有拖死，與其拖死，不如打死。”[232]

然而毛仍然無情驅趕他們。9 月 3 日，他致電陳粟，要他們迅速建立無後方作戰思想，人員給養一律從敵軍敵區取給，不帶重炮，不要怕後方被切斷，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漢以東進軍，並嚴旨切責：“你們各縱過去依賴後方補給心理太重，你們自己亦反映了此種心理，望你們迅速轉變，適應新形勢。軍中要禁絕怕犧牲，怕吃苦，要帶大部隊，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連天等等錯誤思想。”[233]

不管怎樣艱難，陳粟還是抓住追兵虛驕的心理，在 9 月初成功進行了沙土集戰役，殲滅整編第 57 師兩個旅和師部。但此後就再沒能找到戰機。於是陳粟就按毛的指示向豫皖蘇進軍，分兵建立根據地。像劉鄧那樣，不打大軍打“土頑”。粟裕還特地召開前委擴大會，專門“糾正不願打小仗，不願打保安團隊的現象”[234]。這支關內戰績最出色的隊伍，就這樣投閒置散，去忙不急之務。折騰了將近兩個月，又改行當工兵，去破隴海路。接著又為了援救劉鄧去破平漢路。不過，據說豫皖蘇根據地也與大別山根據地一樣建立起來了。

只是這“根據地”仍無法起到讓部隊休養生息的作用。11 月 20 日，陳粟報告中央軍委：“部隊南下後，脫離後方，無休息整頓，連續作戰，艱苦疲勞，情緒受影響，打了幾個勝仗後逐漸好轉。但部隊水土不服，患南方疾病多，且缺乏藥物治療，傷病員安置無安全保障等困難嚴重存在，從而影響指戰員決心與信心。”[235] 由此可見，在此類“根據地”內，竟然連安置傷病員都沒有安全保障。

毛最後也意識到他們呆不下去，於 1948 年 2 月 19 日指示：“如魯西南被敵擾亂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縱等三個縱隊可考慮移至黃河以北，安心休整兩個月。”[236] 粟裕遂派三個縱隊回到老區去休整。劉鄧大軍從大別山撤出後，退到豫皖蘇“根據地”去休整，發現豫皖蘇地區“至今毫無建樹，也沒有幹部，對今後大軍供應已無辦法。而沙河北岸已有災民二百餘萬。”[237]這就是“三軍挺進中原，建立根據地”的真相。

華野外線兵團進軍魯西南以後越走越遠，再也不可能策應留在山東根據地的內線兵團。而這挺進中原的壯舉並沒能像毛預想的那樣調動國軍回救。國軍仍然大舉進攻膠東，保衛根據地的責任就落在內線兵團身上。在這種情況下，毛還讓內線兵團分兵，聲稱“只要許（世友）譚（震林）率三個縱隊位於外線（諸城一帶），尋機打一二個小勝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敵即不敢向膠東深入，膠東大部至少一部即可保全。”[238] 然而國軍並未不敢深入，照樣向膠東內地和沿海進攻，相繼攻佔龍口、蓬萊、煙台、膠縣、高密、平度、昌邑、掖縣、榮成、棲霞、招遠、龍口、黃縣、福山、牟平、諸城等 15 座城鎮。只是蔣介石再次輕敵，認為佔領延安、佔領沂蒙山區和封鎖共軍海上交通路線的三

大戰略任務都已經實現，剿匪軍事隨之告一段落，從膠東撤走部隊，共軍才在萊陽反擊成功，恢復了部份地域。[239]

但總的來說，“反攻反攻，丟掉山東”的基本評價並不錯。若不是外線兵團遠走高飛、勞而無功地去忙那些無益之事，則國軍的進攻未必不能打破，大部膠東根據地也不至丟失。若華野能集中兵力打幾個大的殲滅戰，在粉碎國軍進攻後還能趁勢反攻，擴大既有根據地。如此獲得的地盤因為與老區毗連，可以從老區派大量幹部過去經營，就不會像大別山或豫皖蘇“根據地”那樣徒有虛名。

這完全是可能的：華野內線兵團只是原來兵力的一半，以後這一半兵力又一分為二，1/4 在外線作戰，攻擊敵人的近後方，1/4 在內線阻擊。然而就這一半兵力，還成功地發起了萊陽戰役，奪回了部份失地。如華野兵團“七月分兵”後外線兵團不遠出，取得的戰果絕不止此。若已經挺進到魯西南的劉鄧大軍不再南下，而是在鄰近地域作戰。以華野全軍在內線，劉鄧大軍在外線，彼此配合作戰，則完全可以粉碎國軍對山東的進攻，並趁勢席捲毛念念不忘的平漢路以東、黃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廣大地域。那麼，不但毛垂涎的中原可以以更小的代價獲取，劉鄧大軍也不至於被虐致殘。

當然，比起劉鄧大軍來，華野算是幸運的了，不但沒有損失重武器，內線兵團還打了幾個殲滅戰，戰力有所增長。其所以如此，一是毛派給他們的任務沒有劉鄧那麼偉大，二是陳粟沒有嚴格按毛的旨意辦事，不曾不要重炮，不要後方，不惜大量減員，只顧往前挺進，因而走得不是很遠。而且，粟裕缺乏“不惜疲勞，不要休息，不要補充”的革命硬骨頭精神，寧肯避戰，也要讓三個縱隊休整[240]，最終蒙毛的恩准，把部隊送到黃河以北去休

整。因而倖免殘廢。歷史再次證明，凡是抵制了或未完全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地方，革命就發展，就勝利，就少受挫折，而凡是不折不扣堅決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地方，革命就失敗，就倒退，就自殘自傷。

（四）粟裕為毛澤東規劃了正確的決戰戰略

將劉鄧大軍虐待致殘後，毛意猶未盡，又準備收拾華野了。1948 年 1 月 27 日，毛澤東決定由粟裕率三個縱隊“渡江南進，執行寬大機動任務”，創建閩浙贛根據地。他認為，以主力一部躍進江南，把戰爭繼續引向國統區的遠後方，“勢將迫使敵人改變部署，可能吸引敵二十至三十個旅回防江南”，要粟裕“以七八萬人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兩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應使休息時間多於行軍作戰時間，以躍進方式分幾個階段達到閩浙贛，使敵人完全處於被動應付地位，防不勝防，疲於奔命。”[241]

渡江南下乃是毛最鍾愛的兵出子午谷式奇計。此前他就醞釀過三次。第一次是 1947 年 7 月 23 日，他在令劉鄧大軍躍進大別山的同時，還命令葉飛、陶勇兩個縱隊“出閩浙贛，創立閩浙贛根據地。”[242] 但兩個月後他又打消了此念。第二次是同年 10 月 15 日，他致電陳粟，要他們六個月後準備派一兩個縱隊出皖浙贛，那時擬由劉鄧派一兩個縱隊出湘鄂贛邊區[243]。但陳粟回電表明有困難，國軍又發動了對大別山的圍剿，毛只好又暫時打消念頭。第三次是同年 12 月 4 日，毛致電劉鄧，要他們在 1948 年 8 月以後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創造湘鄂贛邊區根據地[244]。但這次給粟裕下令可是鄭重其事的，他不但給粟裕發電報，還派陳毅到

濮陽向粟裕、張震等人傳旨，告訴他們毛的意圖是“變江南為中原，變中原為華北”。

粟裕此前就不同意毛的決定，曾與華野外線兵團的主要領導人磋商過，他們都同意他的意見。陳毅傳旨後，他又向陳彙報了自己的想法。陳難以接受，但覺得事關全局，建議他直接向毛報告。華東局饒漱石、康生等人也鼓勵他向中央報告。但粟裕比較謹慎，先向劉鄧作了報告，並畢恭畢敬地請示：“是否正確，請鈞座予以指正。”劉伯承、鄧小平、李先念都支持他的看法。在粟裕向中央軍委報告的同一天，劉鄧致電中央軍委及陳粟，說他們擔心的是過江很少把握，如準備不充分，則以遲出幾個月為好，可以先派多支小部隊去，“如果粟部遲出，加入中原作戰，爭取在半後方作戰情況下多消滅些敵人，而後再出，亦屬穩妥，亦可打開中原戰局”[245]。但這不過是在渡江這個具體問題上表示了疑問，並不是粟裕那種關於改變整個戰略的重大建議。

1948 年 4 月 18 日，粟裕給中央軍委發了電報，他先歌頌了一番共軍從轉入外線以來的大好形勢，聲稱此舉“粉碎了敵人全面戰略進攻，使我軍轉入了反攻，將戰爭拖向蔣管區，保衛了基本解放區，減少了解放區受戰爭的直接摧殘”，充分肯定“當時我軍不依靠後方，大膽轉入敵後，是完全正確的，是必要的，因此取得了極大的勝利，使敵我形勢完全改變，而且前進了一大步，造成今後向前發展更有利的條件”，隨即指出：“但自去冬迄今，中原地區（包括豫皖蘇及陝豫鄂）戰局已形成疲憊而頻繁的拉鋸形勢，我軍固然予敵人以極大的困難，給敵人的人力物力以極大縮減與損耗，但由於敵人尚擁有相當機動兵力，佔有某些交通線和所有交通中心、戰略要地及運輸工具、技術條件等，在兵力轉運軍需補給上較我軍便利，亦增加我們殲敵困難”。

接下來他痛陳了外線冒險的諸多壞處，著重指出了渡江南下冒險弊多利少，非但達不到調動敵人的目的，還會在江南破壞共軍形象，更會使中原陷入困局：

1、喪失了控制群眾的優勢，大軍無法得到群眾配合，行動不易保密，往往喪失戰機。補給困難，無法安插傷病員，大大影響士氣。而敵軍則無此類問題。

2、在新形勢下，攻堅將成為今後作戰的中心問題，必須裝備與學習使用重武器。但在外線作戰，重裝備無正常補給，不僅不能發揮其作戰能力，且變成了拖累。但如不要重武器，則在敵人築城能力較強的現狀下（敵人四小時即可完成地堡群），不僅難以速決，甚至不可能攻克。近數月來本有許多戰機，但因補給不正常，戰鬥不能速決，在敵各路增援情況下被迫退出戰鬥，既增人員彈藥之消耗，亦復影響部隊情緒，且鼓勵了敵軍士氣。

3、兜圈子雖能疲勞消耗敵人，但造成己方巨大減員（傷病人員無較安定後方，多遭損失或不能歸隊）。同為一萬人的減員，若用於在外線兜圈子，只能疲勞消耗敵人；若用於有後方依托的殲滅戰，則至少可殲滅敵人一個主力師。

4、“新區”（外線）地方工作很難供給大軍糧草。“大兵團在新區運動，最嚴重的事為糧食問題。敵我往返拉鋸，雙方均須尋求大量糧食，形成與民爭食”，只能派“每個連隊每天都向群眾要糧”（搶糧的美稱），“侵犯了群眾利益，更影響到群眾之發動”。“回憶我軍一九四五年在天目山時不足兩萬人，控制縱橫近五百里地區，僅三個月之久，已弄得民窮財盡。在戰鬥最緊張時（孝豐戰鬥）連貧雇農之糧食也取之殆盡，至今在該地人民中尚留下極深刻之不良影響”（共軍的三光政策）。“今後以十萬之眾進入江南山區，渡江固為一極大困難，但糧食補給則是

長期的嚴重問題。此番南去，固可調動敵較多部隊，打亂敵人之深遠後方與推進戰局。但雙方大軍往返拉鋸，直接與民爭食”，必然引起群眾仇恨，“也同樣將自己弄亂”，“這問題可說是我軍南渡後能否完成中央所給任務之關鍵”。

5、南渡估計只能調動五個師及留華南各地之後調旅。無法調動桂系之七師、四十八師以及美械重裝備的五軍及十一師。此四個整編師戰力最強，為中原敵人骨幹，如我軍南進仍未能調動，或未能予該四個師中之一、二個師以殲滅，則中原局勢將成較長期僵持局面。果如是，既難減輕老解放區之負擔，亦難於中原地區得到新的人力物資的補充，甚至會使這一地區遭到殘酷的摧殘而難於恢復，造成今後更大困難。

最後他提出了正確的決戰戰略：

1、以劉鄧、陳謝及華野主力，依托後方（隴海路北）作戰，以便得到足夠的炮彈、炸藥、手榴彈之補給，發揮現有裝備之作用而大量殲滅敵人（現在的敵人處於交通便利的中原，如無相當炮火，難於殲滅），並求得雨季與夏收前在中原地區（主要戰場應在豫皖蘇及淮北路東、路西）打幾個較大殲滅仗，使這一地區人民能較安定的得以夏收，才能使我軍爾後有糧食等供應與得到人民積極的支援。

2、對敵人近後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蘇中南線直到江邊），則派出數路強有力的遊擊兵團（每路多則一旅，少則一個團）輾轉廣泛遊擊，配合正面主力作戰，協助該區地武遊擊堅持。

3、對敵人深遠後方（長江南蘇浙皖贛閩及湘黔），則派出多路堅強的遠殖遊擊隊（每路至多三千人，少則一千人即可），配成犄角之勢，採取廣大範圍輾轉遊擊。軍事上以殲滅敵人地方

武裝，摧毀其反動政權，破壞敵人兵源、糧源及其他戰爭資源為任務；政治上則宣傳黨的政策，發動與團結廣大人民並支持人民的民變運動。這樣，派出的遠征遊擊隊因人數不多，不致與民爭食，且可與當地人民武裝融台而更大的發揮人民武裝的力量，二者如能結合得好，是能大量的調動敵人的。

4、以上三線武裝部隊（野戰軍主力、遊擊兵團及遠征遊擊隊），依戰局之進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則可能使戰局得到較快與較大之發展。[246]

粟裕上疏的重大意義，不僅僅是防止了老毛又一步危害大局的臭棋，更在於它治好了毛的兩大痼疾：從井岡山帶下來的“狹隘經驗論”以及因天性喜歡冒險而患上的“外線病”，首次教會了毛如何從事新條件下的革命戰爭。通過自身經驗，他實際上告訴毛，井岡山那朱老聾子“打圈子”的辦法，或許有助於小股土匪逃生，但對於大兵團來說，它只能疲憊敵人，消滅自己；大兵團深入敵後只能靠搶劫為生，招來人民的仇視。而且，在共軍已經擁有強大兵力並獲得大量重武器、而敵人築堡技術大為改進的新條件下，要奪取廣大地域，攻堅將成為今後作戰的中心問題。因此，正確的方法是充分利用現有重武器，組成強大的野戰兵團，大規模殲滅敵軍，而這就意味著依托後方作戰，不能扔下根據地，去敵人的遠後方作徒勞無益的冒險，使得本可用於大量殲敵的重武器反而成了拖累。他更告訴該毛如何從戰略角度來看兵力的運用問題，提出了依不同縱深配置運用不同兵力的正確方略：主力依托後方正面作戰，最大限度利用現有裝備，以強大火力大量殲滅敵人，爭取在中原打幾個大殲滅戰；近後方則以偏師襲擾，配合正面主力作戰；遠後方則派出多股小遊擊隊破壞搗

亂，消滅地方部隊和民團，那樣比派大兵團深入敵後能更有效地調動敵軍兵力。

一言以蔽之，對中共勝利而言，粟裕此疏具有劃時代意義。它結束了毛濃重的山大王遊擊習氣，在理論上指出了共軍從遊擊隊真正轉變為正規軍的正道，使得中共奪權戰爭從此徹底脫離了傳統農民戰爭模式，走上了近現代西式戰爭的道路。

粟裕此人深通韜晦之道，其實那封電報並沒把話說透。幾十年後他才在回憶錄裡補足：

> “我覺得，從全局來看，為了改變中原戰局，進而協同全國企圖各戰場底打敗蔣介石，中原和華東我軍勢必還要同國民黨軍進行幾次大的較量，打幾個大殲滅戰，盡可能多地把敵人主力消滅在長江以北。從當時的情況看，要打大殲滅戰，從三個縱隊渡江南進是做不到的。在山東戰場，由於敵人堅固設防地域較多，我作戰地區比較狹窄，暫時也難以打大的殲滅戰。而在中原黃淮地區，我軍打大殲滅戰的條件卻正在成熟。這是因為：第一，中原地區廣闊，有三條鐵路幹線和一些大中城市，敵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的很多很重。敵人雖然在這個地區集結了重兵，但需要較多的兵力擔負防守任務，因而機動兵力就相對地少了。如果我軍在這一地區積極行動，必能調動敵人，為我軍殲敵於運動之中創造戰機。第二，中原黃淮地區地勢平坦，交通發達，固然便於敵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於我軍實施廣泛的機動作戰，尤其是在鐵路和公路被我破壞的情況下，敵人重裝備的機動將受到很大限制。我軍則可以充分發揮徒步行軍能力強的長處，迅速集中兵力，從四面八方分進合擊敵人，實現戰役上的速戰速決。第三，中原黃淮地區雖屬外線，但背靠山東和晉冀魯

> 豫老解放區，可以及時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別是可以較好地保障傷病員的安置和治療。同時，我軍挺進外線作戰已有數月，已經渡過最困難的時期，並已逐漸適應和掌握了外線作戰的規律。第四，經過我三路大軍挺進中原後的艱苦鬥爭，新解放區黨的工作和政權工作已有初步基礎，軍民關係逐漸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戰爭的力量。所有這些，都是我軍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大殲滅戰的有利條件。”[247]

這其實是說，若按毛的方針行事，非但不可能打大殲滅戰，而且“三軍挺進中原”所吃的苦將盡付東流。不但中原的困局無法打破，而且“新區”很可能反水，等於白折騰了一番。不如因勢利導，將錯就錯，利用毛此前冒險決策的副產物（諸如草草經營的“新區”，以及爲了營救劉鄧大軍而發動兩個野戰軍破路成果），選定中原為主戰場，背靠老區，盡可能將國軍主力消滅在江北。

但這些話他當然不能在電報裡說出來。惟其如此，此疏才達到了目的，沒有像彭德懷 11 年後上書那樣為他引來災難。再加上他行文畢恭畢敬，口口聲聲稱“職”，又充分肯定了毛先前的偉大戰略決策。他本人又非元老，不過是個後起之秀，不可能構成對毛的挑戰。於是毛為該疏打動，將粟裕召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去。1948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7 日，毛在河北阜平城南莊主持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了粟裕的意見和建議，決定華野 3 個縱隊暫不渡江南進，留在中原，集中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大仗，盡可能將國軍主力消滅在長江以北。[248]

在將新決策電告劉鄧及華東局時，毛再典型不過地表現了他文過飾非、死不認錯的領袖特色，聲稱：“將戰爭引向長江以南，使江淮河漢地區之敵容易被我軍逐一解決，正如去年秋季以

後將戰爭引向江淮河漢，使山東、蘇北、豫北、晉南、陝北地區之敵容易被我軍解決一樣，這是正確的堅定不移的方針。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難。目前粟裕兵團（一、四、六縱）的任務，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開闢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則四個月多則八個月內，該兵團，加上其他三個縱隊，在汴徐線南北地區，以殲滅五軍等部五六個至十一二個正規旅為目標，完成準備渡江之任務。”[249]

話雖如此，在粟裕上疏後，毛從此放棄了以孤軍深入敵後開闢根據地的奇計。共軍以後的大戰略，完全是按照粟裕的建議展開的。共軍組成了強大野戰兵團，依托隴海路以北的後方，充分發揮重炮火力，舉行了一系列的大規模殲滅戰，打下了許多大城市。最後又在粟裕的建議下，由華野與中野兩個主力野戰軍聯手舉行了淮海戰役，將國軍主力盡殲於江北，使得國府再無兵力保衛江南，只能坐視共軍揮鞭而定江南。在我看來，粟裕敦促毛澤東作出這一戰略思想的根本改變，才是中共奪權戰爭的轉折點。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他替毛撥正船頭，指引航向，使得革命從困局走向勝利。他才是比毛更稱職、更有眼光的戰略家，儘管他提出的也只不過是常識而已。

（五）三大戰役

在消滅國軍主力的三大戰役中，似乎只有遼瀋戰役與單純的軍事學有關，其他兩大戰役都是陰謀詭計的偉大勝利。

在我看來，平津戰役是軍事家傅作義與陰謀家毛澤東的角力。縱是老傅用兵如神，也乖乖喝了老毛的洗腳水。

平津戰役開始前，共軍主力分別在東北、西北和華中，與國軍三個重兵集團交戰，唯獨華北兵力空虛，而華北剿總擁有 60 餘萬大軍。儘管中央軍約占總兵力的 3/4，總司令卻是傅作義。連朱德都不得不承認：“在作戰上他（傅作義——引者注）學了日本人的一些辦法，也學了我們的一套，在華北方面他的力量現在遠比我們大，所以傅作義是比較不好打的。”[250] 事實上，該部成了國軍唯一能抽調出來的戰略預備隊。若傅作義放棄平津，率部南撤，必將給正在全力進行淮海戰役的華野與中野以沉重打擊，而共軍根本沒有兵力阻擋傅集團南撤。

蔣介石看到了這一點，在 11 月初即要傅作義南撤。但傅作義雖然備受蔣介石破格倚重，卻私心太重。他在此前已決定與中共媾和，於是便向蔣介石吹噓，說整個華北尚有大軍六十多萬，自己又有守城經驗，能戰能守，華北大好河山豈能放棄，云云[251]。蔣介石最後決定“暫守平津，控制海口”，要傅作義“以一部兵力守備北平，以主力確保津沽”，“在華北不能支持時，就經海上南撤”，此後又兩次派軍政要員赴北平，要他以主力保守塘沽、大沽和天津，確實控制海口。[252]

但蔣信任傅，傅不信任蔣。他狡兔三窟，一面秘密與中共接洽，一面也準備逃路。他不想南撤，因此根本沒按蔣的指示部署兵力，卻把自己的嫡系放在北平以西，以確保和談不成時逃往老巢綏遠；把中央軍放在北平以東，為他堵住入關共軍[253]。11 月 17 日，他通過共諜女兒傅冬菊，秘密致電中共，要求和談[254]，夢想共產黨會讓他保留自己的軍隊，與他成立聯合政府。

此舉立即給了毛一個誘騙傅作義上鉤、藉此將國軍抑留在平津一帶的機會。毛次日即致電林彪等人，告知此事，說“我們擬利用此機會穩定傅作義不走，以便迅速解決中央軍”，要東野提

前入關，“突然包圍唐山、塘沽、天津三處敵人，不使逃跑，並爭取使中央軍不戰投降”[255]。與此同時，他故意不給傅作義回答。傅冬菊奉父命與地下黨負責人約好面談的時間地點，屆時卻無人如約而來[256]。老傅不知道，毛定下的“基本方針是徹底解除他們的武裝”，“決不允許這些人保存其反動力量，談判和分化只是達到殲滅他們的一種手段”。傅“本人可赦免戰犯罪，保存私人財產，住在北平或外邊由他自定。他的部屬的生命家財不予侵犯，除此之外，不能再允許給他什麼東西，亦不能稱為起義”[257]。毛要的是無條件投降，而且還必須是顏面掃地的投降，哪會容他與中共平等談判？

就在傅作義傻等之際，四野在 12 月中下旬大舉入關，將國軍“圍而不打，隔而不圍”，然後才開始與傅作義談判，老傅這才發現，雙方條件相差太遠，因而心存悔意。於是共軍打下了新保安與張家口，更將天津圍得嚴嚴實實，斷了傅作義的東西逃路，毛這才指示林彪：“新保安、張家口之敵被殲以後，傅作義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屬之地位已經起了變化，只有在此時，才能真正談得上我們和傅作義拉攏並使傅部爲我所用。”[258]

老傅還在猶豫，共軍又打下了天津，示之以威。至此，傅作法自斃：逃無法逃，戰也不能戰，最後只好裹脅全軍（包括由他指揮的中央軍），以“出城改編”的名義 “體面”投降。然而我黨連一點面子都不給他留。就在共軍舉行入城式的當天，《人民日報》還按照毛的指示，特地發表了毛於此前以林彪、羅榮桓的名義寫的命令傅作義投降的最後通牒，儘管傅作義根本沒見到那通牒就同意投降了[259]。那通牒歷數傅的“反革命罪行”，無情折辱之，以出集寧戰敗的惡氣。等打了三百殺威棒後，毛又以寬

宏大量的仁君面目出場，與他談話，於是世上就此又多了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患者。

淮海戰役實際上是由中共特工打贏的，或者說是由國防部故意輸掉的。每個環節都是間諜戰的偉大勝利，堪稱舉世無雙，應該列入間諜戰史而不是軍事史。

首先是任命總司令的問題。蔣介石本想讓較有才能的白崇禧去統一指揮。白開頭也答應了，但共諜劉斐卻去對他說，大局業已崩壞，國軍連淮河、長江都守不住，於是白又不幹了，致使指揮這次最關鍵的決戰的重任落在劉峙那庸才身上[260]。

其次是作戰計劃一改再改。杜聿明原來提出，趁二野與三野分離，以黃維兵團牽制住二野，集中徐州部隊的主力，殲滅三野的一部份。蔣介石批准了該計劃。杜正要執行，蔣介石卻又令杜停止，改行“徐蚌會戰”計劃，擬將國軍主力撤至蚌埠附近，與共軍決戰。此後國防部又將計劃改為放棄隴海路上所有城市，將數十萬大軍配置在徐州與蚌埠之間的鐵路兩側，擺下兩百多公里的一字長蛇陣。然而因為郭汝瑰搗鬼，就連這背時計劃也未實施。待到共軍主動發動淮海戰役時，國軍的主力仍未撤到蚌埠附近，使共軍得以各個擊破。[261]

第三，國軍的五個兵團，都是共諜送掉的。黃百韜早在 10 月間就準確判斷出，共軍已集結主力，準備首先消滅他的兵團，向劉峙建議撤至徐州，但郭汝瑰要他“集結兵力準備應戰”。遲至 11 月 5 日，蔣介石才批准他向徐州撤退。黃明知為時已晚，剛要行動，國防部又命令他們掩護第 44 軍從海州西撤。於是黃只好在新安鎮等了兩天。他知道厄運業已註定，於 6 日晚讓奉命視察部隊的李以劻把他的遺言帶給劉峙，說：“作戰廳郭汝瑰、許朗軒、張宗良等人作出這樣計劃來，使人傷心。大軍作戰，隨

時變卦，動搖軍心，影響士氣，難道他們不知道麼？”果然， 8日，中共臥底張克俠、何基灃即按華野計劃，在賈汪、台兒莊地區裹脅部眾 2.3 萬人“起義”，在國軍的運河防線上撕開缺口。華野北線 3 個縱隊得以迅速渡河南進，將黃百韜兵團包圍於碾莊圩。郭汝瑰說動蔣介石，要黃百韜死守碾莊圩，導致他的兵團被全殲，黃本人自殺。孫元良過後對李以劻說：“消滅黃百韜兵團的是國防部，不是陳毅，黃百韜之死也是如此。”[262]

黃維兵團也是如此。該兵團奉命從駐馬店經指定路線赴援徐州，在蒙城受到共軍主力阻擊。黃維乃向國防部提出，轉到懷遠附近渡過渦河，出敵不意攻擊宿縣，國防部卻不批准，要他們按原計劃攻擊前進，就此鑽進共軍的袋形陣地。黃維決心撤出戰鬥，但被共軍發覺追上，被圍於雙堆集地區，最後被殲。[263]

杜聿明指揮的孫元良、邱清泉、李彌三個兵團斷送得更冤枉。黃百韜兵團被殲後，郭汝瑰說動蔣介石，要徐州主力與李延年兵團會合後西進，以解黃維之圍。杜聿明早就懷疑郭汝瑰了，於是瞞著他秘密告訴蔣介石與顧祝同，應將徐州三個兵團秘密撤到淮河附近，再向敵軍攻擊。蔣介石同意了。三個兵團於是順利撤出徐州。粟裕一時不知國軍動向，非常焦急。但杜聿明快撤到永城時，郭汝瑰、劉斐等人卻得知了杜部的動向，對蔣介石說杜聿明消極避戰，只知逃跑。蔣聽了讒言，向杜聿明空投了親筆信，要他們停止向永城前進，轉向濉溪口攻擊前進，去解救黃維，語氣非常嚴厲，杜聿明只得照辦。於是三個兵團 30 多萬人便乖乖開入共軍重圍，被圍三十多天後，在突圍時被殲滅。[264]

因此，三大戰役中，只有遼瀋戰役才算是取得了軍事意義上的勝利。而且，它的基本構想，尤其最關鍵的打錦州那步棋，是毛澤東看出來的，在這點上，他的戰略眼光高出了林彪。

遼瀋戰役前，林彪因為打長春失利，又無法圍城打援，曾計劃主力南下，攻佔錦州以西的北寧線各點，再轉進平承、平綏、平保線作戰，配合晉察冀野戰軍奪取北平、平津[265]。很明顯，這是個餿主意：將供給線從北滿延伸到關內去，很容易被關內國軍截斷。即使國軍沒有這主動攻擊精神，也能乘機輕鬆打通沈錦線，與關內國軍夾擊共軍，至不濟也能全師撤出東北。毛看出了這一點，因此要東野打錦州。在中央軍委與東總反復討論後，東總才確定了打錦州的決心[266]。但在攻克錦西北面重鎮義縣之後，東總又因獲悉國軍增兵葫蘆口而一度動搖打錦州的決心，想回師北上去打長春。相對打錦州而言，此計更穩妥，但相應的紅利也就小得多：打長春沒有遭受夾擊的風險，但其實是替老蔣卸包袱，促使他下定決心將國軍趁機從瀋陽撤走。在正常情況下，它應該是比較穩健的決策。即使用毛自己的話來說，也是“不打無把握之仗”。當然，後人只看結果，難免覺得打錦州更英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打錦州確實需要大膽的想像力。在這點上，毛和中央軍委的貢獻是主要的，不能抹煞。

但這步棋也是險棋，它充分體現了毛好大喜功，喜歡豪賭的脾性。雖然風險沒有當初在草地決定北上的大，但其成功也是許多計劃外因素促成的。該役不是共軍贏了，而是國軍輸了。如果國軍將帥沒在每一步都主動積極配合共軍作戰，如果不是戰場指揮官的畏縮怯戰，那即使共軍不遭受重大打擊，打錦州也未必能達到將國軍堵在關外全殲的目標。

1948 年 2 月間，衛立煌出任東北行轅代主任，為黨政軍一把手。他上任後所採戰略，就是“烏龜戰術”（蔣介石語）或“以不變應萬變”：“不管解放軍打到什麼地方，如解放新立屯、盤山、遼陽、法庫、鞍山等城市，守軍部隊長如何告急，蔣

介石再三電令他派兵去解各地守軍的圍，他總是把主力集中在瀋陽附近不動。並說：‘共軍的目的和戰術是圍城打援，我們不能上共軍的圈套。’”他明知長春得不到救濟而且空投所耗甚鉅，卻既不去援救被困的孤城長春，也不同意他們突圍。[267]

衛立煌此論也不是毫無道理。前已述及，林彪一度想打到關內去，就是因為東北國軍全面轉入防禦，將主要兵力集結於幾個大城市堅守不出，使得共軍沒有了以運動戰殲敵的機會。林彪因此改用圍城打援的辦法。只是圍攻長春多時都無援可打，東野因此處於無大仗可打的失業狀況[268]。但衛立煌這背時戰略，等於聽任共軍將中小城市的國軍逐一消滅，並慢性痶斃大城市的守軍。當時關內外陸路交通業已斷絕，瀋陽與長春的糧餉彈藥全靠空運，而國軍每天只能出動四架飛機，完全是杯水車薪，且運費幾達全部軍費二分之一。[269]

因此，老蔣雖然當初不想放棄東北，但到了 3 月底也實在撐不下去了。於是他要衛立煌將瀋陽主力撤到錦州去，在瀋陽和長春只留少數部隊防守。但當時沈錦線已被共軍切斷，衛立煌以部隊殘破，尚未完成整訓，不可能打到錦州，反而有被消滅的危險為由，堅決反對，並說東北部隊補給由他負責，請美國顧問團幫助運輸。蔣於是同意了，但還是要他待部隊整訓完畢後主動出擊，打通沈錦線。[270]

衛立煌此說，我看多半是推搪老蔣的鬼話：美國顧問巴大維早就建議從東北撤出，而且杜魯門政府極度討厭蔣介石和國府，早就決定撒手不管。就算巴大維與衛的私交再好，也絕無可能不經政府批准，便動用大量軍機進行大規模空運。更何況要靠空運長期維持長春與瀋陽兩大城市的軍民生活，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二戰後斯大林封鎖西柏林，美國人動用了大量飛機才堅持下來，

因此傳為史詩般佳話，但杜魯門對中國根本就不會這麼做。更何況巴大維自己就反對美國大規模捲入中國事務，不久就被召回美國[271]。衛立煌的承諾根本也就沒兌現。

然而老蔣也就同意了，不僅如此，當老蔣規定的打通沈錦線的限期到後，衛立煌仍按兵不動。老蔣指揮不動他，便只好繞過他去直接指揮其下屬，先要范漢傑從錦州東進打通沈錦線，後要廖耀湘成立機動兵團，讓他把主力從瀋陽帶到錦州去。這些舉措非但未見效，反倒在他們之間製造了矛盾。對打通沈錦線，廖耀湘與衛立煌有著同樣的顧慮。從瀋陽西進去錦州，需要連續橫渡三條自北向南入海的河：遼河、新開河與繞陽河。國軍是半機械化部隊，重武器較多，渡河不便，隊伍必然拉得很長，首尾難以相顧。共軍若南向側擊，即可將此長龍攔腰節節截斷，分別包圍殲滅。這也並非杞憂，後來廖耀湘的西進兵團確實是如此斷送的。廖主張趁遼南空虛，一舉攻佔營口，再從海道撤退。但衛立煌不同意，廖無奈只好運動省主席們去遊說衛，卻引起了衛的極大反感。將帥們從 3 月底一直吵到遼瀋戰役開始，國軍都毫無動作。[272]

9 月 12 日，共軍揭開遼瀋戰役序幕，在北寧線發動攻勢。下旬，共軍相繼攻佔錦州周圍的重要據點，徹底切斷了北寧線，將錦州團團圍住[273]。蔣介石準確判斷出共軍的意圖，立即作出對策：東西對進，與共軍決戰。但衛立煌卻堅持共軍是圍城打援，不可上當，要錦西出兵去解圍，而自己卻按兵不動。老蔣指揮不動他，卻也無法撤他的職，遑論軍法從事，只能先後請傅作義、杜聿明去指揮，但兩人都不想接那爛攤子，於是老蔣又想以直接指揮廖耀湘架空衛立煌，但廖的意見其實與衛一致，都主張由錦西出動解圍，兩軍會合後再東渡大凌河，然後瀋陽的主力再出遼

西，與之會師，打通京瀋線，於是衛、廖就這麼隔岸觀火拖下去。

錦州北面的重要拱衛據點義縣告急時，老蔣派參謀總長顧祝同去逼衛立煌出兵，但衛就是不肯出動，甚至要與顧祝同打賭，說軍隊一旦去援救錦州就會全軍覆沒。雙方吵到面紅耳赤，衛仍不為所動。廖耀湘乃提出個替代方案：先南下經遼中攻佔營口，再北出大窪、盤山，經溝幫子出擊錦州，如此則不必連續橫渡三條河流，因此實際上比直接西進還快，而且右翼側不受敵人威脅。如果錦州不能支持，救援不及，亦可從營口海道安全撤出全部主力。但蔣介石否決了此案，堅持要衛火速西進。衛仍然抗命不從。

10 月 1 日，義縣淪陷，衛立煌仍按兵不動。老蔣於 10 月 2 日親飛瀋陽催促，逼衛無效，只好召見廖耀湘。他給廖的任務是，率瀋陽主力出新立屯地區，再經阜新直出錦州、義縣，與葫蘆島東進部隊東西夾擊共軍，在錦州地區進行戰略決戰，給東北共軍一個毀滅性打擊。但廖指出，瀋陽距錦州較遠，而錦西距錦州較近，因此東西對進的軍隊不能同時打擊敵軍。共軍就會集中主力先打破由瀋陽西進的主力，因此，他認為瀋陽主力應先集中於新民、彰武地區完成準備，等到錦、葫兩地軍隊會師之後，再東西對進，夾擊共軍。蔣本來的計劃也就是這樣，因為錦西與錦州兩地駐軍只相隔 30 多公里，他覺得錦西援軍打到錦州沒什麼問題，於是就同意了。但他告訴廖耀湘，在從東北撤退前，一定要與東北共軍決戰，給它一個大打擊，否則華北就有問題。[274]

這說明蔣還是有點戰略眼光的，知道東北丟了華北也就完了。那計劃也貌似有理：共軍的供給線從北滿延伸過來，攻佔了

錦州北面的阜新，不但能切斷共軍運輸線，而且能以拊敵背而解義縣、錦州之圍。

可惜該計劃卻是國防部作戰廳廳長共諜郭汝瑰制定的[275]，於是廖耀湘才下達西進命令，偉大統帥毛主席便已明見萬里，連國軍將領的怯戰心理都洞若觀火，於同日指出："大連所得瀋陽援錦部署是很膽怯的，該部署表示極怕我攻錦打援戰法，採取逐步推進看勢行事的謹慎方針。因此你們不要顧慮該敵難於阻止，大約有九個師左右即夠阻止該敵。"[276] 情報來自大連，倒也有趣——莫非蘇聯人也參與傳遞情報？不管怎樣，林彪原來準備用四個縱隊阻擊瀋陽援敵，在得知情報後便只投入了三個縱隊，主力佈防在阜新一帶，專等廖耀湘上那兒去。

然而廖耀湘卻沒有按蔣介石的指示直出新立屯，進攻阜新。出動之前，他先命令駐新民的部隊北向彰武，西向新立屯、黑山、大虎山方向搜索，發現共軍第六縱隊位於彰武及其以東地區，但新立屯、黑山、大虎山守軍兵力不大。他於是命令北向進攻彰武。11 日，廖軍攻佔彰武。13 日，國軍炸斷了彰武鐵橋，切斷了共軍的補給線。但這並不能解錦州之圍，因為共軍已在南面囤積了大量物資，而且很快就建立了通遼－開魯－赤峰－北票的第二條運輸線。12 日，廖聽到錦西的東進兵團在進攻塔山受阻時，即不顧國防部"加強攻擊兵力，放膽西進"嚴令，決定只以一部份兵力前出新立屯、黑山地區，將主力控置於彰武、新開河以東地區觀望局勢。如錦州陷落就經遼中撤往營口。蔣介石得知後，於 13 日電令廖耀湘親率主力星夜渡新開河進佔新立屯，否則軍法從事。15 日，廖兵團兩個軍進佔新立屯，一個軍進至黑山以東，都未遇到什麼抵抗。廖準備 17 日主力向阜新躍進，而以一個軍攻佔黑山。

但 16 日錦州就陷落了。廖立即命令部隊停止行動。當天，杜聿明到新民與他會商，廖提出經黑山、大虎山向大窪、營口撤退，杜也同意了。次日，廖去見衛立煌，衛也同意退營口，萬不得已時則退回瀋陽。18 日，廖已經準備好一切，擬於次日拂曉攻擊黑山。但在這關鍵時刻，衛立煌卻和蔣在北平爭論不休，直到 20 日晚，蔣才批准退營口。21 日，廖兵團才開始進攻黑山，卻受到堅強阻擊。戰至 23 日，廖判斷黑山守軍是在固守以待攻打錦州的主力回師，決定次日向營口撤退。衛立煌批准了這一決定，當晚廖下令向營口撤退，一面繼續攻擊黑山，以掩護撤退部隊通過黑山與繞陽河之間的狹窄地帶。但向營口前進的先頭部隊在遭到共軍阻擊時，軍長鄭庭芨既未使用主力攻擊，也未繼續向翼側搜索，卻讓大軍停下來，並直接報告衛立煌。衛竟要他向瀋陽撤退。於是“退營口之路被關閉了”。與此同時，由黑山經新民退往瀋陽的公路也被截斷。26 日晨，廖兵團總部被攻擊，全軍陷入混亂，但廖仍然想向營口攻擊。可當晚衛立煌卻來電，要他迅速退回瀋陽。廖只好從命。此後他最擔心的噩夢果然成真：在東撤過程中，部隊被共軍團團圍住，節節截斷，分割包圍予以殲滅。西進兵團 12 個師十幾萬人被殲，廖本人也作了俘虜。[277]

由上簡介可知，共軍的輝煌勝利，主要是國軍將帥一系列錯誤造成的，其中衛立煌立功厥偉。如果沒有他從頭到尾幫忙，共軍就算打贏了，也無可能全殲關外國軍。無怪乎坊間紛傳衛立煌是共諜，連《新華網》上的文章都說，衛立煌是“遼瀋戰役最大的臥底”[278]。但在找到直接證據之前，史家還是只能採用無罪推定，假設他只是因顢頇無能而在客觀上幫了共軍的忙，充其量只能說，間接證據提示他有通共嫌疑。

老衛的貢獻實在太多，首先是主張堅守東北。若他在 3 月底便同意老蔣的命令，趁共軍還在北滿時迅速打通沈錦線，將部隊撤至錦州，或是他同意廖耀湘從營口撤退的建議，將部隊撤回關內，則史書上也就沒有了遼瀋戰役，國軍也就不會莫名其妙地斷送最精銳的部隊。

老衛第二個貢獻，也是他最大的貢獻，則是促成了錦州國軍被全殲。他反對出援錦州，理由是怕共軍圍城打援。因為遼西地形不利於軍隊東西向運動，而利於南北向運動，因此瀋陽部隊一出去就會遭到共軍南向側擊，被分割包圍。這觀點與廖耀湘相同，因此可以解釋為判斷失誤。但錦州告急，證明共軍並非圍城打援而是阻援攻城，輔助兵力是正面向東阻擊，並非南向伏擊，他就再沒理由反對迅速西進了。但這仍可解釋為他與廖耀湘一樣，只是怯戰畏縮。無法解釋的是，他竟會不准范漢傑突圍。

共軍攻克義縣次日，蔣介石曾派飛機空投密信給守衛錦州的范漢傑，問他能否撤到錦西，范向蔣建議，以錦州吸引住共軍主力，同時由瀋陽和關內派出兩個有力兵團，在錦州地區與共軍決戰。然而范漢傑堅持到 10 月 6 日，國軍東進與西進兵團仍未出發，錦州處於危急之中。他乃於當晚決定將部隊撤到錦西，與關內部隊會合後夾擊塔山共軍，然後回師北上，會合瀋陽兵團與錦州共軍決戰。但他報告衛立煌後，衛立即來電話下令：“錦州堅守不動，以免影響全局。”[279] 於是老范只好堅持下去，直到錦州陷落。

范漢傑此策，實為死裡逃生、反敗為勝的高招。須知在錦州與錦西的國軍相距僅 30 多公里。負責在塔山阻擊錦西援軍的共軍於 6 日至 8 日才佔領陣地、搶修工事。而共軍圍攻錦州的主要兵力與炮兵都部署在東、南、北三個方向，西面只放了一個縱

隊，作為總預備隊，恰是兵力最薄弱之處[280]。國軍向西突圍並無困難，突出去後與錦西國軍夾攻塔山共軍。共軍在塔山搶修的防禦工事都是對著西面的，此時猝不及防，腹背受敵，即使不被全殲，也要遭受重創。兩軍會師後再沿沈錦線東進。此舉完全出乎共軍意料之外，必然要打亂共軍部署，使之陷入混亂，有可能全線撤退。國軍抓住一部殲滅之，乘勝再佔錦州城，休整後與西進兵團東西對進，則鹿死誰手正未可知。就算不能大獲全勝，起碼錦州的 12 萬國軍可保全身而退。

衛立煌為何要反對此案？根本就找不出任何理由。上文已經介紹過，他和廖都主張國軍先由錦西出援錦州，與錦州部隊會合後再東渡大凌河，與瀋陽的西進兵團夾擊共軍。范漢傑的突圍方案，在本質上與他的主張毫無兩樣，他為何還要反對？范漢傑同時也報告了老蔣，老蔣竟然不批准，只知道傻傻地命令錦西國軍強攻塔山，也實在笨得可以。

老衛的第三個貢獻，乃是促成了西進兵團在遼西的覆滅。上文已經介紹過了，錦州陷落後，廖耀湘在耽誤了 5-7 天後，終於獲准南下從營口逃生。但先頭部隊在受到共軍攻擊時，軍長鄭庭芨請示衛立煌，他竟然下令讓鄭撤往瀋陽，這完全是拆廖耀湘的臺。其實共軍當時在南線兵力並不雄厚，廖耀湘若不改初衷，向南攻擊，很有可能打到營口去。但衛立煌又命令廖耀湘退回瀋陽，廖在彷徨無計時聽了他的亂命，才招致全軍覆沒。

廖耀湘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遼西的特殊地形，成了他制定戰役計劃念茲在茲、無時或忘的隱憂，以致他始終為被共軍攔腰側擊、節節截斷的噩夢纏繞，因而“未謀勝，先謀敗”，“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老是想著退路，謹慎到了畏葸怯懦的地步，瞻前顧後，顧慮重重，屢次錯失戎機。

共軍的意圖是阻援攻城。雖然共軍為此投入了三個縱隊，但阻擊瀋陽來的援軍比阻擊錦西來的難。錦西與錦州之間地域狹窄，共軍只需守住塔山即可，而瀋陽與錦州相距約 200 公里。共軍很難確定援軍來自哪個方向。因為作戰計劃是郭汝瑰制定的，故共軍把主力放在阜新一帶。據官修軍史，共軍將兩個縱隊放在彰武東北和東南地區，以運動防禦，誘廖兵團向西北和向北前進，以一個縱隊加兩個師在新立屯以東沿繞陽河岸組織防禦，阻止廖兵團向黑山、大虎山方向前進[281]。但前已介紹過，廖耀湘在出發前，曾令新民的駐軍北向彰武，西向新立屯、黑山、大虎山方向搜索，發現共軍第六縱隊位於彰武及其以東地區，但新立屯、黑山、大虎山守軍兵力不大，後來他從彰武南下攻擊新立屯時和黑山時，正面幾乎沒遇到抵抗，只是受到西面的共軍 6 縱的猛烈側擊[282]，說明共軍的主要阻擊兵力確實放在阜新一帶。然而他卻作出錯誤決策，北上去攻彰武。

此舉之無益，被毛看得清清楚楚。在廖攻佔彰武那天，毛即致電東總：“只要不怕切斷補給線，讓敵進佔彰武並非不利，目前數日你們可以不受瀋陽援敵威脅，待錦州打得激烈時，彰武方面之敵回頭援錦，它已失去時間。”[283] 12 日，毛再度致電東總：“沈敵進佔彰武置於無用之地，表示衛立煌想用取巧方法，引我回援，借此以解錦州之圍，不敢直援錦州，避免遠出被殲之危險。”[284]

因為有臥底，毛對廖耀湘的怯戰心理清清楚楚，但他還是高估了廖的鬥志：廖並不是想以此舉吸引攻錦共軍回援，他不過是生怕共軍攻他側背，因此在進攻前先回師試圖去除威脅罷了。若是他不那麼畏縮，當機立斷，命令主力立即南下新立屯，經黑山、大虎山轉進錦州，只留少量兵力監視鉗制彰武一帶的共軍，

則定能將負責阻擊的共軍主力扔在阜新一帶，及時趕到錦州外圍，從後方攻擊攻城共軍。錦州解圍後再繼續西進，與錦西來的援軍夾擊塔山的阻擊部隊，則就算不能給共軍以毀滅性打擊，也必重創共軍，使之陷入被動，最起碼也能解救錦州十幾萬部隊，並救出他自己率領的西進兵團。可惜生怕被共軍南向側擊成了他的偏執情結，這才會去北上進攻彰武，在關鍵時刻置 10 萬雄師於無用之地。

即使在錦州陷落後，他仍可南下黑山，迅速搶佔盤山、大窪一帶，進可以出溝幫子與錦西國軍夾攻共軍，退可以從營口撤出。毛和東總的判斷，都是錦州陷落後國軍必然退回瀋陽。因此曾計劃在攻佔錦州後接著去打錦西、葫蘆島[285]，對東面再不提防。所以，此策完全在共軍意料之外。此時共軍剛攻下錦州，部隊還未休整，廖軍若出其不意從西面進攻。就算無法與錦西的國軍成功會師，也能重創共軍。若最終寡不敵眾，也有營口作為戰略退路。因為那是南向撤退，共軍只能尾追，不能側擊，廖可以使出他最精通的“邊打邊撤”術，取海道全身而退。

據郭汝瑰稱，國防部第三廳副廳長許朗軒 10 月 27 日從瀋陽回到南京後，曾對他說：

> “瀋陽各級指揮官都非常畏縮，初先共軍主力集中阜新方面，防國軍迂迴往援錦州。國軍主力趨新立屯、黑山、實出共軍意外，可惜國軍軍師長們不敢放膽堅決進攻，以至（致）共軍主力有轉用的充裕時間，今共軍主力已集中於半拉門、黑山、打（大）虎山、國軍已無勝算了。”[286]

確實如此。錦州於 16 日陷落後，廖當即下令停止行動。此後一直因蔣介石與衛立煌爭吵而無所事事，直到 21 日（此為廖的回憶，據官修軍史是 23 日）才向黑山發起攻擊，但此前共諜

已經通知共軍，蔣介石在錦州失守後，仍決定錦西、瀋陽兩方援軍按原計劃向錦州前進。於是共軍放棄打錦西的計劃，準備圍殲廖兵團，搶在廖前一天佔領了黑山和大虎山並趕修工事。待到廖兵團發起對黑山進攻時，已經無望突破共軍的阻擊了。[287]

不過，廖耀湘不可能如後人一樣，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在錦州陷落前，不可能想到不應北上去打彰武，而應迅速南下黑山，出擊錦州。他應該做的，是在錦州陷落後迅速南下黑山、大虎山，控制盤山、大窪一帶，將自己置於進可攻，退可守的地步，卻坐待蔣、衛吵出個結果來，因此耽誤了足足 5 天之久（這是他的記憶，按官修軍史應是 7 天）。但這責任還是不在他身上，而是制度問題——國軍將領不像共軍將領那樣，有充分的臨機處置權（西路軍例外）。

廖犯的第二個錯誤，則是在最後的生死關頭不捨命向南殺出一條血路，從營口逃跑，卻聽了衛立煌的亂命，改向瀋陽撤退，正是章回小說所說："豬羊走入屠宰家，一腳腳來尋死路"，走進了他最害怕的夢魘。當然他這麼做也可原諒，據他自己說，當他接到衛立煌的電令，要他立即迅速退回瀋陽時，"我感到恐懼，感到慚愧，因為我退營口的主張現在徹底失敗了。……現在是不是能夠再違反衛立煌的一貫主張和他現在的電令，而一意孤行到底呢？就現地抵抗是否有成功的把握呢？自問也沒有。既然沒有把握，那就只好服從衛立煌的命令。"[288] 因此，責任還在他的上司頭上。

蔣介石當然也作出了貢獻。他最大的問題是指揮不靈，卻又不能毅然壯士斷腕，換掉百般抗命的衛立煌。身為最高統帥，卻被逼得以繞過衛立煌、直接指揮下級指揮官的背時辦法，去推行自己的作戰意圖。如此不但造出無數磨擦與延宕，以致在千鈞一

髮之際居然花了 5-7 天去和衛立煌爭論該怎麼辦，而且並不能防止衛的顛覆活動——如果東北剿總司令換了人，那就未必會禁止范漢傑從錦州撤退，更不會趁廖耀湘處於危難中拆他的臺，令鄭庭芨轉回瀋陽，致使廖逃往營口的安排完全被打亂，最後只好聽了衛的亂命去送死。

蔣介石的第二個錯誤是戰略謀劃不當，過於輕敵，在將領們畏敵如虎、毫無心理準備、更無必勝信心時，強迫他們去進行戰略決戰。他最初作出東西對進的決策倒不錯，但不該拒絕考慮廖一開頭提出的主張，那就是瀋陽主力應由遼中、營口繞至沈錦線上去救援。如此“既可以免受右翼側敵人的威脅，又可以避開三條河流（遼河、新開河、繞陽河）的障礙。從地圖上看，似乎繞遠了些，不如走沈錦線近捷。但實際上，大部隊行動，特別是半機械化部隊行動，如果避開上述障礙，比走那條直線要迅速得多。如果錦州不能支持，救援不及，亦可從營口海道安全撤出全部主力，保證不會遭到任何損失。”據廖的參謀長楊焜說，他被俘後與共軍 6 縱司令員講過這計劃，那人說：“若蔣介石聽廖的話，我們就麻煩多了！蔣真是個名副其實的‘輸送大隊長！’”[289]

當然，國軍無機密可言。若蔣介石聽了廖耀湘的建議，他的作戰廳長仍會及時把這計劃轉給共軍。但共軍即使事先得知也無計可施，蓋其大部隊都在北面，遼南兵力空虛。因此，廖案應該是可行的。而且，在錦州丟失以後，蔣介石還要堅持東西對進就錯了。此時應採廖案，南下經黑山控大窪、盤山、營口，再向北試探攻擊，不行就邊打邊撤，從海上逃生。所以，若是沒有蔣介石、衛立煌等人一門心思的成全，則毛澤東的豪賭就算贏了，也不會贏得那麼乾淨俐落。

四、毛澤東特殊的個人貢獻

綜上所述，毛澤東對所謂“解放戰爭”的最大貢獻，還是在抗戰中使得共軍有了與國民黨爭天下的武力。只有在這點上他才是其他黨魁無法取代的。但在“解放戰爭”/“戡亂戰爭”開始後，他在戰略指導上起的往往是負作用。因此，光從軍事的角度來看，他的角色完全可以由其他人如劉少奇或張聞天取代。若是別人掌舵，沒有他的瞎指揮，共軍犯的錯誤還會更少。但是，毛有個特殊的個人貢獻是他人無法取代的，那不是他有什麼非凡的軍事才能，而是延安整風運動把他造成了神。

毛發動延安整風運動，當然是爲了鞏固個人權位。但不容否認的是，此舉也加強了那個宗教軍隊的戰鬥力。

前文已經反復指出，國際共運實質上是一種宗教運動，共產黨其實是一種邪教組織，其領導的軍隊具有無比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這種意識形態有別於其他世俗政治思想的特點是：它不但允諾信徒們一個極樂世界，更讓他們堅信自己是“替天行道”，是站在“歷史潮流”、“客觀規律”（“天道”的現代表述）一邊，在為人類歷史上最美好、同時也是必勝的正義事業奮鬥。這個宗教優勢在毛上臺前即已存在，但只有延安整風才賦予中共事業以濃厚的東方民間宗教特色，為那摩登邪教的完善化與本土化，提供了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必需要素——一個活著的全知全能的神，救苦救難的大救星。至此，中共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洗去了它的“國際”特色，變得更像其前驅太平天國革命，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軍戰士也變得更像悍勇絕倫的太平軍戰士，從而更符合中國深厚的草根文化傳統，如同希臘神話中站在大地母

親上的安泰一般，獲得了巨大的活力。毋庸贅言，堅信有一個萬能的神在指點他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迷信軍隊，其士氣當然要遠遠高出士兵不知道為何而戰的國軍。這用郭汝瑰的話來說，就是“有主義的部隊必戰勝無主義的部隊”[290]。

毛在黨內絕對權威的確立，也使得中共完成了向政治軍隊的徹底轉變，從 20-30 年代的“群雄黨”，變成了 40 年代的“一人黨”，使得它如同軍隊一樣，只有一個說一不二、下屬必須絕對服從的最高統帥。因此，共軍雖然分為各個“山頭”，散佈於華北、東北各地，但全軍高度統一，各部根據最高統帥的命令密切配合，互相策應，實行了“一元化領導”，使得毛指揮百萬大軍如臂使手，屈伸如意，實行“全國一盤棋”。劉鄧本不同意他那將大軍致殘的亂命，但在申辯後，“毛主席打了個極秘密的電報給劉鄧，寫的是陝北‘甚為困難’。當時我們二話沒說，立即覆電，半個月後行動，躍進到敵人後方去，直出大別山”[291]。

這與紅軍時代可完全是兩回事。紅軍雖不像國軍那樣渙散，各派系之間仍然矛盾重重，毛甚至會幹出坑害友軍的爛事來。前已介紹過，紅軍在草地分裂後，紅一、三軍編成陝甘支隊，政委是毛澤東，司令是彭德懷，副司令是林彪，但公開佈告只用彭德懷和楊尚昆署名。毛還特地交代楊尚昆，這是爲了讓國民黨以為只是三軍團出來了[292]，好讓國府把注意力全放在四方面軍頭上。二、四方面軍北上後，與一方面軍配合作戰。毛卻生怕損耗嫡系實力，令二、四方面軍在南面阻擊西進國軍，掩護一方面軍渡河北上接取軍火，致使二、四方面軍遭受重創。張國燾、徐向前本來擬了個正確的戰役計劃，可彭德懷卻以絕密電報向毛進讒言，說張國燾的目的是四方面軍在黃河、洮河間活動，以迴避胡宗南，使該敵全力對付我一方面軍，破壞打通國際計劃，還反說完

全同意國際指示，云云[293]，引起毛的共鳴。因此，當張國燾再次提出這計劃後，毛根本不予考慮，卻以中央名義明令四方面軍北上[294]，致使寧夏戰役慘敗，三個方面軍還擠進了死地。毛對西路軍就更是冷漠無情。爲了河東紅軍能順利東向突圍，他竟以河西紅軍為誘餌，令他們在永昌建立根據地。此後又生怕西路軍有二心，不給將領以臨機處置權，終致該軍覆滅。

但在延安整風之後，所有的共軍都成了毛的私人隊伍。他的感情就完全不一樣了。劉鄧大軍的老根底是八路軍 129 師，而該師主要是由四方面軍改編而成的，按理說並非毛之嫡系，但此時卻成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途中，情況一度危急。毛為軍委起草致電陳粟：敵大軍向劉鄧追擊，情況異常緊迫，目前幾個星期內是重要關頭。望你們率六縱、十縱、炮縱星夜兼程急進，不惜疲勞，不要休息，不要補充，立即南渡，統一指揮陳（士榘）、唐（亮）、葉（飛）、陶（勇），大舉越隴海路向淮河以北前進，殲滅與抓住幾部敵人，直接援助劉鄧，並請現在即令陳、唐立即向敵八十五師攻擊，以便調動邱清泉回援而殲滅其一部，擊潰其一部。如該敵已過隴海路，陳、唐、葉、陶必須立刻南下追擊，絕對不能讓其第五軍、整編第八十五師南下危害劉鄧[295]。其急切焦慮之心溢於言表，與當年他對西路軍的冷漠態度形成無比鮮明的對比。因此，只有在成了毛的私人隊伍之後，共軍才成了一個高度統一、令行禁止的戰鬥集團，而這一點在共產國際解散、莫斯科停止了對中共的日常指揮後十分重要。

相比之下，在遼瀋戰役中，蔣介石連衛立煌都指揮不動，又不敢罷免，竟然先後想以杜聿明與廖耀湘架空之。而各部常在友軍危急時袖手旁觀。孟良崮戰役中，整編 84 師離被包圍的整編

74 師只有 5 公里，竟會無法突破共軍阻擊，坐視 74 師毀滅[296]；在 1947 年的東北戰爭中，廖耀湘不聽陳誠號令，坐視新五軍覆滅。陳誠拿廖耀湘一點辦法都沒有，只能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在開會時責罵廖耀湘、李濤，兩人都不服氣，抗辯說並未接到陳誠命令。這本非查不清的事，然而竟成了無頭公案。陳誠最後只得引咎自責，說新五軍被消滅是他自己指揮無方，不怪各將領，請總裁按黨紀國法懲辦他。蔣介石便不了了之[297]。這種連起碼軍紀都沒有的軍隊，如何能是共軍那“神兵”之敵？

對中共來說尤其幸運的是，是毛澤東而不是其他人當上了黨魁。毛和其他中共大員的區別是，此人心胸褊狹，痞性十足，品質極差。出於嫉妒心理與名利心，他可以不顧大局胡來一氣，敢於並善於自傷詭詐，以把船弄翻威脅同僚屈服。前已述及，他在第五次圍剿的危急時刻，出於對洋房子先生們的嫉恨，竟然煽動將領對軍令陽奉陰違；在紅軍突破湘江傷亡過半的危難關頭，他竟然忙著秘密串聯顛覆中央領導，借此擠進書記處；在紅軍發生重大戰略爭論時，他生怕張國燾奪去他的權位，不惜捏造兵變謊言，欺騙中央與他一同出逃，造成紅軍分裂。

這些事，其他人包括張國燾在內，都是幹不出來的。他們或多或少還有點大局觀念，講究點共產黨的“責任倫理”。例如博古雖在遵義會議上被毛罷了官，但在張聞天來串連他奪毛的軍權時，他仍爲了避免紅軍分裂而表示不同意；張聞天後來也因為同樣原因，在會理會議上表態支持毛。即使是張國燾也罷，他因被毛等人拋棄，一氣之下另立中央，但在毛指使張浩假傳聖旨，聲稱“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後，他明知去陝北有坐牢的危險[298]，仍然乖乖取消中央的名號北上[299]。哪怕是在西路軍陷入危局時，他還致電西路軍將領，强調：“軍委對西路

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對西路軍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還有過去認爲中央路綫不正確而殘存著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在幹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300]

不難想見，如果毛沒有在黨內確立其不容置疑的元首地位，而是始終鬱鬱不得志，那麼，以他建黨元老之身，在軍隊裡又有著雄厚的潛勢力，將會在黨內形成何等可怕的破壞力，為中共革命事業帶來多大的損失。這種破壞力無人可以望其項背，不管是張國燾還是王明，都不會像他那樣在失意時不顧大局胡來一氣，充其量只會去投奔國府或蘇聯。因此，哪怕從“減去負數”的角度來看，中共讓毛做黨魁也是最明智的選擇。這或許就是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決定倒向毛的原因——鬼怕惡人。

毛成了黨皇兼上帝後對黨的事業的另一個益處，是讓他從強烈的進攻性自卑情結中解放出來，從而有了“明君虛懷納諫”的可能。這是因為黨內即使對戰略有不同意見，那也是以下屬臣工的身份提出來的，不會引起他深重的不安全感發作，從而使得正確意見有了實行的可能。例如粟裕上疏言事，所作建議乃是對全國大戰略的根本改變，按理說不該出自一個方面將領之口。然而因為粟裕在電報中滿口稱“職”，毛也就沒有因他越位而龍顏大怒，反倒將他召到中央去垂詢，過後還加以擢拔，要他任華野的一把手。只是因為粟裕力辭，才讓陳毅保留了個虛職，由粟實際主事[301]。這並非個例，毛在此期的表現，很像古代從諫如流的明君，在給部下的電報中時時要他們提反對意見，讓他們在緊急情況下臨機處置，甚至連用語都與古代皇帝差不多，只是把“朕不遙制”改為“我們不遙制”而已。若他還像過去那樣，時時生怕

他人與之競爭，則同僚提出來的意見無論如何合理，甚至與他的見解相同，他都要堅決反對。

據李德說，毛在與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前，曾對黨魁們提出，在川康交界地區建立一個少數民族國家，紅軍主力以此為根據地，經過青海或甘肅向新疆推進，與蘇聯建立直接聯繫，使蘇聯對中國紅軍的全面援助成為現實。但在會師後，張國燾提出，不要完全放棄川康交界地區的現有根據地，主力部隊可以向青海前進，並從那裡出發，經過新疆與蘇聯建立聯繫。這個建議與毛原來的主張沒有什麼區別，毛澤東卻激烈反對，因為“他知道，在這個問題上政治局委員是站在他一邊的，並希望以此來孤立堅持不同意見的張國燾”[302]。因此，若不是毛當了黨內的上帝，就算是當了一把手，只要同僚們不處於絕對臣服的地位，無論是誰提合理建議，都要被他猜疑為別有用心而加以抵制，因而妨礙中央迅速制定正確決策。

平心而論，對於奪權戰爭來說，這種體制相當合理。在 20-30 年代，中共因為是“群雄黨”，內部還相當“民主”，這才會有上海中央局與瑞金為是否該援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爭論了幾周，以致錯過戰機。毛澤東成為說一不二的黨皇兼上帝後，既能讓下屬臣工發表意見，又能獨斷專行，中央就不會再因變成個辯論俱樂部而貽誤戎機。

從這個角度來看，延安整風造神運動確實增加了中共的戰鬥力。然而沒有毛，也就不會有延安整風。所以，應該說在這方面，毛確實做出了他人不可取代的獨特貢獻。但這到底是不是中共奪權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是否足以抵消他的錯誤指揮對中共革命造成的破壞與干擾，就是見仁見智的事了。

五、美蔣對中共勝出所作的貢獻

（一）萬惡美帝的貢獻

在內戰的醞釀階段，每逢關鍵時刻，美帝便要出手幫助中共。真想不通老毛為何要翻臉罵恩公。看來這是他固有的心理毛病，所以後來才會對赫魯曉夫恩將仇報。

老美幫的第一個大忙，是幫助共軍將領一從窯洞裡鑽出來，立即就能率領大軍，搶在國軍之前去摘桃子。

如前所述，華北共軍自把殘餘“頑軍”逼成皇協軍之後，便再未集中打過仗，基本處於分散狀態。自整風開始後，主要將領們一直在延安被鬥或鬥人（取決於與毛的關係）。蘇聯人出兵後，毛澤東雖然下令全軍投入反攻，但將領們仍在延安。直至 1945 年 8 月 25 日，美軍飛機才把鄧小平、林彪、劉伯承、陳毅、薄—波、膝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志、鄧華、李天佑、江華、聶鶴亭、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張際春、宋時輪、傅秋濤、鄧克明等 20 高幹從延安運到晉東南的黎城縣。9 月 9 日，美軍又把中共晉察冀軍區的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副司令員蕭克、副政委羅瑞卿和劉瀾濤、某主力縱隊司令員鄭維山等另—批軍頭從延安空運到晉東北的靈丘。[303]

有了這批將領的指揮，共軍才能在日本投降後迅速瘋狂擴張，佔據了廣大鄉村和中小城市，並接收了部份日偽軍的武器，擴大了地盤，極大地加強了實力。

老美幫的第二個大忙，就是在客觀上幫助共軍準備全面內戰。前文說過，中共最終戰勝中共的決定性因素，是蘇聯人給了中共必要的硬實力。但蘇聯援助的武器裝備要交到關內共軍手

上，土八路要學會有效地使用它們，轉變為正規軍，都需要時間。因此，若老蔣抗戰結束後接著剿共，則我黨就來不及武裝到牙齒了。於是考慮周密的美國佬又特地製造了為期將近一年的“和平民主新階段”，讓我黨得以不但裝備訓練關外共軍，而且從關外運來大量武器，裝備訓練了關內共軍。

戰後美國先派赫爾利來華，敦促國共雙方和談解決分歧，共同和平建國，後又派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爭端。但他如史迪威、謝偉思等爛人一樣，嫌國府“獨裁”、腐敗、無能，卻被中共的“民主”、“廉潔”、奮發有為打動，因此難免在內心深處偏袒共軍。

馬歇爾認為：“從武器裝備和訓練上說，政府軍也許稍勝一籌”，但“如果人與人比，中共軍隊的戰鬥力要比國軍強。中共每名士兵都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戰，與之相反，國軍的部隊，少校軍官以下的都不知道”。因此，“武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政府軍不可能摧毀中共軍隊”[304]。而且，如果內戰爆發，美國向國府提供大量援助，就有可能引起美蘇在中國的直接對抗。剛結束了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雅不願為中國再捲入戰火。那陣子核武器剛發明不久，軍人們還來不及意識到它改變了傳統的戰爭觀念，導致了“有限戰爭”的問世。因此，馬歇爾有這種擔憂也是很自然的。

既然不能打仗，那就只能國共合作，“和平建國”。可是他根本不懂共產黨人的戰爭與和平觀。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就是消滅“階級敵人”。因此，“和平”不過是沒有硝煙的戰爭。說白了，“和平”是巧取，“戰爭”是豪奪。毛澤東所謂“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都是爲了盡可能壯大自己，消滅敵人。他們根本不相信西式“雙贏”觀念，更沒有起碼的契約精神與信義感，

信奉的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中間道路是沒有的”。試圖與中共和平共處，共存共榮，完全是與虎謀皮。“調處”只可能以失敗告終，而且還只可能兩面不是人。

然而馬帥卻傻傻地試圖完成不可能的事。46 年 1 月的停戰協定是在他調解下簽署的。此後他一度離開中國。就在他於 4 月 18 日重返中國的那天，共軍攻入長春，殲滅國軍 1.8 萬人[305]，國府委任的長春市長作了俘虜。連美國政府都不得不宣稱這是“公然違反停戰協定”[306]。然而馬身為美國政府特使，不去譴責並制止共軍違反協定的行為，卻與中共和民盟共同提出解決方案：“東北民主聯軍”退出長春，國民黨只派行政人員和平接收長春，不得派軍隊進入；同時依據政協決議和整軍方案，談判解決東北問題[307]。可待到國軍反擊、收復了四平和長春後，他又猛捏軟柿子，逼迫蔣介石停火。前已述及，東北長達約半年的停火，使得共軍獲得喘息時間，鞏固了其南滿根據地，使得國軍失去了各個擊破，“南攻北守”，消滅南滿共軍，切斷東北與關內共軍的海陸交通線的最佳時機。

因為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卻被共軍顯示出來的新氣象打動，作為調解人，他專為中共說話。前文說過，國共雙方在 1946 年 1 月簽訂的停戰協定規定不許破壞交通，而共軍卻在東北吃了敗仗後，為了報復而踐踏協議，在關內大肆破路。共黨聲稱，他們破壞鐵路是“自衛”，是爲了制止國軍去打他們。當徐永昌在 1946 年 5 月 27 日與馬歇爾談到恢復交通之事時，馬歇爾竟然重複中共的遁詞，“以為共黨在防政府運軍隊”。徐永昌乃駁斥道：馬歇爾本人是軍人，應該知道破壞很容易。如果政府真是爲了軍事目的去修復鐵路，其實並不能對中共造成什麼危害（因為修好後他們隨時都可以再破壞）。政府若是真想運兵去打

中共，還不如且戰且修更容易（因為此時共軍已被打跑，修復的鐵路不會再被破壞）。“所以，今日共黨破壞交通，久久不使修復，目的在於困我政府及社會人民之經濟而已。”[308]

馬歇爾甚至天真到對徐永昌說：“擬為共軍劃定駐地。果能按期入駐，彼此既有確定界限，互不相犯，不但和平且可達於和好，如此交通豈不自恢復耶？”[309] 他不知道，早在所謂“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國府就試過這辦法了，中共卻懷疑國府想先將他們驅入死地，再與日軍南北夾擊消滅他們，毛澤東因此計劃用重兵襲擊國府大後方。對一個將“輕信”、“麻痹大意”、“放鬆警惕”譴責為大罪的疑神疑鬼的邪惡政黨來說，任何中性甚至善意的舉措都會被他們視為包藏禍心，合作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遲早要破裂。

正因為馬歇爾不明是非，專拉偏架，毛澤東才會把搶佔地盤的希望押在他身上，作出死守四平的決定，其基本考慮就是堅持下去，等馬歇爾回來壓國府接受既成事實。雖然馬歇爾沒能幫到那個地步，但他還是充分利用了手中的法寶——美援，以此壓迫蔣介石讓步。當時美國國務院認為，美援將鼓勵蔣介石“通過武力解決中國問題”，主張將美援作為迫使蔣介石做出合理讓步的“杠杆”[310]。據此，馬歇爾於 6 月 20 日警告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如果中國爆發全面內戰，美國海軍陸戰隊可能撤離，第 7 艦隊將駛離現駐地，包括租借物資、剩餘物資、借款等項在內的美援將被掐斷[311]。7 月 23 日，馬歇爾下令禁運國府以前根據租借法購買的一批軍火[312]。7 月 29 日，馬歇爾正式宣布停止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313]。8 月 18 日，杜魯門發佈了軍火禁運的行政命令，宣佈停止向中國政府提供可能與內戰有關的部分貨品，不再給中國政府發放出口作戰物資的出口許可證[314]。直到

1947 年 5 月 26 日，因為禁運造成了國軍的嚴重危機，美國才解除禁令[315]。

禁運乃是美式“上屋抽梯之計”，國軍精銳部隊基本都是美式裝備，“裝備自若干部份損壞而有置換之必要時，禁運令便阻止中國向美國市場購取其所必需”[316]。美式武器彈藥消耗量又特別大。因此，如國內學者胡美與任東來所說，禁運使得美式裝備反而成了劣勢。美國人的考慮還特別周密，在發佈禁令時還通知英國、加拿大和比利時等國，要求它們採取同步行動。因此，中國政府向這些國家的採購要求也被拒絕。[317]

禁運嚴重打擊了國軍的戰鬥力與士氣。即使在禁令撤銷後，其延遲效應還在發揮出來。禁令撤銷後兩個月，魏德邁來華調查，發現禁運所帶來的軍火短缺問題尚未得到緩解。他在東北發現，由於槍械彈藥補充嚴重不足，原來由美國在印度裝備和訓練的新六軍已不再是當年的新六軍。廖耀湘告訴魏，新六軍在東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補充，完全被拖垮了”；“自動武器大都消磨太厲害，衝鋒槍有好多已不能連發。”“自動武器和迫擊炮沒有充足的彈藥補給，尤以炮彈奇缺”；“汽車和其他特種車輛，都已到報廢年齡”；“新六軍戰鬥力趕不上當年的 1/3，官兵素質減低，士氣戰志都低。”[318]

對此情形，共軍將領心知肚明，1947 年 2 月 1 日，彭德懷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蔣介石要繼續作戰，“不僅兵力發生困難，軍火也已發生很大困難。”[319] 官修軍史也披露：

> “據國民黨政府國防部的報告，1946 年，全國各兵工廠除生產少量步兵重武器外，對輕武器的生產能力為：‘月產量步騎槍為五千支；輕重機槍三百挺；步機子彈七百萬粒；手榴彈二十三萬顆’，‘生產量固屬有限，而品質亦遠不如

舶來品’。而全面內戰爆發僅半年，國民黨軍損失的武器已達總數的 1/7。由此可見，當時國民黨的軍工生產能力已遠遠不足補償作戰損耗。於是，部隊的裝備日趨匱缺。1946 年底，國防部對 61 個整編師各種火炮配置情況的調查表明，各類火炮編制數為 26460 門，實有數僅 12584 門，缺額達 52%。”[320]

與此同時，東北兵工廠日夜加班，共軍武備不斷增強：“因炮兵增多，各縱隊攻堅能力都大大增強，既可輕而易舉消滅國民黨的整個軍，整個師，也能攻克中等設防城市，所以不論在膠東、魯西南、黃泛區、魯南、蘇北、徐州陸總都全居被動，從大別山作戰會議後，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徐州陸總結束，‘剿總’成立，到處都打敗仗。”[321]

老美幫中共的最大的忙，還是他們根本不懂東方的事，卻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強行塞給中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逼迫國府推行民主憲政。其實當時中國需要的是獨裁而非民主，國家必須進入緊急狀態，全面動員，才有可能打敗實行極權體制的中共。可老美不懂這點還不說，竟然想在中國扶植第三勢力，成立反對黨。馬歇爾在“調處”後期向蔣介石建議：“第三方面的出現是目前局勢中的唯一的希望”。一面督促蔣介石促成小黨派聯合成一個自由派政黨，要蔣介石實行“真正的兩黨制”，一面親自鼓勵小黨派團結起來，組成一個自由派集團，以充當國共兩黨間的平衡勢力。[322]

這結果便是人為製造混亂，為中共提供可乘之機，使得中共可以利用合法手段顛覆國府，在國統區開闢了第二戰場，使得“蔣介石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圍中”。美國人中意的那些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其實既不懂自由主義為何物，奉行的也是傳統

的集體主義而非西式個人主義價值觀，而且其組織早被中共滲透，到最後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都成了中共的別動隊。連美國人垂青的地方實力人物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淮海戰役後期，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竟然建議蔣介石交出軍政大權以作和談準備，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以何應欽任總司令負責軍事，李宗仁代理總統負責政治[323]。在其鼓勵下，李宗仁在共軍過江前悍然出來逼宮，但他當上代總統後，老美卻又始亂終棄，拒絕援助（詳後），使得國府的半壁江山垮得比南明還快，蔚為奇觀。

待到美國人搗亂的惡果開始顯示出來後，他們便決定從中國“脫身”。1948 年初，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司長喬治·凱南建議：“儘快解除我們在中國所承擔的不健康的義務，設法恢復我們對那裡局勢的超脫和行動自由。”[324] 6 月 14 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致電國務卿，指出現時美國所進行的最好策略是“忠告和敦促”，而不是像蔣介石希望的那樣，深入捲進去[325]。從 1948 年 7 月起，美國政府內部討論了中國問題，認為如果繼續對華援助“會把美國直接牽入中國內戰中”，“會連累美國政府”，“其代價是無法低估的”[326]。1948 年 9 月 17 日，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制定了《重審並制定美國對華政策》的文件，認為“全力以赴地援助國民政府是一條規模巨大的沒有盡頭和十分冒險的行動路線，美國政府不能這樣拿美國的聲譽和財力去賭博”。因此，“當我們捲入的事情已經明顯是輸局時，必須心甘情願採取減少我們損失的措施”[327]。1949 年 1 月 11 日，它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並由杜魯門總統於 2 月 4 日批准執行。

據此，美國開始撤回已給國府的援助，並拒絕提供進一步援助。美國聯合顧問團在成立了僅僅兩個月後，即被召回國。1949 年 1 月 26 日，美國正式宣佈停止訓練國民黨軍隊，並召回駐華

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將軍，次日又宣佈撤回美國軍事顧問團。美國也拒絕了蔣介石一系列增加美援的請求，就連宋美齡親自到美國去秦廷哭師也無濟於事。在平津易手之際，美國不顧蔣介石的懇求，下令撤回在平津的美國僑民 800 多人，為士氣民心帶來了極大的打擊。[328]

不但美國政府決定坐視中國陷落，就連軍人也如是主張。美國駐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認為：“唯有一項無限制的美援政策，包括直接使用美國武裝部隊以阻止共產黨南進，才能使國民黨政府得以在華南保待立足點，以對抗共產黨的挺進，然而這樣的政策我是決不主張的。”[329] 就連原來力主援華的魏德邁將軍到後期也認為，繼續對華軍援不但無益，反而有害。[330]

深獲司徒雷登好感的李宗仁上臺，也未能改變美國政府的態度。他要求美國貸款 10 億美元或至少 5 億美元，幫助他抵抗共軍渡江。司徒雷登卻拒絕了[331]。1949 年 3 月，剛組閣的行政院長何應欽請求美國給予二至三億美元的援助，以維持其貨幣穩定，否則政府不能鞏固，也無法和共產黨談判。美國國務院回電告之：財政赤字乃內部問題，不能靠外援解決。[332]

就連在口頭上表示一下對中國政府的支持，美國政府都不願幹。李宗仁多次要求美國政府公開發表聲明支持其政府，都被美國人斷然拒絕。1949 年 1 月 23 日，李宗仁派甘介侯去見司徒雷登，要求美國政府發表聲明，美國務院回電指示司徒雷登拒絕。2 月 9 日，美國駐廣州公使請示國務院，他是否可以與廣州的各團體作非正式會晤，並發表公開講活，國務院回覆道：“相信美國政府的一個公開聲明或即使由你發表的聲明能獲得有益的效果，似乎是不現實的。抵抗共產黨的前進只有在中國人自己的努力的基礎上才有效果，而不能依靠來自中國之外的聲明”。美國

駐天津領事在向國務院的報告中也說："對一個已經完蛋了的政府作進一步的援助，將是沒有用處的，目前的局勢只能由中國人來解決"，"我們應該採取旁觀的政策"。就連司徒雷登也反對發表此類聲明[333]。

1949 年 4 月 17 日復活節，李宗仁建議司徒雷登邀請英、法、澳等國駐華大使為他舉行茶會。在茶會上，李宗仁表示他並不要求各國給予物質上的援助，只要求各國"表明態度"，予以"道義上的支持"，這樣"既可給與共產黨談判的政府代表相當大的鼓勵，也可警告國際共產主義分子不要插手中國"。李宗仁還拿出中共提出的和談草案，表示國府不能接受這些條件，但如果盟國連"道義上的支持"也沒有的話，他就準備接受共產黨的和談草案了。但司徒雷登事前已與其他三國大使商定，由他發表了簡單謹慎的講話，除對李宗仁的處境表示"同情"外，竟將李宗仁的要求"完全擱在一邊，顯然回避一切問題"，使得李宗仁終於意識到"西方已決定袖手旁觀，眼看中國政府的垮臺了"。[334]

1949 年 5 月，李宗仁又派秘書甘介侯赴美，最後一次爭取美援。甘帶去李宗仁致杜魯門的信，信中對美國過去對華政策極盡頌揚，並承認國府目前所處的窘境應歸咎於當時政府的失誤，說明對於他將進行的改革和抵抗共產黨進攻的行動，美援仍是"不可或缺的"。只要美國提供援助，美國提出什麼條件他都可以接受，美國以任何方式進行監督，他都不會認為是干涉內政[335]。與此同時，李宗仁又通過司徒雷登，請求美國發表支持他的政府的聲明。但杜魯門以傲慢無禮和冷漠的態度接見了甘介侯，非但不理會李宗仁的請求，還說自己是密蘇里人，只重視認真幹實事。談話未完他起身就走，使在場之人極度難堪。[336]

神州陸沉後，美國又準備抛棄台灣，不但由杜魯門總統宣佈不介入中國內戰，國務卿艾奇遜還在公開演說中未把韓國與臺灣列入美國的防禦圈，誘使斯大林批准金日成發動韓戰。至此，美國才被迫再次捲入國共衝突，派第七艦隊進駐臺灣，制止了共軍對臺灣的進犯。從頭到尾，美國人顯示的是一種極不負責的態度。麥卡錫輩後來追究民主黨政府“丟失中國”的責任，我個人覺得確有理由。

（二）蔣匪幫的貢獻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其中既有國民黨本身固有的結構缺陷，又有國府要人認識上的原因。

結構性缺陷主要表現在國民黨缺乏組織能力、動員能力、控制能力上。由於歷史原因，國黨內部派系林立、相互傾軋、機構重疊、指揮不靈，致使蔣枉擔了“獨裁”的罪名，卻毫無獨裁能力，非但無法控制黨內派系，而且竟連自家將領都指揮不動。組織、動員、控制民眾就更不用說了。由此導致了一系列軍事惡果：

第一個問題是國軍在很大程度保留了軍閥聯軍的特色，彼此策應不力。淮海戰役中，黃百韜被包圍前，讓李以劻傳話給劉峙，說：“如我被圍，希望別的兵團來救。古人說，勝則舉杯相慶，敗則出死力相救，我們是辦不到的。這次戰事與以前戰役性質不同，是主力決戰，關係存亡，請告老總，注意激勵各級戰場指揮官，否則同歸於盡，誰也走不了。”“國民黨是鬥不過共產黨的，人家對上級指示奉行徹底，我們則陽奉陰違。”[337]而蔣又優柔寡斷，不是延誤戰機，就是反複變卦。國軍將領又普遍缺乏

進取精神，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到後期完全成了因循的官僚。郭汝瑰說，在戰爭後期，“一般人都唯恐負責，事事向蔣介石身上推，蔣也事無大小，一手包辦，坐在南京，憑這時的情報，在圖上指揮，干涉小到一個師的細部行動。至於下級呢？明知錯了，也遵令執行，以免負責。這種癱瘓的指揮機構，再加上腐敗的政治，當然除失敗是沒有第二條出路的。”[338]

第二個問題是，因為缺乏組織民眾能力，國府無法像共軍那樣，靠地方部隊與民兵擔任根據地守衛，以野戰軍專門承擔作戰任務，卻只能動用正規軍去守城。政府守土有責，受民意輿論制約，不能如中共那樣不計一城一地得失，於是佔地越廣兵力便越單薄，始終處於兵力不足狀態。據官修軍史，1946 年 11 月，國軍用於攻擊的兵力只為投入內戰總兵力的 46%。[339] 這就使國軍面對為劉伯承指出的兩難：如果國軍減少守備兵力，增加機動兵力，那麼守備部隊被共軍各個殲滅的危險便更大；若減少機動兵力，增強守備兵力，那麼就無法作戰[340]。這個問題越到戰爭後期越嚴重——遼瀋戰役前夕，國軍在東北的兵力全都成了守備兵力。

第三個問題是國府缺乏組織民眾的能力，打的是軍事戰而非政治戰，因此無法如共軍那樣，靠民眾提供情報，靠民眾封鎖消息，卻只能以空軍偵察來獲得戰役戰術情報，完全成了瞎子。蘇中戰役後，國防部檢討失敗教訓時便指出“蘇北匪化甚深，故匪之情報靈活，行動自如，我軍則每日有盲目作戰之感，常貽匪以集中兵力襲擊我一點之機會。”[341] 確乎如此，在萊蕪戰役中，華東野戰軍將 5 個縱隊秘密長途轉移到北線，國軍竟一無所知。國防部編的《戡亂戰史》承認：共軍“主力作戰略轉移時，經由臨沂、蒙陰、新泰、萊蕪道東西山區小徑，晝伏夜行，秘密前

進，我空軍既無法搜集，地面情報亦不易偵知，一時竟不知匪軍主力所在。及至判明其企圖與行動時，我南進兵團已被各別包圍於古馬陵道中”[342]。如此浩浩蕩蕩的大軍長途轉移，竟然不被國軍發現，說明中共控制民眾的能力之強，而國府在這方面又是何等無能。又如在遼瀋戰役中，共軍意圖是什麼，在何處部署兵力，兵力薄弱處何在，國軍一無所知，除了靠不住的空軍偵察外，便只能盲目猜測。例如共軍在遼南兵力薄弱，竟然不是諜報發現，而是由廖耀湘猜到並靠試探性攻擊證明的[343]。如此兩眼一抹黑，必然應對失措。

第四個問題是國府後期雖然宣佈打總體戰，卻毫無組織動員民眾的能力，因此不能像中共那樣，不但靠民眾反諜除奸，偵察情報，封鎖消息，而且將民力化為戰力，以民養戰，以民助戰，承擔了共軍的後勤供應。而國軍只能靠正規輜重部隊去解決糧秣彈藥供應，其用於作戰的兵力就更為緊張。因為缺乏對民眾的控制力，國府的反諜防間非常差勁，共諜不但滲入軍隊高層和機要中樞，而且在國統區大肆活動，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煽動無知憤青搗亂，而國府對此一籌莫展。偶有整肅鎮壓，又總是誤傷無辜者，反倒喪失了人心。國府更缺乏政宣能力，不能主導控制輿論，宣傳戡亂戰爭的必要性與正義性，在軍民心目中牢牢樹立必勝信念，卻讓國統區的“輿論陣地”完全落在中共或其同情者手裡，使得他們利用“聞、李事件”、“一・二一事件”、沈崇案件以及戰後的經濟困難，在國統區開闢了第二戰場，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運動，“兩路夾攻才能打得贏”。

第五個問題是國軍傳統的問題。除了少數例外如傅作義部，無論是雜牌還是嫡系，從建立那天起，打的就是陣地攻防戰。即

使是進攻，也不知道兩翼迂迴包抄，只會正面強攻。後來與日寇作戰，這傳統就更加得到強化。戰法單一，對共軍運動戰遊擊戰便一籌莫展，以致蔣中正在第五次圍剿中必須使用“以守為攻”的笨辦法來對付共軍的運動戰。這一戰略的成功，更助長了蔣介石及其高級將領的錯覺，卻不知在共黨取得龐大地盤和強大武備之後，江西經驗便再無可能複製了。國軍將領刻舟求劍竟到這個地步：錦州防禦工事只完成了計劃的三分之一，而且問題很多，范漢傑謂之“只是一張空紙，經不起風雨，一吹就破了”。可衛立煌在視察後卻很滿意，聲稱那工事比國軍當年在江西圍剿紅軍時修築的碉堡堅固多了，那時都能打勝仗，現在就更沒有問題了[344]。就是在這種消極戰略指導下，東北幾十萬大軍到後期才會困守在幾個大城市中，不敢出城一步，遑論向共軍主動進攻。這態度倒像當年明軍在遼東不敢跟辮子兵打野戰，袁崇煥只能“守堅城，用大炮”一般。可惜共軍不是辮子兵，有的是比國軍更厲害的大炮。

國府國軍要人的主觀認識上的共同誤區，是對共產黨的本性、思維方式、組織特點與行為方式一無所知。因此普遍看不到中共的軟實力優勢，連當年主張“剿共必須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楊永泰的見識沒有，不知道共黨問題不能光用軍事手段去解決，因而普遍嚴重低估中共的實力與潛力，只知從軍事上看問題。等到吃了共軍苦頭後，國軍將領又走到另一極端，普遍悲觀失望，喪失鬥志。衛立煌在東北死守城市，不敢出城與共軍交戰，其考慮竟然是“固守待援”，而這“援”竟然是“以待國際局勢變化”！[345] 這豈還會有取勝可能？如被俘國軍將領後來說的，他們剿了一輩子的共，但直到進了“戰犯管理所”，才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回事。

與此相伴隨的一個問題，是國府官員普遍是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講究“恕道”與“不忍人之心”，不曾如我等一般，從小學開始就將《農夫和蛇》、《東郭先生和狼》、“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等等背得滾瓜爛熟。這種迂闊心態，與低估共黨危險的傾向結合起來，便使得老蔣屢屢除惡不盡。他以往昔打敗軍閥的狹隘經驗剿共，其“勝利”的標準是“擊潰”而非“殲滅”。在軍閥混戰中，只要打敗了對方，攻佔了某個要地，對方的首領便會自動下野出國，所部聽任收編。因此，一旦國軍擊敗共軍，他就覺得問題業已解決，對方再不足慮，因而屢次上演《捉放曹》。若是國府國軍領導能有三分我輩對共產黨的理性認識，則共黨毫無倖勝之理。但考慮到當時國人毫無在共黨治下的生活經驗，又不曾刻苦攻讀馬列毛著作與國際共運史，自蔣介石以下，舉國無一人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回事，識字分子又素以傲視全球的驚人弱智著稱，這個歷史性錯誤可以原諒。

這些也就是蔣介石本人最主要的認識錯誤。他作出的一系列錯誤決策，實施的若干自殺莠政，基本上都來源於此。

第一個錯誤決策，乃是沒想到抗戰結束後的事。此乃國共最大的區別。如前文所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把抗戰看成是新時期特殊條件下的內戰，從洛川會議那天起就高瞻遠矚，瞄準了北京的紫禁城，整個“抗戰”戰略都是據此長遠目標制定的。

到了戰爭後期，毛澤東更是看到了美蘇聯盟將在戰後破裂，將自己明確地定位於蘇聯代理，將蔣介石誣為美帝代理（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國共反映美蘇”），從此定位出發，制定了明確的奪權戰略。他在黨的七大會議上說，美國以長城為界拒蘇的可能性很大，如其方針得逞，美國就可能成為新的斯科比，中國有可

能變成希臘（蘆註，當時英軍總司令名斯科比，令希臘共產黨解除了武裝，參與國家民主建設）。據此，他給中共制定的戰後戰略是，第一，決不交槍，堅決自衛，蔣反我亦反，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第二，為了防止美蔣沿長城封鎖，遮斷蘇聯，現在就開始集中二三十個旅，準備將來開到滿洲去，背靠蘇聯，“得到技術條件”，“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346]。

這些話是在七大會議上說的，其時蘇聯還根本沒有出兵，毛也不可能得知雅爾達秘密協議，但他就能看到這一步後著，不能不說他在這問題上確有戰略預見能力。

相比之下，蔣介石只顧抗日，不想後事。而且，他太看重對盟國的義務，與毛澤東為保存實力不惜對斯大林陽奉陰違完全不同。為了配合盟軍作戰，他竟然把中央軍幾十個師調往緬甸戰區，那完全是國軍的精銳，無論論戰鬥力還是裝備，都是當時中國第一流軍隊。這戰略調動使得中國戰區防守空虛，致使國軍在日寇於 1944 年發動豫湘桂戰役之後一潰千里，損失兵力五六十萬人，丟了 7 個空軍基地和 36 個飛機場，喪失豫湘桂粵閩黔等省的大部或一部、4 個省會和 146 座城市、20 餘萬平方公里土地和 6000 萬人口，喪失了主要交通線和全部出海口。

此役乃是日寇對中國人作的最後一次大孽，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戰後國共實力對比。如前所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將戰略改為蟄伏待變，把幹部都召到延安去“保存”起來，根據地非但沒再發展，反而縮小了。但豫湘桂戰役改變了這一切，日軍從華北抽調了大量兵力去攻擊國軍，剩餘的日軍和偽軍被迫收縮地盤。我黨趁機擴張，不但恢復了原有的根據地面積，還跟

隨日軍南下，填補日軍留在身後的真空，相繼建立了河南與湘鄂贛根據地。然而若不是蔣介石把精兵弄到印度與緬甸去，也不至於敗得那麼慘。最嚴重的後果，李宗仁已經指出了，那就是停戰後中央軍精銳盡陷於異國，無法及時回撤去“摘桃子”，尤其是搶先佔領至關重要的東北。

當然，說起來這個錯誤還可以原諒：第一，誰也沒料到日本投降會那麼快，無論是蔣介石，是斯大林還是毛澤東，都以為戰爭還要頗長時間才能結束，因為誰也不知道老美有了原子彈，而原子彈竟會徹底改變戰爭方式。第二，蔣介石得罪不起盟國。他和毛澤東不一樣，毛不怕亡國，他可是怕得要死。沒有美國援助，國府根本不可能挺下去。

第二個致命錯誤是對蘇外交失誤以及軍事決策失誤，為蘇軍搶佔東北後違反條約搗鬼留足了空間。

對這個問題，國內學者汪朝光有專論作了相當精湛的分析[347]，這裡轉述一下大意。如有誤解之處，由我承擔文責，我自己的發揮當然更是如此。

蔣介石得知雅爾達密約後，知道蘇聯出兵東北已經無法阻止。他面臨的是兩難處境：要麼捍衛領土完整與國家利益，那必將觸怒斯大林，促使他把中共放出來顛覆國府；要麼出讓部分領土與國家利益，請求斯大林遏制中共，把東北交給國府，那必然引起國內輿論大嘩，破壞國府的公衆形象。無論作何選擇都對國府極為不利。這說起來也是國府的劣勢。嚴密控制了輿論、毫無民意壓力、歷來隱瞞國際條約的我黨就絕無此問題，怪不得愛黨人士要歌頌極權制度的優越性。

老蔣想來想去，最後還是選擇“賣國遏共”的方針，也就是承認外蒙“獨立”，同意蘇聯在東北獲得特殊權益，諸如中蘇

“共管”中長鐵路、“共用”旅順港、大連成為“自由港”等等，換來蘇聯答應把東北移交給國府，也不對中共提供援助。

然而談判代表宋子文與王世傑怕落下賣國賊的罵名（這也是我黨的優勢，黨魁無論怎麼放手賣國，絕無此類擔憂，反而能做驚天動地的民族英雄，毛周就是最光輝的榜樣），在出讓權益問題上與蘇方爭執了許久，卻忽略了與蘇方敲定蘇軍怎麼向國軍移交東北的具體方法，中央政府也不提醒他們這問題。於是條約只籠統規定，中方派代表在收復區設立行政機構，指揮中國軍隊；收復區停止軍事行動後，中國政府即負管理公務之全權。卻沒有規定蘇聯協助國府接收及其撤軍程序的具體有效並有約束力的步驟。

這結果便是老蔣事前便預見到的：若“我對蘇所要求之答覆為具體，而蘇對我所要求之答覆為抽象，乃即我方最大之失敗”。換言之，國府作出了領土與民族權益具體而微的讓步，換來的卻是蘇聯將東北移交給國府的空洞承諾。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就這麼一個為蘇聯留足搗鬼空間的爛條約，國府居然也就盲目信任之。就在我黨認准目標，全力以赴搶佔東北的同時，國府竟然以為蘇聯會信守承諾，把東北裝在金盤子裡端給國府，渾沒把迅速佔領東北當回事。

9 月間，蔣介石不斷接到中共進入東北的密報，也曾引起警惕，承認“讓共黨佔領東北，此為最險之事也”。但直到 10 月 1 日，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才通知蘇方，國府準備海運軍隊到大連登陸，接收東北。不料蘇方竟說，據中蘇條約規定，大連是商港，不能運輸軍隊，而且還蠻橫地不許國府組織地方團隊維護治安，也不許國府空運部隊到東北。

國府對蘇方賴賬毫無思想準備，事到臨頭只好跟蘇聯談判，但中蘇條約及其附件中對此並無具體規定，只好任由蘇聯人糊弄。扯皮到 10 月下旬，蘇方仍不讓步，國府只好決定在營口與葫蘆島登陸。蘇聯人卻把葫蘆島與營口讓給了共軍，要他們牢牢把守，一面對國府說那倆地並無蘇軍，現為中國軍隊佔據，若國軍登陸引起糾紛乃是中國內政問題，他們不便干涉。國府一籌莫展，直到 11 月間才在美國幫助下，在秦皇島登陸成功，16 日攻佔山海關，26 日攻佔錦州。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蔣經國作為談判人員到了長春多日，竟然一直未發現長春地區已有大量中共軍隊。直到 11 月 12 日他才發現此事。東北行營因此決定停止接收，撤回關內。

事已至此，國府仍無應變之道，據汪先生介紹，當時國府內部有三種意見：一為向蘇聯作出更多讓步，換取國府的實際接收；二為中斷中蘇交涉，將東北問題公諸國際，同時重點經營華北。實際上是放棄東北，保住華北；三為杜聿明等人提出的軍事解決方案：國軍立即攻入東北，先殲滅關外共軍，再掉頭與華北共軍決戰。

壞主意勝過沒主意，這三策隨便採哪策，都比沒主意強。不幸的是，蔣介石採用的竟然是抗戰前用過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也就是一邊跟蘇軍交涉，一邊準備武力接收，其實也就是沒主意。

這其間，蔣介石還舉棋不定。開頭他眼見交涉不出什麼名堂來，便於 11 月 7 日重訂東北接收計劃，竟說什麼“此後對東北只可如俗語所謂‘死馬當作活馬醫’而已，必須先收復關內與內蒙，而後再圖東北也。”

此後因東北行營撤回關內，蘇聯人怕引起國際公憤，只好假惺惺地“讓步”。中蘇達成兩項協定，一是蘇方延期撤兵以維持治安，二是從 12 月底到次年 1 月中旬，由國府派出行政人員及若干保安團隊，對瀋陽、長春、哈爾濱三市以及遼北、松江、嫩江三省（註：當時東北劃為九省）進行象徵性接收（被張嘉璈稱為“等於虛飾”）。這就等於放手讓蘇軍武裝扶植中共，讓中共從容招兵買馬，並給蘇軍那強姦犯土匪大軍以充分的搶劫東北工廠設備的機會。

最不能原諒的是，國軍雖在 11 月間便攻佔了錦州，然而蔣介石卻因怕“中途再受共（蘇）脅制，陷於進退維谷之境”，竟然決定蘇不撤，我亦不進，不談經濟，任其擱置一段時間再說，說什麼“應特別慎重，不在於急於接收也”，將正規軍置於錦州一線不動。從 45 年 11 月直到 46 年 2 月這段期間，國府既不交涉，也不抵抗，外交與軍事都無所作為，坐視共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但百倍擴大了武裝，而且建起了根據地。直到 46 年 2-3 月間，隨著蘇軍逐漸撤離，蔣介石的膽子總算才大了起來，下令國軍北上，於 3 月 13 日佔領了瀋陽，然後沿長春鐵路北上[348]。即使是在國軍打下了四平街，即將進攻長春時，蔣還因為聽說長春城內還潛留了六千蘇聯紅軍，竟密令杜聿明，軍隊不准渡遼河。全虧督戰的國防部長白崇禧一手承擔了責任，下令杜聿明追擊，國軍才攻克長春。[349]

後人回顧這段痛史，不難看出此乃蔣中正犯的致命大錯。被迫“以賣國遏共”、簽訂喪權辱國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倒毋庸深責，蓋老蔣也確實沒有其他選擇，並不是如毛周一樣有無從遏止的澎湃賣國激情。該責備的是他對俄國人毫無戒心，以為那種爛污帝國主義會信守盟約，竟然滿足在空洞的承諾中，卻絲毫

沒有想到用板上釘釘的具體的移交細則捆住對方，明確規定我軍的行軍路線與接防辦法，劃定中蘇防區，規定政權的移交辦法與接管政府的許可權等等，卻留下浩瀚的搗鬼空間，生怕那人類歷史上第一爛污帝國主義不“胡日鬼”（山西話）。

外交上被俄國人玩弄也倒罷了，在發現共軍已大舉滲透之後還無所作為，就絕對不能原諒了。敬愛的劉伯承元帥教導我們：“狹路相逢勇者勝。”老毛志在必得，不惜丟掉關內的所有根據地，也要搶下東北來，而老蔣明知讓共黨佔領東北乃是最兇險的事，卻因懼怕蘇聯，按兵不動，甚至連“死馬當活馬醫”都沒做到，既捨不得扔掉，又沒勇氣去搶，最後是什麼也得不到，白白把外蒙送了出去，還貼上中長鐵路與旅大，最後還讓蘇軍把東北的整個武庫送給了中共。

其實老蔣要有三分我等對老共的理性與感性認識，便不難看出上述杜聿明提出武力解決方案實為上策，只是可以與宣傳攻勢、對蘇交涉等手段結合起來。既然蘇方放了話不干涉中國內政，那就要他們嚴守中立，否則中國將向國際社會控訴蘇軍的違約侵略行為；如他們能嚴守中立，則中方可讓蘇聯在經濟上再佔點便宜（當時斯大林要和中國在東北開合資公司，老蔣不肯答應，這就是他中斷對蘇交涉的原因），並向斯大林擔保接收後絕不讓美國人進入東北，然後迅速集結國軍的王牌部隊，攻入東北，首先迅速佔領南滿與熱察兩省，隔斷關內外共軍交通，防止共軍向關外增兵，向關內提供武備，再次第佔領各大城市，尋機殲滅共軍主力。

須知那時中共剛剛出關，還來不及組織人民，建立根據地。東北乃至整個淪陷區的人民只知道國府抗戰，不知道還有什麼八路軍（當時的民謠是：“毛澤東，毛澤東，抗戰八年不見你，如

今出來耍威風”），用我黨的話來說就是“正統思想很頑固”，只會歡迎國府國軍，對土八路毫無興趣。而且，共軍閑了八年，過去都是分散的地方遊擊武裝，如今乃是首次集結起來，大部都是關外招的新兵，素質很低，又還沒來得及建立炮兵，即使有了大炮也不會用（據國內學者劉統披露，共軍最初用大炮是從炮膛裡望出去，比劃著瞄準目標），而接收的中央軍與日軍血戰八年，乃是百戰雄師，完全可以輕易掃平那群烏合之衆。

然而老蔣卻不敢採此策，坐失先機，聽任共黨從容坐大。最混賬的還是，在東北行營撤回關內，蘇聯擔憂國際反彈，好不容易願意讓步時，他還不抓緊時機行使此策，最低限度應該要求蘇軍讓出南滿和熱察，讓國軍佔領，以阻斷共軍關內外交通，卻滿足於象徵性接收，甚至要求蘇聯延期撤兵，好給他們扶持武裝中共的的充分機會！

在這個問題上，蔣介石相對於毛澤東的劣勢，是他的民族觀念很強，而毛澤東則徹底缺乏這種觀念。因此，毛絲毫不以求“辰兄”幫忙為恥，多次請求蘇軍幫他攻城略地，不但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時如此，在搶奪東北時也如此，令部下“速與辰兄接洽，將整個中東路（包括哈市）讓我駐兵，永遠佔住，不讓國民黨駐一兵一卒”。蔣介石則處處顧及國家尊嚴。在奪權戰爭中，顧忌越多的人越處下風，只有百無禁忌、什麼爛污事體都做得出來的人才能勝出。因此，老蔣這顧忌，當然也就成了一個軟穴。

據國軍將領金典戎說，1945 年 11 月，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看出了中國的東北問題，覺得如果有蘇俄在幕後作梗，那就決非單憑中國的外交談判所能奏效。因此向蔣介石建議，由美軍代為接收東北然後再交給中國政府接管。不難想像，如果蔣介石真是

美國人的走狗，而又有毛澤東的“國際主義覺悟”，他會怎樣地歡欣雀躍、迫不及待。然而“蔣先生當時認為這樣的作法，雖然可以從蘇軍手中把東北順利的接收過來，但深恐因此有失國家的體面，經予婉言謝絕。”[350] 當然，魏德邁的建議絕不會被美國政府接納——若美國這麼做，很可能引起美蘇對抗，而那是杜魯門政府竭力要避免的。不過，光是從老蔣的反應來看，也就足以洞見他相對於老毛的主觀劣勢了。

國府決策的第三個致命錯誤，李宗仁已經在其回憶錄中痛陳過了，那就是在接收淪陷區時作出了一系列錯誤決策。

李宗仁指責，國府未能及時從峨眉山上跑下來，及時搶摘桃子（“峨眉山”、“摘桃子”云云，是偉大領袖的誣衊性指責，不是老李說的），讓共軍著了先鞭，主要是因為蔣介石沒有聽取他的忠告。他說，1944 年春，他曾向蔣建言，現在便要考慮到戰後的接收問題。他認為勝利後，蘇聯和中共將變成最頭痛的難題。他建議，準備與蘇聯向東北作進軍競賽，並隔離中共和蘇聯的陸地交通和直接接觸。敵人一旦宣佈投降，我統帥部應立即命令各地日、偽軍就地待命，維持當地治安和交通，以待我接收部隊的到達。他還主張用“後浪推前浪”方式接收淪陷區：原駐河南、安徽和蘇北的國軍向山東、河北前進，原駐山西、寧夏、綏遠的，則向察哈爾前進。各該軍所遺防地，則由後方部隊遞補。如此不出一月，華北所有重鎮及津浦、平漢交通線皆為我大軍所有，然後再令日軍集結，就地解除武裝。

他說，可惜蔣介石沒聽取他的忠告，戰事剛結束，中國統帥部立即命令日本駐華司令官岡村寧次，將日軍向數點集中，聽候繳械。例如長江以北敵人便奉命於短期內集中於鄭州、洛陽、開封、徐州、蚌埠、石家莊、濟南、北平等重鎮。而日軍集中後所

遺留的若干戰略據點的各交通線的防務，國軍卻未能即時一一接防。因而原來通行無阻的津浦、平漢等線，勝利後頓時交通斷絕，直至大陸易手都無法恢復。當時他曾一再警告何應欽，要他千萬不可操之過急，草率從事。但後者卻說，奉蔣委員長面諭，如今抗戰勝利，如不將敵人迅速集中繳械，將有損於國家威信。誰知後患便因此造成，云云。

至於向收復地區進軍，中央也沒採納他提出的“後浪推前浪”的辦法。主要是因為，全付美式配備的嫡系中央軍共四、五十個師，此時尚集中於滇西、緬北一帶。如以後浪推前浪方式向華北前進，則原在安徽、河南一帶的非嫡系部隊將先入華北，甚或東北，這在私心自用的蔣先生看來，顯然是對他不利的，所以他只要原駐鄂北、豫西的劉峙部隊和原駐皖西大別山的李品仙部隊，分別開進隴海線上的鄭州和徐州受降接收，接收後即不得再向北方前進，至於華北、東北的接收，卻要等留在滇、緬一帶的部隊調去辦理。但是四、五十個師大軍要自西南山區開往華北，談何容易。大軍尚僕僕在途，東北、華北的版圖大半已再度變色了。[351]

李宗仁是否提過這些建議，是無從落實的孤證。這其實也不重要，關鍵看他說的是否事實。我盡可能地（當然是在本人極受限的閱讀條件下）查對了一點史料，覺得他說的有如實之處，也有誇張的地方。

前文已經介紹過華北和華中為何會落在共軍手裡；敵後國軍成了敵後共軍的主要作戰目標，受到日軍和共軍的雙面夾擊，不是被消滅就是被迫降日，使得華北大片地區淪共。我黨在停戰時成了華北敵後最主要的武力，當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搶起桃子來格外方便。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的應對有正有誤。正確的是，在日本投降後，他充分利用了國府為同盟國承認之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與中國作為盟國重要成員的合法身份，援引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佈的命令，堅持除了東北之外的中國大陸、臺灣以及北緯 16 度以北越南境內的所有日本部隊，都只能向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及其代表投降[352]，拒絕了十八集團軍的非法要求：

> “本委員長經電令各部隊一律聽候本會命令，根據盟邦協定，執行受降之一切決定。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恪守盟邦共同協議之規定，各部隊勿再擅自行動。”[353]

他還通過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命令岡村寧次，規定日本陸海空軍只能向蔣或何指定的部隊指揮官投降[354]。岡村寧次自稱，他努力執行了這一命令，拒絕向八路軍投降。[355]

汪朝光教授認為，老蔣這一決定相當關鍵。我黨因此被迫放棄了奪取大城市的原定方針，改為佔領廣大農村與中小城市[356]。竊以為，毛改變主意，主要還是因為斯大林制止了他。而且，如東北經驗昭示的那樣，當時奪取大城市對中共也未必是好事。不過此舉畢竟防止了大量武器落到共軍手裡。

在向收復區進軍一事上，蔣介石也未曾如李宗仁所稱那樣，私心自用，提防雜牌，故而沒有採取他建議的“波浪式推進”。早在 8 月 12 日，侍從室就提出了“發動全線部隊從速推進，並特別派遣部隊進據各重要據點”、“飭各戰區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州、武漢、徐州、青島、濟南、東北等地推進”，以及請求美國幫助空運海運部隊等建議[357]。第一戰區胡宗南部、第二戰區閻錫山部和第十二戰區傅作義部很快就分別進佔了太

原、鄭州、歸綏、大同等戰略要地。只是由於劉少奇命令共軍“用糾纏扭打的戰法”，“徹底破壞所有鐵道”[358]，政府軍才未能順利全面接收華北。

傅作義、閻錫山都是所謂雜牌，然而蔣介石並未讓他們停留在原地不動。北上接收平津的第十一戰區孫連仲所部三個軍（曾崇義的三十軍，高樹勳的新八軍以及馬法五的四十軍）也都是雜牌[359]，並未如李宗仁所言，是被胡宗南所部胡博翰摻了沙子[360]。可見李宗仁的指控有挾嫌報復之嫌。蔣介石犯的最大錯誤，還是如前文所述，未能及時搶佔南滿，阻斷關內外共軍交通。

不過李宗仁其他指控倒確屬真情。例如他說，蔣介石命令日軍集中在幾個點聽候繳械，遺留的若干戰略據點則聽任共軍搶佔，更使得原來通行無阻的津浦、平漢等重要交通線被共軍截斷，直至大陸易手時都未能恢復，這倒基本是事實。更惡劣的是，如李宗仁所說，他不但拒絕改編偽軍，而且連國軍的敵後遊擊隊都斥之門外，逼得這些人當了八路。

蔣介石關心的似乎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日軍繳械，並迅速將他們遣送回國，以致一面求美國人幫助運送國軍，一面又動用本來就很落後的運輸力量去忙這不急之務。據岡村寧次說，“中國政府動員全部水陸交通部門，為此甚至影響了一般交通，造成了經濟惡果”，使得 200 萬日本軍民在戰後 10 個月內即全部撤回日本[361]。

此乃老蔣最大的昏招。那時的當務之急，是讓日偽軍嚴格維持現狀，打退共軍的非法進攻，直到國軍前來接防。當時英國人在東南亞就是這麼做的，否則馬來亞等地早被共黨遊擊隊接管了。蔣介石這麼做的結果，是使得國府對華北只進行了空洞的接收，廣大鄉村、中小城市乃至重要的交通線都落在了共黨手中。

李宗仁的另一指控，是國府在戰後整編裁軍，削弱了自己，壯大了八路。

他說，陳誠就任軍政部長後，第一項重要命令就是將收復區的偽軍及有功抗戰的遊擊隊一律解散。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 40 萬偽“滿洲國軍”被強行遣散，“此舉直如晴空霹靂，數十萬偽軍頓時解體，林彪乃乘機延攬，偽軍的精華遂悉為中共所吸收”。其他地區的偽軍和抗日遊擊隊也是這樣，他們奉命集中解散，原有防地卻無國軍接防，讓共軍乘虛而入。這些部隊長官久候無著落，又奉嚴令，不准就地籌措給養，走投無路便投向共黨。李目擊陳誠這樣無理蠻幹，勸告陳誠說，這種幹法是替共產黨湊本錢，陳卻自負地說：“他們要到共產黨那裡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鍋煮掉！”

李還說，陳誠借裁軍和整編軍隊，消滅異己，大量裁撤雜牌部隊，或是將雜牌與嫡系“混編”，不僅製造了大量的失業軍人，而且打亂了原有的指揮系統，使得士氣消沉，戰鬥力也大為下降，云云[362]。

李氏這一指控基本屬實，而這就是老蔣犯的第四個錯誤。但並不是他說的“蔣先生私心自用，消滅異己”。老蔣真要這麼幹，那後來也不會有那麼多臨陣倒戈的部隊了。而逃過了三大戰役的桂系，也就無法在中央軍主力被基本消滅後，成了配合我黨顛覆國府江南半壁江山的決定性因素。

當時所謂“國軍”，實在是五花八門的軍閥部隊的大雜燴，編制和指揮系統異常混亂，政出多門，軍令和軍政分為兩個獨立系統，各軍兵種之間更談不上什麼協同配合。此乃自辛亥乃至晚清傳下來的背時遺產，一直未能清理。抗戰前蔣氏每次想解決這問題，都要觸發軍閥大戰。抗戰使得軍閥們除桂系外基本失去了

槍桿子，此乃實行軍隊國家化的天賜良機。否則若還是戰前那個各地擁兵自雄的烏煙瘴氣模樣，談何國家統一？

既然要整編，自然要汰弱留強。無論是在抗戰還是戡亂戰爭中，中央軍都是主力部隊，更忠實可靠，也更有戰鬥力，岡村寧次本人就相當尊重湯恩伯，覺得他是勁敵。雜牌部隊在抗戰初期倒是打得很英勇，但後來受不了共軍的擠兌襲擊，便紛紛投降日軍了。中央軍倒還不曾出過大規模投敵的事，岡村寧次就承認他當初決定誘降防區內的國軍，是因為那些部隊不是中央軍，可見連敵人都知道國軍不同派系的忠誠度區別。既然如此，新編國軍當然只能以中央軍為主力，李宗仁再吃醋也沒道理。

可問題是，老蔣偏偏沒有這麼幹。據著名共諜郭汝瑰說：

> “這時政府既未打開和平途徑，又未定和戰決心，整軍工作卻又正在進行，這使我迷惑不解。……我記得一次在西大講堂召集軍師長們開會討論整軍問題，軍師長們都怕整到自己，硬說整軍不公道，主張各軍師一律裁減三分之一，以示公允。於是蔣介石決定各軍師平均裁減。”[363]

所以，所謂老蔣排斥異己云云，基本是馮玉祥、李宗仁之類失意野心家編造出來的。郭汝瑰就曾說，傅作義不但被蔣介石任命為華北剿匪總司令，“而且深得蔣介石的信賴。關於華北作戰事宜，除訓令指示企圖、方針外，悉由傅作義全權主持，不干涉其作戰部署。”就連他在平津戰役前夕作出的戰略部署，事前也不報告國防部。[364]

竊以為，老蔣想裁軍，首先還是郭汝瑰看出來的那個原因——那時他還“未定和戰決心”。更準確地說，與我黨的宣傳相反，他當時並不想剿共。他對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人毫無理性認識，誤以為那些人會參加“民主憲政”，與國民黨一道“和平建

國”。再加上國家經歷了八年戰禍，軍民都極度厭戰，他並非罔顧民意的大獨裁者，不可能輕易下定開戰決心。再加上國民黨奉孫文為國父，“憲政”乃是孫氏“建國大綱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早在抗戰前蔣介石就準備沽名釣譽實行憲政了，只是因為抗戰才被迫延遲。戰後出自老美的壓力，他只能宣佈進入憲政時期。既然是要準備實行憲政，那就不能隨便與中共開戰，只能與之和談。而且，他總以為中共即使造反，也不難蕩平，根本沒預料到後來內戰會打那麼大。

既然不準備打仗，那當然就得裁軍，蓋殘破的國家實在難以養活如此龐大的軍隊；其次是美國人的影響。近代軍隊編制本來就是從西方引入的，國人一直在仿效西方強國。等到老美成了最強國，老蔣和陳誠自然想按美軍模式改建國軍。陳誠認為美國只有 90 個師就能應付大戰，國軍裁到 100 個師又有何不可？蔣介石雖改為 120 師，但仍同意陳誠的主張。此昏招連徐永昌都看不下去，在日記中預言：“殊不知我人民教育及軍官養成皆非美比。其結果不裁至最後則已，否則將見其徒損失器械與僨事也。”[365]

雖然老蔣裁軍不能說是完全出自排斥異己的私心，但至少參謀總長陳誠確實如此。他不但是主張裁軍最力之人，而且借此機會任用私人，排除異己，裝備補充，多偏重於他的嫡系第十八軍等部隊，而對其他部隊則多予剋扣留難，以致眾怨沸騰[366]。著名共諜郭汝瑰說：

> “圍繞著整軍，蔣軍內部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奇怪的是，蔣、白、陳都堅決反共，而整軍的態度各不相同。蔣介石堅決反共，國共兩軍在全國已廣泛展開戰鬥，蔣軍將領許多人都叫囂停止整軍，但蔣介石還是要整，陳誠希圖迎合蔣

介石意旨取寵，也大聲疾呼整軍，對於蔣軍要整，對滿洲國及汪偽部隊，更要整編，聲稱國防軍不能容納偽軍，以保持國防軍的純粹性。……白崇禧認為內戰不可避免，反對整軍。”[367]

這就是老蔣犯的大錯：在中共一門心思地準備推翻國府時，他卻不顧內部反對，一意孤行解除自己的武裝，完全是亡國昏君的幹活。從 1945 年初至 1946 年初，國軍陸續裁了 110 萬人，編制減少了約三分之一。1946 年初，軍政部還計劃在 18 個月內進一步裁軍 208 萬人，將全軍縮編為 50 個師。就連地方保安團隊也要復員三分之一[368]。雖然這個宏偉規劃因全面內戰爆發而不得不在 7 月份終止，但此前的裁軍任務已經如期完成。國軍至少裁減了 150 萬人。而共軍則在此期內瘋狂擴張，只是為了應付美國人，從地方部隊中裁去了 11 萬老弱病殘，而且他們都得到了妥善安置，並無生計問題。[369]

這結果便是李宗仁說的，將大量無謀生技能的職業軍人推向社會，撒手不管他們的死活。據重慶警備司令孫元良回憶，僅重慶一地即有登記失業軍官 4 千多人[370]。1947 年 5 月 12 日，中央訓練團將官班失業學員 500 餘人，至孫中山墳前痛哭流涕，表示若不能按目前待遇發給編餘者，將繼續向行政院請願，史稱“哭陵事件”，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371]

由此在失業軍人中產生了那個著名的歌謠：“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投八路。”據杜聿明說，1948 年 4 月間國民大會開會期間，在白崇禧作軍事報告時，全體代表不約而同大喊：“殺陳誠以謝國人！”山東國大代表趙庸夫大喊：“勝利後不收編山東偽軍，把三十萬遊擊隊逼上梁山，應請

政府殺陳誠以謝國人。”[372] 這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壯觀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運動吧。

蔣介石自己也認了錯。1947 年 2 月 26 日，他指出國軍軍心不振、士氣不高有三個原因：“第一，是因為前方在作戰，中央在談判，以致使得前方官兵的心理彷徨，不知道究竟爲什麼作戰？第二，是一面作戰，一方裁軍，前方官兵人人自危，恐怕縮編，影響士氣甚大。第三，是前方死傷的官兵不能公開發表，明令撫恤，戰死戰傷者毫無榮譽，也是士氣低落的一個原因。”[373]

老蔣這反省非常準確，可見此人頭腦還是清楚的，而且不乏反躬自省、公開認錯的能力，與老毛完全是兩回事。他這些話確實正中竅要，只是尚須最後點破，他列舉的這三條弊病，都是因為他既對共黨本性缺乏認識，用我黨的行話來說就是“和平麻痹思想嚴重”，又是他“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倒無妨，反正那陣絕非搞民主之時），瞻前顧後，優柔寡斷，頗多婦人之仁造成的。

國府在戰後犯的第五個錯誤，便是推出三大惡政，使得國府聲望在國民心目中達到頂峰後，迅即坐上“過山車”，在最短期限內便卓有成效地跌到谷底，當真應了揚雄的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抗戰是中國近現代第一次在對外戰爭中獲得完勝，不但失土盡復，而且收回了喪失半個世紀、本來絕無可能收回的臺灣與澎湖。不僅如此，自民初以來中國一直爭取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努力終於奏效。西方列強相繼放棄了租界、協定關稅、治外法權等特權，與中國簽訂了平等條約。唯一的例外，是赤色爛污社會帝國主義蘇聯趁人之危、強加給國府的不平等條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斯大林曾親口向毛澤東等人承認，該條約是不平等

條約）。中國取代了日本在亞洲的地位，崛起為當時所謂“四強”之一（其時法國還沒讓英美扶持起來，因此名義上主宰世界事務的是中蘇英美四強），成了聯合國的發起國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與中國在一次大戰後作為戰勝國的遭遇相比不啻天壤，不能不讓國民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極大滿足。

因此，無論是在大後方各地召開的慶功大會上，還是在國府大員重返淪陷區的歡迎儀式上，人民都對國民政府首腦及其代表表達了真誠的擁戴與歡呼。李宗仁自己就有這體會：

> “10 月 26 日我本人率領副參謀長甘沛澤、主任秘書黃雪邨等專機飛平。北平市民聽說我將於是日到達，竟全城轟動，從機場到城內夾道歡迎的數十萬人，歡聲震天，令人感動。因華北同胞為敵偽壓迫八年之久，今一朝重獲自由，對政府派來坐鎮華北的最高軍政長官的熱烈歡迎，實是出於至誠。”[374]

那可不是如同後世我黨組織起來的虛假民意演示，完全是人民的自發行動，凡是“解放”前過來的老前輩都能告訴你這一事實。

然而“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全國人民咬緊牙關，苦熬了整整八年，盼的就是戰爭結束後過兩天輕鬆日子，可惜卻大失所望。他們盼來的國民黨經不住抗戰中艱苦卓絕的環境的考驗，已經極大地腐敗了，再不是當年那個尚有朝氣、基本清廉的革命黨。在大後方過夠了窮日子的大員們一旦回到相對不那麼殘破的淪陷區，當然免不得個個垂涎三尺，要好好地“堤外損失堤內補”一番了。

這結果便是李宗仁痛陳過的三大惡政。

第一就是藉貨幣兌換肆無忌憚地搶劫淪陷區人民的財富。用李宗仁的話來說是：

“剛勝利時，淪陷區中偽幣的實值與自由區中的法幣，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規定偽幣與法幣的兌換率為二百比一。以致一紙命令之下，收復區許多人民頓成赤貧了，而攜來大批法幣的接收人員則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復地區的失盡人心，莫此為甚。”[375]

這指控完全屬實。據汪朝光先生介紹，1945 年 9 月 9 日，陸軍總部發佈命令，規定接收後一律使用法幣，自 9 月 12 日起，各銀行一切往來交易亦應一律使用法幣[376]，卻又未明確規定兌換率，接收官員便借此上下其手，牟取利益。9 月 27 日，財政部公佈法幣與偽中儲券的兌換比率為 1 比 200。“可憐收復區同胞，他們盼到天亮，望見了祖國的旌旗，他們喜極如狂，但睡了幾夜覺之後，發覺了他們多已破家蕩產，手上所僅有的財產籌碼—偽幣，差不多已分文不值。”[377]

這完全是針對本國國民的選擇性歧視與放肆掠奪，欲不激起廣大收復區人民的憤怒，其可得乎？據說這是共諜冀朝鼎向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獻的毒招。即便確實如此，國府也不能藉此開脫罪責——若非這毒招打動了決策者的貪欲，獻策者又豈能售其奸？

第二大惡政便是“五子登科”的“劫收”，所謂“五子登科”乃是當時民間的嘲諷，指“劫收大員”們下車伊始便專搶金子、銀子、房子、車子、女子。張恨水曾寫了本同名小說加以諷刺。那可不是誇張，李宗仁也說了：

“當時在北平的所謂‘接收’，確如民間報紙所譏諷的，實在是‘劫收’。這批接收人員吃盡了抗戰八年之苦，

一旦飛入紙醉金迷的平津地區，直如餓虎撲羊，貪贓枉法的程度簡直駭人聽聞。他們金錢到手，便窮奢極欲，大事揮霍，把一個民風原極淳樸的故都，旦夕之間便變成罪惡的淵藪。中央對於接收職權的劃分也無明確規定，各機關擇肥而噬。有時一個部門有幾個機關同時派員接收，以致分贓不均，大家拔刀相見。無法解決時，便來行營申訴，我這身為最高長官的行營主任竟成了排難解紛的和事佬。”[378]

這些爛事，其實國府當時就承認了：

“既未先設整個統一之機構，亦無統一指揮接收之大員”；“特派員頭銜者不知若干名，接收機關不下數十處，各不相謀，各自為政，明為接收，實為搶攘。”[379]

“接收辦法公佈既晚，且復一再變更，致敵偽事業，先經軍事機關接收，復經地方機關接收，又經主管機關接收，接收一次，損失一次，至於不肖官吏軍警勾結地痞流氓，明搶暗盜，所在多有，損失更所不貲。敵偽強佔或強租強買人民房屋，經各機關接收後，任意佔用或封鎖，使人民無屋居，此為各城市之普遍現象，喪失人心，莫此為甚。”[380]

第三大惡政特別混賬，乃是所謂“甄審”，李宗仁也說了：

“最令當時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這批接收官員為便於敲詐人民，故意製造恐怖氣氛，隨意加人以漢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時漢奸帽子亂飛，自小商人以至大學教授隨時有被戴上漢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戰期間沒有退入後方的人，都人人自危。於是頗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學者和居民來向我泣訴，希望能稍加制止。”

“這些案件中最令人不平的要算是協和醫學院內幾位知名教授的遭遇了。盧溝橋事變後，協和醫院因受美國保護，

其教授均未隨國軍西撤。迨太平洋戰事爆發，協和醫院為偽政權接收，這幾位教授無法離平，只得仍留院內。因此被特務加上‘偽教授’甚或‘漢奸’的罪名，逐出醫院，不許聘用。這幾位先生衣食無著，乃托人向我申訴，我一時也想不出解決方法，後來我忽然想到他們既是第一流的醫學師資，而廣西醫學院正鬧師荒，何不請他們到廣西屈就些時呢？他們聞言，都異口同聲說，如蒙李主任替我們找到工作，使妻兒免於饑寒已感激不盡，至於地點，我們就顧不得許多了。我隨即發一專電給廣西省省主席黃旭初，旋接渠覆電歡迎。我乃贈他們一些路費前去廣西，才解決了這難題。至其他大中學的教授、教員處境的淒慘，就可想而知了。”[381]

他這兒說的老教授遭受無辜迫害、獲得他的救援的個案無從落實，但國府確實在收復區實行過這種無天理的惡政。

9 月間，教育部發佈《收復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甄審辦法》，規定凡敵偽所辦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一律需經過甄審合格後，才能承認其學歷；政治性學校學生及赴敵國留學者不予登記。[382]

北大學生因此向社會發出公開呼籲：

“固然淪陷的政府是偽的，應絕對予以解散，然而淪陷區的老百姓絕不能指其為偽。固然淪陷區的行政機構是偽組織，有政治性的訓練班或學校應予以解散，然而在學術機關的學校讀書的學生，因為無力赴內地求學，又無力入私立學校，不得已而委曲求全，這種只以求知識為目的的學生，是不能指其為偽的。……我們不幸落入敵人的魔手中，受敵人的宰割和屠殺。我們需要的是撫慰，是鼓勵，是督促，是指導，而不是懲罰，不是歧視，不是擯棄!”[383]

政府和軍隊無力保護人民，致使人民淪入敵偽魔掌，等到光復後，無能的政府不向收復區的人民沉痛謝罪，反而誣指人民為“偽”！天下乃有“偽人民”乎？！莫非人民可以是一種非法成立的權力機構？

這種惡政“為淵驅魚”的神效，連情治系統都看出來了：“自甄審條例頒佈後，一般學生因恐懼而生苦悶……奸偽及民主同盟則針對學生隱痛，以謙虛、和藹、忍苦、耐勞之態度，在學生群內爭取領導地位，收穫頗大。”[384]

從上述一系列失誤來看，蔣介石丟了大陸，確實是“自作孽，不可活”。在某種意義上，在所謂“解放戰爭”或“戡亂戰爭”中，是國民黨輸了，不是共產黨贏了。即使是共產黨贏了，那也不是毛的軍事才能所致，靠的主要是蘇聯人輸出的軟硬件，外加毛在抗戰八年中為我黨搭好的演出威武雄壯的活劇的舞臺。

結語

眾所周知，毛澤東當國最突出的特點，是他的好大喜功之荒誕離奇，到了無從想像、難以置信的地步。他不但抱負遠遠超出能力，理想完全脫離實際，而且以其政策之違背簡單生活常識而獨步古今中外。毛澤東時代以“小高爐煉鋼”、“畝產十四萬斤糧”、“誰說雞毛不能上天”、“巧婦能為無米之炊”、“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三年超英，五年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千古笑話名垂青史。上下兩千年，環球八萬里，下令全國農民將田地深翻一米，每畝施上一萬斤肥，將秧苗密植到因無法通風而腐爛的地步；命令全國人民無論三百六十行的哪一行，統統改行去煉鋼，而且日日夜夜不許睡覺、必須通宵苦戰的皇帝，唯此一人而已，當真是“千古一帝”，誰也沒指望能跟他攀比。

這構成了我幾十年的困惑。自 1970 年代初覺醒後，我就一直在琢磨：毛在當國前那麼明智，那麼謹慎，事事量力而行，從來反對各種各樣“左傾機會主義者”們形形色色的冒險行徑，處處強調“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為何在當國後會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這轉變是怎麼發生的？爲什麼過去那個既“反

左”、又“防右”的精明的現實主義者，會變成了一個夢遊病患者？

很明顯，成功的陶醉與權力的毒化並不能解釋這種天性的實質性變化——豈不聞“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斯大林就是個最雄辯的反例。同為大獨裁者，論個人擁有的權勢，他遠遠超過毛——毛不過是一國之君，而他是全世界共產黨國家的共主；論臣民的無限崇拜，個人迷信就是他發明的，毛不過是從父皇那兒學過來而已；論功業，斯大林將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超級大國，戰勝了納粹德國，極大地擴張了疆域，在 20 世紀還複製成吉思汗的故事，擁有 11 個子汗國，其豐功偉績根本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毛澤東可以夢見的。然而斯大林至死也未喪失其精明而謹慎的天性。雖然蘇聯在二戰後擁有的龐大武力絕非西歐可以匹敵，但他仍然深知美蘇國力差距，只敢在安全限度內作最大限度的擴張，從不敢越過安全線去，引發蘇美直接對抗。為此，他幾次在衝突行將爆發時忍辱後退，1948 年的柏林危機與 1950 年爆發的韓戰就是生動的例證。那時他已在晚年，無論是蘇聯的國際聲望，還是他本人在國內外的威望，都因戰勝納粹德國達到了頂峰，然而他並未因此而沖昏頭腦，作出有可能殃及國家民族的蠢事來。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也喜歡搞邊緣政策，可每次都不知當在何處止步，因而使得中國三次險遭超級大國核打擊（第一次是麥克阿瑟建議用原子彈轟炸東北，並沿鴨綠江施放核廢料；第二次是 1958 年金門危機期間，艾森豪威爾總統一度考慮對中國大陸使用核武器；第三次則是 1969 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曾準備對中國實行全面核打擊）。如果說他因衰老而喪失了往

昔的精明，那他把中國拖入韓戰乃是登極不久的事，爲什麼還會幹出這種蠢事來呢？

直到近年我開始閱讀中共黨史資料，才發現過去的困惑完全是個偽問題。原來，咱們的政治教科書、歷史教科書、革命回憶錄，乃至一切官方出版的虛構與非虛構作品描繪的偉大統帥，不過是個神話形象，猶如神通廣大的孫悟空一般，根本就不曾存在於世間。毛的“左性”是從娘胎裡帶出來的。除了大革命那段時間，他從來都是“左”的，有的遠大理想，諸如以兩三萬人的兵力千里迢迢地從陝北打到南京去，其宏偉壯麗絲毫也不亞於後來的大躍進。

因此，我原來假想的毛當國之後發生“性格突變”的問題根本也就不存在。他當國前後的區別只在於：

第一，當國前，他頭上還有父皇在關鍵時刻為他把舵，多次為他撥正船頭，指引航向，避開了激流險灘。當國後，尤其是在蘇共 20 大後，他便唯我獨尊，為所欲為，再無上司約束。

第二，戰爭與建設不同。前者的偶然因素更多。即使是不顧一切的豪賭，也可能歪打正著。北上投奔蘇聯的孤注一擲最後竟然逢凶化吉，就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在毛的一生中，這並非絕無僅有的一例，不能不讓後人懷疑冥冥之中是否真有天意在焉。跟所謂“紅羊劫”應於“洪楊劫”一般，“朱毛劫”有可能是上天註定了中國人民必須承受的苦難。與此相反，經濟建設不是賭博，其成敗由必然因素決定，胡來一氣只能招致大饑荒。

第三，打仗與治國的後果不一樣，前者弄不好會危及毛澤東本人的身家性命，而後者則任由他再怎麼胡折騰，餓死的也只會是草民。因此，在打天下時，毛不能不強迫自己收束“浪漫”天性，畢竟不敢天馬行空，任性胡來。例如在所謂“第二次反共高

潮”中，他一度準備以 15-20 萬精兵突襲國府後方。若那只是個經濟決策，那麼不管會引出多大災難，他都會毫不猶豫地付諸實行。然而因為那涉及到搶天下的大業，他就不能不戒慎恐懼，反復籌思，如癡如病，提醒同僚和自己：“魯莽不得，錯誤不得，此時錯一著，將遺爾後無窮之患”[1]，最後還是沒敢動手。這也是他何以在當國前能“虛懷納諫”，當國後便再聽不得半句逆耳之言——後果不同使之然也。

同理，中共大員們可以在和平時期先意承旨，為討聖上歡心“大放衛星”，“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造出來”，反正饑荒來了也餓不著他們，但在戰時因為性命交關，就不能不委婉抵制毛的亂命，從而限制了毛瞎指揮的惡果。

原來的偽問題消散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再自然不過的疑問：這麼一個連腦子都不大正常的渾人，何以還會備受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狂熱崇拜，被吹成“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天才”？

細想答案是令人痛苦的。剝去那些無恥捏造的神話，毛澤東真正超出同儕之處，是其厚黑學功夫天下無兩。他贏得黨內一致的衷心欽佩，使得延安整風有了發動的可能，完全是因為他在抗戰初期力排眾議，主張中共將內戰偽裝為外戰，而正是這一戰略方針，使得中共在此後兩三年內以奇跡般的速度崛起，向大眾證明了他的高瞻遠矚。

可這一主張之無恥，就連堅信“爲了實現崇高目的，可以使用最下流的手段”的共產黨人都難以接受。張國燾同樣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共黨魁首，“白雀園大肅反”就記載了他的豐功偉業，其報復政敵的殘酷狠辣也為他殺害曾中生等人充分顯示。然而他在抗戰之初耳聞目睹毛的言行時，也不能不憤怒地感到：“毛澤

東的想法和由此出發點而來的所作所為，其實是幫助日本侵略，毛澤東將會遺害中共和八路軍以及整個中國，簡直是一個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漢奸。”[2] 我相信這憤怒是真誠的，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由於權力鬥爭的失敗，而是他殘存的天良底線被無情突破引出的憤怒吶喊。可決定勝敗存亡的，恰是政客們底線的破除程度。與受過五四影響的張國燾不同，王明並沒有什麼國家民族觀念，但他卻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線。而正是他對莫斯科的忠誠，構成了他覆亡的重大原因。說到底，毛澤東從一個腦子不大正常的怪物變成了大英雄與智多星，是中共革命那種汰優存劣的強大負篩選的必然產物。

悲劇在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並不完全是中共從莫斯科舶來的，也是中國的腐惡傳統之一。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毛澤東與粟裕、劉伯承、林彪等人的關係，頗有點像劉邦與韓信的關係，也就是權術家與軍事家的關係。而所謂權術大師，就是練就了“道德金鐘罩”功夫，渾身上下沒有道德或情感的“練門”，因而不可能被競爭對手尋瑕抵隙，制於死命。如果韓信也像劉邦那樣，能把親生兒女從車上踢下去，能微笑著慫恿項羽把他親爹烹了，能在鴻溝停戰後立即背約偷襲，那也就不會因感念劉邦知遇之恩，而“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了。

因此，使毛澤東獲得成功的所謂“軍事才能”，其實也就是祖傳的“瞞天過海”、“借刀殺人”、“趁火打劫”、“無中生有”、“隔岸觀火”、“笑裡藏刀”、“李代桃僵”、“順手牽羊”、“混水摸魚”、“金蟬脫殼”、“假途伐虢”、“偷樑換柱”、“指桑罵槐”、“上屋抽梯”那些“三十六計”。他之所以被國人目為天才，除了黨神話的洗腦作用外，正是因為這些陰

謀詭計非但不被國人鄙棄，卻歷來被視為大智慧。其實，正如本書表明的，毛是個陰謀家而不是軍事家，是厚黑學大師而非合格的戰爭統帥，是“狹隘經驗主義者”而不是理論家，遑論思想家。在中共奪權戰爭中，他顯示的不是什麼軍事才能，而是出神入化的厚黑學神功。毛澤東的成功，證明了“人至痞則無敵”的中國真理。

這也就是蔣相對于毛的最大主觀劣勢之一。作為毛的競爭對手，蔣介石固然時常優柔寡斷，多謀無斷，瞻前顧後，多慮善變，不是一個合格的軍事統帥，但論戰略眼光恐怕並不比毛差。他遠不如毛的，還是不會玩弄陰謀詭計。兩次國共合作史，便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的歷史。換今天的任何一個中國人去坐他那位置，都絕不會幹出那一系列蠢事來：對國家民族的固執的愛遠超對權位的眷戀；對自身的公眾道德形象的珍惜壓倒了權謀考慮；對中共屢次放虎歸山；對共諜和貳臣一貫“用人不疑”，等等。這原因很簡單：現代中國人個個是吃狼奶長大的，從小就將《東郭先生和狼》、《農夫和蛇》等寓言記得滾瓜爛熟，擅長“陰暗心理分析”國術，專用邪惡心思揣摩他人，講究的是不按規矩出牌，以口蜜腹劍、出爾反爾欺騙一切人為大智慧，而且奉“痛打落水狗”為座右銘，以心狠手辣為意志堅定，視“除惡不盡”為最大惡德，視“宋襄公蠢豬式的仁義道德”為最大恥辱。可惜老蔣無幸蒙受我黨啟蒙教育，卻在《四書》、《五經》的薰陶中長大，尤其崇奉王陽明的“心學”。用這套去對付我黨，當然要一敗塗地，更要被現代國人由衷鄙視。

今日中國的最大悲劇，恰在於毛的成功引起了無數人真誠的欽服與贊佩，從而百倍強化了這種顛倒的價值觀，在大多數人（不說是全民吧）心目中確立了“光榮＝成功規模×死亡人數×

手段的無恥度”的公理。誰越不拿中國人的生命當回事兒，誰越會受到尊重，誰就是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好、用得最活。君不見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解放軍少將朱成虎在紀念世界原爆60 周年之際，對外國記者團口吐狂言，聲稱在臺灣海峽出現衝突、美軍進行干預的情況下，中國將考慮對美國動用核武器，毀滅美國幾百個城市，而中國也準備西安以東的城市全部被美國毀滅，就此一舉成名，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大英雄，“西安以東”四字成了感天地泣鬼神的“民族氣節”的同義語；而正是因為把卑鄙無恥、不按規矩出牌視為聰明才智，波瀾壯闊的“人民投毒造假戰爭”才會在今日神州大地上轟轟烈烈地興起，遍及全國每個角落。

這，或許就是毛澤東留給中華民族最沉重的文化負遺產。要清除這深重的精神污染，不知道還需要多少代人持之以恆的自覺努力。

2011 年 5 月 26 日於屠龍技癢齋

註釋：

引論

1《劍橋中華民國史》，網絡版：
http://www.shuku.net:8082/novels/baogaowenxue/jqzhmgs/jqzhmgs91.html
2《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第 1186—1187 頁。轉引自楊奎松：《武漢國民黨的"聯共"和"分共"》，《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3 C.A.達林：《中國回憶錄 1921-1927》，208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
4 陳雲：《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黨的文獻》2001 年第 4 期。
5 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 11 月 18 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http://www.wxyjs.org.cn/GB/186508/186513/186634/186644/11349957.html
6 《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162、163 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年。
7 《長春圍困戰》，《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96191.htm
8《冀朝鼎》，《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7931.htm
9《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http://www.wxyjs.org.cn/GB/186508/186513/186629/186633/11349818.html
10 趙振華：《義縣戰役紀要》，《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106 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 年。
11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404-405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78 年。

12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61，30，93 頁，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 年。

13《曾希聖傳》編纂委員會：《忠誠的戰士光輝的一生———重溫李先念為〈曾希聖傳〉所作序言有感》，

http://www.hudong.com/wiki/%E6%9B%BE%E5%B8%8C%E5%9C%A3

14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352，362，387，409 頁解放軍出版社，1984 年

15 宋侃夫口述、齊特整理：《歷史是這樣的——紅四方面軍電臺始末》，《百年潮》，2010 年第四期。

16 稻葉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36 頁，中華書局，1981 年。

17 蔣介石：《國軍剿匪必勝的原因與剿匪戰術的改進》，1947 年 4 月 15 日，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27 頁。

18 蔣介石：《對匪軍陰謀詭計與戰略戰術之分析》，1948 年 3 月 13 日，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27-28 頁。

19 蔣介石：《剿匪期間攻防作戰之要領“，1948 年 2 月 5 日，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28 頁。

20 劉鳳翰整理：《蔣緯國口述自傳》，電子書，無頁碼。

21 周一平：《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在軍事戰線上的貢獻》，《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2 期；王紀一：《朱德在解放戰爭中的歷史貢獻》，《黨的文獻》，2003 年第 5 期。

22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52-253 頁，東方出版社，1998 年。

23 粟裕：《對今後作戰建軍之意見》，1948 年 1 月 22 日，《粟裕軍事文集》，PDF 版電子書，其頁碼與紙質書籍不同，故未注明，下同。

24《李宗仁回憶錄》，614-615 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年。

25《蔣緯國口述自傳》，電子書。

26《郭汝瑰回憶錄》，288 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

27《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1215 頁。

28 何方：《黨史筆記》，第三篇，TXT 電子書，無頁碼。

第一章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PDF 版電子書，雖有頁碼，但與正式出版物不同，故不註，下同；《中央致前委信》，1927 年 8 月 1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238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

[2] 中央文獻研究室等：《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2 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該書其餘各卷出版年代相同，不另注。

[3]《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421 頁。

[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4 頁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PDF 版電子書。

[6]《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7 頁。

[7]《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8] 同上。

[9]《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1929 年 9 月 1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751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 年。

[10]《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11] 同上。

[12]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 114-115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13] 白瑜：《湖南五四運動、驅張運動與毛澤東的發跡》，《傳記文學》雜誌總第 211 號，1979 年。

[14]《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15]《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二）》，1929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779-780 頁。

[16]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52-60 頁；朱德：《在編寫紅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3585/74082/5051373.html

[17]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150，152 頁。

[18]《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二）》，1929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776-777 頁。

[19]《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1929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752 頁。

[20]《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778 頁。

[21]《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22]《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關於軍閥混戰的形勢與紅軍的任務》，1929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488-489 頁。

[23]《黃克誠自述》，100-101 頁，人民出版社，1994 年。

[24]《龔楚將軍回憶錄》，171 頁。

[25]《龔楚將軍回憶錄》，205-207 頁。

[26]《龔楚將軍回憶錄》，230-231 頁。龔楚此處記憶細節有誤，毛將秋收起義老部下何長工調去 28 團當黨代表沒錯，但何長工原是 32 團黨代表，並非 31 團，參見《何長工回憶錄》，151 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此外，朱毛爭端是因為毛取消了紅四軍軍委，以他把持的前委代之，龔楚記錯了名稱。

[27]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63-64 頁，2003 年。

[28]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80 頁。

[29]《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781 頁。

[30] 此據《龔楚將軍回憶錄》，但他指揮的 29 團逃散後，他本人便被派往湖南，半路遭到伏擊受傷，輾轉逃到香港，最後轉到廣西，並沒有參加第三次反會剿，可能是他聽老上級朱德講的。

[31]《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781-782 頁

[32]《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755-756 頁；《蕭克回憶錄》，PDF 電子書，無頁碼。

[33]《蕭克回憶錄》，PDF 版電子書，無頁碼。

[34]《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關於軍閥混戰的形勢與紅軍的任務》，1929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480 頁。

[35]《王力反思錄》，512-513 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36]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網絡版。

[37]《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38] 同上書。

[39] 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32 頁。

[40]《蕭克回憶錄》，PDF 版本電子書，無頁碼。

[41]《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07.htm。

[42]《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43]《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779 頁

[44]《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關於軍閥混戰的形勢與紅軍的任務》，《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478 頁

[45] 韓偉：《毛委員教導我們用兵作戰》，《星火燎原》，電子書，無頁碼。原文為 1928 年 12 月，據《毛澤東年譜》改為 1927 年 12 月。

[46]《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47] 愛德格·斯諾：《關於朱德》，載《紅星照耀中國》第十篇，網絡版。

[48]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267 頁，新華出版社，1985

[49] 朱德：《在編寫紅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3585/74082/5051373.html

[50]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158 頁。

[51]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86 頁。

[52]《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關於軍閥混戰的形勢與紅軍的任務》，《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480 頁。

[53]《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09.htm。

[54]《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772 頁。

[55]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186 頁。龔楚這兒的回憶顯係"倒放電影"——把後來發生的事前移了。國內近年研究表明，毛的"農村包圍城市"觀念是後來才形成的，以 1936 年 12 月毛澤東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為標誌。因此，龔楚所說的不是全國戰略，而是當時使用的攻打縣城的戰術。

第二章

[1] 請參看拙著：《野蠻的俄羅斯》，165-167 頁，明鏡出版社，2010 年。

[2]《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229 頁，人民出版社，1984 年。

[3] 王德京：《馬林來華與國共合作》，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 64 輯，131 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 年。

[4] 唐寶林：《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歷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5] 轉引自叶曙明：《中國 1927·誰主沉浮》，花城出版社，2010 年 11 月，網絡版，http://www.guyizhou.cn/article/13241.htm

[6] 王德京：《斯大林與托洛茨基關於中國第一次國共合作問題的分歧》，《中共黨史資料》，第 45 輯，88-92 頁。

[7]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www.marx.org/chinese/chenduxiu/marxist.org-chinese-chen-19291210.htm；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118-119 頁。

[8] 王德京：《馬林來華與國共合作》，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 64 輯，144-145 頁。

[9] 轉引自徐世強：《活躍在中國革命舞臺上的共產國際代表》，《黨史博覽》2010 年第 2 期

[10]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373-379 頁。

[11]《中共六大政治決議案》，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資料庫，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8/4527130.html

[12]《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212 頁，人民出版社， 1959 年。

[1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第 5 冊，328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年。

[14]《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紅旗》， 1928 第 31 期。轉引自朱皓：《陳獨秀在中東路事件宣傳上與中共中央的分歧》，《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 5 月第 21 卷第 3 期。

[15]《中東路是不是屬於中國的主權》 紅旗， 1929 第 33 期。引文出處同上。

[16] 周恩來：《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1930 年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下），314，321，326 頁

[17]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440-441 頁。他這段證詞相當準確，不但李德在回憶錄中數次譴責李立三乃至毛澤東企圖將蘇聯拉入戰禍，而且胡喬木在 1990 年的談話中的有關介紹也與此一致（參見李思慎、劉之昆：《李立三之謎》，載新浪讀書，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8912_20356.html

[18] 楊奎松：《毛澤東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5-36 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19]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 年 12 月），載《王明言論選輯》，頁 361、364，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電子書，下同。

[20]王明：《中國蘇維埃區域的經濟政策》，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年），222-223 頁，

[21]《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 年 8 月 3 日）。

[22]《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 年 4 月 20 日）。

[23]《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 年 9 月 16 日）。

[24] 參見王明：《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1935 年 8 月 7 日），載《王明言論選輯》，449 頁。以上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電子書。

[25]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電子書。

[26]《毛澤東、彭德懷致洛甫電》，1936 年 4 月 9 日，《文獻和研究》，1985 年第 3 期。

[27] 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 年 6 月 20 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477 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

[28]《斯內夫利特筆記——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國共兩黨關係的討論》，1923 年 6 月 12 日-20 日之間，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460 頁。

[29] 同上，465 頁。

[30] 同上，470 頁。

[31] 同上，465 頁。

[32] 馬林致 Zinoviev 等，1923-6-20，見 Saich1991，p.616，轉引自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28 頁。

[33]《斯列帕克給維經斯基的信》，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317 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

[34]《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35] 同上書。

[36] 同上書。

[37] 轉引自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29 頁

[38]《張國燾給維經斯基、穆辛的信》，1923 年 11 月 16 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505 頁。

[39] C.A.達林：《中國回憶錄 1921-1927》，152、155、156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

[40] 楊奎松：《走近真實》，47-48 頁；《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41]《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42] 余育國：《擔任國民黨中宣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文史月刊》，2008 年第 6 期。

[43]布哈林對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草案的修正案》，不晚於 1923 年 5 月 24 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254-255 頁

[44]《就中國農民問題與孫逸仙和廖仲愷的談話》，1924 年 8 月 10 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515-516 頁。

[45]《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按，毛此時在國民黨內的職位似是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46]《湖南全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日刊》，第 339—340 頁，轉引自楊奎松：《武漢國民黨的"聯共"和"分共"》，《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47]《鮑顧問在省黨部第四次代表大會之演說》，1927 年 1 月 8 日《漢口民國日報》，第 1 張第 4 頁;《鮑顧問在湖北省黨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之演說辭》，1927 年 1 月 23 日《漢口民國日報》，第 1 張第 1 頁，轉引自楊奎松：《武漢國民黨的"聯共"和"分共"》，《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48]1927年2月22日長沙《大公報》，第7版，轉引自楊奎松：《武漢國民黨的"聯共"和"分共"》，《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9]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102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215頁。

[50] 楊奎松：《武漢國民黨的"聯共"和"分共"》，《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51] 參見毛澤東在土地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上的發言《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89頁，轉引自楊奎松：《武漢國民黨的"聯共"和"分共"》。

[52]《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32—1235頁，轉引自楊奎松：《武漢國民黨的"聯共"和"分共"》。

[53]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117頁。

[5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1-2頁。

[5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和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600-611頁，轉引自楊奎松：《走近真實——中國革命的透視》，66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56]《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48-49頁。

[57]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119頁。

[58]《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59] 劉少奇：《關于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1937年2月26日，轉引自黃崢：《王光美訪談錄》，
http://book.sina.com.cn/nzt/his/wgmftanlu/9.shtml

[60]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215頁。

[61]《鮑羅廷的劄記和通報（摘錄）》，不早於1924年2月16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470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

[62]《湖南致中央函》，1927 年 8 月 20 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編》，第三冊，354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

[63]祝彥：《評陳獨秀與"立三路線"的分歧與爭論》，《江西社會科學》，2003 年第 11 期。

[64] 賈蔚昌：《再論毛澤東關於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形成——兼評十年來的討論》，《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 年第 4 期；范龍堂：《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思想形成的再認識》，《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刊），2002 年第 2 期。

[65] 劉焱：《周恩來也是開創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先驅》，《南開學報》，1994 年第 1 期；黃林毅：《鄧小平在廣西領導革命鬥爭期間對"城市中心論"的抵制和鬥爭》，《桂海論叢》，1996 年第 4 期。

[66] 楊奎松：《走近真實》，174-175 頁。

[67]《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68] 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 年 4 月 5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59、62、60、63 頁。

[69] 轉引自蓋軍：《關於毛澤東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戰略思想的歷史考察》，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 44 輯，115 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年。

[70]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 年 1 月 5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134-135 頁。

[71]《紅四軍部隊情況報告》，轉引自蓋軍：《關於毛澤東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戰略思想的歷史考察》，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 44 輯，121 頁。

[7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PDF 版。

[73]《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74]《毛澤東給贛西南特委轉閩西特委並轉中央的信》，轉引自蓋軍：《關於毛澤東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戰略思想的歷史考察》，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編：《中共黨史資料》，第 44 輯，128-129 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年。

[75]《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76]《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08.htm。

[77] 彭德懷記錯了，那是中原大戰（蔣馮閻大戰）而非頭年的蔣桂戰爭。

[78]《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79] 同上。

[8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169-170 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

[81] 同上

[82]《張宗遜回憶錄》，87-88 頁，解放軍出版社，1990 年。

[83] 轉引自蓋軍：《關於毛澤東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戰略思想的歷史考察》，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 44 輯，129 頁。

[84]《江西黨史資料》(第 6 輯)，第 127 頁，本條以及以下四條注解的史料，均轉引自歐陽小松：《"不打南昌打吉安"？——對《毛澤東傳》中一則標題的準確性問題的探析》，《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 年第 1 期。

[85] 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1930 年 9 月 17 日，《江西黨史資料》(第 6 輯)，134 頁。

[86]《紅一軍團由萍鄉出發向吉安前進的命令》，1930 年 9 月 23 日，《江西黨史資料》(第 6 輯)，145 頁。

[87]《江西黨史資料》(第 6 輯)，152 頁。

[88] 毛澤東：《給中央的信》，1930 年 1O 月 14 日，《江西黨史資料》(第 6 輯)，第 164 頁；《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89]《江西黨史資料》(第 6 輯)，153 頁。

[90]《紅一方面軍前委會、江西省行動委員會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51 頁。

[91]《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92] 同上，368 頁。

[93]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3，211-212 頁。

[94]《周恩來年譜》，PDF 版，無頁碼。

[95]《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96]《周恩來年譜》，PDF 版電子書，無頁碼。

[97]《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關於軍閥混戰的形勢與紅軍的任務》，《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476 頁。

[98]《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99]《中共六大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案》，中國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資料庫，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8/4527098.html

[100] 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32-34 頁。

[101]《前委開除江漢波黨籍決議》（1930 年 4 月 4 日），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576－577 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02]《富農問題——1930 年 6 月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同上書，398－99、400、402、404、410、413 頁。

[103]《蘇區中央局關於士地問題的決議案》（1931 年 8 月 21 日），同上書，445、448 頁。

[104]《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於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後的中心任務》，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 7 冊，361、357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105]《毛澤東傳 1893—1949》（上），第 313-314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6 年版。

[106]《楊尚昆 1986 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演變》，《炎黃春秋》，2009 年第 3 期。

[107]《邱會作回憶錄》（下），31、30 頁，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

[108] 劉少奇：《農業工會十二縣查田大會總結》，蘇區中央局：《鬥爭》第34期，1933年11月12日，轉引自黃道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原因探析——不以中共軍事政策為主線》，《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下同。

[109] 邵式平：《閩贛省查田突擊運動的總結》，《紅色中華》第181期，1934年4月28日。

[110] 毛澤東：《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蘇區中央局：《鬥爭》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111]《勝利于都地主富農企圖逃跑》，《紅色中華》第96期，1933年7月26日；《贛縣查田運動勝利中的缺點》，《紅色中華》第124期，1933年11月11日。

[112] 項英：《于都檢舉的情形和經過》，《紅色中華》第168期，1934年3月29日；陳壽昌：《萬泰工作的轉變在哪里？》，蘇區中央局：《鬥爭》第39期，1933年12月19日。

[113]《關於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問題，人民委員會訓令中字第一號》，《紅色中華》第164期，1934年3月20日。

[114]《人民委員會為萬太群眾逃跑問題給萬太縣蘇主席團的指示信，1934年4月3日》，《紅色中華》第173期，1934年4月10日。

[115]《中共粵贛省委、省蘇給各地指示信，1934年8月9日》，《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936》，中央檔案館1984年編印，第46頁。

[116] 張聞天：《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蘇區中央局：《鬥爭》第67期，1934年7月10日，以上轉引自黃道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原因探析——不以中共軍事政策為主線》，《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17]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電子書。

[118]《前委通告第一號》（1930年2月16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173頁，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電子書。

[119]《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90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0]《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 年 5 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477－78、480 頁。

[121]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8 冊，18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122]《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123]《西江縣—紅五月擴紅突擊中的第二名》，《紅色中華》第 199 期，1934 年 6 月 7 日，轉引自黃道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原因探析——不以中共軍事政策為主線》，《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5 期，下同。

[124]《閩贛省槍斃反革命首領兩隻》，《紅色中華》第 180 期，1934 年 4 月 26 日。

[125] 張聞天：《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蘇區中央局：《鬥爭》第 67 期，1934 年 7 月 10 日。

[126] 李一氓：《模糊的螢屏——李一氓回憶錄》159 頁，人民出版社，1992 年，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127] 楊會清：《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前後》，《黨史文苑》2009 年第 05 期。

[128]《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129]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45，122-123 頁

[130]《毛澤東年譜》，電子書。

[131]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8 冊，530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13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298-299 頁。

[133]《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134] 同上書。

[135] 同上書。

[136]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電子書。

[137]《周恩來年譜》，電子書。

[138]《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頁 216，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文章發表日期則根據《毛澤東年譜》作了訂正。

[139]《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140]《中央革命根據地史要》，305 頁。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14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 13 卷，146-147 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年。

[14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8 冊，249 頁。

[143]《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 13 卷），164 頁。

[144] 以上電文均來自《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145]《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 年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八冊，530-531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146]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727 頁。

[147] 高華：《“肅ＡＢ團”事件的歷史考察》，《二十一世紀》，1999 年 8 月號。

[148] 轉引自楊會清：《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前後》，《黨史文苑》2009 年第 05 期。

[149]《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 13 卷），212-214 頁。

[150]《黃克誠自述》，101 頁。

[151] 轉引自楊會清：《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前後》，《黨史文苑》2009 年第 05 期。

[152] 轉引自楊會清：《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前後》，《黨史文苑》2009 年第 05 期。

[153] 施昌旺：《王稼祥傳》，107 頁，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54]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30-31 頁。

[155] 曹春榮：《周恩來在中央蘇區創建過程中的重大貢獻》，人民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692162.html

[156]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721-743 頁。

[157]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728 頁。

[158]《蕭勁光、陳雲、蕭華、程世才致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電》，1947 年 3 月 31 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250 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

[159]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490-768 頁。本節所引毛主席語錄全是同一來源，下不一一注明。

[160] 黃道炫：《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政策考察——以廣昌戰役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黃道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原因探析——不以中共軍事政策為主線》，《近代中國研究》，http://jds.cass.cn/Article/20051029111526.asp

[161] 蔣介石 1933 年 10 月 17 日戰字二一三號訓令，《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五次進剿戰史》上，第三章第 12 頁。

[162] 蔣介石 1934 年 3 月 13 日致陳誠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 2 冊，第 402 頁。

[163] 蔣介石 1934 年 5 月 1 日致蔣鼎文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 2 冊，第 403 頁。

[164] 蔣介石 1934 年 5 月 1 日致湯恩伯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 5 輯第 1 編（軍事四），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2 頁。

[165] 蔣介石 1934 年 9 月 19 日致顧祝同電，《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 5 輯第 1 編（軍事四），第 109 頁。

[166]蔣介石 1934 年 10 月 11 日電，《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 5 輯第 1 編（軍事四），第 269 頁。

[167]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57 頁

[168] 蔣介石皓酉行戰六手令，1933 年 11 月 19 日，《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五次進剿戰史》上，第四章第 21 頁。

[169]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60 頁。

[170]《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軍事問題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電報》，《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 3 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09 頁。

[171] 米夫：《中國革命危機的新階段》，原載《共產國際》1933 年 4 月號，蘇區中央局：《鬥爭》第 23 期轉載，1933 年 8 月 22 日。

[172] 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複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關係編年史 1919-1991》，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1 頁。

[173]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複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關係編年史 1919-1991》，第 247 頁。

[174]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底任務》，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第 3 卷，日本汲古書院 1973 年版，第 87 頁。張聞天：《閩贛黨目前的中心任務》，蘇區中央局：《鬥爭》第 71 期，1934 年 9 月 7 日。

[175] 王明：《新條件與新策略》，第 21 頁，莫斯科，1934 年編印（出版者不詳）。

[176]《中共中央給閩浙贛省委信，1934 年 10 月 4 日》，《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上），第 653-654 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

[177] 項英：《挺進遊擊隊的任務，1933 年 11 月 6 日》，《項英軍事文選》，第 251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 年。

[178] 項英：《對閩浙贛工作的指示，1933 年 8 月 26 日》，《項英軍事文選》，第 126 頁。

[179] 張聞天：《閩贛黨目前的中心任務》，蘇區中央局：《鬥爭》第 71 期，1934 年 9 月 7 日。

[180]林彪：《短促突擊論》，中革軍委《革命與戰爭》第 6 期，1934 年 7 月。

[181]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58 頁。

[182]《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183]《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0.htm。

[184]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91-92 頁。

[185] 黃道炫：《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政策考察——以廣昌戰役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

[186]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92 頁。

[187] 黃道炫：《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政策考察——以廣昌戰役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

[188]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93 頁。

[189]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93-94 頁。

[190]《博朱關於廣昌戰況及決令二十八日晨放棄廣昌致電周》，1934 年 4 月 29 日，《江西黨史資料》第 21 輯(下)，第 82、83 頁。

[191]《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0.htm。

[192] 黃道炫：《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政策考察——以廣昌戰役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

[193]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94-95 頁，97-98 頁，102-104 頁。

[194]《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0 冊，第 465—466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195]《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196]《紀念紅軍長征勝利 70 周年》，《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299/index.html

[197] 黃道炫：《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政策考察——以廣昌戰役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

[198]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27 頁。
[199]《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文獻和研究》，1985 年第五期。
[200]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449 頁,“康□”，原文如此。
[201]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78-279 頁。
[202]《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關於紅軍行動方針給王明同志電》，1936 年 8 月 21 日，《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203]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93、95 頁。
[204]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36-38 頁
[205]《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0.htm。
[206]《毛澤東年譜》（上），400-401 頁。
[207]《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199、214、255，321-322 頁。
[208]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757 頁。
[209] 這是毛澤東在《關於赫魯曉夫及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標準之一，每一條都先指責赫魯曉夫的錯誤，後給出正確做法，但他對赫魯曉夫的指責，恰是為他自己度身定做的。
[210]《李宗仁回憶錄》，484 頁。
[211]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63 頁。
[212] 同上，84-85 頁。
[213] 同上，85-88 頁。
[214]《紅色中華》，1934 年 8 月 1 日，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215]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89 頁。
[216]《楊尚昆回憶錄》，147-148 頁。

[217]《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0.htm。
[218] 同上，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1.htm。

第三章

[1] 奥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9 頁；《彭德懷自述》，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1.htm
[2]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戰史》，電子書，無頁碼。
[3] 《歷史的回顧》，232-233 頁，336 頁。
[4] 《歷史的回顧》，411 頁；《中國紀事》，167 頁。
[5] 《蕭克回憶錄》，PDF 版電子書，無頁碼；《毛澤東年譜》，電子書。
[6] 《蕭克回憶錄》。
[7] 《紅二十五軍長征》，《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2809.htm
[8]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21 頁。
[9]《楊尚昆回憶錄》，135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
[10]《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黎平會議》，《紅軍長征紀念館》，
http://changzheng.china1840-1949.net.cn/jghy2.htm
[11]《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12] 同上。
[13] 《聶榮臻回憶錄》，251 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 年。
[14]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182-185 頁，PDF 版電子書。
[15] 《聶榮臻回憶錄》，251 頁。
[16] 同上，185 頁。
[17]《楊尚昆回憶錄》，134-136 頁。
[18]《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19] 同上書。

[20]《楊尚昆回憶錄》，124 頁。

[21] 同上，485 頁。

[22]《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1.htm；《楊尚昆回憶錄》，125 頁；《聶榮臻回憶錄》，252-253 頁。

[23] 同上，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1.htm。

[24] 同上。

[25]《聶榮臻回憶錄》，252-253 頁。

[26]《楊尚昆回憶錄》，125 頁。

[27]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118 頁，人民出版社，1998 年 3 月。

[28]《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1.htm。

[29]《黨中央爲粉碎敵人新的圍攻赤化全貴州告全黨同志書》，《中共中央文件選編》第十冊，495-496 頁。

[30]《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31] 李鏡：《新寫長征圖文檔案》，388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 8 月。

[32]《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33]《彭德懷年譜》，118 頁。

[34] 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史政局編《剿匪戰史》［5］，第 884 頁。

[35] 貴州人民出版社：《紅軍轉戰貴州》第 123 頁。

[36]《彭德懷年譜》，118 頁。

[37]《楊尚昆回憶錄》，127 頁；《彭德懷年譜》，119 頁。

[38]《楊尚昆回憶錄》，128 頁。

[39] 轉引自周繼強：《聶榮臻在紅軍長征中的重大貢獻》，《軍事歷史》，1999 年第 6 期。

[40]《楊尚昆回憶錄》，132 頁。

[41]《中國紀事》，155 頁。

[42]《中國紀事》，171、190 頁。據李德說，紅一方面軍在巴西會議後整編，總數只有九千至一萬二千人，其中有七千至一萬戰士。被扔下的紅五、九軍團總數五六千人。兩者相加，紅一方面軍在與四方面軍會師時總數應為 1.5-1.8 萬人。

[43]《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44]《何長工回憶錄》，336-338 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45]《聶榮臻回憶錄》，258-259 頁；《楊尚昆回憶錄》，132-133 頁。

[46]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55 頁、157 頁。

[47] 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71-72 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年。

[48] 張聞天：《1943 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 221。

[49]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 1986 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演變》，《炎黃春秋》2009 年第 3 期。

[50]《楊尚昆回憶錄》，134-135 頁。

[51]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電子書。

[52]《楊尚昆回憶錄》，133-134 頁。

[53]《黃克誠自述》，135 頁。

[54]《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1.htm。

[55]《楊尚昆回憶錄》，135 頁。

[56] 宋侃夫口述、齊特整理：《歷史是這樣的——紅四方面軍電臺始末》，刪節本載於《百年潮》，2010 年第四期。此處引用的是全本，筆者通過私人通訊獲得。

[57]《何長工回憶錄》，103、127、151 頁

[58]《對我軍南進的三點意見》，1947 年 8 月 12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193 頁。

[59]《楊尚昆回憶錄》，136 頁。

[60]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57 頁、166 頁。

[61]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27 頁。

[62] 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載《文獻和研究》，1985 年第 5 期。

[63]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75-176 頁。

[64]《歷史的回顧》，439-440 頁。

[65] 括弧裡的問號是原有的，下同。

[66]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449-451 頁。

[67]《毛澤東年譜》，電子書。

[68]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340 頁，華文出版社，2002 年。

[69] 關於毛澤東捏造假情報騙得中央星夜出逃的考證，請參看拙著《紅一、四方面軍草地分裂真相》，《國共偽造的歷史》，明鏡出版社，2010 年。

[70] 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文獻與研究》，1985 年第 5 期。

[71]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27 頁。

[72]《毛澤東年譜》，電子書。

[73]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201-202 頁。

[74]《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關于紅軍行動方針給王明同志電》，1936 年 8 月 21 日，中心檔案 495/74/283，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224 頁；《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75]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494-495 頁。

[76]《楊尚昆回憶錄》，162-163 頁。

[77]《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1.htm。

[78]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28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

[79]《中國紀事》，201-204 頁。

[80]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320 頁。

[81]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256-257 頁。

[82]《中國紀事》，253 頁，271 頁。

[83] 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454 頁。

[84]《楊尚昆回憶錄》，172 頁。

[85] 同上，115 頁。

[86]《楊尚昆回憶錄》，151 頁。

第四章

[1]《中國紀事》，207 頁。

[2] 林育英、張聞天二同志致四方面軍電》，1936 年 2 月 14 日。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30 頁。

[3]《洛甫致毛澤東電》，1935 年 11 月 20、25 日，同上，31 頁。

[4]《毛澤東給洛甫的信》，1935 年 12 月 1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408-409 頁。

[5]《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1.htm。

[6]《李德關於紅軍渡過黃河後的行動方針問題的意見書》，1936 年 1 月 27 日。

[7]《毛澤東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1935 年 12 月 23 日，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40 頁。

[8]《毛澤東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1935 年 12 月 23 日，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41 頁。

[9]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 1986 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演變》，《炎黃春秋》2009 年第 3 期。此處"背靠內蒙"應為"背靠外蒙"之誤，蓋當時並無"內蒙"的行政區劃，毛是想挺進到綏遠（今內蒙中西部）去，背靠外蒙，

[10] 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55 頁。

[11]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 1986 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演變》，《炎黃春秋》2009 年第 3 期。

[12]《中國紀事》，214-217 頁。

[13]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483 頁。

[14]《洛甫等對戰略計畫的意見》，1936 年 1 月 31 日。《周博致毛彭轉政治局諸同志電》，1936 年 1 月 31 日。《李德關於紅軍渡過黃河後的行動方針的意見書》，1936 年 1 月 27 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57 頁。

[15]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 1986 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演變》。

[16] 同上。

[17]《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1936 年 5 月 8 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95 頁。

[18]《中國紀事》，216 頁。

[19]《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6 年 6 月 28 日，《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2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401-405 頁。

[21]《中國紀事》，222 頁。

[22]《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1.htm。

[23]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08-210 頁。

[24]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400 頁。

[25]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10-211 頁。

[26]《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2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551-552 頁。

[28]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227-228 頁。

[29]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201 頁

[30]《楊尚昆回憶錄》，168 頁。

[31]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115-119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32]《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和時機問題》，1936 年 6 月 29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551 頁。

[33]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157-158 頁。

[34]《歷史的回顧》，514 頁。

[3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553-554 頁。

[36] 譯自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p31. 括號中的問號是英文編者所加的，原文所指地名使用了頭兩個字母的縮寫："Ur"，故編者推斷為全詞是"Urumqi"（烏魯木齊）。

[37]《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38]《西安事變新探》，236-238 頁。

[39]《歷史的回顧》，514-515 頁。

[40]《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書記處電》，1936 年 10 月 24 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241 頁。

[41]《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央書記處電》，1936 年 11 月 3 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244 頁。

[42]《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43]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493-494 頁。

[44]《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45] 同上，

[46]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496 頁。

[47]《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48] 同上書。

[49]《歷史的回顧》，497 頁。

[50] 同上，498-499 頁。

[51]《彭德懷年譜》，154 頁。

[52]《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53]《楊尚昆回憶錄》，147-148 頁。

[54]《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55] 同上書。

[56] 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259 頁。

[57]《洛甫致國際書記處電》，1935 年 11 月 20 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264 頁

[58]《張聞天致王明、陳雲電》，1936 年 12 月 5 日，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256-257 頁。

[59]《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http://www.unitedcn.com/06jssj/02huiyilu/pdhzs/11.htm

[60]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531 頁。

[61]《歷史的回顧》，497 頁。

[62]《彭德懷年譜》，162 頁。

[63]《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64] 同上書。

[65] 張國燾：《我的回憶》

[66]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554-562 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67]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719 頁。

[68]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759 頁

[69] 同上 763 頁。

[70]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532 頁。

[71]《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72]《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73]《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74]《歷史的回顧》，556 頁。

[75]《西安事變新探》，244 頁。

[76]《西安事變新探》，259 頁。

[77]《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78]《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79] 同上書。

[80] 同上書。

[81] 同上書。

[82] 同上書。

[83] 同上書。。

[84] 同上書。

[85] 同上書。

[86] 同上書。，

[87] 同上書。

[88] 程世才：《悲壯的歷程》，載中共張掖地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印：《紅西路軍史料》第一、二輯，第 74 頁，轉引自董漢河：《陳昌浩與西路軍——西路軍人物論之二》，《甘肅社會科學》1998 年第 6 期。

[89]《楊尚昆回憶錄》，154 頁。

[90] 蘆笛：《張學良為何發動西安事變》，《國共偽造的歷史》，342-378 頁，明鏡出版社，2010 年。

[91]《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1935 年 5 月 8 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100 頁。

[92]《中共代表團會議記錄》，1936 年 4 月 19 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182 頁。

[93]《鮑格莫洛夫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的電報》，1935 年 12 月 19 日，《中蘇外交文件選譯》，李玉貞譯，《近代史資料》總 79 號，225 頁

[94]《洛甫致王明、康生、陳雲同志電》，1936 年 7 月 2 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122-3 頁

[95] 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網絡版，
http://www.my285.com/js/xxmj/09.htm

[96]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331 頁

[97]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335 頁

[98] 稻葉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47-50頁，中華書局，1981

[99] 愛德格•斯諾：《紅色中國散記》，2-3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

[100] 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76-7 頁，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326-7 頁

[10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683 頁。

[102] 宋毅軍：《中共在西安事變前後的軍事戰略防禦》，《軍事歷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

[10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685 頁。

[104]《毛澤東致張學良電》，1936 年 12 月 17 日，《文獻與研究》，1986 年第 6 期。

[10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686 頁。

[106] 蘆笛：《宋慶齡是否為斯大林轉過密電》，《國共偽造的歷史》，379-392 頁，明鏡出版社，2010 年。

[107]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347 頁

[108]《西安事變簡史》，93-4 頁；《毛澤東致任、彭電》，1936 年 12 月 25 日，《文獻和研究》，1986 年第 6 期，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389 頁

[109]《西安事變新探》，390 頁

[110]《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出網絡版，

http://www.wxyjs.org.cn/GB/186508/186513/186629/186630/11349914.html

[111]《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電》，1937 年 1 月 19 日，《中共黨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西安事變新探》，399-400 頁

[112]《洛甫、澤東致周、博電》，1936 年 1 月 4 日，《文獻和研究》，1986 年第 6 期

[113]《西安事變新探》，410-1 頁

[114]《西安事變新探》，413 頁

[11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777 頁。

[116]《蔣介石致楊虎城書》，1937 年 1 月 10 日，《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110-1 頁

[117]《西安事變新探》，418 頁

[118]《張學良致楊虎城等函》，《張學良致王以哲、何柱國等函》，1937 年 1 月 13 日，《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110-1 頁

[119]《張學良文集》，1122 頁

[120]《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133-6 頁

[121]《西安事變新探》，424-5 頁

[122]《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博古電》，1937 年 1 月 21 日，《文獻和研究》，1986 年第 6 期

[123]《西安事變新探》，423-4 頁

[124]《中共黨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125]《西安事變新探》，441 頁

[126]《西安事變新探》，412 頁

[12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789 頁。

[128]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271 頁。

第五章

[1]《聶榮臻回憶錄》，508 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 年。

[2]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83 頁

[3]《毛澤東關於國內形勢和應付投降、力爭時局好轉致周恩來》，1940 年 11 月 3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8-39 頁。

[4]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380-1 頁

[5]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386-8 頁

[6]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388-391 頁

[7]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289-290 頁

[8] 王紹軍、張福興：《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戲》，《中外書摘》2005 年第 11 期。

[9]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410-1 頁

[10] 李銳：《盧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網絡版：
http://www.17794.com/book

[11]《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洛甫同志在白區黨代表會議上報告之一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 冊，227，229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12]《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 年。

[13]《陳毅年譜》（上）261-262 頁，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4]《中共中央關於在反磨擦鬥爭中應採取攻勢防禦戰術的指示》，《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940 年 3 月 5 日，53-54 頁。

[15]《毛澤東軍事年譜》，312 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6]《彭德懷自述》，網絡版：http://bbs.jconline.cn/cgi-bin/view.cgi?forum=2&topic=22500

[17]《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洛甫同志在白區黨代表會議上報告之一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 冊，229，232 頁。

[18] 李銳：《盧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網絡版：
http://www.17794.com/book

[19]《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20]《邱會作回憶錄》，112 頁，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

[21]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71 頁，2003 年。

[22]《關於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原則的指示（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致彭德懷》，《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 冊，339-340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23]《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朱德等電》，1940 年 12 月 22 日，《彭德懷年譜》，242 頁，人民出版社，1998 年。

[24]《毛、朱、王致彭、左電》，1941 年 5 月 10 日。轉引自楊奎松：《抗戰期間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文獻資料述評》，載《社會科學》，2006 年第 2 期。

[25]《毛、朱、王致彭德懷電》，1941 年 5 月 17 日，出處同上

[26]李銳：《盧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網絡版：
http://www.17794.com/book

[27]《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28]《彭德懷自述》，網絡版：http://bbs.jconline.cn/cgi-bin/view.cgi?forum=2&topic=22500

[29]《毛澤東軍事年譜》，335 頁。

[30] 楊奎松：《開卷有疑》，81，84 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

[31] 王紹軍、張福興：《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戲》，《中外書摘》2005 年第 11 期。

[32] 指借用閻錫山的合法名義，使用他的語言推行中共的一套。朱、彭曾指示薄一波："表面上戴'閻的帽子'，說'山西話'，實際上完全做共產黨的事。有些事我們出面做不到，而閻錫山能幫我們做到，何樂而不為呢！"（轉引自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266 頁）

[33]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209，250，253-256 頁。

[34]《陳毅年譜》，248 頁，人民出版社，1995 年。

[35]《葉飛回憶錄》，157 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 年。

[36]《岡村寧次回憶錄》，33 頁，中華書局，1981

[37] 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133 頁，開放出版社，2006 年 9 月。

[38] 李銳：《盧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網絡版：
http://www.17794.com/book

[39] 唐利國：《關於國民黨抗日遊擊戰的幾個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7 年第 1 期

[40] 洪小夏：《抗戰時期國民黨敵後遊擊戰研究述略》，《抗日戰爭研究》2003 年第 1 期

[41] 參見何應欽對國民黨五屆八中、十中、十一中、十二中全會的軍事報告，浙江省歷史學會現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抗日戰爭軍事報告集》(下)，第 22、134、197、223 頁，1986 年內部發行，轉引自洪小夏：《抗戰時期國民黨敵後遊擊戰研究述略》，《抗日戰爭研究》2003 年第 1 期

42《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43《毛澤東軍事年譜》，275 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44]《中共中央對新四軍發展方針的指示》，1940 年 1 月 19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52 頁。

[45]《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46]《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毛澤東軍事年譜》，262 頁。

[47]《毛澤東關於國內形勢和應付投降、力爭時局好轉致周恩來》，1940 年 11 月 3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8-39 頁。

[48]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85-87 頁。

[49]《毛澤東軍事年譜》，276 頁。

[50]《毛澤東軍事年譜》，318 頁。

[51]《毛澤東軍事年譜》，264 頁。

[52]《毛澤東軍事年譜》，278 頁

[53]《朱德年譜》，212-213 頁，人民出版社，1986 年。

[54]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273，276，279-280 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年。

[55]《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4856/74857/5095526.html

[56]《彭德懷年譜》，220-221 頁，人民出版社，1998 年。

[57]《朱德年譜》，215 頁。

[58]《彭德懷年譜》，222 頁。

[59]《毛澤東軍事年譜》，293 頁

[60]《朱德年譜》，215 頁。
[61]《彭德懷年譜》，223 頁。
[62]《彭德懷年譜》，224 頁。
[63]《朱德年譜》，217 頁。
[64]《彭德懷年譜》，224 頁。
[65]《朱德年譜》，217 頁。
[66]《彭德懷年譜》，224 頁。
[67]《彭德懷年譜》，226 頁；《朱德年譜》，219 頁。
68《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69《中央書記處致中共中原局》（1940 年 3 月 14 日）。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17 頁。
70《中央及中央軍委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1940 年 2 月 10 日），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17 頁。
[71]《毛澤東軍事年譜》，273 頁。
[72]《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73]《毛澤東軍事年譜》，275 頁。
[74]《中共中央對新四軍發展方針的指示》，1940 年 1 月 19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53 頁。
[75]《陳毅年譜》，264 頁。
[76]《陳毅年譜》，265 頁。
[77]《陳毅年譜》，266 頁。
[78]《彭德怀年譜》，226 頁。
[79]《陳毅年譜》，270 頁。
[80]《陳毅年譜》，269 頁。
[81]《葉飛回憶錄》，157-159 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 年。
[82]《陳毅年譜》，272 頁。
[83]《毛澤東軍事年譜》，312 頁；《陳毅年譜》，274 頁。
[84]《陳毅年譜》，276 頁。

[85]《陳毅年譜》（上），275 頁。

[86]《毛澤東軍事年譜》，313 頁

[87]《陳毅年譜》（上），277 頁。

[88]《毛澤東軍事年譜》，314 頁

[89]《陳毅年譜》（上），280 頁。

[90]《葉飛回憶錄》，177 頁；《陳毅年譜》（上），280-284 頁。

[91]《毛澤東軍事年譜》，317 頁

[92]《陳毅年譜》（上），287-288 頁。

[93]《陳毅年譜》（上），288 頁。

[94]《陳毅年譜》（上），291 頁。

[95]《毛澤東軍事年譜》，318 頁。

[96]《陳毅年譜》，293 頁。

[97]《陳毅年譜》，294 頁。

[98]《陳毅年譜》，294-297 頁。

[99]《毛澤東軍事年譜》，321 頁

[100]《毛澤東軍事年譜》，322 頁

[101]《陳毅年譜》，301 頁。

[102]《陳毅年譜》，304-307 頁。

[103]《毛澤東軍事年譜》，322 頁

[104]《毛澤東軍事年譜》，322 頁。

[105]《陳毅年譜》（上），310 頁。

[106]《陳毅年譜》（上），317-319 頁。

[107]《陳毅年譜》（上），321 頁。

[108]《陳毅年譜》（上）323-325 頁。

[109]《彭德懷年譜》，241 頁。

[110]《毛澤東軍事年譜》，335 頁

[111]《毛澤東軍事年譜》，336 頁

[112]《毛澤東軍事年譜》，337 頁

[113]《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114]《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115]《毛澤東軍事年譜》，341 頁。

[116]《共黨二年來在各地破壞抗戰之非法行動紀實》，1940 年 3 月印行，42-55 頁。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13 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117]《共黨問題處理辦法最高原則》（1939 年 9 月 27 日）；《對某黨應取態度之原則》（1940 年 2 月 1 日），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藏檔，特 009/16-12，15。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11-412 頁。

[118]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四）第 50643 號。417 頁。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11-412 頁。

[119]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9 廿五）973。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19 頁。

[120]《何應欽、白崇禧致朱彭總副司令、葉挺軍長電》（1940 年 10 月 19 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504-506 頁。

[121]《彭德懷年譜》，240 頁。

[122]《毛澤東軍事年譜》，326 頁

[123]《蔣委員長令》（1940 年 12 月 9 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1985 年印，第 521 頁；《徐永昌致蔣委員長簽呈》（1940 年 12 月 10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第 114 頁。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載《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124]《何應欽關于解決江南新四軍呈蔣委員長》（1940 年 12 月 3 日），來源同上。

[125]《困勉記》卷六十三，1940 年 12 月 25 日條，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來源同上。

[126]《周恩來關于和蔣介石談話情况給毛澤東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21－122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

[127]《第三十二集團軍進剿匪軍計劃》，1940年12月29日，《皖南事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頁，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128]《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二），第520頁，來源同上。

[129]《何應欽關於"解決"江南新四軍給徐永昌的親筆函》，1940年12月3日，《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21頁。

[130]《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08頁，來源同上。

[131] 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32-433頁。

[132]《毛澤東、朱德關於皖南新四軍應分批經蘇南北移致葉挺、項英》，1940年12月30日，《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17頁。

[133]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134]《新四軍軍部關於決定全部經蘇南北移報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並致劉少奇、陳毅》，1941年1月1日，《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18頁。

[135]《毛澤東、朱德關於同意皖南新四軍立即開往蘇南致葉挺、項英》，1941年1月3日，《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19頁。

[136]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36頁。

[137]《顧祝同關於迅速進剿皖南新四軍給上官雲相的密令》，1941年1月6日，《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33頁。。

[138]《徐永昌日記》（1941年1月8日條）第六册，第6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139]《困勉記》卷六十四，1941年1月12日條，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國民政府在皖南事變前對四十八軍所發陰謀部署之密電》（1941年1月），《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09頁，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140]《徐永昌日記》（1941年1月15日條），第六册，第11-12頁。

[141]《困勉記》卷六十四，1941 年 1 月 16，17 日條，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142]《毛澤東軍事年譜》，342-343 頁。
[143]《毛澤東軍事年譜》，343 頁。
[144]《毛澤東年譜》（中），PDF 版電子書。
[145]《彭德懷年譜》，245 頁。
[146]《毛澤東關于"一·一七"命令後形勢的估計給劉少奇的通報》（1941 年 1 月 23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 187 頁。
[147]《彭德懷年譜》，245 頁。
[148]《毛澤東關于時局發展情況給周恩來的通報》（1941 年 1 月 30 日）；《毛澤東關于請問崔可夫蘇聯何時可以公開援助我們給周恩來電》（1941 年 1 月 30 日），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09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149]《毛澤東關於蔣介石發佈"一·一七"命令後國共關係的變化及我之對策致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1941 年 1 月 20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引文中"遠方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諸字被刪節，據楊奎松引用之原件填入，參見楊著：《毛澤東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08-109 頁；《毛澤東軍事年譜》，344-345 頁。
[150]《毛澤東軍事年譜》，347 頁。
[151]《毛澤東軍事年譜》，347 頁；《陳毅年譜》，338 頁
[152]《劉少奇年譜》（上），PDF 版電子書，無頁碼。
[153] 毛澤東：《關於蔣介石政治動向的估計》，1941 年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3 冊，46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154]《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3 冊，46 頁。
[155]《毛澤東關於目前蔣介石反共政策的實質及我之方針致周恩來等》，1940 年 11 月 30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04 頁
[156]《陳毅年譜》，346 頁。

[157]《陳毅年譜》，361 頁。

[158]《岡村寧次回憶錄》，327-328 頁

[159]《毛澤東關於國內形勢和應付投降、力爭時局好轉致周恩來》，1940 年 11 月 3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8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年。

[160] 轉引自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144 頁。

[161]《陳毅年譜》，357 頁

[162]《毛澤東軍事年譜》，365 頁。

[163]《陳毅年譜》，360-361 頁。

[164]《彭德懷年譜》，289 頁。

[165]《毛澤東軍事年譜》，364 頁。

[166]《中央關於敵偽軍偽組織的工作決定》，1941 年 8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3 冊，182 頁。

[167]《關於冀南平原對敵鬥爭的指示》（1941 年 6 月 9 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劉伯承、鄧小平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3 冊，125 頁。

[168]《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1941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3 冊，第 212 頁。

[169]《中央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後抗日根據地工作的指示（1941 年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3 冊，264 頁。

[170]《中共中央關於徵調敵後大批幹部來陝甘寧邊區保留培養的決定》，1943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4 冊，3-4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

[171]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282 頁。

[172]《周佛海日記全編》（下），713，715，716 頁，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 年。第三則日記中某句原點斷為“僅其最上層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當返延安報告等語”，顯係錯誤，引者作了改動。

[173] 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上海黨史與黨建》1996 年第 1 期。

[174] 同上。

[175]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103-104 頁。

[176] 同上，109，243 頁。

[177]《邱會作回憶錄》，114-117 頁。

[178] 同上，124 頁。

[179]《毛澤東軍事年譜》，364 頁

[180]《陳毅年譜》，263，264 頁。

[181] 同上，365 頁。

[182] 同上，366 頁。

[183] 同上，372 頁。

[184]同上，404，406頁。

[185]《伊里契夫轉發毛澤東致季米特洛夫 4 月 24 日電》，1944 年 5 月 6 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Vol.30，no.1，pp.89-95.轉引自楊奎松：《抗戰期間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文獻資料述評》。

[186]《毛澤東軍事年譜》，414 頁。

[187]《軍委關於開闢河南根據地問題給鄭位三、李先念、任質彬、陳少敏的指示》，1944 年 10 月 14 日；《軍委關於向蘇浙豫皖發展給華中局的指示》，1944 年 10 月 24 日；《中央關於發展廣東遊擊戰爭等問題給林平的指示》，1944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4 冊，382，386，388 頁。

[188]《毛澤東軍事年譜》，434 頁。

[189]《邱會作回憶錄》（上），144-145 頁。

[190]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電子書。

[191]《毛澤東、彭德懷致洛甫電》，1936 年 4 月 9 日，《文獻和研究》，1985 年第 3 期。

[192]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6 年 8 月 15 日，《中共黨史研究》，1988 年第二期。

[193] 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186 頁。

[194] 《王明在代表團會議上的報告》，1936 年 8 月 21 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185 頁。

[195] 《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的指示》，1936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 卷，80 頁，1991。

[196] 譯自 Ivo Banaced: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933-1935，p48，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197] 譯自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pp51-52.

[198]《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1937 年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第 157-8 頁

[199]《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周恩來選集》（上卷），http://www.xj71.com/?action-viewnews-itemid-36376

[20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162 頁。

[201]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http://www.wxyjs.org.cn/GB/186508/186513/186629/186632/11349844.html

[202]《毛澤東關於國際國內形勢的估計和對策的指示》，1940 年 10 月 25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3-34 頁，

[203]《毛澤東關於在目前國際形勢下準備應付任何黑暗局面致周恩來》，1940 年 10 月 25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5-36 頁。

[204]《毛澤東關於目前時局的指示》，1940 年 11 月 1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72 頁

[205]《毛澤東關於國內形勢和應付投降、力爭時局好轉致周恩來》，1940 年 11 月 3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8-39 頁。

[206]《毛澤東關於對蔣介石的策略致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1941 年 1 月 25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92 頁。

[207]毛澤東：《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1939年9月14日。轉引自楊奎松：《走近真實》，275頁。
[208]《中共中央關於時局趨向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5頁。
[209]同上，15-19頁。
[210]《毛澤東關於目前時局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73頁。
[211]《中共中央宣傳部政治情報第六號——英美拖中國加入其戰爭集團》，1940年10月20日，同上書，32-33頁
[212]同上，
[213]《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1935年5月8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100頁。
[214]轉引自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135頁
[215]《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75-76頁。
[216]《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217] 同上，324頁。
[218] 瓦·伊·崔可夫《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33、35-36頁，新華出版社，1980年9月。
[219] 同上，32-33頁。
[220] 請參閱蘆笛：《野蠻的俄羅斯》，259-260，277頁，明鏡出版社，2010年。
[221] 請參閱楊奎松：《走近真實》，278頁。
[222]《毛澤東關於在目前國際形勢下準備應付任何黑暗局面致周恩來》，1940年10月25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5-36頁。
[223]《毛澤東關於目前時局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72頁

[224]《毛澤東、王稼祥關於反對反共投降的策略問題致彭德懷》，1940 年 11 月 3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76 頁。

[225]《毛澤東關於目前時局的指示》，1940 年 11 月 1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73 頁。

[226]《毛澤東關於加強國內外聯絡以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來》，1940 年 11 月 6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81 頁。

[227]《毛澤東、王稼祥關於反對反共投降的策略問題致彭德懷》，1940 年 11 月 3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76 頁。

[228]《毛澤東關於粉碎蔣介石反共陰謀致周恩來等），1940 年 11 月 21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01 頁。

[229]《中共中央關於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戰略部署的指示》，1940 年 12 月 31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27 頁。

[230]《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關於葉挺不應徵求蔣介石同意致葉挺、項英，1940 年 12 月 20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14 頁。

[231]《中共中央關於皖南事變的指示》，1941 年 1 月 18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73 頁。

[232]《毛澤東關于國民黨取消新四軍番號後形勢與對策的報告》，1941 年 1 月 18 日，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233]《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關於在政治、軍事、組織上應採取的步驟致彭德懷、劉少奇》，1941 年 1 月 19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80 頁。

[234]《毛澤東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0 年 11 月 4 日。轉引自楊奎松：《抗戰期間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文獻資料述評》，載《社會科學》，2006 年第 2 期。

[235]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02-123 頁

[236]《毛澤東關於國內形勢和應付投降、力爭時局好轉致周恩來》，1940 年 11 月 3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8-39 頁。

[237] 轉引自毛澤東：《關於蔣介石政治動向的估計》，1941 年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3 冊，46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238]《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關于蘇美英等大使對皖南事變態度致毛澤東電》（1941 年 1 月 16 日），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239]《毛澤東關于蔣介石"一·一七"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致周、董、葉電》（1941 年 1 月 23 日），來源同上。

[240]《毛澤東關于對蔣介石應取對立態度不怕破裂致周恩來電》（1941 年 1 月 25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 190 頁。

[241]《毛澤東關于時局發展情況給周恩來的通報》（1941 年 1 月 30 日）；《毛澤東關于請問崔可夫蘇聯何時可以公開援助我們給周恩來電》（1930 年 1 月 30 日），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242] 毛澤東：《關於蔣介石政治動向的估計》，1941 年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3 冊，45-46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243] 譯自：Ivo Banaced: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933-1935，p147，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244] 轉引自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142 頁。

[245] 譯自：*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933-1935，p145.

[246] *Khrushchev Remembers*，p464，Andre Deutsch Ltd，1971.

[247]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11 頁。

[248]《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1944 年 6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4 冊，244 頁。

[249] 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78 頁。

[250]《毛澤東在董必武十月關於大後方工作的報告上的批示》，1944 年 12 月 20 日，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09 頁。

[251]《中央關於蘇聯參戰後準備進佔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945 年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215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252]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562 頁，2003 年。

[253]《中央關於創立湘粵邊根據地等給廣東區黨委的指示》，1945 年 8 月 11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226 頁。

[254]《中央關於日本投降後我黨任務的決定》，1945 年 8 月 11 日，同上，228 頁

[255]《中央關於必須力爭佔領的交通線及沿線城市的指示》，1945 年 8 月 12 日，同上，232 頁。

[256]《中央關於華中我軍的戰略部署給華中局的指示》，1945 年 8 月 12 日，同上，234-235 頁。

[257]《軍委關於執行中央堅持江南鬥爭方針的具體部署給華中局的指示》，1945 年 8 月 12 日，同上，236 頁。

[258]《毛澤東接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1956 年 9 月 22 日，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1 頁。

[259]《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56 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260]《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改變戰略方針的指示——目前方針著重於奪取小城市及廣大鄉村》，1945 年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243 頁。

[261]《延安日記》，569 頁。

[262]《中央關於批准上海武裝起義給華中局的指示》，1945 年 8 月 20 日，等，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15 頁。

[263]轉引自楊奎松：《1946 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历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

[264]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司令部編（1949 年 10 月）：《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196 頁。轉引自張正隆：《雪白血紅》，TXT 版電子書，無頁碼。

[265]《中央關於東北工作方針與任務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2 月 7 日，同上書，465-466 頁。

[266]《對戰後形勢的分析和關於當前工作問題的指示》（1943 年 1 月 25 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4 冊，14 頁。

[267]《中央關於批准上海武裝起義給華中局的指示》，1945 年 8 月 20 日，等，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15 頁。

[268]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版）》，TXT 電子書，無頁碼。

[269] 譯自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p68.

[270] Vietnam War Casualties：http://www.vietnam-war.info/casualties/

[271]《岡村寧次回憶錄》，36 頁。

[272]《對戰後形勢的分析和關於當前工作問題的指示》（1943 年 1 月 25 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4 冊，14 頁。

[273] 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274]《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報》，1941 年 3 月 22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275 頁。

[275]《關於對形勢估計等問題的指示》（1941 年 4 月 20 日毛澤東致周恩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3 冊，84 頁。

[276]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 1986 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演變》，《炎黃春秋》2009 年第 3 期

[277] 譯自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p164.

[278] 譯自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p176.

[279] 譯自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pp182-183.

[280]《季米特洛夫致斯大林並莫洛托夫信》，1941 年 7 月 18 日，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

495/74/317/81.轉引自楊奎松：《抗戰期間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文獻資料述評》，載《社會科學》，2006 年第 2 期。

[281]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214-215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

[282]師哲：《峰與谷》，81 頁，紅旗出版社，1992 年。

[283]蘆笛：《領袖們留下的謎團（下）》，208-286 頁，明鏡出版社，2010 年。

[284]同上，56 頁。

[285]同上，58 頁。

[286]同上，78 頁。

[287]《楊天石文集》，第 467-8 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

[288]楊杏佛：《駁梁任公先生應付上海慘殺態度》，《楊杏佛文存》，《民國叢書》第三編第 84 分冊，198-202 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 年

[289]《蔣廷黻回憶錄》，123、140 頁，嶽麓書社，2003 年

[290]顏惠慶著、吳建雍等譯：《顏惠慶自傳》，376 頁，商務印書館，2003 年

[291]《蔣委員長致蔣廷黻轉楊傑養電》，《對蘇外交》，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第 46 頁

[292]《蘇中關係（1937-1945）》俄文版，第 1 冊，第 111 號、121 號文件，第 138、156 頁

[293]《對蘇外交》，蔣中正總統檔案

[294] 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602-3 頁，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295]《小川平吉關係文書》（2），611-2 頁，轉引自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612 頁

[296]《事略稿本》，未刊稿，“國史館”藏，以下各注均轉引自楊天石：《論“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與蔣介石“抗戰到底”之“底”》，載《中國文化》第 22 期，三聯書店 2006 年 5 月出版

[297]《困勉記》。

[298]《困勉記》。蘆按，此情報看來有誤，美國在與日本談判中態度始終很強硬，似無同意日本佔領中國華北一說。相反，國務卿赫爾最後提出了著名的《赫爾備忘錄》，其中一條就是要求日本從中國撤退，被日人視為最後通牒，由此觸發了太平洋戰爭。但即使是在該備忘錄中，美國也並未特地指明必須從滿洲撤退。由此可見，美國人當時對早已成為既成事實的滿洲國的態度相當曖昧。如楊天石教授的研究表明的那樣，若不是蔣公堅持，滿洲和臺灣都未必會在戰後回歸中國。

[299]《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300]《困勉記》。

[301]《小川平吉關係文書》（1），385-6 頁，轉引自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607 頁

[302]《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一），中國國民黨黨史會 1981 年版，第 680 頁

[303]《中日兩國在九國公約會議所採取之態度及應取之辦法》，“蔣檔”。

[304]《戰爭與共產主義》，175 頁，轉引自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609 頁

[305]《岡村寧次回憶錄》，86 頁

[306] 侯中軍：《美國軍事情報人員對八路軍的第一次實地考察—卡爾遜給美國軍方情報處的報告》，《抗日戰爭研究》，2004 年第 2 期，65 頁

[307]《毛澤東年譜》，中卷，電子書；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遊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 年第 6 期。

[308] R Overy: *Russia's War*，p196，TV Books Inc，1997.

第六章

[1] 陳雲：《關於〈遼瀋決戰〉一書的談話》，《中共黨史資料》，第 10 輯，2 頁。

[2]《伍修權同志回憶錄（之二》，《中共黨史資料》，第 2 輯，211-212 頁。

[3] 曾克林：《戎馬生涯的回憶》，209-225 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

[4]《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66 頁。

[5] 李運昌：《憶冀熱遼部隊挺進東北》，《中共黨史資料》，第 15 輯，63、64、68、73 頁。

[6]《東北局致中央電》，1946 年 3 月 9 日，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44 頁。

[7] 薛銜天　劉成元：《蘇聯與東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8]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遼沈決戰》（上），163，165 頁，人民出版社，1988 年。

[9]佟冬：《中國東北史》第 6 卷，704 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年。

[10]《伍修權同志回憶錄（之二》，《中共黨史資料》，第 2 輯，211-214 頁

[11]薛銜天.：《中蘇關係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 49，50，330，331，187 頁。

[12]李丹慧：《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82 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3] 田酉如：《彭真年譜》（上），285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

[14] 蕭華：《開闢遼東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第 13 輯，116-117 頁。

[15]《何長工回憶錄》，427-428 頁。

[16]《彭真年譜》（上），285 頁。

[17] 章百家、牛軍：《冷戰與中國》，77，78 頁，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年。

[18]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35 頁。

[19]《彭真年譜》（上），292 頁

[20]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46，250 頁。

[21] 迪特·海茵茨希著，張文武、李丹琳譯：《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178 頁，新華出版社，2001 年。

[22] B P 博伊科：《解放使命》，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編《在中國的道路上(1937-1945)：回憶錄》， 莫斯科，1989 年， 第 336-337 頁。

[23] 伊·伊· 柳德尼科夫《穿越大興安嶺》， 《在中國的道路上(1937-1945)：回憶錄》， 第 302-304 頁。

[24] 博伊科：《解放使命》， 《在中國的道路上(1937-1945)：回憶錄》， 第 339-340 頁。

[25]《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95 頁。

[26] 李長林：《論日本關東軍的武器流向》，《史學集刊》，2006 年 3 月第 2 期。

[27] 迪特·海茵茨希著，張文武、李丹琳譯：《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178 頁。

[28] 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遼瀋戰役親歷記》，70-71 頁。

[29]《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95 頁。

[30] 同上，148 頁。

[31] 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遼瀋戰役親歷記》，75 頁

[32] 盧浚泉：《錦州國民黨軍被殲記》，同上書，83，84，85 頁。

[33] 盛家興：《第九十三軍錦州被殲記述》，同上書，93，94 頁。

[34] 趙振華：《義縣戰役紀要》，同上書，98-99，102，104 頁。

[35]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同上書，274 頁。

[36]《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冊，60，80-81 頁。

[37] 牟中珩：《濟南國民黨軍隊的防禦與被殲》，《濟南戰役親歷記》，33-34 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 年。

[38] 李世傑：《黃百韜在碾莊圩指揮目睹記》，《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189 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年。

[39] 楊奎松：《毛澤東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49，253，252 頁

[40]《岡村寧次回憶錄》，36 頁

[41]《兩次大戰與中國前途》，71 頁，臺北, 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 1985，轉引自李長林：《論日本關東軍的武器流向》，《史學集刊》，2006 年 3 月第 2 期，下同。

[42] 阿克金：《蘇聯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所給與的軍援》，100 頁，蘇聯國防部軍事出版社, 1975。

[43] 楊奎松：《毛澤東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50 頁

[44] 轉引自李長林：《論日本關東軍的武器流向》，《史學集刊》，2006 年 3 月第 2 期。

[45] 李長林：《論日本關東軍的武器流向》，《史學集刊》，2006 年 3 月第 2 期。

[46] 楊奎松：《毛澤東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50 頁

[47] 丁雪松等：《回憶東北解放戰爭期間東北局駐朝鮮辦事處》， 載《遼沈決戰》上冊，轉引自劉統：《解放戰爭中東北野戰軍武器來源探討——兼與楊奎松先生商榷》，《黨的文獻》，2000 年第 4 期

[48]《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234-235 頁。

[49]《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273 頁。

[50]《何長工回憶錄》，432-433 頁。

[51]《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176-177 頁。

[52] 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178 頁。

[53]《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72 頁。

[54]奧·鮑·鮑里索夫、鮑·特·科洛斯科夫著，肖東川、譚實譯：《蘇中關係（1945-1980）》，第 19-20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 年，以下參考文獻均轉引自薛銜天 劉成元：《蘇聯與東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55]《蘇中關係（1945-1980）》，第 24 頁

[56]《交通部小組組長科馬羅夫呈莫洛托夫函（1948 年 9 月 19 日）》，鄺永慶、王曉東抄自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以下凡引自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的文件，均系鄺永慶和王曉東抄錄，不再一一注明。

[57]〔俄〕弗•弗•基霍米洛夫、阿姆楚卡諾夫著、米鎮波編譯《中國東北之行》，《黨史研究資料》，1987 年第 11 期。

[58]《林彪致斯大林函（1948 年 9 月 10 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藏。

[59]《科瓦廖夫致斯大林關於中國東北鐵路修復工程完成情況的報告（1948 年 12 月 16 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藏。

[60] 呂正操：《解放軍打到哪里，火車就開到哪里》，《遼沈決戰》上，第 590 頁。

[61]《科瓦廖夫致斯大林關於中國東北鐵路修復工程完成情況的報告（1948 年 12 月 16 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藏。

[62]《科瓦廖夫致斯大林關於中國東北鐵路修復工程完成情況的報告（1948 年 12 月 16 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藏。

[63]《蘇聯部長會議指令（草案）1948 年 12 月》，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藏。

[64] 楊澤民：《蘇聯與中國的解放戰爭》，《黨史研究與教學》，1989 年第 1 期。

[65]《東北貿易總公司一九四七年第一季度對外貿易工作總結與第二季度對外貿易意見》，遼寧檔案館東財委檔案，卷 5065，第 1-2 頁。轉引自薛銜天　劉成元：《蘇聯與東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66]《東北局關於對外貿易工作的報告（1948 年 6 月 5 日）》，遼寧檔案館藏，轉引自孟憲章主編《中蘇經濟貿易史》第 354 頁。

[67]《黑龍江近代歷史大事記》，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48-249 頁。

[68]《東北日報》，1948 年 7 月 31 日。

[69] 東財委檔案：《1949 年對蘇貿易最後確定之意見》，遼寧檔案館藏，轉引自孟憲章主編《中蘇經濟貿易史》第 355 頁。

[70] 薛銜天 劉成元：《蘇聯與東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71] 孟憲章主編《中蘇經濟貿易史》， 第 354 頁。以上均轉引自薛銜天　劉成元：《蘇聯與東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72]《中央關於建立東北長期永久根據地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2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504 頁。

[73]《東北局關於目前東北的形勢與部署的指示》，1945 年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509 頁。

[74] 路文娟：《對蘇聯給予中共東北解放戰爭軍事援助情況的考察》，《鞍山科技大學學報》，第 30 卷第 1 期，2007 年 2 月；青山：《蘇聯出兵之後中共對東北的爭奪》，《黨史博覽》，2006 年第 8 期。

[75]丁雪松等：《回憶東北解放戰爭期間東北局駐朝鮮辦事處》，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編：《遼沈決戰》（上），628-629 頁，人民出版社，1988 年。轉引自薛銜天　劉成元：《蘇聯與東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76]同上，627-628 頁，1988 年。轉引自薛銜天　劉成元：《蘇聯與東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77] 華文：《民主同盟軍借道朝鮮北上始末》，《黨史縱橫》1988 年第 2 期。

[78]《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254-255 頁。

[79] 見本章開頭所引陳雲語錄。

[80] 楊澤民：《蘇聯與中國的解放戰爭》，《黨史研究與教學》，1989 年第 1 期；張文政：《抗戰勝利前後美國對華政策中的蘇聯因素》，《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 5 月第 3 期。

[81]胡美任東來：《1946-1947 年美國對華軍火禁運的幾個問題》，《美國研究》，2007 年第 3 期。

[82]《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 218-219 頁，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24 頁。

[83]《延安總部命令第二號》（1945 年 8 月 11 日 8 時）；《延安總部命令第六號》（1945 年 8 月 11 日 12 時），《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219 頁；223 頁。

[84]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15 頁。

[85]同上，216 頁。

[86]《中央關於迅速進入東北控制廣大鄉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258 頁。

[87]《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58 頁。

[88]《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59 頁。

[89]《中央關於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致中共赴渝談判代表團電》，（1945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278-279 頁

[90]《中央關於阻止國民黨軍隊入東北問題給彭真、陳雲等的指示》，1945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351 頁。

[91]楊奎松：《戰後中共奪取東北始末》。

[92]《中央關於全力控制東北拒止蔣軍登陸著陸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388 頁。

[93]《華北東北等地須歸人民自治》，1945 年 11 月 3 日，《毛澤東文集》第四卷，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7/70358/4769035.html

[94]《中央關於宣傳與談判的方針問題給中共赴渝談判代表團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7 日、8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413 頁。

[95]《毛澤東軍事年譜》，467 頁。

[96]同上，《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139，141 頁。

[97]《從內線作戰著眼分批殲滅國民黨三個軍》，1945 年 11 月 15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143-144 頁。

[98]《中央關於東北的工作方針等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冊，429 頁。說明：據《毛澤東年譜》，毛於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生病住院，以下中央文件都不為《毛澤東年譜》，《毛澤東軍事年譜》以及《毛澤東軍事文集》所收，故判為劉少奇之作。

[99]《中央關於讓出大城市及長春鐵路線後開展東滿、北滿工作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20 日，同上書，431-432 頁。

[100] 轉引自張正隆：《雪白血紅》，網絡版，
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wars/xuehong/xuehong08.html

[101]《中央關於東北工作方針與任務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2 月 7 日，同上書，465-466 頁。

[102]《中央關於爭取我黨在東北的地位及策略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2 月 8 日，同上書，474 頁。

[103]《中央關於建立東北長期永久根據地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2 月 21 日，同上書，504-505 頁。

[104]《劉少奇關於應以主要力量建立東、西、北滿根據地致彭真電》，1945 年 12 月 24 日，同上書，512-513 頁。

[105] 轉引自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135 頁。

[106]《中共代表與國民黨政府代表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6 冊，17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

[107]《毛澤東軍事年譜》，472 頁。

[108]《中央關於目前東北工作的方針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1946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6 冊，57-58 頁。

[109]《東北局致中央電》（1946 年 2 月 22 日），轉引自楊奎松：《1946 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歷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

[110]《中央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方針給東北局和中共赴渝談判代表團的指示》，1946 年 3 月 13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6 冊，89-90 頁。

[111]劉向上：《1946 年蘇軍撤軍東北內幕》，《四海鉤沉》，2009 年第 12 期。

[112]《東北局致中央電》，1946 年 3 月 9 日，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44 頁。

[113]《東北局致中央電》，1946 年 3 月 14 日，轉引自楊奎松：《1946 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歷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

[114]《彭真致中央電》，1946 年 3 月 16 日，轉引自楊奎松：《1946 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44 頁。

[115]《毛澤東軍事年譜》，475 頁。所刪字句根據楊奎松著《1946 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之引文補足。

[116]《毛澤東軍事年譜》，476 頁。

[117]《毛澤東軍事年譜》，476 頁。

[118]《全力控制長春哈爾濱兩市及中東路全線》，1946 年 3 月 24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153 頁。

[119]《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282-284 頁。

[12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159 頁。

[121]《林彪致東北局並中央電》，1946 年 4 月 11 日，轉引自楊奎松：《1946 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

[12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165 頁。

[12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166 頁。

[12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173 頁。

[12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186 頁。

[126]《毛澤東軍事年譜》，480-482 頁

[12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182 頁。

[128] 楊奎松：《1946 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

[129]《毛澤東軍事年譜》，481 頁

[130]《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280 頁。

[131]同上，288-289 頁。

[132]《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289 頁。

[133]《黃克誠自述》，206 頁。

[134]《黃克誠自述》，206-207 頁。

[135] 張正隆：《雪白血紅》。

[136]《堅守四平不可能時應主動放棄》，1946 年 5 月 19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224 頁。

[137]《毛澤東軍事年譜》，488 頁。

[138]《毛澤東軍事年譜》，489 頁

[139]同上，490 頁。

[140]同上，491 頁

[141]楊奎松：《1946 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

142《毛澤東軍事年譜》，492 頁。
143《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290 頁。
144楊奎松：《1946 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
145《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289 頁。
146《黃克誠自述》，206 頁。
147《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128 頁。
148《黃克誠自述》，206-207 頁。
149《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241 頁。
150《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235 頁。
151《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137 頁。
152《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238-239 頁。
153同上，244-257 頁。
154《黃克誠自述》，204 頁。
155《堅守四平不可能時應主動放棄》，1946 年 5 月 19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224 頁。
156《四平防禦戰不能成為一般作戰方針》，1946 年 5 月 27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236 頁。
157《黃克誠自述》，204-205 頁。
158《毛澤東軍事年譜》，487-488，491 頁。
159《徐永昌日記》第八冊，第 289-290 頁。
160《準備對付蔣介石大打的作戰部署》，1946 年 6 月 19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277 頁。
161《國民黨大打後晉察冀軍區的基本任務》，1946 年 6 月 28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305-306 頁。
162《全局破裂後太行和山東兩區的戰略計劃》，1946 年 6 月 22 日，同上書，283-284 頁
163《對南線作戰的補充指示》，1946 年 6 月 24 日，同上書，292 頁。
164《華中野戰軍應準備出蚌浦線作戰》，1946 年 6 月 26 日，同上書 301 頁。
165《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54 頁。
166《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1946 年 7 月 4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
167《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60，63 頁。

[168]《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402 頁。
[169]《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63 頁。
[17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410 頁
[171]《粟裕戰爭回憶錄》，PDF 版電子書，無頁碼。
[172]《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73-75 頁。
[173]《太行山東華中積極作戰以援中原》，1946 年 8 月 9 日
[174]《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87 頁。
[175]《調動劉峙兵力推遲主力決戰時間》，1946 年 8 月 13 日。
[176]《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87-88 頁。
[177] 同上書，89-91 頁。
[178] 同上書，106 頁。
[179]《先攻懷仁等地然後相機奪取大同》，1946 年 6 月 23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290 頁。
[180]《關於殲滅大同之敵的意見》，1946 年 8 月 30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
[181]《殲滅進攻集寧之敵的作戰部署》，1946 年 9 月 10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468 頁。
[182]《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110-115 頁。
[183]《大同集寧戰役》，《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643133.htm
[184]《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18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487-488 頁。
[186]《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118-120 頁。
[187]《郭汝瑰回憶錄》，342，345 頁，引文中漏點錯點的標點符號未予糾正。
[188]《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1 頁。
[189]《張宗遜回憶錄》，302 頁。
[19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226-227 頁。
[191]《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40，45，70 頁.
[192]《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38 頁。
[19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147 頁。
[194]《粟裕戰爭回憶錄》，PDF 版電子書，無頁碼。

[19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236 頁。

[196]《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162 頁。

[197]《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72 頁。

[198]《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327 頁，第三卷，69 頁。

[19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39 頁，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0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158 頁。

[201]《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80 頁。

[202]《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80，81 頁。

[20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40 頁。

[204]《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47 頁。

[205]《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40 頁。

[206]《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84 頁。

[207] 王玉彬：《第二野戰軍征戰紀實》，237 頁。

[208]《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87 頁

[209] 李百齊：《光輝的業績　艱苦的歷程——劉鄧挺進大別山 55 周年祭》，《中州學刊》，2002 年 7 月第四期。

[21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216 頁。

[211]王玉彬:《第二野戰軍征戰紀實》，237 頁。

[212]《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137 頁。

[213]《粟裕軍事文集》，PDF 版電子書。

[214]《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145-146 頁。

[215]劉鄧致中央軍委電，1948 年 1 月 26 日，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冊，352 頁。

[216]《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352，354，357 頁

[21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388 頁。

[218]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358 頁。

[219]《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361 頁。

[220]王玉彬:《第二野戰軍征戰紀實》，318 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 年。

[221]王玉彬、王蘇紅：《大勢中原》，384 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

[222]《鄧小平文選》第一卷，99 頁。

[223] 陳雲：《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黨的文獻》2001 年第 4 期。

[224]《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145 頁。
[225]《粟裕戰爭回憶錄》，PDF 版電子書。
[226]《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43 頁；《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113 頁。
[227]《粟裕戰爭回憶錄》，PDF 版電子書。
[228]《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113 頁。
[229]《粟裕戰爭回憶錄》，PDF 版電子書。
[230]《毛澤東年譜》，電子書。
[231]《毛澤東軍事年譜》，596，597 頁。
[232]《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116 頁。
[23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236 頁。
[234]《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124-126 頁。
[235] 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356 頁。
[236]《毛澤東軍事文集》，633 頁。
[237] 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374 頁。
[238]《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210 頁。
[239]《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181-192 頁。
[240] 同上，365 頁。
[241]《毛澤東年譜》（下），電子書。
[24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147 頁。
[243] 同上，307 頁。
[244] 同上，338 頁。
[245]《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384-385 頁。
[246] 《粟裕軍事文集》，電子書。
[247]《粟裕戰爭回憶錄》，電子書。
[248]《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386-387 頁。
[249]《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459 頁。
[250]《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372 頁。關於華北劉總的兵力，該書說的是 50 餘萬人，此處採用《聶榮臻回憶錄》提供的數字。
[251] 杜任之：《和平解放北平之經過》，《平津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326-327 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 年。
[252]《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383-384 頁

[253] 同上，385 頁。

[254]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經過》，《平津戰役親歷記》，281 頁。

[255] 《毛澤東年譜》（下），電子書。

[256]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經過》，《平津戰役親歷記》，281 頁。

[257]《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472，476 頁。

[258]《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冊，473 頁；《毛澤東年譜》（下），電子書。

[259] 郝在今：《"布衣將軍"傅作義》，《同舟共進》月刊，2008 年第 9 期。

[260] 覃戈鳴：《桂系在淮海戰役中的態度及白崇禧"備戰求和"陰謀的幻滅》，《淮海戰役親歷記》，128 頁；李以劻：《淮海戰役國民黨軍被殲概述》，同上書，64 頁。

[261] 杜聿明：《淮海戰役始末》，《淮海戰役親歷記》，2-12 頁。

[262] 李以劻：《淮海戰役國民黨軍被殲概述》，《淮海戰役親歷記》，69，77 頁；陳士章：《第七兵團的毀滅》，同上書，190-191 頁；《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278 頁。

[263] 黃維：《第十二兵團被殲紀要》，《淮海戰役親歷記》，485-493 頁。

[264] 杜聿明：《淮海戰役始末》，《淮海戰役親歷記》，28-48 頁；《郭汝瑰回憶錄》，334-336 頁。

[265]《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五卷，125 頁

[266]《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五卷，125-129 頁。

[267] 杜聿明：《遼瀋戰役概述》，《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9 頁；《郭汝瑰回憶錄》，303-304 頁。

[268]《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122-123 頁

[269] 同上，105 頁。

[270] 杜聿明：《遼瀋戰役概述》，《遼瀋戰役親歷記》，10-11 頁。

[271]《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376 頁，詳見下。

[272] 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遼瀋戰役親歷記》，156-157 頁。

[273]《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133-134 頁。

[274] 廖耀湘：《遼遼西戰役紀實》，《遼瀋戰役親歷記》，159-165 頁。

[275]《郭汝瑰回憶錄》306-367 頁。

[276] 1948年10月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42頁。
[277] 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遼瀋戰役親歷記》，171-188頁。
[278] 《遼沈戰役最大臥底：國軍將領衛立煌親共之謎》，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4/24/content_8041350.html
[279] 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遼瀋戰役親歷記》，74頁。
[280]《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五卷，153，146頁。
[281]《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五卷，158頁。
[282] 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遼瀋戰役親歷記》，169頁。
[28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65頁。
[284] 同上書，70頁。
[285]同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五卷，179-180頁。
[286]《郭汝瑰回憶錄》，313頁，原文用錯的標點未予糾正。
[287]《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182，187頁。
[288] 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遼瀋戰役親歷記》，185頁。
[289] 楊焜：《遼西戰役補述》，《遼瀋戰役親歷記》，190頁。
[290]《郭汝瑰日記》，1947年5月17日，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330頁。
[29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3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
[292]《楊尚昆回憶錄》，147-148頁。
[293]《彭德懷年譜》，154頁。
[294]《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295] 《毛澤東軍事年譜》，596頁。
[296]《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326-327頁。
[297] 杜聿明：《遼瀋戰役概述》，《遼瀋戰役親歷記》，5頁。
[298]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497頁。
[299] 關於毛捏造兵變謊言欺騙中央大員與他出逃以及張國燾屈服一事，請參考拙著：《領袖們留下的謎團》上冊，明鏡出版社，2009年。
[300] 《歷史的回顧》，538頁。
[301]《粟裕戰爭回憶錄》，電子書。
[302]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65、174、175頁
[303]牛大勇：《影響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一次戰略空運》，《歷史研究》，1995年第4期。
[304]《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分冊），706-707頁中華書局，1987年。

[305]《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284 頁。

[306] 轉引自白先勇：《養虎貽患——父親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間國共第一次“四平街會戰”之前因後果及其重大影響）》，《當代》（台灣雜誌），第 147 期，1999 年 11 月 1 日。

[307]《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308]《徐永昌日記》，第八冊，281 頁。

[309] 同上。

[310] Draft Policy Memo Prepared in the Embassy in China， FRUS， 1946，Vol.10， p.148.

[311] 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 and General Yu Ta-Wei，June 20， 1946， FRUS， 1946， Vol.9， p1105.

[312] General Marshall to Colonel Marshall S. Carter，July26，1946，FRUS，1946，Vol. 10，p.755.

[313] John E. Jessup: A Chronology of Conflict and Resolution，1945-1985 (Westport，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9)，p.14；王成勉:《馬歇爾使華調停日誌》，第 120 頁。

[314] 王成勉:《馬歇爾使華調處日誌》，第 129 頁；《蔣主席日記》(1946 年 8 月 18 日)，引自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三)，212 頁。

[315] Memo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Ringwalt) to Brigadier General Marshall S. Carter， May26， 1947， FRUS， 1947， Vol.7，pp.833-834;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1.， p.356.

[316] 董顯光：《蔣總統傳》，467-468 頁。

[317] 胡美 任東來：《1946-1947 年美國對華軍火禁運的幾個問題》，《美國研究》，2007 年第 3 期。本節關於美國對華禁運的參考文獻，均轉引自該文。

[318] 廖耀湘、杜建時：《我們所知道的關於美蔣勾結的內幕情況》，《文史資料選輯》(第 29 輯)，59-60 頁。

[319]《彭德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47 年 2 月 1 日。

[320]《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147 頁。

[321]《郭汝瑰回憶錄》，281 頁。

[322] 鄧澤宏：《美國對華調處政策和第三條道路的興衰》，《中共黨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樊繼福：《抗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檢視》，《理論導刊》，2007 年第 9 期。

[323] 郭汝瑰：《淮海戰役期間國民黨軍統帥部的爭吵和決策》，《淮海戰役親歷記》，61 頁。

[324] 《凱南回憶錄》第 381 頁。轉引自王青山 楊密密：《美國對華政策與李宗仁的代總統》，《社會科學學家》1992 年 第 01 期，下同。

[325] 肯尼斯· 雷，約翰· 布魯爾：《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 1946-1949》，第 226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326]《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327 頁。

[327]《美國外交文件集》1948 年第 8 卷，146-156 頁。

[328] 王青山 楊密密：《美國對華政策與李宗仁的代總統》，《社會科學學家》1992 年 第 01 期。

[329]《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376 頁。

[330]《美國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 4 卷，478 頁。

[331]《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376 頁。

[332]《美國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 4 卷，746 頁。

[333]《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335、337、341、343 頁。

[334] 《李宗仁回憶錄》，947-948 頁。

[335] 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94 頁。

[336] 《美國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 4 卷，709 頁、1947 年第 7 卷，741-759 頁。以上均轉引自王青山、楊密密：《美國對華政策與李宗仁的代總統》，《社會科學學家》1992 年 第 01 期。

[337] 李以劻：《淮海戰役國民黨軍被殲概述》，《淮海戰役親歷記》，69 頁。

[338]《郭汝瑰回憶錄》，288-289 頁。

[339]《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142 頁。

[340]《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190-191 頁。

[341]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局：《如皋海安戰鬥》，《國民黨軍資料選編》第 2 冊，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69 頁。

[342]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二卷，183-184 頁。

[343] 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遼瀋戰役親歷記》，156 頁。

[344] 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遼瀋戰役親歷記》，70 頁。
[345] 侯鏡如：《第十七兵團援錦失敗經過》，《遼瀋戰役親歷記》，242 頁。
[346]转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12-213 頁。
[347] 汪朝光：《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東北決策研究》，《歷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
[348] 同上。
[349] 白先勇：《養虎貽患——父親的憾恨》。
[350] 金典戎：《東北淪共痛史》，《春秋》雜誌總第 37 期，中華民國四十八年。
[351]《李宗仁回憶錄》，621 頁。
[352]《日本投降後中共動態資料彙編》，第 48 頁，重慶 1945 年版，轉引自汪朝光：《國民政府對抗戰勝利之初期因應》，《抗日戰爭研究》，2003 年第 2 期。
[353]鐘斯等著：《1942-1946 年的遠東》下冊，第 741-2 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 年版。
[35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紀實》，第 63-4、78-9 頁，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9 年版。
[355]《岡村寧次回憶錄》，36 頁。
[356] 汪朝光：《國民政府對抗戰勝利之初期因應》，《抗日戰爭研究》，2003 年第 2 期。
[357] 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 686-687 頁。
[35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第 501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版。
[359] 金典戎：《光杆司令長官孫連仲與華北》，《春秋》雜誌總第 193 期，中華民國五十四年。
[360]《李宗仁回憶錄》，623 頁。
[361]《岡村寧次回憶錄》，92 頁。
[362]《李宗仁回憶錄》，622-623，659 頁。
[363]《郭汝瑰回憶錄》，237 頁。
[364]《郭汝瑰回憶錄》，342，345 頁。
[365]《徐永昌日記》，第八冊，181 頁。
[366] 杜聿明：《遼瀋戰役概述》，《遼瀋戰役親歷記》，1 頁。

[367]《郭汝瑰回憶錄》，第 237 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368] 林蔚：《軍事復員報告》，1946 年 3 月 3 日，青年遠征軍第二零八師政治部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二中全會輯要》，第 42-8 頁。
[369] 汪朝光：《簡論 1946 年的國共軍事整編復員》，《民國檔案》1999 年第 2 期。
[370]《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286 頁，高雄 1972 年版。
[371]萬仁元、方慶秋主編：《中華民國史料長編》，第 70 冊，107 頁，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版。
[372] 杜聿明：《遼瀋戰役概述》，《遼瀋戰役親歷記》，7 頁。
[373] 蔣介石：《高級將領精神心理之改變與剿匪戰略之研究》，1947 年 2 月 26 日。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18 頁。
[374]《李宗仁回憶錄》，627 頁。
[375] 同上，624 頁。
[376]《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下卷，第 206 頁。本註以及以下各註直至註 90，除《李宗仁回憶錄》外，均轉引自汪朝光：《國民政府對抗戰勝利之初期因應》，《抗日戰爭研究》，2003 年第 2 期。
[377]《莫失盡人心》，《大公報》（重慶）1945 年 9 月 27 日。
[378]《李宗仁回憶錄》，627 頁。
[379]《接收處理敵偽物資工作清查報告書》，二檔，五三六-56。
[380]國民參政會秘書處編：《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二次大會提案原文》下冊，重慶 1946 年版，審 4 第 134 號。
[381]《李宗仁回憶錄》，627-8 頁。
[382]《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第 67 冊，第 122-3 頁。
[383]《我們的呼聲》，《華北日報》1945 年 11 月 6-11 日。
[384]　北京市檔案館編：《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第 26 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 年版。

結語

[1]《毛澤東關於國內形勢和應付投降、力爭時局好轉致周恩來》，1940 年 11 月 3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9 頁。

[2]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410-1 頁。

《真相》系列(70)

書　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作　者：蘆 笛

出版人：何 頻

責任編輯：李 慧

封面設計：一 劃

出　版：明鏡出版社

網　址：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SA.

電話：(516)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978-1-935981-25-1

定 價：HK$149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一版